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之十



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

叶玉英 著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⑩ 之十

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

叶玉英 著

厦
门
大
学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叶玉英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9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ISBN 978-7-5615-3323-9

I. 古… II. 叶… III. ①汉字-古文字-构形法-研究②汉语-上古音-研究 IV. H121 H1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1312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361008)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沙县方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9×1240 1/32 印张:15.25 插页:2

字数:410 千字 印数:1~1500 册

定价:3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出版例言

一、为了促进我国国学研究的繁荣，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组织出版“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旨在鼓励海内外学者在国学领域的深入探索和研究。

一、本丛书的资助出版范围以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章程为依据，围绕着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产生划时代影响的朱熹理学这一核心，进而探索唐宋以来中国南方的思想文化、政治社会、民生经济、宗教习俗等各领域的演变发展，以及深入研究在朱熹与闽学影响下的闽台及周边区域的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尤其注重对东南海洋带文化传承的探讨，对中国文化在这些区域的演进，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努力建构国学研究的东南风格。

一、本丛书面向国际性、专门性研究的学术著作，本着百家争鸣、求同存异的原则，增进不同区域间的学术交流互动与中华文化认同。不同区域的学者各自遵循的学术规范和表述方式必然有所差异和区别，从充分尊重学术交往的立场出发，出版时尽量做到保持原著的面貌，原则上不做过多的更改与硬性的统一，相信读者能够正确地给予甄别和分辨。

一、本丛书采用中文简体字出版，允许对书稿进行合乎丛书体例的调适和出版技术规范的处理。惟征引典籍的个别异体字、通假字以及习用专有名称等姑仍其旧；遇有错讹字予以订正，正字置于方括弧〔 〕内。另须特别说明者，使用〔编者按〕予以注明。

序 一

近十几年的古文字学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这一是得益于大地对这一代人的恩赐,出土资料如井喷般不断涌现;二是因为出土资料的重要性对相关学科的刺激和影响,使得相关学科都不得不相应地改变自己,从而使得更多的人开始关注出土资料。虽然从相对人数来说,真正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人还是很少,因此这种繁荣昌盛在外人看来,颇有点自娱自乐的感觉,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人的学术热情。

说到古文字对相关学科的刺激和影响,首先就应该提到语言学。古文字研究与语言学的关系是最为紧密,最为直接的,古文字研究的长足进展,拓展和延长了汉语文字学的研究领域和学术纵深。

在古文字研究中,与传统小学相对应的形音义三要素,有关形、义的研究积累很多,研究相对更为深入,而有关音的研究却相对薄弱。这—是因为在语言中,音是变化最快,受地域影响最大的要素,有时很难把握;二是以往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大宗的不多,很多极为零散,难以提供一个完整的面,且受时代、地域的限制,很难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商周音系;三是古文字学与音韵学的学科渗透和交叉工作还做得不够,研究音韵的不懂古文字,研究古文字的对音韵又钻研不深,无法在掌握两个学科的高度上进行细密的分析考证。

随着出土资料的不断问世和古文字研究的不断深入,用出土古文字资料研究古代汉语的音韵问题,探讨古文字构形中音的作用及音与形体的复杂关系,并进而试图重新构建商周音系等课题,逐渐成为学术界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近几年用古文字资料研究音韵的文章逐渐增多,还出现了许多篇博士论文,就是这一焦点渐热并将成为热点的明显征兆。叶玉英的《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在利用最新的上古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古文字资料中选取了一个最好的切入点。这个切入点就是古文字构形学的最新成果和方法。古文字构形学强调科学的文字符号观,认为文字始终是处在变动的过程中,认识和分析文字要有动态的眼光。与文字相同,语音也是一个动态的因素,是不断在发展变化的。一个字的读音不可能亘古不变,而是不断在发生着音变。自古以来形体和声音就关系复杂,纠葛不断,而雅言和方言也是一直互相交叉、互相影响,这就决定了一个字读音的上古来源可能并不单纯。从这个思路出发,书中考察了中古精母字的上古来源、精组产生的时代、秦音中以母与喉牙音的关系、音随字变、字随音变等问题。这些考察都具备了“史”的观念和眼光,牢牢把握住了“声音是文字构成演变的枢纽”这一关键,这些考察的结论虽然还不能说就是定论,但的确是非同凡响的创见或极具启发性的意见。

古文字构形学研究的深入,使得对文字的拆分和分析更为细密,更有理致。这同时也为音韵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文字声韵的分析不再只是停留在考察一个形声字的声符这样简单的层面,而是把文字形体的最初构成、形体在每个时段演变的诸多细节、文字构形上的一些规律性的变化所体现出的声音的作用等都纳入到视野中来,并加以合理地解释和抉发。如此视角开阔了,思路和方法也就变得更为丰富。书中对文字分化、讹混、双

声符字、变形音化、变形义化、类化、饰笔等问题的探讨,正是在这一新的广阔视野下进行的新的学术尝试。这一尝试是可喜的,是值得提倡和发扬的。

本书一个很突出的优点就是在两条线上同时达到的深度。一条线是古文字构形学上的,一条线是音韵学上的。而要做到在两条线上同时出击并占领高地,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叶玉英做到了。这背后跳动着她追求学术的一颗顽强的心,浸透着她为学术付出的数不尽的汗水。

叶玉英本来的基础并不好,直到硕士从福建师大林志强先生读古文字学,才算真正走上研究的道路。到厦门大学从我读博后,她努力刻苦,勤于思考,抱着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古文字的世界中。在度过初期的迷茫后,很快就登堂入室,渐入佳境。这几年她不断参加博士生论坛和各类学术会议,也写出了很多篇不错的文章,还广泛与学术界同仁接触,切磋学术,探讨问题。学问和做人同时提升,道德和文章齐头并进,我看在眼里,喜在心上。

厦门大学语言文字学科人才荟萃,强手如云。李如龙先生的方言研究、李无未教授的音韵学研究、苏新春教授的词汇研究、曾良教授的俗字研究等都各自成家,蔚为大观。叶玉英身处其中,耳濡目染,一定会见贤思齐,追慕效法。如果假以时日,相信她会在古文字与音韵学之间找到最好的接口,沟通嫁接,探寻出新的学术之路,为传统的文字学和音韵学研究再立新功。而她的这本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新著,正可以当作再攀高峰的第一级台阶。

刘 钊

2009年7月2日

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序 二

汉字成为记录古汉语的载体后,成功地记载了灿烂的华夏文化,有力地促使中原的华夏语扩大其在中华大地和东亚的影响,把接触它的各原始族群纷纷融入中华文化的洪流中去。汉字在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所作的贡献,那不是高估,而是事实。

从前人们对汉字的表形成分印象深刻,甚至有人说汉字是象形文字,但如果光有象形那只是画,还不是文字,只有成功记录了有声语言的才是真文字。最初汉字是怎么记录古汉语这个有声语言的,就得依靠古文字的材料来说明。而寻求和研究古文字所用的各种表音手段,不仅是文字学的需要,也是汉语古音学的需要。

李方桂先生曾经指出:“古韵学的出路在古文字。”李新魁先生谈到如何进一步开展上古音的研究时也特别指出:“必须充分利用古文字研究的成果,把对古文字的研究和古音的研究结合起来。”

古音自然在古文字中。只有把古文字和古音学的成果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互相证明构建系统的可信性,特别是谐声系统和假借字系列的构建,复辅音声母的构建,并可互相促进各自难题的突破。

但在古文字研究领域,对古音学的关注一直是个薄弱环节。部分顾及古音的学者还往往沿袭旧说,对古音学的最新发展视而

不见,这样对已经解决的难点也一仍旧贯,未能突破,令人叹惜。

叶玉英的《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把重点放在古文字表音手段的探索上,这个选题是很有意义的。本书本着“声音是文字构成演变的枢纽”的精神去探寻古文字构形演变的规律,研究“音随字变”和“字随音变”两个方面。“音随字变”关注古文字构形特点所体现出来的语音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字随音变”则反过来研究语音的变化对古文字构形的影响,如文字分化、变形音化、双声符字、音同或音近所致讹混、方言形成的形声字异体,等等,这些研究对丰富古文字构形理论皆有裨益。作者广泛掌握了有关这些构形论题的最新成果以及古音最新成果,并在考论中予以运用。

本书关注语音的时空差别,对古文字材料数据注意区分时代和地域,这在其研究重点“中古精母字来源之古文字学证据”、“秦音中以母与喉牙音之关系考”中皆有表现。精母来源部分采用了郑张尚芳对精组古音的构拟,其列举的大量字例反过来证实了古音史上精母晚起的论断,这是一项新的成就。

在古文字构形研究上,对文字分化、讹混、双声符字、变形音化、饰笔、类化等古文字构形上的变化及其原因,皆试图从声音的角度进行阐释,这涉及上古音研究中疑难点,如复辅音的类型、分化的年代等。作者也都在讨论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于利用古文字资料参与上古音研究中争议的问题讨论是有益的。

不过文字分化与音最最常见应是转注字,这是“六书”中常易被误解的一类。我在1981年《上古音系表解》、1984年《上古音构拟小议》都曾指出:“转注”其实就是同字根变形的孳乳分化字(许慎“建类一首”即指同字根),可以分三类分化方式:(1)改笔或增减笔(吏太千百丕少享阵茶角皂),(2)加形(命含酒敬赐肇杵溢影凯峪),(3)加声(考鳳雞虺齿星釐夜荆必罔)。凡在原字根上加形加声而形成的次生“形声字”都实属转注。它们既是同字根分化

字,其语音自然本同,所以跟本书论题正相关,其字例文中也多有涉及,但未归于一类。而第三类尤其跟本题关系更深,可进一步专题拓展。目前本书列入双声符字的如“庠静翊”等或可列之,而有说“部分表意的双声符字”,如“星齿夜螯荆”等还是归加声转注类为妥,像“螯”本为扑来(麦)之象,“里”明为后来加声。语音成分添加的先后,对本书所强调关注的时代性是很有意义的。这一思路或可供作者以后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作者好学深思,在古文字的古音现象方面有所发现是很有价值的,对我的古音研究有一定佐证意义,是以乐为小序。

郑张尚芳

2009年8月于北京霞光里

目 录

序一/刘钊	
序二/郑张尚芳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选题的目的、价值及意义	1
一、选题目的	1
二、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4
第二节 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	8
一、研究材料	8
二、研究方法	11
第三节 百年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	17
一、古文字构形理论的初步架构	18
二、古文字构形规律的全面探索	22
三、古文字构形学的确立与完善	28
第四节 近 30 年上古音研究综述	61
一、上古音研究中尚存争议的问题	62
二、上古音的分期分域研究	95
第二章 中古精母字来源之古文字学证据	138
一、材料说明及研究方法	139

二、中古精母字来源之古文学证据	142
三、中古精母字来源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222
第三章 秦音中以母与喉牙音之关系考	230
一、秦音中以母与影母的关系	231
二、以母与牙音见组的关系	236
三、关于以母与见组声母的关系的讨论	241
四、认清以母与喉牙音之关系在古文字考释中的作用	242
第四章 论音随字转	245
一、因误认声旁而改变读音	248
二、受与之形近的另一字的影响而读为其音	252
三、因自身形体变化而造成的音变	256
四、因误认两字为一字异体而混淆读音	259
第五章 论字随音变	262
第一节 音是文字分化的枢纽	265
第二节 语音与形声字声符的变化	285
一、语音演变与形声字声符的替换	287
二、战国时期方言与形声字异体	294
第三节 音与讹混	303
第四节 音与饰笔	316
第六章 变形音化	325
第一节 变形音化是古文字构形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325
一、变形音化现象的研究概况	326
二、注重标音是变形音化现象的内在驱动力	335
三、变形音化的若干理论问题	339
第二节 变形音化举例	342

一、甲骨文中的变形音化	342
二、西周金文中的变形音化	346
三、春秋战国文字中的变形音化	353
第七章 双声符字研究	378
第一节 双声符字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378
一、关于双声符字概念的讨论与界定	379
二、双声符字产生的原因和必然性	383
三、双声符字的来源	386
第二节 双声符字考	388
一、甲骨文中的双声符字	388
二、西周金文中的双声符字	396
三、春秋战国文字中的双声符字	409
引用书目简称表	421
参考文献	423
后 记	467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的目的、价值及意义

一、选题目的

山川呈瑞,地不爱宝。随着地下出土文字资料的不断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文字研究进入了新的高峰期,古文字学作为一门学科也日趋成熟。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研究方法日益精密,主要表现在:(1)“以形为本,辅以音义”已成为每一个古文字学者遵循的法则。(2)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饶宗颐先生又提出三重证据法,即考古资料、地下出土文献和典籍相结合。第二,理论建构:新时期以来,不少学者开始重视总结古文字学理论,并取得一些成果。如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高明先生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林沅先生的《古文字研究简论》,陈炜湛、唐钰明先生的《古文字学纲要》,陈世辉、汤余惠先生的《古文字学概要》,刘钊先生的《中国文字学史》、《古文字构形学》,黄德宽先生的《古汉字形声结构论考》、《汉字理论丛稿》,黄德宽、陈秉新先生的《汉语文字学史》,詹鄞鑫先生的《汉字说略》,赵诚先生《甲骨文文字学纲要》,李圃先生的《甲骨文文字学》,何琳仪先生的《战国文字通论》,林志强先生的《汉字的阐释》,邹晓丽等著的《甲骨文字学述要》等都是对古

文字学进行理论总结的著作。第三,古文字考释:甲骨文、金文的考释工作已经解决了大部分,仅剩部分疑难问题尚待解决。战国文字研究也日益成熟,已经形成不少分支,如铜器文字、简帛文字、玺印文字、货币文字、兵器文字、陶器文字等。不断出土的战国文字资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到古文字考释的工作中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目前古文字研究仍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多数学者热衷于古文字考释工作,而疏于理论上的建构和创新。在古文字资料特别丰富、古文字研究空前繁荣的情况下,对古文字构形进行专题研究的仍然不多。第二,在古文字研究中很少吸收上古音研究的新成果,更谈不上对声音在古文字构形上的影响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第三,无论是论证字形还是讨论古音,特别是在谈到音的时候,往往缺乏时空的观念,以“古音”二字涵盖从殷商到东汉 1000 多年的语音。

在上古音研究方面,近二三十年来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将专设一节进行概述,此不赘述。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如何利用古文字资料对上古音进行分期分域的研究。其中关于殷商音系研究的主要成果有:赵诚先生的《商代音系初探》、《上古谐声和音系》,管燮初先生的《从甲骨文的谐声字看殷商语言声类》,陈振寰先生的《音韵学》,郭锡良先生的《殷商时代音系初探》,陈代兴先生的《殷墟甲骨刻辞音系研究》,董琨先生的《周原甲骨文音系特点初探》,王文耀先生的《殷周文字声类研究》等;关于西周音系的研究主要有:郭锡良先生的《西周金文音系初探》,刘志成先生的《西周金文音系的声母》,师玉梅先生的《西周金文音韵考察》等;关于战国各地语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汪启明先生的《先秦两汉齐语研究》,赵彤先生的《战国楚方言音系》,姜允玉先生的《中山王铜器铭文中的音韵现象初探》,周祖谟先生的《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李玉先生的《秦汉简牍帛书音系研究》,刘宝俊先生的《秦汉帛书音系》,赵振兴、陈灿先生的《〈周易〉通行本与帛书本异文声母研究》等。尽管他们的研究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成绩是

主要的,不失为积极的探索。他们的指导思想尤其值得倡导:首先,主张研究上古音的主要依据应该是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传统的谐声、通假、经籍异文等材料以及亲属语言的同源比较、域外对音等资料只能作为佐证。其次,认为语音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这就克服了传统音韵学研究中的弊病:以一个上古音系统统摄从殷商到魏晋长达1000多年的语音时段。上古音研究已不再如林语堂先生所批评的那样“没有精确的时代观念、没有地理观念”。^①

本课题的研究就是沿着这一指导思想,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声音在古文字构形上的影响进行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期达到以下目的:

第一,进一步丰富古文字构形理论,以时空为线索,由一系列专题构建一个理论框架。

本课题将本着“声音是文字构成演变的枢纽”这一精神去探寻古文字构形演变的规律。研究的主题包括“音随字转”和“字随音变”两个方面。“音随字转”主要是研究古文字构形上的特点所体现出来的语音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并以此为依据,试图解决上古音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字随音变”则是反过来研究语音的变化对古文字构形的影响,如语音演变与文字分化、变形音化、双声符字、音同或音近而造成的讹混、由方言因素而形成的形声字异体,等等。这些研究对丰富古文字构形理论应该是有所裨益的。

由于语音具有时空的差别,所以我们在利用古文字资料的时候始终注意区分材料的时代和地域,使得我们的研究更具有说服力。本书的主体由“中古精母字来源之古文字学证据”、“秦音中以母与喉牙音之关系考”、“论音随字转”、“论字随音变”、“变形音化”、“双声符字研究”六个专题构成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具有扩展性,因此我们可以在今后的研究不断地去丰富、充实它。

^① 林语堂《前汉方言区域考》,《林语堂名著全集·语言学论丛》,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第二,在古文字构形研究方面,对文字分化、讹混、双声符字、变形音化、饰笔、类化等古文字构形上的变化及其原因从声音的角度进行阐释。同时,在一些问题的研究上希望有所突破,如形声字是一个已经被研究得很深入透彻的问题,前贤对形声字的来源、结构类型、声符的变化模式等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本书将从语音的时代和地域上的差异和变化来研究形声字声符发生变化的原因,并从另一方面对所有汉代以前的形声字从来源上进行分时代和划地域的研究,从而使上古音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如复辅音的类型、分化的年代等有所突破。

第三,解决上古音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语音是动态的,是不断发展演变着的,因此,字的读音不可能从远古时代一直到中古仍然不变,这期间有可能发生音变,而且可能不止一次音变。同时,自古以来雅言和方言都是交叉发展、相互影响的,因此一个字读音的上古来源有多种可能性。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将考察中古精母字的上古来源、精组产生的时代、秦音中以母与喉牙音之关系等问题。

二、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1. 结合上古音研究的新成果来研究古文字已成为当务之急。

古文字考释实际上就是要解决一个字的形音义三方面的问题,所以不能不谈古音;古文字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如形声字、双声符字、变形音化、一字异读等跟语音的关系自不必说,其他如饰笔、讹混、文字分化等也都与声音密切相关。如从甲骨文到隋唐俗字,饰笔伴随着古文字发展演变的始终。饰笔本是人们出于对形体进行美化或装饰的角度而添加的与字音字义都无关的笔画,是文字的羨余部分。^①有的饰笔后来脱落了,有的成为文字构形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有的成了声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必”字,金文“必”字作“𠄎”(南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宫乎钟),郭沫若先生指出:“必即秘也。弋象秘形,八声。”^①裘锡圭先生也认为“必”是“秘”的初文,从“八”声,但不从“弋”。^②甲骨文“必”作“𠄎”“𠄏”“𠄐”“𠄑”“𠄒”“𠄓”等形,金文“必”字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添加饰笔而成的,后来所加饰笔固定成为构字部件以表音;又如有的“讹混”是由于音同或音近造成的。如《睡虎地秦简》“雄”字作“𠄔”(睡·日甲 70)，“又”字作“𠄕”(睡·日甲 14 背)，“宏”与“右”混。古音“右”在匣纽之部，“宏”在匣纽蒸部；再如文字分化现象贯穿在文字发展演变的始终，造成文字分化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却是我们应该明确的，即音是文字分化的线索。因此及时地、充分地吸收上古音研究的新成果十分必要。然而，当前古文字研究在吸收上古音和上古方言研究新成果方面严重滞后。大多数学者还是手捧郭锡良先生的《汉字古音手册》或唐作藩先生的《上古音手册》等 80 年代的著作，而无视近 20 年来古音学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滞后给古文字研究带来的严重后果并未引起重视。可以这样说，古文字研究如果不能及时利用音韵学研究的新成果，在很多问题上就难以取得突破，甚至得出错误的论断。

2. 充分利用古文字资料以及古文字研究的新成果来研究上古音是上古音研究的新出路。

李方桂先生曾经说过：“古韵学的出路在于古文字。”^③早在 1984 年，著名音韵学家李新魁先生在谈到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上古音的研究时就特别指出：“必须充分利用古文字研究的成果，把对古文字的研究和古音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古文字（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

①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金文丛考》，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年。

② 裘锡圭《释“秘”》，《裘锡圭自选集》，郑州：大象出版社，1994 年，第 27～28 页。

③ 转引自曾宪通《从“蚩”符之音读再论古韵部东冬的分合》，《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7 年，第 753 页。

字、秦汉文字)所提供的材料和所展示的问题运用到古音的研究上来,特别是谐声系统和假借字系列必须进行新的、更深入的研究;找出确切的、较为完整的体系,为古音的研究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佐证。”^①向光忠先生也指出:“古文字蕴涵古声韵,古声韵寓于古文字。古声的考索,古韵的推究,既可由古文字探察具体征迹而多所发现,亦可由古文字参合有关佐证而相得益彰。在古声韵研究中,古文字之可供考察而发挥功效者,或为古文字构造之成素所透示的古音表征,或为古文字同源之关系所透示的古音征迹,或为古文字应用之变易所透示的古音迹象。这样,古韵部之考定,便借谐声印证韵语之相协,而以谐声弥补韵语之局限,使分部由粗疏臻于精细;古声类之推求,亦由谐声结合通假及异文,并同其他关联材料相参证,使分类由茫然趋于认识。此外,古文字的诸多相关资料也有助于各声类与各韵部的音值构拟。”^②在这一点上,老一辈古文字学家已经为我们做了典范,如于省吾先生《甲骨文字释林·释卣》、吕兼论古韵东冬的分合》,曾宪通先生的《从“出”符之音读再论古韵部东冬的分合》,裘锡圭先生的《从殷墟卜辞的“王占曰”说到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等都是利用古文字研究古音的佳作。

3. 本课题力图从声音对古文字构形的影响的角度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论述。

第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这一特性决定了文字的构成演变必然受语音的影响。语言先于文字,语言先有义然后有音而后才有文字,而文字记录语言的过程正好相反,即文字是用“形”来记录语音,从而表达语词的意义。因此,人们造字时必然非常重视

① 李新魁《汉语音韵学研究概况及展望》,《音韵学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页。

② 向光忠《古文字与古声韵之参究刍说——兼示〈说文〉古籀篆文谐声系统之学术价值》,《说文学研究》第1辑,武汉:崇文书局,2004年,第103~104页。

文字的标音作用。在甲骨文中,形声字就已经超过 20%,假借字被大量使用,也出现部分双声符字,一些象形或会意字实际上也含有表音成分,凡此种种都表明古人在造字之初就已经非常重视使用表音的造字方法。同样,人们在使用文字记录语言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古人的很多知识都是靠口耳相传的情况下,在潜意识里必然受到声音影响。至今我们在认读字的时候还普遍存在“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的心理,这一心理实际上就是把所有文字都当成形声字来读,而不管这个字是不是形声字。古人也有这种心理。李家浩先生曾撰文阐释古文字中的异读现象,举了八个例子:读“躬”为“身”、“豕”为家、“翠”为“卒”,“山”为“口”、“𠂔”为“黍”、“喜”为“豈”、“吉”为“士”、“去”为“大”等。^① 此类异读,说穿了也就是古人“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的心理的反映。这种注重表音的心理也必然在文字构形上有所反映,如形声字声符的变化、双声符字、纯表音字、变形音化等现象的增多。

语音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的,不同时代的语音必定有所不同,这也必然表现在文字构形上。如当有的形声字的声符已不能准确表音的时候,人们就通过替换声符、叠加声符或使某一构字部件变形音化的方式进行更为准确的标音;又如,商代有复辅音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复辅音 *mr-* 的例子如甲骨文中“命”、“令”同字,“柳”从卯声,“吝”从文声等。大约在战国晚期,复辅音 *mr-* 开始分化,到汉代彻底分化。这种分化也能从古文字构形中得到反映。如西周金文虽然已有“命”字,但一直到春秋,甚至战国中期,“命”与“令”仍可通用。战国晚期的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中“命”、“令”已截然分开,可知此时 *mr-* 已分化。

声音对古文字构形的影响还表现在方言的影响上。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长期割据混战,其结果是“田畴异亩,车涂异轨,

^① 李家浩《从战国“忠信”印谈古文字中的异读现象》,《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第9~19页。

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文字异形”是说各国记录同一语词所使用的字往往不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就是受了各地方音的影响。

第二,正因为声音对古文字构形的影响是必然的,所以对此进行全面考察是必要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通过考察,既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声音在汉字构成演变中的枢纽作用,又有利于汉字性质的讨论以及科学的语言文字观的确立。

第二节 研究材料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材料

本书所使用的材料有三类:第一类是甲骨文、金文、出土简帛中的通假和谐声资料,第二类是古文字的字形资料;第三类为《史记》、《说文》、杨雄《方言》等典籍资料。时间跨度为从殷商到汉代。采用原则是:(1)以古文字资料和出土文献材料为主,典籍资料为辅;(2)对于谐声、通假关系的认定,尽可能取学界一致的说法,放弃那些还有争议的材料;(3)有些字虽然从构形上可以确定为双声符字,但未见于后世字书,因无法确定其读音,故不予采用。如甲骨文有字作“𠩺”(合 18663 正)“𠩺”(英 725 正),可隶定作“𠩺”。古音“户”在匣纽鱼部、“黄”在匣母阳部,二字双声,韵为阴阳对转,由此似可确定“𠩺”为双声符字,但因“𠩺”未见于后世字书,所以我们无法确知“𠩺”的读音,因此也就不能肯定“𠩺”为双声符字。材料的主要来源有:

1. 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1—13 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上、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

3. 伦敦大学亚非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英国所藏甲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

4. 电子版《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
5. 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甲骨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1—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4年。
8.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9. 刘雨、卢岩编著《近出殷周金文集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10.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金文引得》，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11. 汤余惠《战国铭文选》，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
12.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侯马盟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
13.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1—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08年。
14.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包山楚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15.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16.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1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1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望山楚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1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2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21.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22. 中国文物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龙岗秦简》，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23.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帛书》（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帛书》（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帛书》（四），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24.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25. 张家山247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武威汉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27.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编《武威汉代医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
28. 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30. 袁仲一《秦文字通假集释》，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
31. 王辉《秦文字集证》，台北：艺文印书馆，1999年。
32. 王辉《古文字通假释例》，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年。
33. 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
34. 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5. 高明《古文字类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36. 汤余惠主编《战国文字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37. 李守奎《楚文字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38. 曾宪通《长沙楚帛书文字编》，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39. 张守中《郭店楚简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40. 张守中《包山楚简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41. 张光裕、袁国华《望山楚简校录》（附文字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4年。
42. 高明《古陶文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43. 袁仲一《秦代陶文》，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
44. 顾廷龙《古陶文彙录》，上海：上海医学书局，1938年。
45. 张颌《古币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6. 商承祚等《先秦货币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
47. 罗福颐《古玺汇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48. 罗福颐《古玺文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49. 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
50. 许雄志《秦印文字汇编》，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
51.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秦铭刻文字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6年。
52. 孙慰祖、许谷富《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年。
53. 汉语大字典字形组编《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5年。
54. 陈松长《马王堆简帛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55. 骈宇騫《银雀山汉简文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56.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篇》，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57. [宋]郭忠恕、夏竦《汗简·古文四声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58. [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

二、研究方法

（一）古文字研究与上古音研究相结合

本书的研究力图达到古文字研究与上古音研究的有机结合。在研究古音的时候，充分利用出土古文字资料，及时吸收古文字研究的

最新成果。反之,尽可能全面地吸收上古音研究的新成果来解释古文字构形变化的原因。

(二)谐声资料与通假资料互证

1. 对谐声和通假资料进行断代

谐声材料是上古音研究的重要依据。以往的研究主要依据《说文》的谐声资料,然而,研究者发现,同一声符所组成的一组谐声字的声母往往不同,甚至差别很大。《说文》所收谐声字是经过了1000多年的累积,很难分清每个字形成的年代,因此不能作为我们研究的主要依据。早在20世纪30年代,魏建功先生就指出:“得将谐声字的时代划定,不能先后笼统混合。许慎《说文解字》所指明的谐声字是基本材料,而又必须与甲骨文金文对照审查。”^①在谈到如何使用文学作品中的通假资料时,魏先生强调要“同时认定‘时’、‘地’的确证。”^②孙玉文先生也指出:“研究上古声母的直接材料有谐声字、联绵词、假借字、异文、声训、汉代的注音等。利用这些材料研究上古声母,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要区分它们所反映的时代层次。……对于一个谐声字,我们应区分其造字时代和用字时代……对于假借字,我们应当区分始借时代和沿借时代。”^③

同理,以往认为音近可以通假,其实也是因为典籍中的通假资料分不清时代,所以人们就认为音近可以通假。语音是发展演变着的,汉语的历史悠久,地域广阔,不仅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语音不同,即使是同一时期不同地域之间的语音也有差异。因此,现在我们看来音近而通假的两个字,本来应该是同音的,后来语音发生了变化,成了音近的两个字。“音近”指的是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相近,有发生音变的可能性。

① 魏建功《上古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4页。

② 魏建功《上古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6页。

③ 孙玉文《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一)》,《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1期。

因此,本书所用谐声和通假资料一律采用明确的时代、地域,否则弃之不用。

2. 确立谐声和通假原则

(1) 谐声原则

李方桂先生曾定了两条谐声原则:

A、上古发音部位相同的塞音可以互谐。

a、舌根塞音可以互谐,也有与喉音(影及晓)互谐的例子,不常与鼻音(疑)相谐。

b、舌尖塞音互谐,不常与鼻音(泥)谐。也不跟舌尖的塞擦音或擦音相谐。

c、唇塞音互谐,不常与鼻音(明)相谐。

B、上古的舌尖塞擦音或擦音互谐,不跟舌尖塞音相谐。

以上两条原则实际上指的都是同部位之间的相谐,而谐声资料所显示的情况远要复杂得多,因此李方桂先生又指出:“依这两条原则当然实际上可以发现些例外。”^①古文字资料所显示的谐声关系远比李先生所定的原则要复杂,但无论怎么复杂,我们认为同谐声的一组字必有同样的来源,中古同一谐声偏旁的字之所以不同音,是后世的音变造成的。傅东华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夫所谓谐声者,本当声与韵无乎不谐。”^②朱声琦先生亦主张“谐声必同声,谐声偏旁相同的一组谐声字,其声母也必然相同或相近。”^③郑张尚芳先生所认同的谐声原则是:同声符及同词根的字,其读音自应相同,或者相近(作为其变式)。^④

(2) 假借原则

关于假借原则,前贤多有论述,如林沅先生认为假借是指对某个

①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0页。

② 傅东华《汉语声纽变转之定律》,《学林》第10辑,1941年。

③ 朱声琦《段氏注〈说文〉,重韵不重声》,《山东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

④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页。

语词来说,原来没有相应的记录符号,规定用记录另一同音词的符号来记录这个词。林先生还称本有其字的通假为“同音代用”。“同音代用”就是“写白字”。^①何九盈先生认为假借的重要依据就是“同音”,即声、韵、调全同。据他的考察,先秦两汉的假借字,声、韵、调相同的占多数,是正例,调不同而相借的占少数。这个“少数”得以产生的原因,可能有古方言问题以及语音演变等问题,也有可能写错别字的人取调近的字造成的。^②潘悟云先生也曾举例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指出:现代人一般是用同音字作为别字,“手帕”可以写成“手怕”,但是一般不会写成“手坝”。不过也不排除出现少数近音别字的可能,特别是找不到同音字可以替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是,假借与个别人写别字又有所不同,假借是一种社会行为,假借字需要得到社会的承认,所以只有同音才能假借,个别人可以把“手帕”写成“手坝”,但社会上肯定是不会承认的,社会宁愿承认同音的假借字。所以认为假借必须同音的原则还是正确的。^③裘锡圭先生曾举了一些现代人用别字的例子,如现代人把“脖颈(gěng)子”的“颈”改为“梗”,把“张家(ge)庄”、“庞家庄”的“家”改为“各”,把“叫化(huā)子”的“化”改作“花”,把“木樨(也作犀,音 xū)肉”、“木樨汤”里的“樨”改为“须”,等等。^④裘先生所举之例也说明假借必须是同音的。诸位先生讨论假借原则都是从现代人写别字的语言心理推测古人的通假规则。假借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因为人们在用字时由于一时写不出本字而临时借用一个同音字。我们注意到,出土文献中出现的假借字有很多比本字更难写,笔画更复杂。^⑤有的笔画很简单很常用的字,人们不可能不会写,却假借笔画更繁复的字为之,且通常是写成以之为

① 林沅《古文字研究简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3、30页。

② 何九盈《音韵丛稿·古无去声补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97~198页。

③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37页。

④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97页。

⑤ 此蒙刘钊先生提示。

声符的字,如“主”假借“宐”为之(郭店《性自命出》);“示”假借“视”为之(郭店《缁衣》);“工”假借“攻”为之(曾);“酉”假借“栖”为之(包山);“即”假借“節”为之(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王章》、睡虎地《效律》);“云”假借“员”为之(郭店《缁衣》);“甫”假借“誦”为之(睡虎地《法律答问》);“虎”假借“臙”为之(曾);“令”假借“斂”为之(包山),等等,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这说明古人使用假借字更大程度上是因为古人的学问是口耳相传的,所以人们在用字的时候十分重视听觉,只要是同音字,想到哪个字就用哪个字。当然,这种借用必须有代表性和普遍性,即同样的借用发生在不止一个人身上,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以流传和推广。典籍中大量的通假字之所以得以流传,说明每个时代的人使用通假字的原理是一致的,即同音才可能通假。

要确立假借必须音同的原则,还必须对典籍中流传下来的大量假借字只是音近的现象做出解释。我们认为这是历时与共时的问题。我们说通假必须音同是从共时的角度而言,即对于同一时代的人而言,这些通假字是同音的;而我们看到的大量的音近通假则是历时的因素造成的。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引其父王念孙说:“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所谓“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从词义训诂的角度来说的,指的是要读出本字的含义;另一层含义就是说假借字与本字的读音已有距离,用后世人的读音来读这个假借字,很难找出本字。所以清儒常叹“破假借之难”。裘锡圭先生特别强调假借现象中的历时因素,他说:“古代往往借‘麋’为‘眉’,有时还借‘麋’为‘湄’。据中古的韵书,这三个字都读武悲切,但是在普通话里,‘麋’就读为 mí,‘眉’和‘湄’读为 méi,‘麋’字本义跟假借义的读音就有了差异。”“有时候,假借也能起减少一字异音现象,使文字更好地反映读音的作用。例如在一个字有了变音的引申义之后,如果不造分化字的话,有时就假借一个跟这个引申义同音的字。如借‘闲’字表示‘閒’字的变音引申义闲暇的‘闲’,借‘茶’

字表示‘塗’字的变音引申义‘搽’。”“有的词由于用为某个复合词的一个成分或其他特殊原因而发生音变(有时实际上是保持了较古的语音)。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时也会假借一个能够反映实际语音的字来代替原来所用的字。^①裘先生的这些论述我们认为包含以下几层含义:第一,从历时的角度看,一些通假字与现代人的读音已经有了差距,但在上古或中古时期的语音中它们是相同的;第二,有些假借字的产生是为了记录变音引申义。所谓“变音引申义”是指表示引申义的词的读音与表示本义的词的读音不同,发生了变化。为了更加准确地记录这个“变音引申义”的语音才用假借,音同的字应该是首选;第三,从后世人用字的角度来看,当遇到语音发生变化的情况时,人们往往以当时人的读音为准来选用假借字,以反映当时的实际语音,也就是选用一个与当时读音相同的字来作为假借字,而不管这个字以前的读音。总而言之,尽管裘先生承认音近假借,但从他的具体论述来看,他也认为假借必须音同,所谓音近是历时的音变造成的。他说:“一个字的本义和假借义的读音,在开始的时候即使并不全同,至少也是很相近的,二者之间比较明显的差异一般是后来的语音演变所造成的。”^②

谐声和通假中表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语音现象正好可以成为我们研究语音演变的好材料。魏建功先生早已指出这一点,他说:“‘其’、‘厥’、‘蚌’、‘眉’的音依后世韵书是有‘阴、入’的不同,‘阳、阴’的不同,以及‘清、浊’、‘喉、牙’的分别,从这种材料上我们就可以发生种种的问题和解释。”^③林英津先生以《太平御览》中的一则语料“黑鈇之错”为例探讨声符置换的异体字所反映的音韵转换,认为“鈇”与“鉛”之声符替换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台”后来虽然读喻四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97页。

②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96页。

③ 魏建功《上古音系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2页。

声母,原来却是圆唇舌根音声母;二是表明侯、东与元部韵的转换。^① 龚嘉镇先生剖析了从“台”谐声系统的古今音变,发现整个谐声系统与声符字“台”的古今韵变是同步的:上古之部的开口呼在中古分化成了之咍二韵;从“台”的谐声系统也体现了定、透、喻在声类上的分合。^② 林英津、龚嘉镇两位先生试图从错综复杂的谐声关系中寻找音变规律,这是非常有益的尝试,值得我们提倡。

(三)以时空为线索,由一系列专题构建一个理论框架

1. 这种框架结构既体现语音演变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又有利于问题的横向展开和纵向深入。

2. 这种框架还具有灵活性。具体表现在:第一,以一个母题带动多个子题,如“音随字转”是个母题,在这个母题下,只要是有关以形证音的,都可纳入,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多地解决一些上古音研究中的有争议的问题,如“复辅音”、“章组产生的时代”、“日母与泥母的关系”、“以母与见组的关系”、“庄组产生的时代”、“群匣云的关系”、“祭月分合”、“之幽交涉”、“幽侵、宵谈对转”等问题;第二,有利于对一些问题做专题性的研究,如“秦音中以母与喉牙音的关系”、“秦、楚两系语音同源”等。

第三节 百年来古文字构形研究概述

古文字构形研究是指研究古文字的构成方式和演变规律的学问。具体包括古文字的产生、古文字的初始形态、古文字构形的基本分类、六书分析、古文字中的繁化、简化、类化、音化、分化、美化、符号化、变形音化、讹变、借笔等问题。^③ 纵观古文字研究百年来的历史,

① 林英津《从“黑鈇之错”论古汉语若干声符置换的异体字》,《语言学问题集刊》第1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龚嘉镇《从“台”谐声系统的古今音变》,《汉字汉语汉文化论集》,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

③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页。

古文字构形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重视文字的产生、文字的初始形态、古文字构形的基本分类、六书分析的研究，时间大约是从20世纪20—60年代；第二阶段指的是20世纪70—80年代，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文字构形演变规律的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古文字构形的研究进入了理论构建期，古文字构形理论趋于系统化，并日益完善。古文字构形是古文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古文字构形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古文字学日益成熟的标志之一，因此对古文字构形研究做一个全面的回顾和总结十分必要。本书所要论及的古文字指《说文》小篆以前的所有文字（《说文》小篆除外，但包括《说文》古文、籀文）。

一、古文字构形理论的初步架构

1899年殷墟甲骨发现以后，中国文字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即开始了真正意义的古文字研究。学者们不再局限于《说文》研究，金文也不仅仅被用于订补《说文》，甲骨文、金文考释工作全面展开。至20世纪30年代，古文字考释成果可谓硕果累累，但古文字学作为一门学科尚未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理论。唐兰先生首先意识到理论建设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1935年，他撰成《古文字学导论》，这是最早的一部关于古文字构形理论的专著。^①《导论》涉及的古文字构形问题有：（一）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产生的时代。唐先生批驳了八卦说、结绳说和仓颉造字说，认为文字的产生是自然趋势，

^① 在唐兰先生之前，清代学者王筠在《说文释例》中谈到不少文字构形规律。如“两借”、“文饰”、“分别文”、“体同音义异”、“或体”、“俗体”、“籀文好重叠”等，但王筠的研究局限于《说文》小篆，且以六书为框架。孙诒让在《古籀拾遗》、《古籀余论》中成功地采用偏旁分析法来考释古文字，是对古文字构形研究的一大贡献。我们之所以认为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导论》是最早的一部关于古文字构形理论的专著，是因为《导论》论及的不仅仅是汉字结构问题（六书），而是用动态的历史的文字发展观广泛地考察汉字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探索文字内在演变规律。他的研究的重心是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不再局限于《说文》小篆。

并非一两个人所创造,并假定中国的象形文字至少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象形象意文字的完备至迟也在五六千年前,而形声文字的发轫,至迟在3500年前;(二)上古文字的构成。唐先生打破传统“六书”理论的束缚,提出“三书”说,即象形、象意、象声;(三)文字演变的规律。唐先生指出:“形的分化、义的引申、声的假借是文字演变的三条大路。”(四)字形演变的规律:1. 简易。原始文字近于图画,写起来太费事了,于是把笔画太肥不便刀笔的地方用双钩或较瘦的笔画表现出来,这就促使文字走向线条化。到了形声文字发展以后,许多文字都是由上下或左右两部分组合的,由此许多图形文字由整个图形分析成两半,太繁的文字往往省去一部分。2. 增繁。一是因为文字的结构趋向整齐,所以在许多地方添一些笔画,使疏密匀称;二是因形声文字的影响,有些本是图形文字,又注音而成形声字;三是有的象意字改为形声字;(五)文字通转规律:1. 有些形式在后世看来很有分别的,但在当时却是从一个系统里演变出来的,所以可以通用,也可以随便写;2. 凡同部的文字,即由一个象形文字里孳乳出来的,在偏旁里可以通用;3. 凡义相近的字,在偏旁里可通转;(六)字形的混淆和错误。^①

如果说《导论》还只是对古文字构形理论的初步探索,那么于1949年问世的《中国文字学》则可谓初成系统了。在这本书里唐先生更加深入地阐明了文字的发生、文字的构成、文字的演化、文字的变革等问题,还提出了一些新的论题,如“孳乳、转注、緼益是形声字产生的途径”、“声化”、“省变”、“倒文”、“正反无别”、“反文”、“割裂笔画”、“复体字的字母式排列”、“一个字偏旁位置的随意性”、“趋简”、“好繁”、“同化”,等等。^②这无疑进一步丰富了古文字构形理论。

六书研究是自宋以来学者用力最多的问题,但始终未能摆脱《说文》的巢臼。除了唐兰先生提出的“三书说”敢于打破旧说以外,林义

①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

②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光先生是另一个在这个问题上有重大突破的学者。1920年,林义光先生的《文源》一书问世,内附《六书通义》。在《六书通义》中,他提出了一套新的六书理论,对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之旨做了新的阐释。^① 林义光先生在六书理论上的发明主要有:第一,他为一些用传统六书理论无法解释的文字现象找到了理论上的归宿,如“形变指事”、“二重形声”等;第二,从文字产生、发展、孳乳分化的历史出发,探索了形声字的来源;第三,视转注为汉字孳乳大法,从而较为合理地阐明了转注造字之旨;第四,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的角度,倡导假借是一种“不造字”的造字法。然而,由于林义光早歿,所以他的六书理论也随之湮没,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马叙伦先生的六书研究长期以来也未能得到应有的关注。他提出“六书二系”说,将六书分“形系”和“声系”,象形、指事和会意属“形系”,假借、形声和转注属“声系”。^② 1956年,陈梦家先生在唐兰先生的“三书”说基础上提出新的三书说,即象形、假借、形声。他认为假借字必须列为汉字的基本类型之一,象形、象意应该合并为象形。^③ 1968年,李孝定先生发表了《从六书的观点看甲骨文字》一文。此文对六书说的分组和次第提出新的看法,他把六书分为象形(表形文字),指事、会意(表意文字),假借、形声、转注(表音文字)三组。六书的次第为:象形、指事、会意、假借、形声、转注。他认为转注字不过是形声造字大量应用以后所造出来的古今音殊字和方言音殊字,它本身只能说是形声字,所谓转注,是说它和另一个字的关系而已。^④

① 林义光的六书理论虽然也沿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些旧称,但含义却与旧说大不相同。关于他的六书之旨详见叶玉英《〈文源〉的文字学理论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② 马叙伦先生的六书理论见其《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李春晓先生对此做了专题研究,参看李春晓《马叙伦“六书说”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③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④ 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31~39页。

这一时期著述较多的还有两类，一类是关于文字起源及源流的，如沈兼士先生撰有《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的文字画》、《造字原则发展之程叙说》、《初期意符之特性》、《文字形义学》等文，对文字起源、造字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① 其他还有蒋善国先生的《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胡棣华先生的《文字源流》、易坤先生的《文字源流讲义》、李天根先生的《中国文字来源及变迁》等；另一类是在文字学通论性的著作中论及古文字构形问题，如杨树达先生的《中国文字学概要》、容庚先生的《中国文字学》、朱宗莱先生的《文字学形义篇》、丁山先生的《中国文字学通论》、吴其昌先生的《古代文字学》、孙海波先生的《中国文字学》、陆和九先生的《中国文字学讲义》、蒋善国先生的《汉字形体学》等。

由于历史原因，五六十年代的论著较少，如郭沫若先生的《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释说到殷代已在进行文字简化》对汉字简化问题只是简单一提，没有作进一步的阐述。^② 梁东汉先生的《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是影响较大的一部书。此书对古文字构形演变规律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所论的问题有：（一）探索汉字发展的内在规律，指出形声字产生的九种途径、汉字发展的内因和外因、简化和繁化是汉字发展的两大趋势；（二）指出汉字结构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一些规律和特性，如异体繁多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结果、行款对结构的影响、汉字结构的内在平衡律、汉字结构的复杂性、字体演变对于结构的影响等；（三）总结出汉字新陈代谢的规律，一是假借字的产生和大量使用；二是标音的形声字的出现；三是不标音的字转化为标音的字；四是义符的音符化等。^③

① 上述沈兼士先生诸文均已收入《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② 郭沫若《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释说到殷代已在进行文字简化》，《文物》1959年第7期。

③ 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

二、古文字构形规律的全面探索

20世纪70—80年代,随着古文字学的兴盛和发展,古文字构形研究也进入了全面探索阶段。

这一时期由于考古发现大量史前陶文,文字的起源问题再一次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李孝定先生在《从几种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观察蠡测中国文字的起源》、《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符号与文字——三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汉字起源的一元说和二元说》等文中指出:(1)半坡陶文应是已知最早的汉字,迄今6000—5500年;(2)从半坡陶文中已有相当数量的假借字的情况来看,汉字应已经历了象形、指事、会意三个阶段;(3)半坡时代应该有更多象形会意的文字;(4)汉字的起源是单元的。^① 郭沫若先生的看法与李先生略有不同,他认为半坡陶文距今6000年,是汉字的原始阶段,创造它们的是劳动人民。郭先生还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有指事和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先于象形系统。^② 裘锡圭、汪宁生、姚孝遂、高明诸先生也先后发表了他们对史前陶文与汉字起源关系的看法。四位先生一致认为因为史前陶文不能记录语言,所以不属于严格意义的文字的范畴。高明先生称之为“陶符”,认为陶符与陶文有本质的区别。陶符自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开始,中间经过商代,直到春秋战国时期,不仅始终是每器只用一个符号,而且一直是独立存在,从不与汉字共同使用。形体依然如旧,仍非常原始。^③ 对此李孝定先生认为史前陶文之所以不能记录语言,是由陶器上刻画符号的特性所决定的,即陶器上除了极少数特定的目的外,少有大量使用文

① 李孝定先生诸文皆已收录于《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②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正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

③ 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讨》,《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姚孝遂《古文字的符号化问题》,香港中文大学《古文字学论集》,1983年;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

字的机会。符号与文字,本是一物的二名,有的因约定俗成而成为文字,有的因使用的人少,所以停滞不前,如族徽和陶工的专业记号。^①

这一时期在六书研究上也有所突破,主要有:(一)于省吾先生在《释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一文中指出:“形声字的起源,是从某些独体象形字已发展到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然后才逐渐分化为形符和声符相配合的形声字。”在《释古文字附划因声指事字的一例》中于先生还指出有一类指事字的特征是在某个独体字上附加一种极简单的点划作为标志,赋予它以新的含意,但仍因原来的独体字以为音符,而其音读又略有转变。^②(二)姚孝遂先生在《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论形符与声符的相对性》、《论文字形体的整体性》、《再论古汉字的性质》、《文字形体的分化及其不可逆性》、《甲骨文形体结构分析》等文中一再指出文字的形体结构来源和文字的功能作用是两个性质绝然不同的问题。文字的形体,都是来源于客观事物的图像,从这一角度来看,无论是甲骨文还是金文,都是象形文字。但是就这些文字符号记录语言的作用来说,它们却是表音的。一个独立的文字符号,不论是基本形体还是复合形体,它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在起到记录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时,这一整体不容许加以割裂。形声字的形符主要表明义类,并不能真正表意,所以从广义上说,形符也是一种区别符号。将文字的形体结构分割为形符和声符,只是我们探索文字形体来源和构成方式的一种手段。形声字的形符与声符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形符和声符的作用是受文字的整体形态和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所制约的。^③孙常叙先生从文字记言写词

① 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278~279页。

②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③ 参看姚孝遂《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古文字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80年;《论形符与声符的相对性》,《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论文字形体的整体性》,《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5期;《再论古汉字的性质》,《古文字研究》第17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文字形体的分化及其不可逆性》,《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甲骨文形体结构分析》,《古文字研究》第20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的角度称假借和形声为“象声写词法”。他认为象声写词法出现后文字才真正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但他不同意姚先生以为先秦文字是表音文字的意见,他认为假借并没有改变先秦文字体系及其表意的性质,形声字的声符也不纯然表音。^① (三)裘锡圭先生在唐兰先生和陈梦家先生“三书说”的基础上建构了新的“三书说”:表意字、假借字和形声字。其中表意字包括抽象字、象物字、指示字、象物字式的象事字、会意字和变体字。此外裘先生认为仍有少数字不能纳入三书的范围,它们是记号字、半记号字、变体表音字、合音字、两声字和特殊来源字。^② 詹鄞鑫先生以裘氏构建的三书系统为基础,提出了“新六书说”:象形、指示、象事、会意、形声、变体。“新六书说”把假借字排除在汉字结构类型之外,并将传统六书中的“指事”分为“指示”和“象事”。“会意”除了以形会意、以义会意之外,还有会意兼声。“变体字”包括裘氏的“变体字”和不能纳入其“三书”范围的变体表音字和半记号字,分为取形变体字、取义变体字和取音变体字三类。^③ 张亚初先生在《谈古文字中的变形造字法》一文中指出:“变形造字法是指用改变一个字的位置形状(指字形的正、倒、左、右),或者对一个字的笔画略加增损而创造出另一个新文字的方法。”“变形的基本情况有七种:横变竖、正面变侧面或侧面变正面、整体变局部、双变单、正变倒、局部变形、增减笔画。”^④

总的来说,文字的起源和六书等问题并不是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学者们关注得更多的是古文字构形的内在演变规律。从笔者所见的研究成果来看,大致有三类:(一)从宏观上考察古文字演变的历史过程,从而有所发现,如李孝定先生在《从中国文字的结构和演变

① 孙常叙《假借形声和先秦文字的性质》,《古文字研究》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②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06~109页。

③ 詹鄞鑫《汉字说略》,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69~216页。

④ 张亚初《谈古文字中的变形造字法》,《庆祝苏秉琦先生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38~345页。

过程泛论汉字的整理》、《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从金文中的图画文字看汉字文字化过程》等文中总结概括了汉字“由不定型趋向大致定型”、“整齐划一的趋势”以及讹变、抽象化、简化、繁化、声化的规律，还指出了早期文字形体结构的特质，如早期文字具有不定型的特质、偏旁位置多寡不定、笔画多寡不定、正写反写无别、横书侧书无别、事类相近之字在偏旁中多可通用等。^① 赵诚先生在《古文字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调整》一文中探索了古文字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文字系统内部的制约而进行内部调整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现象，如类变、类化、定型、统一、繁化、简化、转化等。^② 高明先生的《略论汉字形体演变的一般规律》主要讨论的是简化和规范化对汉字形体演变所起的作用。^③ 林沅先生在《古文字学简论》第三章《字形历史演变的规律》中谈了古文字简化、分化、规范化、讹变等问题。刘翔等编著的《商周古文字读本》也有一节“古文字形体的发展规律”，指出古文字简化和繁化、循化和讹化、分化和整化的一些现象。(二)对某一论题作专项研究。如高明先生对古文字的形旁做了专题研究。他不仅整理出111个形旁从甲骨文到隶书的演变轨迹，^④而且对义近形旁通用现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指出了32组义近通用形旁。^⑤ 其后，张桂光先生对义近形旁通用的定义做了明确的界定，“义近形旁通用，指的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现象。由于某些形旁的意义相近，它们在一些字中可以互易，而互易之后，不仅字义与字音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而

① 李孝定先生诸文皆已收录于《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② 赵诚《古文字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调整》，《古文字研究》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50~365页。

③ 高明《略论汉字形体演变的一般规律》，《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④ 高明《古文字的形旁及其形体演变》，《古文字研究》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1~90页。

⑤ 高明《古体汉字义近形旁通用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中国语文研究》1982年第4期。

且于字形结构上亦能按同样的角度作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形旁的讹变、造字时因取意角度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形旁的现象以及一个字的不同写法作形旁,这三种情况不属于形旁通用范畴。张先生又进一步探讨了古文字义近形旁通用的原因和条件,他认为古人对义近形旁通用的利用,一般都是有意识的,或者出于同化的需要,或者出于表意明确化的需要。张桂光先生还撰写了《甲骨文形符系统特征的探讨》、《金文形符系统特征的探讨》、《战国文字形符系统特征的探讨》等一系列文章,对各个时期文字的形符所表现出来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既重视共时的横向的分析,又兼顾历时的纵向的联系。张先生的《古文字中的形体讹变》也是关于古文字构形研究的重要文章。文中对殷商时期到秦初小篆期间,古文字形体讹变的历史情况做了纵向的剖析,并按支配其变化的不同因素把讹变分为八种类型:因简省造成的讹变、因偏旁同化造成的讹变、因汉字表音化趋势影响造成的讹变、因割裂图画式结构造成的讹变、因一个字内相邻部件的笔画相交形成与别的偏旁相似的形象造成的讹变、因装饰性笔画造成的讹变、以文字形体附会变化了的字义造成的讹变以及因时代写刻条件、习惯的影响造成的讹变等。^① 金国泰先生在《讹变三题》中讨论了讹变与简化的区别,讹变前后正讹两字的共存、竞争和淘汰以及由于人们的误解而导致的讹变等问题。^② 裘锡圭先生的《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遗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和吴白匋先生的《从出土秦简看秦汉早期隶书》是较早利用古文字资料进行字体研究的成果。^③ 此外云惟利先生的硕士论文《汉字演进过程中声化趋势的研究》、吴振武先生的硕士论文《古文字中形声字类别的研究》、袁家麟先生的《汉字纯双声符字例证》、马国权先生的《鸟虫书论稿》、陈初生

① 以上所述张桂光先生诸文均已收录于张桂光《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② 金国泰《讹变三题》,《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

③ 吴白匋《从出土秦简看秦汉早期隶书》,《文物》1978年第2期。

先生的《谈谈合书重文专名符号问题》、林素清先生的《论先秦文字中的“=”符》、陈世辉先生的《略论〈说文解字〉中的“省声”》等都属专题研究类。(三)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文字构形演变规律进行总结。如赵诚先生的《甲骨文字的二重性及其构形关系》、《甲骨文形符系统初探》,陈炜湛先生的《甲骨文异字同形例》,李彤先生的硕士论文《甲骨文形声字声符研究》、姚淦铭先生的《论西周铜器文字演变的轨迹》、《论两周金文形体结构演变规律》,张振林先生的《试论铜器铭文形式上的时代标记》,马国权先生的《战国楚竹简文字略说》,林素清先生的《论战国文字的增繁现象》,唐莉先生的《战国文字义符研究》,黄盛璋先生的《战国冶字结构类型与分国研究》,罗运环先生的《论楚国金文“月”“肉”“舟”及“止”“止”“出”的演变规律》,黄锡全先生的《楚系文字略论》等。汤余惠先生的《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是这类文章中影响较大的一篇。此文就战国文字笔画、偏旁的省略,形体分合、字形讹变、辅助性笔画、地域特点以及与商周古文的辨正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对《古玺汇编》所收玺印进行分域,指出其中的燕系、楚系和齐系玺印。^①何琳仪先生在《战国文字通论》第三章“战国文字分域概述”中也指出了战国齐系、燕系、晋系、楚系、秦系文字各自的区别特征。在第四章“战国文字形体演变”中,他还总结了一些战国文字形体简化、繁化、异化、同化的规律。^②

综观这一时期研究的特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古文字构形演变规律已经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大批的学者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并取得许多重要的成果;第二,研究的重点不再是文字的起源、六书等论题,而是古文字形体本身的演变规律,如符号化、简化、繁化、异化、同化、声化、讹变、双声符字、异字同形、义近形旁通用等;第三,虽然已经出现专题研究,如汤余惠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战国

① 汤余惠《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文字研究》第15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②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文字形体研究》，但从理论框架的建构上来看，还停留在点的研究上，而没有系统的研究。

三、古文字构形学的确立与完善

1991年，刘钊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正式出版后书名为《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下称引均采用正式出版后的书名《古文字构形学》）。文中第一次把对古文字构形的研究称作“古文字构形学”。他指出：“古文字构形学是指研究古文字产生、构成及发展演变的学问。古文字构形学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古文字的构成方式，一是古文字的演变规律。具体包括古文字的产生，古文字的初始形态，古文字构形的基本分类，六书分析，古文字中的繁化、简化、类化、音化、分化、美化、符号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集合体，就构成了古文字构形学。”在《古文字构形学》中，刘钊先生分析了甲骨文、早期铜器铭文的构形特点，介绍了西周金文中“声符”的类型、古文字中的“类化”、“变形音化”、“简省分化”、“一字分化”以及古文字中形近易混形体的区别形式等构形规律，还总结了古文字考释方法和古文字构形演变条例。“古文字基本构形构成演变谱系举例”、“秦汉篆隶资料在古文字构形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古文字考释举例”三部分则是用来检验上述理论的实践性工作。这充分体现了刘钊先生提出“古文字构形学”的宗旨：古文字构形研究是古文字研究的基础理论，它不仅有古文字学上的理论意义，也具有指导分析考释古文字的实践意义。由于《古文字构形学》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开创之功，并且见解精辟独到，所以一经问世便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书中一些古文字构形方面的术语及概念的界定如“饰笔”、“类化”、“变形音化”、“讹混”等已得到普遍采用。

黄德宽先生也是致力于汉字学理论体系构建，而且收获颇丰的学者之一。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古汉字形声结构论考》以殷商到秦汉的古汉字形声字为研究对象，比较全面地考察分析了形声结构及其

发展。在形声结构及其相关的许多重要问题上获得了新结论,如从构成的角度对形声字给以新的类型划分,将形声结构的研究从笼统的描述引向科学的分析;将形声结构纳入汉字构形方式系统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出形声结构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等。^①除此之外,他还有相关的系列文章《古汉字形声结构的动态分析》、《形声起源之探索》、《论形符》、《论形声结构的组合关系、特点和性质》、《汉字形义关系的疏离和弥合》、《汉字构形方式——一个历时态演进的系统》、《汉字构形方式的动态分析》、《从转型到建构:世纪之交的汉字研究和汉语文字学》,等等。他主编的《古文字谱系疏证》以声符为核心,构建形声谱系,再以“音”系连,将形声谱系按古韵部和声纽编列构建广义谱系。对每一字罗列古文字不同阶段之典型字形构成形体流变表谱,然后逐字分析字形,阐释用例,予以梳理证说,在此基础上对同声系内部具有亲缘关系的同源字进行考辨确认,试图比较全面地揭示古文字阶段汉字体系内部字际关系,分层次构建古代汉字因发展沿革,形成广义谱系,为进一步揭示汉字发展演变规律奠定基础。^②所有这些研究都体现了黄德宽先生关于汉字断代史研究的思想核心:汉字构形系统是一个历时的演进系统,我们应该重视文字断代的研究,改变以往将不同历史阶段产生的汉字置于同一历史平面做类型性概括的状况,用动态的历时的眼光观察不同时代汉字构形方式的异同及其内部调整,从而揭示汉字体系运动的规律。

王宁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指导一批博士生进行汉字构形系统研究,并逐步构建起一套汉字构形学理论。1991年,李国英先生完成其博士学位论文《小篆形声系统研究》,这是王宁先生设计

^① 黄德宽《古汉字形声结构论考》,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

^② 黄德宽先生在《对古代文字发展沿革内在关系的探索与揭示——关于〈古文字谱系疏证〉》一文中对此书的内容和学术意义做了详细的介绍。该文刊于《学术界》2005年第1期,第292~95页。

的汉字构形系统描写研究的初步尝试。此后陆续完成的系列博士学位论文有王贵元先生的《马王堆帛书汉字构形系统研究》(1994)、王立军先生的《宋代雕版楷书构形系统研究》(1994)、李运富先生的《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1996)、曹永花先生的《西周金文构形系统研究》(1996)、罗卫东先生的《春秋金文构形系统研究》(1997)、宋珉映先生的《〈秦简〉文字与〈说文〉小篆字形比较研究》(1997)、齐元涛先生的《隋唐碑志楷书研究》(1998)、陈淑梅先生的《东汉碑隶构形系统研究》(1999)、赵学清先生的《战国东方五国文字的构形系统》(1999)、洪映熙先生的《居延汉简文字构形系统研究》(2000)、朴仁顺先生的《殷商一期甲骨文形义关系研究》(2000)、郑振峰先生的《甲骨文字构形系统研究》(2000)、易敏先生的《云居寺明刻石经文字构形研究》(2003)、刘延玲先生的《魏晋行书构形研究》(2004)等。1995年王宁先生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关于汉字构形学的文章,题为《汉字和汉字构形学》。此后,《中国教育报》又连载了她的《汉字构形学讲座》(2005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整理出版)。1999年,王宁、邹晓丽先生出版了《汉字》一书,书中系统地阐述了汉字构形学理论。王宁先生关于汉字构形学的思想还见于《二十世纪汉字问题的争论与跨世纪的汉字研究》、《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汉字构形理据与现代汉字部件拆分》、《基于超文本环境的〈说文解字〉知识库的建立》(与宋继华合作)等文。其理论核心是:(1)用系统的观点看待汉字,用系统的方法描写汉字,用系统比较的方法观察和总结汉字的历史发展和演化的规律。(2)认为汉字构形的基本元素是“形位”。在汉字使用的每个历史时期,“形位的数量都大致在250~300个左右,它们分别或完全具有表音、表义、表形、标示四种功能”,几百个形素又可以组成上万个汉字。(3)汉字的结构方式主要有两种:层次结构与平面结构。其组合过程以及层次结构的级层数和各级构件,是了解汉字构意的重要途径。(4)汉字有五类属性。汉字有一批基础构件,它们在不同汉字中具有不同的功能,这是汉字最重要的属性。其次,汉字的基础构件有不同的组合样式,这是汉字的又一属性。汉字构

件的组合过程(即结构方式)以及结构的级层数和各级构件,是汉字的另外两个属性。汉字的构形模式是汉字的第五种属性。汉字的构形模式有全功能零合成、标形合成、标义合成、会形合成、会义合成、形义合成、形音合成、义音合成、形音义综合合成、无音综合合成、标音义合成、义与音兼义合成等。

李圃先生提出的字素理论也是关于汉字构形的研究。李先生的专著《甲骨文文字学》就是用字素理论来研究甲骨文的成果,在《说字素》、《字素理论及其在汉字分析中的应用》、《字素理论与汉字分析问题》、《中国正统文字的发端——殷商甲骨文字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地位》等文中,他对字素理论做了详细的阐述。他指出:字素问题是基于汉字与汉语语素之间的关系提出来的。字素是构成汉字的形与音义相统一的最小的结构要素。字素的位包括上位和下位两个层次,出于上位的字素,或是稳性字素,或是活性字素,均具有直接显示语素音义的字素资格。而出于下位的则失去了字素的资格,退居到构成活性字素的构素成分了,它们与所表示的语素音义没有直接的关系。字素的类与位之间存在类位交变、类随位变的关系。字素系统由静态系统和动态系统共同构成,字素的静态系统指字素进入造字过程以前的字素系统。这种静态的字素包括基本字素和准字素两种。字素的动态系统指字素进入构字过程之中的字素系统,这种动态的字素包括稳性字素和活性字素。独体字是由一个字素构成的,故又称“独素字”。合体字一般由两个字素或三个以上字素构成。一个合体字结构类型的分析要以语素的音义为出发点和归着点去确定字素及其组合的上位层次,即直接显示语素的音或义的层位。据此可把合体字的结构类型分为七组相对称的十四个类型:左右分置、上下迭置;竖式插入、横式插入;左下填入、右下填入;左上填入、右上填入;上部嵌入、下部嵌入;左部嵌入、右部嵌入;中间嵌入、中间穿合。根据汉字中所包含的字素的多寡和历时与共时的差异,可以把古文字的造字法分为八种:独素造字、合素造字、加素造字、更素造字、移位造字、省

变造字、缀加造字和借形造字。^① 刘志基先生的《汉字体态论》采用了李圃先生的字素理论,^②张再兴先生则运用字素理论来研究西周金文的文字系统。^③

此外,还有一批硕博论文采用王宁先生的汉字构形学理论和李圃先生的字素理论,再结合计算机技术对古文字形体构件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从而对不同时代和地域的文字构形系统进行描写。博士论文如陶霞波先生的《先秦货币文构形无理性趋向研究》、吴建伟先生的《战国楚文字构建系统分析和〈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一)文字考辨》、竺海燕先生的《甲骨构件与甲骨文构形系统研究》,硕士论文有陈青峰先生的《殷商金文构形研究》、郭利芳先生的《春秋金文构建系统定量研究》、马晓风先生的《甲骨文会意字研究》、沈之杰先生的《楚简帛文字研究——形声字初探篇》、韩同兰先生的《战国楚文字用字调查》等。

以上所论是学界在古文字构形学理论体系的宏观建构上所取得的成就。据此,我们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在学界众多学者的努力下,古文字构形学作为一个理论分支已经确立,并且仍在积极的探索中不断地完善与发展。这表现在:

第一,古文字构形的分期分域研究较之前期更加深入了,成果相当丰富。其中,探讨甲骨文字形体演变规律的成果主要有裘锡圭先生的《从文字学角度看殷墟甲骨文的复杂性》,董琨先生的《从甲骨文到简化字》、《周原甲骨文与汉字形体发展》,曹锦炎先生的《甲骨文合

① 参看李圃《甲骨文文字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说字素》,《语文研究》1993年第1期;《字素理论及其在汉字分析中的应用》,《学术研究》2004年第4期;《字素理论与汉字分析问题》,《中国文字研究》第2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国正统文字的发端——殷商甲骨文字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地位》,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② 刘志基《汉字体态论》,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③ 张再兴《西周金文文字系统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文研究》，黄天树先生的《略论甲骨文中的省形和省声》、《殷墟甲骨文“有声字”的构造》，沈建华先生的《甲骨文所见几种异体字释例》，蔡哲茂先生的《卜辞同文例研究举例》，潘杰先生的《甲骨文非形声合体字与传统会意字的区别》，郝文勉先生的《甲骨文编码的线性结构》，刘志基先生的《试说殷商金文中的非通用构件》，施顺生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甲骨文字形体演变规律之研究》等；关于西周金文构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懋镛先生的《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的结构特点》，李善洪先生的《简论周代金文省体字》，乃俊廷先生的《两周金文“其”字中的“丌”形偏旁研究》，江学旺先生的《从西周金文看汉字构形方式的演化》及其博士学位论文《西周金文研究》，雷缙磊先生的硕士学位论文《西周金文与传世文献同词异字研究》等；有关战国文字形体研究的成果最多，如林素清先生的《谈战国文字的简化现象》，林清源先生的《从“造”字看春秋战国文字异形现象》、《战国“冶”字异形的衍生与制约及其区域特征》，黄文杰先生的《战国时期形声字声符换用现象考察》，黄锡全先生的《先秦货币文字形体特征举例》等。战国文字形体的分域研究以楚文字为最，其中博硕士论文就有多篇，如魏宜辉先生的《楚系简帛文字形体讹变分析》、林清源先生的《楚文字构形演变研究》、张静先生的《郭店楚简文字研究》、张传旭先生的《楚文字形体演变的现象和规律》、黄丽娟先生的《战国楚系形声字研究》，许文献先生的《战国楚系多声字研究》（硕），方勇先生的《战国楚文字中的偏旁形近混同现象释例》（硕）等。期刊论文主要有罗运环先生的《论楚文字的演变规律》，董琨先生的《楚系简帛文字形用问题》，曹锦炎先生的《从竹简本〈老子〉、〈缁衣〉、〈无行〉谈楚简文字构形》，李运富先生的《从楚文字的构形系统看战国文字在汉字发展史上的地位》，李天虹先生的《楚简文字形体混同混讹举例》，李守奎先生的《略论楚文字与小篆的关系——兼论依〈说文〉部首编著的古文字编的体例》，林清源先生的《新旧交替——论楚国文字构形的时代特征》，许文献先生的《先秦楚系文字声符替换结构初探——分类之一——非属同一谐声系统之共时性同字异构例》、《先秦楚系文字声符替

换结构初探》等。林宏明先生的《战国中山国文字构形研究》将中山国文字与侯马盟书、战国三晋系铜器文字、传世字书(《说文解字》、《汗简》、《古文四声韵》)相比较,分析总结了中山国文字的构形特点^①;秦汉文字形体研究的相关论文主要有黄文杰先生的《秦至汉初简帛形近字辨析》、《秦汉时期形声字音近声符换用例析》、《秦汉时期形声字义近形旁换用现象考察》、《睡虎地秦简文字形体的特点》,张世超先生的《战国秦汉时期用字现象举隅》,谢光辉先生的《秦文字形体研究》,林钦娟先生的《〈石鼓文〉:秦系文字构形演化发展的枢纽》,郝茂先生的《秦简新构字论析》等。专著有杜忠诤先生的《说文篆文讹形释例》。

第二,各类专题研究成果说明古文字构形研究正在不断地走向深化。

1. 字体演变研究

上文我们提到,裘锡圭先生的《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是较早利用古文字资料进行字体研究的成果。他注意到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上的文字在书体上具有隶书的特点,但有相当一部分跟篆文还很接近,还出现不少草书式的写法。通过研究,他认为隶书是在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简率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古隶又发展出草书。^②这一结论打破了千百年来一直以为隶变发生于小篆之后的错误观念。裘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对隶书的形成和发展做了进一步的阐述。^③他明确指出隶书形成于战国晚期,是在战国时代秦国文字俗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同时他认为

^① 林宏明《战国中山国文字构形研究》,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7年。

^② 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考古》1974年第1期。

^③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9页。

战国时代六国文字的俗体也有向隶书类型字体发展的趋势。^① 1991年,赵平安先生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隶变研究》。该文以西周、秦汉金文、秦陶文、秦汉印文、秦汉石刻文字、秦货币文字以及秦至汉初的简帛文字等出土文字资料作为研究的依据,得出“隶书产生于战国中期”的结论。同时他还分析了隶变的外因和内因,探索隶变的规律,指出隶变不是突变,而是渐变。^② 同年,丛文俊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隶书研究》也通过了答辩。与赵平安先生的研究相比较,丛先生则重于分析隶书字形,说明隶变与文字简化、偏旁分化、偏旁混同之间的联系。^③

① 关于六国文字与隶书的关系,唐兰先生在1949出版的《中国文字学》中已指出:“六国文字的日渐草率,正是隶书的先河。”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42页;郭沫若先生认为长沙楚帛书文字“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世的隶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正的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第8页;李孝定先生也指出:“传世楚缙书,其结构是六国古文一系,但在书法和形式上,已饶有分隶的意味”;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2分册、第3分册,1974年;马国权先生认为:“象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简、马王堆帛书这样早期的古隶,他的行格架式、波势挑法,在战国中晚期的楚简文字中,已孕育了雏形。”马国权《战国楚文字略说》,《古文字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林素清先生也举包山楚简中许多“隶味”十足的例字说明“隶书的发展,也吸收了楚国及其他各国古文的因素”。林素清《探讨包山楚简在文字学上的几个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6本第4分册,1995年;林清源先生的《楚文字构形演变研究》绪论部分也谈到了楚国文字所见的隶变现象。林清源《楚文字构形演变研究》,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论文,1997年;罗运环在《论楚文字的演变规律》一文中说:“隶变发生在战国时代,一般来说是用方折、平直的笔法改造篆体,在楚国则主要是用平直、简便的笔法改造篆体,实际上也是一种普遍性的文字简化。”罗运环《论楚文字的演变规律》,《古文字研究》第22辑,2000年。

② 赵平安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隶变研究》已于1993年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再版时新增了三篇与隶变有关的论文《略论汉字的象形特点》、《汉字声化论稿》和《新出〈史律〉与〈史籀篇〉的性质》。

③ 丛文俊《隶书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

陆续出土的战国及秦汉简帛文字资料,为隶变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台湾学者陈昭容先生的《隶书起源问题重探》认为战国中期简率的刻划文字与隶书起源有关。谈隶书的起源与发展,必须东西土文字同时考虑,就隶书风格而言,战国东西土都有相同的经历。就隶书的结构而言,基本上是在秦文字俗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土简牍文字在结构上与秦相异的部分,在文字统一过程中被约定俗成地罢除了,汉代隶书结构与秦隶接近的原因在此。在隶书发展进程中,“吏”起过整理作用。^①刘凤山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隶变研究》(2006)也对“隶变”问题再做检讨。他指出:“隶变”不仅发生在战国秦文字中,楚文字的隶变也很明显。他把隶变的过程分为萌芽(战国中、晚期)、发展(秦、西汉早期)和完成(西汉中期到东汉后期)三个阶段,并细致地描写了各个阶段的特点。^②

邱莹霓先生考察了齐系金文、陶文和玺文在年代、官私性质上所体现出来的书法风格与书体结构,并通过齐系文字的比较研究,整合齐系文字的书体结构和风格特征。^③林清源先生在对楚国金文书体风格的演变过程进行研究后认为:楚国金文的书体风格,从楚国立国直到春秋早期,仍然延续西周金文以来的传统风格书体。大概是在春秋中晚期之际,最具代表性的美术风格书体逐渐形成,此一书体发展到了战国早中期,线条布局日趋精致,并且出现错金与加鸟虫形部件的现象,是楚国金文美术书体的鼎盛时期。到了战国晚期,美术风格书体的品质与数量都急剧衰退,代之而起的则是草率风格书体,其字形往往解散篆体,破圆为方,表现出明显的隶化倾向。^④张晓明先

① 陈昭容《隶书起源问题重探》,《南大语言文化学报》第2卷第2期,1997年。

② 刘凤山《隶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③ 邱莹霓《东周齐国书风研究》,国立台湾艺术大学,1997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 林清源《楚国金文书体风格的演变历程》,《南大语言文化学报》第2卷第2期,1997年。

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春秋战国金文字体演变研究》分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战国中期至战国晚期四个阶段,对春秋金文字体的演变规律、特点以及原因做了考察。她指出:“春秋战国金文字体演变,是汉字字体从篆体到隶体转变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汉字系统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是汉字结构发展与汉字字体演变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书写便捷与字体规范之间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①杨宗兵先生全面考察了秦出土文字材料,认为秦文字“草化”不仅完全属于自然书写状态下的“草书萌芽”,而且与严格意义的“狭义草书”相比已经相距不远,对汉代草书的形成与趋于成熟具有“导源”意义和“示源”作用。^②于丽萍先生在《汉字构形的发展与字体的演变》一文中阐述了汉字构形的发展和字体的演变之间的关系,认为古文字向今文字过渡的主要原因是汉字构形系统的发展成熟。而今文字阶段字体的发展演变破坏了汉字的构形理据,影响了构形系统的平衡,使构形系统不断地进行调整以实现新的平衡。^③

继马国权先生的《鸟虫书论稿》之后,陆续有学者将鸟虫书作为字体的一种进行书体研究。如林素清先生的《春秋战国美术字体研究》、董楚平先生的《金文鸟篆书新考》,丛文俊先生的《鸟凤龙虫书合文考》、严志斌先生的《鸟书构形简论》等。

2. 讹变与讹混

文字形体讹变问题在这一时期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季采素先生分析了导致文字形体讹变的五个内因和三个外因。^①林志强先生认为对讹变现象的研究应把眼光扩大到整个汉字演变过程,而不应

① 张晓明《春秋战国金文字体演变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

② 杨宗兵《秦文字“草化”论析》,《汉字研究》第1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537~544页。

③ 于丽萍《汉字构形的发展与字体的演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100~103页。

④ 季采素《汉字形体讹变说》,《汉字文化》1994年第2期,第37~42页。

只局限于古文字阶段,并强调应结合汉字符号学来研究讹变现象。^①古敬恒、李晓华两位先生一方面从形近相混、字形的离析与粘连、误形为音三个方面探讨讹变的原因,另一方面追溯了讹变形体所折射出的文化意蕴。^②沙宗元先生分讹变为有意讹变和无意讹变两类,进而分析了古文字各个阶段这两类讹变的情况。^③魏宜辉先生用大量字例论证了楚系简帛文字形体中笔势变化讹变、简省讹变、增繁讹变、易构讹变、类化讹变、音化讹变等六种类型的讹变现象。^④方勇先生细致地分析了战国楚文字中31组形近偏旁混同现象。^⑤闫华先生梳理出“西”、“勺”、“百”、“夜”、“陵”、“岁”、“登”等字及与之相关诸字的讹变脉络,并总结归纳了支配这些讹变现象的规律。^⑥另外,上文提到的一些论著或博士论文中也论及讹变问题,如江学旺先生的《西周金文研究》、张静先生的《郭店楚简文字研究》、林清源先生的《楚国文字构形演变研究》、张传旭先生的《楚文字形体演变的现象和规律》、林宏明先生的《战国中山国文字构形研究》等。

从上述诸文来看,“讹变”与“讹混”、“变形音化”这三个概念还没有得到严格的区分。如江学旺先生在《西周金文研究》的第三章“讹变”下分“独体离析”、“形近混同”、“变形音化”三节;魏宜辉、林宏明、张静先生也将“变形音化”认定为一种讹变现象。针对这一情况,刘

① 林志强《关于汉字的讹变现象》,《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第82~84页。

② 古敬恒、李晓华《试析古文字的形体讹变》,《江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70~73页。

③ 沙宗元《古汉字字形讹变现象初探》,合肥: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④ 魏宜辉《楚系简帛文字形体讹变分析》,南京: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⑤ 方勇《战国楚文字中的偏旁形近混同现象释例》,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⑥ 闫华《古文字中的讹变现象举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刘钊先生在《谈讹混》一文中对“讹变”与“讹混”的关系做了界定。他指出：“从广义上看，‘讹混’与‘讹变’有相同之处，‘讹混’可以列为‘讹变’的一个小类。从狭义上看，‘讹混’与‘讹变’又有区别。‘讹混’与‘讹变’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讹变’所指的构形因素可大可小，既包括独立的字和偏旁的讹变，也包括笔画的讹变，而发生“讹混”的构形因素基本是指可以独立的字和构形偏旁；(2)‘讹变’一般是指构形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大都是不能逆转的单向发展，而‘讹混’则不光有单向的发展，还有两种形态之间的混用，有时是可以互换的双向互动。”^①关于“讹变”与“变形音化”的区别，我们可以从刘钊先生对“变形音化”所作的定义看得很清楚。他认为“变形音化”是人为的，有意识地对一个字的形体的一部分进行改造，^②而“讹变”则是无意识的，发生讹变的形体可以是笔画、偏旁，也可以是独立的字。

3. 双声符字研究

宋代郑樵《六书略》^③里的“母子同声”字指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双声符字”。近代学者林义光在《文源》里举出二十四个“二重形声”字。^④虽然他没有对其所谓的“二重形声”下定义，但从他的具体说解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所说的“二重形声”指的是两个偏旁都指表音而不表义，且两个偏旁音同或音近。裘锡圭先生称这类字为“两声

① 该文于2004年古文字年会上宣读，后经修改收录于《古文字构形学》第十章“古文字中的‘讹混’”。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 郑樵《通志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④ 林义光《文源》，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依写本石印，线装本3册，1920年。

字”，^①何琳仪先生名之曰“双重标音”，^②袁家麟先生则称之为“纯双声符字”。^③刘钊先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中把双声符字（该文称为“双声字”）纳入古文字构形学的研究范畴，并做了较为周密的定义：双声字是指一个形体的两个构形因素对于所记录的词来说都是标音的声符，而没有形符、意符或其他别的成分。^④陈伟武先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他在《双声符字综论》一文中，将双声符字分为两类，一类是纯双声符字，另一类是在形声字基础上加注声符而形成的。在考辨一些字例的基础上，他还阐明了双声符字的结构原理、双声符字与形声字的关系、双声符字内部两个声符的语音联系等问题。^⑤许文献先生的硕士论文《战国楚系多声符字研究》第四章《同取型多声符构形》分“双重标音例”和“形声标音例”两节，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十二例楚文字中的双声符字。^⑥宋鹏飞在其硕士论文《殷周金文形声字研究》中指出了一些殷周金文中的纯双声符字例。^⑦黄丽娟先生在《战国多声字研究》一文中也把双声符字纳入其研究范围，指出了七例双声符字及其来源。^⑧黄天树先生在《殷墟甲骨文“有声字”的构造》一文中指出了甲骨文中的双声符字“𠄎”、“𠄏”、“𠄐”、“𠄑”等。^⑨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07页。

②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5页。

③ 袁家麟《汉字纯双声符字例证》，《南京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

④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⑤ 陈伟武《双声符字综论》，《中国古文字研究》第1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8～339页。

⑥ 许文献《战国楚系多声符字研究》，彰化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⑦ 宋鹏飞《殷周金文形声字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⑧ 黄丽娟《战国多声字研究》，《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4～184页。

⑨ 黄天树《殷墟甲骨文“有声字”的构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6本，第2分册，2005年。

4. 饰笔

清代学者王筠最早注意到文字中有些笔画并不表意,而是起着文饰的作用。他指出:“古人造字,取其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而已。沿袭既久,取其悦目,或欲整齐,或欲茂美,变而离其衷矣。此其理在六书之外,吾无以名之,强名曰文饰焉尔。”^①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导论》中讨论到文字的增繁现象时曾指出:“凡垂直的长画中间常加‘·’,‘·’又引为‘一’,间或为‘∨’;前缀是横画的,常加一画或‘八’;字末常加‘一’,‘一’又加‘--’;凡有空隙的字,常填以‘·’。”^②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饰笔。汤余惠先生在《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谈到“起辅助性作用的点”这个问题时说:“战国文字基本形体之外的点,多半用为饰笔,具有装饰美化的作用。点饰无论其形式如何,均与文字的基本构形无关。”文中除了讨论了“一”、“八”、“^”等一般饰笔外,还介绍了齐、燕、楚三系文字中的特殊饰笔。楚文字中有一种状似垂露的饰笔,如楚王禽尚盘“王”字作“𠄎”;燕文字中有“鹤头书”,如燕玺“秦”字作“𠄎”(古玺汇编 3853);齐文字有尾形饰笔,如陈喜壶“族”字作“𠄎”。^③何琳仪先生对战国文字中的装饰符号(饰笔)做了进一步的归纳整理,指出单笔装饰符号和复笔装饰符号各六类。^④

刘钊先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中把饰笔纳入古文字构形学体系,进行专题性研究。首先他对“饰笔”做了严密的定义,饰笔,又称装饰笔画、羡画、赘笔,是指文字在发展演变中,出于对形体美化或装饰的角度添加的与字音字义都无关的笔画,是文字的

① 王筠《说文释例》,武汉:武汉市古籍书店,1983年,第219页。

②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第223页。

③ 汤余惠《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文字研究》第15辑,1986年,第9~100页。

④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9~234页。

羨余部分；其次，他以“萬”、“𠄎”、“禹”、“𠄎”、“是”、“其”、“奠”、“典”、“甚”、“廷”等字为例，揭示了饰笔在文字符号化过程中的演变轨迹。同时，他还归纳出甲骨文中七种主要饰笔，并举了60对甲骨文字例；再次，他指出了“饰笔”研究对古文字考释工作的重要意义，并在文中的许多考释中加以强调；最后在第十四章“古文字构形演变条例”中他总结出二十一条关于“饰笔”的演变规律。^①

张振林先生在《古文字中的羨符——与字音字义无关的笔画》一文中对刘钊先生的研究做了充分的肯定。张先生考察了商、周、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期间文字的发展及使用情况。他认为羨符（饰笔）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在没有统一用字标准时，它可以是装饰、平衡美化的结果，也可能是偶然的笔误，乃至积非成是。在政府和用字者的正字观念不强的时候，羨符被看作有某种合法性的异体字。相反，则被认为是不合法的错字。商代甲骨文的繁简异体，主要是符号系统改进期间的表像，增添减少的笔画，多数属于与字音字义有关的象形或指事符号。从西周初到春秋中期，文字形体在外观上主要是线条化和方块化，未有明显涉及装饰美的倾向。春秋中期以后，形声字在当时用字中的比重占了优势，满足了用字需要，于是在钟鸣鼎食之余，便有了使文字美化的特别追求，就出现了蚊脚体、鸟虫书、悬针垂露体等美术字体以及一些与构形字理无关的羨符。随着羨符大量出现，还有形声构字心理驱使下的偏旁滥用，在春秋后期到战国中期，出现了一个文字繁化和异化的潮流。秦统一天下所推行的强力政策使得文字走向规范化。在隶变期间还存在饰笔、羨符，只是未规范的古文字的子遗。^②

赵诚先生将甲骨文形符分为象形性形符、示意性形符、类别性形符、关系性形符、文饰性形符五类，其中“文饰性形符”指的就是饰笔。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② 张振林《古文字中的羨符——与字音字义无关的笔画》，《中国文字研究》第2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他说：“(文饰性形符)没有任何表义功能,只起文饰作用。”他认为“启”、“啟”、“君”三字所从之“口”,均为文饰性形符。^①

湛玉书先生将文字羡余现象分为字素羡余、非偏旁构件羡余、表意偏旁羡余三类,又进一步指出文字羡余现象的五种成因:为增强文字形体的区别性、为求字义表达的彰显性、因文字类化、受民族心理文化因素的影响、因书写习惯等而增加羡余成分。^②

林宏明先生的硕士论文《战国中山国文字构形研究》第二章第五节“装饰”分析讨论了中山国文字中的九种饰笔。^③

5. 借笔

清代学者王筠在《说文释例》中所论的“两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借笔”。他指出的“两借”字例有“齋从示齊省声,二字上属则为齊”、“兜之从𠂔从兒省也,以儿属口为𠂔,以儿属白为兒”、“豕从彡豕省,一字两借”“黎从黍秝省声,此以禾子左右两借也”等。^④当代著名学者于省吾、朱德熙、孙稚维等先生在考释古文字的时候都因为能识破借笔而获得成功。裘锡圭、张政烺、李学勤、李家浩、陈世辉、林沄、张守中、张光裕等先生也都在各自的论著中运用借笔的原理考释古文字。杨五铭先生在《两周金文数字合文初探》一文中将合文分为借笔与不借笔两种情况。^⑤陈炜湛先生在谈到甲骨文中的合文时说:“两字合文者占多数,单字合文较少见。多数不借笔,也有少数是

① 赵诚《甲骨文文字学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68~169页。

② 湛玉书《论文字羡余现象》,《语言研究》2005年第3期,第64~66页。

③ 林宏明《战国中山国文字构形研究》,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7年。

④ 王筠《说文释例》,武汉:武汉古籍书店影印,1983年,第125页

⑤ 杨五铭《西周金文数字合文初探》,《古文字研究》第5辑,1981年,第139~149页。

借笔的。”^①林沅先生在《古文字研究简论》中提到的“并划性简化”，^②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借笔”。何琳仪先生在《战国文字通论》第四章第二节“简化”中指出战国文字借用笔画、借用偏旁以及合文借用笔画、合文借用偏旁的现象。^③

吴振武先生的《古文字中的借笔字》是最早的关于借笔的专题性文章。他采用了杨五铭先生在《两周金文数字合文初探》中所用的术语“借笔”，但吴先生所论的借笔除了合文中的借笔外，还包括单字借笔。“借笔”可以是借笔画，借偏旁，也可以是借字。该文的第二部分是吴先生新释的十个借笔字：“𠄎”（公子孟）、“𠄎”（君子）、“𠄎”（中易）、“𠄎”（马师）、“𠄎”（青中，读作“精忠”）、“𠄎”（去痼）、“𠄎”（私库）、“𠄎”（臣）、“𠄎”（付臣）、“𠄎”（起）、“𠄎”（塚，即“冢”字读作“重”）等。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吴先生在充分吸收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古文字中的借笔字做了较为全面的整理和考察，共有 362 例。在结束语部分，吴先生指出：“不仅古文字中有借笔，到了今隶和真书阶段，仍会出现借笔。”他认为古人写字用借笔，求简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有时可能也有“玩”的意思。^④

刘钊先生的《古文字中的合文、借笔、借字》在理论上对“借笔”做了进一步探讨。首先他指出合文、借笔、借字三者相互包容，但又各有其不同特点。合文、借笔、借字是三种不同的现象，但又有联系。合文中常用借笔，借字与借笔在某种意义上相似，都是古文字记录语言时追求省便的一种变通方法；其次，他从定义上对合文、借笔、借字三者做了明确的区分。他指出：合文，又称合书，是指二个或三个在

① 陈炜湛《甲骨文简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3页。

② 林沅《古文字研究简论》，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81～83页。

③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90～193页。

④ 吴振武《古文字中的借笔字》，《古文字研究》第20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08～337页。

词序上相连的文字符号用或不用合文符号,相对紧凑地写在一起的写词形式;借笔,又叫借划、兼笔、共享笔画,或称省略重复偏旁。借笔是指一字本身或词序相连的二个字之间共同占有笔画或偏旁的古文字构形方法;借字又称重文,是指一个独立形体用借字符号或不用借字符号重复一次记录功能的写词方法;再次,将“借笔”作为一种独立的古文字特殊构形方式与合文、借字区别开来,指出其性质和特点;借笔要求合文借笔的二个字词序必须相连,不论二字借笔还是单字借笔。借笔的双方相邻的笔画或偏旁必须相同或相近。借笔是古文字为书写简便而产生的一种变通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装饰化的意味。^①

林清源先生把借笔作为文字简化现象进行研究。他认为“借笔”一词的语意稍嫌含糊,所以改称“共享部件”。林先生考察了楚国文字中的共享部件现象,指出五例单字共享部件和四例合文共享部件。^②

6. 变形音化

变形音化是指文字受逐渐增强的音化趋势的影响,将一个字的形体的一部分,人为地改造成与之形体相接近的可以代表这个字字音的形体,以为了更清楚地表示这个字字音的一种文字演变规律。变形音化大都是将原为象形字或会意字的形体改造为形声字。变形音化具有讹变的性质,但与讹变又有不同,它的改造过程具有人为的有意识的因素。^③

在20世纪40年代,唐兰先生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他指出:“把物形的某一部分直接变作声符,应作为‘声化’的一类。”^④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释“勿”“发”》、《说字小记》等文中也谈及这个

① 刘钊《古文字中的合文、借笔、借字》,《古文字研究》第21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397~410页。

② 林清源《楚文字构形演变研究》,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论文,1997年。

③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9页。

④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9~90页。

问题,他指出:“在汉字发展过程中,把合体表意字的一个偏旁略加改造,使之转化成声旁,从而把原来的表意字改变成形声字的现象,是颇为常见的。”并举“何”、“𠄎”、^①“愬”、^②“羞”、“弦”^③为例。李新魁先生也曾指出汉字因隶变造成的声化现象,并称之为“声符化”。他说:“有些字本不是形声字,但其中的某一部分偏旁,经过隶变以后,变成与整个字音相近或相同,人们遂把这个字看成形声字,把该偏旁说成是声符。从后代研究者的立场来观察,这样的偏旁是从非声符变成声符,这样的现象叫做‘声符化’。如亭字,字下部的‘丁’本像亭柱矗立的形状,但后代把它写成丁字,丁与亭的读音相同(或相近),所以《说文》说亭字从丁声。这样,亭字就从象形字变为了形声字,‘丁’声符化了。”^④张桂光先生认为这类现象是因汉字表音化趋势影响造成的讹变。如“攷”,金文作“𠄎”,象以手持棍打击戴羊角帽的人,会欺侮之意。因为字与“矛”音近,“𠄎”又与“𠄎”形似,戴羊角帽的人便讹为声符“矛”了。其他如“𠄎”变从今声,“𠄎”之变从由声,“良”之变从亡声,“皇”之变从王声,“𠄎”之变从矢声等。^⑤何琳仪先生在《战国古文字典》中也指出一些古文字中的声化现象。如甲骨文“𠄎”字作“𠄎”、“𠄎”,从支,从丰或从木,会击植物果实使其坼裂之意。或作“𠄎”,左上声化从来。西周金文“𠄎”字作“𠄎”,战国齐陶“𠄎”字作“𠄎”,声化从壬声。^⑥赵平安先生在《汉字声化论稿》中所指

①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8页。

②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43页。

③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53页。

④ 李新魁《从“同音”现象看语音与文字的某些关系》,《语文园地》1985年第1期。

⑤ 张桂光《古文字中的形体讹变》,《古文字研究》第15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⑥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784页。

的声化现象只有“经由讹变的声化例”属变形音化。如“幸”，甲文象枷锁之形，到小篆形体分裂成“大”和“苜”，其中的“大”被声化；“甬”，“甬”、“用”一字。金文“甬”为钟即镛之象形。后来繁体变成“甬”，简体变成“用”。“甬”的下部被声化，等等。^① 在《汉字形体结构围绕字音字义的表现而进行的改造》一文中，他也指出一些变形音化例，如“鬯”变从亡声，“壺”变从古声，“寐”变从未声，“榦”变从干声等。^②

以上诸位先生对变形音化现象的指称虽然不同，但实质上是一样的。他们指出了现象，却未能上升为理论，因此还不是自觉的研究。刘钊先生是第一个把“变形音化”提升为一条重要古文字演变规律，并较为系统地加以研究的学者。他为变形音化现象做了概念上的界定，并举出大量的例证说明“变形音化”是普遍存在的，而非偶然现象。

经过十余年的检验，“变形音化”作为古文字构形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为古文字学界普遍接受。如魏宜辉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楚系简帛文字形体讹变分析》设专节《变形音化讹变》，江学旺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西周金文研究》和张静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郭店楚简文字研究》都设有《变形音化》专节，冯胜君、陈剑等学者也在他们的研究中采用“变形音化”这一术语。

7. 同形字

陈炜湛先生是最早把“同形字”作为专题进行研究的学者。他对甲骨文中的异字同形现象作了考察，指出“下人”、“女母”、“臣目”等二十二组例证。他认为异字同形现象应该排除假借字和“古本一字后世孳乳而分为二字”者。甲骨文之所以存在异字同形现象，其原因

① 赵平安《汉字声化论稿》，《河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② 赵平安《汉字形体结构围绕字音字义的表现而进行的改造》，《中国文字研究》第1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4～75页。

有四：字形省简、异体字的存在、意义上的联系、文字演变的历史因素等。^① 姚孝遂先生认为异字同形是文字在其孳乳分化过程中的一种形体交叉现象。同字异形和异字同形是相对立而存在的，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同字异形，就不可能有异字同形，绝对的异字同形是没有的。另外，两个形近字的偶尔混同不能看作是异字同形。^② 裘锡圭先生按照同形字在结构或形体上的特点把它们分成四类：文字结构性质不同的同形字、同为表意字的同形字、同为形声字的同形字、由于字形变化而造成的同形字。^③ 陈伟武先生对战国秦汉文字资料中出现的同形字进行梳理，认为简化、繁化、讹变、书写形式等都可能造成异字同形。战国秦汉同形字常见于同时同地，保留了早期汉字的特点。此外，战国秦汉同形字还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其时代性依然受汉字发展规律的制约，这个时期的许多讹体、简体、繁体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后来在汉字体系中往往被分化、清理，与它们相对应的同形关系也随之消失。^④ 施顺生先生在陈炜湛和陈伟武两位先生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探讨了甲骨文异字同形现象产生的原因，认为原因有四：(1)造字之初即已同形；(2)因同源分化而产生的；(3)合文后与其他字同形；(4)在形体上产生简化、繁化、异化等各种变化，而与另一字同形的现象。施先生还补充了四组甲骨文中的异字同形例：囟(报甲)与田、寅与交、午与十、灾与用同形。^⑤ 蔡信发先

① 陈炜湛《甲骨文异字同形例》，《古文字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27~250页。

② 姚孝遂《甲骨文形体结构分析》，《古文字研究》第20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78~281页。

③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11~217页。

④ 陈伟武《战国秦汉同形字论纲》，《于省吾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8~232页。

⑤ 施顺生《甲骨文异字同形之探讨》，《第十三届全国暨两岸中国文字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出版，2002年。

生对《说文》中的形声字同形异字例做了研究。^①许钺辉先生整理出《说文》中的同形字 27 组,并将它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同形同字,第二类是同形异字;第三类是因《说文》版本不同,中有形误,或许慎释形有误,以致看似同形,实乃异形,并非同形字。^②詹今惠先生的硕士学位论文《先秦同形字研究举要》对始见于甲骨文、两周金文、战国楚简、战国楚简之部件、不同书写材质中的三十组同形字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认为先秦时期出现同形字的成因有字形同源,字形繁简、形讹和构字本义不同,字形偶然相同三种。^③杨郁彦先生将甲骨文中的同形字分为同源分化之同形字、取象形近之同形字、形近相讹之同形字和依声假借之同形字等五种类型。^④张新俊先生考察了上博楚简中的文字同形现象,如“不”与“辛”、“甲”与“亡”、“火”与“亦”在上博简中同形。^⑤

8. 类化

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指出:“‘午’字写成‘么’字的样子,从午的‘御’字,有的会从兹。‘十’字变成了‘甲’,‘戎’、‘早’、‘卓’等字都跟着改。‘二’字变成‘贰’,又省作‘弍’,后来就造出‘弍’、‘弍’二字。‘鳳皇’的皇变成‘凰’,‘烟燼’的烟写作‘壹’,从吉,所以又造了从凶的‘壹’。凡同化的字,往往是由类推作用来的。”^⑥唐兰先生所谓“类推”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类化”,即一个字的形体变了,以它为形旁的一批字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同形旁的一批字往往因为其

① 蔡信发《形声字同形异字之商兑》,《第十三届全国暨两岸中国文字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出版,2002年。

② 许钺辉《〈说文〉同形字探究》,《第十八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第51~62页。

③ 詹今惠《先秦同形字研究举要》,台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④ 杨郁彦《甲骨文同形字疏要》,台湾辅仁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⑤ 张新俊《上博楚简文字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73~76页。

⑥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5页。

中一个字发生变化,其他的随之而变;记录双音节词的两个字本来形旁不同,后来也趋同了。

王力先生认为群众造字有两个方向:第一是类化法,第二是简化法。类化法通常是按照形声字的原则,把没有形旁的字加上一个形旁。例如“夫容”加成“芙蓉”。有时候是形旁不明显,就再加形旁,如“果”加成“菓”、“梁”写成“樑”、“冈”加成“岗”、“嘗”写成“嚐”。最容易类化的是双音词,群众感到双音词是一个整体,形旁应该取得一致。于是“峨眉”加成“峨嵋”,“昏姻”加成“婚姻”,“芭蕉”加成“芭蕉”,等等。有些字虽然都有形旁,但不一致,于是也改成一致,如“蒲桃”改成“葡萄”。甚至有时候改得没有什么“道理”,如“鳳皇”改为“鳳凰”(“鳳”,从鳥,凡声)。^① 王力先生用了“类化”这个术语,但从他的论述过程来看,只有“峨眉”加成“峨嵋”、“昏姻”加成“婚姻”、“芭蕉”加成“芭蕉”这一类与我们所说的“类化”性质相同。另外,王力先生没有对“类化”这个概念做出明确的界定。

沃兴华先生在《类化字及其训诂法》一文中讨论了古代汉字中,上下文字的形体类化的问题,认为类化字是指通过加旁或更旁来与上下文形体保持联系的异体字。类化有四项规则:上下文有主谓关系、动宾关系、偏正关系、并列关系等。^② 在文中,沃先生虽然举了一些甲骨文、金文中的例子,但多数还是出字典籍。

率先对古文字中的类化现象进行专题研究的是刘钊先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中,他指出:“类化,又称‘同化’,是指文字在发展演变中,受所处的具体语言环境和受同一文字系统内部其他文字的影响,同时也受自身形体的影响,在构形和形体上相应地有所改变的现象。这种现象反映了文字‘趋同性’的规律,是文字规范化的表现。”他把古文字中的类化现象分为两类:一类是文字形

①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3页。

② 沃兴华《类化字及其训诂法》,《于省吾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12~316页

体自身的“类化”，另一类是受同一系统内其他文字影响而发生的类化。在文中刘钊先生考辨了50组古文字中的“类化”例。^①

林清源先生在刘钊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楚系文字中的类化现象进行了考察。他把楚系文字中的类化现象分为自体类化、形近类化和随文类化三种。形近类化又分个别形近类化和集团形近类化。经林先生指出的类化例有17组。^②台湾还有不少硕博学位论文对古文字中的类化现象进行专题研究，如徐再仙先生的《吴越文字构形研究》、沈宝春先生的《春秋金文形构演变研究》、黄圣松先生的《东周齐国文字研究》、林宏明先生的《战国中山国文字研究》、徐筱婷先生的《秦系文字构形研究》、陈立先生的《战国文字构形研究》，等等。

黄文杰先生对战国文字中的类化现象进行了探讨，指出11组类化例。他认为类化现象多出现在俗体文字之中，类化的场合一般是一个词，也可以是一个字内部、一个词组、一个句子，甚至是一段话，凡有接触性的语言环境都可能出现类化。类化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因此不能以文字错讹现象解之。^③

9. 同源字

在过去的相当长时期内，同源字的概念被等同于同源词。蒋礼鸿先生在《读〈同源字论〉后记》对王力先生所谓同源字之名提出批评，他指出：“讲训诂，探求语源，如若不严格区分‘词’和‘字’的概念，就会在实践上产生若干难以解释的麻烦，或自陷于矛盾。”^④此后，陆续有学者试图把语言学上的同源字（同源词）与文字学上的同源字进行区分。如张兴亚先生认为推寻汉字的同源关系必须抓住字形上的渊源关系。从同一字根孳乳出来的字是含有同一来源的字，就是有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5～108页。

② 林清源《楚文字构形演变研究》，台湾东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第155～172页。

③ 黄文杰《战国文字中的类化现象》，《古文字研究》第26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50～455页。

④ 蒋礼鸿《怀任斋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5页。

字形结构上的渊源关系的字,就是同源字,而不管它表示的词是不是同源词。

词的同源关系不是确定同源字的基本依据。虽然许多同源字表示的是同源词,但有的并不表示同源词。表示同源词的字不是同源字,音义皆近的字不一定是同源字。假借字表示同源词。^① 林沅先生在《王、土同源及相关问题》一文中认为“王”与“土”、“月”与“夕”、“卜”与“外”本是一形多读字,后分化为两个形体相似的字,在字形上具有同源关系。^② 林先生在《古文字转注举例》中所举的“女”与“母”、“鼻”与“自”、“主”与“示”、“帚”与“婦”、“毕”与“禽”等也是同源字。^③ 王蕴智先生在概念上对两者做了区别。他指出“凡语音相同或相近,具有同一语义来源和分化的词叫同源词;凡具有同一形体来源和字形分化关系的字叫同源字。同源词属于词义系统的问题,同源字则属于字形系统的问题。”^④对于同源字之间在语音、语义上的关系问题,王先生认为同源字之间的语音相同或相近,语义上也关系密切。他说:“对于同源分化字来说,其义或缘自本形,或借字写词,意义仅依附于音,或者形、音、义互有依托,不一而足。”“凡涉及到同源关系,不管是字还是词,本初读音基本上是相同或相近的。”^⑤这与林沅先生的看法不同,林沅先生认为同源字之间在语音和语义上都没有联系。郝士宏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古文字同源分化研究》中对同源字做了新的界定:同源字是指汉字在发展过程中孳乳分化来的一

① 张兴亚《简论同源词与同源字》,《殷都学刊》1996年第3期,第88~90页。

② 林沅《王、土同源及相关问题》,《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③ 林沅《古文字转注举例》,《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

④ 王蕴智《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现象探索》,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页。

⑤ 王蕴智《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现象探索》,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25页。

组在字义或构形上有意义联系的分化字。同源分化有三种途径：语义引申引起的分化、事物命名的理据引起的分化和汉字表意特点引起的分化。同源分化可归并为四种类型：“增加、减省、改易、形声同取。同源分化方式在汉字不同阶段表现也出差异。在表意阶段（西周早期以前）的主要方式是加注区别性符号、加注点画、改变点画方向、截除、省简点画、变体等方式，属象形表意性；形声阶段的分化方式有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意符、形声同取、替换等。除了理论上的探索，郝先生还考辨了50组同源字例。^① 杜永俐先生在《汉语同源字与同源词》一文中认为讨论同源词，应该从词的音与义出发，而讨论同源字，则必须从汉字的本体——字形出发。凡由同一字根（通常是声符）孳乳出来的一组字叫同源字，具有共同的形体来源。同源词则指语音相同或相近，具有相同的隐性义素的一组词。两者的关系表现为：（1）重叠关系，即同源字同时也是同源词；（2）是同源字而非同源词，即因同音借用而在一个声符的基础上孳乳产生的一组形声字，它们是同源字，记录的却不是同源词；（3）是同源词而非同源字。^② 台湾学者洪燕梅先生在其硕士论文《睡虎地秦简文字研究》中，考察了简文中的同源字，如“买”与“卖”、“直”与“值”、“知”与“智”、“为”与“伪”、“五”与“伍”等。^③ 程燕先生的《“豈”、“譏”同源考》、师玉梅先生的《系、聯、縕等字同源》、王蕴智先生的《同源字例释三组》等文则是关于同源字的考释文章。

10. 转注

六书中的“转注”一直是个纷争不断的论题。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是孙雍长的《转注论》，他认为“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的“类”即事类，“首”即“类首”。“同意”即谓“转注原体”与“类首”的旨趣相同，也

① 郝士宏《古文字同源分化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② 杜永俐《汉语同源字与同源词》，《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69~72页。

③ 洪燕梅《睡虎地秦简文字研究》，台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1992年。

就是“转注原体字”所包含的某一语词或意义与“类首”所代表的事类范畴相符合。“相受”即谓“转注原体字”与“类首”的两相结合，故所谓“转注”，就是将“转注原体字”转移附注到“类首”上的一种造字法。^① 林沄先生以为转注就是把记录 A 语词的表意字转作记录 B 语词的表意字。转注和假借一样，都是原有字形的利用，使原字和转注字分化的方法，有利用异体、添加点画、加意符、加声符等。^② 林小安先生则认为“转注”是说字义从某一范畴的含义向另一范畴转移，而注入了新的含义，即用引申义造字。^③ 郑张尚芳指出：“转注”是同一字的变形分化现象，是以原字形为基础加以变化来表示音义变易或单纯义变，这可以有三类分化方式，即改笔或增减笔，加形和加声。^④

第三，新的论题陆续出现，说明古文字构形学具有可拓展空间，生机无限。

1. 糅合

侯马盟书 67:45 片上的“獻”字作“𩇑”，吴振武先生认为这一形体的出现似应跟当时“獻”、“鮮”二字经常通假有关系。“𩇑”可能捏合了“獻”、“鮮”二字。^⑤ 上博简《孔子诗论》“害”字作“𩇑”（简 8），又作“𩇑”（简 7）“𩇑”（简 10）。冯胜君先生认为第 7 号和第 10 号简“害”字的形体是受了“𩇑”字的影响。吴振武先生进一步指出同样写

① 孙雍长《转注论》，长沙：岳麓书社，1991 年。

② 林沄《古文字转注举例》，《林沄学术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③ 林小安《殷契六书研究》（一），《出土文献研究》第 3 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殷契转注刍议》，《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年。

④ 郑张尚芳《汉语的同源异形词和异源共形词》，收入侯占虎主编《汉语词源研究》第 1 辑，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79～197 页。

⑤ 吴振武《古玺姓氏考（复姓十五篇）》，《出土文献研究》第 3 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 84 页。

法的“害”字，亦见于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字作“𠄎”（简 61）。这种“害”字实际上是糅合了“𠄎”、“害”这两个经常可以通假的字后形成的。其中间的“人”部，既可看作是“害”字的顶部，也可看作是“𠄎”字的中部。这与侯马盟书“獻”字从羊作“𦍋”正相似。^① 张新俊先生的博士论文《上博楚简文字研究》在其师吴振武先生研究的基础上设专节讨论“文字的糅合”问题，指出上博简中的文字糅合现象共三例，如《性情论》简 38“𦍋”字是糅合“慧”与“快”二字而成的^②，《周易》简 50“𦍋”字是糅合了“𦍋”、“红”而成，《逸诗》简 1“𦍋”字也可以看成是把“幾”和“豈”两个部分糅合在一起所成。^③ 金俊秀先生认为上博简《曹沫之阵》简 42“𦍋”字是混合“駢”（駢）、“邇”（御）而成的。他还归纳出文字糅合的三个条件：其一，糅合 A、B 而成 C，这时 A、B 的读音一定要相同或密近；其二，当时人的书写习惯上是 A、B 二字常通假（但此项并非必须条件，实际上单纯的同音字也可以糅合）；固然这也属于双声字的范畴之一，但其与一般双声字不同的是 A、B 二形结合时，结构上必有所省减。^④

2. 异体糅合

裘锡圭先生曾指出“𦍋”当是“𦍋”的变体，“𦍋”（𦍋）似是糅合这两种写法而成的。^⑤ 张涌泉先生认为敦煌卷子中“紙”又或作“𦍋”，

① 以上冯胜君、吴振武两位先生的说法均可参见吴振武《战国文字中一种值得注意的构形方式》，《汉语史学报专辑（总第 3 辑）：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92~93 页。

② 此例是由吴振武先生提供给张新俊先生的。参看张新俊《上博楚简文字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第 18~23 页。

③ 张新俊《上博楚简文字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第 18~23 页。

④ 金俊秀《文字的糅合》，《第十八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 年，第 298~305 页。

⑤ 裘锡圭《释“𦍋”》，《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13 页。

是把“紙”、“帀”熔为一炉了。^①江学旺先生将这种现象称为“异体糅合”。“异体糅合”是指将两个或几个(大多为两个)异体字的不同部件糅合在一个构形单位(即字)之中,从而构成一个新的异体字。他把这种新的异体字称为“糅合体”。异体糅合必须具备这样一个条件,即在“糅合体”出现之前,就已出现了参加糅合的两个或几个异体。古文字中由异体糅合而成的新字形大多是由三个部件构成。参加异体糅合的,可以是两个表意字,也可以是两个形声字,还可能发生在表意字和形声字之间。没有相同部件的合体的异体字之间,一般是不会发生糅合现象的。如果是两个独体的异体字,即便字形相差很远,也有可能被糅合。异体糅合不同于一般所讲的“增加形符”和“增加声符”。“增加形符”和“增加声符”,从文字演变的过程来看,都只能有一种正确的字形分析,如“𪔐”字甲金文都从升龍声作“𪔐”,西周中期或作“𪔐”,也只能析为“𪔐”加“兄”为声符。而异体糅合的结果,从表面看,却可以作两种不同的分析。例如“盥”字,西周金文中既有“从皿須声”的“盥”,又有“从金須声”的“𪔐”。那么,西周晚期的“盥”,就不能简单地析为“盥”加“金”,或“𪔐”加“皿”,而应当认为是前两个异体糅合的结果。“异体糅合”从表面上看与“合文”有相似之处,但它们有本质上的不同。“合文”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多为两个)字合写在一起,使它们看起来好像只有一个构形单位,实际上却记录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多是两个)音节,应当读成两个(或几个)字。而异体糅合却不能读成两个字,糅合的结果只是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异体字而已。^②

3. 错别字

台湾学者施顺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甲骨文字形体演变规律之研究》第二章第四节中,把“错字”作为甲骨文书写时的特殊状况进行

^① 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

^② 江学旺《浅谈古文字异体糅合》,《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1期,第77~79页。

专题研究。^①裘锡圭先生在《谈谈上博简和郭店简中的错别字》一文中,对上博楚简和郭店楚简《缁衣》和《性自命出》进行互校,指出其中的错别字。他认为上博简《孔子诗论》中有一个过去释为“坪”或“塿”的字,很可能是“聖”字的误摹。同时,他强调指出:“我们在释读楚竹书的时候,应该把竹书中有错别字这一点牢记在心。如果遇到错别字而不能辨明,就会无法理解或误解文义。”^②李零先生也曾指出:“过去古文字学家对‘同音假借’和‘同义换读’等正常现象注意比较多,而对错字却不大理睬,没有注意它在文字考释上的重要性和规律性(历代都有这类问题)。简帛文字的错字分两种,一种是因形体相近,偶尔写错;一种是我称为‘形近混用’,积非成是的合法错字。这两种错字都要结合当时的书写习惯去认定。”^③张新俊先生认为在出土简帛中不大适合用“别字”这个概念,主张以“错字”名之。他以楚文字中的“龟”、“鼯”为例,认为类似这种涉及楚人用字习惯的情况不能看作“错字”,又以“名”和“明”为例,说明这类由于偏旁混同造成的错误,不能视为“错字”。他把错字分为“坏字”、“抄手笔误”、“形近而误”三种情况,并指出造成错字的原因有:(1)底本本来存在错误;(2)由于文字国别的不同,在传抄过程中造成的误写;(3)文字类化造成的误字。^④

4. 字迹研究

字迹研究一开始是与甲骨文断代相联系的。20世纪30年代,董作宾先生提出的十项断代标准中“字形”和“书体”就跟字迹有关。

^① 施顺生《甲骨文字形体演变规律之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

^② 裘锡圭《谈谈上博简和郭店简中的错别字》,《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7~80页。

^③ 李零《简帛古书的整理与研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171页。

^④ 张新俊《上博楚简文字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36~55页。

当代学者李学勤、彭裕商、黄天树、林沅等先生提出的卜辞分类依据的也是字迹。张世超先生的博士论文《自组卜辞字迹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自组卜辞的字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张先生所谓的“甲骨字迹”是从甲骨刻辞的整体着眼，除字形与书体风格外，刻痕、行款布局、记事的书面语言形式等可以反映刻写活动特征的考察内容都包括在内。他从个体特征、群体特征与综合特征，意识规律与下意识规律、字迹布局与契刻时序等方面对自组卜辞字迹进行了考察。考察和鉴定的内容包括文字布局习惯体系、刻写动作习惯体系（书体风格、字形结构、字的方向）和书面语言习惯体系（谦辞、特定部位上的刻辞用语、虚词、用字现象、合文）三个方面。通过对自组卜辞字迹的鉴定、规分，在甲骨断代上论证了自组大字是殷墟年代最早的甲骨刻辞，证明了自组大字的肥笔类（文中的 NS₁ 字迹）和自类（文中的 NS₂ 字迹）是基本同时供职的两个刻手所刻，进一步精确界定了自组小字的 A 类（文中的 NS₃ 字迹）和 B 类（文中的 NS₄ 字迹），并论证了 A 类的刻手师承自组大字自类，B 类的刻手师承自组大字的肥笔类，两个刻手也是基本同时供职，且互有影响。字迹研究为今后的甲骨断代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新的研究方法。李儒松先生的硕士论文《郭店楚墓竹简字迹研究》按字迹特点将郭店楚简分为五类：第一类包括《老子》甲、乙、丙三篇，《太一生水》；第二类是《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缁衣》、《五行》、《语丛四》；第三类为《语丛一》、《语丛一》、《语丛三》；第四类有《忠信之道》、《唐虞之道》；第五类是《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他还根据字迹特征重新编联了《语丛四》。^①

与此相关的研究还有许学仁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战国文字分域与断代研究》，他通过探寻先秦书风的流变以及战国时期各国关系

^① 李儒松《郭店楚墓竹简字迹研究》，长春：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文字的结体特点,对战国文字进行分域和断代研究。^①王帅先生的硕士学位论文《西周早期金文字形书体演变研究与断代》^②、张懋镛先生的《金文字形书体与20世纪的西周铜器断代研究》^③则是把书体研究与铜器断代结合起来,互相印证。

林清源先生在《新旧交替——论楚国文字构形的时代特征》一文中,选取楚文字中的“金”、“阜”、“贝”、“寿”等十八个例字,观察它们的各种构形,将之区分为旧体和新体两类,并进一步考证新体形成的年代,以及新旧二体变迁的过程。最后再运用那些时代印记比较鲜明的新体,断定“罗高之官壶”为战国中晚期的楚国器。林先生称这种研究方法为“标准构形研究法。”^④

这一时期有关古文字构形的文章还有林沅先生的《先秦古文字中待探索的偏旁》,陈伟武先生的《同符合体字探微》,陈初生先生的《古文字形体的动态分析》,孙雍长先生的《汉字构形的心智特征》(上),张希峰先生的《古文字形体分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简论古文字形体的分化形式及其相互补足和运用》,丛文俊先生的《论古汉字形体的联想特征与组合原理》,张亚初先生的《古文字源流疏证释例》,吕瑞生先生的《论异体字例及其运用》,钟柏生先生的《秦以前古文字中文字部件“一”的来源及其演变》(上),许进雄先生的《判定字形演变方向的原则》,吴振武先生《古文字中的“注音形声字”》,许倬辉先生的《形声字声符表义释例》,江学旺先生的《〈说文解字〉形声字甲骨文源字考》,李海霞先生的《形声字造字类型的消长——从甲骨文到〈说文〉小篆》,马育良先生的《关于汉字早期形声化现象的再认

① 许学仁《战国文字分域与断代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1986年。

② 王帅《西周早期金文字形书体演变研究与断代》,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③ 张懋镛《金文字形书体与20世纪的西周铜器断代研究》,《古文字研究》第26辑,2006年,第188~192页。

④ 林清源《新旧交替——论楚国文字构形的时代特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6本第4分,2005年。

识》，王建民先生的《从马王堆医书中的俗字看汉字形声化》，孟广道先生的《声符累增现象初探》，殷寄明先生的《形声字声符新论》，孙雪英先生的《试论古文字阶段形声字形符的演变》，徐莉莉先生的《论〈马王堆汉墓帛书〉(肆)的声符替代现象及其与古今字的关系》，费锦昌、孙曼均先生的《形声字形旁表义度试探》，曹先擢先生的《汉字的表意性和汉字简化》，吴九龙先生的《银雀山汉简中的古文、假借、俗省字》，陈焕良先生的《从〈说文〉看繁简字的关系》，马海江先生的《试论象事造字法的构形特点》、《古汉字中象事造字法构形特点新探》，郑春兰先生的《从甲骨文看〈说文〉或体》，张明海先生的《反形字浅论》，等等。

综上所述，学界在古文字构形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上可谓成绩斐然。既有对古文字本体的研究，也有断代的平面的描写，还有纵贯汉字史的探索。较之前一时期的研究，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方法上都产生了质的飞跃。这显示着古文字构形研究在理论上正在走向成熟，但这并不意味着古文字构形研究已经无事可做，它还具有广泛的可拓空间。刘钊先生在《古文字构形学》一书中对此做了展望，他认为今后的古文字构形研究在资料和理论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大力度。在资料方面：第一，应该加快各种字编或字形库、检索系统的编辑出版。字编、字形库、检索系统的内容可以是收录某一宗资料的，也可以是收录某一类资料的，或是收录某一时期资料的；第二，编辑出版古文字字形大全和古文字偏旁谱；第三，编辑古文字考释的发明史，确定每个字的正确考释者和考释时间，总结正确考释所使用的方法；第四，进一步深入进行对各类古文字资料《诂林》的编辑；第五，编写《古文字论著书目解题》或《古文字论著书目提要》，对现有的所有古文字研究的论著进行编排并进行提纲挈领式的说明；第六，编写古文字通假字典和《古文字讹混字典》。在理论方面：第一，编写《中国古文字学史》；第二，编写《古文字基本形体演变谱系》，将所有古文字基本形体按其发展脉络进行排谱，描写并分析其发展变化的过程、规律；第三，进一步对不同地域、不同依附材质的大宗古文字资料进行

构形分析,从而更全面地观察现象、归纳问题、找出规律,总结出理论。^①

除此之外,古文字构形和上古音研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刘钊先生曾强调指出:“以科学的文字符号观来认识文字,始终以符号的眼光来看待文字,重视声音在文字孳生与分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正确考释文字的关键。汉字在发展演变中,其许多形体上的变化是受语言的影响而以声音为枢纽的,一个形体可以分化出一个或几个形体,这种分化有时只有音的联系而无义的联系,只有正确地认识这种分化,才能对文字形体的发展演变取得科学的结论。”^②因此正确认识语音在文字构成演变中的枢纽作用,从声音的角度去探索古文字构形演变的规律,必将有新的创获。

第四节 近 30 年上古音研究综述

郑张尚芳先生把上古音的研究范围界定在从史前到西晋,分为四个时期:远古(原始汉语,指史前期的远古汉语)、前古(上古前期,指约当殷商的前上古汉语)、上古(上古中期,指约当两周的上古汉语)、次古(上古晚期,指约当汉魏的次上古汉语)。^③由于本书研究的文字材料上限为殷商甲骨文,下限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所以我们所要涉及的上古音也以此为限,即指前古、上古次古的语音,以下通称为上古音。

目前上古音研究可分为两个系列,一是根据中古《切韵》音系与上古韵部、谐声系统之间的语音分合所表现的对应关系,现代汉语方言中的古音遗留层,古文献中文字本身的通假、异读、异文、声训、先儒训释中的读若、直音以及汉藏同源对比、相邻地域的非汉语文献中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8页

②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5页。

③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页。

的译音与借词等进行上古音系的构拟。所构拟的音系是中州雅言的书音音系；一是以系统的古文字资料如甲骨文、西周金文、战国楚系简帛等为主要依据对上古音系进行分阶段、分地域的研究。前者长于拟音、解释音理、探索语音演变规律等，后者则照顾到语音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而且所据资料较为单纯、系统、不庞杂。这是前者所不具备的。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力图结合二者，取长补短。

本书的研究目的之一是试图利用古文字资料解决上古音研究中一些尚存争议的问题，因此本综述在第一部分着重指出有哪些问题尚有争议，争议的焦点是什么，以及诸家的主要观点；本书的研究目的之二是利用目前上古音研究的新成果阐释古文字构形与语音的关系，故本综述的第二部分要介绍的是学术界利用古文字资料对上古音进行分期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

一、上古音研究中尚存争议的问题

20世纪初，瑞典学者高本汉先生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汉文典》和《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等著作为我国古音研究开创了新纪元。国人不再仅囿于用传统音韵学的方法考订韵部、声纽的分合，或进行补证和修订，而是积极地学习西方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从语音史的角度开始了上古音系的构拟。自30年代钱玄同先生开始为上古韵部拟音之后，董同龢、陆志韦、魏建功、王力、方孝岳、严学窘、李方桂、周法高、张琨、陈新雄、余迺永、李新魁、何九盈、郑张尚芳、金理新等几代学者都构拟了上古音系。几代学者经过七十余年的努力，在许多问题上都已达成共识。声母如“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韵母如宵谈对转^①，脂、微分部，魏晋以前鱼部的音值为a等。本书将着重谈谈声、韵、调研究中的一些曾经有过争议或尚处于争议之中的

^① 冯蒸《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与古代印度语言中的-am>-o,-u型音变》，《古汉语研究》1993年第3期；裘锡圭《从殷墟卜辞的“王占曰”说到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中国语文》2002年第1期。

问题。

(一) 声母

1. 单辅音

(1) 中古端、知、照三系声母的上古来源

清代著名的音韵学家钱大昕曾有“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的论断。他指出：“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古人多舌音，后代多变为齿音，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也。”（《十驾斋养新录》卷五）由于中古韵图中端组出现在一、四等韵，知组出现于二、三等韵，正好互补，所以后人对“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的论断已无异议。然而照三则与此不同，虽然谐声、异读、通假等材料证明上古照三跟端、知相近，但中古照三也出现在三等韵，与知系形成对立，如果照三跟知系上古属于同一来源，就无法解释它们在后代的分化。的确，在谐声系统中，照三不仅跟端、知谐声，而且还跟见系、精系、喻四、泥母、日母等大量谐声。如何解释这些谐声现象？这就引起了音韵学界对照三系声母来源的激烈讨论，王力先生认为章、端两系的关系只是音近。^① 而李方桂先生则认为知、章上古都应归端组，知、章的不同在于带有不同的介音，即知、组带-rj-介音，章组带-ɟ-介音。^② 李新魁先生以为知组和章组上古相同，只是从[tj]变[tʃ]变[tʃ̥]的速度不很一致，章组较早读为[tʃ̥]而已。^③ 另外，学界对照三与见系声母的关系特别关注，如陈独秀先生早在1937年就曾提出舌面腭音有两个来源，一由见系向前腭化，一由端系向后腭化。^④ 陈初生先生认为止、臻、山等摄的照三系字是由上古的见系经由端系发展而来的。^⑤ 李方桂先生把与见系关系密

①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②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5页。

③ 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

④ 陈独秀《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⑤ 陈初生《上古见系声母发展中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1期。

切的照三系拟为 krj-、khrj-、grj-。^① 梅祖麟先生同意李氏的构拟,并进一步指出这些声母有两种不同的演变,保留-r介音就变成《切韵》时代的照三系声母,失落-r介音就变成舌根音。^② 后来的研究表明上古喻四为 l, 来母为 r, 所以杨剑桥先生改拟为 klj-(照三)、khlj-(穿三)、glj-(床三禅)。杨先生对端、知、照三系的来源做了全面的研究,他认为照三系除了来自见系之外还有两个来源为 plj-、skl-(照三), phlj-、sklr-(穿三), blj-、sklj-(床三禅)。另外,照三系与鼻音声母的谐声可能反映了原始汉语具有一种鼻音前缀,其形式是 mkl-、nkl-、gkl-等。在谐声系列中,鼻音前缀跟 s-前缀可以交替。^③

我们注意到李方桂和杨剑桥两位先生都把船、禅合为一母。学界对这一问题一直有争议,因为《切韵》中船、禅是分立的,船是塞擦音,禅是擦音。裴学海先生曾提出“船”、“禅”两母为一说。^④ 其后,李方桂、李新魁两位先生也撰文主张合二为一。李新魁先生认为从古至今船和禅实际上没有对立,应该合为一类。《切韵》别船、禅为二,根据的是隋代的金陵雅音。金陵雅音由于保存晋代以前的洛阳古读,这种古读把原为一类的船、禅纽字有的读为古一点的读音[d],有的读为[ɬ],形成一类字之中读音的参差不齐,于是《切韵》便把它分为两类。^⑤ 邵荣芬先生也指出中古以后船、禅两母相混的情况。^⑥ 寻仲臣先生从章组产生的时间来考察船、禅的分合问题,他认为章系从端系中独立出来是在汉代,也就是说,汉代以前,船、禅是合一的。汉代以后,船、禅二母发展演变大致分三个阶段:单一船母阶段,船、

①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88页。

② 梅祖麟《跟见系字谐声的照三系字》,《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第1期。

③ 杨剑桥《论端、知、照三系声母的上古来源》,《语言研究》1986年第1期。

④ 裴学海《古声纽“船”“禅”为一“从”“邪”非二考》,《河北大学学报》1961年第1期。

⑤ 李新魁《论〈切韵〉系统中床禅和分合》,《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⑥ 邵荣芬《切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禅分立阶段,船、禅合流为单一禅母阶段。^① 寻先生考虑问题的角度值得肯定,但由于上古章组是否归端组尚未有定论,正如周祖谟先生在《禅母古读考》中所指出的那样,隋唐以后不分床禅,至于汉以前古音是否为一母,尚不易确定。^② 李新魁先生所论在上古音方面证据仍嫌不足。师玉梅先生通过分析西周金文中的通假和谐声资料,发现西周金文中船、禅二母只有一例相谐,所以她认为禅、船二母宜分不宜合。^③

关于船、禅二母还有一个长期有争议的问题,即二母的音韵地位和音值问题。上文已提到,《切韵》韵图中船是塞擦音,禅是擦音。最早对禅母古读质疑的是周祖谟先生,他在1941年就提出禅母古音接近定母。^④ 陆志韦先生在1947年就明确提出,上古船禅的音值应该颠倒为 $ɬ$ 、 $ʒ$ 。^⑤ 不过,陆氏的主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得到支持,直到80年代初,邵荣芬先生利用梵汉对音的成果证明禅母是塞擦音而不是擦音,支持了陆氏的说法。^⑥ 他在《试论上古音中的常船两声母》一文中又根据谐声、通假、异文、读若、直音等材料再次证明了这一点。^⑦ 张树铮先生根据上古地名异称资料也支持禅母是塞音的说法。^⑧ 赵彤先生也同意禅母是塞音,但他认为船母上古是 l ,而不是擦音,在 j 前变为 $ʒ$ 。^⑨ 师玉梅先生利用金文材料亦证明了上古禅母

① 寻仲臣《论中古船禅二母的分合演变》,《古汉语研究》1994年第2期。

② 周祖谟《禅母古读考》,《问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148页。

③ 师玉梅《西周金文音韵考察》,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31页。

④ 周祖谟《禅母古读考》,《问学集》,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161页。

⑤ 陆志韦《古音说略》,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47年,第11~13页。

⑥ 邵荣芬《切韵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⑦ 邵荣芬《试论上古音中的常船两声母》,《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⑧ 张树铮《从上古地名异称看上古声母》,《古汉语研究》1991年第3期。

⑨ 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为全浊音，船母字则可能有塞音和擦音不同的来源。^①

郑张尚芳先生不同意李方桂先生把船、禅两母合并的做法，同时他认为中古禅母应依陆志韦、邵荣芬作浊塞擦音。关于审(书)母，他认为大多数书母字来自冠 h- 的清边音 hlj- (李方桂拟作 hrj-)，但还有来自喉音和清鼻流音的。不仅是书母，他认为章系其余 5 母(含日母)都来自唇、喉牙、舌的塞音以及清鼻流音和塞化流音。以下是他对章系六母的构拟：

章母来自 tj-、pj-、plj-、kj-、klj-、qj-、qlj-、qwj-、ʔlj-

昌母来自 thj-、phj-、phlj-、khj-、khlj-、mhj-、nhj-、hj-、lhj-、rhj-

船母来自 Gj-、Gwj-、Glj-、úlj-、ɸblj-、ɸglj-

书母来自 qhj-、qhlj-、qhwj-、hlj-、hmj-、hnj-、hNj-

禅母来自 dj-、bj-、blj-、gj-、glj-

日母来自 nj-、ɲj-、ɲlj-、mlj-

跟以上诸家都是用复辅音来解释章组的来源不同的是，李娟先生认为章组的历史演变是由于 i 介音的腭化作用，即在上古三等韵前，由于 i 介音的作用，首先发生了舌头和舌上的分化，以及舌上音与 i 介音前的见组字的合流。^② 郑张尚芳先生对此也是肯定的，他说：“见组各母不仅在 j 垫音前会腭化为章系，在短的前腭元音 i 母前也可出现同样的腭化现象，也会将见组变为章、昌、禅、书、船母等。……章系中有些 j 应是后起的。”^③

因为郑张尚芳先生把日母归入章组，这里我们也谈谈日母与泥母的关系。章太炎先生有《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认为娘日二母古

① 师玉梅《西周金文音韵考察》，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3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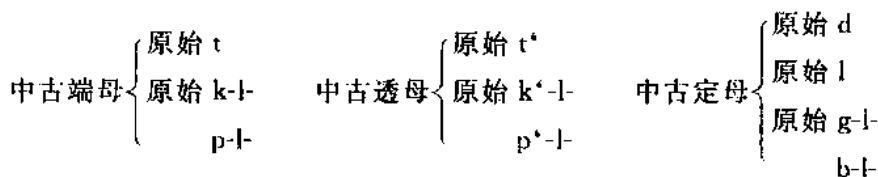
② 李娟《章组字的历史演变——附论现代方言与古音研究的关系》，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1年。

③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7～128页。

读为泥。^①娘母归泥母是肯定的。但日母是否归泥,却有争议。因为中古日母和泥母都出现在三等,是对立的。周祖谟、赵诚两位先生根据出土的汉初简牍帛书中的通假字资料均得出汉初娘日归泥的结论。^②《说文》读若泥日通用有四例(瓊读若柔、𦉳读若襁、岩读与聂同、𦉳读若能),可见许慎时代娘日二母尚未从泥母分化出来。从上文郑张尚芳先生对日母的拟音,可知他也承认有一部分日母字来自泥母。日母的分化是由于j介音的腭化作用。^③

以上我们较为详尽地介绍了照三系声母来源的研究状况,下面我们再简要说说端、知两组的来源。

先说端组。对于端组自古有之这一点,学界是没有异议的。不过近年来传统谐声通假等材料通过与汉藏同源对比和域外对音资料相结合,人们发现中古端组的来源并不是单一的。包拟古先生认为中古端组有三个来源:^④



杨剑桥先生的结论与包拟古略有不同。一是拟音上的不同,他把端、透、定来自唇音和见系的分别拟为 p-l、k-l(端), p'-l、k'-l(透), bl、gl(定);二是他没有把喻四作为定母的来源之一。^⑤潘悟云先生采

① 章太炎《章氏丛书·国故论衡》,上海:右文社,1912—1949年,第30~31页。

② 周祖谟《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音韵学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赵诚《临沂汉简的通假字》,《音韵学研究》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③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

④ 潘悟云《高本汉以后汉语音韵学的进展》,《温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第46页。

⑤ 杨剑桥《论端、知、照三系声母的上古来源》,《语言研究》1986年第1期。

用了包拟古的拟音,并把前一成分的性质定为前冠次要音节。^①郑张尚芳先生认为此说有其优点,但也有问题,即这等于把其中 l、r 都立为词根,而前面的音都成了前冠音,这样几乎所有非舌音声母都可作冠音,冠音的数目就太庞杂了;而且流音词根也会太多,在谐声词源分析上就会平生阻碍。^②他还引入“流音塞化”的概念来解释中古端组的来源,认为来自 kl-、pl-、ʔl- 的 t-类字是因为流音的塞化作用而形成的。塞化流音在端组的分布,理论上可有:

端 t < kl'-、ql-/ʔl'-、pl'-

透 th < khl'-、qhl-/hl'-、phl'-、ɲhl'-、mhl'-

定 d < gl'-、Gl-/ʔl'-、bl'-、l'-

泥 n < ɲl'-、ml'-

从-r'来的则为二等知、彻、澄、娘,只要把上列的-l改为-r就是。^③知系二等是由r'的塞化作用,而知系三等则是因为喉牙唇音后的l塞化而来的。^④与端组通谐的知组字则拟为带r冠的rt-、rth-、rd-、rl-,最后的rl-声母是表示那些与以母通谐的澄母字“茶、泽、雉”的。^⑤

(2) 喻四、来母

喻四的音韵地位和拟音问题是学界争论较为激烈的问题之一。1927年,曾运乾先生利用谐声、通假、异文、异读等材料,认为在上古汉语中喻母应该归入定母,这就是后来写入教科书中的“喻四归定说”。依据陆志韦先生的统计,喻母和端组、知组以及章组各母的相谐次数分别为:定母94次、透母39次、端母14次、澄母43次、彻母20次、知母2次、神母15次、书母46次、禅母11次、昌母3次、章母

①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②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6页。

③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37页。

④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0页。

⑤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8页。

23次。^①可见曾运乾先生的“喻四归定说”基本上符合喻四在谐声系统中的谐声实际。高本汉先生把喻四拟为d,王力先生最早采用高氏的构拟,后又改用 λ 表喻四。李方桂先生提出喻四应为闪音r,并拟来母为l。^②蒲立本先生虽拟喻四为 δ ,但指出从汉藏对应上看,喻四多对l。^③薛斯勒先生《上古汉语的R和L》肯定了喻四为l的拟音。其后,雅洪托夫^④、包拟古^⑤、梅祖麟^⑥、潘悟云^⑦、郑张尚芳^⑧等学者都认为喻四当拟为l,而来母才是r。郑张尚芳先生还提出流音分塞化不塞化说,象闽语那样塞化的l'变定母,而一般的l则变 $\lambda \rightarrow j$ 为喻四。^⑨喻四和来母主要来自上古流音的观点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金理新对r、l的拟定仍有异议,认为依藏文对应词看,上古来母读r限于三等,一、四等应仍拟为l,还主张二等介音r也该为l,而r专用于三等。他认为上古喻母起码有两个不同的来源,其一是半元音j声母,以及附加不同辅音前缀的gj-声母(g表示

① 陆志韦《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8页。

②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4页。

③ 蒲立本著,潘悟云、徐文堪译《上古汉语辅音系统》,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④ 雅洪托夫(苏)《上古汉语的开头辅音L和R》,《汉语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⑤ 包拟古著,潘悟云、冯蒸译《原始汉语与汉藏语》,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⑥ 梅祖麟《古代楚方言中“夕(祭)”字的词义和语源》,《方言》1981年第3期,第216页。

⑦ 潘悟云《流音考》,《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潘悟云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⑧ 郑张尚芳《上古音构拟小议》,《语言学论丛》第1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⑨ 郑张尚芳《上古音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一),《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4期,第16页。

辅音前缀);其二是附加 ʃ-辅音前缀的舌尖浊塞辅音 d-。前者谐声中和见组谐声而不与端组谐声,后者谐声中和端组尤其是其中的定母谐声而不和见组谐声。为了使这两种不同来源的喻四有所分别,他称前者为颐母,后者为以母。他认为颐母和见组声母之间的谐声关系是通过附加 g-辅音前缀来实现的,即 j->gj-=kj-。金先生进一步指出:“上古汉语除了 kj-、pj-、tj-系列之外,还有 qj-系列声母。”qj-系列声母就是指与喻四相谐的喉音声母。^①

在谐声系列中还有一部分喻四字与匣云相谐。郑张尚芳先生认为:“‘喻四’中包含一些非舌音来源字,这些字都跟‘见系’合口联系,应该从上古‘以母’中排除出去。它们混入‘喻四’是由于都是前元音 i、e 字,因受前元音的影响而来的。”^②金理新先生不同意郑张尚芳先生把这部分和云母相谐的喻母上古归入云母,并作为一种语音演变过程中的例外的做法。他把这部分字称为“营母”字,构拟为 Gj-。“营母”只出现在合口中,而颐母仅仅局限于中古开口,两者正好合成一个声母。^③

金先生的上述观点有一点值得肯定,就是他把以母分为两类。但他对以母与见组的谐声关系的解释却有违于他所定的谐声原则,即互谐的两字的词根音节必须相同。他把与见组相谐的颐母拟为前缀 k-、p-、t-、q-、G-分别+j-组成 kj-、pj-、tj-、qj-、Gj-,在这里,j-是词根音节,而见组 kj-的词根音节却是 k。因此显然他无法自圆其说。

王姗姗先生也不同意来母为 r、喻四为 l 的拟法。她认为来母和喻四可能有着共同来源,这个共同来源主要是作为复辅音声母的前置边音成分。在汉语中,来母自始自终都读边音[l-],只有喻四从

① 金理新《上古汉语语音系》,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

② 郑张尚芳《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温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

③ 金理新《上古汉语语音系》,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133页。

[l-]中分化出来变作[r-],继而变为[j-]。①

林亦先生则从方言的角度论证了古以母演变的另一形式——喻四归匣。②

从亲属语比较,可知来母除 r 外还有三合的 hbr-、hgr-来源。③

(3) 喉牙音

A. 见纽的上古音值

曾晓渝先生通过考察水语、苗语、突厥语等少数民族语言里古代汉语见母借词的读音以及后汉三国时期梵文 k-音节与见母译音字的特殊对应关系,根据这些少数民族语言里古汉语见母借词所反映出的三等与非三等声母读音上的类别选择,认为见母的上古音值有可能包含小舌塞音 q-(非三等)和舌根塞音 k-(三等)两个音位,进而言之,上古三等与非三等的语音差别可能主要不在于-j介音的有无。④ 郑张尚芳先生认为这是一个 k 音位的两个变体。这种现象可能表明见系 k 历史上一度有过一个阶段性的音位变体 q-。曾文说的那些汉语借词,多半是上古晚期借的,这时三等韵母已处在产生 w~i 介音的萌发阶段,它们会使见类声母部位较前,而非三等则相对较后;由于原来影组 q-声母这时已喉音化,q-成空位,于是便有可能在这个阶段一度成为见母非三等的音位变体。⑤

B. 群匣云

黄侃先生的古音十九纽中没有群纽,他把群纽归入上古溪纽。黄侃之说激起了后人对中古群纽来源以及群匣云三组关系的探讨。时建国曾用临沂汉简和长沙帛书通假资料以验其是,但又说群纽和

① 王珊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② 林亦《喻四归匣——古以母演变的另一形式》,《语言研究》2004年第1期。

③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5页。

④ 曾晓渝《见母的上古音值》,《中国语文》2003年第2期,第109页。

⑤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4页。

见纽关系表现最为密切。^① 高本汉以匣母与群母相配,拟为上古的 gh-,在一、二、四等韵前变为中古的匣母,在三等韵前变为群母,又认为云母从上古 g-来;董同龢先生主张匣、云合一,跟中古一样读 y;^② 李方桂先生则合匣、云、群三母为一,读 g。云母从圆唇舌根浊音 gw+j-而来。群母是不圆唇的舌根浊音 g+j-来的,或者是 gw+j+i-来的。匣母是由 gw+(一、二、四等韵)->中古匣母 y+w-。^③ 其实,李方桂先生早年曾主张把匣母一分为二,与 k、k'谐声和互读的同群母,读浊塞音;与 x谐声的同云母,读浊擦音。此说曾得到罗常培先生的认可,并在罗氏的《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两组》一文中得以表述。^④ 邵荣芬先生的《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试析》和《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再证》对罗常培先生把匣母一分为二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和补充,指出匣₁跟群母相同,是浊塞音 g-,匣₂跟云母同,是浊擦音 y-。^⑤ 郑张尚芳先生的上古音系采纳此说,把匣母分为塞音 g、gw 和通音 h、hw,并特别指出匣母还是以读 g、gw 为主,h、hw 除含不多的匣母字外,主要即表示云母。^⑥

C. 上古有无圆唇舌根音喉音

蒲立本^⑦、李方桂两位先生认为舌根音的开合应当区别,所以拟了一套圆唇舌根音 kw-、khw-、gw-、ngw-、hw-及 w-,这些声母也就是中古的大部分的合口的来源。^⑧ 此说已为新起各家一致采纳。金

① 时建国《从临沂汉简、长沙帛书通假字再证古声十九纽》,《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6期。

② 董同龢《中国语音史》,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8年,第175页。

③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8页。

④ 邵荣芬《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试析》,《语言研究》1991年第1期。

⑤ 邵荣芬《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试析》,《语言研究》1991年第1期;《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再证》,《中国语言学报》1995年第7期。

⑥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6页。

⑦ 蒲立本著,潘悟云、徐文堪译《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⑧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7页。

理新先生进一步提出一种新见, kw-系是由原始 q-系转化来的。^① 郑张尚芳先生认为 q-变 kw-这种转化, 在亲属语言分散的音值变化中是有的, 而在音系结构总观上就缺乏有力的根据而难以成立, 所以仍不能动摇上古音系具有 kw-系声母的设想。为了整个声母系统的简约, 他把圆唇不圆唇合为一套, 不另标名, 但明确规定只在喉牙音出现, 即只有舌根、小舌、喉音才有带 w 的复声母。^②

D. 影晓云

潘悟云先生提出影、晓、云三母来自上古小舌塞音 q-、qh-、G-。^③ 金理新先生认为这样还是无法完满解释影组跟见组的谐声关系。他认为影组是在见系的基础上黏着一个词缀 ʃ- 后演变成中古汉语的喉塞音, 为附加 ʃ- 辅音前缀的舌根塞辅音 k-, 同组的晓母 g- 辅音前缀的舌根塞辅音为 kh-, 而同组的匣母和云母就是附加 ʃ- 辅音前缀的舌根塞辅音 g-。影母二等上古来源是 ʃ-kl- 和 ʃ-ql-, 三等上古起码也有 ʃ-kr- 和 ʃ-kj- 两个来源。^④ 郑张尚芳先生认为金说值得考虑, 但在他构拟的音系里仍采用潘悟云先生之说。

关于晓母,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它与影母不同, 不是深喉音而是浅喉音, 最早由黄侃先生提出, 其后支持者不少。如李新魁先生认为上古晓匣归见溪群疑;^⑤ 时建国先生认为在秦汉之际的齐楚两大方言中晓匣都应归牙音见组;^⑥ 王文耀先生认为晓母在上古声系中并没有自成系统的地位, 而应当归并到匣母中去。^⑦

① 金理新《上古汉语音系》, 合肥: 黄山书社, 2002 年。

②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 第 84 页。

③ 潘悟云《喉音考》,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潘悟云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④ 金理新《上古汉语音系》, 合肥: 黄山书社, 2002 年, 第 153~169 页。

⑤ 李新魁《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 《学术研究》1963 年第 2 期。

⑥ 时建国《从临沂汉简、长沙帛书通假字再证古声十九纽》, 《西北师大学报》1993 年第 6 期。

⑦ 王文耀《殷周文字声类研究》,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年, 第 35 页。

(4) 精系

郑张尚芳先生认为精组除心母字有一部分来源于 s 及 s 冠外,多数更是上古后期才成为塞擦音的。所以他构拟的精组只有心 s、清 sh/tsh、从 z/dz。在《上古汉语的 S-头》一文中,他总结了精组字的变化规律共四项:^①

A. 鼻流音声母冠 s-(sm-、sn-/sng-)中古为“心(生)”母。以母冠 s-中古为心母,来母冠 s-中古为生母;

B. 在清鼻流音送气声母“mh 抚、ngh 哭、nh 帑、lh 胎、rh 宠”之前冠 s 时中古变“清(初)”母;

C. 塞音声母冠 s-中古为精(庄)、从(崇)、清(初),各依清、浊、送气相应变化,即精庄组还有 st-、sk-、skr-、sp-、spr-来源。sl-、sr-本变心母、生母,但也有因塞化而变精母、庄母的。sl'-、sr'-也可能来自前古的 sql-、sqr-,即 sql-(精)、sqr-(庄),sqlh-(心)、sqhr-(生),sGl-(邪)、sGr-(俟);

D. 擦音 hñ 冠 s-中古为心母与邪母,与晓匣云母相交替。

另外,他认为精组在上古 i 元音前还有另一种来源,即 ?lj-、hlj-、ñlj-的腭化音。在腭化音 i 前,?lj-、hlj-、ñlj-也腭化为章、书、船母;而 ?lji-、hlji-、ñlji-中的 lj 则像邪母那样变 zj-,从而使 ?lji-变精母,ñlji-变从母,hlji-变心母。^②

赵彤先生指出心母还有 l'i->si-,n'i->si-两个来源。^③

王姗姗先生也认为塞擦音是后起的,即有的是因为塞音受韵母的影响而向塞擦音方向转化,而这类塞音基本上是舌尖中部位的,其所配合的韵母多是高元音或舌位较高的元音;有的源自复辅音的前置辅音成分,如 [lt'-]>[st'-]/[st-]>[ts'-]/[ts-];有的来自复辅音的后置擦音成分。

① 郑张尚芳《上古汉语的 S-头》,《温州师专学报》1990 年第 4 期。

②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109 页。

③ 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

金理新先生不同意上古精组为 st-系列复辅音,而把精组的上古读音构拟为 tl->ts-精组一等, tr->tʃ-庄组二等和三等, stl-、str->tsj-精组三等。

邪母常与舌尖塞音及喻四互谐,所以钱玄同提出古无邪纽说,认为邪纽归定。^①“古无邪母”说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支持,但邪母是否归定则尚有争议。如李方桂先生认为邪母是从上古 r-(喻四)来,后面有个三等介音-j而已,所以拟邪母为 rj-,梅祖麟先生改喻四 l-的同时也改邪母为 lj-。王文耀先生也认为中古邪母是从古喻四中分化出来。郑张尚芳先生指出邪母有舌音、喉音两个来源。舌音是由以母 l 加垫音 j 来的,即 lj->ʎ->ʒ->ʒ-。喉音由 G 加前冠 s 来, sG->sf->ʒ-,其中多数是 sGw-,所以中古常为邪母合口。俟母是由 fir 前加 s-形成的。

(5) 清鼻流音声母

在谐声系列中有不少晓母与明母相谐的例子,如“每”与“梅”、“黑”与“墨”、“民”与“昏”等。高本汉先生把这些跟 m-相谐的 b-母字的上古声母构拟为“擦音+流音”式的复辅音 xm-。董同龢先生否定了高氏的构拟,在他的上古汉语声母系统中设定了一个 m。^②但是从语音的系统性来看,董氏的构拟还是有缺陷的。李方桂先生根据谐声中泥日娘跟吐气清音透母、彻母、审母三等跟鼻音声母、晓母字跟疑母以及来与透彻互谐等线索得出一套上古清鼻流音声母 hm-、hn-、hng-、hnwg-、hl-、hw-。^③张永言先生也找出了一套送气清鼻流音 m̥-、n̥-、ŋ̥-、l̥-与 m-、n-、ŋ-、l-相配。^④郑张尚芳先生主张将清鼻

① 钱玄同《古无邪纽证》,《钱玄同文集》(第四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 董同龢《中国语音史》,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8年,第170页。

③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9~21页。

④ 张永言《关于上古汉语的送气流音声母》,《音韵学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流音分为二类,其中变擦音的另属 h-的复声母一类:

hm-悔 hɣ-谗 hn-汉 hr-嚅 hr-哈 ——后变晓母

hmj-少 hɣj-烧 hnj-摄 hlj-舒 ——后变书母

而变送气塞音的则自成一套独立的送气清鼻流音声母,它们才是基本声母。其中 mh-、nh-、ŋh-表送气清鼻音[ŋ^h-、m^h-、n^h-],lh-、rh-表送气清流音[l^h-、r^h-]。

2. 复辅音

“古有复辅音”说的提出,实际上是为了解释谐声系列中的特殊谐声和例外谐声关系。19世纪末,为了解释古汉语的来纽字与其他声纽字的谐音交替现象,英国汉学家艾约瑟在《汉字研究导论》中首次提出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的假设。1923年,高本汉在《中日汉字分析字典·序言》中根据艾约瑟的假设,提出了“各”、“络”互谐是古汉语复声母的遗迹的著名理论。中国学者中第一个提出“古有复辅音”说的是林语堂先生。1924年,他在《古有复辅音说》中指出古有复辅音[kl-]、[pl-]和[tl-]。^① 迄今为止,经过几代学人近一个世纪的研究探索,复辅音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已濒于成熟。研究方法上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用材料上更加丰富全面,与过去的学者仅限于谐声通假、经典异文、古今俗语中的联绵词等资料不同的是,当代学者十分重视利用方言、同源词、亲属语言、中外对音等资料;二是把内部构拟和外部比证相结合,进行音理上的解释。理论上的进展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谐声原则进行新的解释。潘悟云先生首先尝试从古汉语形态变化上对谐声现象重新进行解释,他认为同一个词的两个形态变体之间必定有语音上的联系,即或有某种内部曲折关系,或是附加词缀不同,但同一谐声系列的各字的词根声母为可交替声母。如果某两字的中古声母为不可交替辅音,那么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

^① 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林语堂名著全集·语言学论丛》第19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这两个中古的声母辅音,由上古的词缀变来;另一种可能是这两个中古的声母辅音,一个来自上古的词根声母,一个来自词缀。他所界定的可交替声母有:(1)同部位的塞音,清浊可以交替,送气不送气可交替;(2)流音之间,即 r 和 l 可交替;(3)鼻音之间可交替;(4)可交替声母可带中缀 -r-、-l-、-j- 以及前缀 s-、N-、m-、k-、kh-、g-、p-、ph-、b-, 等等,组成复辅音。^① 金理新先生对谐声原则做了进一步推阐,他认为上古汉语实际上是以双音节为主的语言,其中一个词根音节而另一个是词缀音节。谐声系列中的各字的词根音节必须是相同,词缀音节所反映的正是语词的形态。这些表示形态的附加音节在脱落的过程中影响了词根音节,使本来相同的词根音节由于附加音节的影响而产生了变异。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同一谐声系列中各字的发音部位往往不同甚至相距甚远的原因。^② 谐声原则的确立使得复声母结构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二,复声母结构的研究。古汉语有复辅音,已为多数学者所接受。但在具体的构拟上,复声母的结构问题却成为研究的难点。复声母不是几个辅音的随意凑合,而是有规则的。然而早期的复声母构拟,就存在着随意性和拼凑性的问题。王力先生无法接受高氏所拟复辅音的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声系不能“这样杂乱无章”。^③ 如今,学界已经在谐声原则上取得一致意见,即作为声干的基辅音,通常就是谐声系统的声符(即主谐字)的声母辅音。复声母的结构成分有冠音、基辅音和垫音三种,分别处于声首、声干、声尾三种位置。郑张尚芳先生分复声母为后垫式、前冠式、前冠后垫式三大类:

后垫式复声母可带流音 r、l 和通音 j、w 四种后垫音。其中 w 只与见系(喉牙音)K-结合;j 只在章组 Cj 及邪母 lj 出现。但由于 kw- 类声母相当于圆唇化单声母,故也还能跟 -r-、-l-、-j 结合。垫音 r 出现

① 潘悟云《谐声现象的重新解释》,《温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

② 金理新《上古汉语音系》,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

③ 王力《汉语语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的条件为中古二等和重组三等。垫音 l 出现的条件则为中古一、四等和重组三等之外的三等字。

前冠式复声母所带冠音有啞、喉、鼻、流、塞五类。啞冠音即 s-冠音；喉冠音有 ʔ-、h-、ɦ- 三种；鼻冠音有 m- 和 n-；流冠音即 r-；塞冠音则有 p-、t-、k-。前冠后垫式复声母主要有庄、精组的 s-冠式，晓、书母的 h-冠式，船母的 ɦ-冠式，来、以母的 r-冠式、鼻音的 N-冠式等五种。

金理新先生所拟上古音系与郑张尚芳先生的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他认为来母一等为边音 l，而来母三等为闪音 r，以(颐)母为 j。它们都是独立的声母；其次，他的音系里只有一个构词中缀 -l-；再次，他所拟定的前缀有 ɦ-、g-、r-、s-、d-、m-、q- 等，而没有郑张尚芳所指出的 ʔ-、h-、n-、p-、t-、k- 等。

第三，复辅音的类型。复辅音的结构清楚了以后，复辅音的类型也就不言而喻了。目前研究得比较成熟的主要有带 l-复辅音、带 s-复辅音、鼻冠 N-复辅音、带喉塞音 ʔ-的复辅音等类型。王姗姗先生还提出 l-前置的复辅音可能是一些带 s-复辅音、鼻冠复辅音的更早时期的形式。他认为前置边音影响后面的基本辅音由送气音变成不送气音，并带有同部位的鼻冠音成分；而这个前置边音本身亦可向擦音 [s > h > x-]、[r-]、半元音 [j-]、以及塞化为塞音 [d-] 演化。所以在某些复辅音往后演化的过程中，有向鼻冠音声母演化。所以王姗姗认为带 s-复辅音应该分为原始型 s-复辅音和过渡型 s-复辅音。

第四，复辅音向单辅音的演化过程。研究表明，复辅音向单辅音演化主要是受前冠音或后垫音的影响，但对于一些前冠音和后垫音在演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学者或有不同的意见。如潘悟云先生曾讨论过流音 l-及带次要音节的流音即 C·l-的塞化的问题，认为以母上古是 l，有些以母字到中古变作定母 d，是一种流音塞化现象。当 C·l-出现在长元音前的时候，不仅次要音节失落，后头的 l-发生塞化，而且次要音节的性质也会影响到流音的塞化性质。此说得到郑张尚芳先生的支持并得以进一步阐发。郑张尚芳先生认为流音 l-

r-都会发生塞化,并指出塞化的语音条件除了常在长元音外,还跟前缀音 f-有关,即 f-l>l-l'>l'。塞化流音 l-在端组的分布,理论上可有:

端 t<kl',ql/?l',pl'

透 th<khl',qhl/hl',phl',qhl',mhl'

定 d<gl',Gl/?l',bl',l',fl'

泥 n<ql',ml'

而塞化流音 r-则体现在知组。王姗姗则强调前置边音 l-不仅可以塞化为 d-,而且会向擦音、鼻音或半元音演化。下面我们主要介绍郑张尚芳先生的有关主张:

1. 垫音-w 涉及的是圆唇舌根音、喉音系列,中古全反映为见系声母合口。有些 kw-系列字在后接圆唇韵系时混并于 k-系。

2. 凡带垫音 j 的上古声干,不管舌音、喉牙音、唇音,除 lj-和 s-j 变邪母、心母外,其他到中古都腭化变为章组。中古精组三等字中也有部分是从上古带 j 垫音的复声母来的。在一般元音前 ?lj-变章母,hlj-变书母,flj-变船母,但在前腭元音 i 母前,?lji-变精母,flji-变从母,hlji-变心母。

3. -r、-l 只出现于 P-、K-两系和啞音后。庄组早期是擦音 ?sr-、shr-、sr-、zr-和 sCr-;汉语 Cl-、Cr-在后世大多简化了。多数是失去垫音演化为 C-,也有失 C-而成 r-、成 l-的。另外还有 Cl->T-变入端、知组,即塞化;云母最初应是带 r 的 fir-<Gr-。

4. 上古 s-冠音主要是在鼻流音前,形成了中古心母可观的一部分;啞冠音在塞音前能生成后来的一部分精、清、从母字;s-在送气清鼻音前能生成清母;s-在喉擦音前清音入心母,浊音入邪母;s-和 h-可以交替。

5. 在鼻流音前的喉冠音(hm、hn、hq)会以冠音占位的方式吞没声干,形成中古的影、晓、匣、云喉音声母。

6. 在清塞音前的鼻冠音后世大多脱落,浊塞音前的鼻冠音可以吞没声干而占位为主声母,如 mq-、mG-、mg-可形成明母,而 mqh-还

能形成滂母。

7. 带 r 是形成中古二等和三等 B 类及形成庄组的条件。凡舌音声干的知组二等字和三等字的一部分应该有 r-冠,但知组三等多数字本就来自上古端组三等字,中古变知组是受了三等初生介音 w 的影响,因此不需拟 r-冠音。rt-知、rth-彻、rd-澄、rn-娘之外,还有一部分澄母字是 rt-。

8. p-冠音有的吞没声干而占位为主声母,如“百”、“八”的声母 p 就是从 p-冠音来的;有的 p-冠音弱化为 w 而转入合口韵,如“立”分化出“位”;塞冠音可因后接送气声干而变送气。

第五,复辅音声母消失的年代问题。关于复辅音声母消失的确切年代,至今尚无定论。何九盈先生认为远古汉语可能存在复辅音,所以在上古汉语中留下许多复辅音的遗迹,但复辅音作为一个系统已经消失。也就是说,《诗经》时代(包括战国时代)不再有系统的复辅音声母。^① 竺家宁先生指出,汉代是复辅音大量消失的时代,因为到了魏晋六朝的中古早期,大量的反切里,已经看不出复声母仍然存在的迹象。^②

何九盈先生曾指出目前复辅音研究在材料上的问题,他说:“研究复辅音声母,主要途径有二:一是全面利用《说文》中的谐声资料,根据谐声关系的变异规律归纳出复辅音声母系列;一是利用亲属语言个别词对应关系的研究,建立起各种类型的复辅音声母结构。前者着眼于内部拟测,后者着眼于历史比较。这两种方法都是行之有效的。问题在于,这两种材料本身都无法提供明确的时代界限和汉语方言的具体区域。谐声资料经过上千年积累而成,包含不同时代的语音素材,情况颇为复杂;亲属语言的比较,主要是寻找同源词,在

① 何九盈《上古音》二校后记,何九盈《上古音》,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② 竺家宁《古汉语复声母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1年,第733页。

现阶段来说,这项工作还只是零敲碎打,各家构拟的所谓‘原始形态’,时地观念同样是模糊的。所谓‘同源词’,其可信程度如何,很难判断。”^①据以上认识,何先生倡导对复辅音声母进行断代研究,他的《商代复辅音声母》一文就是这方面的尝试。这种尝试是有积极意义的,应该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的方向。

(二)韵母

1. 东、冬、侵

韵母如东、冬、侵三部的分合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清代音韵学家自孔广森之后除王念孙、严可均(他还把冬部并入侵部)主张东、冬不分外,均认为东、冬当分立为两部。当代学者李毅夫先生也认为东、冬当分立。^②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根据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的古文字资料论证了在西周以前的古音中东、冬不分的事实。^③其后曾宪通先生从金文、玺印和战国楚系文字资料出发,结合典籍再次证明了这一点。^④师玉梅先生根据西周有韵铭文中冬、东两部多有合韵的现象,得出直至西周时期东、冬仍然不分的结论。^⑤周祖谟先生不同意于先生的看法,仍然认为冬、东当分立。^⑥史存直先生又撰文反驳周祖谟先生的观点,认为直到汉代东、冬还没有分立。^⑦罗江文先生把《诗

① 何九盈《音韵丛稿·商代复辅音声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页。

② 李毅夫《上古韵是否有个独立的冬部》,《语文研究》1982年第2期。

③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山¹、吕兼论古韵东冬的分合》,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63~471页。

④ 曾宪通《从“𠄎”符之音读再论古韵部东冬的分合》,《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1997年。

⑤ 师玉梅《西周金文音韵考察》,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92页。

⑥ 周祖谟《汉字上古音东冬分部的问题》,《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⑦ 史存直《古音“东、冬”两部的分合问题》,《史存直音韵学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经》与西周金文对比之后认为东、冬当分立。^①但从他所列的资料来看,金文中冬部无独用例,冬、东合韵二十例,东部独用36次。显然,金文中冬部应并入东部,但罗先生却根据《诗经》东、冬的用韵情况,仍主张冬部独立。可见引起这一论争的根本原因在于有些学者忽视了语音发展演变的阶段性,《诗经》所代表的音系与西周金文音系还是有差别的。主张东、冬分立的学者所据的研究资料《诗经》、《楚辞》、《论语》、《左传》等都是春秋战国以后的。东、冬分立在《诗经》时代确实如此,但直到西周时期,东、冬却是合用的,而且东、冬合用还保留在春秋战国以后的某些方言中。我们注意到曾宪通先生在文中所据的文字资料都是楚系文字,这说明在楚系方言中东、冬很可能还是合用的。

关于冬、侵的分合问题,目前已经取得一致意见,即冬、侵合韵是关中方言的特色。吴文祺先生指出:“《诗经》蒸、侵合用只限于《雅》、《颂》和《秦风》。《雅》、《颂》代表较古的方言,《秦风》代表西北方言。很可能上古方言及西北方言的蒸部是收-m的。《诗经》时期冬部韵尾收-m,到战国时,因为韵头(冬部原是侵部的合口呼)u-、iu-和韵尾-m的异化作用,-m>-ŋ,从侵部分化出来。”^②周祖谟先生也认为“冬”、“侵”通押是《诗经》时代部分地区所有的早期的一种方音现象。^③王健庵先生认为《诗经》用韵可分为东土和西土两个方言韵系,冬侵合韵仅见于西土之诗,在西土方言中是合一的。^④

2. 侵、蒸

关于侵、蒸的关系,陆志韦先生曾有个提法,认为在周之前以及在周代的西北方言中蒸、侵都是收-m,而《秦风》(《邠风》)以外的十

① 罗江文《〈诗经〉与两周金文韵部比较》,《思想战线》2003年第5期。

② 吴文祺《上古音中的几个问题——评王力〈诗经韵读〉》,《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下)(《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1~99页。

③ 周祖谟《汉字上古音东冬分部的问题》,《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④ 王健庵《〈诗经〉用韵的两大方言韵系——上古方音初探》,《中国语文》1992年第3期。

三国的蒸部字收-ŋ。周代蒸-m>-ŋ,此后,蒸、侵两部就不通转了。^①但师玉梅先生则指出春秋铜器铭文中侵、蒸仍有相谐和通假现象。她认为侵蒸主要元音相同,只是蒸部为-ŋ尾,侵部为-m尾,所以两部本有相谐的可能,不必一定解释成-m>-ŋ。李玉先生考察秦汉时期简牍帛书中的通假现象后认为蒸、侵两部常常通假,很可能不属方言现象。^②从李书所收材料的分布来看,马王堆汉墓帛书35次,阜阳汉简2次,银雀山汉简2次,武威汉简3次,可见至秦汉时期,蒸、侵两部的关系还很密切,而且并不局限于地域。

3. 支、脂、歌

段玉裁提出的“支、脂、之”三分一直被视为古音学上的一个颠扑不破的重大发明。史存直先生最早提出异议,他认为古韵支部不是一个独立的韵部,而是“脂”、“歌”两部的交叉地带。而造成这种交叉的原因是因为研究古音所据的资料无论是韵文还是文字的谐声关系,都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③史先生敢于对支部与脂歌的关系提出质疑是值得肯定的,也道出了古音研究中存在的一大弊端,即所据资料不分时代和地域。但从他的论证过程及所据资料来看,都存在问题。首先,他在分析材料时既不分时代也不分地域。其次,他仅根据“脂、支”合韵和“支、歌”合韵较多,而“脂、歌”合韵或“脂、支、歌”合韵极少,就得出“支部不是独立的韵部,而是脂、歌两部的交叉地带”这一结论,显然不足为据;再次,他用所谓“交叉”地带来解释古音中的方言因素也过于含混。虞万里先生的《从古方言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一文真正做到了对古音进行分时代分地域的研究。他在研究上古歌支两个韵部时,将地域分为周郑音系和楚辞音系。他认为

① 陆志韦《古音说略》,《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0~194页。

② 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103~104页。

③ 史存直《关于古韵“脂、支、歌”三部之间的关系》,《汉语音韵学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周秦之时,周郑音系歌部和支部绝然分读,而楚地则将歌部音读成支部音。西汉之际,歌支音读虽然大致如周秦,但楚地文人辈出和文化勃兴,为以后歌部中的一部分字流入支部创造了条件。到东汉,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歌部中的一部分字受了楚音的支配,流向支部,而这时反切的产生,也促进了这一音变的过程。^①但虞先生在分析材料时又过于主观。由于他主张楚地将歌读入支,所以他分析《楚辞》中支歌用韵情况时,就刻意强调支部无独用例、支歌3例、歌脂(微)3例这一情况,而无视歌部独用32次的事实。显然,歌部独用的数字远远高于支歌合用,而据此何以得出歌读入支的结论?赵彤先生认为战国楚方言中支歌当分立。^②黄人二先生认为之、脂通押的现象为南(包括东)方边鄙蛮夷所在地域之语音特点。^③

4. 幽、侯、鱼

顾炎武并侯于鱼,但由于所用材料有许多是汉代以后的用例,所以受到批评。江永则是把虞部字析为两半,一部分归鱼部,一部分归侯部,又主张把侯部并入幽部,侯部不独立。段玉裁则将侯部独立出来,使鱼、侯、幽各为一部,侯次于鱼幽之间。^④侯、鱼两部字在先秦押韵中基本上是分用不乱的,所以两部的独立得到了学界的赞同。至汉代,两部通押现象增多,罗常培、周祖谟两位先生认为应合为一部。^⑤史存直先生统计《诗经》押韵,幽部独用113例,侯部独用27例,鱼部独用181例,鱼侯合韵6例,幽侯合韵4例。统计《楚辞》押

① 虞万里《从古方言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榆枋斋学术论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② 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第87~89页。

③ 黄人二《从战国竹简之脂、中侵通押现象论之脂支、冬(中)东分部问题》,第九届国际暨廿三届全国声韵学学术研讨会论文,1994年。

④ 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⑤ 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

韵,幽部独用 26 例,侯部独用 3 例,鱼部独用 66 例,鱼侯无合韵例,幽侯合韵 1 例。史先生因此认为侯部不是独立的韵部,而是摆动于鱼、幽两部之间的一群字,在某些方言里这群字属于鱼部,在另一些方言里这群字属于幽部。^① 这一结论显然与所列资料不符。《诗经》中鱼侯、幽侯合韵的例子相对于鱼、侯、幽三部独用的例子,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所占比例来看都只是少数,特别是从《楚辞》来看,鱼侯没有一例合韵的,幽侯也只是一例。虽然侯部独用例相对于鱼部、幽部独用例而言要少得多,但据此认为侯部不是独立的韵部,当有失偏颇。邵荣芬先生重新检讨了于海晏先生的《汉魏六朝韵谱》和罗常培、周祖谟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主张鱼、侯应分立。^② 李新魁先生也主张仍应分立。^③ 罗江文先生对西周金文韵文进行统计后发现侯部独用 3 次,与鱼部合用 1 次;鱼部独用 89 次,与侯部合用 1 次。可见侯、鱼当分立。幽部独用 336 次,没有发现一例幽侯合用;侯部共出现 7 次,独用 3 次,也没有发现与幽合用例。幽、侯显然是分立的。^④ 师玉梅先生考察西周金文中鱼、侯、幽三部之间的相谐情况后,认为侯部与幽部和鱼部虽都有互谐,但与各自独谐量相比,互谐只是少数,三部分立属当然。之间的互谐字例说明侯部与鱼、幽两部的主要元音相去不远,段玉裁将侯部置于鱼、幽之间是合适的。她发现侯部与幽、鱼两部交涉的字都是三等字,而西周时期三等字普遍带有-i介音,这个介音不仅使舌尖、舌根等不同部位的声母发音趋近(精组、章组、见组等声母之间的相谐),同样也会使一些主要元音本来就相近的韵母发音更加趋近,这样就可能出现之间互谐的现象。

① 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75~76页。

② 邵荣芬《论古韵鱼侯两部在前汉时期的分合》,《中国语言学报》1983年第1期;《古韵鱼侯两部在后汉时期的演变》,《中国语文》1982年第6期。

③ 李新魁《论侯鱼两部的关系及其发展》,《李新魁音韵学论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④ 罗江文《从金文看上古邻近韵的分立》,《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3期。

鱼与侯、幽两部之间的相谐多数可以如此看待。^①

5. 之幽

史存直先生撰有《古韵“之”“幽”两部之间的交涉》一文，专门讨论周秦时代之幽两部的交涉问题。他认为之幽两部毫无疑问应当分立，至于之幽之间的交涉则属方言现象，即有的方言根本之幽不分或基本不分。^②但史先生没有明确指出什么方言之幽不分。王健庵先生研究《诗经》用韵，认为之幽合韵属西土方言的语音特点。^③刘志成先生以“裘”字在金文中有从又(之部)声和从求(幽部)声两种形体为例，指出之幽交涉为上古方言差异的体现。^④董同龢先生认为之幽合韵是楚方言的特色。^⑤喻遂生先生对董说提出质疑，他考察了《老子》和西周金文的用韵情况后认为董氏提出的“东阳、之幽、真耕、真文合韵是楚方言的特色”不能成立，而是长期而且普遍存在于通语中的语音现象。^⑥师玉梅先生赞同喻说，认为之幽两部分立以及它们之间存在部分相谐现象应是西周雅言状况的反映。^⑦从李玉先生《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对之幽互谐的统计调查来看，之幽相谐 17 例，其中马王堆帛书 2 例，银雀山汉简 3 例，武威汉简 9 例，睡虎地秦

① 师玉梅《西周金文音韵考察》，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年，第 92～94 页。

② 史存直《古韵“之”“幽”两部之间的交涉》，《音韵学研究》第 1 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

③ 王健庵《〈诗经〉用韵的两大方言韵系——上古方言初探》，《中国语文》1992 年第 3 期。

④ 刘志成《西周金文音系的声母》，《语言学问题集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05 页。

⑤ 董同龢《与高本汉商榷“自由押韵”说兼论上古楚方言特色》，《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 本第 4 分册，1939 年。

⑥ 喻遂生《〈老子〉用韵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 年第 1 期；《西周金文韵文和先秦“楚音”》，《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 年第 2 期。

⑦ 师玉梅《西周金文音韵考察》，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年，第 95 页。

简 1 例,江陵、阜阳汉简 2 例。^① 虽然武威汉简中之幽相谐相对多一些,但也很难说之幽两部的相谐为地域特色。

6. 幽侵、宵谈

清代古音学家孔广森有侵宵对转的说法。严可均进而提出幽侵对转、宵谈对转说,严氏的谈部包含了缉、叶二部的字。章太炎先生在前人区分缉、叶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正严说,主张幽部与冬、侵、缉对转,宵部与谈、盍(即叶部)对转。^② 李新魁先生把幽、觉、缉、侵各部归为一类,把宵、药、叶、谈各部归为一类。他认为幽以[-u]为收尾,其作用在唇(带圆唇势),缉以[-p]、侵以[-m]收尾,其作用也在唇,幽部可以说是与唇音收尾韵相对的阴声韵。幽、觉、缉、侵各部主要元音相同,只是韵尾不同。同样,宵药与叶谈的关系也是如此。^③ 施向东先生通过汉藏同源对比再证此说,他主张把幽、宵拟为 əu、au,认为 u 的语音特征已经包括了 wɣ 或 gʷ,这类构拟所要包含的意思,即韵尾同时具有舌根音和双唇音的特征。幽部、宵部是上古与侵缉、谈盍相配的阴声韵部。因为这三类韵的韵尾都有双唇的特征。幽部、宵部同时也是觉部、沃部的阴声韵部,因为它们的韵尾都具有舌根的特征。^④ 王玉堂先生则从词的音义关系的角度论证幽侵对转、宵谈对转、侵宵对转和谈幽对转。^⑤ 冯蒸先生把宵谈对转视为一种音变,即-am>-o。^⑥ 裘锡圭先生以殷墟卜辞、西周金文、战国楚文

① 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② 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6~29、40页。

③ 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341~344页。

④ 施向东《试论上古音幽宵两部与侵缉谈盍四部的通转》,《天津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⑤ 王玉堂《侵宵对转说与词的音义关系研究》,《古汉语研究》1991年第3期。

⑥ 冯蒸《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与古代印度语言中的-am>-o,-u型音变》,《古汉语研究》1993年第3期。

字中的一些文字现象支持了宵谈对转说。^① 赵彤先生也指出了楚简文字谐声材料中侵部与幽、觉两部的对转现象,如上博简《孔子诗论》简16《诗经》篇名“葛覃”的“覃”字写作两声字“𠄎”;上博简《民之父母》第8简“夙”字作“𠄎”;《容成氏》第28简“宿”字作“𠄎”,“𠄎”、“𠄎”,皆从𠄎声,“𠄎”为“算”之初文;江陵天星观一号墓楚简“憂”字有作“𠄎”的。^②

7. 祭

关于祭部是否为独立的韵部,学界争议非常激烈。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祭部与脂部当不当分?二是祭部与月部的分合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最早提出脂祭分立的是戴震。目前学界对脂祭的分立基本上达成共识,由脂祭的分立又确立了脂微的分部。关于祭部独立的意义,李开先生指出:“祭部的独立又意味着脂微独立为一部”、“祭部独立的价值既在于祭部独立本身所形成的阴阳入三分相配,又在于因祭部而引起的脂微独立为一部,在于入声术以下十部分立为术部和月部,脂微部的分立又为脂部与微部的分立,术物的分立又为术与物的分立铺平了道路。戴震祭部独立的价值既在于其自身,又在于因祭部独立而引起的古韵系统内部的相邻相关韵部的局部性质变。”^③史存直先生认为脂祭当合,^④但当代学者多不以为然,刘冠才先生分析了此说的问题所在。^⑤

祭月的分合问题更为复杂。主张祭月合一的学者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祭部在上古是入声,这一派以黄侃、王力两先生为代表。黄、王两家都主张阴阳入三分和古无去声,所以都认为祭月合一;另

① 裘锡圭《从殷墟卜辞的“王占曰”说到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中国语文》2002年第1期。

② 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③ 李开《戴震语文学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④ 史存直《古音“祭”部是独立的韵部吗?》,《汉语音韵学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⑤ 刘冠才《论祭部》,《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2期。

一派以王念孙、江有诰和李方桂先生为代表。李方桂先生分上古韵部为二十二部，第九部为祭部。他指出：“这一部也有人声韵跟阴声韵两类，不过阴声韵都在去声。这很显然表示韵尾与声调的关系。”^①他把祭部中的去声拟为-dh。李方桂先生的祭部等于王力先生等的“月部”、黄侃先生的“曷末部”。主张祭月分立的人，也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祭部是去声，以罗常培、周祖谟为代表。周祖谟先生在他的《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诗经韵字表》、《两汉韵部略说》以及他与罗常培先生合著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中都是主张祭部独立的，并且认为祭部是去声；另一派认为祭部是次入韵，收喉塞音 ʔ 尾，以李新魁先生为代表。李先生把祭部称为“次入韵”，并说“次入韵”实际上也是入声韵。李新魁先生认为祭部在远古时代与月部合一，收-t尾，到了先秦时代祭部从月部中分离出来，变为收喉塞音 ʔ 韵尾，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汉魏时代，到了六朝时期。这些上古的次入声韵字已向阴声韵字发展了，它们丢失了喉塞音 ʔ ，变为去声。但是，它们在某些方言或某种场合还经常保有人声读法，与去声成为又读或异音。^②

我们认为引起“祭月是分还是合”这一争议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对上古有无去声，以及去声的来源等问题的看法不一；二是因为研究方法的不同。李毅夫先生在研究祭月分合问题时发现，在用统计法时，阴入分明；用系联法时，阴入的界限竟然又泯灭了。他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阴入通谐韵段”中的《广韵》阴声字原本是阴入两读字。它们在所谓“通谐韵段”中读为入声，而在阴声韵段中则读为阴声；^③三是对祭月分合的时代没有明确的认识。关于祭月的分合过程，刘冠才先生赞同李新魁、李毅夫两位先生的研究结

①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0页。

② 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331~339页。

③ 李毅夫《上古韵祭月是一个还是两个韵部》，《音韵学研究》第1辑，1984年。

果,即认为祭月在远古时代是合一的,在《诗经》时代,祭部虽有独立的倾向,但与入声韵月部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还不能肯定的说这个时代祭部就已经完全独立了;在《楚辞》用韵里,祭部与月部虽然还有通押的例证,但可以肯定祭部已经从月部中分离出来了。南朝从梁开始,北朝从后魏开始,祭月两部基本上不再合用,而祭部同其他韵合用的渐渐多起来了。这其中可能有地域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应该是时代的因素;①四是忽视方言因素。刘志成先生分别考察了秦晋方言、齐鲁方言、楚方言、中原方言中祭月的分合情况,发现在秦晋方言中祭月的关系密切,祭部字读入声,还有韵尾,应该与月部合并。秦晋方言中的祭月混同,延续很久,直到两汉魏晋仍然如此;而在齐鲁方言中,祭月界限分明,从不混用;楚方言和中原方言中祭、月二部大致可分,大部分祭部字已读去声。②

以上我们厘清了上古韵部分合中的几个问题,从中我们发现引起这些争议的根源就在于以往的古音研究所据的材料是不分时代和地域的。史存直先生曾批评指出:“过去研究古韵的人没有重视古代的方言分歧和语音变化,因而想不到有所谓交叉地带。”③史先生很重视从方言的角度来审定和解释古韵部的分合,但显得过于笼统,还不能真正把他的主张贯彻到具体的研究中去。

(三)声调

上古音中是否有声调?如果有的话,可分为哪几个调类?从清代到现代,在很长时间内,学界都难以取得公认的结论。

古音学开创人明代陈第首先提出《诗》韵不必拘于四声的观点。清初顾炎武有“四声一贯”说。陈说和顾说曾被理解为古无声调,现多认为这是对他们的误解,即陈第和顾炎武是主张古有四声的。关

① 刘冠才《论祭部》,《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刘志成《祭部与上古汉语方言》,《川东学刊》1995年第1期。

③ 史存直《关于古韵“脂、支、歌”三部之间的关系》,《汉语音韵学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于上古声调,还有江永的“古有四声说”、孔广森的“古无人声说”、段玉裁的“古无去声说”、黄侃先生的“古无上去两声说”、王国维先生的“五声说”、陆志韦的“长去短去说”。王力先生也主张古无去声,但与段玉裁不同,段氏认为上古声调只有平上入三声,而王力先生则是主四声说的,他的四声为平声、上声、长入和短入。^①李新魁先生也主张古无去声,但又有所不同。他认为阴声韵在上古时只有平、上两个调类;阳声韵只有平声一类;入声韵则分为两类,一类相当于后代的人声,另一类为次入声,在后代变为去声。^②董同龢^③、史存直^④、邵荣芬^⑤诸位先生均主张上古的声调系统与中古相去不远,也有四个声调,只是在个别字的归类上与中古有所不同。孙玉文先生在王力先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上古汉语有五个声调,阴声韵和阳声韵都有平上去三声,入声韵分为长入、短入两个调。^⑥目前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为:

1. 四声形成的时间

俞敏先生认为四声形成的时间为周初。^⑦大多数学者主张《诗经》时代有四声的除董同龢、史存直、邵荣芬诸先生外,还有周祖

① 王力《汉语语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73页;《古无去声例证》,《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② 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

③ 董同龢《中国语音史》,台北:华冈出版有限公司,1978年,第183页。

④ 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4页。

⑤ 邵荣芬《汉语语音史讲话》,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8页。

⑥ 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先秦联绵词的声调研究》,《语言学论丛》第26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⑦ 俞敏《四声平议》,《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谟^①、谢纪锋^②、张博^③、丁邦新^④等先生。王健庵先生认为《诗经》包含西土和东土两大方言韵系，东西两大方言都有“四声”分别，西土阴声韵去声字归属入声，正是“秦陇去声为入”，而东土不混。^⑤ 赵彤先生则认为在《诗经》时代以前，汉语很可能没有去声，《诗经》时代是去声形成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去声字多是从平上二声字变来的。^⑥ 我们认为周祖谟先生的态度比较客观，他虽然持四声说，但他还是认为上古声调有一个发展过程，去声成为一个调类，发展比较晚。周秦时代不同韵部的调类多寡不同，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阴声韵如之支鱼等部除平声外，先有上声，进一步发展有去声，阳声韵各部，冬、蒸两部没有上去，阳、侵、真三部则有上而无去。他说：“汉语在周秦时代调类有三、或有四，是经过长时期逐渐发展而形成的。更早也许只有长短之分，说不定在远古时代可能有复辅音的韵尾，如-ms, -gs, -ks 之类，后来因复辅音韵尾之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声调。我认为去声可能就是-s 尾来的。”^⑦ 赵诚先生通过研究临沂汉简的通假字后发现：“汉语在某一时期不分四声（比如商代后期），紧接着开始了向平、入二声的发展（这里的入声不是指以-p、-t、-k 收尾），然后逐步产生了上声，最后产生了去声。临沂竹简通假字所反映的声调情况，说明这时候平入的区分即将完成；上声的产生已到了相当阶段但还没有

① 周祖谟《古音有上去二声说》，《文字音韵训诂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② 谢纪锋《从〈说文〉读若看古音四声》，《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③ 张博《先秦有四声新证》，《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④ 丁邦新《汉语声调源于韵尾说之检讨》，《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3页。

⑤ 王健庵《〈诗经〉用韵的两大方言韵系——上古音初探》，《中国语文》1992年第3期。

⑥ 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⑦ 周祖谟《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音韵学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完全分出,去声则好象根本还没有分出来。”^①这与何九盈先生的研究结果大致相同。^②何先生以《睡虎地秦简》、《武威汉简》及《马王堆简牍帛书》中的通假字为主要依据,也得出汉初还没有去声的结论。

2. 声调源于韵尾说及以韵尾为区别特征的声调形成的时间

近些年来,汉藏比较研究表明声调是后起的。郑张尚芳先生认为汉语最初没有声调,只是音节分舒促。但这两种音节都可加上后缀-s、-ʔ,生成-ms、-ns、-ŋs、-ls、-bs、-ds、-gs,及-mʔ、-nʔ、-ŋʔ、-lʔ等尾,这依-s、-ʔ分的两类复尾音节,便是去、上两声的最初起源。^③也就是说上声来自-ʔ尾,去声来自-s尾。四声最初表现为韵尾的对立,当韵尾存在时,伴随的音高特征在辨义上就是无关紧要的羡余部分。后来由于紧喉的作用,伴随产生了一个高升调,是为上声。又由于清擦音尾的作用,伴随产生了一个长降调,是为去声。入声字则因都是塞音尾,伴随一个短调,即所谓“入声直而促”。这些伴随的声调后来成为韵尾的标志,逐步代替了其辨义功能,上升为独立的声调系统。依据-s尾转化的情况来推测,这一系统约于晋时形成,南北朝时才为文人所认知,依调型排序,被分称为平、上、去、入四声。^④但他没有明确指明以-ʔ、-s尾作为区别特征的四声形成于什么时代。潘悟云先生也没有明确的说法。^⑤丁邦新先生认为声调源于韵尾可能有更早的来源,可能在汉藏语的母语中有这种现象,但在《诗经》时代已没有痕迹。^⑥

① 赵诚《临沂汉简的通假字》,《音韵学研究》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

② 何九盈《古无去声补证》,《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年。

③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3页。

④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18页。

⑤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⑥ 丁邦新《汉语声调源于韵尾说之检讨》,《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3页。

3. 以音高作为区别特征的声调出现的时间

在声调源于韵尾说没有提出之前,学者所争论的声调问题就是指中古以音高为区别特征的声调。但“韵尾”说出现以后,就产生新的问题,即以音高为区别特征的声调什么时候替代以韵尾为区别特征的声调?以韵尾为区别特征的声调何时消失?郑张尚芳先生认为以音高为区别特征的声调大约形成于晋代,至少魏时还有的地方保留-s尾,^①而不同意韵尾说或以为韵尾早在《诗经》时代就已消失的学者则多认为以音高为区别特征的四声形成于《诗经》时代。我们认为无论四声是以韵尾为区别特征还是以音高为区别,都意味着四声的形成,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

谢纪锋先生研究《说文》,读若后得出的结论是《说文》时代已有四种声调。^②其后唐作藩先生也对《说文》读若所反映的声调现象进行了探讨,首先他肯定了许慎时代已有平、上、去、入四个调类,但与《切韵》时代相比,去声字还比较少;其次,在东汉,已有一部分原入声字转为或可读为去声,尚有一部分后代去声字仍念入声;再次,当时去声字虽然较少,但不仅已从入声,而且已开始从平声和上声破读出来,有的仍有异读,处于过渡阶段。^③谢、唐二位先生用同样的资料得出同样的结论,再与周祖谟、赵诚、何九盈三位先生的研究成果相比照,可知四声在许慎时代已经形成。杨剑桥先生认为上古汉语的声调有个发展过程,而且具有发展的不平衡性,应该区分谐声时代和《诗经》时代。在谐声时代,汉语的声调只分为平入两类。《诗经》时代已经产生四声,其最后完成大约在东汉末年至魏晋。^④

①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② 谢纪锋《从〈说文〉读若看古音四声》,《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③ 唐作藩《〈说文〉“读若”所反映的声调现象》,《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④ 杨剑桥《上古汉语的声调》,《语文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

二、上古音的分期分域研究

长期以来,音韵学界在使用研究材料上都存在忽视材料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的问题。如以《说文》的谐声、读若研究上古声韵,却无视其中的方音因素和谐声形成的时代层次性;以《诗经》为研究上古韵部的依据,也因为没有区分其中各诗篇来源的地域性而忽略了方音的影响,从而在许多韵部的分合上纷争不断。史存直先生在《古音“祭”部是独立的韵部吗》、《古音“侯”部是独立的韵部吗》、《关于古韵“脂、支、歌”三部之间的关系》、《古音“之、幽”两部之间的交涉》诸文中,都指出了造成这些争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忽视了所据资料的方音因素。研究古韵所依据的两种主要资料:韵文和文字谐声关系,都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但历来的古韵学家大都不能重视这一点,总是希望把古代的韵类划分得整整齐齐,好象整个周秦时代的语音都是统一的,固定的,没有方音的区别,没有时代的变化。^① 虞万里先生强烈呼吁:“研究古音,应该从时空观念出发,既要考虑方音音差,也要考虑历史音变;既要观察由历史音变而形成的新的方音音差,也要观察由方音的融合而造成的历史音变;既要注意模仿变异,同化异化的语音现象,又要注意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迁移给语音所带来的影响。”^②

新起诸家在上古音系的构拟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谐声、通假、经籍异文等材料,而是广泛地使用亲属语言的同源比较、域外对音等资料。他们非常注重音理的科学性,他们特别重视描绘上古各声母和韵母以及声调的来源和历史……凡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顾及了语音演变的时代性。但我们认为他们的研究仍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第一,他们虽然对古音进行了分期,但所构拟的音系仍只有一套,即以一套音系涵盖从原始汉语到汉魏

① 史存直《汉语音韵学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② 虞万里《榆坊斋学术论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5页。

长达两千多年的语音。郑张尚芳先生所拟音系虽然能体现语言的演变层次,但时代性仍不明确;第二,他们试图解释种种谐声现象,剖析其中的音理,但还是没有体现谐声形成在时代上的层次性;第三,对古方言的研究还不够重视,不能区分各个时代不同地域的语音特征,从而影响了字音构拟的精确性。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认为近年来利用时代性、地域性明确的成系统的古文字资料研究上古音,所取得的成果就显得意义特别重大,应该成为今后音韵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以下我们就来谈谈近些年来利用古文字资料进行上古音系的分期研究的情况。

(一)殷商音系研究

1. 赵诚《商代音系初探》^①

声母:

A. 清声和浊声在甲骨文里不分;

B. 甲骨文中本来没有舌擦音,舌擦音是在发展中历史地形成的;

C. 商代同一声母,后世分而为二或三,如舌音分为舌头舌上和周秦古音同;

D. 有些商代同音后世声母各异的情形,很难说明是由同一个声母演变为不同的声母,最简单的办法即早有学者提出过的那样解释为原来是复辅音,后世某一辅音失落才形成了单声母;

E. 商代某些字的音读是多音节的,或者说是两个音节的,有两个辅音两个元音。由于两个元音之间的辅音容易失落,久而久之只保留了一个辅音,也就成了单音节。

韵母:

A. 阴声韵和入声韵不分的现象,在甲骨文里相当普遍;阳声韵和入声韵不分的现象也相当普遍;由此很容易看出商代没有入声。为了区别字义,阴声韵或阳声韵在韵尾部分加以强调,逐步形成入声韵是很自然的。

^① 赵诚《商代音系初探》,《音韵学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B. 甲骨文字还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是阴声韵和阳声韵容易混同,商代的阳声韵很可能是一种鼻化元音,为了区别字义,作某种强调时演化为阴声,作另一种强调时演化为入声,为了强调本来的鼻化音时就演化成了后代典型的阳声。

声调:商代似乎不分四声。

按赵诚先生是最早倡导利用古文字资料探索古音的学者之一,在研究中起了先导的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他在研究方法上仍存在问题,第一,只凭少数几个例子就下结论,这样很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如他根据卜辞中“夙”和“夙”、“白”和“百”、“匕”和“牝”、“子”和“字”等的关系,就得出“清声和浊声在甲骨文里不分”的结论,显然过于草率,缺乏说服力。第二,有的例子还不是甲骨文的,如“禽”在西周金文中才加了声符“今”;“齋”字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蔡侯钟,作“𦉰”,甲骨文里还没有“齋”字。第三,有的例字在释字上本身就有问题,如甲骨文“中”字作“𠄎”“𠄏”“𠄐”,“仲”字作“𠄑”“𠄒”“𠄓”,迥然有别。旧释“𠄑”“𠄒”“𠄓”等形为“中”,以为卜辞“中”假借为“仲”是错误的;又如“遯”虽不知是何字,但其义为“快”则绝无问题。^① 赵先生以为“遯”假借为“侄”,不可据。

2. 管燮初《从甲骨文的谐声字看殷商语言声类》得出的结论是:^②

帮系:帮类(中古帮母) 滂类(滂母) 并类(并母) 明(明母)

端系:端_甲类(端母、知母) 透_甲类(透母、彻母) 定_甲类(定母、澄母) 泥_甲类(泥母) 来类(来母) 以类(中古以1部分)

端_乙类(章母的2部分) 透_乙类(昌母的昌2部分)

定_乙类(船母的船2部分,书母的书2部分) 泥_乙类(日母的日2部分)

精系:精类(精母、庄母) 清类(清母、初母) 从类(从母、崇母)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② 管燮初《从甲骨文的谐声字看殷商语言声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1988年。

心类(心母、生母) 邪_甲类(邪母) 邪_乙类(以母的以 2 部分)

章系:章类(章母的章 1 部分) 昌类(昌母的昌 1 部分)

船类(船母的船 1 部分) 书类(书母的书 1 部分)

禅类(禅母的禅 1 部分) 日类(日母的日 1 部分)

见系:见类(见母) 溪类(溪母) 群类(群母) 疑类(疑母)

晓类(晓母) 匣类(匣母和云母的云 2 部分)

影组:影类(影母) 云类(云母的云 1 部分)

管先生又撰《据甲骨文谐声字探讨殷商韵部》^①一文,其研究的结论是:

第一,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殷商音系韵部和上古韵部基本相同,殷商汉语的韵部也有二十二个韵部:之、蒸、幽、中、宵、侯、东、鱼、阳、佳、耕、歌、祭、元、微、文、脂、真、叶、谈、缉、侵。

第二,每一部主要元音同类,韵尾辅音相同或发音部位相同。一部中包含不同声调不同等呼的字,音值不同;阴声韵、阳声韵分部,阴声韵部包括入声韵。韵部是一种区别语义的音类。

第三,甲骨文谐声关系中音转合韵的占 14%弱,原来有叠韵、对转、旁转、旁对转、通转等小类,唯独缺少旁通转一小类,建立起旁通转这个小类,眉目比较清楚一点。

第四,甲骨文谐声字音转范围虽宽,但有两种构造格式的韵部不转,一是主要元音相隔很远,二是主要元音虽然相近,但韵尾辅音部位不同的阴声或入声韵对阳声韵的。

按管先生据四百多个甲骨文谐声字例研究殷商语言的声韵,并采用概率统计的方法计算相谐几遇数,排除偶然和例外,这在材料和方法上都比较可靠。但他以中古音为参照系,则欠妥,这样得出的结论需要再考虑。

^① 管燮初《据甲骨文谐声字探讨殷商韵部》,纪念王力先生九十寿辰语言学讨论会论文,1990年。

3. 陈振寰《音韵学》^①

陈振寰先生以甲骨文中能确定的 450 个形声字、部分假借字以及早期金文中的形声字、假借字为材料，整理出《甲骨文谐声字韵母关系统计表》和《甲骨文谐声字声母关系统计表》。根据这两个表，陈先生得出了一些结论：

(1) 韵母

A. 被谐字以同部字为主谐字超过 50% 的有幽、觉、冬、侯、屋、东(钟)、宵、药、鱼、铎、阳、之、职、蒸、微、文、緝、侵、锡、耕、脂、歌、月、元、谈等二十五部，50% 以下的只有江、物、支、质、真、盍等六部。这说明甲骨文的谐声系列跟周秦时期文字谐声系列，从韵的角度看，基本上是互相包容的。因此，上古后期韵部的划分情况也大体适合于上古前期。

B. 有些韵部在《诗经》及韵语中界限不很清楚，在甲文谐声系统中却界限分明，极少通谐。如脂与微通谐仅一次(脂为主谐字的 28 个次，微为主谐字的 16 个次)，冬与侵无一例通谐，冬与东通谐一次，幽、宵侯通谐也极少。江、钟通谐的比例稍高(江部字太少)，可认为上古前期江、钟合为一部，江开钟合。

C. 上古前期已经存在阴、阳、入三类韵母，而且阴、入两类差别明显。入声韵尾可能是合一的，即不分[p][t][k]三类；

(2) 声母

据陈振寰先生研究，殷商时代共有 17 个声母：

帮	并(滂)	明	
端(章)	余(透、定、昌、船)	泥(日)	来
精(庄)	从(清、初、崇)	心(生、书)	邪(禅)
见(溪)	群	疑	匣
影		晓	

张玉金先生曾对陈先生的研究做较为客观的评价，他指出：“用

^① 陈振寰《音韵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

列表统计的方法研究商代语音也有困难。列表统计出数字、百分比容易,但是据此下断语难。比如一个韵部内,如果被谐字以同部字为主谐字的超过 50%,这说明什么?如果没有超过 50%,那又说明了什么?由于断语难下,所以陈振寰只能笼统地说上古后期韵部划分的情况大体适合上古前期。他还不能在上古后期韵部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分合,从而得出上古前期的韵部系统。他研究上古前期声母系统,仅根据甲骨文等材料中的谐声字,但由于同谐声未必同声母,所以他得出的 16 个声母也意义不大。”^①按仅凭统计出来的百分比来确定韵部或声类的分合是不可靠的,如陈先生据此得出殷商语音中没有送气音这一点就不可信。

4. 郭锡良《殷商时代音系初探》^②

声母:

喉音:影 晓

牙音:见 溪 群 疑(殷商时代群、匣两母本属一个,周秦时代的匣母是从群母中分化出来的)

舌音:端 透 定 泥(章组还没有从端组中分化出来,喻四本属定母)

齿音:精 清 从 心(庄组还没有从精组分化出来,邪母本属从母)

唇音:帮 滂 并 明

半舌音:来

韵母:见下文《西周金文音系初探》。

声调:殷商时代的声调系统也许同周秦时代是一致的,即分成舒促两大类,每类再分长短,即长平、短平、长入、短入,实际上每个韵部只有两个声调。

^① 张玉金《二十世纪殷代语音研究的回顾暨展望》,《古汉语研究》2001 年第 4 期。

^② 郭锡良《殷商时代音系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8 年第 6 期。

按郭锡良先生撇开甲骨文中的谐声和通假资料,将《甲骨文编》见于《说文》的 941 字摆进周秦语音的框架中去,考察甲骨文的字音分布情况,再根据分布情况得出结论,这在方法上就值得商榷。首先,我们知道,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我们想要知道一个字在甲骨文里读什么音,只能依靠谐声偏旁和通假资料提供研究的线索。郭先生的做法实际上是把甲骨文时代一个字的读音看作与周秦时代读音相同,但这是不符合语音发展的事实的。语音是不断发展演变的,引发音变的可能性也不是单一的;其次,根据这样的分部情况来决定韵部和声类的分合也是不科学的。

5. 何九盈《商代复辅音声母》

何先生以殷商时代为基点,以甲骨文中足以说明复辅音形态特征的资料为本证,再从后世的文献资料、语言资料中寻找有关材料作为旁证,把这两种材料结合起来,对商代复辅音声母进行全面拟测。他为商代音系构拟了 32 个复辅音声母,分为四种类型:

甲、清擦音 s 和其他辅音的结合:sp、sph、sb、sm、st、sth、sd、sn、sr、sl、sk、skh、sg、sng。

乙、带 l/r 的复辅音声母:pl、pr、phr、br、mr、thr、kl、kr、khr、gl、gr。

丙、章组与舌根音相同:klj、khlj、glj。

丁、其他:ʔk、ʔr、mg、ng。

按何先生的研究在材料和方法上都应该没有问题,因此其结论的可信度较高。不过他的构拟是否全面,还值得考虑。甲骨文中应该还有一些资料可用来构拟复辅音,这就有可能构拟出新的复辅音类型来。

6. 董琨《周原甲骨文音系特点初探》^①

声母

^① 董琨《周原甲骨文音系特点初探》,《语言》第 1 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年。

A. 唇音：帮、滂、并三母存在互谐的现象，明母则有与晓母互谐的现象。

B. 舌音：端组与章组（照三）关系密切，常有互通互谐的现象，黄侃将照三（章组）的上古音归于端组，从周原甲骨的材料来看也是可以成立的。舌头音的端组字中，诸母彼此互谐互通的现象较为常见。

C. 齿音：从分布看，精组与庄组只在之部、脂部有个别重叠，其余皆为互补状态。可见齿音组中，作为齿头音的精组与作为正齿音的庄组，关系确实密切。

D. 喉音：从周甲的材料看，见、溪、群、疑、晓、匣诸母字多有相互通谐的现象。从分布情况考察，除少数韵部如之、鱼、阳、物、月、元、质、侵外，喉音组的字也多呈互补状态。

韵母

A. 从总体来说，周甲和殷甲一样，存在着后世韵部阴、阳、入三声混同的现象，阴声韵和入声韵、阳声韵和入声韵、阴声韵和阳声韵都有不少混同的例子。

B. 周原甲骨中冬部和东部在分布上几乎相等，而且涉及的声母也有所重迭，分立似乎不为无据。

C. 在早周阶段，幽、觉、宵、药四部仍以合一为宜。

D. 之、职、脂、微、支、物、质、月、锡诸部在周甲中多呈互补，通用、混用现象不为少见，所以似可合为一部。

声调：早周时代或许存在声调之别，但绝无后世那样严格的四声。

按董先生的研究方法，相对于郭锡良先生的来说已有所改进，即不仅仅看音韵分布，还使用了假借和谐声资料。在研究态度上也较为谨慎，仅就已有的材料说明一些问题，不轻易下断言。

7. 王文耀《殷周文字声类研究》^①

A. 殷周时期没有轻唇音，轻唇音是周秦以后在声韵发展变化过

^① 王文耀《殷周文字声类研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

程中逐渐形成的。

B. 从殷周金文来看，“古无舌上”是可信的。日母是独立的，并不归泥。

C. 影、来、见、匣是独立的声母，见匣关系密切。

D. 牙音无群，群归见；喉音无晓，晓归匣；齿音无邪，邪归喻四；

E. 照系声母在古声系中占据独立地位的只有照、审、禅三母，穿、船两母在两周金文中尚未独立出来。床母主要从上古心母中分化而来。照、审、禅三母在上古未必像切韵系统那样清晰地有卷舌（照三）、非卷舌（照二）的区别，而是混读为[tʃ]（照）、[ʃ]（审）、[ʒ]（禅）。

F. 舌音中有相当部分来自喻母，与喻母字中有相当部分来自舌音一样，两者只是处于一种均等的互相谐声关系，即喻四是独立的，并不归定；喻三在与匣母的交往中始终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喻母是处于零声母和舌头音之间的一个舌面塞擦音[jʃ]。

G. 殷周文字的声类系统包括二十三个声母：

重唇音：帮（非） 滂（敷） 并（奉） 明（微）

舌头音：端（知） 透（彻） 定（澄） 泥（娘）

牙 音：见（群） 溪 疑

齿头音：精 清（穿） 从（床） 心

正齿音：照 审 禅

喉 音：影 匣（晓） 喻（邪）

齿舌音：来（半齿） 日（半舌）

按商代语音，与西周时期语音有相承关系，这一点没有疑义，但两个时代的语音必定有差别，因此为殷周语音构拟同一个音系似有不妥。

8. 陈代兴《殷墟甲骨刻辞音系研究》

陈代兴先生将已识的 900 余个甲骨文字分别置于一个以传统 41 声类为经，以王力所分 30 部为纬的表格中，逐个标出其中古时代的声、韵、等、呼，此外把已经确认的通假字以及有语音关联的关系字在唐宋以至周秦时代的语音概况分别列表说明，然后根据这两个表

考求商代的语音系统。其结论为：

声母：(1)单声母有：帮、并、明、端、定、泥、来、精、从、心、邪、见、群、疑、晓、匣、影；(2)复辅音声母：[kd]、[hd]、[kl]、[hl]、[ɲl]、[pl]、[ml]、[pd]、[ph]、[mh]。

韵母：之、蒸、幽、候、东、鱼、阳、耕、歌、月、元、真、文、缉叶、侵、谈。

声调：没有后世所谓平、上、去、入四个调类。研究上古声调应当把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问题及入声韵问题结合起来，做深入考察。

9. 孔仲温《殷商甲骨谐声字之音韵现象初探——声母部分》

孔仲温先生的研究方法是将选定的 221 个形声字字例及其谐声声符依中古 41 声类及其发音部位列举出来，注上《广韵》或《集韵》的音切，以此为基础，他得出的结论是：(1)清浊有分途的趋势；(2)殷商时期的形声字其与声符间，作同部位的通转是普遍而频繁的；(3)复声母可解释部分通转现象。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殷商语音研究仍处在探索阶段，各家所据资料和研究方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从资料来说，各家所选用的资料之所以不尽相同，就是因为甲骨文中有些字的考释还存在不同看法，有的资料能否用来研究语音也有争议，如喻遂生先生在《纳西东巴字、汉古文字中的“转意字”和殷商古音研究》一文^①中认为古文字中的“转意字”如“毓”与“后”、“帚”与“婦”、“大”与“夫”、“月”与“夕”、“立”与“位”、“郭”与“墉”、“言”与“音”等不能作为研究商代语音的资料，相反，有的学者认为“月”与“夕”、“立”与“位”、“郭”与“墉”、“言”与“音”同源，可以用来构拟复辅音。另外各家都存在不能及时吸收新的甲骨文考释成果的问题。

就研究方法而言，赵诚先生的研究方法在原则上应该可行，但他仅凭少数几个例子就下了结论，容易有以偏概全之嫌；陈震寰先生将谐声资料中的两个韵部或两个声系的谐声比例作为韵部和声系分合

^① 喻遂生《纳西东巴字、汉古文字中的“转意字”和殷商古音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第81~86页。

的标准,存在两个困难,一是标准的确定,二是仅凭谐声资料来研究声类是不够的。孔仲温先生的研究就是仅以两百多个谐声字例为依据,所以他没有构建出殷商声系;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我们想要知道一个字在甲骨文里读什么音,只能依靠谐声偏旁和通假资料提供线索,所以郭锡良先生撇开甲骨文中的谐声和通假资料,其方法似有可商。另外,郭先生的做法实际上是把甲骨文时代一个字的读音看作与周秦时代读音相同,但这不符合语音发展的实际;陈代兴、董琨先生也采用了郭锡良先生的办法,但他们同时还采用了大量的谐声和通假资料,故相对科学,但凭借如此单薄的资料进行音系研究仍感不足,所以董琨先生没有在音系上下结论,只是指出了一些语音特点,这是比较客观科学的态度。王文耀先生的研究方法比较周密,不过他将殷周语音构拟同一个音系,似有不妥。何九盈先生的研究在材料和方法上都无问题,因此其结论的可信度较高。不过他的构拟是否全面,还值得进一步探讨。甲骨文中应该还有一些资料可用来构拟复辅音,这就有可能构拟出新的复辅音类型来。毕群的《甲骨文所见若干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问题蠡测》就是关于利用甲骨文字资料研究复辅音时如何使用谐声字、假借字、汉语同源字、音训、异读等十种材料的讨论。

我们认为要构建商代音系,首先应该对所有甲骨文或商代金文中已经出现的字的读音进行从殷商到中古的纵向考察,再进行量的统计,然后才能下结论。如虞万里考察了甲骨刻辞多字结构以及金文中“多”和“者”(诸)的用例后,认为以殷商语言为主的多字结构之“多”在改朝易姓过程中逐渐为以姬周为主的由方言上升为雅言的“诸”所替代,两千多年前周族语音系统中知、章系的音值可能是舌尖后塞音或舌面中塞音。^①这是对一个字的读音经过纵向的深入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其方法值得提倡。

^① 虞万里《榆枋斋学术论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39~491页。

(二)西周金文音韵研究

随着金文断代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成熟,截至目前,多数铜器已经被确知大致的年代,因为铜器的出土地点大多是明确的,所以金文资料成为研究两周乃至战国时代语音的绝好材料。如师玉梅先生就认为由于西周铜器铭文构字或用字很少有方言,所以可以用来研究西周音系。^①

1. 余迺永《西周金文音系考》

余先生辑录了《金文编》可确知音义者 1894 字,制成《西周金文音韵表》,在表中他为每个字的声母拟了音。从他的研究来看,他并不是从西周金文资料中分析总结出西周金文音系,相反,他是先采用传统音韵学的研究方法拟定一套音系,再用它去套金文。这显然是不科学的。

2. 郭锡良《西周金文音系初探》^②

(1)韵母:

	之	职	蒸
殷商	开口一、三等 合口一、二等合并,三等	开口一、二等合并,三等 合口一、三等	开口一、三等 合口一、三等
西周	开口一、三等 合口一、二、三等	开口一、二、三等 合口一、二、三等	开口一、三等 合口一、二、三等

	幽	觉
殷商	开口一、二等合并,三、四等合并	开口一、二等合并,三等
西周	开口一、二、三、四等	开口一、二、三、四等

^① 师玉梅《以西周铜器铭文研究西周音系的可行性》,《殷都学刊》2003 年第 3 期,第 102~104 页。

^② 郭锡良《西周金文音系初探》,《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年。

	宵	药
殷商	开口一、四等合并,开口二、三等合并	开口一、二等合并,三、四等合并
西周	开口一、四等,开口二、三等合并	开口一、二等,开口三、四等合并

	侯	屋	东
殷商	开口一、三等	开口一等, 开口二、三等可合并	开口一、二等可合 并,开口三等
西周	开口一、三等,合口三等	开口一、二、三等	开口一、二、三等
	鱼	铎	阳
殷商	开口一、四等、开口二、 三等 两两合并,合口二、三等	开口一、四等、开口 二、三等 两两合并,合口一、二 等	开口一、四等、开口 二、三等两两合并, 合口一、四等合并, 合口三等
西周	开口一、二、三、四等 合口一、二、三等	开口一、二、三、四等 合口一、二等	开口一、二、三、四等 合口一、三、四等

	支	锡	耕
殷商	开口一、四等合并,开口 三等	开口一、四等合并,开 口三等;合口一、三等	开口一、四等合并, 三等;合口三等
西周	开口一、三、四等,合口 四等	开口一、三、四等,合 口一、三等	开口一、三、四等 合口一、三、四等

	歌	月	元
殷商	开口一、三等 合口二、三等合并,合口 一等	开口二、三、四等合并, 开口一等;合口二、三 等合并,合口一等	开口一、二等、三、四 等,合口一、二等,三 等、四等两两合并。
西周	开口一、二、三、四等,合 口一、二、三等	开口一、二、三、四等 合口一、二、三等	开口一、二、三、四等 合口一、二、三、四等

	脂	质	真
殷商	开口一、四等合并, 开口三等; 合口四等	开口一、四等合并, 开口三等; 合口三、四等	开口一、四等合并, 开口三等; 合口三、四等
西周	开口一、三、四等; 合口三、四等	开口一、三、四等; 合口三、四等	开口一、三、四等; 合口三、四等

	微	物	文
殷商	开口三等, 合口一等和二等、三等和四等两两合并	开口三、四等合并, 开口一等; 合口三、四等合并, 合口一等	开口一和四等、二和三等两两合并; 合口一、四等合并, 合口三等
西周	开口一、三、四等 合口一、二、三、四等	开口一、三、四等; 合口一、三、四等	开口一、二、三、四等; 合口一、二、三、四等

	緝	侵
殷商	开口一、三等, 合口一、三等	开口一和四等, 二和三等两两合并 合口二、三等合并, 合口一等
西周	开口一、二、三、四等, 合口一、三等	开口一、二、三、四等; 合口一、二、三等
	叶	谈
殷商	开口一等和二等, 三等和四等两两合并	开口一、二等合并, 开口三等
西周	开口一、二、三、四等, 合口三等	开口一、二、三、四等

结论: 西周金文的韵母格局已由殷商音系的两呼各二等(每部最多四个韵母)演变成《诗经》音系的两呼各四等。

(2) 声母

A. 西周时代的端组和章组已经一分为二。

- B. 西周金文精组同庄组仍未分化为两组声母。
 C. 西周金文中群、匣已分化。
 D. 西周金文的定母和以母已分化。
 E. 西周金文中从、邪仍未分化。
 F. 西周金文的声母有 27 个：

喉音	影	晓	匣		
牙音	见	溪	群	疑	
舌音	端	透	定	泥	
舌面音	章	昌	船	书	禅
齿音	精	清	从	心	
唇音	帮	滂	并	明	
半舌	来				
半齿	日				

(3) 声调

西周金文的声调系统应该与《诗经》音系相同。从分布情况看，阴声韵、阳声韵应该有三个声调，入声韵有两个声调。

3. 刘志成《西周金文音系的声母》^①

刘志成先生根据金文中 1220 条谐声资料归纳出西周金文的声类 33 个：

帮	滂	并	明	明晓		
端	透	定	泥	泥晓	以	日
章	昌	船	书	禅		
精	清	从	心	邪		
见	溪	群	疑	疑晓	晓	匣
影						
来	明来	疑来				

^① 刘志成《西周金文音系的声母》，《语言学问题集刊》，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4. 师玉梅《西周金文音韵考察》^①

(1) 声母

唇音:A. 轻唇音还没有从重唇音中分化出来,从西周金文看上古三等字普遍具有一个-j介音,轻唇音的分化应与这个介音有关;B. 唇塞音与唇鼻音有明显的分组趋势;C. 唇音发音在方法上的清/浊、送气/不送气不构成明显的对立;D. 明晓关系密切,可解释为清鼻音,拟为 hm-;E. 西周金文中唇音三等字带有-j介音,后世脱落了介音前的声母而成为以母字;F. 西周金文中出现的唇音与部分舌齿音相谐的情况可以解释为 bj-在 b 的影响下,辅音性的-j介音擦化成 z-,z->z-,而 b-同时逐渐弱化以致失落,z-又进一步塞化为 t-。

舌音:知组和照三组声母归入端组。禅母当为全浊声母,船母字可能有塞音和擦音不同的来源。西周时期应该有独立的作为擦音的书母存在,但上古书母的字肯定不是中古书母的唯一来源,书母字可能有舌头音的来源。书母和以母关系非常密切,可以把书母看作是以母同部位的清音。

泥娘日:“娘日二纽归泥”说符合西周金文的实际。娘日二母出于泥母,二等的娘母带有一个-r介音,三等的娘母则带有介音-rj-,日母带介音-j-。西周金文中泥(娘、日)母字没有与晓母字相谐的情况,不能为 hn-的存在提供证据。

齿音:A. 齿音中精、庄两组关系密切,可以合为一类。分化条件与知组同。B. 精组内部清/浊、送气/不送气在当时不作为明显的区别性特征而存在。C. 西周时期应有独立的心母存在,同时也存在有s-头类复辅音声母,如 st、sn、sq 等;D. 西周时期也应有独立存在的邪母。中古邪母的上古来源除了独立的邪母以外,还有 sdj->zj-,r +j->zj-两个来源。

喉牙音:A. 西周时期的群母应视为独立;B. 牙音中送气与不送气、清与浊之间不构成明显的对立;C. 西周金文的匣母应分为两类,

^① 师玉梅《西周金文音韵考察》,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匣_甲一类作为全浊塞音归入群母,匣_乙应为喉部擦音,云母只有三等字,与匣_乙呈互补分布,可以合并。D. 西周时期有清舌根鼻音的存在,与hm-对应。

来母:A. 西周金文有独立的来母;B. 来母与唇喉牙音相谐的原因可用带r复辅音来解释。因为唇音和喉牙音的发音部位在唇或舌根,很难受r的影响形成翘舌音,所以也不可能象舌尖音那样与r介音融合。在急读影响下,容易脱去r介音或脱去原有的声母,在缓读的影响下也常会分化为两个音节,成为后世来母字的一个来源;C. 西周时期不仅二等字带有r-介音,重组B类、普通三等喉牙音等亦带有r-介音;D. 西周金文中以、来两母字的互谐可看作是两母的交替。

以母:A. 西周金文中应有独立的以母存在,以母为边音l;B. 一部分邪母源于以母;C. 心、以相谐应与s-头复声母有关;D. 以母与见母当有音理上的联系,即grj->jj-;E. 西周金文中的一些以母与定澄母相谐说明部分以母字在某类元音和介音的影响下变为定澄是有可能的;F. 章组字上古带有j-介音,这个介音应是章、以两母相谐的关键;G. 西周金文中以母字可以和唇舌齿牙喉各类音的三等字有相谐现象,这是因为西周时期三等字普遍带有j-介音。带有j-介音的三等字后世的语音分化也是中古以母字的来源之一,Crj-一系的音节如brj-、grj-、mrj-、krj-等都可能脱落前面的辅音变为以母字,或是存在缓读分化的现象,后一音节独立成为以母字。

西周时期的单辅音声母有25个:

唇音:帮 _非	滂 _敷	并 _奉		明 _晓	明 _微
舌音:端 _{知章}	透 _{彻丹}	定 _{得禪船}	书	以 _邪	泥 _{娘日} 来
齿音:精 _庄	清 _初	从 _崇	心 _山	邪 _船	
牙音:见	溪	群 _群		疑 _晓	疑
喉音:影			晓	匣 _云	

(2) 韵母

A. 西周时期阴阳入三分。阴入对转是由急读或缓读造成的。急读可能在收音时产生急促的色彩,没有塞音韵尾的发音可能产生

塞音韵尾；缓读发音延长，塞音韵尾可能消失，则转化为阴声韵。

B. 根据西周金文的谐声、通假以及韵文的考察，可以得出西周金文的韵部系统与以《诗经》为主的先秦韵文材料得出的上古 29 部系统基本一致。差异在于王力将冬、侵合为一部，认为冬部战国以后才分立出来，而师玉梅先生认为西周时期冬、东两部当合，并认为冬、东、阳三部在西周时期都是收-ŋ尾。

C. 侵、蒸两部关系密切，主要元音相近。部分侵部字的韵尾可能有 $m > \eta$ 的变化。

D. 侯部与幽、鱼两部关系密切，而幽、鱼之间相对疏远。说明西周时期侯部的主要元音可能介于幽、鱼两部之间。在三等-j介音的影响下，侯部字与幽、鱼两部字有较多互谐的可能。

E. 之、职两部与幽两部多有相谐，可见西周时期之类与幽类主要元音相近；幽部与侵部、宵部与谈部在西周时期关系也比较密切，主要元音亦相近。李新魁先生提出的幽—缉觉—侵，宵——叶药——谈相配是有可能的。

F. 宵、觉两部关系密切，同时幽、觉之间也有较多的互谐字例，说明幽类和宵类的主要元音亦应相近。

G. 文部与真、元两部都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而真、元两部相对疏远。文部的主要元音应分别与真、元两部相近，可能介于真、元之间。

H. 叶部与月部、物部与缉部分别有较多互谐字例，说明叶、月两部，物、缉两部的主要元音相近。同时部分叶、缉部字的韵尾可能存在 $-p > -t$ 的过程。

I. 西周时期已经存在四声以及四等的分别。不过异调相谐、异等相谐的情况十分常见。

玉英按：受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的影响，现代学者研究两周韵部仍多采用金文韵文和《诗经》韵读。如余迺永先生的《西周金文音系考》，喻遂生先生的《两周金文韵文和先秦“楚音”》，罗江文先生的《两周金文用韵初探》、《两周金文韵例》、《从金文用韵和文字统一性看两周雅言书面语》、《从金文看上古邻近韵的分立》、《谈两周金文

合韵的性质——兼及上古“楚音”》、《〈诗经〉与两周金文韵文押韵方式比较》、《〈诗经〉与两周金文韵部比较》，刘志成先生的《两周金文韵读和诗经韵读之比较》，金颖若先生的《两周金文韵部研究》、《吉金奏雅——从东周列国金文韵文蠡测雅言的存在》、《从两周金文用韵看上古韵部阴入间的关系》等。他们中除了刘志成先生^①以外，多认为两周金文代表的是当时的雅言音系，所以合韵现象不是方言差异，而是音近押韵。在韵部的分合上，罗江文先生主张金文中支、脂、之分立，脂、微分立，鱼、侯分立，幽、侯分立，幽、宵分立，冬与东、侵分立。金颖若先生在支、脂、之分立和脂、微分立这两个问题上与罗先生意见一致。在阴阳入是否三分这个问题上，罗先生和金颖若都认为两周时期阴、阳、入三分的格局已经形成。

然而，正如彭占清先生所指出的：“现代人论甲金文字的押韵有三难：一是甲金文字多为散文，当时又没有韵律的记载，爬罗剔抉，未必即得古人初衷；二是甲金文字的语法和文例，后世多有意见分歧或者两通之处，执一而论，终恐偏失，兼收并蓄，又恐体例不纯；三是甲金文字多有残蚀不全或者不能确识者，倘若发生在可能的韵脚上，整个语例只好存疑不论。”^②金文韵文还有一个缺点是语言程序化严重，重复的韵语多，入韵字较少，而且多集中在一部分韵部。因此，无论是研究韵部还是研究声纽，谐声和通假资料都是必须重视的资料。

因而对于以上诸家的研究，我们认为师玉梅先生的研究最可采信。理由有二：第一，从材料来说，她真正做到了全面利用西周金文中的谐声和通假资料，并采纳了古文字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每一条材料都是经过认真审查的；第二，在音理的解释和论证方面也很周密，

^① 刘志成主张金文韵语中或有方言因素。如从“邦”字的人韵情况来看，在当时的陈、蔡、中山、晋国的方音里，“邦”读阳部。参看刘志成《两周金文韵读和诗经韵读之比较》，《川东学刊》1996年第3期，第75~78、83页。

^② 彭占清《“两周金文押韵方式”志疑》，《古汉语研究》2004年第1期，第28~29页。

能够比较全面地吸收音韵学研究的新成果。

(三) 战国语音的分域研究

1. 楚音

从西周初期楚人立国到汉武帝统治的前期,楚语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上古楚语可以界划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春秋以前时期,包括春秋时期,约公元前 476 年以前;第二个时期,即战国时期,公元前 475 年至公元前 221 年;第三个时期是即秦汉时期,公元前 221 年至汉武帝独尊儒术、改历法、定服色之时(公元前 104 年)。^①传世典籍中战国楚系语言材料有《楚辞》、宋赋、《庄子》、《老子》等,出土文献中楚简特别多,大宗的就有《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包山楚简》、《九店楚简》、《信阳楚简》、《望山楚简》、《仰天湖竹简》,等等。如此宏富的资料,使得楚方言研究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楚方言研究成果却不尽如人意。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林语堂先生就十分重视上古方言的研究,他的《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就是关于楚方言的论述。董同龢先生的《与高本汉商榷“自由押韵”说兼论上古楚方言特色》也是较早论及楚方言的文章,他认为东阳、之幽、鱼侯、真耕合韵是上古楚方言的特色。^②然而,在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楚方言的研究都是空白的。20 世纪 50—60 年代以后,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又开始注意到楚方言的一些特点,如罗常培、周祖谟先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主张东阳、真耕合韵为楚音的特点。^③周祖谟先生又在《汉代竹书和帛

^① 此采用李水海先生的意见。李水海《上古楚语历时考释》,《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8 年第 3 期。

^② 董同龢《与高本汉商榷“自由押韵”说兼论上古楚方言特色》,《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 本第 4 分册,1939 年。

^③ 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年。

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指出真文、东阳通押是楚地方音。^① 虞万里先生指出在战国时期楚地将歌部音读成支部音。^② 刘宝俊先生的《冬部归向的时代和地域特征》认为先秦时期楚方言冬近于东,战国以后东、冬、阳三部互通成为楚方言的一个特色,幽部兼通东、冬、阳三部是上古楚方言的又一特色。^③ 他在《秦汉帛书音系》一文中以马王堆帛书中的通假字和异文为依据,总结出楚方言在声韵调各方面的一些特点。如他认为帛书音系的声母分单辅音声母和复辅音声母,单辅音中禅母是舌尖中浊塞音,与船不分;复辅音有四种类型:与边音-l-构成的复辅音、以s-为前缀构成的复辅音、x-与鼻音构成的复辅音、鼻冠塞音声母。韵母如中古祭、泰、夬、废等去声韵在帛书音系中属入声月部,微部戈韵字转入歌部,侵部东韵字转入蒸部,上古具有圆唇舌根音韵尾的韵部其元音均变为圆唇元音,上古-i-元音的韵部其元音均已裂变,脂与微、质与物、鱼与侯、东与阳均明显分立。声调的特点则表现在帛书音系中阳声韵的平、上、去与人关系密切,与齐方言中阳、入疏远不同。^④ 李玉先生《秦汉简牍帛书音系研究》也指出了楚方言的一些特点,如微部字都转入歌部字,真和文、微和脂、幽和宵常常通假,缉和叶、祭和月两两关系密切,先秦鱼、侯两部在楚方言里可能正趋于合流,等等。^⑤ 臧正一先生研究了尹湾汉简《神乌赋》的用韵特点,并结合杨雄《方言》以及《淮南子》、《释名》、《楚辞》、《老子》等资料,认为鱼侯、之鱼、脂微的通假与合韵是楚方言的

① 周祖谟《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音韵学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② 虞万里《从古方言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榆枋斋学术论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③ 刘宝俊《东部归向的时代和地域特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

④ 刘宝俊《〈秦汉帛书音系〉概述》,《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⑤ 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特点。^① 不过,喻遂生先生《〈老子〉用韵研究》、《西周金文韵文和先秦“楚音”》、罗江文先生的《谈两周金文合韵的性质——兼及上古“楚音”》三文则否定了东阳、真耕、之幽、真文、侯鱼、支歌合韵是楚方言特色的说法,认为它们都是通语的特点。

另外,梅祖麟先生《古代楚方言中“夕(稟)”字的词义和语源》、李裕民先生《楚方言初探》、李水海先生《上古楚语历时考释》、郭必之先生《金文中的楚系方言词》等文章在考证楚方言词的同时也论及了一些楚方言的语音特点。

以上这些学者所论只是楚方言的某些特征,而真正做到较为全面地利用出土文献,并结合传世典籍进行楚方言音系研究的仅见赵彤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总结了楚方言的声、韵、调系统。^② 下面作简单介绍:

1. 韵母

战国楚方言有 30 个韵部,同《诗经》音系相比,战国楚方言的韵部系统发生了如下变化:

(1)除月部以外各部的长入字变为去声,转入相应的阴声韵部。

(2)脂部的一部分字转入了微部,如饥、美、惠。

(3)真部的一部分字转入了文部,如匀、隸、申、津、陈、尘、慎、邻、岷、莘等。

(4)鱼部开始接近侯部。

(5)东部开始接近阳部。

(6)冬部开始接近东部。

按:赵彤先生认为楚方言中冬部独立,支歌、脂微、质物、侯鱼、东阳、真耕、文元、真文都是分立的,也就是说上文提到的楚方言特色如东阳、之幽、侯鱼、真耕、真文、支歌合韵等现象,在赵彤先生看来并不

^① 臧正一《尹湾汉简〈神乌赋〉音韵研究》,《古文字与古文献》试刊号,台北:1999年。

^② 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突出。以支歌为例,据赵彤先生统计,战国楚方言中支部独用 8 韵次,歌部独用 75 次,支、歌合韵 6 韵次。把支部独用与支、歌合韵次数相比较,很容易得出支、歌合韵的结论,但从歌部独用的韵次来看,则不然。虞万里先生的研究就有这个问题,他统计了《楚辞》歌支的用韵情况,歌部独用 32 次,支部无独用例,支歌 3 例、支脂 2 例、歌脂(微)3 例。据此,他认为《楚辞》音系中无歌支之分,并进而得出楚地将歌部音读成支部音的结论。虞先生显然过分强调支部无独用例这一现象,而忽略了歌部独用的次数远远高于支歌合韵的次数这一事实。支部是个窄韵,在《诗经》中人韵的例子就很少,在楚方言中也是如此,所以考察支歌两韵部的关系只考虑支部独用与支歌合韵次数的比例是有失偏颇的。我们认为赵彤先生将楚方言中的支歌分立是有道理的。

2. 声母

(1) 单辅音声母

唇音: p- p' - b- m'- m-

舌尖音: t- t' - d- n'- n- l'- l- r'- r-

舌尖塞擦音: ts- ts' - dz- s-

舌根音: k- k' - g- ŋ'- ŋ- x- ɣ-

喉音: ʔ-

从上面的声母表可以看出赵彤先生是把与明母通谐的晓母拟为清鼻音 m'-, 与疑母谐声的晓母字拟作清鼻音 ŋ'-, 与以母相谐的透母、心母、书母拟为清边音 l'-, 与透、彻、书、心等母谐声的鼻音泥、娘、日母拟为舌尖清鼻音 n'-。在楚方言中匣母与见、溪、群关系密切, 而与云母比较远, 所以他把匣母全部拟作 g-, 把云母拟作 ɣ-。他注意到楚简中有一些唇音跟舌根音谐声的例子, 认为这类谐声系列中的唇音字的声母来自一套圆唇小舌音 q^w、q'^w、G^w、N^w, 在 u 或 o 前变为唇音。这套圆唇小舌音声母存在于早期汉语(指早于《诗经》时代的汉语中)。战国楚方言中这套圆唇小舌音没有变为唇音, 而是变为舌根音。

(2) 复辅音声母

国内研究民族语言的学者一般把复辅音声母分为两类:A. 甲类复辅音,由前置辅音加上基本辅音组成的复辅音;B. 乙类复辅音,由基本辅音加上后置辅音组成的复辅音。赵彤先生认为谐声时代没有甲类复辅音,而乙类复辅音中的后置辅音通常是半元音、流音,它们处在基本辅音和韵母之间,性质相当于介音。也就是说,乙类复辅音也可以不作为复辅音来处理。从谐声情况来看,谐声时代存在着乙类复辅音。他认为楚简中一些端系、章系、精系字与见系字的谐声现象可以反映出 KL-型复辅音的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复辅音声母字在战国楚方言中仍然读复辅音。KL-在战国楚方言中去后置辅音 l 变为 K-,也就是说战国楚方言中已经没有 KL-型复辅音声母存在了。^①

2. 齐语

林语堂先生在《燕齐鲁卫阳声转变考》一文中指出:“燕、赵、齐、鲁‘寒’音转入‘虞’、‘模’,而不入‘歌’。同此,并有他类阳声的转变,大抵‘仙’转入‘支’,‘真’转入‘脂’,‘淳’、‘文’、‘欣’、‘魂’转入‘微’、‘灰’。”^②林先生此说由后人的研究得以进一步证明和阐发。如虞万里先生从山东古史、齐系文献、音理等方面论证了山东古方言中元支、元脂、文脂、真脂的音韵对应关系。^③赵诚先生在《临沂汉简的通假字》一文中也指出了战国秦汉之际齐语的一些特点,如脂与微、支与之尚未完全分开,齐方言中有一部分晓母字读为唇音、晓、匣与见、溪群关系较近等。^④汪启明先生《先秦两汉齐语研究》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对齐语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指出了齐语在声韵调等方面的一

① 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

② 林语堂《燕齐鲁卫阳声转变考》,《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9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③ 虞万里《榆枋斋学术论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④ 赵诚《临沂汉简的通假字》,《音韵学研究》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些特点。用韵的特点有：^①

(1)脂微在齐语中没有区别，支、脂、之三部个别字在齐语中有交替现象，但不如脂微的数量大，所以齐语中支、脂、之三部是分立的。

(2)先秦时期，齐语的真、文、元三部界限划然，从战国时代起，这三部开始相混。到了汉代，一些文部字转入真部，经过一个发展阶段，这两部逐渐合并成为一部。元文相通的例子在汉代也大量出现，汉代齐语中一部分元部字和文部字发音相近。

(3)齐语中耕、真交替现象从《诗经》时代一直延续到汉末，耕、元交替的现象则在汉代以后的异文、声训、通假和读若中都有发现。

(4)质、物、月三部在齐语中有密切关系。从音理上说，物、质部是脂、微部的入声，而齐语中，脂、微为一部；月部同祭部关系密切，也同脂部有关；入声质、物、月与阴声韵的之部有关系。

(5)在齐语区也存在着歌部字与元部字的对转现象。

(6)“齐人言殷声如衣”，即齐地的一种“阴阳对转”现象，不是个别的字，而是相当一部分字的群体现象。它从殷商时代末年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达千年之久。

声母方面的特点，汪先生主要谈了以下几点：

(1)复辅音：齐语中有大量来母与唇音、舌头音、齿音、牙音相通的现象，汪先生认为这说明在先秦两汉齐语中还保留来母复辅音声母。至于来母复辅音中l的位置，他认为可能有两种，即l可前可后。

(2)齐语中存在着见、溪与晓、匣之间的交替现象。

(3)齐语中明晓、疑晓关系密切，汪先生分别称之为 m-h 型声母和 ŋ-h 型声母。

(4)齐语中并定从群与其同部位清声母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情况，有的与不送气清声母有关，有的与送气清声母有关。

^① 汪启明《先秦两汉齐语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

3. 姜允玉《中山王铜器铭文中的音韵现象初探》^①

姜允玉先生以中山王铜器铭文中的同源词、谐声词、通假字和方言词为研究材料,勾勒了中山王国的一些语音特征。声母方面主要有:(1)清浊分途情形明确;(2)轻唇音不分,部分晓母读为唇音;(3)端、知两组当归并为一组声母,“泥、娘、日”不分;(4)章组和端组开始分化、精组和庄组合并的趋势;(5)群母已经是个独立的声母,匣母与见、溪、疑当为舌根塞音;(6)有 st'、n-、dn-、hl-、ml-、st-等类型复辅音。韵母方面主要有:(1)阴声韵和入声韵俨然分立;(2)一部分真部字在战国时期中山国、楚方言中已经转入文部,或者互相语音接近;(3)支、之二部尚未完全分开。或者说支、之两部本应分部,此时已开始合并;(4)战国时期‘鱼侯两部在中山国、楚方言里可能正趋于合流,在战国时的中山国语音中出现 31 个韵部:之、职、蒸,幽、觉、中;宵、药,侯、屋、东;鱼、铎、阳,歌、祭、月、元;支、锡、耕,脂、质、真,微、物、文,缉、侵,叶、谈。声调方面则表现为平、入区分接近完成,这一时期尚无去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由于战国时期“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因此对战国语音的研究首先必须是分域的研究。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除了楚方言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以外,其他地区的方言研究还相当薄弱。如齐语的研究就资料而言,应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除了银雀山汉简外,齐国的铜器铭文、齐玺、齐陶等还可为我们提供一些谐声和通假资料。齐语的先期研究成果也比较多,如林语堂先生的《燕齐鲁卫阳声转变考》、虞万里先生的《山东古方言与古史研究》、汪启明先生的《先秦两汉齐语研究》等,因此,齐语的研究还大有可为。其次,既然是地域方言研究,就应该重视具有方言特色的文字资料。如中山国铜器铭文中既有通用文字,又有很多方言字。要找出方言语音特色,应该以这些方言字为主要素材。姜允玉先生的研究就因为没

^① 姜允玉《中山王铜器铭文中的音韵现象初探》,《古汉语研究》2003 年第 1 期。

有严格区分这一点,所以他所谓的中山国语音特点其实多是通语的特点。又如陈鸿先生《战国形声字异体与战国古音研究》、《从战国文字的谐声看战国语言的阳声韵》,也因为没有顾及形声字异体的地域性差异,所以得出的结论就难以取信于人。

(四)秦汉语音研究

由于秦汉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是一脉相传的,所以当代秦汉语音研究也往往被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虽然这并不符合事实,但鉴于本书只是对秦汉语音研究做个综述,所以只能依从目前的研究现状做比较客观的叙述。

1. 周祖谟《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①

p p' b m pl ml(以下是复声母)

t t' d n d' thl

(tr t'r dr)

t t'r d e

ts ts' dz s zd sl sn

(tsr ts'r dzt sr)

k k' g ng g' x kl xm

?

几点说明:

(1)古无轻唇。

(2)知、彻、澄三母读如端、透、定。

(3)照、船、审古读如舌头音,审母三等字大部分读为舌部塞音,还有一部分读为摩擦音。禅母古音接近定母,床母三等当与禅母为一类。

(4)章太炎《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认为娘、日二母古读为泥。西汉早期还是这样。

^① 周祖谟《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音韵学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5) 邪母在谐声上与喻母、定母关系最为密切。

(6) 喻母古音原先也许是由 sd- 和 sg- 两类复辅音来的。

$$sd \begin{cases} d' \rightarrow j \\ zd' \rightarrow z \end{cases} \quad sg \begin{cases} g' \rightarrow j \\ z \rightarrow z \end{cases} \quad sd \begin{cases} d \rightarrow \epsilon \\ z \rightarrow \epsilon \end{cases}$$

(7) 照二即庄、初、崇、山四母，古音读近精、清、从、心。

(8) 喻三为匣母细音。

(9) 晓母与明母相通的那部分应读为清鼻音 xm-(m-)

(10) 古代有以 l 为第二成分的复辅音，如 kl-、ml-、t'l- 之类。

2. 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①

(1) 声母

唇音：帮 p- 滂 ph- 并 b- 明 m-

舌音：端知章 t- 透(书_甲)彻昌 th- 定(邪_乙)澄(禅)d- 泥日
娘 n- 以 r- 来 l-

舌尖擦音、塞擦音声母有：

精庄 ts- 清初 tsh- 从崇 dz- (心_甲)生 s- 俟(邪_甲)z-

舌根塞音、擦音声母有：

见 k- 溪 kh- 群(匣_甲)g- 影ʔ- 疑 ŋ- 晓 x- 云(匣_乙)ɣ-

几点说明：

A. 书、透两母的交替最频繁。这可能说明书母与清塞音声母有比浊塞音更多的共同之处。中古书母与透母均属清声母，透母具有送气这一区别特征。从音理上看，由送气清塞音变为清擦音是符合音变通则的，送气成分加强，则可变为擦音。因此，中古书母大部分字归入透母可能更为合适，这类书母字称为“书_甲”。中古书母有一部分字的声母在西汉早期是清鼻音、清流音和复辅音形式，这类书母称为“书_乙”。

B. 中古来母、以母在秦汉时期应当是独立的声母。

C. 西汉早期，心母与泥母的通假次数大于其几遇数。运用历史

^① 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比较法、内部拟构法和类型学拟测法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这类现象在现代汉语方言和亲属语言的同源词中是清鼻音声母。故心母与泥母似有音理关系,两部分字同属一类。心母可一分为二,心_甲是精组中的舌尖清擦音声母,心_乙属清鼻音、清流音或复辅音声母。

D. 中古邪母至少有定(以)、精组(邪_甲)及 ST-类型复声母等三个来源。中古邪有小部分字的声母在西汉早期很可能是复辅音形式,这类字与定母、以母、澄母常常通假,与西汉早期的舌尖塞音声母有谐声关系,而且能在现代汉语方言找到它们的分化痕迹,在汉语的亲属语言中还存在声母为 ST-形式的同源词反映形式。这样,中古邪母在西汉早期就一分为三,邪_甲是与心母相对称的一独立的声母,邪_乙归定,邪_丙属 ST-类型复辅音声母。

E. 俟母与心、邪两母的常常通假,说明秦汉时期,中古俟母也是舌尖擦音声母。这一现象似可说明,中古俟母在秦汉时期也是与心母相对应的舌尖浊擦音声母,与邪_甲同属一个声类。但因材料太少,还不能做肯定的说明。

F. 中古影母在秦汉时期分别与舌根擦音声母晓和舌尖塞音声母以相通假,接近常常通假的临界线的现象,这表明中古影母在秦汉时期可能是个介于擦音和塞音之间的喉音声母。

G. 匣母在秦汉时期一分为二,匣_甲归群,当有舌根塞音的特征,匣_乙归云,有舌根擦音的特征。

H. 中古娘、日、泥三母于秦汉时期同属舌尖鼻音声母 n-(泥日娘),合称为泥母。此外,秦汉时期,中古“娘”、“日”、“泥”三母还与“透”、“心”、“晓”等母有 hn-音理上的关系。

I. 西汉早期的清鼻音、清流音声母有 hm-(晓明、心明)、hn-(泥、透、彻、昌、书、审三、心、晓)、hŋ-(疑—晓、书、心、生、匣₂)、hl-(hr-)(来晓、心、生、书、云、匣)。

J. 西汉早期的鼻塞复辅音有 mp-(帮—明)、mph-(滂—明)、mb-(并—明)、ŋk-(疑—见)、ŋkh-(疑—溪)、ŋg-(疑—群);战国中期到西汉早期还存在 Pl-类型复辅音声母:pl-(帮—来)、phl-(滂—来)、bl-

(并一来);西汉中期以后复辅音声母已到了差不多消失的阶段(至少在武威、居延、敦煌等地的方音是这样);战国中期至西汉早期,楚方言区的音系中存在 ml-复辅音声母。(ml-复辅音声母只出现在古楚方言);KL-类复辅音有 kl-、khl-、gl-;ST-类型复辅音声母包括 st-、sth-、sd-、zd-、zt-、zth-等,由舌尖擦音作为第一音素、舌尖塞音作为第二音素组合而成的结构形式;Thl-类型复辅音声母包括 tl-、thl-、dl-等形式。

(2)韵母

A. 在楚方言、秦陇方言和蜀方言中微部字都转入歌部字,而在古齐鲁方言里则未见。

B. 简帛文书中幽、宵常常通假当为方音之异,是楚方言及蜀郡之音的共同特征。

C. 在战国末期就差不多完成了中部从侵部分出来独立为一部的音变过程。中部的韵尾大部分字已发生了-m>-ŋ。中部从侵部分出来而导致的-m>-ŋ音变在秦代和西汉早期就波及了侵部中《广韵》的东韵字,东韵字至迟不晚于西汉中期就差不多完成了-m>-ŋ音变。古韵侵部中《广韵》东韵字到魏晋时代完全并入当时早已是-ŋ尾的中部的现象,三国时代侵部只和《广韵》的侵韵字相押。收-m韵尾的谈部中有一些也发生了-m>-ŋ的音变,即谈部有少数字在西汉时期转入中部。这一现象只出现在马王堆和包山两地,有可能是古楚方言特有的音变。

D. 在楚方言区和武威地区的方言里,缉、叶关系密切。

E. 缉部与物、叶和月部常常通假的原因是因为缉部中的“立、莅、涩、纳”等字的韵尾原系[-p],在发生了-p>-t>-l(>-i或-o)音变后,使“立、纳、涩”等缉部字的韵尾与收[-t]的“位、内”等物部字相同(或同为[-t]尾,或同是[-l]尾)。这一音变是楚方言的特征之一,这一音变发生在西汉早期。

F. 微、脂常常通假是楚方言的特征,这一现象只能说明微、脂两部中的一部分字正趋于合流。

G. 从方言区域上看,上述真、文通假及合韵的地域主要分布在古楚方言及齐鲁方言地区。(罗常培、周祖谟认为微脂、真文在汉代已合流。)

H. 歌部应该独立为一类。

I. 祭、月两部频繁通假,其音理当为祭、月、元这三个韵部同属一类。祭、月两部关系密切,主要反映在楚方言的材料中。

J. 元、真两部通假、合韵的音理可能是秦汉时期真部一些字的主要元音已经由上古的高前元音-e-(或-i-)裂变为-ia-,这样,真部一些字的主要元音与元部一些字的主要元音(-a-)(这些字大多为《广韵》元韵三等字)十分接近。

K. 语音的相似(同为-t韵尾,有共同的音变过程)和质部元音裂变这两个原因,使先秦月、质两部到秦汉时期关系更为密切,以至在楚方言里发生“常常”通假。

L. 秦汉时期,先秦鱼、侯两部在楚方言里可能正趋于合流。在雅言、齐鲁方言、西部方言的语音中尚未开始合流。

(3)声调 至迟不晚于战国中期,汉语语音就形成了“平、上、去、入”各自分立的格局了。

3. 刘宝俊《秦汉帛书音系》^①

刘宝俊先生认为帛书音系是战国秦汉时代楚地的方言音系,它与秦陇、蜀汉、梁益地区的语音较为接近,而与齐鲁地区的语音相距较远。上文我们在介绍楚方言研究情况时,已对刘先生的研究成果做了简要介绍,以下再作详述:

(1)声类

A. 单辅音声母:

p- ph- b- m-

t- th- d- n- r- l-

ts- ths- dz- s-

^① 刘宝俊《〈秦汉帛书音系〉概述》,《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k- kh- g- ng- h- ?-
kw- khw- gw- ngw- hw- ?w-

B、复辅音声母

ml- thl- kl- khl- gl- gwl-
sl- sn- st- sth- sk- skw- sng-
xm- xng
nth- ngk- ngkh- ngg-

几点说明：

A. 中古端、知、章三组塞音声母在帛书音系中仍为一组，尚未分化，可构拟为 t-、th-、d-，它们在介音-r或-rj-前变为中古知组声母，在介音-j-前变为中古章组声母，在其他地方为中古端组声母。中古泥、日、娘三母在帛书音系中也未分化，拟为 n-。

B. 禅母在上古(包括帛书时代)当为舌尖中浊塞音，拟为 d-，与南人船禅不分的特点相符合。

C. 上古以、邪同属一母，拟为舌尖浊流音 r-。

D. 中古精、庄两组声母在帛书材料中浑然不分，可构拟为舌尖前塞擦音和擦音 ts-、ths-、dz-、s-，它们在介音-r或-rj-前变为中古庄组声母，在其他地方为中古精组声母。

E. 帛书音系中存在一套与展唇舌根音和喉音相对立的圆唇舌根音和喉音声母。

F. 中古云、匣两母在帛书音系中是一个音位，可把三等的云母与一、二、四等的匣母填入三等群母的空档中，构拟为 g-，在-j-前变为中古群母，在-i-前变为中古云母。

G. 帛书音系的复辅音声母正处于一个逐渐消失衰亡的过程中。上古时期语音变化的最大特点是复辅音声母的消失。以谐声系统为代表的上古前期极其丰富的复辅音，到上古后期——东汉末年已基本消失。帛书音系中复辅音声母的残余状态，正体现了它所处时代和地域的语音特点。

(2)帛书音系韵部的主要特点表现在：

A. 中古祭、泰、夬、废等去声韵在帛书音系中属入声月部。

B. 微部戈韵字(“火”等)转入歌部,侵部东韵字(“夙”等)转入蒸部。

C. 上古具有圆唇舌根音韵尾的韵部其元音均变为圆唇元音。幽、觉部的上古-ə-元音已受其圆唇舌根音韵尾的影响变为圆唇元音-o-,宵、药部的上古-a-元音亦因同样原因变为圆唇元音-ɔ-。中部也不与-ə-元音韵部接触,而与-u-元音的东部经常相通,说明它的上古-ə-元音也因受圆唇舌根韵尾的影响变为圆唇元音-o-了。

D. 上古-i-元音的韵部其元音均已裂变。

E. 除真、文两部关系密切外,脂与微、质与物、鱼与侯、东与阳均明显分立。

(3) 声调

帛书音系的调类不十分明显,以中古的平、上、去、入四声来观察它们在帛书中的接触,主要有以下特点:

A. 中古的平、上、去、入四声虽然分别不明显,但仍可看出分立之象,其中平、上、入三声独立性较强,去声稍弱。

B. 去声与入声关系密切,平、上、去关系密切,平、上声与入声很少接触。

C. 帛书音系中阳声韵与入声韵关系密切。

4. 赵振兴、陈灿《〈周易〉通行本与帛书本异文声母研究》^①

(1) 轻重唇音还没有分化。

(2) 西汉时期章组、知组和端组同类,均为舌尖塞音声母,知组与端组归并为一组。它们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它们彼此的通转上面,也表现在它们跟牙音的关系上面。

(3) 透、泥二母通假有音理关系,以母在西汉早期为舌尖塞音,与端系诸母通假,属本组相通假,当有音理关系。以母很少与喉音诸母

^① 赵振兴、陈灿《〈周易〉通行本与帛书本异文声母研究》,《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

通假,以母和云母(喻三)在《周易》异文中尚未发现有通假的例子,说明以母在西汉时期与喉音无音理关系,尤其以母与定母均属浊音,都有舌尖塞音成分,具有音理关系;以母与见组声母通假,说明中古属喉音的喻四(即以母)在西汉时期与牙音诸声母有关系。以母和心母有密切的音理关系,上古泥(娘)、日相通外,它们跟来、以等都有过接触,这是因为这四个声纽都是同部位的次浊音的缘故;书母与端、透、定三母通假,这也许说明书母在西汉早期有舌尖塞音成分。书母与定母通假字例较多,可能书母与浊塞音声母有比清塞音声母更多的共同之处。禅母与端、定通假,与透母未见通假的字例,禅母可能归舌尖浊塞音较恰当;来母在西汉早期当是一个独立的音位,西汉早期的楚方言里,有 ml-、kl-复辅音声母,西汉时期存在一个与 l- 相对立的复辅音声母 hl-形式。

(3)精组、庄组同为齿音,精组是齿头音,庄组是正齿音,齿音各声母之间在西汉早期通假,具有音理关系;邪母在西汉早期就可能是复辅音,中古邪母字在西汉早期与定母有音理关系。西汉早期很有可能是 St-类型复辅音声母。

(4)见组与喉音晓组在上古同是舌根音声母。见组除与晓组诸母关系密切外,还与端系诸母通假较多,具有相对的聚合关系,当有音理关系的。

(5)晓母与明母通假,其声母很可能是 hm-复音声母;晓母与唇音诸母皆相通假,这说明舌根清擦音与唇音关系密切,具有相对立的聚合关系;和端系的端、章、来、禅四个声母通假,关系亦较密切;匣母是具有与晓母不同的区别性特征的一个舌根浊擦音声母,与见、溪、疑在西汉早期当有舌根塞音这一共同特征。匣母与唇音明母通假,它们具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声母的聚合关系,这当是有音理理由的;影母与以母通假例较多,当是有音理关系的通假。影母与以母一清一浊,从语音结构的平衡规律来看,清浊是古音声母系统中普遍存在的区别性特征。“以”为喻四,当是从上古定母分化出来的,中古喻母与影母同类。

5. 张洁《张家山汉简通假字所反映的西汉时期声母特点》^①

张洁先生据张家山汉简通假字指出西汉时期语音在声母上的一些特点,如:禅母为塞音,船母是浊塞音,船、禅在上古可能有同一来源;书母除了清塞音一读外,可能还有小部分的复辅音 stj-;有 P. r-、K. r-类型的复辅音,一些章组字读作 krj-;既与喻以相谐,又与舌尖塞音相谐的邪母应拟作 slj-;存在鼻塞类型复辅音 mb-、mp-、mp'-、nd-、nt-、nt'-、ng-、ŋk-、ŋk'-。

6. 谢荣娥《秦汉时期楚方言区文献的语音研究》^②

谢荣娥先生对秦汉时期楚方言区文献表现出来的语音现象做了较为细致的考察,得出以下结论:

声调:秦汉时期楚方言区文献韵语中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长入变为去声,长入与去声的合并在不同韵部内并非同步的。同时,长入与去声的合并亦非突变。从西汉到东汉,长入与去声、短入的关系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表现为长入与短入的关系逐渐疏远,以致不再发生关系,最终变为去声。长入的演变不仅仅反映出声调的变化,长入字由入声韵转入阴声韵,又是韵部的变化。同时,阴声韵和阳声韵均有平、上、去三个声调。

韵部:西汉时期楚方言区文人诗文用韵为 30 部,东汉时期为 28 部。从西汉到东汉,不仅有韵部的变化,还有韵字的变化。韵部关系变化表现在:①西汉时期鱼部不与幽部、宵部相交涉,只是侯部侯韵字与幽部相交涉。东汉时期鱼部、侯部与幽部、宵部均有交涉;②西汉时期脂部与之部不相交涉。东汉时,脂部与之部相交涉;③西汉时期,脂部字与支部字、歌部字均有交涉。东汉时期,则表现为微部与支部的关系更为密切;④西汉时期,宵部与幽部有交涉,主要是幽部

① 张洁《张家山汉简通假字所反映的西汉时期声母特点》,收入张显成主编《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第 2 辑,成都:巴蜀书社,2006 年。

② 谢荣娥《秦汉时期楚方言区文献的语音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年。

萧韵字与宵部字相叶。东汉时期,宵部不仅与幽部萧韵字相交涉,还与幽部豪韵字相叶;⑤西汉时期,东部与冬部关系极为密切,不仅冬部东韵字与东部有交涉,冬部江韵字、冬部冬韵字也与东部有交涉,到东汉,只有冬部东韵字与东部相交涉;⑥真部、文部与耕部、元部合韵用例较多,到东汉时期,这种局面有所改变,真部、文部与耕部关系相对疏远,合韵用例减少;⑦西汉时期,祭部与月部关系较为密切,而东汉时期却有所疏离,合韵用例明显减少。

秦汉楚方言区诗文用韵与东汉长安为中心文人用韵情况相比较,表现出一些共性:①韵字归属方面,古侯部三等字加入鱼部,古脂部部分字归入微部;②韵部之间关系方面,脂部与微部、质部与物部、真部与文部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均呈合并之势;祭部与月部关系较为密切,两部呈分立之势。东汉时期,两个方言区在韵部关系上的差异表现在:①楚方言区鱼侯合韵现象更为突出;②楚方言区蒸部、冬部、东部与侵部关系疏远,没有通押韵次,而秦晋方言区蒸部、冬部、东韵均与侵部相通押,冬部与侵部在东汉秦晋方言区内关系较为密切,语音相近,而在东汉楚方言区内则关系疏远,语音不杂混;③楚方言区职部与缉部绝不通押,而秦晋方言区职、缉二部关系密切;④楚方言区质部与月部无通押用例,而秦晋方言区质、月二部关系较为密切。

作者根据合韵现象,归纳出楚方言的特点:①古侯部一等字与鱼部合流;②东、冬合韵;③歌、支合韵;④幽、宵合韵;⑤脂、微合韵。

声部:①东汉时期,知组有独立发展的趋势,这与秦及西汉时期的状态有所不同;②秦及西汉时期,精组与庄组有合并的痕迹。东汉时期,庄组有了独立发展的趋势;③晓、匣、影、余、云五母在秦汉时期与见组的发音部位相同;④泥、娘、日三母在秦及西汉时期楚方言区文献中发音部位相同,东汉时期三母独立发展趋势较为明显。

7. 张清常《〈释名〉声训所反映的古声母现象》^①

- (1) 轻重唇声母不分。
 (2) 明、晓两母有互为声训的。
 (3) 舌头舌上不分。
 (4) 泥、娘、日不分。
 (5) 照二组、照三组与端组、精组都有关系。

8. 管燮初《从〈说文〉中的谐声字看上古汉语声类》^②

- A. 帮类(>帮母) 滂类(>滂母) 并类(>并母)
 明_甲类(>明母) 明_乙类(>晓母一部分)
- B. 端_甲类(>端、知母) 端_乙类(>章母一部分)
 透_甲类(>透、彻母) 透_乙类(>昌母一部分)
 定_甲类(>定、澄母) 定_乙类(>船母和禅母一部分)
 以_甲类(>以母一部分) 以_乙类(>书母一部分)
 泥_甲类(>泥母) 泥_乙类(>日母一部分) 来类(>来母)
- C. 精类(>精、庄) 清类(>清、初) 从类(>从、崇) 心类(>心、生)
 邪_甲类(>邪、俟母) 邪_乙类(>以母一部分)
- D. 章类(>章母一部分) 昌类(>昌母一部分)
 船类(>船母一部分) 书类(>书母一部分)
 禅类(>禅母一部分) 日类(>日母一部分)
- E. 见类(>见母) 溪母(>溪母) 群类(>群母)
 疑类(>疑母) 晓母(>晓母一部分) 匣类(>匣和云一部分)
- F. 影_甲类(>影母) 影_乙类(>云母一部分)

^① 张清常《〈释名〉声训所反映的古声母现象》，《训诂研究》第1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

^② 管燮初《从〈说文〉中的谐声字看上古汉语声类》，《中国语文》1982年第1期。

9. 杨剑桥《〈说文解字〉读若研究》^①

杨剑桥认为东汉许慎音基本上属于上古音系统,但又表现出向中古音过渡的端倪。《说文》读若是研究这种过渡的重要资料。

(1) 读若所反映的上古韵部演变

A. 《诗经》音的之部尤韵字的一部分,西汉时已转入幽部。除此之外,其他之部尤韵字则自成读若,表现出较大的独立性。

B. 《诗经》音的幽部脂韵字在读若中表现出很大的独立性。

C. 《诗经》音的歌部支韵字在读若中已经转入支部,与支部支韵字合流。除此之外,是歌部支韵字自成读若。

D. 《诗经》音的鱼侯两部在读若中仍然分立,并不合一。鱼侯两部的虞韵字已经开始合流,直到中古,形成《切韵》的虞韵。

E. 《诗经》音的阳部庚韵字亦有相当的独立性。

F. 《诗经》音的鱼部麻韵字也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2) 读若所反映的上古声母

A. 轻重唇音仍然不分。

B. 泥、日相近,而非不分。

C. 精系与庄系不分。

D. 知系和章系有部分相混,知系和端系则大致不混,知、端一开始分化或已经分化。

E. 喻四与定母大致不混。

F. 喻三与匣母不混。

G. 有复辅音 $kl-$ 、 $sx-$ 、 $hm-$ 等存在的可能。

10. 胡先泽《诗经东汉齐音考》^②

(1) 声母

A. 见、影、端、心、穿、来诸母,郑音比较稳定,这些声母,自东汉

^① 杨剑桥《〈说文解字〉读若研究》,《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

^② 胡先泽《诗经东汉齐音考》,《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至隋唐，齐鲁少变，且与后代《广韵》声系及三十六字母大体相同。

B. 见、端、知、帮、精等清声母，郑有读本部之全浊音者。相反，群、匣、定、从、床等浊声字，郑音有读为本部或邻部之清声者。无论是浊音清化，还是清音浊化，它们多是在同一发音部位或相近的发音部位中进行的。

C. 有些轻唇音字，郑读重唇音；有些重唇音字，郑读轻唇音，一方面说明此时齐音仍保留着古无轻唇的现象，一方面也看出轻重唇音已能分立的趋势。

D. 郑音日母与娘母有别，说明此时齐音日母已具有独立的性质。

E. 精组与照二组声母多自通，少互通，界限明确。

F. 喉音匣母与半元音喻母相通，与牙音见母相通。

G. 半元音喻母与舌音齿音相通。

H. 郑氏《诗经》注音，声母可归纳为三十类

牙音 见溪群(疑) 齿头音 精清从心邪

舌音 端透定(泥) 舌齿及正齿音 照穿床审禅

澄 喉音 晓匣影

唇音 帮(滂)并明 半元音 喻

非 半舌音 来 半齿音 日

(2)韵部

A. 支脂、虞侯有别。

B. 萧宵、肴豪相通，尤虞、先登、阳唐相通。

C. 侵、覃诸韵多各自为韵。

D. 入声屋、烛相通，屋部与平声之部相通；铎部与虞部相通；质、职相通。

(3)声调

A. 东汉齐鲁之间，平、上、去、入四声存在，毫无问题，迨及唐宋，四声稳定。

B. 郑音去声与中古平、上、入三声关系密切。

C. 郑音入声较少，《诗经》所见十余次，多数在后代仍读入声，只

有极少数与后代去声有关。

11. 赵克刚《〈经典释文〉郑玄音声母研究》^①

见溪群疑	影晓匣
端透定泥喻来	知彻澄娘
精清从心邪	庄初崇山
照穿床审禅日	
帮滂并明	非敷奉微

12. 祝敏彻《从汉儒声训看上古韵部——兼论阴、阳、入三声分立》^②

(1)“职、觉、药、屋、铎、锡”六个人声韵应该从阴声韵中分立出来。

(2)阴、阳、入三声分立，体现了同类的两个或三个韵部的较为密切的关系。

(3)冬部应从侵部分立出来。

(4)“之、支、脂”各自为部。

(5)“脂、微”各自为部。

(6)古韵应分为三十部，古韵阴、阳、入三声分立是客观存在的。

13. 柯蔚南《东汉音注的声母系统》^③

单辅音声母

唇音 p ph b m

舌尖擦音和塞擦音 ts tsh dz s z

齿音 t th d hn n l r

舌面中音 ts̄ tsh̄ dz̄ s̄(东部方言仅有)

① 赵克刚《〈经典释文〉郑玄音声母系统研究》，《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3期。

② 祝敏彻《从汉儒声训看上古韵部》(上)(下)，《兰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第3期。

③ 柯蔚南著，李玉译《东汉音注的声母系统》，《音韵学研究通讯》1983年第4期。

舌根音 k kh g hng ng

喉音 。 h

复辅音声母(不包括 cr-和 cj-型)

sn-(东汉前期仅有) sgi- sngr-(东汉前期仅有) gl-

几点说明:

(1)唇音:A. 东汉一些唇音声母由上古唇化软腭音发展而来的,其条件是,在上古叶和谈两韵部的韵母之前;B. 上古 hm-在东汉跟 m-接触,又跟舌尖擦音、塞擦音、舌根音、喉音接触,这可能说明东汉许多方言 hm-变为喉擦音 h-,但也可能在另一些方言为唇鼻音。

(2)舌尖擦音、塞擦音:精组和庄组还没有分化。它们不仅源于上古擦音、塞擦音,也源于上古几个复辅音,即 skh->东汉 tsh->tsh-,skh(r)->东汉 tsh(r)->tʃh-,st->东汉 s->s-,sn->东汉 s->s-,skw->东汉-s->-s;中古 s-不仅源于上古 sr-,也源于 sl-,有证据说明东汉还未发生 sl->ʃ-音变,sl-可能在东汉前就发展为 sr-了。

(3)齿音和东部方言的舌面中音:t-组和 tr-组东汉还未分化。在郑众、服虔(中部)和高诱(北部)的方言里,tj-系列还没有从东汉的齿音分化出来,而郑玄则认为他的语言里 tj-组跟东汉齿音组很相似(但不是相同);上古 n-、nj-和 nr-在东汉已合并为 n-;上古 skhr-在东汉变为 thr-;中部和北部方言 s+舌根或唇化舌根型复辅音(有介音-j-)跟齿音接触,而郑玄方言里这些复辅音似乎并于舌面中塞擦音,这说明东汉前上古 ski-/skwj-系列已和 tj-系列合并;hn-和 g-接触说明东汉还有 hn-,而郑玄方言里除有介音-j-外,hn-在东汉与 th-合并;东汉前 sthj-和 skhj-(>ʃ-)已合并;东汉时 sthj-已和舌尖音及东部方言的舌面中音合并,变为 ʃ-了。

(4)舌根音和喉音:唇化和非唇化舌根音、喉音两系列已合一,sgwj-(>魏晋和中古 z-)在东汉仍保持一个舌根音或喉音成分,可构拟为 sgj-;hng-在东汉早期仍是个鼻音上古 hngw-和 hng-在东汉早期并为 hng-。但郑玄的方言里上古 hng-和 hngw-跟东汉 s-合流;东汉后期以前至少在某些方言里 sngr-应变为 nr-,因为它跟东汉 n-交替。

(5)流音:东汉以前上古的 $gl-$ 、 $gwl-$ 还未变为单辅音 $l-$, 而是并为 $gl-$; 上古的 $r-$, 当后面跟着介音 $-j$ 时, 变为魏晋的 $z-$, 在别的地方它变为魏晋的 $z(-)$; 在郑玄的方言里 $rj-$ 已变为 $z-$ 。

笔者所见关于秦汉时期语音研究成果已如上所述(台湾学者李存智的博士学位论文《秦汉简牍帛书之音韵学研究》也是利用出土简帛研究秦汉语音的重要成果。因未能找到此书,故无法做详细的介绍)。虽然各家所据材料各不相同,但在许多问题上所得结论却大体一致。声母如轻重唇音仍然不分,但郑玄音轻唇音已经开始分化;西汉时期端、知两组尚未分化,到东汉开始分化;精、庄两组声母一直到东汉还没有分化,但郑玄音中已分化为两组;一直到东汉还有清鼻音声母,东汉还有复辅音遗存。韵母如阴、阳、入三分,冬部在西汉中期就已完成了 $-m > -ŋ$ 音变,从侵部分离出来;支、脂、之三分,祭、月合一。声调方面,大家一致认为汉代已有四声,不过,尚存争议的问题也不少。声母方面主要有:(1)章组是否归端组?李玉、刘宝俊、杨剑桥等先生主张章并入端,而周祖谟、赵振兴、管燮初、赵克刚、柯蔚南等先生则认为章组独立。值得注意的是柯蔚南先生认为这是东部方言独有的,看来有一定道理;(2)东汉时期已有邪母,但西汉时期有没有呢?周祖谟先生为邪母拟的音为 $zd-$,李玉先生和刘宝俊先生则认为西汉时期还没有邪母。从周先生的行文来看(文中说:“今暂拟邪母为 $zd-$,后来变为 $z-$ ”),也可理解为当时邪母还没有独立;3. 日母是否归泥母?周祖谟、李玉、刘宝俊、赵振兴等先生都认为西汉时期娘、日还归泥。研究东汉的学者中,只有柯蔚南先生认为娘、日还归泥,多数学者则把日母独立出来。韵母方面的分歧主要有(1)鱼、侯是否分立?罗常培、周祖谟两位先生认为鱼、侯在西汉时期就已合流。邵荣芬先生撰文加以反驳,认为鱼部主元音与歌部相近,而侯部主元音与歌部相远,所以前汉时期鱼、侯应该分立。李玉先生认为秦汉时期,先秦鱼、侯两部在楚方言里可能正趋于合流,但在雅言、齐鲁方言、西部方言的语音中尚未开始合流。刘宝俊先生则认为帛书音系(代表楚音)中鱼、侯当分立。杨剑桥先生指出在说文读若中鱼、侯还

是分立的。(2)罗常培、周祖谟两位先生认为微脂、真文在汉代已合流。李玉先生指出微、脂常常通假是楚方言的特征,这一现象只能说明微、脂两部中的一部分字正趋于合流。真文合韵则主要分布在古楚方言及齐鲁方言地区。刘宝俊、祝敏彻两位先生都认为脂、微当分立。

综上所述,利用古文字资料对上古音进行分期分域研究已经取得显著的成绩。尽管在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但却意义重大,这表现在:第一,克服了传统音韵学研究中的弊病,即以一个上古音系统统摄从殷商到魏晋长达一千多年的语音时段的弊端。上古音研究已不再是林语堂所批评的那样“没有精确的时代观念、没有地理观念”,^①而是开始注重语音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第二,语音是动态的,是不断发展演变着的。因此,一个字的读音不可能从远古时代一直到中古仍然不变,这期间有可能发生音变,而且还可能不止一次音变。同时,自古以来雅言和方言都是交叉发展、相互影响的。因此,一个字读音的上古来源有多种可能性。据此,我们的研究应该尽可能地接近上古音的语音实际,探索每一个汉字读音的来龙去脉。第三,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由于汉字从来就不是拼音文字,所以我们要探究上古音系统,就不得不借助古文字资料。因此,我们今天研究上古音的主要依据应该是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而传世典籍中的谐声、通假、经籍异文等材料以及亲属语言的同源对比、域外对音等资料则只能作为佐证。“古韵学的出路在于古文字”,^②利用古文字资料研究上古音,应该成为今后古音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① 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语言学论丛》(第19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② 此为李方桂访问中山大学时所言,参看曾宪通《从“蚩”符之音读再论古韵部东冬的分合》,《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第753页。

第二章

中古精母字来源之古文字学证据

在郑张尚芳先生构拟的上古音系里精组只有心、清、从三个单声母，没有精母和邪母，他认为汉代后期才有精母，精母来自心、从母的塞擦化，源于复辅音 $?s/?z, sl'$ ，而庄母源于 $?sr/?zr, sr'$ 。他认为谐声声符表示词根，s 或 z 词根的塞擦化由前置喉冠音引致（在网上还补充说明此类冠音还有 s-[ss, sz] 来源）。这一结论来自他对汉语与藏语、凯里养蒿、贵阳高坡甲定、紫云绞坨、黄平枫香、布努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研究。而 sl' 、 sr' 的词根是流音 l、r（“酒爰进”等）跟“造井”等来自 sk 一样，另属于前置幽冠音结构。^① 朱声琦先生认为齿音中除了少数在汉初就由别的声纽转入齿音外，多数音变发生在东汉后期至六朝，到六朝，音变完成。^② 管燮初在考察了甲骨文里的谐声字后认为商代精、庄两系尚未分化，精组有精、清、从、心、邪五个声母。^③ 刘志成、师玉梅所拟西周金文音系也是精、清、从、心、邪俱备。^④ 上述诸家中，郑张先生和朱先生的观点一致之处在于他们都

①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70、92~109页。

② 朱声琦《论齿音》，《山东师大学报》1999年第1期。

③ 管燮初《从甲骨文的谐声字看殷商语言声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1988年，第136~153页。

④ 刘志成《两周金文音系的声母》，《语言学问题集刊》第1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5~112页；师玉梅《西周金文音韵考察》，广州：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54页。

认为汉代后期才有精母,而管、刘、师三家的结论则不同。这就引起我们的关注,精母是否自古有之?什么时候开始有精母?精母的来源是什么?语音的发展演变同文字一样也是一个动态的历时的过程,因此一个中古读为精母或庄母的字在上古很可能并非读为精母。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书利用古文字资料对中古出现的精母字(以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①所收字例为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探寻语音演变的踪迹,以期有所发现。

一、材料说明及研究方法

(一)材料说明

由于郑张尚芳先生的观点是汉代后期才有精母字,所以我们用来考证的资料主要采用从甲骨文到《说文》小篆古文字字形资料和出土文献中的通假和谐声资料,同时辅以异文、异读、古今字、异体字等资料。

(二)研究方法

1. 谐声与通假互证

从出土文献的假借资料来看,古人使用假借字表现出以下五个特点:第一,超过90%的假借字是同一谐声偏旁之字的借用;第二,出土文献中出现的假借字有很多比本字更难写,笔画更复杂。^②有的笔画很简单很常用的字,人们不可能不会写,却假借笔画更繁复的字为之,且通常是写成以之为声符的字,如“宝”←“主”(郭店·性命出,“←”前面的是假借字,后面的是本字,以下同)、“视”←“示”(郭店·缁衣)、“攻”←“工”(曾)、“節”←“即”(睡虎地秦简)、“誦”←“甫”(睡虎地秦简)、“臙”←“虎”(曾)、“斂”←“令”(包山)、“智”←“知”(张家山汉简)、“𠄎”←“徹”(周家台30号秦墓简牍)、“摭”←“氏”(周家台30号秦墓简牍),等等,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第三,作为声符的那个字可以假借为以之为谐声偏旁的一系列谐声字。“燥”←“燥”(郭

^① 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② 此蒙刘钊先生提示。

店·老子乙)、“躁”(郭店·老子乙)、“趨”(郭店·老子乙)、“噪”(郭店·性自命出)、“疋”←“疏”(郭店·老子甲)、“疎”(郭店·老子甲)、“胥”(郭店·穷达以时)、“古”←“故”(郭店·尊德义)、“固”(郭店·尊德义)、“楛”(郭店·忠信之道)、“胡”(上博·昭王毁室)、“皮”←“彼”(郭店·緇衣)、“破”(郭店·语丛四)、“跛”(上博·容成氏)、“疲”(上博·鲍叔牙)、“可”←“何”(郭店·老子乙)、“荷”(郭店·老子乙)、“诃”(郭店·老子乙)、“呵”(郭店·老子乙)、“阿”(郭店·老子乙)、“奇”(上博·周易)、“歌”(上博·曹沫之阵)；“齊”←“情”(郭店·性自命出)、“臍”(郭店·性自命出)、“齋”(上博·三德)、“劑”(九店楚简·季子女训)、“佳”←“惟”(郭店·緇衣)、“唯”(上博·恒先)、“谁”(郭店·緇衣)、“维”(上博·孔子诗论)、“雖”(上博·孔子诗论)、“弋”←“试”(郭店·緇衣)、“忒”(郭店·緇衣)、“式”(郭店·緇衣)、“代”(上博·容成氏)、“弑”(上博·苦成家父)，等等(以白于蓝先生《简牍帛书通假字典》为例)；第四，一个形声字假借为用作它的声旁的那个字的例子也非常多，如“改”←“巳”(上博·周易)，“迪”←“由”(郭店·緇衣)，“栖”←“酉”(九店楚简·建除)，“萩”←“秋”(九店楚简·相宅)，“舍”←“余”(郭店·老子甲)，“唯”←“佳”(郭店·緇衣)，“壞”←“裹”(郭店·緇衣)，“浴”←“谷”(郭店·老子甲)，“投”←“殳”(睡虎地秦简)，“诱”←“秀”(睡虎地秦简)，“業”←“世”(银雀山汉简)，“海”、“晦”←“每”(银雀山汉简)，等等；第五，即使是声母的发音部位不同，甚至相差很远，用作声符的那个字也可以假借为以之为谐声偏旁的字。如“薦”←“薦”(上博·昔者君老)、“酉”←“酒”(睡虎地秦简)、“酋”←“鞫”(上博·容成氏)、“谷”←“欲”(郭店·老子甲)、“位”←“莅”(郭店·老子甲)、“失”←“佚”、“洸”(睡虎地秦简)，“合”←“答”(银雀山汉简)、“革”←“勒”(银雀山汉简)、“金”←“险”(银雀山汉简)、“芒”←“荒”(银雀山汉简)、“秀”←“诱”(银雀山汉简)、“与”←“舉”(银雀山汉简)，等等。这些材料可以说明两点：第一，在古人的用字观念里，同谐声的一组字的读音与它的声符的读音本应相同，并且以用作声符的那个字的读音为代表。尽管古文字资料所显示的

谐声、通假关系很复杂,有同部位邻近的,也有不少不同部位的,但我们认为同谐声的一组字必有同样的来源,后世同一谐声偏旁的字之所以不同音,是后世的音变造成的。我们依然可以透过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寻找的上古来源,解释它们语音演变的过程;第二,除了同音通假之外,还有一部分属同部位的邻位通假和同词根的音近通假。同部位的邻位通假很多是由一字异读造成的。这也证明郑张先生的谐声和通假原则是正确的。

我们认为一个中古读为精母的字,如果谐声、通假或异文资料表明它在上古有精母以外的读音,我们就可以认定它的中古精母之读音另有来源,它的读音曾经发生变化,甚至不止一次音变。如“兹”的中古声母为精母,但甲骨文、金文“兹”和“丝”同字,“兹”都假借“丝”为之。而“丝”一直到中古还是心母字,据此,我们可以推定“兹”本来也读心母。战国文字已见“兹”字。在战国时期出土古文字资料里,“兹”常常假借为“慈”,同时“慈”又假借为“滋”。“慈”一直到中古都是从母字,字音没有发生过变化,因此我们可以推定“兹”、“滋”等到战国时期音转为从母,它们的精母读音乃后出。

2. 同源关系互证。汉语语源研究表明,词族系统包含语根→根词→同族词→词群→词族五个自小而大的层次。语根是最初表示概念的语言形式、词族的原始语源。它是词族赖以孳生的根本、蕃衍的源头,是整个词族系统的总语源。根词是从语根直接生发出来的词。同族词又是由根词孳乳而来。词群是词族中属于同一个意义层次的同族词的群体,词族是同出一源的所有同族词的总和。同族词的音义都是由语根逐级分化的。代表语根的音是最早的,根词次之,依此类推,从而构成同源词语音分化的线索。在同族词的语音(声韵)关系中,声母的地位和作用远胜于韵母。声母在词族中起统率作用。^①如“丝、滋、孳、慈、子、字”是一组同源词,有增长或连属义,源自词根

^① 任继昉《汉语语源学》,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40~155、176~182页。

“丝”。丝为蚕吐之物，寓增长、连属之义。因而我们推定这组同源词的语根是 s-，即最早读心母。

二、中古精母字来源之古文学证据

1. 之部

精母 兹滋孳孜/子仔籽(籽)/孳戠哉栽栽(灾)甾(蓄)载戠岱/宰梓(梓)擘/再泐

庄母 甾(蓄)缙缙鞣鞣/滓滓愈(肺)戴






兹孳滋孜(精)——慈(从)——丝(心)


甲骨文、金文“兹”与“丝”同字，“兹”皆假借“丝”为之，作“𠄎”（合 36013）“𠄎”（录伯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西周中期的留鼎铭文“丝”既用如本字，又假借为“兹”，铭曰：“留用丝（兹）金作朕文考伯寡鬻牛”“用端延赎丝（兹）五夫”“乃俾飧以留酒及羊，丝三铎，用致丝（兹）人”“用丝（兹）四夫……”（按：本书所用通假字例除所要谈的字外均采用宽式，直接写出本字。）可知在西周中期“兹”还读心母。

大约在战国时期，“兹”音变为从母，字形也与“丝”分化，作“𠄎”（郭店·缙衣 1）（偶尔还有“丝”用作“兹”的情况，如上博《采风曲目》：“《思之》、《丝（兹）信然》……（5）”这可能是抄手因袭古文的缘故）。楚系文字有字作“𠄎”（郢陵郡鉴）“𠄎”（郭店·老子甲 21）“𠄎”（上博五鬼神之神明 6），《楚系简帛文字编》将此字收录于“兹”字条下，视为“兹”字异体，是对的。“𠄎”字当是楚音中“兹”音转为从母后而造的楚系方言字，即在“丝”上累加声符“才”。

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宽俗忠信（12 壹），和平毋怨（13 壹），悔过毋重（14 壹），兹（慈）下毋陵（15 壹）……”“为人父则兹（慈）（40 贰）……父兹（慈）（46 贰）子孝，政之本也（47 贰）。”“除害兴利（50 贰），兹（慈）爱万姓（51 贰）。”“兹”皆当读为“慈”；郭店楚简《唐虞之道》：“闻舜兹（慈）乎弟□□□□□□（23）为民主也。（24）”“兹”读为“慈”；马王堆帛书“兹”用为“慈”的例子也很多。如马王堆帛书《老

子》乙本《德经》：“我恒有三宝，持而宝之，一（206下）曰兹（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兹（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器长。今（207上）舍兹（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则死矣。夫兹（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207下）建之，如以兹（慈）垣之。（208上）”“兹”皆当读为“慈”；张家山汉简《盖庐》：“不兹（慈）稚弟，不入伦雉者，攻之。（47）”“兹”读为“慈”；武威汉简木牍86甲“兹石”当读为“磁石”，91甲木牍作“慈石”，可知至少在东汉初年“兹”还读从母，其精母读音后出无疑。

“孳”、“滋”的音变过程与“兹”是平行的。殷商和西周金文“孳”字作（孳父辛盃）（叨孳簋）（猷钟），皆从丝声。西周中期的滋盂“滋”字作，所从之当亦为“丝”，故“孳”、“滋”本亦读为心母。到了战国时期，“孳”、“滋”的读音也变成了从母，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下简称“上博简”）《彭祖》：“眊眊余朕孳（兹）未则于天，敢问为人？（3）”又“朕孳（兹）不敏，既得闻道，恐弗能守。（8）”；上博《紂衣》：“故慈以爱之，则民有亲。（13）”郭店本《缁衣》作“孳”；郭店楚简《老子》甲本：“民多利器，而邦慈（滋）昏。人多（30）知天而奇物慈（滋）起。法物慈（滋）彰，盗贼多有。（31）”“滋”皆假借“慈”为之；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德经》中“兹”分别与“慈”、“哉”、“滋”相通假，“哉”又借“才”为之，可知“兹”、“孳”、“滋”皆当读为从母。

《说文》：“孜，汲汲也。从支子声。《周书》：‘孜孜无怠。’”经传皆以“孳孳”为之。如《礼记·表記》：“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孟子·尽心上》：“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吴王光和钟铭曰：“束束和钟，鸣扬条虞。既孜且紫……”崔恒升先生认为“孜”当读为“孳”、“紫”当读为“訾”，“既孳且訾”意谓勤勉不怠也。^①《古文四声韵》“慈”字作，从孜声。如此则“孜”与“孳”、

^① 崔恒升《安徽出土金文订补》，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第209页。

“慈”本同音。

“丝”、“兹”、“滋”、“孳”、“慈”、“磁”是同源词。“丝”为语根，*丝*为蚕吐之物，寓增长、连属义。^① 沈兼士先生在《广韵声系》中也是以“丝”为“兹”、“孳”、“滋”的主谐字，归入心母一类。楚简“𠄎”（兹）既可通“字”（郭店·老子甲简 21），又可通“灾”（上博二·从政简 8），还可通“慈”（上博五·曹沫之陈简 55）。“慈”为心母字，“字”为从母，“兹”、“灾”为精母。如何解释这种谐声现象？郑张先生拟“丝”的上古声母为 *s-*，拟“兹”、“滋”、“孳”、“孜”的声母为 *?s-*，*S* 为词根。“孳”、“滋”等原本读心母 *s-*，到战国时代，浊化为从母 *z-*，汉代以后，由于前冠音 *?-* 的作用，成为不送气清塞擦音 *ts*，可以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广韵》记古国名“龟兹”之“兹”的读音为疾之切，我们知道地名所记录的语音往往是非常古老的，“孳”又读疾置切，凡此亦可证“孳”、“兹”等曾有从母之读音。

子(精)——字(从)——巳(邪)

卜辞中“子”字作“𠄎”，又作“𠄎”。在卜辞十二地支中，“𠄎”用为“巳”，“𠄎”读作“子”；西周晚期的膳夫梁其簋：“百𠄎(子)千孙，𠄎(子子)孙孙用宝享。”“字”用为“子”；大盂鼎：“古天异临子(慈)”，“子”假借为“慈”；𠄎儿钟：“余义𠄎之良臣，而𠄎之字(慈)父。”上博一《絺衣》：“故慈(子)以爱之，则民有亲。(13)”“慈”当读为“子”；曾侯乙墓竹简有简文曰：“司马上子为左驂”(简 151)、“建巨之子为右驂”(简 172)、“大首之子驂为右驂”(简 173)，简文中“子”皆当读为“𠄎”。“字”、“慈”、“𠄎”为从母字。

从上引资料我们知道，“子”、“字”、“慈”、“𠄎”本来同音，而“字”、“慈”、“𠄎”一直到中古还是从母字，由此我们可以推定“子”亦曾有从母之读音，后音转入精母。

^① 殷寄明《汉语同源字词丛考》，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第374～377页。

“字”、“子”、“仔”、“籽”、“籽”与“孳”、“慈”是一组同源词，有相同的词根，因此郑张先生拟“子”、“仔”、“籽”、“籽”的上古声母为 ?sl-，“字”的上古声母为 zl-。郑张先生认为“子”、“字”、“仔”、“籽”、“籽”最早的语根是“巳”。从“包”、“孕”的古文字字形来看，“巳”表示的是未出生的孩子，“字”的本义是生孩子，“子”的本义是出生以后孩子的象形。“巳”的上古声母为 lj-，l-前冠 s-头成 sl-（心母），后变为浊擦音 zl-，其音转为精母当在西汉以后。

“字”、“子”、“仔”、“籽”、“籽”与“孳”、“慈”同源，有相同的词根。郑张尚芳先生拟“巳”的上古声母为 lj-，“丝”的声母为 sl-，“兹”、“滋”、“孳”、“孜”、“子”、“仔”、“籽”、“籽”的声母为 ?sl-，“字”的声母为 zl-，^①认为“孳”、“滋”等原本读心母 sl-，汉代以后，由于前冠音 ?-的作用，成为不送气清塞擦音 ts-。我们认为“丝”（兹）声系和“子”声系最早的读音的确如郑张先生所言，读 ?sl-，但它们中间还发生一次音变，即 ?sl- > ?zl- / ?z- > ts-，否则就无法解释“丝”、“兹”为什么在战国以后不再同用，而是分化为二字，以及“兹”、“滋”、“孳”与“慈”的通假关系，也不能解释“子”、“字”的关系。因为“字”、“慈”一直到中古还是从母字，其音变轨迹为 ?zl- > z- > dz-。

甯甯（精庄）——才（从）

甲骨文“甯”字作“𠄎”（合 667）“𠄎”（合 946），卜辞中多读为“载”。《说文》：“甯，东楚名缶曰甯。”古文字中从才声与从甯无别，如甲骨文“甯”字作“𠄎”，从宀从𠄎才声；又作“𠄎”，从宀𠄎声。按“𠄎”本从才声，故从才从𠄎无别。字又作“𠄎”“𠄎”，从宀甯声。金文“甯”字作“𠄎”“𠄎”，结构同于甲骨文，又作“𠄎”“𠄎”“𠄎”，从食从𠄎西声，所从之“甯”在金文中与“西”混同了。这给了我们一条信息，即“甯”本与“西”同音，为心母字。郑张先生拟“甯”的上古声母为 ?sr-

① 本书所引郑张尚芳先生的拟音均采自郑张尚芳《上古音系·古音字表》，参看郑张尚芳《上古音系》，第 260～579 页。

是正确的。到了战国，“𦰩”音转为从母，如上博简《缁衣》中，“缁”作“𦰩”，从才声。《玉篇》：“缁，黑色也。紂，同缁。”《礼记·檀弓上》：“天子之哭诸侯也，爵弁经，紂衣。”陆德明《经典释文》：“紂，本又作缁。”“缁”字始见于《说文》小篆，当是“𦰩”、“缁”音转为精母后才产生的后起字。音变后“紂”字被淘汰，所以《说文》没有“紂”字。

居延汉简：“其有菑(灾)害者，署顷亩□率□□。”“菑”读为“灾”，“灾”在汉初还不是精母字，“菑”亦然。









戔戔灾菑载𦰩(精)——才(从)



甲骨文“戔”字作“𠄎”（合 28365），从才声。西周中期班簋：“唯八月初吉，𠄎(在)宗周。……唯民亡𠄎(戔)……允𠄎(戔)显。”“才”既借为“在”，又借为“戔”，可见当时“才”、“戔”同音，都读为从母。“才”与“戔”不仅同音，而且同源。《说文》：“才，艸木之初也。”《尚书·武成》：“厥四月戔生明。”传：“戔，始也。”《诗·大雅·文王》：“陈锡戔周，侯文王孙子。”笺：“戔，始。侯，君也。”^①于省吾先生在《诗经新证》中指出：“戔、才、在古通。‘陈锡戔周’应读作‘陈锡在周’。”^②西周晚期的师询簋“才”仍假借为“戔”。中山王罍鼎“𦰩”(兹)既用为“戔”，又借为“在”。好盗壶：“昔者先王𦰩(慈)爱百媚。”“𦰩爱”即“慈爱”。楚简中“才”可用作“在”、“戔”、“灾”、“材”，其中以用为“在”和“戔”的最多。如上博简《民之父母》：“孔子曰：‘善才(戔)，商也。(8)’”《鲁邦大旱》：“公割不𦰩初𦰩肉才(戔)毆。(6)”郭店楚简《穷达以时》：“苟有其世，何难之有才(戔)。(2)”马王堆帛书“戔”多假借“才”为之。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狐皮》：“狐皮卅五戔，狸皮廿五戔(裁)，犬皮十二戔，偕出关。(36)”“戔”皆当读为“裁”，“裁”为从母字。银雀山汉简多用“才”为“戔”，仅一例作“戔”，可知直到汉初



①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00页。

② 于省吾《双剑謄群经新证·双剑謄诸子新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64页。

“戔”仍读与“才”同，读入从母。

甲骨文“灾”作，又从才声作。《说文》古文作，亦从才声。甲骨文“灾”还假借“戔”为之。上博简亦有“灾”，字作（周易 21），可隶作“灾”，从火才声；或作（三德 14）。马王堆帛书《经法·名理》“灾”字作，陈伟武先生认为此字为“灾”之专用字。^① 如此看来，“灾”为火灾之“灾”的专用字，“灾”乃神灾之“灾”的专用字。上博简“灾”还可假借“才”或“恚”或“捰”（兹）为之。如《容成氏》：“当是时也，疠疫不至，妖祥不行，祸才（灾）去之。（16）”《内豊》：“君子孝子，不飮若才（灾），腹中巧变，故父母安。（7）”“才”皆假借为“灾”。《从政》：“而不智则奉捰（灾）害。（8）”“捰”即“兹”，从才声；《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競建内之）》：“知万乘之邦，而贵尹，其为恚（灾）也深矣。（6）”“恚”当读为“灾”。张家山汉简《盖庐》：“凡用兵之谋，必得天时，王名可成，妖孽不来，凤鸟下之，毋有疾戔（灾）。（4）”银雀山汉简“灾”假借“哉”为之，而“哉”又假借“才”为之。绎山碑“灾”字作，从留声。《说文》篆文作，从“戔”声，而“留”、“戔”秦汉时还是从母字。此皆可证“灾”本读从母。

“薰”最早见于殷或西周早期的孺作父庚鼎，作，又作（王作康季鼎），从才声。西周中期的段簋：“王薰（在）毕烝。”“薰”假借为“在”。战国时期魏国的梁十九年鼎借“才”为“薰”。《类篇》“薰”下有“墙来切”可资佐证。

“載”字最早见于春秋早期的□鏞用戈，作，从車戔声，“戔”又从才声。上博简《庄王既成》有字作，可隶作“材”，从車才声。春秋晚期的邾公华钟：“慎为之铭，元器其旧。哉（載）公眉寿。”“載”假借“哉”为之，上文已证“哉”在汉初还读从母，故“載”本亦为从母

^① 陈伟武《简帛兵学文献探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8页。








字。战国晚期的中山王𠔁方壶：“因載所美”，“載”字作“𠔁”，从車才声；中山王𠔁鼎“毕业才(載)祗”，“載”假借“才”为之；平安君鼎“載”则假借“才”为之，作“𠔁”，“才”从才声；梁十九年鼎“載”亦假借“才”为之，作“𠔁”。上博《曹沫之阵》：“其将率尽伤，车辇皆栽(載)，曰将早行。(32)”《广韵》“栽”下收有“昨代切”，读为从母。马王堆帛书《天文云气杂占》：“此书不才(載)其图下者，各已从其等矣。”“才”借为“載”。《古文四声韵》收“載”字古文作“𠔁”(古老子)“𠔁”(华岳碑)“𠔁”(云台碑)，实即“𠔁”字，或从弋，或从戈，或从才。从才声之字方为“𠔁”之本字，从弋、从戈作者皆为讹体。以上例证足以证明“載”的精母读音是由从母音转而来的。

戠(精)——捷(从)

西周早期的吕行壶有字作“𠔁”，即“戠”字，在铭文中读为“捷”；西周中期的寔壶铭曰：“王令遣戠(捷)动反夷。”“戠”亦读为“捷”。“捷”为从母字，则“戠”很可能本亦读为从母。

沈兼士先生的《广韵声系》以“才”为主谐字，下收“𠔁”、“載”、“𠔁”、“戠”、“戠”，可见他也认为这组字本当读从母，其精母之音读乃后出。郑张先生拟这组字的声母为ʔsl-，甲骨文“𠔁”的几种不同形体结构可为这种构拟做出解释。甲骨文“𠔁”作“𠔁”(合38262)“𠔁”(合35421)“𠔁”(合35565)“𠔁”(合22779)“𠔁”(英2562正)“𠔁”(合36899)。这些异构中，“𠔁”从食留声，“𠔁”从食西声，“𠔁”从食吏(事)声，“𠔁”从食戠声，“𠔁”从食𠔁才声。楚简“𠔁”既可通“字”(郭店·老子甲简21)，又可通“兹”(上博五·融师有成氏简6)，也可通“灾”(上博二·从政简8)，还可通“蕙”(上博五·曹沫之陈简55)。这都说明“才”声系和“留”声系的语根是sl-。“留”、“留”、“緇”、“灾”、“戠”、“戠”、“𠔁”、“載”等字的音变轨迹为ʔsl-/ʔsr->ʔzl-/ʔzr->ts-。

宰梓滓(精)——辛(心)

甲骨文“宰”作 (合 1229 反),^①金文作 (师汤父鼎)、 (散盘),从宀从辛会意,疑辛亦声。上博简作 (中弓 1),从宀从辛从刃。三体石经古文“宰”字作,当与战国陶文 (陶汇 3·692)是一字。字当即“臍”字,乃“囟”之或体。《说文》:“囟,头会脑盖也。臍,或从肉、宰。”《广韵》“臍,脑盖”,可证其是。由此看来,“宰”很可能本是心母字。战国前期至汉初,“宰”音变为从母。战国燕玺“右宰”之宰作,借“载”为之,上文已证“载”在战国时代还读从母。马王堆帛书《养生方》:“……浚去其财(滓),以汁渍滷饭……(176)”又《五十二病方》:“……熟□□□饮其汁,汁宰(滓)皆索,食之自恣。(4)”“滓”既借“财”为之,又假“宰”为之,可知“宰”、“滓”与“财”同音,读为从母。武威汉简《仪礼·少牢》甲本“在”假借为“宰”,“在”为从母字。郑张先生拟“宰”的上古声母为 ?s-,“滓”的上古声母为 ?sr-,是正确的。“宰”、“滓”最初为心母字,战国时期音变为从母 ?z-,其精母读音是 z-受了前冠 ?-的作用塞擦化而来的。

中古精纽之部字中,甲骨文或商代金文已出现的有“兹”、“孳”、“子”、“戔”、“哉”、“肅”、“灾”、“宰”、“再”、“甾”、“訊”;西周金文中新增的有“滋”、“秭”;春秋战国文字中新增的有“贄”、“咨”、“戡”、“淄”、“戡”、“戡”、“割”、“圻”、“疳”;仅见于《说文》小篆的有“仔”、“籽”、“孜”、“嗞”、“梓”、“晳”、“湑”、“訊”、“緇”、“籛”、“輜”、“鞞”、“滓”、“龠”等。经我们考察,只有“再”找不到证据能说明它本不读精母。

2. 幽部

精母:遭糟槽媯/蚤/棗/早/酒/湫啾摯/摯

庄母:甦

① 陈伟武先生认为“宰”很可能与“字”本同字,后世因分化之形以附义,音仍相同。“宰”后来从“辛”是由“子”讹变而来。参看陈伟武,《战国秦汉同形字论纲》,《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8页。

遭糟槽糟(精)——曹(从)

甲骨文有字作“𠄎”“𠄏”，陈剑先生指出字当为“遭”之初文，所从之声符“𠄎”为“艸”之初文。^①《说文》“遭”字作“𠄎”。上博三《彭祖》有字作“𠄎”（简7），可隶作“故”，“故”即“造”字，在文中读作“遭”。“故”在上博四《曹沫之陈》中皆用作“曹沫”之“曹”，可见“遭”与“曹”当时同音。中山王𠄎方壶铭曰：“适曹（遭）郾君子脢，不辨大义……”“曹”假借为“遭”。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秦客卿造谓穰侯章》：“舜（203）虽贤，非适遇尧，不王也。汤、武虽贤，不当桀、纣，不王天下。三王者皆贤矣，不曹（遭）时不王。（204）”银雀山汉简《晏子·一三》：“……不用令之罪，柏常騫出，曹（遭）晏子。（2320）”又《论政论兵之类·三七》：“……贤之治天下，治可为诸侯不曹（遭）时危□……（0784）”“曹”皆用为“遭”。“艸”、“曹”皆为从母字，可知一直到汉初，“遭”还读从母。

马王堆帛书《养生方·除中益气》：“以猪膏大如手，令蜂……醇曹（糟）四斗。善治（118）□。”“曹”假借为“糟”。汉初右槽锤“右槽”即“右曹”。

“槽”、“糟”从曹声，最早见于说文。“曹”、“糟”、“遭”、“槽”、“糟”是一组同源词。^②“曹”是语根。东周铜器有字作“𠄎”（四升冶客方壶），黄盛璋先生以为“曹”字异体。《西清古鉴》19.3 著录“丙辰方壶”铭中“王后右酉”，黄先生认为当读为“右曹”。《说文》籀文“槽”字作“𠄎”。陕西咸阳市塔儿坡出土一圆壶，圈足可有“芮府”二字，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遣策亦有“茜”字，黄先生认为此二“茜”皆当读为“槽”。^③ 这些










① 陈剑《释造》，收入《甲骨金文考释论集》，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127~176页。

② 曾昭聪《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述论》，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33~36页。




③ 黄盛璋《试论战国秦汉铭刻中从西诸奇字及其相关问题》，收入《古文字研究》第十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1~242页。

资料证明郑张先生拟“曹”的上古声母为 $z-$ ，“糟”、“槽”等的声母为 $?sl-$ $?zl-$ ，没有问题。这组字的读音也经历了从 $sl-$ （心母）到 $z-$ （从母）再到 $ts-$ （精母）的过程。至少在汉初，这组字还没有读入精母。

蚤（精）—搔（心）

甲骨文“蚤”作（合 4890）（合 21238），从虫从又，会用手搔抓身上有虫或为虫所咬之处。^① 秦汉文字承袭商代文字。马王堆帛书作（秦汉 13·19）。《说文》小篆作或，变从又声。我们认为这是“蚤”字最早当读心母，小篆从又声就是“蚤”从心母变读精母在字形上留下的痕迹。理由是：第一、从甲骨文字形来看，的本字是“搔”，而“搔”正读如心母。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癩者及股痈、鼠腹者，口中指蚤（搔）二七，必瘳。（213）”“蚤”即用为本字“搔”；第二、“蚤”与从“蚤”得声的“搔”、“骚”、“蚤”、“蚤”、“蚤”、“蚤”、“蚤”等是一组同源词，^②一律读心母，不读精母。“骚”字最早见于秦玺，作（秦印·马骚）（秦印·骚）。“蚤”字最早见于晋玺，作（玺汇 3334）。二字所从之“蚤”仍从“又”，不从又声。在玺文中都用为姓氏。我们知道姓氏字保留的语音往往是最古老的。第三，“蚤”、“搔”、“骚”、“蚤”、“蚤”、“蚤”、“蚤”、“蚤”还与“躁”、“燥”同源，而“躁”、“燥”的精母读音也是从心母变来的（详见下文）。

𦰇（早）（精）—造（从）

甲骨文有字作“𦰇”“𦰇”“𦰇”等形，陈剑先生释为“草”，并指出“𦰇”“𦰇”这两种形体见于自组小字类、白宾间类卜辞，“𦰇”“𦰇”这两种字形则只见于典宾类、宾出类，字在卜辞用为表示为时段名的“早”字。表示时间段的“早”字在出组卜辞、花东子卜辞中则假借“又”字

① 裘锡圭《殷墟甲骨文字考释七篇》，《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② 殷寄明《汉语同源字词丛考》，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第428～429页。

为之。^① 郑张先生拟“早”的上古声母为 ?s-，“草”的声母为 sh-，“爪”（义）的声母为 ?sr-，可与陈剑先生的说法相佐证。

西周晚期敔簋：“赐田于敔五十田，于𠄎（早）五十田。”“𠄎”指地名，非“早”，与“早”为同形字。表示“早晚”的“早”字最早见于越王者旨于暘戈，铭曰：“戎□亭候之早（造）”，吴振武先生谓“早”当读为“造”。^② 可知“早”与“造”同音，读为从母。

“棗”字始见于战国文字。战国晚期的宜无戟：“宜无之棗戟。”“棗”用为“造”。春秋早期的邾友父鬲有字作“𠄎”，王辉先生释为“嫫”，读为“曹”。^③ 杞伯敏亡鼎、簋、壶盖有字作“𠄎”“𠄎”“𠄎”，亦为“嫫”字。铭文所称“龜嫫”即“邾曹”。“嫫”（曹）从棗声，可为“棗”读从母之佐证。

中山王𠄎鼎表示早晚之“早”写作“𠄎”。铭曰：“𠄎弃群臣。”“𠄎”从棗声。中山国文字也属晋系文字，故而“𠄎”所从之“棗”当跟宜无戟的“棗”一样读为从母。战国时期三晋兵器韩钟剑“造”字作“𠄎”，^④从“棗”声。楚系文字“早”亦从“棗”声，作“𠄎”（郭店·老子乙1）、“𠄎”（郭店·语丛四12）、“𠄎”（上博四·曹沫之陈32）。睡虎地秦简“早”作“𠄎”，又借“棗”为之。如《日书》甲种：“利棗（早）不利暮。（14正贰）”“棗”读为“早”。郭店《老子》乙“夫唯高，是以棗，是以棗服，是谓□。（1）”文中“棗”，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作“蚤”（简195上）。马王堆帛书及汉简里“蚤”字皆用为“早”。上文我们提到

① 陈剑《释造》，收入《甲骨金文考释论集》，北京：线装书局，2007，第127～176页。

② 吴振武《蔡家岗越王者旨于暘戈新释》，收入《古文字研究》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③ 王辉《古文字通假释例》，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年，第239页。

④ 陈伟武《简帛兵学文献探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8页。

出组卜辞、花东子卜辞中“早”假借“又”字为之，“又”与“蚤”同源。“蚤”最初为心母字，可证“早”、“棗”最初也读为心母。郑张先生拟“早”、“棗”、“蚤”的声母皆为 ?s-，“蚤”的声母为 ?sr-。“早”、“蚤”、“爪”、“棗”音变轨迹为 ?s- > ?z- > ts-。

酒(精)—酉(以)

在甲骨文中，“酒”多假借“酉”为字，“𩚑”一见，辞曰：“戊子卜方贞阜酒在疾不从王古。”(合 9560)于省吾先生考定为“酒”字，^①赵诚先生谓此处“酒”用作动词，为“饮酒”义。^② 还有一形作“𩚑” (合 28231)，辞曰：“在酒孟田受禾。”用为地名。我们认为把《合》9560 中的“𩚑”释为“酒”字，虽然于辞例可通，但毕竟是孤证。《合》28231 的“𩚑”形，虽与后世的“酒”同形，但很可能只是同形字。金文“酒”均假借“酉”为之。“酒”字最早见于睡虎地秦简，字作“𩚑” (日书甲种 23) “𩚑” (日甲 157 背)，但仅见 5 例，多数情况下“酒”仍假借“酉”为之。楚简亦然。如新蔡楚简“酒”皆作“酉”；上博简多假借“酉”，如《容成氏》简：“既为金柅，有为酉(酒)。(45)”“闵于天曰：‘受为亡道，昏者百姓，制约诸侯，绝种侮姓，土玉水酉(酒)，天将诛焉。’(53)”这说明战国时期“酒”还与“酉”同音，读为以母。马王堆竹简和帛书“酒”字作“𩚑” (杂疗方 43) “𩚑” (十问 80) “𩚑” (道策 1·173)，但借“酉”为“酒”的例子也很多。《说文》：“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从水从酉，酉亦声。一曰造也，吉凶所造也。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杜康作秬酒。”“一曰造”乃声训，说明在许慎时代“酒”读从母，还未读为精母。郑张尚芳先生用流音塞化来解决精组与以母、来母的相谐问题，认为汉语里的 sl-、sr- 也可能像藏语那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阜酒才广”》，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18页。

② 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69页。

样出现流音塞化,导致塞擦音产生。因此,他“酒”的上古声母为 ?sl-,l-为词根,带 s 冠音。“酒”的音变轨迹当为 ?sl->sl'->ts-。

搯(精)——酉(从)——酉(以)

《说文》:“搯,聚也。从手酉声。”《说文》以“聚”训“搯”乃声训,“聚”为从母字。《说文》:“酉,绎酒也。从西,水半见于上。”“酉”与“酉”一字分化。金文“尊”或从酉,或从酉,是其确证。上博二《容成氏》:“其德酉(辘)清,而上爱(1)下,而一其志,而寝其兵,而官其材。(2)”“酉”读作“辘”,“辘”是以母字。郭店楚简《老子》丙:“信不足,安有不信。猷乎其贵言也。”“猷”,王弼本作“悠”。《老子》乙:“攸之身,其德乃真。攸之家,其德有余。攸(16)之乡,其德乃长。攸之邦,其德乃丰。(17)”“攸”字,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德经》作“修”,“修”为心母 sl-。郑张先生拟“酒”的上古声母为 ?sl-,“搯”为 skl-,认为它们的来源都与以母有关,看来是有依据的。

湫啾擎瓮(精庄)——秋(清)——龜(见)

湫,《说文》:“隘,下也。一曰有湫水在周地。《春秋传》曰:‘晏子之宅秋隘。’安定朝那有湫泉。从水秋声。”“湫”字见于诅楚文,作“𣶒”,指湫渊。

啾,《说文》:“小儿声也。从口秋声。”“啾”字见于晋玺,作“𣶒” (玺汇 1902),用为人名。《说文》:“擎,束也。从手秋声。《诗》曰:‘百禄是擎。’”《广雅·释诂二》:“擎,小也。”王念孙《广雅疏证》指出:“擎、啾、𣶒并音即由反,义亦同也。”“擎”、“啾”、“𣶒”是一组同源词,都有小义。

瓮,《说文》:“井壁也。从瓦秋声。”

秋,《说文》:“禾谷孰也,从禾爻省声。𣶒,籀文不省。”甲骨文“秋”字作“𣶒”,字即“龜”,象爬行动物,或从火作“𣶒”。战国文字作“𣶒”(玺汇 0824)“𣶒”(玺汇 4430)“𣶒”(玺汇 4447)“𣶒”(侯马 318)“𣶒”(郭店·六德 25)。《广雅·释诂三》卷:“酉,熟也。”王念孙《广雅疏证》指出:“《说文》:‘秋,谷孰也。’秋与酉,亦声近义同。”“秋”、

“酋”是一对同源词。《广雅·释诂四》：“秋，愁也。”以“愁”训“秋”乃声训。“酋”、“愁”皆为从母字。春秋时期以前，古人的观念里一年只有春秋两季，没有夏、冬。秋天禾谷收获之后开始造酒。《诗经·七月》：“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意谓十月获稻以后始酿春酒。“为此春酒”并非春天才开始酿酒。故“秋”、“酋”、“酒”亦同源。因此，我们拟“秋”及秋声之字的上古声母为 skl-。

3. 宵部

精母：纛纛纛纛/澡澡澡澡澡澡/焦蕉焦焦焦焦醮醮醮醮/燹燹醮醮/朴

庄母：攞爪瑤

纛纛攞(精)——巢(心)

甲骨文“西”的形体来源有两个，其中一个形体来源是“囟”，作“𠄎”（合 36975），“囟”为心母字；另一类作“𠄎”（合 7863）“𠄎”（合 5636）“𠄎”（合 6357）“𠄎”（合 17397 正）“𠄎”（合 9744）等形。以往多认为此类形体是“甯”字，谓“西”假借“甯”，但我们认为此类形体不是“甯”，而是“巢”。理由是：第一，甲骨文“甯”字作“𠄎”（合 5499）“𠄎”（合 18），从“甯”的字，如“甯”作“𠄎”（合 20495）“𠄎”（合 20167），与“𠄎”“𠄎”“𠄎”“𠄎”等形迥然有别；第二，甲骨文“澡”字作“𠄎”（合 28095）“𠄎”（屯 667），西周中期的歧贮簋“巢”字作“巢”、班簋作“巢”，春秋时期的虢巢钟“巢”字作“巢”，所从之“𠄎”“𠄎”与假借为“西”字的“𠄎”“𠄎”“𠄎”形无别；第三，从“巢”之字与从“巢”之字常可通，如鄂君启节车节“巢”假“鄣”为之，作“鄣”；上博简《容成氏》：“桀乃逃之南巢氏。（40）”“南巢氏”读为“南巢氏”；又《性情论》“躁”假借“趣”作“趣”（简 35），“趣”当为“趣”之异体；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巢（躁）者，候天电而两手相摩，向电祝之，曰：‘东方之王，西方□□□□主冥冥人星。’（66）”“巢”读为“躁”；阜阳汉简《诗经》“采

藁”即“采藻”；其他如“纛”和“纛”、“藻”和“藻”、“藁”和“藁”、“藻”和“藻”互为异体，等等。以上例证足以说明甲骨文“𠄎”“𠄎”“𠄎”“𠄎”等形为“巢”之本字，其读音与“囟”、“巢”同，读为心母。“巢”之从母读音是从心母音变而来的。

纛，《说文》：“绎茧为丝也，从糸巢声。”《玉篇·糸部》：“纛，杂文也，子老切。”南唐徐铉注“纛”的读音为“稣遭切”，说明“纛”在南唐还是心母字，“纛”的精母读音出现得很晚。“纛”有或体作“纛”、“纛”，所从声符“巢”、“蚤”（搔之本字）均为心母字，可证。

剿，《说文》：“劳也，《春秋传》曰：‘安用剿民’，从力巢。”《说文》以“劳”训“剿”乃声训，说明“剿”在语源上与卜有关。郑张先生拟“剿”的声母为 ?sl-，是正确的。

攆，《说文》：“拘击也，从手巢声。”“攆”本为心母字，南唐徐铉的注音为“子小切”，《广韵》有“落萧切”和“侧交切”两读，郑张先生拟“攆”的读音为 ?sr-，可以很好地解释其间的音变过程。

澡澡藁藁剿燥(精)——巢(心)

西周金文“巢”字作“𠄎”（叔巢父簋）。战国晚期的巢之造戈，“巢”字作“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有“澡”字，作“𠄎”（简3），简文曰：“滄热复相辅也，是以成湿澡（燥）。湿澡（燥）复相辅也，成岁（3）而止。故岁者，湿澡（燥）之所生也。湿澡（燥）者，神明之所生也（4）。”马王堆帛书《合阴阳》：“十已之征：一已而清凉出，再已而臭如燔骨，三已而澡（燥），四已（129）而膏……（130）”“澡”皆用为“燥”。“燥”为心母字，“澡”的声符“巢”亦为心母字；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狂犬啮人者，孰澡（操）湮汲，注杯中少多如再食浆……（57）”“□鼠令自死，煮以水，□布其汁中，傅之，毋以手操（搔）痂。（400）”“澡”读为“操”，而“操”又读为“搔”，可知“澡”、“操”、“搔”同音，皆读为心母。

纛，仰天湖楚简作“𠄎”（简19），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作“𠄎”（简31）。《说文》：“纛，帛如绀色，或曰深绀。从糸巢声，读若

臬。”意谓“燥”读与“臬”同，为心母字。战国简帛资料也可证明这一点。上博(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寡人之不燥(肖)，岂不二子之忧也哉？”“燥”用作“肖”。《苏秦自齐献书于燕王章》文曰：“王信田伐燥去疾之(31)言攻齐，使齐大戒而不信燕。(32)”整理小组指出：“燥去疾，人名，燕臣。《战国策·燕策二》‘燥’字作‘参’，古书从参的字常误从臬。”“参”为心母字。据此，我们可以推定“燥”的精母读音是由心母音转而来的。

秦印有“趣”字作“𨔵”（战国古文字典 79 页）。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趣(燥)胜滄，清胜热。清静可以为天下正。(18)”“趣”，郭店楚简《老子》乙作“臬”(简 15)。《说文》：“趣，疾也。从走臬声。”《类篇》：“趣，则到切。又色到切。”“色到切”说明“趣”有心母一读。

藻，《说文》：“藻，水艸也。从艸，从水，巢声。《诗》曰：‘于以采藻。’藻，藻或从澡。”上博二《容成氏》有字作“𨔵”（简 40），从艸臬声，字可隶作“藻”，在简文中读作“巢”。上博四《柬大王泊旱》有字作“𨔵”（简 15），从竹臬声，可隶作“藻”。在简文中用作“藻”。“藻”、“𨔵”皆为“藻”之异体。阜阳汉简《诗经》“藻”字作“𨔵”，从艸巢声。上博二《容成氏》：“桀乃逃之南藻(巢)氏，汤又从而攻之。”“藻”读为“巢”。“巢”本为心母字，后音转为从母，可知“藻”、“藻”最初当读为心母，汉代音变为从母，其精母读音更为晚出。

从上文的讨论我们知道，“臬”声系和“巢”声系关系非常密切，它们的语音应该同出一源，都来自心母。沈兼士先生《广韵声系》就是以“臬”为主谐字统领“藻”、“躁”、“燥”、“趣”、“燥”、“剽”等字，归入心母一类。郑张先生拟“燥”、“剽”、“燥”的声母为 ?sl-/?sr-，“巢”的声母为 z-，“燥”、“剽”、“藻”、“燥”、“趣”的声母为 ?s-，“澡”的声母为 ?sl-。除了认为“巢”当拟为 ?s-，我们同意郑张先生的拟音。

焦蕉礁礁礁礁礁礁礁礁礁礁(精)——𨔵(从)——小(心)

“焦”字见于战国文字，作“𨔵”（郾侯戟器），从火从隹；或从隹作

“𤇑”（玺汇 3153）；或从𤇑作“𤇑”（上博·鲁邦大旱 4）“𤇑”（《说文》小篆）。《说文》：“𤇑，火所伤也。从火𤇑声。𤇑，或省。”“𤇑”为从母字，“焦”亦当读为从母。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戊午去父母同生，异（54 正三）者焦（𤇑）嫫，居瘵（55 正三）。”“焦”假借为“𤇑”，“𤇑”为从母字。《类篇》：“焦，又慈焦切，夷楚地名。”读为从母的“焦”为春秋时陈国的地名。《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帅师伐陈，讨其贰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顿而还。”杜预注：“焦，今譙县也……二地皆陈邑。”战国古玺“譙”、“鄗”所从之“焦”皆作“𤇑”，累加“小”作声符，“小”为心母字。

今本《诗经》篇名《鹊巢》，武威汉简《燕礼》甲本作“鹊蕉”（简 31）。上博一《孔子诗论》作“譙櫟”，“櫟”所从之“桌”当是“巢”的讹体。故“蕉”读与“巢”同，来自心母。今本《诗经·国风·鸛鸣》“予羽譙譙”，东汉熹平石经《诗经》作“予羽蕉蕉”（汉石经集成 53）。“譙”为从母字。可知“蕉”的读音经由心母到从母再到精母两次音变。

𤇑，《说文》：“啗也，从口焦声。”南唐徐铉注音为“才肖切，又才爵切”，可知在南唐时代“𤇑”还读从母，不读精母。“𤇑”的本义指咀嚼，由咀嚼义引申指声音急促，为了把本义和引伸义区别开来，而音转为精母。

灑，《说文》：“醜酒也。一曰浚也。从网从水焦声。读若《夏书》天用剿绝。”“酒”、“浚”皆为声训。“酒”为以母字，“浚”为心母字。许慎又用“剿”给“灑”注音，故“灑”的上古声母亦当为 ?sl-。

焦，《说文》：“所以然持火也。从火焦声。《周礼》曰：‘以明火热焦也。’”

糶，《说文》：“早取谷也。从米，焦声。一曰小。”“小”乃声训。

醜，《说文》：“面焦枯小也，从面、焦。”《说文》以“醜”为会意字，而用“小”作声训来注音，徐锴不解其意，在《说文解字系传》中改作“焦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醜，字亦作𤇑。”

沈兼士先生《广韵声系》以“𤇑”为主谐字统领“焦”、“蕉”、“焦”、

“噍”、“灑”、“鏹”、“醮”、“漹”诸字,就是认为它们本为从母字。综合分析上引资料,我们认为从焦声诸字的音变轨迹当为 ?s-/?sl->?z->ts-。

杪(精)——小(心)

杪,《说文》:“相高也,从木小声。”南唐徐铉注音为“私兆切”,仍与“小”同音,为心母字,其音转为精母当在宋代。《广韵》:“杪,子了切。”

搔(精)——蚤(“搔”之初文,心)

搔,《说文》:“车盖玉搔。从玉蚤声。”段注:“搔与爪同。”“搔”指的是古代车盖弓端伸出的爪形部分,故“搔”、“爪”同源,皆来自心母。

爪(精)——蚤(“搔”之初文,心)

“爪”为“叉”的今字。“叉”字在出组卜辞、花东子卜辞中可假借为“早”。西周晚期的师克盃“叉”字作“𠂇”。段注:“叉、爪古今字。古作叉,今用爪。礼经假借作蚤。《士丧礼》:‘蚤揃如他日’,《士虞礼》:‘浴沐栲搔揃’,搔或为蚤。《曲礼》:‘大夫士去国不蚤髻’,蚤皆即叉字也。郑注皆云:‘蚤读为爪。读为者,易其字也。不易为叉,而易为爪。于此可见汉人固以爪为手足甲之字矣。’”王力先生谓搔以爪,故“搔”、“爪”同源。^①“搔”为心母字,“爪”本亦为心母字。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万物》:“为荧荧之火以鸟蚤(爪)也。W057”“蚤”用作“爪”。马王堆帛书中“蚤”既通“爪”又通“早”、还通“搔”,亦可证。

4. 侯部

精母:走/奏/擻陬檄讞/邹纒

庄母:鼓鞞廢邸/駘

走(精)——媵(清)

甲骨文“走”字作“𠂇”(合 17230 正),金文作“𠂇”(孟鼎),金文中职官名“走马”就是典籍中的“趣马”。中山王𠂇兆域图“提跂”即

^①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38~239页。

“题凑”，“跬”为“走”之异体。张家山汉简《引书》：“须臾之顷，汗出走理。(32)”“走”当读为“腠”。“趣”、“凑”、“腠”皆为清母字，可知“走”最初很可能也当读为清母，其精母之读音乃后世之音变而来的。

奏(精)——凑(清)





甲骨文“奏”字作“𠄎”(合 26010)“𠄎”(合 6653 正)“𠄎”(合 2072)，姚孝遂先生以为“奏”乃“凑”之本字，本义为会合、聚集。^① 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臂太阴温，循筋上廉，以奏(凑)臑内，出腋内廉，之心。(25)”“奏”(凑)就用为聚集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即有当治者，令史吏主者完封奏(凑)令若丞印，高夫发，即杂治为。(332)”“奏”当读为“凑”。马王堆汉墓竹简“腠”皆假借“奏”为之，如《养生方》：“民何得而奏(腠)理靡曼(8)，鲜白有光(9)。”《十问》：“将欲(37)寿神，必以奏(腠)理息。(38)”张家山汉简《引书》：“人之所以得病者，必于暑湿风寒雨露，奏(腠)理启阖，食饮不和……(99)”“奏理”即“腠理”，“腠”为清母字。银雀山汉简《阴阳时令占候之类·四》：“……不鸣水人之一日趣(奏)夷则天不阴雨。(0890)”“奏”假借“趣”为之，“趣”亦为清母字。以上诸例可证“奏”本当读为清母，其精母之音读当晚出。




鼗(精)——叢(从)

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厥阴脉，系于足大指鼗(叢)毛之上。(58)”“鼗”当读为“叢”，“叢毛”指大趾第一节背部汗毛较多的部位。“叢”为从母字，则“鼗”很可能本亦读为从母。



甲骨文“擻”字作“𠄎”(合 367 正)“𠄎”(合 1165 正)，在卜辞中皆读为“驟”。“驟”为从母字，则“擻”亦当读为从母。《说文》：“擻，夜戒守有所擊。从手取声。”可知到东汉初“擻”已音变为清母字，其精母之读音当在汉代以后才产生。


^① 参看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 1534 条姚孝遂按语，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1479~1480 页。

“祖”字始见于西周金文，西周早期的獬伯鼎“祖”字作，春秋金文作（叔夷钟），战国文字“祖”作（陈逆簋）（中山王鬲壶）。西周中期的生史簋：“用事昏馭（祖）日□。”西周时期“馭”与“盧”同字，读为从母字，可知“祖”也当读入从母。居延新简：“右以祖（粗）脱谷给，岁竞。（22·78）”“粗”为从母字，可知汉代“祖”还读从母。

俎，《说文》：“礼俎也。从半肉在且上。”西周中期金文有“俎”字，作（三年癸壶），望山二号墓楚简“俎”字作（简4）。“俎”在文中皆用作本义，指祭祀或宴会时盛放牲体的礼器。包山楚简：“盥禱一全腊猪、馭（俎）桓。（244）”“馭”读如“俎”，“馭”在包山楚简中又借为“祖”，“祖”为从母字，可证“俎”本亦读入从母。

上博四《曹沫之阵》：“民有宝，曰城，曰固，曰蔽（阻）。（56）”“蔽”即“蘆”字异体，“蘆”为从母字。阜阳汉简《诗经》：“既沮（阻）我直。（35背）”又“□□畜，反以我为雠，既沮（阻）我直。（36）”东汉石经此句作“既诈我□”（汉石经集成11），“诈”为从母字。“沮”用作阻止义时读为从母。《广韵》：“沮，止也。慈吕切。”可知“阻”很可能本当读为从母。敦煌悬泉汉简：“欲且（阻）却阳成士吏，令后归，尚意中甚不安。（244A）”“阻”在东汉末年还读为从母。

组，《说文》：“绶属。其小者以为冕纓。从糸且声。”“组”已见于西周金文，如师袁簋作，虢季氏子组壶作。师袁簋铭曰：“余弗暇组（组）。”“组”当读为“祖”，“祖”为从母字；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窞罗之日，利以说盟诈盟。（17）”“诈”，《日书》甲种作“组”；“诈”、“组”皆当读为“祖”；信阳楚简：“泊且（组）之金（2·10）。”今本《诗经·国风·干旄》“素丝组之”，“组”字敦煌《诗经》残卷作“祖”（伯希和藏2529）。“诈”、“祖”、“且”皆从母字，则“组”、“祖”亦当读从母。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怛”字作（简48），从盧声。“盧”为从

母字，则“阻”很可能最初也是从母字。

菹，《说文》：“茅藉也，从艸租声。《礼》曰：‘封诸侯以土，菹以白茅。’”“藉”为从母铎部字，以“藉”训“菹”乃声训。

苴，《说文》：“履中艸。从艸且声。”大通县上孙家寨 115 号汉墓出土木简：“□□为浮苴(沮)之法。(一九·九七)”“沮”为从母字。

蒞，《说文》：“酢菜也。从艸沮声。”“酢”为从母铎部字，以“酢”训“蒞”亦声训。

琿，《说文》：“琿玉之瑑也。从玉且声”“琿”为从母冬部字。以“琿”训“琿”亦声训。

柵，《说文》：“木闲也。从木且声。”“柵”指木栅、行马和水堰之类的阻拦物。

庑，《说文》：“人相依庑也。从广且声。”

置，《说文》：“兔网也。从网且声。𦉳，或体。𦉴，籀文。”上博一《孔子诗论》：“《兔蒞(置)》其用人则吾取□。”“蒞”当读为“置”。“虞”、“蒞”皆为从母字。

姐，《说文》：“蜀呼母曰姐，淮南谓之社。从女且声。”

《说文》：“且，荐也。从几，足有二横，一其下地也。”林义光认为“且”为“俎”之初文。^①“俎”和“且”在形、音、义上都有联系。甲骨文“虞”从且声作“𠄎”(合 7909)，又从俎声作“𠄎”(合 7011)，可证。上博六《天子建洲》10 号简“且”就读为“俎”。“菹”指古代祭祀时用来衬垫的草席，“苴”指鞋中草垫。因此“俎”、“且”、“菹”、“苴”为一组同源词，都有垫藉义；俎、菹、苴的形体特征是宽而薄，俎是宽而薄的丝带，柵(木栅)也是宽而薄的，可证“俎”、“柵”同出一源；“柵”(木栅是用来阻拦的，故引申有阻止义。“柵”、“蒞”、“沮”、“置”、“沮”、“阻”、“俎”构成另一词群，皆有阻止义。《释名》：“蒞，阻也。生釀之，使阻

① 林义光《文源》卷一，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依写本石印，线装 3 册本，1920 年。

于寒温之间,不得烂也。”“沮”的本义是求神加祸于人,其目的只要阻止对方。《尔雅·释器》:“鸟罟谓之罗,兔罟谓之置。”郭璞注:“置犹遮。”可见“置”有遮挡、阻挡之义。《说文》:“但,拙也。”“祖”、“姐”、“沮(祖)”又另外构成一个词群。《说文》:“祖,始庙也。”“姐”指母亲,含有始义。《说文》:“沮,往也。”“往”即始发。总之,由“且”生发出一个词族。这个词族的语根是什么呢?孙常叙先生曾做过探索。他从与“且”、“姐”密切相关的“宜”字入手。甲骨文“宜”字作“𠄎”(合 318)“𠄎”(合 395)“𠄎”(合 655)。孙先生认为“宜”、“姐”一字分化。虽然这个观点现在看起来未必正确,但“宜”与“姐”在形、音、义上密切相关,是无疑的。孙先生认为“姐”、“宜”的语根是 sqa,即在砧板上切肉的声音,又是拉锯的声音。^①“𠄎”、“𠄎”、“𠄎”都是以锯齿形特点而得名。陆宗达先生曾指出“‘且’(姐)与‘爿’(床)、“藉”、“席”、“苴”、“菹”、“蔣”(即《说文》的“藉”)、“烏”、“不借”等词有同源关系”、“在这种义列中,姐(且)是语根。”^②由“祖”的语源“始”来看,“且”词族的语根当与卜有关。上博简“疋”读作“胥”(《容成氏》简 1),读作“疏”(《用曰》简 3),可证“疋”仍为心母字。“疋”还读作“起”或“睢”,如上博三《周易·夬》:“九四:臀无肤,其行越疋(起)。无羊悔亡,闻(38)言不终。(39)”“疋”当读为“起”。今本诗经篇名《关雎》,上博一《孔子诗论》作“关疋”。上博四《昭王毁室》:“昭王为室于死泯之泮……(1)”“泯”当读为“沮”。《甚六钟》:“中鸣姪好”之“姪”,何琳仪先生认为当读为“且”。^③因此,我们认为这组字的最初读音为 sgl-。

𠄎 𠄎 𠄎 𠄎 (精庄)——盧(从)

① 孙常叙《以齿音和牙音疑母构成复辅音初步探索》,收录于《孙常叙古文字学论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79~415页。

② 陆宗达《“且”和它的同源词证》,收入《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58页。

③ 何琳仪《吴越徐舒金文选释》,收入《中国文字》新第19期,台北:艺文印书馆,1994年,第145页。

甲骨文有字作“𠄎”（合 7909）“𠄎”（合 36965）“𠄎”（英 2523），都指同一方国名，可知“𠄎”、“盧”、“蘆”在甲骨文中同字。金文有“𠄎”（乔君钺钺），也有“𠄎”（大保簋）。西周金文盧钟铭曰：“盧罍蔡姬用宝。”叔钟铭为“叔罍蔡姬用宝”，可见“盧”与“𠄎”在金文中仍同字，且读音相同。在西周和春秋金文中，“𠄎”除用为人名和侯国名外，主要还有两种用法，一是假借为“徂”，如西周中期的生史簋：“用事𠄎（徂）日□。”春秋早期的崑甫人匜：“余王搜𠄎（徂）孙。”春秋晚期的鄒叔之仲子平钟：“仲平善𠄎（徂）考。”二是用为连词“且”，但仅见于春秋金文。如春秋早期的戎生编钟五：“既𠄎（且）淑。”春秋晚期的配儿钩鐙：“余其戕于戎功𠄎（且）武。”王孙遗者钟：“终翰𠄎（且）扬。”上博简《紂衣》“且”作“𠄎”，郭店楚简作“𠄎”，可见“𠄎”、“盧”仍同音。包山楚简：“𠄎（徂）见王。（208）”“𠄎”当读为“徂”，训为“往也”。“徂”为从母字，可知战国时期“𠄎”、“盧”还读入从母。《说文》：“盧，虎不柔不信也，从虍且声。”《说文》：“𠄎，又卑也，从又盧声。”“盧”与“𠄎”已分化为形、音、义都不同的两个字，即“盧”读为从母，而“𠄎”为精母字。

櫨，《说文》：“果似梨而酢，从木盧声。”上博六《慎子曰恭俭》：“首戴茅蒲，撰蓀执櫨（鉏），遵吠服晦。（5）”“櫨”假借为“鉏”，“鉏”为从母字。

楚简中有大量“𠄎”用作“且”的例子。从且、从盧、从𠄎常构成异体。如《说文》：“𠄎，骄也。”又“𠄎，骄也。”俞越《儿笈录》：“𠄎，徂之籀文。凡籀文从盧者，小篆或省作且。”“𠄎”当为“𠄎”之异体。《说文》：“𠄎，往也。从辵且声。𠄎，齐语。𠄎或从彳。𠄎，籀文从盧。”战国梁十九年亡智鼎“徂”字作“𠄎”，从𠄎声。楚简“蘆”皆从𠄎声，作“𠄎”（包山 154）。天星观一号墓卜筮简“𠄎”字作“𠄎”，又作“𠄎”。“盧”及从盧声之字的语根当与从且之字同。

6. 支部

精母：𦉑𦉒紫𦉓𦉔𦉕𦉖𦉗𦉘𦉙𦉚𦉛𦉜𦉝𦉞𦉟𦉠𦉡𦉢𦉣𦉤𦉥𦉦𦉧𦉨𦉩𦉪𦉫𦉬𦉭𦉮𦉯𦉰𦉱𦉲𦉳𦉴𦉵𦉶𦉷𦉸𦉹𦉺𦉻𦉼𦉽𦉾𦉿

庄母：𦉑

𦉑𦉒𦉓𦉔𦉕𦉖𦉗𦉘𦉙𦉚𦉛𦉜𦉝𦉞𦉟𦉠𦉡𦉢𦉣𦉤𦉥𦉦𦉧𦉨𦉩𦉪𦉫𦉬𦉭𦉮𦉯𦉰𦉱𦉲𦉳𦉴𦉵𦉶𦉷𦉸𦉹𦉺𦉻𦉼𦉽𦉾𦉿(精)——此(心→从→清)

甲骨文“此”字作“𦉑”，在卜辞中多用为“𦉑”，表祭名，如：

……此……有佑。 《合》27035

惟牛王此受佑。 《合》27040

惟大牢此有雨。 《合》28244

……其炆此有雨。 《合》30789







睡虎地秦墓家书木牍“黑夫自以布此(裁)”，“此”当读为“裁”。“𦉑”、“裁”为从母字。郭店《老子》甲：“皆知善，此其不善已。”今本和帛书本“此”作“斯”。定州八角廊汉简《论语》：“斯人也而有此(斯)疾也。(119)”今本“此”作“斯”。据此可知“此”很可能也来自心母，其音变轨迹为 ?s->z-或 s->sh->ts^h-。

𦉑，《说文》：“不思称意也。《诗》曰：‘翁翁𦉑𦉑。’”“思”乃声训，“思”为心母之部字。上博三《曹沫之阵》：“则斯(𦉑)度伤亡，𦉑搜行(51)失车甲，命之毋行。(31)”“斯”假借为“𦉑”。“𦉑”见于睡虎地秦简，作“𦉑”(秦律十八种 126)，简文曰：“或私用公车牛，及假人食牛不善，牛𦉑。”“牛𦉑”即“牛𦉑”。银雀山汉简《论政论兵之类》：“…能使劳，得天下；能使离，三军和；能使柴(𦉑)，故兵有四路五(0161)。”“𦉑”、“柴”为从母字。





“𦉑”见于《包山楚简》：“𦉑𦉑二箕。(258)”“𦉑”字作“𦉑”，简文“𦉑𦉑”即“𦉑𦉑”，^①“𦉑”读为从母。武威汉简 3 号简：“治久咳上气，喉中如百虫鸣状，卅岁以上方：𦉑胡、桔梗、蜀椒各二分，桂乌、喙姜各一分。”“𦉑胡”即“柴胡”。“柴”为从母字。居延汉简：“第十侯史殷省伐慈其。”“慈其”即“𦉑蕪”。“柴”、“慈”皆为从母字，则“𦉑”东汉早期

① 参看湖北荆沙铁路考古队编《包山楚简》注 529，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 60 页。





还读从母。

甲骨文“髡”字作，金文有字作（孟鼎），从从“此”，裘锡圭先生指出与甲骨文为一字，应释为“髡”。即是在字上追加此声而成。^①“髡”在鼎文中当读为“紫”，则“髡”本亦读为从母，其精母之读音后出。

“此”在战国时期可能已经音变为清母。如：

“紫”见于战国楚系文字，作（曾 121）（包山 271）（信阳 2·15）。裘锡圭、李家浩两位先生认为曾侯乙墓竹简 121 号简之“紫”当读为“此”。^②曾侯乙墓竹简 124 号简有字作，可隶作“𦉳”，可证“紫”本当读与“此”同，读为清母。

𦉳，《说文》：“𦉳旧头上角𦉳也。一曰𦉳𦉳也。从角此声。”睡虎地秦简“𦉳”皆假借“此”为之，凡四见。三例见于《日书》甲种，一例见于《日书》乙种。文例皆为“此𦉳”，即“𦉳𦉳”，二十八星宿之一。曾侯乙墓漆匱“此佳”亦当读为“𦉳𦉳”。“此”为清母字，则“𦉳”最初亦当读为清母，其精母之读音后出。

“𦉳”见于秦陶文，作（陶汇 5·361），又见于睡虎地秦简，作（效律 14）。简文曰：“过千一百钱以到二千二百钱，𦉳官嗇夫一盾。”战国不降矛：“降之金。”“𦉳”为“罚缴财物”之义。上博五《季康子问于孔子》：“救民以辟，大皐则赦之以刑，𦉳皐则赦之以罚，小则𦉳（𦉳）之。（20）”“𦉳”与“𦉳”当同音，读为从母。

“𦉳”未见于出土文字资料。《汉书·货殖传》：“𦉳𦉳千觔。”《音义》：“𦉳音如楚人言芥。”“芥”为从母字。^③

郟，《说文》：“宋、鲁间地。从邑晋声。”《左传·庄公元年》：“齐师

① 裘锡圭《读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1972年第5期。

② 湖北博物馆编，《曾侯乙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496页。

③ 转引自李裕民《楚方言初探》，《中国语文研究》1987年第9期。

迁纪、邢、鄞、郛。”杨伯骏注：“鄞音贲。”“鄞”曾读为从母，后来才音转为精母。

殷寄明先生认为从此声的“柴”、“柅”、“𠄎”、“玼”、“疵”、“娵”、“𧈧”、“髴”、“𧈧”、“𧈧”都含有小义，是一组同源词。^①此声可表小义，源自“子”的引伸义，当与“子”的语源相同。从上引谐声、通假、异文等资料来看，“此”及从此声之字所构成的同词族语根当为 s-，郑张先生拟中古变为精母的为 ?s-、?z-，变为清母的为 sh-，变为从母的为 z-。

7. 歌部

精母：/ 左佐尪嗟/ 𠄎挫𦉳/ 屣騷/ 𦉳/ 𦉳

庄母：𦉳

左(精)——差(清)

甲骨文“左”作“𠄎”(合 137 正)，在卜辞中用为“佐”。在古文字资料中有大量的用“差”为“左”或“佐”的现象，如：

师询簋：“师询，丕显文武应受天命，亦则惟汝乃圣祖考，克差(左)右先王。”“差”当读为“左”。

沈子它簋盖：“它用怀𦉳(佐)我多弟子。”“𦉳”读“佐”。

同簋：“世子子孙孙差(左)右吴大父。”“差”与“右”连用，当读为“左”。

国差簋：“国差(佐)立事岁，戌日(月)丁亥，工师𦉳铸西墉宝簋四乘。”“国差”即齐臣国佐。《左传·宣公十年》：“冬，公孙归父如齐。齐侯使国佐来聘。”

叔夷钟、叔夷罍：“𦉳恤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戡差(左)正卿。”“左”、“差”同用。

中山王𦉳鼎：“敬顺天德，以𦉳(左)右寡人。”“𦉳”假借为“左”。

^① 殷寄明《汉语同源字词丛考》，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第193～196页。

中山王𠄎方壶：“使得贤才良𠄎(佐)𠄎”、“以𠄎(𠄎)右𠄎辟。……受任佐邦。”“𠄎”、“佐”同用。

战国郢客问量：“恭赐少攻差(佐)孝癸。”用“差”为“佐”。

战国𠄎距末：“作距末，用差(佐)商国。”“差”当读为“佐”。

战国楚器邕客铜量：“工差竟之。”“工差”当读为“工佐”。

楚王𠄎𠄎鼎：“冶师绍条差(佐)陈共为之。”盖内铭文：“冶师吏秦差(佐)苛膾为之。”鼎腹外铭文：“冶师盘埜差(佐)秦𠄎为之。”“差”假借为“佐”。

楚王𠄎𠄎盘：“冶师绍条差(左)陈共为之。”“差”用为“左”。

曾侯乙墓竹简：“差(左)令引所馭乘车……(7)”“差令”即左令。^①又“工差(佐)坪所造行广五乘。(120)”“差”当读为“佐”。

蔡侯申盘：“蔡侯申虔恭大命，上下陟𠄎。𠄎敬不惕，肇𠄎(佐)天子。”

蔡侯申编钟：“小子余非敢……宁志，有虔不……惕，𠄎(佐)右楚王。”“𠄎天子”即辅佐天子。“𠄎右楚王”即佐佑楚王。

包山楚简：“差(左)令𠄎。(85)”“差令”即左令。又“乔差(佐)仆受之。(128)”“差”读为“佐”。

包山楚简：“金𠄎二𠄎。(147)”何琳仪先生释“𠄎”为“𠄎”，并读“𠄎”为“𠄎”。^②“𠄎”为清母字。

上博二《容成氏》：“昔者天地之差(佐)舜而……(16)”“汤乃谋戒求贤，乃立伊尹以为差(佐)。(37)”“昔者文王之差(佐)受也，如是状也。(49)”“差”皆当读为“佐”。

上博五《季康子问孔子》：“毋乃肥之问也是左(差)乎？(11B)”“左”读为“差”。

郭店楚简《老子》甲本：“以道差(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强(6)于天

① 参看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注 6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年，第 511 页。

②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 879 页。

下。(7)《穷达以时》：“御繇衣胎盖帽经冢巾，(3)释板筑而差(佐)天子，遇武丁也。(4)”“差”皆当读为“佐”。

《古玺汇编》4199号玺：“𠄎敬事。”“𠄎”从广左声。何先生疑“𠄎”为“瘥”之省文，“瘥”为清母字。^①

以上资料除同籀外，分属齐、晋、楚三系，其中叔夷钟、中山王𠄎方壶铭文中“差”、“佐”并用，可证“差”、“佐”在形、音、义上关系都很密切，属同源词。郭店《五行》：“能遯(差)池其羽，然后能至哀。君子慎其独也。(17)”九店楚简《建除》：“宁寗日，利以取妻，人人，𠄎(徙)家室。”“凡故日，𠄎(徙)之日，不利祭祀。聚众，□去，𠄎(徙)家。(15)”上博三《周易》：“九二：需于𠄎(沙)。小有言，终吉。(2)”“𠄎”、“𠄎”皆释为“徙”，假借为“差”，“𠄎”读为“沙”。“徙”、“沙”皆为心母字。郑张先生拟“左”的上古声母为ʔs-，“差”的声母为shr-，可以很好地解释“左”、“差”、“徙”、“沙”的语音演变。

挫挫𠄎(精庄)——坐(从)——危(跪)(见)

马王堆《老子》甲本《德经》：“坐(挫)其锐，解其纷，是谓玄同。(38)”“坐”当读为“挫”。同文在乙本《德经》、甲乙本《道经》中作“挫”。“坐”、“挫”皆为从母字。银雀山汉简《孙臆兵法·三》：“奈何孙子曰：‘鼓而坐(挫)之，十而揄之。’(0057)”“坐”亦假借为“挫”。刘熙《释名·释姿容》：“坐，挫也，骨节挫拙也。”“坐”与“挫”同源，都有折屈义。^②

《信阳楚简》：“𠄎(坐)綰(坐)裙。(2·20)”何琳仪先生释“𠄎”为“坐”，并读为“坐”。^③《包山楚简》“坐”字作“𠄎”(简237)，简文曰：“坐山一粘。”何先生读“坐”为“坐”。^④“坐”为从母字。九店楚简《丛

①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79页。

② 陈建初《〈释名〉考论》，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5页。

③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81页。

④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81页。

辰》：“利于饮食，如远行，剡(倅)。(35)”“剡”为清母字。

髻，《说文》：“丧结。《礼》：‘女子髻衰，吊则不髻。鲁臧武仲与齐战于狐貍，鲁人迎丧者始髻。从髟坐声。’”“丧”乃声训，“丧”是心母阳部字；上博四《柬大王泊旱》：“王事何(17)必三军有大事，邦家以机隍，社稷以遑(危)欤。(18)”“危”为疑母歌部字。

“坐”引申为“座”，则“坐”与“座”构成一组同源词；“坐”、“挫”、“剡”、“倅”都有折屈、挫折义，又构成另一组同源词。陈剑先生认为“坐”与“危”(“跪”之初文)很可能为一语一形分化，^①则“坐”与“危”同源。它们构成一个词族。这个词族的根词“坐”的语根可拟为 $sq1^-$ 。

《说文》：“羞，藏鱼也。南方谓之黔，北方谓之羞。从鱼，羞省声。”“羞”的异体“鮓”从乍声，“乍”为从母字。

《类篇》：“屨，是为切，又津垂切。《说文》：‘屨屨，山巔。’又才规切，《尔雅》：‘岬者，屨屨。’郭璞说。又视佳切。”“才规切”说明“屨”有从母一读。

《说文》：“驂，马小貌。从马，垂声，读若榘。”“榘”为端母字，可见至少在许慎时代，“驂”还不读为精母。



《说文》：“恣，心疑也。从三心。读若《易》曰：‘旅琐琐’。”“琐”为心母字，“恣”本亦读为心母。《广韵》所收“姊规切”、“才榘切”当晚出。

8. 脂部

精母：弟姊秭秭/咨资姿窳咨恣咨咨/齋齋擠擠濟霽躋稭齋(賈)齋

庄母：齋第姊

弟第姊秭(精)——弟(从)

甲骨文“弟”作 (合 1385 正)、“ (合 10974)。于省吾先生指出甲骨文中的“弟”当读为“次”，并指出从弟、从次通用之例，如《易

^① 陈剑《上博竹书〈昭王与龚之雉〉和〈柬大王泊旱〉读后记》，简帛研究网，2005年2月15日。

·夬》九四：“其行次切。”释文：“次，《说文》及郑作越。”《仪礼·既夕礼》：“设床第。”郑注：“古文第作茨。”^①可知“第”与“茨”同音，读为从母，则“第”最初当读为从母。战国时期简帛资料中亦有“第”与“次”相通的例子，如上博三《周易》曰：“六四：师左第，无咎。7”“第”，马王堆帛书《周易》作“次”。

姊，《说文》：“女兄也。从女第声。”齐玺“姊”字作“𠂔”（玺汇0331），疑读“茨”。^②

秭，《说文》：“五稷为秭。从禾第声。一曰数亿至万曰秭。”“秭”见于西周中期的召鼎，作“𠂔”，用作量词。

咨资恣窳姿湊次(精)——次(从)

商代金文“次”字作“𠂔”（次觚），西周金文作“𠂔”（次尊），疑为“咨”之初文。^③ 战国陈侯因咨戈“咨”字作“𠂔”，陈侯因咨戈作“𠂔”，《史记》作“齊”。“因咨”即战国齊威王之名。王国维曾指出：“次、齊古同声，故齊声之字亦从次声。征之《说文》则咨、濟同字，𠂔、齋同字，窳、穉同字。经典咨斧亦作齊斧、墻茨亦作墻齋，采茨亦采齊、窳盛亦齋盛，蟻螬亦作蟻齋。又齊威王之名，《史记·六国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史记·鲁仲连传》并作因齊，战国策作嬰齊，而传世陈侯因咨敦、陈侯因咨戈并作因咨，咨亦齋之异文也。”因此，他认为王子嬰次卢铭文“王子嬰次”即“嬰齊”，乃楚令尹子重，为莊王弟。^④ 刘钊先生释包山楚简“𠂔”（齋）为“咨”，并指出：“在古文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步、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17～472页。

② 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097页。

③ 黄德宽主编《古文字谱系疏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066页。

④ 王国维《王子嬰次卢跋》，收入《观堂集林》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99～890页。

字中，齊、次用作声符时常可替换。”^①《类篇》“次”字条下记有“才资切”，即读为从母。“次”本当与“齊”音同，读为从母。

上博四《柬大王泊旱》有字作“𠄎”（简 18），可隶作“瘠”，在简文中读作“资”。鄂君启节有字作“𠄎”，可隶作“瘠”，读为“资”。“瘠”、“瘠”皆从瘠声，上文已经提到“瘠”读与“齊”同，为从母字。武威汉简《仪礼·服传》甲本：“直经大鬲左末在下，去五分一以为带。资（齊）衰之经，斩衰之带也（1 背）。”“资”读为“齊”可证，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处如资（齊）（47 三），言如盟（48 三）……”整理小组谓“资”读为“齊”。银雀山汉简《六韬·四》：“……太公望曰：‘守国奈何？’太公望曰：‘资（齊）……’（1354）”“资”亦当读为“齊”，“齊”为从母字；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国次》，用“次”为“资”。文中“资”又假借“齋”为之。《老子》甲本《道经》：“故善人，善人（146）之师；不善人，善人之齋（资）也。不贵其师，不爱其齋，虽智乎大迷。（147）”“齋”当读为“资”。“齋”、“齋”皆本为从母字，故“资”亦有可能本读为从母；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上出鱼（14）股内廉，触少腹，大资（眦）旁。（15）”“资”当读为“眦”，读入从母。凡此皆可证“资”本当读为从母。

《石鼓文·车工》：“麇鹿越越，其来大次。”郭沫若认为“次”为“恣”之省。^②马王堆帛书、竹书中借“次”为“恣”的例子很多，如《战国纵横家书·触龙见赵太后》：“诺，次（恣）（199）君之所使之（200）。”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诸伤》：“……熟□□□（饮）其汁，汁滓皆索，食之自次（恣）。（4）”“自次”即“自恣”。马王堆《合阴阳》：“虽欲勿为，作相响相抱，以次（恣）戏道（106）。”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牋“次（恣）心肆意（146）”，“次”皆读为“恣”。

① 刘钊《包山楚简文字考释》，收入梁志强编《东方文化》，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8年1-2期合刊，第69页。

②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楚文考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61页。

也。”“齊”甲骨文作“𣎵”，从木齊声，西周金文作“𣎵”（史墙盘）。西周中期的猋钟：“猋其万年，齊（茨）祿炽光。”史墙盘：“亚祖祖辛𣎵毓子孙，繁祿多釐，齊（茨）祿炽光。”“齊”皆读为“茨”，则“齊”与“茨”同音，读入从母。

齋，《说文》：“持遗也。从貝，齊声。”西周早期的麦方尊：“𣎵（劑）用王乘车马金𣎵门衣市烏。”“劑”当读为“齋”，“劑”为从母字。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李园谓辛梧章》：“与燕为上交，秦祸案还归于赵矣。秦大举兵东面而齋（劑）赵，言毋攻燕。（279）”“齋”当读为“劑”。王辉先生认为“劑赵”即“翦伐赵”之意。^①西周晚期的五年师旅簋：“王曰：‘师旅，令汝羞追于齊，𣎵（儕）汝十五易登’。”“儕”用为“齋”，“儕”为从母字。“齋”从齊声，又与“劑”、“儕”通用，可证“齋”本当读如从母，其精母之音读属后来之音变。


霽，《说文》：“雨止也，从雨，齊声。”《类篇》：“在礼切，雨止也。洪范曰雨曰霽。又子礼切，又子计切，又才诣切，晴也。”可证“霽”训为“雨止”、“晴也”时当读为从母，其“子计切”之音读当晚出。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虽雨齊（霽），不可覆室盖屋（33正）。”“雨，齊（霽）。（35正）”“旦雨夕齊，夕雨不齊（霽）。（43正）”“齊”皆读为“霽”，是“霽”当读为从母之力证。







齏，《说文》：“纒也，从衣齊声。”阜阳汉简《诗经》：“宗室牖下，谁其尸之，有齊（齏）季女……（6）”“齊”用为“齏”。《玉篇·女部》“齏”下引《诗》，“齊”作“齏”。《广雅·释诂》：“齏，好也。”王先谦云：“韩‘齊’作‘齏’。”《广韵》：“齏纒，经典同用齊。”可证“齏”本当读与“齊”同，读入从母。


穡，《说文》：“获刈也，从禾齊声。”《广韵·霽韵》：“穡，获也。又音劑。”可证“穡”本当从母一读。《诗经》“墙有茨”，阜阳汉简《诗经》

① 王辉《古文字通假释例》，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年，第624页。

作“墻有穡”。“茨”为从母字。阜阳汉简《诗经》的书写时代在秦始皇下焚书令至汉文帝十五年。^①可知西汉初年“穡”还读为从母。

濟，《说文》：“水。出常山房子赞皇山，东入泚。从水，齊声。”中山王方壶“濟”字作，铭文曰：“……以飨上帝，以祀先王，穆穆濟濟。”“濟濟”指的是祭祀时仪容。《集韵》：“濟，前西切，濟濟，祭祀容。”可证“濟”本来就读为从母，其读精母之音当由从母音变而来。上博简《性情论》：“宾客之礼必又夫齊齊之颂，祭祀之礼必又夫臍臍之敬……(19)”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宾客之礼必有夫齊齊之容，祭祀之礼必有夫齊齊之敬。(66)”“齊齊”、“臍臍”皆当读为“濟濟”。上博简《容成氏》：“东方为三佻，西方为三佻，南方为三佻，北方为三佻，以愷于溪谷，淒(濟)于广川。(31)”“淒”当读为“濟”。“淒”本读与“齊”同，可知战国晚期楚国“濟”仍读为从母。

盥，《说文》：“黍稷在器以祀者。从皿，齊声。”西周金文作（仲父鬲）（趯鼎），从齊声，又从妻声作（吊鼎）（白六鼎）。白六鼎的所从妻字上部，象发簪形变形音化成齊声。^②西周时期“妻”当亦与“齊”同音，读为从母。农亩“妻”字作，象发簪形的部分变从甬声，而“甬”本当读从母，可证“妻”也读为从母。西周金文或借“齊”为“盥”，如夔王鬲铭曰：“夔王作姜氏齊。”“齊”用为“盥”。春秋时期的延敦铭曰：“作盥器。”“盥”当读为“淩”。上文已论“淩”本当读入从母，则“盥”亦当如此。

躋，《说文》：“登也。从足齊声。《商书》曰：‘子颠躋。’”春秋金文作（洹子孟姜壶）。叔夷钟借“躋”为“齊”。《史记·礼书》：“祭齊先大羹而饱庶馐。”用“齊”为“躋”，可证西汉“躋”还不读精母，而读

^① 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序言》第1页。

^②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为从母。

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诸伤》：“久伤者，齋(齋)杏核中仁，以臙膏弁，封瘡，虫即出。(21)”“齋”假借为“齋”。“齋”为从母字。《周礼·天官·醢人》疏：“细切为齋。”又“以五齋七醢七菹三糝实之。”郑注：“齋当为齋……凡醢酱所和，细切为齋。”可知郑玄时代“齋”还读为从母。

齋，甲骨文作“𠄎”“𠄎”，西周金文作“𠄎”“𠄎”，战国文字作“𠄎”“𠄎”“𠄎”等形。《说文》：“齋，禾麦吐穗上平也。象形。”许慎析形显然有误，但他指出“齋”有齋平之义，则揭示了“齋”及从齋声之字的语源。“齋”、“齋”、“濟”有平齋、整齋义，“臍”、“劑”、“濟”、“濟”、“齋”都有齋断义，“齋”、“齋”、“齋”、“齋”、“齋”皆有齋等义。“齋”是这个词族的根词。凡此可证“齋”、“濟”、“齋”、“齋”、“齋”、“濟”、“齋”、“齋”最初当读为从母，其读精母乃后来的音变。

9. 微部

精母：最(𡗗)

最(精)——聚(从)

包山楚简：“凡君子二夫，𡗗是，其著之。(4)”刘钊先生指出“𡗗”当读为“最”。最，会聚也。此言君子二人会聚于此；①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取灶末灰三指最□□(57)水中，以饮病者。(58)”“一，屠芍药，以□半杯，以三指大掙饮之(72)。”“最”、“掙”皆假借为“撮”。《说文》：“掙，持头发也。”又“撮，四圭也。一曰两指撮也。”“掙”、“撮”都指用手抓，为同源词，故“掙”、“撮”、“最”本当同音，读为从母。又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明君》：“𡗗天下之良而独有之，故能汜强。(8)”帛书《周易·系辞》：“方以类𡗗，物以群分。(1行上)”“𡗗”当读为“聚”。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官府及其县官积𡗗弃市。”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十三篇》：“有受□□□□固

① 刘钊《包山楚简文字考释》，梁志强编《东方文化》，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8年1、2合刊，第48页。

有数矣，市货𧇧(聚)贵者受肆毋过……(4897)“𧇧”为“最”之异体，皆当读为“聚”，“聚”为从母字。

脢(精)——允(以)

《说文》：“脢，赤子阴也。从肉，爰声，或从血。”“爰”字最早见于楚帛书，作“𠄎”。“𠄎”就是在“允”字作“𠄎”形之上加“𠄎”而成的。《说文》“爰”作“𠄎”，即“𠄎”形进一步演变而成的。西周晚期的不斲簋“允”作“𠄎”，在所从之“𠄎”乃“𠄎”之讹。不斲簋铭文“允”假借为“猷”，可见此“𠄎”还是“允”而非“爰”。楚帛书“帝𠄎”即典籍中的“帝俊”，则此“𠄎”即“爰”字。《说文》：“爰，行爰爰也，一曰倨也。从爰，允声。”据此，“爰”仍读与“允”同，“爰”读清母当始于汉代。“脢”最早见于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德经》：“未知牝牡之会而脢怒，精之至也。(191上)”“脢”作“𠄎”，在帛书中即用为本义。“脢”从爰声，则很可能在《说文》时代，“脢”还不读精母，而读为清母。

10. 职部

精母：則/𠄎稷稷

庄母：𠄎仄𠄎側𠄎

則側𠄎(从→清→精)

卜辞用“𠄎”为“則”，如：

(1)……我其已𠄎，𠄎帝降若；

我勿已𠄎，𠄎帝降不若。

《合》6497

(2)…卜穀贞：我其已𠄎，𠄎帝降若。

穀贞：我勿已𠄎，𠄎帝降不若。

《合》6498

(3)甲戌卜争贞：我勿将自兹邑𠄎𠄎祀𠄎若。

《合》13525

(4)…争…勿将…邑𠄎…𠄎若。

《合》13529

(5)癸酉子卜高𠄎不若。

《合》21826

(6)…戌子卜…𠄎不若。

《合》21827

以上诸辞，“𠄎”均当读为“則”。西周早期金文天亡簋铭文曰：

“文王德在上，丕显王乍省，丕肆王乍庸。”郭沫若认为铭文中两“乍”字均当读为“则”，语例与《合》6497 卜辞同。^①“乍”为从母字，“则”亦当读为从母。“则”字始见于西周金文，作“𠄎”（何尊）“𠄎”（召伯簋）“𠄎”（格伯簋）等形，从鼎从刀，会以刀刻鼎铭为准则之意。战国早期晋国铜器羸羌钟：“赏于韩宗，令于晋公，昭于天子，用明则之于铭。”郭沫若读“则”为“载”。^②中山王𠄎壶有“载于简策”之语，与此铭文可相比照。据我们考证，“载”在中山国语音中与“才”同音，读为从母。同为晋系的侯马盟书：“贼（则）永亟𠄎之。”（侯马 156·25）“贼”当读为“则”，战国温县盟书：“……而敢与贼为徒者。”“贼”作“𠄎”（T1 坎 1:3863）“𠄎”（T1 坎 1:3797）“𠄎”（T1 坎 1:3211）“𠄎”（T1 坎 1:1961），又借“则”为之，作“𠄎”（T1 坎 1:3780）“𠄎”（T1 坎 1:4585）“𠄎”（T1 坎 1:2182）“𠄎”（T1 坎 1:1845）“𠄎”（T1 坎 1:2279）。“贼”为从母字。三体石经残石有字作“𠄎”，即“𠄎”。《集韵》：“𠄎，或从则。”“𠄎”为从母字。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听其有矢，从而贼（则）之。（19 肆）”整理小组读“贼”为“则”，训为纠正、约束。中古从则声的“𠄎”，“阻力切”（庄）和“士力切”（崇）两读，“𠄎”有“阻力切”（庄）和“秦力切”（崇）两读，亦可证“则”本当读为从母。“则”由从母音转为清母，先发生在战国末年至汉初的楚音中，如长沙子弹库帛书乙篇：“□敬惟备，天象是𠄎（则）。”“𠄎”用为“则”，“𠄎”为清母字。楚文字中有大量用“𠄎”为“贼”的例子^③，这说明在战国楚音里“𠄎”、“则”、“贼”三字同音，都读从母，“𠄎”的清母读音乃后出。

①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二），上海：上海书店，1999 年，第 1~2 页。

②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二），上海：上海书店，1999 年，第 234 页。

③ 白于蓝《简牍帛书通假字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167~168 页。

马王堆帛书《养生方》：“益产者食也，损产者色(200)也，是以圣人必有法廌(則)，一曰廌□，二曰援据……(201)”“法廌”即“法則”。用“廌”为“則”，“廌”为清母字。马王堆竹简《天下至道谈》：“八幢：一曰接手，二曰伸肘……七曰廌钩。(49)”《合阴阳》則作：“八动：一曰接手，二曰伸肘……四曰側句，五曰上句(120)……側句者，旁欲摩也；上句者，欲下摩也。(121)”张家山汉简《引书》：“周脉循腠理，以利踵首；廌比以利耳，阳见以利日……(99)”“廌”为清母字。《说文》：“則，等画也。从刀从貝。貝，古之物货也。𠄎，古文則。𠄎，亦古文則。𠄎，籀文則从鼎。”古文“𠄎”即从“册”声，“册”为清母字。

以上例证表明，“則”本为从母字，汉初音转为清母，其精母之读音当在东汉以后才有。

側，《说文》：“旁也。从人則声。”段注：“不正曰昃，不中曰側。二义有别，而经传多通用。”出土文献中“側”与“昃”也常通用。如郭店《语丛四》：“贤人不在昃(側)，是谓迷惑。”上博二《昔者君老》：“太子昃(側)听，庶醴进。(1)”上博五《君子为礼》：“□俛视，毋昃(側)覿。(6)”

甲骨文“昃”作甲骨文昃字作“𠄎”(合 20957)“𠄎”(合 13442 正)“𠄎”(合 13312)“𠄎”作“𠄎”(合 1051 正)“𠄎”(合 1825)。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清日、食时、日則(昃)、暮、夕。(233 壹)”“則”假借为“昃”，上文已提及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中“則”假借“賊”为之，“賊”为从母字，由此可推定“昃”本亦读为从母。

马王堆竹简《天下至道谈》：“八幢：一曰接手，二曰伸肘……七曰廌钩。(49)”“廌钩”，《合阴阳》作“側句”；今本《诗经·国风·关雎》“辗转反側”一句，马王堆帛书《五行》引《诗经》作“媿搏反廌(340)”；张家山汉简《引书》：“周脉循腠理，以利踵首；廌(側)比以利耳……(99)”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轻车先出居廌(側)。”“側”与“廌”互为异文或通假，“廌”为清母字。不过，“廌”可能跟“側”一样，本为从母字，后音变为清母。

前，《说文》：“乌喙也。从艸則声。”《广韵·职部》“蓊”字有“阻力切”（庄）和“士力切”（崇）两读。

综合分析上引资料，我们认为“側”和“則”的音变轨迹是一致的，即汉初音转为清母，其精母之读音当在汉代以后才有。

稷（精）——鬼（见）

《说文》：“稷，齋也，五谷之长。”“稷”字最早见于马王堆木简《杂禁方》，作“稷”（简 189），与《说文》古文“稷”作“稷”相合。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甲篇“鬼”字作“𠃉”（简 245），可证“稷”确从鬼，“稷”本当为从禾鬼声之字。简文曰：“煮黍稷而饮其汁。”可见“稷”的本义当是一种谷物，“社稷”之义乃引伸义。

马王堆帛书“稷”字作“稷”（老子甲 90）“稷”（阴阳十一脉灸经甲 40），变从巛声。“稷”所从之“巛”实际上是由“𠃉”形加动符“止”变来的，其演变规律与“𠃉”、“兕”同，即在人形腿部加“止”或“尸”，最后变从文。

“稷”的字形演变轨迹亦可证“稷”本来确实从鬼。

战国文字有字作“𠃉”（陈昉簋盖）“𠃉”（上博·柬大王泊旱 6），可隶作“𠃉”。陈昉簋盖铭曰：“恭寅𠃉（鬼）神。”上博简《柬大王泊旱》简文：“为楚邦之𠃉（鬼）神主，不敢以君王之身，变乱𠃉（鬼）神之常故。夫上帝𠃉（鬼）神高明（6）”，“𠃉”皆当读为“鬼”。

上博简《柬大王泊旱简》又有字作“𠃉”（简 18），在简文中用作“社稷”之“稷”。“𠃉”即“稷”。战国文字“稷”字又作“𠃉”（丘关釜）“𠃉”（子禾子釜）“𠃉”（中山王髹鼎）“𠃉”（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 235）。

我们认为“𠃉”乃“稷”之初文。“稷”的字形演变轨迹为：𠃉、𠃉、𠃉、𠃉、𠃉、𠃉、𠃉，即在“𠃉”所从之“𠃉”“𠃉”形上加动符“止”讹变成从

“𣎵”“𣎶”“𣎷”，再进一步演变成从“𣎸”。上博简《柬大王泊旱简》“𣎸”用为“鬼”，“𣎸”用为“社稷”之“稷”，说明二字在形体上已分化。

上博四《采风曲目》有字作“𣎸”（简2）“𣎸”（简4），可隶作“𣎸”。“𣎸”所从之“𣎸”亦是在“𣎸”（鬼）形上加动符“止”而成的。简文“𣎸（曾）商：《乔木》（2）”“𣎸（曾）羽：子之贱奴（4）”，董珊先生认为“𣎸”当读为“曾”，^①甚确。战国晋玺“千稷”当读为“千秋”，可知“稷”至迟在战国时期已变成清母字。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心与胁痛（39），不可以反稷（侧），甚则无膏。（40）”“稷”当读为“侧”，“侧”为清母字，可知“稷”在汉初已经音变为清母字。《史记索隐·秦本纪》云：“秦昭襄王名则，一名稷。”^②可资佐证。《说文》：“稷，从禾夨声。”可知在许慎时代“稷”还是清母字，其音变读精母当在东汉后期。郑张尚芳先生拟“鬼”的上古音为 kul，“稷”为 sklwg，^③可谓卓识。

11. 觉部

精母：躐/蹴/蹶/蹶

躐/蹶(精)——就(从)——搜(心)

《说文》：“躐，蹶也。从足，就声。”“蹶”指轻步走，表恭敬貌。《礼记·哀公问》：“孔子蹶然辟席而对。”郑玄注：“蹶然，敬貌。”《类篇》：“躐，七六切，《说文》：‘蹶也。’或作蹶。蹶，又子六切，踏也，逐也。又就六切，蹶然，敬貌。”训为“敬貌”时读为“就六切”，即读入从母。“蹶”本当读入从母，亦可从其异体“蹶”的用例得到证明。

“蹶”从“蹶”声，而“蹶”本亦读为从母，如殷墟甲骨文有地名

① 董珊《读〈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四）〉杂记》，简帛研究网，2005年2月20日。

② 参看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马王堆帛书四·阴阳十一脉灸经》注2，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0页。

③ 本书所引郑张尚芳先生的拟音均采自郑张尚芳《上古音系·古音字表》，参看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0~579页。

“就”，《合》37474：“戊子卜，贞，王田𡗗往来亡灾。”“𡗗”即“就”之初文，指卫邑戚；郭店楚简《五行》：“不勉不悦，不悦不就（戚），不就（戚）不亲，不亲不爱……（21）”《六德》：“圣与智𡗗（戚）矣（1），仁与义𡗗（戚）矣，忠与信𡗗（戚）矣。（2）”“就”皆假借为“戚”。《六德》：“新（亲）𡗗（戚）远近，唯其人所在。（48）”“新𡗗”当读为“亲戚”。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索迹椒郁，不周项二寸。（66）”整理小组谓“椒”读为“蹙”，“蹙郁”指绳套勒束处的青紫瘀血，则“椒”当与“蹙”、“蹴”有同样来源。

睡虎地秦简《效律》：“上即发委输，百姓或之县就（僦）及移输者，以律论之。（49）”《日书》甲种：“丙申以就（僦），同居必寡。（56）”敦煌悬泉汉简：“令史豊受就（僦）人敦煌安国里范仲。（上/30·532）”“就”皆当读为“僦”。居延汉简“僦”皆假借“就”为之，则“僦”在汉代还读从母。

上博四《曹沫之阵》：“则訾度伤亡，撃𡗗（搜）行（51）失车甲。（31）”白于蓝先生认为“𡗗”当读为“搜”。^①“搜”为心母幽部字。“𡗗”所从之“𡗗”即“就”之初文。楚简“𡗗”及从𡗗（就）声的“𡗗”、“𡗗”、“𡗗”多读为“就”。^②郑张先生拟“僦”、“蹴”的声母为ʔs-，认为它们来自心母，是正确的。

窰（精）——造（从）

西周金文始见“造”字，作“𡗗”（史造作父癸鼎）。在春秋战国时期“造”字异体纷呈，作“𡗗”（郟大史申鼎）“𡗗”（许之造戈）“𡗗”（斨君戟）“𡗗”（曹公子沱戈）“𡗗”（宋公得戈）“𡗗”（秦子戈）“𡗗”（秦子戈）“𡗗”（十八年戈）“𡗗”（高密戈）“𡗗”（颂壶）“𡗗”（郟平剑）“𡗗”

① 白于蓝《〈曹沫之阵〉新编释文及相关问题探讨》，收入《中国文字》新31期，台湾：艺文印书馆，2006年，第126页。

② 白于蓝《简牍帛书通假字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5~168页。

(齐□造戈)“𠄎” (元年郑令矛)“𠄎” (七年宅阳令矛)“𠄎” (廿三年司寇矛)“𠄎” (闾丘虞雉造戈)“𠄎” (郢侯戈)“𠄎” (顯作造戈)“𠄎” (郟脆鼎)。^①“造”字虽然异体众多,但十八年戈“𠄎”从曹声外,其余都从告声。司马望戈、陈子皮戈、相公子赠戈“造”皆省作“告”,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穷四海,至千(10)里,遇𠄎(造)故也。(11)”“𠄎”即“造”之声符“告”。陈剑先生指出“造”之声符“告”是由甲骨文“𠄎” (“艸”字初文)之异体“𠄎”演变而来的。^②“艸”为从母字。《公羊疏》“𠄎”假借为“造”,十八年戈“造”字作“𠄎”,从曹声,可证“造”在战国时期与“曹”音同,读为从母。鄂君启节:“大攻尹雅以王命命集尹……为鄂君启之府鑄铸金节。”王辉先生认为“𠄎”从貝就声,应是“𠄎”(造)字之异体。^③《说文》:“造,就也。从辵告声。谭长说:‘造,上土也。船古文造从舟。’”许慎以就训造,乃声训。“就”为从母字,可知在许慎时代“造”还读为从母。

战国晚期齐国的陈子戈“造”作“𠄎”,吕公孙潮子编钟“造”亦作“𠄎”。公孙窳壶:“公孙(窳)莅事岁,饭者月……”(《文物》1972年5期图版5:1、2)齐文涛先生认为“窳”即“造”,“公孙窳”即齐景公时代的公孙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秋七月,齐公孙蚤、公孙窳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杜注:“蚤,子尾;窳,子雅。”《左传·襄公二十

① 陈伟武先生对战国兵器文字中“造”字形体做过较为全面的汇总和研究。参见陈伟武,《简帛兵学文献探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4~127页。

② 陈剑《释造》,收入《甲骨金文考释论集》,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127~176页。

③ 王辉《释𠄎、𠄎》,《古文字研究》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46~149页。

八年》：“子雅、子尾怒。”杜注：“二子皆惠公孙也。”^①“竈”见于秦系和晋系文字资料中，亦假借为“造”，作“𩇛”。如春秋早期的秦公簋：“竈(造)有四方。”秦公钟“竈(造)有下国。”“竈”用为“造”。春秋晚期晋国的郟盨钟：“其竈(造)四堵。”“竈”亦读为“造”。武威汉简：“□二升□□复置水一升其中为东乡造(竈)饮以葦薪若桑。(75)”“东乡造”即“东向竈”，可证东汉初年“造”、“竈”仍同音，读为从母，后“竈”音变为精母。

12. 药部

精母：爵/雀/繫

雀爵(精)——小(心)

甲骨文“爵”字作“𩇛”“𩇛”，又作“𩇛”“𩇛”，金文作“𩇛”（爵父癸盃）“𩇛”（史兽鼎）“𩇛”（伯公父勺）等形。甲骨文“雀”字作“𩇛”（合6952正），西周早期金文作“𩇛”（雀父己卣）。《容成氏》：“于是乎治筮(爵)而行祿，以让于来？(32)”“其政治而不赏，官而不筮(爵)，无励于民，而治乱不□。(43)”“筮”均当读为“爵”。《说文》：“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有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又“雀，依人小鸟也。从小、隹。读与爵同。”段玉裁注：“小亦声也。”“小”为心母字，则“雀”、“爵”最初可能也是心母字，其精母读音乃后世音变而来。上博简《紂衣》：“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轻料。(15)”“料”字郭店楚简作“雀”，今本作“爵”。“料”从少声；郭店楚简《太一生水》：“天道贵弱，雀(削)成者以益生者，伐于强，责于……(9)”“雀”当读为“削”，“削”为心母字，亦可为“雀”、“爵”读为心母之证。

“繫”字始见于马王堆帛书，字作“繫”（《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明君 419），文曰：“身繫行以篡万民。”与马王堆帛书时代相当的阜

①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第5期。

阳汉简《诗经》：“……繫繫，素衣朱……(116)”今本作“白石凿凿，素衣朱褻。”“凿”为从母字。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舛米一石为凿(繫)米九斗。(42)”“凿”当读为“繫”。《说文》：“糲米一斛舂为九斗曰繫。从穀幸声。”“幸”为从母字，可知在许慎时代“繫”还读为从母，汉代以后才音转为精母。

13. 屮部

精母：足馘

庄母：捉


足(精)——疋(心)

甲骨文“足”字作“𠂔”(合 13693)“𠂕”(合 22236)“𠂖”(合 190 正)“𠂗”(合 4584)“𠂘”(合 19956)，在卜辞中皆用为“疋”，故李孝定先生释为“疋”。^① 商代金文有字作“𠂙”(父癸疋册鼎)“𠂚”(疋作父丙鼎)，刘钊先生认为字应释为“足”，金文作“𠂛”“𠂜”“𠂝”，就是由甲骨文“𠂕”形加以规整化后变来的。^② 金文足字见于下列铭文：


- | | |
|----------------------|---------|
| (1) 令汝𠂛周师司。 | 《免簋》中 |
| (2) 命师晨𠂛师俗司邑人隹小臣。 | 《师晨鼎》中 |
| (3) 昔先王既令汝佐𠂛象侯。 | 《善鼎》中 |
| (4) 𠂛尹𠂛𠂛威义。 | 《癸钟》 |
| (5) 册命申更乃且考𠂛大祝。 | 《申簋盖》 |
| (6) 令汝更乃祖考𠂛备中。 | 《吕服余盘》 |
| (7) 𠂛师戏司走马馭人累五邑走马馭人。 | 《虎盖簋》 |
| (8) 𠂛𠂛，赐汝赤□□□旗。 | 《走簋》 |
| (9) 𠂛师穌父司左右走马。 | 《元年师兑簋》 |

①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第640页。









②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

(10) 余既令汝师夬父司左右走马。 《三年师兑簋》

(11) 羯对，恪从，司王家外内。 《蔡簋》

(12) 雩邦人，人，师氏人有皐有辜。 《睪盨》

(13) 子子孙孙宝用 《伯司簋》

以上“足”字皆当读为“疋”，可见西周春秋时期“足”、“疋”仍不分。但战国时期二字已开始分化。^① 战国时期的燕陶“疋”作（陶汇 4·21），是将“足”上部由圆形改写成开口状而分化出“疋”。楚简里“足”、“疋”区别甚为明显，“足”字作（包山 112）（郭店·老甲 6）（上博·性情论 39），“疋”字作（包山 70）（郭店·老甲 28）（上博·诗论 10）（曾 175）。《说文》：“足，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又《说文》：“疋，足也，上象腓肠，下从止，弟子职曰：问疋何止，古文以为诗大疋字，亦以为足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记也。”可见许慎也已经认识到“足”、“疋”乃一字分化。从卜辞和铜器铭文用例来看，“足”和“疋”最初当读为心母。“楚”字的用例也为之佐证。西周晚期的弭叔师鬲簋：“赐汝赤舄攸勒，用楚（疋）弭伯。”“楚”当读为“疋”，读入心母。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需卦》：“上六，入于穴，有不楚（速）客三人来，敬之，终吉。（22行）”通行本《易》“楚”作“速”，“速”为心母字。可证汉初“楚”仍读为心母，“足”的情况当与之类似。战国时期“足”很可能音变为从母 z-。如郭店《语丛三》：“自示其所不族（足），益。（14）”“族”用为“足”。“族”为从母字。正是因为语音的分化才导致文字的彻底分化，其精母之读音当在汉代以后。

“捉”字始见于《说文》，从手足声。此时“足”已与“疋”分化为二

^① 参看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林沅《四版〈金文编〉商榷》，江苏太仓古文字学年会论文，1990年；董莲池《金文编校补》，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8~59页。

字，“足”已读为精母，故“捉”亦当为精母字。












《说文》：“镞，利也。从金族声。”武威汉简有“镞”字。“族”为从母字，“镞”最初极有可能也为从母字。


14. 倅部


精母：作连/借谱踏

庄母：笞诈/斲

作诈(精)——乍(从)

甲骨文“乍”作 (合 7750)，又作 (合 6506) 。鲁实先生把隶定作“玨”，以、“”为玉。^①曾宪通先生认为“乍”字作形者是从耒起土会意，义为耕作。作形者所从之为手形操持的标志。“”与“”只是繁简不同。^②甲骨文“乍”的用法有三：其一，与“则”的用法相同；其二，用作祭名，即祚之初文；其三是制造的意思，即“作”字。“作”是从“乍”分化而来的，本亦如“乍”，读入从母，有大量的出土文献资料可为之佐证：

西周早期的量侯簋：“量侯作(作)宝尊簋。”借“柞”为“作”。

西周早期的利簋：“王呼乍(作)命内史册命利。……用钳(作)朕文考伯尊鼎。”“乍”、“钳”都用为“作”。

西周中期的师鼠鼎：“伯大师不自乍(诈)小子……用妥乍(祚)公上父尊于朕考虢季易父敎宗。”前一个“乍”用为“诈”，后一个“乍”当读为“祚”。

西周晚期的师斲簋器铭：“师斲父钳(胙)，斲淑市恭告于王。”“钳”用为“胙”。

包山楚简：“东周之客许緹致伐(胙)于裁郢之岁。(12)”“伐”用

①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 3227 条金祥恒说，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3250 页。

② 曾宪通《“作”字探源——兼谈耒字的流变》，《古文字研究》第 19 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408～416 页。

为“𠄎”。

春秋晚期的徐王义楚觶：“自酢(作)祭饗，用享于皇天。”王子虞鼎：“王子虞自酢(作)食鼎。”“作”假借“酢”为之。

战国早期的陈逆簋：“以乍(作)毕元配季姜之祥器……乍(祚)鬲永命。”“乍”既借为“作”，又借为“祚”。

曾侯乙鉴缶：“曾侯乙作(作)時甬冬。”“作”假借“作”为之。

郭店《成之闻之》：“君衿冕而立于作(阼)，一宫之人不胜(7)其敬。(8)”“作”当读为“阼”。

上博二《容成氏》：“汤乃尊为征复(籍)，以征关市。(36)”“复”用为“籍”。

上博六《用曰》：“人无文，言以为章。起事乍(作)志，觐其有中成。(18)”“乍”读为“作”。

在上引出土文献资料中，假借为“作”的“乍”、“祚”、“祚”、“祚”、“酢”、“作”、“阼”、“籍”诸字皆为从母字。尽管从西周时期到战国出现“𠄎”、“𠄎”、“𠄎”、“𠄎”等“作”字异体(“作”字见于睡虎地秦简，作“𠄎”(秦律杂抄49)、“𠄎”(为吏之道24)，但此时“作”与“乍”并未完全分化，“作”仍读为从母。《说文》：“作，起也。从人从乍。”许慎不说“乍声”，则很可能“作”此时已音变为精母。

“𠄎”本亦为从母字。上引师𠄎鼎铭文：“伯大师不自乍(𠄎)小子。”“𠄎”假借“乍”为之；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酢(𠄎)伪者，𠄎(32)二甲。(33)”“酢”用为“𠄎”；战国晚期的中山王𠄎鼎假借“𠄎”为“作”；武威汉简《仪礼·特牲甲本》：“受爵，𠄎(酢)于主人。主人降作(阼)阶，西面拜宾，如初。”又《甲本有司》：“尸降筵，受三献爵，酌以𠄎(酢)之。”“𠄎”、“阼”、“𠄎”在西汉晚期还读从母。

𠄎借𠄎𠄎(精)——𠄎(从)

甲骨文“𠄎”字作“𠄎”“𠄎”“𠄎”，像人踏耒形，又作“𠄎”“𠄎”“𠄎”，刘钊先生谓“𠄎”即“灾祸”之“𠄎”字。金文“𠄎”字作“𠄎”

“𦉳”“𦉴”，都已在甲骨文“𦉵”字的基础上加“昔”为声符。“昔”字甲骨文作“𦉶”“𦉷”，金文作“𦉸”“𦉹”“𦉺”等形。“昔”从“𦉵”声。^① 甲骨文“灾”字作“𦉻”，又从才声作“𦉼”，可知“灾”本当读为从母。从“𦉵”得声的“昔”、“藉”，亦读为从母。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人无故鬼昔（藉）其宫，是是丘鬼。（29 背壹）”“昔”就读为“藉”。

战国古玺有“断”字，作“𦉽”（玺汇 0847）。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曰：“葆子□□未断而（109）诬告人，其罪当刑城旦，耐以为鬼薪而鋈足。藉（断）葆子之谓也。（110）”整理小组谓“藉”读为“断”。“断”最初也当读为从母。《说文》：“断，斩也。从斤昔声。”“斩”乃声训。据我们考察，“斩”在汉初还读从母，则“断”音转为精母当在汉代后期。

“借”字最早见于战国玺印，作“𦉾”（玺汇 2545）“𦉿”（玺汇 2805），在玺文中读为“藉”。《说文》：“借，假也。从人昔声。”又“藉，帝藉千亩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谓之藉。从未昔声。”《汉书·文帝纪》：“其开藉田，朕亲率耕。”注引韦昭云：“藉，借也，借民之力以治之，以奉宗庙，且以劝率天下。”可证“借”、“藉”同源。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六·伯有章》：“悬钟而长（39）饮酒，是怒其心而藉（借）之间，非□也。（40）”《战国纵横家书五·苏秦谓燕王章》：“今日愿藉（借）于王前。（49）”“藉”通“借”。银雀山汉简《论政论兵之类》：“故曰：‘假而又假，果有天下，藉而又藉，果成王霸，假藉务其道存乎……’（0341）”“藉”与“假”对文，可知此“藉”用为“借”。据此，我们认为“借”至少在汉初还读为从母。

“諝”字见于战国晚期的二年盩鼎，作“𦉿”，在铭文中用作人

^① 刘钊《释甲骨文藉、羲、螳、敖、戟诸字》，《吉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名。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二一·苏秦献书赵王章》：“且五国之主尝合横谋伐赵，疎分赵壤，著之盘孟，属之祝諧（籍）。（232）”“諧”读为“籍”。“諧”当与“藉”音同，读入从母。《说文》：“諧，大声也。从言昔声。读若笱。𠵼，諧或从口。”据此可知“諧”在许慎时代可能已读为精母。

《说文》：“𠵼，长胫行也。从足昔声。一曰𠵼𠵼。”《释名·释姿容》：“𠵼，藉也，以足藉也。”“藉也”既为声训，又为义训。“𠵼”与“藉”、“借”同源，本读入从母。

15. 锡部

精母：賁簣𠵼𠵼積跡績/脊𠵼踏/跡(迹)

賁積跡績簣𠵼𠵼脊(精)——束(心→從→清)

賁，《说文》：“求也。从貝束声。”甲骨文已有“賁”字，作“𠵼”（合 22226）“𠵼”（合 21306 乙）。西周金文作“𠵼”（旗作父戊鼎）“𠵼”（缶鼎）“𠵼”（兮甲盘）。战国文字“賁”仍从束声作“𠵼”（秦公簋）。上博三《仲弓》：“今之君子復过攷斫（賁），难以入諫。（20A）”“斫”即“析”字异体。中古“析”为心母锡部字，“賁”为精母锡部字，音极近。“賁”很可能最初是心母字，后音转为从母，再转为精母，经历两次音变。

簣，《说文》：“床栈也。从竹賁声。”包山楚简：“一收床有策（簣）。（260）”“策”读为“簣”。

積，《说文》：“積，聚也。从禾賁声。”秦商鞅方升“積”字作“𠵼”。西周早期的沈子它簋盖有字作“𠵼”，从宀束声，可隶作“𠵼”，借为“積”，史墙盘有字作“𠵼”，五年召伯虎簋作“𠵼”，可隶作“諫”，皆用为“積”，郭店《忠信之道》：“忠𠵼（積）则可亲也，信𠵼（積）则可信也。忠（1）信𠵼（積）而民弗亲信者，未之有也。（2）”“𠵼”字作“𠵼”，在简文中都用作“積”。“𠵼”、“諫”、“𠵼”皆从束声。

“蹟”为“迹”之异体。《说文》：“迹，步处也，从辵亦声。蹟，或

体。𡗗，籀文。”师寰簋铭：“弗𡗗我东国。”“𡗗”即“迹”。秦公簋：“宓宅禹責(迹)十又二公。”“責”假借为“迹”。“迹”在汉代变从亦声，作“𡗗”(马王堆·老甲 144)“𡗗”(居延汉简甲 49)。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迹”字作“𡗗”，可寻其声旁由“束”变“亦”之迹。

績，《说文》：“缉也。从系責声。”五年师旂簋铭曰：“敬勿败𡗗。”“𡗗”用为“績”。

从上引资料来看，“責”、“蹟”(迹)从束声，“績”假借从束声的“𡗗”、“諫”、“𡗗”，“績”假借从束声的“速”，“質”假借“策”。“束”、“策”为清母字。不过，一些异文、声训资料表明“束”很可能本是心母字，后变为从母，而后再音转为清母。如：

郭店《老子》甲本：“孰能浊以束者，将徐清。”“夫亦将知足，知足以束，万勿将自定。”马王堆帛书乙本“束”作“静”，甲本作“情”，傅奕本作“靖”。“静”、“情”、“靖”皆为从母字。同时，“静”、“情”、“靖”皆从青声，“青”又从生声。“生”为心母字。

𡗗，《说文》：“齐也。从女責声。”段注：“谓整齐也。”以“齐”训“𡗗”乃声训。“齐”为从母脂部字。《说文》：“𡗗，发有巾曰𡗗。从巾責声。”《释名·释首饰》：“𡗗，蹟也，下齐眉蹟然也。”《说文》：“𡗗，齿相值也。”“𡗗”、“𡗗”、“𡗗”同源。“𡗗”亦为从母字。

长沙子弹库帛书丙篇曰：“壮，不可以筑室，不可以□，□腓不复，其邦又大乱。娶女，凶。”“腓”字作“𡗗”，朱德熙先生谓“腓就是膾字。”^①睡虎地秦简“脊”字作“𡗗”(法律答问 75)，“責”字作“責”(效律 60)，可证“脊”所从之“𡗗”为“束”，即“脊”为从月束声之字。^②所以“𡗗”当释为“脊”。帛书“脊”假借为“膾”(瘠)。马王堆帛书《战

① 朱德熙《长沙帛书考释(五篇)》，《古文字研究》第 19 辑，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

②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13 页。

国纵横家书·苏秦谓齐王章》：“薛公相脊(齐)也，伐楚九岁，攻秦三年。(67)”“脊”当读为“齐”。银雀山汉简《阴阳时令占候之类》：“多戮死四不时四足脊(瘠)五不……(0897)”又《晏子·三》：“……毋言其名出，既事者兼月脊(瘠)者……(0942)”“脊”皆读为“瘠”。武威汉简《仪礼·有司》：“折正膾(脊)一，正胁一，肠一，胃一……脰膾(脊)一，衡膾(脊)一……(10)背”“膾”假借为“脊”。“齐”、“瘠”、“膾”皆为从母字。

因此我们认为“束”以及从束声的“贲”、“積”、“蹟”、“簣”、“績”、“嬖”、“贖”、“齷”、“脊”等字最初是心母字，后来经历了由心母到从母，最后才变为精母。从我们所见的资料来看，至少在西汉晚期，它们还是从母字。

16. 月部

精母：祭際際療蕪

庄母：札

祭際(清→精)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以蔡(祭)，上下群神飨之，乃盈志。(3正貳)”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卫献公出亡章》：“献公使公子段谓宁召子曰：‘苟人我□政必宁(53)氏之门出，蔡(祭)则我也。’(54)”“蔡”皆当读为“祭”。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记有地名“祭阳”，即“蔡阳”。整理小组注曰：“比阳、平氏、胡阳、蔡阳属南阳郡。”马王堆竹简《天下至道谈》：“乃祭(察)八动，观气所存，乃知五音，孰后孰先。(48)”“审察五音，以知其心；审祭(察)(50)八动，以知其所乐所通。(51)”“祭”皆当读为“察”。《春秋繁露·祭义第七十六》：“祭者，察也，以善逮鬼神之谓也，善乃逮不可闻见者，故谓之察。”“蔡”、“察”皆为清母字，可证至少在汉初“祭”还读为清母，其精母读音当晚出。

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筋灸经·足泰阴筋》：“出大指内廉骨蔡(際)，出内踝上廉……(16)”“蔡”读为“際”。可知“際”本亦读为清母。

17. 质部

精母：卩即節聖

庄母：櫛

卩即節聖(精)——次(从)

甲骨文有字作“𠂔”（合 20470）“𠂕”（合 21312），象人曲膝跪跽之形。屈万里先生疑此字乃跪跽字初文，认为此字与《说文》“卩”字，形虽相似，义实悬殊。^①何琳仪先生谓“关节”之“节”乃“卩”之孳乳字。^②从卜辞用例来看，“𠂔”多用为祭名，为“卩”之省。古文字从𠂔之字，如“𠂔”（即）、“𠂔”（印）、“𠂔”（卣）等，后世都从卩，但与《说文》训为“瑞信也”之“卩”显非一字，只是“𠂔”与小篆“卩”作“𠂔”形近，故而混同。

甲骨文“即”字作“𠂔”（合 32019）“𠂔”（合 29707）“𠂔”（合 29708），金文作“𠂔”（孟鼎）“𠂔”（颂鼎），象人就食于簋之形。所从之“𠂔”象人跪跽之形，古文字从“人”与“𠂔”同，故甲骨文“即”为会意字，而非从卩声。《说文》以为“即”从卩声，是就混同的形体立说。从古文字通假资料来看，“即”当读与“次”同。

长由盃：“穆王飨醴，即（次）井伯、大祝射。”

交鼎：“交从畀，逌^③即（次）王。”

中山王霁方壶：“敢在得贤，其即（次）得民。”“即”皆当读为“次”。

郭店《性自命出》：“其居即（次）也旧，其反善复始也（26）慎……（27）”，又《老子》丙本：“大上下知有之，其即（次）亲譬之，其即（次）畏之，其即（次）悔之。（1）”“即”皆读为“次”。

① 参看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 0301 条屈万里说，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340 页。

②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 1095 页。

③ “逌”字从陈剑释。参见陈剑《据郭店简释读西周金文一例》，《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年，第 378～394 页。

上博二《容成氏》：“成德者，吾说而伐之，其即(次)，吾伐而代之。(50)”“即”读为“次”。

战国尖足布有字作“榆即”，圆肩圆足三孔布有字作“鴈次”，裘锡圭先生释“榆即”为“榆即”，读为“榆次”，释“鴈次”为“鴈次”。榆次、鴈次并为赵国地名。^①张颌先生也主张“榆次”的地望在战国时属赵国。^②

《说文》“逄”之古文作“聖”，亦可证“即”、“次”本同音。

上文已证“次”本为从母字，则“即”本亦读为从母。《类篇》：“即，节力切。《说文》：‘即，食也，一曰就也。’亦姓，隶作即。即，又疾力切，又子悉切，疾也。”《集韵》“即”下有才资、疾力二切，皆可证“即”有从母一读。

郭店《成之闻之》：“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其生而未有非之節(次)于而(?)也，(26)则犹是也。(27)”“節”当读作“次”。《性自命出》：“其居即(次)也久，其反善复始也(26)慎，其出入也顺，始其德也。(27)”“即”，上博一《性情论》作“節”，读为“次”。凡此可证“節”和“即”有着同样的音变轨迹。郭店《性自命出》：“有其为人之邈(節節)如也，(44)不有夫简简之心则採。(45)”“邈”上博一《性情论》作“儻”。“儻”从鴈声，“鴈”为定母支部字。据此，“即”、“節”的上古声母当拟为 ?sl-。

18. 物部

精母：卒啐倅綷啐醉粹粹糈

甲骨文“卒”与“衣”同字，如：

丁丑卜王贞余勿_卒占余哉三月。 《合》20332

乙亥卜争贞生七月王勿_卒入哉。 《合》5165

① 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② 张颌《“贝丘”布文字辩证》，收入《张颌学术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26页。

贞勿归戠。 《合》16102













□寅卜王贞勿值戎戠。 《合》7266

贞勿燎于河。 《合》14572 正

甲辰卜戠贞王勿入于稭入 《合》9523

贞王勿入戠。 《合》1535

以上诸辞皆用为“卒”，读为“粹”。^①

甲骨文有字作（合 30990）（合 30993）等形，《类纂》隶作“裨”。又作（合 32263）（合 34238）（英 2336）（英 2414）等形，《类纂》无释，裘锡圭先生认为此亦为“裨”，上列诸形皆当为“卒”字异体，字从衣聿声。^②郑张尚芳先生赞同此说，并谓“卒”之读音来自 sl'ud。西周金文“卒”仍与“衣”同字，战国时期始见“卒”字，作（外卒铎）。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二七·麇皮对邯郸君章》：“麇皮曰：‘臣之□□不足（319）恃者以其俞也。彼其应臣甚辨，大似有理。彼非卒（粹）然之应也。’（320）”“卒”亦当读为“粹”。上博简《周易》有字作（简 42），可隶作“粹”，整理小组认为此同“粹”字。马王堆帛书《周易》作“卒”。“粹”、“卒”皆当读为“萃”。郭店楚简《缁衣》：“大雅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粹）疽。’（7）”“卒”当读为“粹”。“粹”、“萃”、“瘁”皆为从母字。“萃”在楚系文字中皆从皀声作（曾 9）（望山 2·13）（信阳 2·2）（包山 269），“皀”为从母字，可为“卒”本读为从母之旁证。阜阳汉简《诗经》文：“□□自出，父旖母旖，畜我不萃（卒），胡能有□？（25）”“萃”当读为

①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说甲骨卜辞中“戠”字的一种用法》，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4页；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第2724页；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多友鼎的“卒”字及其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37页。

② 裘锡圭《释殷墟卜辞中的“卒”和“裨”》，《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

“卒”。银雀山汉简《孙臆兵法·陈忌问垒》：“用此者，所以应卒（猝）窘，处隘塞死地之中也，是吾所以取庞□而擒太子申也。（0276）”“卒”当读为“猝”。《史记》中用“卒”为“猝”之例有 19 例，如《史记·礼书》：“卒（猝）如飘风。”《仲尼弟子列传》：“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猝）；兵不先辨不可胜敌。”《滑稽列传》：“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猝）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可知一直到西汉“卒”还读为从母。

以上诸例可证“卒”最初本当读为从母，其精母之音读晚出。

战国时期齐国的苛意匱铭曰：“蔡倅（卒）铸苛意。”“倅”用为“卒”。则“倅”当与“卒”同读为从母。

《说文》：“醉，卒也。卒其度量，不至于乱也。一曰溃也。从酉从卒。”段玉裁注：“此以会意包形声。卒亦声也。”《说文》谓“醉，卒也”乃声训。马王堆帛书有“醉”字，作“𩚑”（阴阳五行甲篇 127）“𩚑”（养生方 62）。《养生方》里“醉”当读为“淬”。《五十二病方》中又借“卒”为“淬”，可知“醉”、“卒”同音。上文已论及“卒”在马王堆帛书、竹书中当读为从母，以此可推定“醉”亦读为从母。

从甲骨文中“卒”还有从聿声的异体字“肄”。从卒声的“碎”、“淬”、“粹”、“悴”、“粹”、“粹”一直到中古还是心母。殷寄明先生认为“碎”、“甄”、“醉”、“粹”与“琐”同源，来自心母。^①因此，我们认为“卒”及从卒声之字的上古音可拟为 sl-。

19. 緝部

精母：𠂔△緝緝緝

庄母：戢

甲骨文“𠂔”字作“𠂔”（屯 2118），《说文》：“𠂔，众口也。从四口，读若戢，又读若嘏。”“𠂔”在甲骨文时代读音已不得而知，据《说文》可

^① 殷寄明《汉语同源字词丛考》，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第323～324页。

知在许慎时代已读为精母。

“亼”是由古文字倒置的口“𠂔”变为尖角而写作“𠂔”演变而来的。《说文》：“亼，三口也。从人、一，象三合之形。读若集。”“集”为从母字，说明“亼”在东汉还读为从母。

《说文》：“縑，合也。从系从集，读若捷。”“捷”为从母字。《广韵·叶韵》：“縑，合也，远方物也。疾叶切。”《广韵·缉韵》：“縑，合也，又蛮夷货名。子入切。”据《说文》可知“縑”在许慎时代还读为从母。

“聿”字见于郭店楚简，作“𠂔”（鲁穆公问子思 2）。简文：“公不悦，聿（揖）而退之。”“聿”假借为“揖”。“揖”为影母字。《说文》：“戢，藏兵也。从戈聿声。”又“楫，船棹也。从目聿声。”又“淅，雨下也。从水聿声。”“聿”、“戢”、“楫”、“淅”、“𠂔”、“缉”、“辑”的上古音很可能为 $sq-$ ，后有的变为清母，有的变为从母。“戢”、“楫”、“淅”、“𠂔”可能在许慎时代还是清母字，其精母之音读晚出。

20. 叶部

精母：接接萋鯨/婕/𦉳

接接萋鯨（精）——妾（辛，心）

甲骨文“妾”字作“𠂔”（合 663）“𠂔”（合 904 正），何琳仪先生认为“妾”从辛声。^①虽然“妾”与“辛”韵部远隔了些，但从妾的字都有心母读音，如“𦉳”（萋）、“𦉳”（簑）、“𦉳”、“𦉳”、“𦉳”、“接”，所以“妾”读清母之读音很可能是由心母音转而来的。“接”、“𦉳”、“萋”之读音当有同样来源，即由心母音转为清母，再转入精母。上博二《容成氏》：“舜于是乎始免笠开（肩？）耨，萋（芟）芥而坐之。（14）”“萋”当读为“芟”，“芟”为心母字。武威汉简《仪礼·服传》乙本：“诸侯之大夫时妾见乎天子。（29）”今本“妾”作“接”，可知当时“接”还读为清母。“鯨”始见于《说文》，当是“妾”由心母转入清母之后产生的字。《说文》谓“鯨”从妾声，可知“鯨”最初读为清母，其精母之音读后出。

^①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436页。

战国时期楚音中“接”读与“执”同，如包山楚简：“王所舍新大厩以畜蔑之田，南与郢君执（接）疆，东与陵君执（接）疆，北与鄢易执（接）疆，西与鄢君执（接）疆。（154）”汤余惠先生谓“执”读“接”。^①“执”为章母字，这很可能反映了当时楚音的一个特点，即一部分精母字读为章母。

婕(精)——走(从)

《说文》：“婕，女字也。从女，走声。”“走”为从母字，又《集韵·叶韵》：“婕，美也。疾叶切。”可证“婕”本当读为从母，其精母之音读产生在东汉以后。

币(精)——师(心)

“币”始见于春秋金文，作“𠄎”（庚壶）、“𠄎”（曾子仲宣鼎）。在春秋战国“币”皆用为“师”，无一例外。马王堆帛书中“币”仍读为“师”，可知“币”一直到汉初仍读为心母脂部。《说文》“币”与“师”是形音义迥异的两个字。“币”读入精母叶部。

21. 蒸部

精母：曾憎譜增罍甑鬲

曾增憎增(精)——曾(从)

甲骨文“曾”字作“𠄎”，象蒸熟食物之具，即“甑”之初文。所从之“田”象釜鬲之算，“𠄎”象蒸气逸出。《说文》：“甑，甑也。从瓦，曾声。𠄎，籀文从甑。”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蒸米为饭器，先以算蔽甑底，加米其上，而饩之，而馏之。”“甑”的特点就是用算隔层，金文作“𠄎”“𠄎”“𠄎”“𠄎”等形，在“田”下加“𠄎”或“𠄎”（“𠄎”是在“𠄎”上加饰笔“一”）就是为了突出“田”分层的作用。“𠄎”与之同源，《类篇》：“𠄎，复也。”“曾”、“甑”、“𠄎”的词根应该是“層”。“層”为从母字。因此我们认为“曾”的从母读音早于精母。古文字资料也可以证

^① 汤余惠《战国铭文选》，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50页。

明这一点。

甲骨文“曾”或用为地名，或用为祭名。用为地名的“曾”因地望不详，读音也就不得而知了。用为祭名时即“赠”之初文。^①西周中期的段簋：“曾（赠）王蔑段历。”匍盃：“曾（赠）匍于束麇贲韦两赤金一钧。”春秋时期的吴王光和钟铭曰：“吴王光穆曾（赠）临金。”“曾”皆用为“赠”，“赠”为从母字。西周晚期的曾仲盘：“曾仲自作旅盘。”“曾”指夏时古国，文献又称缙、鄩。李学勤先生考定“曾国”即典籍中的随国。^②于豪亮先生《曾侯乙墓出土于随县解》一文称原有两个姒姓的曾国，一个在今山东枣庄市以东，一个在今河南泌阳县东南，西与申国接壤，南与随国接壤，此曾后为随所灭，随改称曾，犹韩灭郑，徙都于郑，因改称郑。“曾”文献亦作鄩或缙。《通志·氏族略三》：“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鄩。”《国语》《史记》《穀梁传》作“缙”，《左传》、《公羊传》作“鄩”。^③“缙”、“鄩”亦为从母字。凡此亦可证“曾”本读从母。

“曾”乃“甑”之初文，甑有两层，上一层加在釜鬲之上，故从曾声的“增”、“赠”、“贲”、“赠”、“鬪”、“赠”、“譜”等字都有加、高之义。^④《说文》：“增，益也。从土曾声。”王筠《说文句读》：“‘曾’下虽云‘词之舒也’，而‘会’下则曰：‘曾益也。’知增即曾之分别文。”“增”乃“曾”之孳乳分化字。“增”字见于睡虎地秦简，作“𡗗”（秦律 24）。西周中期的卫簋铭曰：“王曾（增）命卫，易赤市、攸勒……”西周晚期的辅师斝毁云：“今余曾（增）乃令。”“曾令”即“增命”；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函》，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7～28页。

② 李学勤《曾国之谜》，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46～150页。

③ 于豪亮《曾侯乙墓出土于随县解》，收入《于豪亮学术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5～61页。

④ 曾昭聪《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述论》，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24～27页。

书五·苏秦谓燕王章》：“假臣孝如增(曾)参，信如尾生，廉如伯夷……(49)”“增”用为“曾”；又《战国纵横家书一六·朱己谓魏王章》：“夫增(憎)韩，不爱安陵民，可也。(159)”“增”读为“憎”，而《苏秦献赵王章》“憎”又假“曾”为之，可知“增”、“憎”、“曾”音同，都读为从母。

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称》：“行曾(憎)而索(154上)爰，父弗得子。(154下)”又《战国纵横家书二一·苏秦献赵王章》：“今足下功力非数加于秦也，怨毒积怒，非深于齐，下吏皆以秦为忧赵而曾(憎)齐。(225)”“曾”皆假借为“憎”。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五·晋献公欲得隋会章》：“魏州余果与隋会出，晓朝赠策(29)，曰：‘□□吾赠(赠)子，子毋以秦□□人，吾谋实不用□。’(30)”“赠”当读为“赠”，可知“赠”本当读为从母。

22. 冬部

精母：宗综

甲骨文“宗”字作“宗”(合 34045)“宗”(合 13534)，象屋中立神主形。卜辞中既指祭祀祖先的宗庙，又指殷先王或殷先王集合称谓“丁宗”、“大宗”、“小宗”、“中宗”等。金文作“宗”(保卣)“宗”(文考日己方彝)“宗”(作宗宝彝卣)“宗”(中山王鬲壶)。《说文》：“宗，尊祖庙也。从宀从示。”“宗”、“尊”反映了古人对祖先的崇拜，与“崇”同源，本当读为从母。上博简《容成氏》：“耆、宗(崇)，密须氏。(46)”“宗”就读为“崇”。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昔者文王军宗(崇)，能取而弗灭，以申其德也。(8)”“宗”即“崇”，指周文王伐崇事。《左传·僖公十九年》：“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阜阳双古堆汉墓《仓颉篇》：“宗(崇)幽不识。(C009)。”武威汉简《仪礼·甲本燕礼》：“歌‘南有嘉鱼，生宗立。’”今本“宗”作“崇”。此为西汉晚期“宗”还读入从母的力证。从“宗”的字除“综”外皆为从母字，如“淙”、“棕”、“竇”、“琮”、“崇”等，亦可为之佐证。“综”始见于《说文》。《说文》：“综，机缕也。从系宗声。”

23. 东部

精母：縱縱縱縱縱/總/變變變變變

縱(精)——從(从)

西周直至春秋金文中“縱”皆假借“從”为之，西周金文如毛公鼎：“鬻鬻四方，大從(縱)不靜。”蔡簋：“汝毋弗善效姜氏人，勿使敢有疾，止從(縱)獄。”春秋金文如洹子孟姜壶：“齐侯既济洹子孟姜丧，其民都邑懂寔，无用從(縱)尔大乐。”《尔雅·释詁》：“縱，乱也。”“縱”又训为进击。如不殿簋：“戎大恫，從(縱)追汝，女及戎大敦搏。”多友鼎：“……從(縱)至追搏于世，多友或右，折首执讯。”师同鼎：“羿畀其井，师同從(縱)，斩首执讯。”诸例中之“從”皆当读为縱，训为“进击”。^①

“縱”是“從”的后起分化字。战国亡縱熊节有“縱”字，作“縱”，睡虎地秦简“縱”字作“縱”(法律答问 63)，但我们认为战国时期“縱”仍读与“從”同，如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從(縱)仁、圣可与，时弗可及嘻。(15)”“從”用为“縱”。睡虎地秦简《封诊式》：“某头左角刃瘡一所(56)，背二所，皆從(縱)头背。(57)”“從”当读为“縱”；又如诅楚文：“令楚王熊相，康回无道，淫口甚乱，宣麥竟筮(縱)，变輪盟约……”“筮”当读为“縱”。马王堆帛书“縱”皆假“從”为之，如《战国纵横家书一四·苏秦谓齐王章(四)》：“攻秦之事成，三晋之交完于齐，齐事縱橫尽利……(120)”《战国纵横家书一五·须贾说穰侯章》：“楚、赵(144)怒于魏之先己也，必先争事秦，從(縱)已散而君后择焉。(145)”“從”皆用为“縱”。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启广》《启纵》中“從”皆读为“縱”。武威汉简“用白羊矢乾之十余石置其坑中，從(縱)火其上……(49)”《尹湾汉简》：“涕泣從(縱)橫。(9)”“從”皆当读为“縱”。《史记》借“從”为“縱”有 22 例。^②武威医简“用白羊矢乾之十余石置其坑中，從(縱)火其上……(49)”可证直到东汉早期，“縱”还读为从母。

① 王辉《古文字通假释例》，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年，第549页。

② 易国杰《〈史记〉通假字汇释》，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4～95页。

𦍋 𦍌 𦍍 𦍎 𦍇 𦍈 (精)——兕 (晓)

战国文字“兕”字作“𦍋” (玺汇 0094) “𦍌” (睡虎地·日乙 208), 唐兰先生指出“兕”即“𦍍”。^① “𦍍”字小篆作“𦍍”形, 就是在“兕”字人形腿部加动符而成的。《说文》所收“稷”字古文作“𦍍”, 小篆也变作“𦍍”可证。楚简“聰”字作“𦍍” (郭店·五行 15) “𦍍” (上博二·容成氏 12), 可隶作“𦍍”、“𦍍”, 从兕。包山楚简遣策有字作“𦍍” (简 255), 可隶作“𦍍”, 读为“蕙”。马王堆汉墓竹书“𦍍”字作“𦍍” (一号墓遣策 150) “𦍍” (三号墓遣策 129), 亦读为蕙。裘锡圭先生认为马王堆汉墓竹简以“𦍍”为“蕙”, 可能是由于楚文字的影响。^② 何琳仪、裘锡圭两位先生都认为“𦍍”与“恩”声系可通。^③ 典籍中从𦍍声的“𦍍”和“稷”都与从恩声的“總”字通。凡此皆可证“𦍍”与从𦍍声的“𦍍”、“𦍍”、“𦍍”、“稷”以及“總”、“蕙”、“聰”等的上古音, 当拟为 sqh。

《说文》:“𦍍, 斂足也。从文兕声。”《广雅·释诂三》:“𦍍, 聚也。”王念孙《广雅疏证》:“《陈风·东门之枌篇》:‘越以𦍍迈。’郑笺云:‘𦍍, 總也。’……凡言𦍍者, 皆聚之义也。”胡继明先生指出:“𦍍、𦍍、稷、𦍍、𦍍、𦍍、𦍍、𦍍为一组同源词, 共同的意义核心‘聚集’即是这组

①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 济南: 齐鲁书社, 1981年, 第240页; 裘锡圭先生亦肯定“𦍍”是由“兕”分化出来的, 两者本一字, 文中裘先生还指出石鼓文“作原”石“𦍍”字作从木𦍍声之形, “𦍍”旁作“𦍍”, 可资佐证。参看裘锡圭《释古文字中的有些“恩”字和从“恩”、从“兕”之字》, 收入《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2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5页。

② 裘锡圭《释古文字中的有些“恩”字和从“恩”、从“兕”之字》, 收入《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2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7页。

③ 何琳仪, 《郭店楚简选释》, 收入黄德宽等, 《新出楚简文字考》,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44~63页; 裘锡圭《释古文字中的有些“恩”字和从“恩”、从“兕”之字》, 收入《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2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第4~7页。

同源词的核义素。”^①

總，《说文》：“聚束也。从糸总声。”又“蔥，菜也。从艸总声。”“蔥”是从聚而生的菜；又“燧，燃麻蒸也。从火总声。”段注：“麻蒸，析麻中幹也，亦曰菼。菼一作廢。古者烛多用苇。郑注周礼曰：燧，炬也。许曰：菼，束苇烧之也。”可见“燧”亦有聚束义。又“聰，察也。从耳总声。”“聰”指耳朵听力敏捷，要做到聰，必须聚精会神，故“聰”亦有聚义。

从形、音、义三方面考虑，“燧、稷、稷、緩、鬃、峻、稷”和“總、聰、蔥、燧”两个词群可以构成一个大的词族。它们皆来自 sqh-，后来有的音转为清母字，有的由清母再转入精母。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十六经·成法》：“夫百言有本，千言有要，万言（123 上）有蔥。（123 下）”银雀山简《五议》有：“百言有本，千言有要，万言有總。”可知帛书“蔥”当读与“總”。“蔥”为清母字。由此看来，汉初“總”就音转为清母。

24. 阳部

精母：葬臧將蔣漿獎牂獎醬蕘肝

庄母：妝莊裝壯

臧葬牂壯莊裝妝將（精）——爿（从）

甲骨文有字作“𠄎”（合 12836 正），于省吾先生释此字为“臧”，认为在卜辞中用为臧否之义。^② 西周及春秋战国金文“臧”字作“𠄎”（甚謏臧鼎）“𠄎”（纪伯子寤父盨）“𠄎”（臧孙钟）“𠄎”（曾子旂鼎）等形，即“戕”字，“戕”为从母字，可知“臧”本当读为从母。战国简牍帛书资料也可证明这一点。

上博简“臧”字多从口作“𠄎”，又作“𠄎”（周易 7），可隶作“𠄎”。

^① 胡继明《〈广雅疏证〉同源词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129页。

^②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臧》，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52页。

“臧”从爿声，很可能是“臧”字异体。上博五《季康子问于孔子》：“丘闻之，牀(臧)文仲有言曰……(9)”“臧”假借“牀”为之，“牀”为从母字。

楚简“藏”字作“𦉳”(郭店·老子甲 36)，可隶作“𦉳”，从貝臧声；或作“𦉳”(上博一·孔子诗论 19)，可隶作“臧”，从宀臧声；或作“𦉳”(上博三·周易 40)，从艸臧声。楚简中，“𦉳”用作“藏”，如郭店《老子》甲本：“厚𦉳(藏)必多亡。(36)”《太一生水》：“是故太一𦉳(藏)于水。(6)”“臧”假借为“臧”，如上博一《孔子诗论》：“《木瓜》有藏(臧)愿而未得达也(19)。”“藏”假借为“壯”或“牀”，如上博三《周易·夬》“九三：藏(壯)于頄，有凶。(38)”马王堆帛书《周易》“藏”(壯)作“牀”。可见“藏”、“臧”、“壯”同音，都读入从母。定州八角廊汉简《论语》：“舍之则臧。(144)”“臧”字今本作“藏”。

睡虎地秦简“臧”字作“臧”(日乙 46)“臧”(日甲 80 背)等形。简文中“藏”均假借“臧”为之，如《日书》甲种：“水窠北出，无臧(藏)货(17 背三)。”《日书》乙种：“大疵在臂，臧(藏)于瓦器间，旦闭夕启西方。(71 背)”《秦律十八种·内史杂》：“毋敢以火入臧(藏)府、书府中。吏已收臧(藏)，官啬夫及吏夜更行官。毋火，乃闭门户。令令史循其廷府。即新为吏舍，毋依臧(藏)府、书府。(198)”“臧”皆当读为“藏”。

马王堆汉墓帛书及竹书“臧”字作“臧”(五行 217)“臧”(阴甲)“臧”(十问 3)等形。文中“藏”亦皆假借“臧”为之，如《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五行》：“聪也者圣之臧(藏)于耳者也。明也(242)者智之臧(藏)于目者也。(243)”《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本伐》：“储库(126 下)臧(藏)兵之国，皆有兵道。(127 上)”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军吏缘边县道，得和为毒，毒矢谨臧(藏)，节迨外蛮夷盗，以假之，事已辄收臧(藏)。(19)”《二年律令·户律》：“臧(藏)□已，辄复臧闭封臧(藏)，不从者罚金各四两。

(333)”张家山汉简《引书》：“春产、夏长、秋收、冬臧(藏)，此彭祖之道也。(1)”《尹湾汉简》：“蛟龙蛰而深臧(藏)，良马仆于衡下。(130)”“臧”用为“藏”。“臧”皆当读为“藏”，张家山汉简《脉书》：“凡三阳，地气也，死脉也，腐臧(臧)烂肠而主杀。(51)……五臧(臧)虚则玉体利矣。(53)”“臧”当读为“臧”。《说文》：“臧，善也。从臣戕声。”“戕”为从母字，可证一直到东汉“臧”还读为从母。

从上引资料来看，“藏”本与“臧”同字，皆假借“藏”为之。楚简虽然已经出现“藏”的三种异体，但“藏”、“臧”还通用，二字还没有真正分化，这是因为它们的语音还没有分化，二字还同音。《说文》：“臧，善也。从臣戕声。”《说文新附》：“藏，匿也。臣铉等按：《汉书》通用‘臧’字。从艸，后人所加。”“臧”、“藏”在汉代晚期还同音，“臧”音转为精母当在东汉以后。

甲骨文“葬”字作“𣎵”（屯 4514）“𣎵”（屯 4514）“𣎵”（屯 2273）“𣎵”（合 17176）“𣎵”（合 17171）“𣎵”（合 526），字所从之“𣎵”即表意，又标音。“𣎵”为从母字。杨树达先生云“藏死曰葬”，^①“葬”的本义指将死人藏起来，因此“藏”是“葬”的语源。“藏”是从母字，故“葬”本亦为从母字。中山王𣎵兆域图“葬”字作“𣎵”。包山楚简作“𣎵”（简 155），从死臧声，又作“𣎵”，从死藏声，可资佐证。

壯，《说文》：“大也，从土𣎵声。”从古文字资料来看，许慎所言不误。“壯”字，中山器作“𣎵”，从𣎵从土。金文又有字作“𣎵”（毛公鼎）“𣎵”（虢季子白盘）“𣎵”（趯亥鼎），刘钊先生认为此字极可能为“壯”字异体，“𣎵武于戎工”，即“壯武于戎工”，宋𣎵公即宋莊公。^②上博《周易》：“九三：藏(壯)于頄，有凶(38)。”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五行》：“弗能进，各各止于其里耳矣。充其不壯(藏)尤害人

①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页。

②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3页。

之心，而仁覆四海。(308)“壯”皆当读为“藏”；又帛书《周易·系辞》：“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故知鬼神之情(情)壯(状)。(6行下)”汉代晚期的定州八角廊汉简《论语》：“临之以状(壯)，则忠。(27)”“状”字今本作“壯”，“状”为从母字；银雀山汉简《守法守令》：“…屋壯(墙)垣及家人室物、器械，可以给城守者尽。(1892)”“壯”当读为“墙”，“墙”为从母字；郭店《老子》甲本：“物蹙则老，是谓不道。(35)”“蹙”为“臧”之繁体，“物蹙”即“物壯”。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丙篇有“臧(壯)柰□”一节。“臧”即《尔雅·释天》十二月名之“壯”，指秋八月。上文已论及“藏”、“臧”、“壯”同音。“臧”在东汉还读为从母，则“壯”当亦读为从母，其精母之读音晚出。

春秋晚期的余刺子痈子廌鼎铭曰：“余郑臧公之孙。”“郑臧公”即郑莊公；上博四《曹沫之阵》中鲁莊公之“莊”多假借“臧”为之，作“臧”(简1)，或作“臧”，可隶作“臧”，从酉月声；郭店《穷达以时》：“秦穆(7)孙叔三斥擲思少司马，出而为令尹，遇楚臧(莊)也。(8)”“楚臧”即“楚莊”。

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祝曰：‘帝有五兵，尔亡。不亡，泻刀为裝(戕)。”即唾之，男子七，女子二七。(381)”“裝”当读为“戕”，读入从母。

甲骨文“妝”字作“𠄎”(合5652)“𠄎”(合18063)，卜辞中用为人名。郭店《缁衣》：“叶公之顾命云：‘毋以小谋败大(22)作，毋以嬖御塞妝(莊)后，毋以嬖士塞大夫、卿士。’(23)”“妝”当读为“莊”。上文已证“莊”在东汉还读为从母，“妝”从月声，“月”亦为从母字，则“妝”很可能最初就读为从母，其精母之读音后出。

甲骨文“將”字作“𠄎”(合9377)“𠄎”(合15885)，又作“𠄎”(合13528)“𠄎”(合27988)，皆从月声。西周金文作“𠄎”(师獸簋)，诅楚文作“𠄎”，加了动符“又”，或作“𠄎”，睡虎地秦简作“𠄎”。战国文字或借“醬”为之，如中山王響兆域图“瘡”、中山王響方壶“瘡”、九年将

军戈“𠄎”皆用为“將”。《说文》：“將，帅也，从寸醬省声。”“將”本从月声，当读为从母。上博四《曹沫之阵》第四十简“將軍”之“將”与“莊公”之“莊”均写作“𠄎”，可知“將”与“莊”同音。上文已论及“莊”在楚简里读为从母，则“將”亦然。郭店楚简有字作“𠄎”（语丛四7），与中山王𠄎兆域图读为“藏”的“𠄎”同，字可隶作“𠄎”。简文曰：“彼邦亡𠄎（將），流泽而行。”“𠄎”当读为“藏”，假借为“將”。上博一《孔子诗论》：“《贊（將）大车》之器也，则以为不可如何也。（21）”“贊”为“藏”之异体，此为“將”读为从母的直接证据。

25. 耕部

精母：精婧蜻鵲/晶旌/井邢

庄母：争诤箴诤紜/綉

争诤旌精（精）——静（从）——生（心）

战国楚简中“争”常假借“静”为之，如上博二《从政》甲篇：“行在𠄎而名在人，名难静（争）也。（18）”《紂衣》：“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也静（争）先。（6）”《内豊》：“君子曰：‘悌，民之经也。在小不静（争），在大不乱。（10）’”郭店《老子》甲本：“以其不静（争）也，故天下莫能与之静（争）。（5）”马王堆汉墓帛书用“静”为“争”的例子也很多，如帛书《老子》甲本《德经》：“天下乐推而弗厌，非以其无静（争）与？故天（63）下莫能与静（争）。（64）”《道经》：“水善利万物而有静（争），居众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105）心善渊……夫唯不静（争），故无尤。（106）”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一三·苏秦谓齐王章》：“攻秦之事败，三晋之约散，而静（争）秦，事印曲尽害。（121）……天下之兵皆去秦而与齐诤（争）宋地，此其为（123）祸不难矣。（124）”文中“静”、“诤”皆当假借为“争”，可知“争”、“诤”与“静”同音，读为从母字。张家山汉简《脉书》：“脉盈而洩之，虚而实之，诤（静）则待之。（53）”银雀山汉简《孙臆兵法》：“诤（静）戒毋动。”今本《诗经·邶风·柏舟》“静言思之”，“静”字东汉熹平石经作“诤”（汉石经集成6），皆可证。

“旌”从生声，“生”为心母字，则“旌”最初当读为心母。大约在战国时期，“旌”的读音由心母转入从母，如在曾侯乙墓竹简中写作“旌”，望山二号墓竹简和马王堆汉墓帛书作“菁”，武威汉简《泰射》甲本“旌”作“菁”（简46），皆从青声，而“青”在西周金文中已读为从母。

《说文》：“精，择米也。从米青声。”上博一《紉衣》：“故君子多闻，齐而守之多志；齐而亲之青智。（19）”郭店《缁衣》作“精”。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以有疾，酉少瘳，戌大瘳，死生在子，（165）干肉从东方来，把者精（青）色，巫为姓。（166）”“精”当读为“青”。《为吏之道》：“吏有五善（6 贰）：一曰忠信敬上（7 贰），二曰精（清）廉毋谤……（8 贰）”“精”当读为“清”。马王堆帛书《周易·系辞》：“……故知鬼神之精（情）壯（状）。（7 行上）”又《老子》甲本《道经》“静”既假“情”为之，又借“清”为之，而“精”又假“请”为之。帛书中还有很多用“请”为“情”的例子，分别见于《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明君》，《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四度》、《论》、《顺道》。银雀山汉简“请”皆用为“情”，可知“静”、“情”、“清”、“精”音同。

《说文》：“静，审也。从青争声。”在楚系简牍资料中，“静”可与“争”、“耕”、“诤”相通假，又可以跟“青”以及从青声的“靖”、“清”、“情”、“青”相通假，^①这表明“静”是个双声符字，“青”也是声符。“青”又从生声。“旌”在曾侯乙墓竹简中写作“旌”，望山二号墓竹简和马王堆汉墓帛书作“菁”，武威汉简《泰射》甲本“旌”作“菁”（简46），皆从青声，亦可证“青”从生声。

上博二《容成氏》：“昔舜静（耕）于历丘，陶于河滨，渔于雷泽，孝养父母，以善其亲，乃及邦子。（13）”“静”又读作“耕”；上博三《周易·无妄》：“六二：不诤（耕）而获，不畜之。（20）”上博四《柬大王泊旱》：“太宰答曰：‘君王元君，君善，大夫何用诤（诤）？’（23）”“诤”既可读作“耕”，又可用作“诤”。“耕”为见母字。

^① 白于蓝《简牍帛书通假字字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91~293页。

综合分析上述资料,我们认为“争”及从争声之字、青以及从青声之字(包括“旌”)的上古音可拟为 sk-。从西周金文“青”可读为“静”,又可读作“刑”这一情况来看,大约在汉初音变为从母,东汉以后它们有的仍读从母,有的音转为清母,有的变成精母。

井(精)——阱媯(从)——型刑邢(匣)

甲骨文“井”作“井”(合 9390),为“阱”之初文,非“水井”之“井”。^① 在卜辞中有两种用法。一用为方国名,一用为人名“妇井(媯)”,“媯”作“媯”(合 8993)。甲骨文又有字作“井”(合 18770),沈之瑜先生释为“洪”。他认为“洪”的音声同“阱”。^② 《说文》古文“阱”作“𡿨”,可证沈说。九店楚简:“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是谓交日,利以申户牖、凿菘,行水事,吉。(27)”“菘”字作“菘”,可证甲骨文“井”即“水井”之“井”之初文。金文“井”除了用作方国名“井方”外,还假借为“型”、“刑”、“邢”,可知“井”本当读为匣母。战国文字“型”字有异体作“𡿨”(郭店·老子乙 12)“𡿨”(郭店·缙衣 24),从井声。上博六《用曰》“制法节井(刑)(14)”“凶井(刑)厉政(13)”“五井(刑)不行(4)”,“井”皆用作“刑”。凡此可证“井”本当读为匣母。西周中期的匍盂:“青(邢)公使司使见。”“青公”即金文中常见的“邢公”。同为西周中期的史墙盘铭中“青”又读作“静”。“青”从生声。据此,我们认为“井”、“阱”、“媯”最早的读音当拟为 sg-,后来音变为从母,而“井”之精母读音则可能是由从母 ?z- 塞擦化而来的。

晶(精)——星(心)

甲骨文“星”字作“星”(合 98)“星”(合 10344 正)“星”(合 9615)

① 郑慧生《释“井”》,收入《2004 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29~30 页。

② 参看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 2860 条沈之瑜说,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2858~2859 页。

“𠄎”（合 11504）“𠄎”（合 18648）“𠄎”（合 21419）等形，又从生声作“𠄎”（合 11489）“𠄎”（合 11491）“𠄎”（合 11501）。因为“星”的象形字中作“𠄎”者象三日，所以旧多以为“𠄎”为“晶”的初文，认为“晶”与“星”同字，在甲骨文中并用。^①然而，从甲骨文所作诸形来看，有的从二“〇”，有的从三“〇”，四“〇”，乃至五“〇”；有的作方形的，有的作圆形的，也有作菱形的，并非“日”形，所以我们认为甲骨文作“𠄎”“𠄎”“𠄎”“𠄎”“𠄎”等形皆为“星”字，而非“晶”字。据李学勤先生的研究，卜辞“𠄎”为群星形的象形字，而在宾组卜辞中加“生”声的“𠄎”则读阴晴的“晴”。^②从现在所能见到的古文字资料来看，“晶”最早见于战国楚系文字，如曾侯乙墓竹简“晶”字作“𠄎”（简 179），在简文中“晶”凡三见，皆用为“叁”；郭店楚简“晶”字作“𠄎”（性自命出 15），读为“叁”；上博简中“晶”字大量出现，皆假借为“叁”，无一例外；曾侯乙墓竹简“驂”字作“𠄎”（简 150），从晶。以上例证足以说明当时“晶”与“叁”同音，读入心母。《说文》：“晶，精光也。从三日。”“星，万物之精，上为列星。一曰象形从口，古口复注中，故与日同。𠄎古文星，𠄎𠄎或省。”据《说文》可知“晶”之“精光”义实为“星”之引申义，“晶”当为“星”之后起分化字。“晶”字作“𠄎”；是从金文作“𠄎”（麓伯星父簋）、战国文字作“𠄎”（玺汇 2745）形而来，即截取“𠄎”上部而来，在语音上则由心纽转读为精纽。

26. 元部

① 姚孝遂先生在《甲骨文字诂林》第 1142 条上加按语云：“古‘晶’、‘𠄎’同字。‘晶’本象群星之形，后复增‘生’为声符”。权东五也持类似的观点，参见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1109 页；权东五《甲骨文字形声学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 年，第 11～14 页。

② 李学勤《论殷墟卜辞的新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 年第 2 期。

精母：箠濺棧煎箭翦剪薦贊饋贊鄴錯趨

庄母：儻

箠儻濺(精)——蒺(从)

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人州出不可入者，以膏膏出者，而倒悬其人，以寒水蒺(濺)其心腹，入矣。(263)”“蒺”假借为“濺”，则“濺”当读与“蒺”同，读入从母。

汉代晚期的定州八角廊汉墓竹简《论语》：“善人为国百年，亦可以胜儻(殘)去杀矣。(334)”“儻”当读为“殘”，“殘”为从母字，则“儻”亦当读从母。

煎箭翦(精)——寿(前，从)——雉(定)

甲骨文“雉众”之“雉”作“𠄎”（合 8874 正）“𠄎”（合 35345）或作“𠄎”（合 26893）“𠄎”（合 69）。陈梦家先生释“𠄎”为“至”，王贵民先生改释为“矢”。沈培先生释“𠄎”为“箭”，并指出：“卜辞中‘雉’、‘矢’、‘箭’表示同一个词，显然是因为它们读音都很近。”^①“前”字的构形可为之佐证。

西周金文“寿”字作“𠄎”（兮仲钟）“𠄎”（趺簋），从止从舟，或借笔作“𠄎”（追簋）“𠄎”（善鼎）。“寿”（前）所从之“止”、“舟”古音非常近，二字声皆为章母，韵为之幽旁转，那么很可能“寿”（前）是个双声符字，即“前”本读为舌音。其从母之音乃后出。

“箭”从前声，也发生了同样的音变，由舌音音转为从母，后进一步发生音变，读入精母。下文我们将谈到从“𠄎”（箭）的“晋”本亦读为舌音，战国时期音转为从母，其读入精母的时间当与“箭”、“进”相差不远。

武威汉简：“治千金膏药方：蜀椒四升、弓穷一升、白芷一升、付子

^① 沈培《卜辞“雉众”补释》，《语言学论丛》第 26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第 238～239 页。

卅果，凡四物，皆冶父且，置铜器中，用淳湓三升渍之，卒时取豸猪肪三斤先前(煎)之。(58)“前”当读为“煎”。“前”为从母字，“煎”亦当读为从母。

甲骨文有字作“𠄎”(合 248 正)“𠄎”(合 5775 正)，吴振武先生释为“杀”，^①陈剑先生认为“𠄎”是“翦除”、“翦灭”等义的本字。^②从甲骨文“𠄎”还可假借为“灾”来看，似当从陈剑说，读“𠄎”为“翦”。“翦”与“灾”同音，读入从母。诂楚文《湫渊》：“亦应受皇天上帝及大神厥湫之襍靈德賜，克剂(翦)楚师，且复略我边城。”“剂”用为“翦”。“剂”为从母字。由此看来，“翦”在春秋时期还读从母。

薦(精)——廌(定)

甲骨文“廌”字作“𠄎”(合 5658 反)“𠄎”(合 28420)，在卜辞中或假借为“薦”。春秋金文始见“薦”作“𠄎”(叔朕簠)“𠄎”(郑登伯鬲)“𠄎”(邵王之諛簠)。新蔡楚简“薦”皆作“廌”，如“八月甲戌廌(薦)之。(甲 3:80)”、“□廌(薦)三楚先，各□甲(3:106)”、“日于九月廌(薦)且禱之，吉。(甲 3:401)”、“□巳之昏廌(薦)且禱之，地主。(乙 3:60)”、“□之日廌(薦)之。(零 23)”上博简《曹沫之阵》：“有克政而亡克阵。三代之阵皆廌(存)，或以克，或以亡。(14)”又“乎境必胜，可以有治邦，《周志》是廌(存)。(41)”又“其将卑，父兄不廌(薦)，由邦御之，此出师之忌。(42)”其中简 14 和 41 两例“廌”皆当读为“存”，“存”为从母字，可知“薦”、“存”在战国晚期声母还是 sd-，后“薦”音变为精母，“存”变为从母。

27. 真部

^① 吴振武《“𠄎”字的形音义——为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而作》，收入《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第225~239页。

^② 陈剑《甲骨文“𠄎”字补释》，《古文字研究》第25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0~43页。

精母：津璫/盡進晋缙瑁措

庄母：臻藁漆榛轅

盡進津——聿(以)

甲骨文“盡”字作“𣎵”（合 3251 正）“𣎵”（合 4918）“𣎵”（合 3520）“𣎵”（3520 正），从聿从皿，西周金文作“𣎵”（师鬲鼎）“𣎵”（多友鼎）。《说文》：“盡，器中空也，从皿聿声。”又《说文》：“焯，火余也，从火聿声。”刘钊先生认为“盡”字从聿不从焯，应是从皿聿声的形声字，^①可谓卓识。武威汉简作“𣎵”，仍从聿可证。郭店楚简、包山楚简、上博简、新蔡简“盡”字的用例亦可证其说。郭店简“盡”字作“𣎵”（语丛四 15），包山楚简作“𣎵”（简 212），上博简作“𣎵”（曹沫之阵 8），新蔡简作“𣎵”（甲三：282），以往释为“聿”。我们认为“𣎵”非“聿”，而是“聿”。“𣎵”所从之“𣎵”乃“聿”所从之笔形的变形，即郭店简和上博简中“盡”皆假借“聿”为之，“盡”也读为以母。侯马盟书“宗盟类”“盡”字作“𣎵”（106：4）“𣎵”（1：78）“𣎵”（200：51）“𣎵”（200：57），可知“盡”在晋语里也读为以母。字又在一竖笔两侧加饰点作“𣎵”（3：2），又作“𣎵”（156：17）“𣎵”（98：11），所从变得近似“火”字，这便是后来误为从焯的由来。侯马盟书“盡”字又作“𣎵”（1：2）“𣎵”（1：3）“𣎵”（156：15），在一竖笔上加“夕”“乡”形饰笔，由此又分化出“𣎵”字。《说文》分“盡”和“𣎵”为二字，其实乃一字异体。“焯”从聿得声，后世作“燼”。中山王罍壶“盡”字作“𣎵”，竖笔上也加“夕”饰笔。加了饰笔“乡”的“𣎵”后分化出“𣎵”字。《说文》有“𣎵”字，谓“书饰也。从聿从乡。读若津。”又“津，从水聿声。”大徐本《说文》注“津”、“𣎵”皆为“将邻切”，可知“𣎵”和“津”同时音转为精母。大徐本《说文》：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盡，慈刃切。”这说明一直到唐代“盡”还读为从母。《广韵》“盡”收“慈刃切”和“即刃切”两读，可知用作虚词的“盡”已音转为精母。当然，“盡”也可能与“聿”、“津”同时发生音变。

西周晚期的罍生盃有字作“𣶒”，与《说文》“津”之古文“𣶒”形同，故当释为“津”，铭曰“王征南淮夷，伐角津，伐桐适，罍生从……”“津”用为地名。“𣶒”可分析为从舟淮声。西周时期的戠鼎“淮”字作“𣶒”，春秋早期的曾伯霰匜仍从唯声作“𣶒”，可证“淮”本从唯声，都读为以母，则“津”也当读为以母。战国文字资料亦可证明这一点，如睡虎地秦简“津”字作“𣶒”（为吏之道 14），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作“𣶒”（简 157）。《说文》小篆作“𣶒”当是由“𣶒”之饰笔讹变而成的。从楚系文字资料来看，“津”在楚音中已由以母音转为从母，如上博二《容成氏》：“戊午之日，涉于孟瀾（津）。（51）”“孟瀾”即“孟津”；郭店《穷达以时》：“吕望为臧棘瀾（津），战监门（4）棘地……（5）”“棘瀾”即“棘津”。“津”当与“瀾”同音，读为从母。“津”之精母读音当在其声符“聿”讹变为“聿”之后才产生。

从古文字资料来看，“進”也与“聿”音同，在语音上与“盡”有同样的来源，即由以母音变而来。西周金文“進”字从佳声作“𣶒”（兮甲盘）、“𣶒”（召卣）。甲骨文、金文“佳”皆读为“唯”或“惟”，而“唯”、“惟”是以母微部字。战国文字资料亦可证明“進”本读以母，如战国中山王罍壶“進”作“𣶒”，而中山王罍兆域图之“𣶒”亦用为“進”，从辵从聿，当为“進”之异体；又如郭店《语丛三》：“或由其避，或由其不聿，或由其可。（43）”“聿”当释为“聿”，读为“進”。马王堆《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五行》：“大成至矣，神耳矣，人以为弗可为□（305）□由至焉耳，而不然。能谁（進）之为君子，弗能進，各止于其里。（306）”“谁”用为“進”。武威汉简《仪礼·泰射》：“有司复立，泽获者述盡取首获执之。（76）”今本“盡”作“進”。“盡”在武威汉简里还从聿声，可知“進”、“盡”此时也还是以母字。“進”、“津”的上古读音当

拟为 ?sl-,“盍”当拟为 zl-,后来由于流音 l 的塞化,变成塞擦音 ts-。

晋(精)——铎(端)

甲骨文“晋”字作“𠄎”(合·19568),金文作“𠄎”(晋人簋)“𠄎”(颍羌钟)“𠄎”(鄂君启舟节)“𠄎”(曾侯乙钟)“𠄎”(郭店·缁衣 22)。林义光认为“晋”古与“铎”同字。^①姚孝遂先生赞成其说。^②何琳仪先生认为“晋”从铎声。^③沈培先生认为“𠄎”所从之“𠄎”乃“箭”字,而“箭”本与“雉”同音,读定母。^④春秋晚期的几里墩鼓座铭文有字作“𠄎”,何琳仪先生释为“隼”,读为“晋”。“隼”的读音归入舌音定母。^⑤

以上例证足以说明“晋”最初本读舌音,大约在战国时期音变为从母,如战国晚期楚器太府镬:“秦客王子齐之岁,太府为工食晋镬。”李家浩先生认为“晋镬”当读为“荐镬”,指进献食物用的镬。他还指出望山楚简 23 号简中的“晋”、曾侯乙墓竹简 70 号简中的“晋”皆当读为“荐”。^⑥“荐”为从母字。关于郭店楚简《缁衣》中的“晋”,李先生则认为当读“祭”。郭店楚简“浅”、“察”二字所从的声旁相同。“察”从“祭”声。^⑦则“祭”在楚音中很可能读为从母字。

① 林义光《文源》,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依写本石印,线装本三册,1920年,卷六·五一。

②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 2568 条姚孝遂按语,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2562~2563 页。

③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 1153 页。

④ 沈培《卜辞“雉众”补释》,《语言学论丛》第 26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238~239 页。

⑤ 何琳仪《几里墩鼓座铭文新释》,《出土文献研究》第 3 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 68~71 页。

⑥ 李家浩《楚太府镬铭文新释》,《语言学论丛》第 22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96~97 页。

⑦ 李家浩《楚太府镬铭文新释》追记,《语言学论丛》第 22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98 页。

《说文》：“晋，进也，日出万物进。从日从进。《易》曰：‘明出地上晋。’”据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推断：第一，《说文》不说“晋”从“进”声，可见“晋”已不读舌音；第二，《说文》以“进”训“晋”，当为声训，即在《说文》时代“晋”与“进”同音；第三，“晋”与“进”音变为精母的时间不会相差太远。

臻 臻 臻 臻(精)——秦(从)

臻，《说文》：“至也。从至秦声。”马王堆竹简《天下至道谈》：“……为之喘息中(37)乱，曰烦；弗于强之，曰绝；为之秦(臻)疾，曰费，此谓七损。(38)”“秦”假借为“臻”。

臻，《说文》：“艸盛貌，从艸秦声。”上博二《容成氏》：“禽兽犬肥大，卉木晋(臻)。(16)”“晋”读为“臻”，“臻”从秦声，“秦”为从母字。《集韵·真韵》：“臻，艸名。慈邻切。”可证“臻”确可读为从母。

臻，《说文》：“木也。从木秦声。一曰鼓也。”“鼓”乃声训。上文我们已证“鼓”为从母字。则“臻”的读音当在东汉以后才音转入精母。

臻，《说文》：“水出桂阳临武入江。从水秦声。”上博一《孔子诗论》：“《卷而》不智人，《涉秦(臻)》其绝柎而士。(29)”可知“臻”本当读从母。

综合分析以上例证，可推知“臻”、“臻”、“臻”本读为从母，其精母之读音后出。

28. 文部

精母：尊 尊 尊 尊 尊 尊 尊 尊 / 俊 俊 俊 俊 俊

尊(精)——寸(清)

商鞅方升：“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人无故而心悲也，以桂长尺有尊(寸)而中折(67背壹)，以望之日日始出而食之，已乃舖，则止矣(68背壹)。”秦公一号墓殉奴棺木文：“北尺四尊(寸)高。”“尊”皆当读为“寸”，则“尊”在战国秦音中很可能读为清母。上博六《天子建州》甲本“尊”字作“𠄎”（简10），从西关声。上博六《慎子曰恭俭》：“首戴茅蒲，撰蓀执鉏，送(遵)朕服

晦,必于[□](5)。”“送”假借为“遵”。上博简有字作“𠄎”(孔子诗论 13),从辵恩声,可隶作“遵”,裘锡圭先生认为此字当是“送”字异构,在《孔子诗论》简 11 和 13 中也可读作“媵”。这种形体有较古的来源,可能当初是有意取“心”字作“𠄎”的异体,以取得兼表凶声的效果。^①由此看来,“尊”、“遵”等字的上古音当拟为 sqbl-。

峻俊俊(精)——允畹(以)

甲骨文、金文“峻”作“𠄎”(合 5608)“𠄎”(合 3019)“𠄎”(孟鼎)“𠄎”(颂壶)“𠄎”(墙盘)“𠄎”(戎生编钟),从田允声,可隶作“畹”。《字汇补·田部》:“畹,古允字。见韩成鼎文。”“畹”变成《说文》小篆之“畹”形,是在“峻”作“𠄎”、“𠄎”等形的基础上,在人形或女形的腿部加“𠄎”作“𠄎”(秦公罍)形之后,进一步演变而成的。张桂光先生曾指出,在西周金文中,表现人体的部件不仅有跪踞逐渐消失的趋势,而且有加脚趾“土”的习惯,如“𠄎”(《令簋》)之作“𠄎”(守宫鸟尊)、“𠄎”(续 3·31·5)之作“𠄎”(扬簋)等。^②同样的例子还有“𠄎”(孟鼎)之作“𠄎”(谏簋)、“𠄎”(毛公盾鼎)之作“𠄎”(伯忧觶)等。西周早期的大孟鼎有辞曰:“匍有四方,畹(允)正毕民。”邢侯簋铭曰:“邵朕(盈)福盟,朕(畹)臣天子。”“朕”既用为“盈”,又借为“畹”。秦公钟:“戾夤胤(俊)士。”又秦公簋:“咸蓄胤(俊)士。”“胤士”当读为“俊士”。晋公益:“余咸畜胤(俊)士。”用例与秦公簋同,“胤士”亦读为“俊士”。秦公罍:“峻寔在位。”秦公罍“峻”作“畹”,“畹”、“峻”同读为“俊”。南阳博物馆藏春秋宋右师延铜敦:“朕宋右师,佳盈。明。扬天则,畹(畹)共天常。”“畹共天常”应读为“俊恭天常”。^③

① 裘锡圭《释古文字中的有些“恩”字和从“恩”、从“兪”之字》,收入《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 2 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12 页。

② 张桂光《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7 页。

③ 王辉《古文字通假释例》,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 年,第 796 页。

“昏”从日允声，可知在铭文中“骏”还读为以母。上引诸例可证“峻”、“俊”本当读为以母。“眈”字讹变为“峻”后，读音也由以母音转为精母。“峻”的声符“夂”也发生类似的音转。“夂”字最早见于楚帛书，作“𠄎”。“𠄎”就是在“允”作“𠄎”形之上加“土”而成的。《说文》“夂”作“𠄎”，即“𠄎”形进一步演变而成的。西周晚期的不斂簋“允”作“𠄎”，在所从之“中”乃“土”之讹。不斂簋铭文“允”假借为“犹”，可见此“𠄎”还是“允”而非“夂”。楚帛书“帝𠄎”即典籍中的“帝俊”，则此“𠄎”即“夂”字。上博简《絺衣》：“尹诰云：‘惟尹夂及康咸有一德。’”(3)“《小雅》云：‘夂也，君子，展也大成。(18)’”“夂”字作“𠄎”(简18)，与“夂”相对应之字，郭店楚简《缁衣》作“𠄎”(简36)。裘锡圭先生认为“𠄎”为“允”之繁文，“惟尹躬及康咸有一德”可读为“惟尹允及汤咸有一德”；“夂也”即“允也”。^①《说文》：“夂，行夂夂也，一曰倨也。从文，允声。”据此，“夂”仍读与“允”同，“夂”读清母当在汉代之后。

29. 侵部

精母：簪僭醮𦉳𦉳𦉳/浸埶浸寢綬侵

庄母：先璿潜

疑簪僭(精)——璿(从)

“潜”见于西周晚期的戎生编钟，作“𦉳”。铭曰：“俾潜(潜)征繁汤。”“潜”当读为“潜”，读入从母。马王堆竹简《十问》：“夫食气潜(潜)入而默移，夜半而□□□□□(91)气，致之六极。(92)”“潜”亦读为“潜”，可证“潜”最初当读为从母，其精母之读音后出。

马王堆帛书《胎产书》：“欲产(5)女，佩蚕(簪)珥，绅珠子，是谓内象成子。(6)”“蚕”假借为“簪”，“蚕”为从母字，则“簪”当亦读为从母。《易·豫》：“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马王堆帛书《周易》作：

^① 参看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注15 裘锡圭先生按语，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32页。

“允餘，大有得。勿疑佃甲谗。”“簪”与“谗”互为异文。“谗”为从母字。

戎生编钟三铭曰：“懿肃不𡗗(僭)，绍匹晋侯，用恭王命。”“𡗗”假借为“僭”。《广韵·感韵》：“𡗗，《说文》：‘曾也’，七感切。”又《盐韵》：“于𡗗，县名，名属杭州，今作潜，昨盐切。”“𡗗”有清、从两读，我们认为从母先出，理由有二：第一，用作地名的读音一般自古不变，而且肯定早于许慎时代；第二，“𡗗”组成的谐声系列多本读为从母。既然“𡗗”本读为从母，则戎生编钟之“𡗗”读为“僭”，亦当读为从母。

浸寢侵緡(精)——侵(清)

战国时期秦国的寺工师初壶、雍工壶铭、二年寺工尊“北寢”当读为“北寝”。凤翔南指挥村秦景公之墓出土残磬铭：“申用无疆，□寢(浸)龚雍。”“寢”即“浸”，王辉先生认为“寢”当读为“寝”。^①武威汉简《仪礼·燕礼》甲本：“燕朝服于寢(寝)。(48)”“寢”亦读为“寝”。“寝”为清母字，则“寢”很可能最初也读为清母。

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乾卦》：“初九，浸(潜)龙勿用。(1行)”“浸”当读为“潜”，“潜”为从母字。马王堆帛书承袭楚系文字特色，则“浸”很可能在楚音中读为从母。

银雀山汉简《阴阳时令占候之类》：“观其时以占其德亦可攻也，是故圣人慎观侵(浸)祥，未见其征不发，其随时而动，因毁而伐。(0577)”“侵”假借为“浸”。“侵”为清母字。

《广韵·侵韵》“七林切”小韵下收有“浸”、“緡”，可证“浸”、“緡”有清母一读。

30. 谈部

精母：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 寢

庄母：𡗗

“𡗗”字始见于战国文字，作“𡗗”(玺汇 3818)“𡗗”(睡虎地·秦

^① 王辉《古文字通假释例》，台北：艺文印书馆，第929页。

律十八种 155)“斬”(马王堆·养生方 54)。《古玺汇编》3818 号玺为姓名私玺,玺文“司马斬离”即“司马漸离”,“漸离”为当时习见人名。《史记·刺客列传》有“高漸离”。包山楚简:“登人所漸(斬)木四百县失于鄴君之地襄溪之中。(140)”“又祭,见于继无后者与漸(斬)木立,以其古之斂之。(249)”“命攻解于漸(斬)木立,馭徙其尻而逗之,尚吉。(250)”“漸木”皆当读为“斬木”。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四·苏秦自齐献书于燕王章》:“以求卿与封,不中意,王为臣有之两,臣举天下使臣之封不掣(慚)。(46)”《战国纵横家书五·苏秦谓燕王章》:“假臣孝如曾参,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即有恶臣者,可毋乎掣(慚)?(49)”“掣”为“斬”之异体,借为“慚”。“漸”、“慚”皆为从母字,故“斬”很可能本当读为从母。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徭律》:“县葆禁苑、公马牛苑,兴徒以斬(塹)垣篱散及补缮之,辄以效苑吏,苑吏循之。(117)”《龙岗秦简》:“侵食道、阡陌,及斬(塹)人畴畦,赏一甲。(120)”“斬”皆读为“塹”,银雀山汉简《论政论兵之类·四五》:“火战之法,沟垒已成,重为沟漸(塹),五步积薪必均疏数从役,有数令之为属,批必轻必利风辟。(0039)”“漸”假借为“塹”,“塹”又可通“斬”,可证“斬”、“漸”、“塹”音同,读为从母。

戣 鐵 殲 濊 (匣→心→精)

甲骨文“戣”字作“𠄎”(合 96)“𠄎”(合 32889),卜辞用为人名。《说文》:“戣,绝也。一曰田器。从从持戈。古文读若咸,读若《诗》云:‘攸攸女手’。”“咸”为匣母字,“攸”读心母,则“戣”的心母读音很可能来自匣母。南唐徐铉注音为“子廉切”,可知最迟在南唐时代“戣”已音变读精母。

殲,《说文》:“微尽也。从歹戣声。”

鐵,《说文》:“铁器也。”段注:“盖锐利之器。郭注《尔雅》用为今之尖字。”《广雅·释诂四》:“鐵,锐也。”《尔雅·释山》:“(山)锐而高峩。”郭璞注:“言鐵峻。”《正字通·金部》:“鐵,尖本字。锋芒锐也。”

濊,《说文》:“渍也。从水戣声。《尔雅》曰:‘泉一见一否曰濊。’”

《尔雅·释水》：“泉一见一否曰灑。”郭璞注：“灑，纔有也。”郝懿行《尔雅义疏》：“郭义则以灑为纖。纖，小意也。”《广韵》：“灑，泉水出微貌。”

“纖”、“纖”、“殲”、“灑”皆有细或小义。“鐵”为山韭，《本草纲目》：“苏颂曰：‘鐵，山韭也。形性亦与家韭相类，但根白，叶如灯心苗耳。’”可见“鐵”亦有细义。故“鐵”、“纖”、“纖”、“殲”、“灑”同源，皆来自 sg-。

三、中古精母字来源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在上节中，我们对中古精母字的来源做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考察，结果发现大多数中古精母字在上古并非就是精母字，而是有多种来源。在漫长的语音发展过程中，有的不止发生一次音变。如“宰”本当为心母字，从马王堆帛书的文字资料来看，汉初“宰”音变为从母，汉代后期才音变读为精母；“酒”在西汉以前都读以母，大约在东汉音转为从母，其精母之读音则是在魏晋以后才有；“晋”最初乃舌音，最迟在战国时期已音变读从母，其精母之读音是由从母清化而来的；“稷”字经历了三次音变，先是由见母转入从母，再由从母转入清母，然后由清母变为精母。由见母转入从母、再转入清母约在战国时期，由清母变为精母则在汉代以后。

我们还发现不同声系的两组或三组、甚至四组字有交替的现象，并且表现出同样的音变轨迹。如“青”声系与“争”声系，都来自 sk-，大约在汉初音变为从母，东汉以后有的仍读从母，有的音变为清母，有的读入精母；又如，“兹”声系和“子”声系，“兹”本与“丝”同字，“丝”和“子”同源，都有连属、增长义，因此它们都来自 ?sl-，战国时期音变为从母，最早在东汉后期才音变为精母；再如“次”声系和“齊”声系，从次声之字往往有从齊声的异体，从次又与从宀通用，“次”还与“即”通，因此四个声系表现出了同样的音变轨迹，即由从母变为精母。其他还有“才”声系（含“戔”声）和“笛”声系、“臬”声系和“巢”声系，“秋”声系与“酉”声系，“取”声系、“奏”声系、“芻”声系和“最”声系。

等。

战国时期,由于“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各地语音演变的速度也不同。如“津”在西周金文中从隹(唯)声,读为以母,在战国秦系文字中从聿声,仍读以母,而在上博简和郭店简中“津”已由以母塞化为从母;又如,古文字资料表明“则”一直到战国时期还读为从母,但在战国晚期的楚音里已经音变为清母,在汉初的共同语里,“则”也读为清母,由清母音转为精母当在汉代以后;再如“浸”在秦汉文字中为清母字,而在汉初的马王堆帛书里还是从母字。这种情况在殷商时代也是有的。如“早”在白组小字类、白宾间类、典宾类、宾出类卜辞中假借“草”为之,在出组卜辞、花东子卜辞中则假借“又”字为之,这很可能反映出当时的方言差异,即在有的方言中还读心母,有的方言则已音变为从母。

通过考察,我们还发现精母字多来源于同部位音转。朱声琦先生曾从汉字的谐声关系、古注、古书异文等十多个方面论证并总结出一条语音演变的重要规律:中古汉语 36 声母 5 音 8 大系,同系内部的几个声母皆可互转。^① 下面我们就谈谈中古精母的来源问题及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 中古精母的来源

1. 来源于心母

郑张尚芳先生认为精母除了复辅音来源外,都是由心母和从母而来的。根据我们的考察,中古精母字中确有一部分来源于心母,如“兹”、“滋”、“孳”、“晶”、“足”、“捉”、“旌”、“雀”、“爵”、“杓”以及从臬声的“藻”、“澡”、“燥”、“剿”、“燥”、“趯”,从巢声的“纛”、“瓌”、“鱗”、“剿”,从妾声的“接”、“接”、“菱”、“鯨”,从青声的“精”、“睛”、“靖”、“菁”等。其中“蚤”、“蚤”、“爪”、“杓”以及从臬声的“藻”、“澡”、“燥”、“剿”、“燥”、“趯”等直接由心母转入精母,而从妾声的谐声系列字则

^① 朱声琦《论同系声母内部可以互转》(上、下),《山东师大学报》2000 年第 1、2 期。

是先由心母塞擦化为清母，再由清母变为不送气的塞擦音精母。从巢声、青声的谐声组字也经历两次音变，即先由心母浊化为从母，再由从母清化为精母。

2. 来源于清母






清母与精母发音部位相同，只是在发音方法上有送气与不送气之别，所以这两组字很容易发生转化。在我们考察的中古精母字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總”、“走”、“奏”、“觜”、“紫”、“髭”、“左”、“祭”、“際”、“尊”，以及从束声的“責”、“簣”、“嘖”、“嘖”、“孿”、“積”、“蹟”、“績”、“跡”，从受声的“浸”、“寢”、“埤”、“裨”、“緜”、“侵”等。

3. 来源于从母

从母音变为精母是由于浊音清化的作用。中古精母字中来源于从母的较之清、心两母的要多得多。如“子”、“則”、“側”、“最”、“宗”、“綜”、“稷”、“戾”、“斬”、“婕”、“蹴”、“儻”、“椒”、“鏃”、“繫”、“竈”、“早”、“棗”、“笛”、“戔”、“哉”、“灾”、“薰”、“載”、“叢”、“戩”、“遭”、“糟”、“焦”、“蕉”、“簪”、“僭”、“臻”、“藜”、“溱”、“笈”、“濺”、“煎”、“箭”、“翦”、“争”、“淨”、“津”、“將”、“縱”、“曾”、“憎”、“贈”、“增”、“卒”、“倅”、“醉”、“即”、“節”、“第”、“挫”、“倅”、“借”、“諧”、“斷”以及从齊声的“齋”、“齋”、“濟”、“霽”、“齋”、“蹟”、“齋”、“積”、“齋”，从次声的“咨”、“资”、“姿”、“粲”、“恣”，从且声的“沮”、“祖”、“租”、“组”、“俎”、“沮”、“阻”、“獻”，从冫声的“葬”、“臧”、“妝”、“壯”、“莊”等。





4. 来源于以母

郑张尚芳先生用流音塞化来解决精组与以母、来母的相谐问题，认为汉语里 sl-、sr-也可能像藏语那样出现流音塞化，导致塞擦音产生。中古精母字中确有一些字是由以母音变而来的，如“酒”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皆写作“酉”，战国晚期的睡虎地秦简和马王堆帛书中“酒”、“酉”并用。《说文》谓“酒”从“酉亦声”可知东汉前期“酒”还读为以母。“酒”后来读精母，当是音变的结果；“俊”、“骏”、“峻”等字，在金文中或写作“允”、或写作“畎”、或写作“畎”，皆从允声，故“俊”、“骏”、“峻”在西周时期当读为以母，后音转为精母当与字形的讹变有



关,即声符“允”加动符“止”讹变为“爰”后,“俊”、“骏”、“峻”、“腴”等字也变从“爰”声,读为清母,东汉后期才又音变为精母;甲骨文、金文“盡”字皆从“聿”,战国时期楚简中皆用“聿”为“盡”,武威汉简作“盡”,可证东汉初年“盡”仍从“聿”声。“盡”字小篆作,是由侯马盟书“盡”字作“(3:2)”“(156:17)”“(98:11)”等形讹变而成的。“盡”读精母当在字形讹变之后。“盡”的声符“聿”,也是由“聿”加饰笔作讹变而来的,“聿”也发生同样的音变,读为精母。从古文字资料来看,“进”也与“聿”声同,在语音上与“盡”有同样的来源,即由以母音变而来。

5. 来源于喉牙音

精组的发音部位与喉牙音虽相隔较远,但古文字实际却表明有一部分精组字确实与喉牙音有关。例如:

甲骨文“歲”字作“(合 13475)”“(合 3385)”,西周金文作“(利簋)”,战国时期齐国的子禾子釜作,从戊声。“戊”为匣母字,“歲”的心母读音当不会早于战国时期。“歲”的音变过程亦可证。《说文》:“歲,古文讀若咸,讀若《詩》云:‘攢攢女手’。”许慎之意当指“歲”之古音与“咸”同音,乃喉音,而当时与“攢”同音,读心母。南唐徐铉注音为“子廉切”,则“歲”在南唐已音转为精母字。

“恤”和“恤”均当读血声。战国早期陈逆簋:“余寅事齐侯,欢血宗家。”“血”用为“恤”。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升卦》:“利见大人,勿血(恤)。(55行)”《萃卦》:“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其号。一握为笑,勿血(恤)。(59行)”《晋卦》:“六五,悔亡,矢得勿血(恤)。(71行)往吉,无不利。”《家人卦》:“九五,王假有家,勿血(恤),往吉。(91行)”以上帛书四例血字通行本《易》作“恤”。“血”为晓母字。

甲骨文“薛”字作“(合 248 正)”“(合 947 正)”,裘锡圭先生释

“𠄎”为“义”。^①“薛”所从之“𠄎”为声符。西周金文如“𠄎”（何尊）“𠄎”（吊父鬲卣）仍从义声。“义”为疑母月部字，“薛”为心母月部字，显然“薛”之心母字是由疑母音变而来的。

甲骨文“井”作“𠄎”（合 9390），为“阱”之初文。金文“井”除了用作方国名“井方”外，还假借为“型”、“刑”、“邢”，可知“井”本当读为匣母。西周中期的匍盂：“青公使司使见。”“青公”即金文中常见的“邢公”。“青”在西周金文中又可用为“静”，可见“井”已有从母异读。“阱”、“妍”之从母读音当是由匣母音变而来，而“井”之精母读音则可能是由从母浊音清化而来的。

“𠄎”的字形当是由“兕”演变而来。战国文字“凶”皆假借“兕”为之，作“兕”（睡虎地·日书乙种 208）“兕”（马王堆·二三子问 8），“𠄎”字小篆作“𠄎”形，就是在“兕”字人形腿部加动符而成的。《说文》所收“稷”字古文作“𠄎”，小篆也变作“𠄎”可证。《说文》：“𠄎，斂足也。从文兕声。”据此可知“𠄎”仍与“兕”音同，读为晓母，其精母之读音当在东汉后期才产生。

郑张尚芳先生把与喉牙音有关的精母字拟为 sk-，清母拟为 skh-，从母为 sg-。^②他认为精组与见组在音理上有联系。

6. 来源于舌音

朱声琦先生考定的由舌音转入精母之字有“进”、“椒”、“俊”、“𦉳”、“津”、“姿”、“恣”、“咨”、“资”等九个字。其中“进”来自端母，“椒”来自透母，“俊”、“𦉳”、“津”来源于定母（按：他认为喻四归定，故把从允声的“俊”、聿声的“𦉳”、“津”归入定母），“姿”、“恣”、“咨”、“资”来自泥母。^③

①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释“𠄎”“𠄎”》，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页。

②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2~143页。

③ 朱声琦《论齿音》，《山东师大学报》1999年第1期。

朱先生宥于《说文》所谓“次从二声”，“二”为泥母字，所以认为从次声的“姿”、“恣”、“咨”、“资”都来源于泥母。但经我们考证，“次”本为从母字，从次的“姿”、“恣”、“咨”、“资”最初都读为从母。“椒”字最早见于睡虎地秦简，在简文中读为“蹇”。“蹇”为“蹴”之异体，本为从母字，故“椒”之精母亦来源于从母。

古文字资料表明“進”和“津”本皆从佳声，而“佳”本与“唯”同音，读以母。在战国时期有的地区“津”音变为从母，“進”、“津”与“盡”音变为精母的时间应该不会相差很远。

“薦”的精母读音也来自舌音定母。甲骨文乃至战国文字“薦”皆假借“薦”为之。上博简中“薦”既读为“薦”又读为“存”，可知“薦”、“薦”已读为从母，“薦”之精母读音是由从母清化而来的。

吴振武先生考鄂君启节中“𠄎”为“豚”，即文献中的“豚”。古音“冢”在端母东部，“宗”在精母冬部。^①

包山楚简“接”假借“执”为之，这说明在当时的楚系语音中“接”不读精母，而读章母。藏文 sdeb 表“联接”义，可知汉语“接”的上古读音可能是 st-。

师玉梅先生试图用-j介音来解释，她认为精、章、见三系字在-j介音的作用下发音部位都趋于舌面和上腭，从而使发音相近。所以古人在谐声字声符的选用上以及通假字的选择上，就有可能出现混用现象。^②

(二) 精母产生的时代

郑张尚芳先生认为上古没有邪母 z-, 上古的从母读 z-, 而不是 dz-, 清母读 sh-, 而不是 tsh-。也就是说上古没有塞擦音。心、从、清在汉代以前都是擦音，汉代后期开始塞擦化，因此精母是汉代后期才

^① 吴振武《鄂君启节“𠄎”字解》，收入《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3年，第271~272页。

^② 师玉梅《西周金文音韵考察》，广州：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30页。

有的。我们同意郑张先生的意见。上文我们考察了中古精母字的上古来源,发现大量的精母字都来源于心母,还有的精母字分别来自以母、喉牙音和舌音。如果认为上古有精母,精、清、从母都是塞擦音的话,就很难解释这些精母字的来源问题。相反,如果认定清母、从母也是擦音的话,那么它和心母的谐声和通假关系就很好理解。来源于心母的精母字拟为 ?s-/?sl-/?sr, ? 表示紧喉动作,可以导致 s-的塞擦化;来自以母的精母字拟为 sl-, l' 的塞化,可使 sl-变成塞擦音;来源于喉牙音、舌音的 sk-、sg-、sq-、skh-、sd-, 可受咝冠音的影响演变成塞擦音;来源于从母的精母字拟为 ?z-/?zl-/?zr-, 来自清母的拟为 sh-/shl-/shr-。

据我们考察,甲骨文、西周金文乃至战国文字中都没有读为精母的。汉初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张家山汉简、银雀山汉简、阜阳汉简《诗经》、《史记》等资料表明:“兹”、“哉”、“载”、“茂”、“灾”、“菑”、“遭”、“槽”、“蚤”、“早”、“爪”、“澡”、“趨”、“奏”、“鼓”、“坐”、“资”、“咨”、“恣”、“卒”、“齋”、“齋”、“穡”、“齋”、“齋”、“躋”、“最”、“則”、“側”、“稷”、“借”、“脊”、“祭”、“際”、“卒”、“醉”、“帀”、“曾”、“增”、“憎”、“罾”、“宗”、“侵”、“縱”、“蔓”、“總”、“臧”、“壯”、“裝”、“争”、“精”、“竈”、“蕉”、“旌”、“濺”、“津”、“臻”、“簪”、“潛”、“僭”、“浸”、“走”、“诤”、“藻”、“阻”、“诈”、“阼”、“昨”、“儻”等在西汉还不是精母字;从武威汉简《仪礼》、武威医简中的通假资料来看,“兹”、“滋”、“孳”、“子”、“宰”、“寢”、“浸”、“縱”、“接”、“苾”、“煎”、“旌”、“竈”、“资”、“脊”、“进”、“盡”、“且”(俎)等在西汉晚期、东汉早期还不是精母字;据定州八角廊汉墓竹简《论语》可知“壯”、“臧”、“齋”、“儻”、“遭”在汉代晚期还不是精母字;据《说文》、东汉熹平石经《诗经》可证“則”、“灾”、“酒”、“摛”、“剿”、“纛”、“總”、“臧”、“壯”、“盡”、“繫”、“跡”、“即”、“亼”、“緜”、“嬖”、“媿”、“焦”、“醜”、“樵”、“灑”、“壑”、“俚”、“譬”、“鼓”、“擗”、“晋”、“踏”、“斲”、“齏”、“婁”、“珣”、“菹”、“蕒”、“縹”、“榛”、“恣”、“駟”、“爰”、“蕉”、“臧”、“阻”、“诤”等在东汉后期还不读精母;据徐铉注音,可知“朴”、“盡”、“噍”、“纛”在南唐还不是精

母字。因此,我们认为精母字大致在汉代后期才开始出现的,历经东汉至魏晋南北朝,逐渐形成。由《切韵》精、清、从三母已是塞擦音来看,精母的产生和形成年代应该在汉代后期至南北朝之间,清、从二母由擦音变成塞擦音的时代与之相当。

第三章

秦音中以母与喉牙音之关系考

汉语的史前母语是华夏语，早在夏禹时代就已形成。^①古文字研究表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与周原甲骨、西周金文同属一个文字系统，具有传承关系。以此为基础研究商周古音，可以发现商代音系与西周音系也是相承的。这说明原始汉语发展到殷周时期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民族共同语了。同时，在民族共同语形成过程中，由于语言的分化和同化，也产生了各地汉语方言。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长期割据混战，其结果是“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各国尽管“言语异声”，但由于华夏共同语的存在，各诸侯间的亲缘关系以及文化的同源关系等原因，秦汉时期各地的主要语言都是从黄河流域华夏一带的语言发展而来的，^②也就是说，各地方言当与华夏共同语具有同源关系。这是我们研究方言语音、词汇以及方言分区的前提。目前秦汉方言研究已经取得显著的成绩，但在研究中仍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所据的资料仅限于《方言》（杨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以及传世典籍中经学家们的传注；二是忽略了秦方言的研究。秦国地处西北，陕西方言是华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之一，但并不等同于共同语。赵彤的《战国楚

① 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页。

② 丁启阵《秦汉方言》，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11页。

方言音系研究》、汪启明的《先秦两汉齐语研究》分别对楚方言和东齐语做了专题研究,但至今未见专门的秦方言研究;三是以往的研究总把秦汉方言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所据资料主要是杨雄的《方言》,这是有失偏颇的。虽然语言有继承性,但语言是始终发展演变的。从秦的先祖非子被周孝王封于秦(今甘肃清水东北)为“西垂大夫”到秦灭亡,长达七百余年,再从秦灭亡到杨雄作《方言》的时代又历经近二百年,很难说这期间的语音没有变化。因此,我们认为秦代方言应当同汉代方言分离出来进行独立的考察,杨雄的《方言》只能作为辅助材料来使用。

周祖谟先生曾经说过:“前人说《方言》多奇字,是就文字的写法来讲的,如果从语言的观点来看,这些字只是语音的代表,其中尽管和古书上应用的文字不同,实际上仍是一个语言。”^①周先生所言正点明了文字与语音包括方言研究的关系。以此为指导,本书拟以秦系文字中特有的方言用字和通假字为线索,以出土的秦系文字中的谐声、假借资料为主,以《方言》、《说文解字》等文献资料为辅,对秦音中以母字与喉牙音的关系进行初步的考察,从而管窥秦方言语音的一些特征。

一、秦音中以母与影母的关系

在秦系文字中,有个非常典型的用字特征,即语气词“也”大都写成“毆”,而且“毆”字仅见于秦系文字。这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毆”显然是个方言字,它与“也”在秦音中有联系吗?“毆”是影纽脂部字,“也”为以纽歌部字,脂歌音近,但“影”、“以”能通吗?这是语音演变的例外吗?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们考察了秦系文字中的所有以母字,结果发现以母除了大量的自谐外,还与影组、见组以及书、心、邪、船等擦音关系密切。

战国文字中的语气助词“也”,楚文字作“也”,晋系文字作“施”,

^① 周祖谟《方言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1页。

秦文字则大多写作“毆”，只有个别写作“也”。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用字现象。“毆”当为秦文字原有的助词，少数用“也”字，可能是受其他地域文字的影响。从《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和《绎山刻石》、《元年诏版》来看，秦始皇时代“毆”字已不再使用，而改用“也”。张世超先生认为秦文字“也”、“毆”并用的主要原因是在秦方音中“也”、“毆”音同。^①由于张先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和论证，所以不能让人信服。我们同意张先生的看法，理由有三：

第一，秦文字还有一些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如：

焉(影)——矣(於，以) 同为句末语气词表示陈述或肯定的“焉”和“矣”都在战国末年到秦始皇年间的文字资料中出现。如旬邑权、大隗权：“始皇为之，皆有刻辞焉。”《睡虎地·日书乙种》：“凡五已不可入寄者，不出三岁必代寄焉。”其中“焉”的用法就与“矣”相同。“焉”同“於”，“於”为影纽鱼部字，“矣”从“以”得声，“以”为以母之部字。

於(影)——匀(以)睡虎地秦简“於”字作“𠄎”(语书1)“𠄎”(日书乙种187)“𠄎”(日书甲种69)，“均”字作“均”(秦律十八种114)，两相对比，可知“𠄎”已变形音化从匀声。古音“於”在影纽鱼部，“匀”在以纽真部。在秦音中，鱼部与脂部有交涉的情况，如战国秦封宗邑瓦书“冬十壹月”之“壹”作“壹”“壹”(陶汇3·384)；诅楚文“两邦若壹”之“壹”作“壹”；睡虎地秦简“壹”字作“壹”(日书甲59背)，又作“壹”(秦律十八种43)；秦廿六年诏权“壹”字作“壹”，又作“壹”；马王堆帛书“壹”字作“壹”(相马经15上)“壹”(老子乙前49下)“壹”(老子甲后445)，又作“壹”(战国纵横家书30)；武威汉简作“壹”(士相见7)“壹”(有司42)，皆以“壹”字为之；银雀山汉简“壹”皆从吉声作“壹”(简58)“壹”(简464)“壹”(简373)等形。金文

^① 张世超《战国秦汉时期用字现象举隅》，《中国文字研究》第1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3页。

“懿”字作“𩚑”（穆父鼎）“𩚒”（沈子它簋）“𩚓”（禹鼎）“𩚔”（师鬲鼎）“𩚕”（班簋）“𩚖”（匡匡）“𩚗”（癸钟）“𩚘”（鬲仲壶）“𩚙”（单伯钟）“𩚚”（禾簋）。刘钊先生认为“壶”、“壹”乃一字分化，“懿”当从壶声。^①古音“壶”在匣纽鱼部，“壹”、“懿”在影纽质部。从金文“懿”皆从“壶”这一情况来看，“壹”、“壶”本同字，“壹”是从“壶”分化出来的一个字，二字本同音，皆为鱼部字，后“壹”转入脂部入声质部，故又加“吉”为声符，古音“吉”在见纽质部，这一音变大约发生在秦末汉初。

“睪”、“眈”的分化关系亦可证有一部分字的读音是由鱼部转入脂部的。甲骨文有字作“𠄎”、“𠄏”，在卜辞中用作地名。学者多认为此字为《说文》训为“目不正”之“眈”的初文。^②刘钊先生认为“睪”、“眈”、“睪”乃一字分化。^③“睪”、“眈”本同音，古音在以纽铎部，后因为“眈”所从之“矢”与“失”形近，人们就误把“眈”写成“眈”，并以为字从失声，于是“眈”（眈）就音转入质部。

醫(影)——酉(以) 睡虎地秦简有“醫”字，作“𩚛”（日书甲148）。王筠《说文句读》谓“醫从毆声。”按：“醫”为影纽之部字，“毆”为影纽脂部字，二字虽双声，但秦文字中未见之脂相通之例。从“醫”仅见于秦系文字这一点考虑，我们认为“醫”当从毆从酉、酉亦声。“酉”为以母幽部字，之幽二韵在古文字资料中相通之例习见，此不赘举。以母与影母在秦音中可通。

剗(掩)(影)——剗(省声)(以)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令甲以布帛剗埋男子某所，待令。(61)”“剗”字作“𩚜”。整理小组指出：“剗，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6页。郑张尚芳先生以为“懿”是个会意字，金文像畅饮壶内美酒称美状。参看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22页。

② 参看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43条。

③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1~186页。

应从剡省声，读为掩。”^①古音“掩”在影纽谈部，“剡”在以纽谈部。

捐(以)——冃(影) “捐”字最早出现于战国秦印，作“𠄎”（秦印·张捐之印），从手冃声。马王堆帛书作“𠄎”（相马经 16），沿袭秦文字的写法。古音“捐”在以纽元部，“冃”在影纽元部。郑张尚芳先生认为中古“捐”列喻四“与专切”，其古音是 hwən < Gwən，它是和“娟”qwen 一样由影组转来见组的。“捐”在本质上是云母重组四等字。^②

伊(影)——尹(以) “伊”字甲骨文中就已出现，作“𠄎”、“𠄎”，从尹声。秦文字中“伊”字见于睡虎地秦简《编年记》，作“𠄎”（简 14）。甲骨文“伊”还可以假借“亦”为之，如《契》三七七有辞云：“贞弓告于亦尹，八月。”《小屯·殷墟文字丙编》一〇四：“贞，亦尹鬻王？贞，亦尹弗鬻王？”《小屯·殷墟文字乙编》八〇二四：“贞，出于亦尹十伐十牛。”姚孝遂先生认为“亦尹”即“伊尹”。^③

甲骨文中还有一些以母与影母相通的例子，如甲骨文有字作“𠄎”（合 33211）“𠄎”（合 33233）“𠄎”（合 9481），裘锡圭先生认为字当读为“壘”，又加用声作“𠄎”（合 9485），^④古音“壘”在影纽东部，“用”在以纽东部；“易”、“益”同源分化，“易”为以母字，“益”为影母字。秦音以母与影母可通的特点很可能就是沿袭了殷商的雅言。

第二，简牍帛书研究成果已经表明秦汉时期影母与以母关系密切。张儒先生对竹书、帛书中的通假字进行统计后发现秦汉时期以

① 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57页注17。

②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8页。

③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0215条姚孝遂按语。

④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79~181页。

母与影母的通假次数多达 151 次,几遇数是 20.8。^①李玉先生的统计数字是:影以通假次数是 40 次,几遇数 32.8,处于常常通假的临界线。李先生还认为中古“影”母在秦汉时期分别与舌根擦音“晓”和舌尖塞音声母“以”相通假,接近“常常”通假的临界线的现象表明:中古“影”母在秦汉时期可能是个介于擦音和塞音的喉音声母。^②金理新先生对此做了很好的解释,他认为上古汉语的 f-辅音前缀附加在舌尖塞音 d-之前,构成 fd-复辅音声母,中古为喻母四等(实际是三等);附加在舌尖塞辅音 th-之前构成 fth-复辅音声母,中古为晓母三等或一等,极个别演变成晓母二等;而附加在舌尖塞辅音 t-之前,中古为影母。^③

第三,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也表明:以纽字中一部分来源于喉牙音。如“乌”和“鸕”,“嫫”和“鸕”、“益”和“易”等。^④

第四,方言资料中也有不少“影”、“以”相通的例证。例如:

殄(影)——殄(以) 《方言》卷二:“殄,殄,微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病而不甚曰殄殄。”^⑤

僂(以)——约(影) 《说文》:“僂,自关而西,物大小不同谓之僂。”杨雄《方言》:“陂,僂褻也。自山而西,凡物细大不纯者谓之僂。”郭璞注曰:“言俄僂也。”马宗霍先生认为《方言》与《说文》所言只是

① 张儒《关于竹书、帛书通假字的考察》,《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第37~443页。

② 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15页。

③ 金理新《上古汉语语音系》,合肥:黄山书社,2002年,第152页。

④ 孟蓬生《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













⑤ 本书所引《方言》资料均来自指周祖谟《方言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词微异而意无殊。”^①李恭先生注曰：“天水以西通谓物之大小不同处曰‘偃’，或累言之‘偃偃兒’。作‘约’亦可。”^②

镛(以)——温(影) 李恭先生《陇右方言发微》：“陇右人形容钟声宏大而余音深长者，曰‘有镛声’。‘镛’读若‘温’。‘温’为影纽，‘镛’为喻纽，声音最近。”^③

通过分析以上资料，可见在秦音中以母与影母关系很密切，当是秦方言的一个突出特点。据我们考察，以母与影母相通的例子仅见于甲骨文和秦文字，因此秦音中的这一特点很可能源自商代语音。

二、以母与牙音见组的关系

在甲骨文、金文及战国各系文字中都有大量以母与见组谐声或通假的例子，如甲骨文“君”(见母)字作，从尹(以母)声。春秋早期的番昶伯者君鼎“君”字作，番昶伯者君盘作，可证“君”、“尹”同音；“姬”(见母)字作，从臣(以母)声；“姜”(溪母)字作，从羊(以母)声；西周金文“钧”(见母)假借“匀”(以母)为之，作 (虢鼎)；戎方鼎“淮”(匣母)字作，从唯(以母)声；五祀卫鼎“营”(以母)假借“荣”(匣母)为之，作；何尊“裕”(以母)假借“谷”(见母)为之，作；战国秦、楚文字“欲”(以母)皆从谷(见母)声，作 (诅楚文)“欲”(睡虎地·秦律杂抄 30)“欲”(郭店·老子甲 5)“欲”(玺汇 3098)；鄒子匡“永”(匣母)假借“兼”(以母)为之，作；齐侯敦“熙”(晓母)假借“配”(以母)为之，作；土軍錡

① 马宗霍《〈说文解字〉引〈方言〉考》卷二·二十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② 李恭《陇右方言发微》，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1页。

③ 李恭《陇右方言发微》，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28页。

“軍”(见母)字假借“勻”(以母)为之,作“勻”;秦文字“邪”(以母)字作“𠄎”(睡虎地·秦律十八种 89),三晋文字作“𠄎”(玺汇 2142),“𠄎”(货系 886),皆从牙(疑母)声;秦、楚文字“藥”(以母)皆从樂(疑母)声,作“𠄎”(秦印·藥丹)“𠄎”(郭店·五行 28)“𠄎”(郭店·五行 29)“𠄎”(玺汇 1384);齐、秦及三晋文字“与”(以母)皆从牙(疑母)声,作“𠄎”(綸罽)“𠄎”(乔君钺钺)“𠄎”(睡虎地·秦律十八种 123)“𠄎”(中山王霁鼎)“𠄎”(中山王玉片)“𠄎”(侯马·宗盟类 198:10),等等。

由上引例证可知,以母与牙音见组的谐声或通假关系当是殷周雅言的语音特点之一。春秋战国各地语音都继承了这一特点,秦方言是华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所以在秦音中以母与见组的关系尤其突出。以下是仅见于秦系文字材料的例子:

(一)以——见

𠄎(以)——𠄎(见)“𠄎”字仅见于秦系文字。在秦简中常与“𠄎”、“𠄎”相通假。《说文》:“𠄎,读若龠。”“龠”,古音在以纽药部,“𠄎”、“𠄎”均为见纽宵部字。

翼(以)——冀(见)春秋早期的秦公罽“冀受明德”中“冀”字作“𠄎”,即“翼”字。“冀”古音在见纽微部,“翼”在以纽职部。《荀子·修身》:“行而供冀,非渍淖也。”杨倞注:“供,恭也;冀,当为翼。”

𠄎(郭,见)——𠄎(以)“郭”与“𠄎”为一字分化。甲骨文作“𠄎”(合集 29797)“𠄎”(合集 31981),可隶作“𠄎”。关于“𠄎”的读音,段注“𠄎”字下云:“《玉篇》曰:‘𠄎,度也,民所度居也,字音古博切。此云古文𠄎者,盖古读为庸,秦以后读如郭。’”朱德熙先生则认为“𠄎”在先秦就有“庸”和“郭”两种读法。^①《石鼓文·吴人》“𠄎”字作

^① 朱德熙《古文字考释四篇·释𠄎》,《古文字研究》第8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

“𡗗”，鼓文曰：“□曾受其章，□□𡗗离逢。”郭沫若先生认为“章”、“逢”为韵，“章”读为“塘”，^①可证“章”在秦音中确有以母东部之读音。

舉(见)——與(以)“舉”字最早见于秦文字，作“𡗗”（睡虎地·语书6）“𡗗”（睡虎地·为吏之道9）“𡗗”（秦印·咸鄆里舉）“𡗗”（陶汇5·63），从手與声。中山王𡗗壶“舉”假借“猥”为之，作“𡗗”。

鹽(以)——監(见)秦文字“鹽”字从監声，作“𡗗”（集证）“𡗗”（睡虎地·秦律十八种182），楚文字作“𡗗”（包山147），齐系文字作“𡗗”（亡鹽戈），皆为会意字。

容(以)——谷(见)秦文字“容”字作“𡗗”（蕘阳鼎）“𡗗”（睡虎地·封诊式20）“𡗗”（秦印·赵容印），皆从谷声。睡虎地秦简《封诊式》：“甲、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钱、容（镕），来诣之。（20）”“容”当读为“镕”，指钱模，知秦音中“容”读以母。楚、齐及三晋文字“容”皆从公声，作“𡗗”（九店M621·6）“𡗗”（郭店·语丛一47）“𡗗”（陶汇6·83）“𡗗”（公朱左官鼎）。

均(见)——匀(以)秦文字“均”从匀声，作“𡗗”（睡虎地·秦律十八种114）“𡗗”（睡虎地·法律答问187），而楚文字和三晋文字“均”皆从旬声，作“𡗗”（蔡侯钟）“𡗗”（郭店·老子甲19）“𡗗”（郭店·尊德义34）“𡗗”（包山43）“𡗗”（𡗗钟）“𡗗”（玺汇782）“𡗗”（中国玺印集粹）。

盈(以)——𡗗(见)“盈”字仅见于秦文字，作“𡗗”（石鼓文·霪雨）“𡗗”（睡虎地·效律21），从皿𡗗声。《说文》：“𡗗，秦以市买多得为𡗗。”马宗霍先生认为“𡗗”与“盈”意义相关，并引《诗经》“我𡗗酌彼

^①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79页。

金盞”证明“盞”亦有“满”义。^① 慧琳《一切经音义》引《说文》：器满也。从皿从盞，盞亦声。”“盞”字古音在以纽耕部，“盞”在见纽鱼部。

橘(见)——肴(以)“橘”字仅见于秦文字，作“𣎵”（秦印·橘监）“𣎵”（橘印），从木肴声。古音“橘”在见纽质部，“肴”在以纽质部。

遗(以)——贵(见)西周金文“遗”字作“𣎵”（旗作父戊鼎）“𣎵”（鹿侯钟），所从之“𣎵”象双手指间遗漏水滴或米粒状，以表遗漏之意。^② 中山王𣎵方壶“遗”字作“𣎵”，包山楚简作“𣎵”（简18），郭店楚简作“𣎵”（老子甲38），皆沿袭西周金文之形。秦文字作“𣎵”（秦印·遗仁）“𣎵”（秦印·王遗）“𣎵”（秦印·杨遗），均从贵声。

秦汉方言资料中以母与见母相通的例证亦多见，如：

《说文》：“犹，獾属。一曰陇西谓犬子为猷。”《说文》：“驹，马二岁曰驹。”“犹”、“驹”同源。^③

《方言》卷一：“嘏，奕，大也。……秦晋之间凡物壮大谓之嘏，或曰夏。”“夏”字古音在匣纽鱼部，“嘏”在见纽鱼部，“奕”则为以纽铎部字。

《方言》卷九：“戟，楚谓之钅。凡戟而无刃秦晋之间谓之钅，或谓之鎡。”“鎡”古音在以纽真部，钅在见纽月部。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梦楚子伏而盐其脑。”李恭注曰：“盐与咀同，谓咀嚼其脑。故《方言》曰‘盐，且也’。‘且’与‘姑’音同。即陇语所谓‘咀骨头’也。”^④“盐”字古音在以母谈部，“咀”（姑）在见纽鱼部。

① 马宗霍《〈说文解字〉引〈方言〉考》（卷二·二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② 张世超《金文形义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0258条。

③ 孟蓬生《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6页。

④ 李恭《陇右方言发微》，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9页。

《周官·大师》：“下管，播乐器，令奏鼓鞀。”郑众注云：“鞀读为道引之引。”李恭注曰：“甘谷、武山一带，称导引乐声之小鼓曰‘鞀鼓’，‘鞀’读如‘干燥’之‘干’。古音‘鞀’在以纽真部，‘干’在见纽元部。”^①

(二)以——疑

在秦文字中的第一人称代词，春秋早期的秦公钟、秦公罍用“余”。战国末年的《睡虎地秦简·日书》，简文中第一人称代词作“吾”，如：“狼恒諱(呼)人门曰：‘启，吾非鬼也。’”(日甲 33 背三)“主君勉饮勉食，吾岁不敢忘。”近年发现的秦駉玉版据曾宪通先生考定为战国末年秦庄王之物。玉版中有第一人称代词八个，五个为“余”，三个为“吾”。^②可见“吾”和“余”在秦国语音中很接近。古音吾在疑纽鱼部，“余”在以纽鱼部。秦音中以母与疑母相通的例子还很多，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危”假为“檐”。

(三)以——匣

阅(以)——穴(匣)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楼陴矢阅(穴)。”整理小组注曰：“阅，当读为穴。矢穴当指城上射箭用的穴口。”^③把“穴”读成“阅”当是具有秦方言特色的说法。

阎(以)——冂(匣)“阎”字仅见于秦文字，作“𠄎”（睡虎地·日书乙 88）“𠄎”（秦印·阎广）“𠄎”（秦印·阎夸）“𠄎”（秦印·阎魁），从冂冂声。

颀(以)——颌(匣)《方言》卷九：“颌，颀，颌也。南楚谓之颌。秦晋谓之颀。颀，其通语也。”

踊、豫(以)——浑(匣)《春秋公羊传·僖公十年》：“踊为文公讳

① 李恭《陇右方言发微》，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28页。

② 曾宪通、杨泽生《秦駉玉版文字初探》，《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1期，第49页。

③ 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71页注13。

也。”何休注：“踊，豫也。齐人语，若关西言浑矣。”

三、关于以母与见组声母的关系的讨论

通过考察，我们可以肯定，以母与见组声母的谐声、通假及同源关系是普遍存在着的，绝非偶然的例外。前贤对以母与见组声母的关系已有不少探讨。如李方桂先生认为跟舌根音互谐的“盐”字可拟作 grj-；^①周祖谟先生也注意到古书异文和简牍帛书中以母字跟牙喉音有关系，推测这部分以母古音也许是由 sg-类复辅音来的；^②潘悟云先生曾讨论一些从以母得声的见母字，如“窑”在《说文》中作“窯”，从“羔”得声。“舉”从“與”得声。他拟“羔”、“舉”为 kl-，“與”为 l-，“窑”为 k·l。^③郑张尚芳先生认为以母与见组的关系可区别为二类：一般大都为 ql-、kl-类，但中古重组类以母合口字原应为 Gwi、Gwe 变来（匀、喬）。^④吴安其先生认为与以母互谐的见组字为 g-l-复辅音，如从“匀”得声的“均”、“钧”、“遗”从“贵”得声，而以母则为独立的 l-。^⑤以母与影、晓、匣的关系也有一些学者进行过研究。如林亦先生认为东南方言中有一部分古以母字当归为匣母；^⑥赵振兴先生发现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与通行本的异文中有三对影母与以母相对应的例子，他认为影母与以母有音理关系，二者一清一浊，

①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4页。

② 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4页。

③ 潘悟云《著名语言学家自选集·流音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8~319页。

④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87页。

⑤ 吴安其《汉藏同源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⑥ 林亦《喻四归匣——古以母演变的另一形式》，《语言研究》2004年第1期，第95页。

符合语音结构的平衡规律。^① 据龚维英的考证,上古秦、楚两族同源。^② 古秦音和楚音中以母与喉牙音之关系都很密切也就不足为奇。以往的研究都认为影母与以母不可能有音理关系,今从秦音资料来看,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二者的关系。从秦文字中“也”都作“毆”这一独特现象来看,秦音中影、以母不分或可看作一种方言特征。上面我们已经提到,李玉先生认为中古“影”母在秦汉时期可能是个介于擦音和塞音的喉音声母。而秦文字资料也表明秦音中以母还与心、邪、书、船、匣母等擦音关系非常密切,这些擦音包含了牙音、舌音和齿音,可见以母是沟通牙舌齿之间的中介或桥梁。孟蓬生先生通过研究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也证明了这一点。^③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战国时期秦音中仍有 Kl-、ql-复辅音。赵彤先生就认为以母以及以母谐声的声母应该是复辅音,以母的上古音应拟作 *ql-,其他和以母谐声的声母相应地拟作其他小舌音加边音的复辅音声母 *Ql-。^④

四、认清以母与喉牙音之关系在古文字考释中的作用

早在 1984 年,李新魁先生在谈到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上古音的研究时就特别指出:“必须充分利用古文字研究的成果,把对古文字的研究和古音的研究结合起来,把古文字(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汉文字)所提供的材料和所展示的问题,运用到古音的研究上来,特别是谐声系统和假借字系列必须进行新的、更深入的研究,找

① 赵振兴、陈灿《〈周易〉通行本与帛书本异文声母研究》,《古汉语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31 页。

② 龚维英《上古秦、楚同源初探》,《江汉考古》1999 年第 2 期,第 59~63 页。

③ 孟蓬生《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22 页。

④ 赵彤《以母的上古来源及相关问题》,《语言研究》2005 年第 4 期。

出确切的、较为完整的体系,为古音的研究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佐证。”^①同样,古文字研究如果不能及时利用音韵学研究的新成果,在很多问题上就难以取得突破,甚至引出错误的论断。例如,本书所讨论的以母与喉牙音的关系问题,依照传统音韵学的观点去分析古文字材料,就会误把一些形声字当作会意字,也可能误认声符,还可能把一些本是双声符字的当作一般的形声字。如:

春秋早期秦公簋、秦公钟有“胤”字分别作“胤”、“胤”。《说文》:“胤,子孙相承续也。从肉,从八,象其长也;从幺,象重累也。”后人多有于《说文》,视“胤”为会意。其实不然,金文“幺”、“玄”不别,“胤”实从“玄”声。古音“胤”在以纽真部,“玄”在匣纽真部。由上文的论证可知古以、匣可通,可谓声近韵同,从玄声无疑。

“運”字最早见于秦始皇的泰山刻石,字作“運”。 “軍”字见于《睡虎地秦简》,字作“軍”(杂律杂抄 12)。《说文》:“運,逄徙也。从辵軍声。”又“軍,从車包省声。”《说文》所言之省声多有问题。战国古文字资料不乏用“匀”为“軍”的例子,可证“軍”当从“匀”声。如中山王罍鼎“軍”从匀声作“軍”,战国赵器土軍罍“勻”用为“軍”^②;三晋私玺有“中匀”氏,见于《古玺汇编》2707号玺,吴振武先生认为“中匀”当读为“中軍”。^③ 进而言之,“運”字的结构当分析为“从辵从車匀省声。”古音“運”在匣纽文部,“匀”在以纽真部,声韵皆近,“運”从“匀”省声无疑。

“郝”字最早见于秦印,均用为姓氏,当为秦国一大姓。《秦印文字汇编》共收“郝氏”印 13 枚。字均或从“亦”作“郝”(秦印·郝氏)。

① 李新魁《汉语音韵学研究概况及展望》,《音韵学研究》第 1 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1 页。

② 汤余惠《战国铭文选》,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9 页。

③ 吴振武《古玺姓氏考》,《出土文献研究》第 3 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 86 页。

亦当为声符。古音“郝”在晓纽铎部，“亦”在以纽铎部，可谓声近韵同。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 51 号简“逆”字作“𦍋”，字变为从“羊”。实际上是一个变形音化的例子，即变从“羊”声。古音“逆”在疑纽铎部，“羊”在以纽阳部，声韵俱近。

总之，上古音、上古方言与古文字研究三者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古文字研究可以为上古音和上古方言研究提供新资料，并作为其研究的依据。同样，利用上古音和上古方言研究的新成果，也往往能使古文字考释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四章

论音随字转

在语言与文字的孳乳分化过程中，常常发生音随字转的现象。所谓“音随字转”是指一个字的语音往往受各种形体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有的是因为其本身形体变化而造成读音的变化，有的是受与之形近的另一字的影响或同声符的一组字的读音的影响而发生音变，有的则是因为误认声符而改变读音。这是汉语中独有的现象，是由汉字与汉语的关系所决定的。由于汉字不是注音文字，人们读书用字的时候，又总希望从文字形体上找到读音的线索，这就自然会出现以下一些情况：

一、把一个字读为与之形近的另一字的读音。郦道元《水经注》称此为“读随字改”或“音从字变”，^①如：

《地理志》：“千乘有延乡县。”世人谓故城为從城，“延”、“從”字相似，读随字改。（卷二十四，瓠子河）

城东北二十里有丹山，世谓之凡山。……“丹”、“凡”字相类，音从字变也。（卷二十六，巨洋水）

二、由于一个字的声旁与另外一些字容易混同，从而有了新的读音。刘钊先生称这一现象为“音随形转”。他举了两个例子：^②

例 1 𩇛和𩇛

① 转引自张永言《郦道元语言论拾零》，《中国语文》1969年第3期。

②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6页。

金文有如下一字：

井季𧈧卣

井季𧈧尊

字从“𧈧”从“史”，清代学者认为此字就是《说文·𧈧部》中的“𧈧”字。《玉篇·𧈧部》下分别收有“𧈧”和“𧈧”字，清纽树玉《说文解字校录》谓：“《玉篇》‘𧈧’上有‘𧈧’，古穴切。兽，似狸。‘𧈧’下有‘𧈧’，生冀切。兽，似狸。疑实一字。石鼓文有‘𧈧’，疑《说文》是‘𧈧’。”从西周金文就有“𧈧”字看，纽树玉的推测无疑是有道理的。“𧈧”字读“古穴”切，是字由“史”讹混为“夬”后的音随形转。《集韵·志韵》又收有“𧈧”字，显然也是“𧈧”字的讹混。

例2 𧈧、𧈧和𧈧

《说文·马部》：“𧈧，𧈧𧈧，马父羸子也。”《集韵·夬韵》：“𧈧，马行疾。”

唐惠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六引《苍颉篇》：“𧈧，马行疾也。”

《说文新附·马部》：“𧈧，疾也。”《龙龕手鑑·马部》：“𧈧，同𧈧。”

“𧈧”和“𧈧”的关系很可能也是本为一字，后来因讹混而分化出两字。只是一时还难以确定是先由“𧈧”讹混为“𧈧”，还是先由“𧈧”讹混为“𧈧”。“𧈧”自然是由“𧈧”讹混而来。“𧈧”和“𧈧”读音的不同也是讹混分化后的“音随形转”。

以上两例都是由于声符“史”、“夬”、“吏”形近造成混同，继而在读音上也发生了变化。

三、受同声符其他字的影响，特别是同声符的常用字的影响，这个字的读音往往变得与同声符其他字同音。李新魁先生曾指出：“有一部分形声字，本有自己的读音，但由于受到相同的声符的影响，也跟着改变原来的读音。……其实质也是追求‘声符相同者读为同音’的原则。如‘贷’字，《广韵》他代切，本应读为 tài，但现代读为 dài（与它同作他代切的‘态’字仍读 tài）。这是因为，这个字从‘代’字得声，同从‘代’字得声的‘袋’、‘岱’、‘黛’等都读为 dài，它为了追求与声符同音，也变读为 dài。又如‘缤’字，匹宾切，因‘宾’读 bīn，所以现代也将‘缤’字读为 bīn。‘谱’字，博古切，因‘普’读 pǔ，现在也将‘谱’

改读为 pū。‘寇’字，呼漏切，本应读为 hòu，后因‘寇’而改读为 kòu。‘恢’字，苦回切，本应读为 kui，后因‘灰’而改变为 huī。‘娟’字，于缘切，本应读为 yuān，后因从‘冂’的‘鵠’、‘涓’等读为 juán，所以也变读为 juān。‘茎’字，户耕切，本应读为 hēng，后因从茎的字‘經’等读为 jīng，故改为 jīng。鲸字，渠京切，本应读为 qīng，后因从‘京’而改读为 jīng。等等。这是‘音因形变’。”^①

四、由于这个字的声符变得不表音，人们误把形体的另一部分当作声符，从而有了新的读音。张涌泉先生指出：“在文字的演变过程中，随着书写形式的变化，语音也会相应发生变化，有时会变得跟原来的读音毫无共同之处。如‘昞’字，由于原来的声旁‘白’变成了‘白’，失去了表音功能；而汉字的结构又多是左形右声，于是人们便‘理所当然’地把‘昞’读作了‘男’音。这种因为字形的讹变而导致读音发生相应变化的语言现象，我们称之为‘音随形变’；这种变化后的读音称为‘俗音’或者俗读。”^②

五、“有边读边，无边读中间”是现代人认字的普遍心理。在这一心理的影响下，有些字的读音就发生了变化。李荣先生在讨论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时，就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字形的影响，并举例加以说明。如“岛屿”的“屿”，在浙江、福建沿海一带常用于地名，如厦门的鼓浪屿，“屿”字厦门话说 su，浙江温岭有个地名叫“长屿”，“屿”字当地话说“zi”，《广韵》上声语韵“屿，海中洲也”，徐吕切，和“序”同音。厦门和温岭的读音都符合音变的规律。按音变规律，“屿”字北京照例读“序”xù。北京一带，在语言里平常不用这个字，只在书面上见到这个字，就照偏旁读成“与”yù了。^③

前贤对“音随字转”做了精到的论述。从他们所举之例来看，多

① 李新魁《从‘同音’现象看语言与文字的某些关系》，《辞书与语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 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论“音随形变”》，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③ 李荣《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中国语文》1965年第2期。

为唐代以后乃至现代楷书中的例子。本书将着重谈谈《说文》以前的古文字资料中所见的“音随字转”现象。

一、因误认声旁而改变读音

1. 歸(帚,章幽或并之)——歸(见微)

《说文》：“歸，女嫁也。从止从婦省，白声。”中古音“白”为端母微部，“歸”为见母微部，因此人们一向对《说文》的解释深信不疑，但从古文字资料来看，“歸”一直到战国时期还从帚声。

甲骨文“歸”字作“𠄎”（合 21661）、“𠄎”（合 22323）“帚”为“笄帚”之“帚”的本字，“帚”为幽部字。“帚”在甲骨文中皆用作“婦”，“婦”为之部字。古音幽侵、之幽、之侵皆可通。裘锡圭先生认为“歸”当是从白帚声之字，此“帚”大概就读“彗”。裘先生又释甲骨文“歸”、“歸”为“习”。^①“习”为缉部字（侵、缉对转）。

裘锡圭先生又指出甲骨文中训为“小阜”的“白”与表示“師”的“白”写法有别，有可能本来是两个字，后来才混而不分的。^②从甲骨文、金文“歸”的字形来看，“歸”所从之“白”是表示“師”的，并不读“堆”。

西周金文“歸”字或沿袭甲骨文之形作“𠄎”（令鼎），或在“帚”形下加动符“又”作“𠄎”（貉子卣），或加动符“彳”作“𠄎”（芮簋），或加动符“辵”作“𠄎”（不殿簋）。在西周金文中，“歸”除用作古国名及归还之义外，还有“赠送”、“回馈”之义，如貉子卣：“王令道歸（饋）貉子鹿三。”芮簋：“王命芮眾叔繇父歸（饋）吳姬怡器。”

楚简“歸”均从辵帚声作“𠄎”（包山 205）“𠄎”（郭店·六德 11）

^① 裘锡圭《殷墟甲骨文“彗”字补说》，《华学》第 2 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35 页。

^②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释殷墟卜辞中与建筑有关的两个词——“门塾”与“白”》，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192 页。

“歸”（上博·诗论 10），《说文》籀文作“歸”与楚简可相印证。郭店楚简《尊德义》：“尊仁、亲忠、敬莊、歸（贵）礼，（20）行矣而无遗，养心于子谅，忠信日益而不自知也。”“歸”假借为“贵”，“贵”为见母微部字。

由西周金文和楚简的用例来看，“歸”字最迟在战国时代已经音变读入微部。我们认为造成这种音变的原因是由于词义的引申。金文中“赠送”之义多用“遗”表示，故“歸”的“回馈”之义后来写作“饋”。《左传·闵公三年》：“歸公乘马。”杜注：“歸，遗也。”可证。“饋”、“遗”皆为微部字。

许慎认为“歸”字从止从婦省、白声的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到了汉代，两种不同来源的“白”不仅形体混同了，而且读音也没有区别，都读入端母微部，变得与“歸”音近；二是因为“歸”多用来表示女子出嫁义；三是因为“帚”的之部读音与“歸”的微部读音已经不同，于是就把“帚”当作是“歸”字之省，用作意符。

2. 改（以之）——改（见之）

甲骨文“改”字作“𠄎”（合 36418）、“𠄎”（合 39465），西周金文作“𠄎”（改盃），战国文字“改”字作“𠄎”（侯马·宗盟类 1:9）、“𠄎”（侯马·宗盟类 194:4）、“𠄎”（郭店·缙衣 17）、“𠄎”（郭店·尊德义 4）、“𠄎”（郭店·六德 19）。李学勤先生指出更改之“改”本是从支已声之字，^①甚确。小徐本《说文》：“改，更也。从支己声。”我们认为“改”本从已声，为以纽之部字，后因声符“己”与“已”形近而混，人们就误以为“改”从己声，古音“己”在见纽之部，于是“改”也随之读入见纽之部。郑张尚芳先生认为“改”的声母本应当为复辅音 kl-，后因垫音脱落，变为 k-。

3. 釐（明宵）——釐（来之）


^① 李学勤《释“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说文》：“鼈，犛牛尾也。从犛省，从毛。”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从犛省，从毛会意，毛亦声。”按朱说是，“鼈”本从毛声，《广韵·豪韵》收“鼈”于“莫袍切”下。由于“鼈”所从之“犛”为“犛”、“犛”、“犛”、“犛”等字的声符，所以“鼈”也被误认为是从毛犛声之字，于是有了来纽之部的读音。《集韵·之韵》：“鼈，十毫曰鼈。陵之切。”“鼈”即被用作“鼈”。

4. 赦(亦,以铎)——赦(书铎)

西周晚期铜器虘匜有“赦”字，作“𠄎”、“𠄎”，从支亦声。从古文字资料来看，一直到汉初，“赦”仍从亦声，如战国晚期三晋兵器十七年春平侯铍“赦”字作“𠄎”，睡虎地秦简作“𠄎”（法律答问 153）“𠄎”（为吏之道 1），马王堆帛书作“𠄎”（战国纵横家书 40）“𠄎”（五行 298），汉初的银雀山汉简作“𠄎”（173）。“亦”为以纽铎部字，可知“赦”一直到汉初还读以母。《说文》小篆作“𠄎”，乃“𠄎”、“𠄎”等形的进一步讹变。“赦”所从之“亦”讹变成“赤”后，人们就误以为“赦”从赤声，《说文》：“赦，置也，从支赤声。”古音“赤”在昌纽铎部，“赦”在书纽铎部。“赦”字读音由以母音变为书母，很可能就是因为其声符的变化造成的。

5. 覩(见,见元)——覩(透元)——覩(明元)

《说文》：“覩，面见也。从面、见，见亦声。《诗》曰：‘有覩面目。’，或从旦。”段注：“旦声。”《说文》谓“覩”从见声，而不谓从旦声，可知“覩”本为见母字，其透纽元部之读音后出，故段注谓“从旦声”。后来“覩”之或体“𠄎”废弃不用，而“覩”又不再读见声，人们就误以为“面”为“覩”之声符，于是“覩”又有了明纽元部之读音。“覩覩”之“覩”，其实就是读为透母之“覩”的后起字，即从“覩”字已看不出“覩”读透母，而另造一个从典声的形声字来表音。《玉篇》：“覩，惭兒。”《切韵·铎韵》：“覩，面惭。”《龙龕手镜·见部》：“覩，面惭也。”

6. 皂(见缉)——匕(帮脂)

甲骨文“皂”字作“𠄎”（合 34388）“𠄏”（合 34602）“𠄐”（合 30499），戴家祥先生认为此即“簋”之象形字，象盛满食物之簋。^①西周金文沿袭甲骨文之形，作“𠄑”（寗吊簋）“𠄒”（作豕商簋）“𠄓”（燧姬簋）“𠄔”（伯嘉父簋）。其中作豕商簋、燧姬簋“皂”就当读为“簋”。战国文字“皂”字有的下部已讹变得近似“匕”，作“𠄕”（信阳 1·41）“𠄖”（陶汇 3·83）“𠄗”（三晋货币 44）。《说文》小篆作“𠄘”，已变从“匕”。

《说文》：“皂，谷之馨香也。象嘉谷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极之。或说皂，一粒也。又读若香。”西周金文“皂”可读为“簋”，可知“皂”本读为见母。战国时期秦国铜器中斂鼎铭曰：“中斂皂鼎。”何琳仪先生认为“皂鼎”字当读为“斂鼎。”^②由此可证《说文》“又读若香”非无据。大徐本《说文》注“皂”之读音为皮及切，则“皂”又有帮纽职部之读音。我们认为“皂”之所以又读入帮纽，是因为“皂”字下部讹变成“匕”后，人们误以为“匕”为声符。古音“匕”在帮纽脂部，与“皂”之帮纽职部之音极近。古文字中不乏之脂相通之例子，如甲骨文“西”借“𠄙”为之，“西”为心纽脂部字，“𠄙”为从纽之部字；战国文字“嫫”从“爾”，或“爾”声作“𠄚”（王子申作嘉嫫盞盂）、“𠄛”（鄢侯簋），“嫫”为泥纽之部字，“爾”为日纽脂部字；“醫”从“毆”声，“醫”为影纽之部字，“毆”为影纽脂部字；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脂”字可借“職”、“織”、“臈”、“識”诸字为之，如《五十二病方·加（痂）》：“取陈葵茎燔冶之，以臈職膏殺，弁以傅瘡。（355）”又“取三岁織猪膏，傅之。（359）”又“□□死人胛骨燔而冶之，以識膏□（357）”《五十二病方·[牡]痔》：“……以臈膏濡，而人之其孔中。（240）”《说文》：“脂，戴角者脂，无角者膏。”《玉篇》：“脂，脂膏冶。”简文“職膏”、“織猪膏”（猪織膏）、“臈膏”、“識




















① 转引自张世超《金文形义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917条。











②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19页。

膏”皆当读为“脂膏”。“職”、“織”、“識”、“職”皆为章纽职部字，“脂”为章纽脂部字。

二、受与之形近的另一字的影响而读为其音

7. 單(端元)——罍(书幽)

甲骨文“罍”(單)字作 (乙 6269)。金文作 (孟鼎)“”(师寰簋)“”(邵钟)“”(罍卣)“”(交鼎)“”(令瓜君壶)“”。裘锡圭先生认为“罍”在古文字中即“單”的繁化。^① 陈剑先生进而指出古文字中“罍”皆当释为“單”。^② 战国文字“戰”、“獸”的用例亦可资佐证,如战国文字“戰”从單作 (盗壶),又从“罍”作 (舍志鼎);“兽”字作 (睡虎地·秦律十八种 120)“”(曾侯乙磬)“”(马王堆·老子甲 36),又从單作 (睡虎地·日书甲种 31 背)“”(曾侯乙编钟·下二 1)“”(郭店·老子甲 38)“”(包山 142)“”(郭店·缁衣 38)“”(马王堆·五十二病方 237)。

郭店楚简《成之闻之》:“《君夷》曰:‘唯冒丕罍(單)称德’何?言疾也。(22)”“罍”字作,读为“單”。长沙楚帛书甲篇:“二曰朱四罍(單)。(4·20)”“罍”字作,用为“單”。凡此可证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等皆读

①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69页。

② 陈剑《据郭店简释读西周金文一例》，《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

“單”。

“狩”与“獸”乃一字分化，甲骨文作“𠄎”（合 10611）“𠄎”（合 10609）“𠄎”（合 28773）“𠄎”（合 28774）等形，在卜辞中皆用作“狩猎”之“狩”。西周金文“獸”除用作人名外，皆用为“狩猎”或“巡狩”义。战国文字中“獸”用为“野兽”义的仅一例，见于郭店楚简《老子》甲本，简文曰：“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虺蚤蛇弗盖，攫鸟猛兽弗扣，骨弱筋柔而捉(33)固。”从犬守声之“狩”字最早见于汉印，作“𠄎”（汉印 10·6）。由春秋战国古文字资料来看，“獸”（狩）乃幽部字。如郭店楚简《老子》甲本：“道恒无名，朴虽细，天地弗敢臣，侯王如(18)能獸(守)之，万物将自宾。(19)”“至虚，恒也；獸(守)中，笃也。(24)”“金玉盈室，莫能獸(守)也。(38)”又《缙衣》：“故君子多闻，齐而獸(守)之。(38)”又《六德》：“道不可遍也，能獸(守)一曲焉。(43)”“獸”皆当读为“守”，“守”为幽部字。

“狩”和“獸”分化后，“獸”用来表野兽义。“𠄎”又是从“獸”中分化出来的一个字，读音仍因“獸”的音，读入幽部。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等字本读为“單”，为元部字，因为字与“獸”字所从之“𠄎”“𠄎”“𠄎”形近，受了“獸”的读音的影响，后来就音变读入幽部，并与“𠄎”混为一字。

8. 𠄎(书幽)——畜(透觉、晓觉)

甲骨文“畜”字作“𠄎”（合 29415）“𠄎”（合 29416）“𠄎”（屯 3121），字在卜辞中皆读为“畜养”之“畜”，如：

王畜马在兹廌……母戊王受…… 合 29415

畜封人 合 3398

春秋金文作“𠄎”（秦公钟）“𠄎”（秦公簋）“𠄎”（栾书缶），在铭文或典籍中训为养育之义，如秦公钟：“咸畜百辟胤土。”《书·盘庚》：“用奉畜汝众。”秦公钟：“咸畜左右。”或训为好，如栾书缶：“余畜孙书也。”





战国文字“畜”字作“𡗗”（秦律十八种 77）“𡗘”（法律答问 108）“𡗙”（秦律十八种 84）“𡗚”（楚帛书丙 3·3），在文中皆训为“牲畜”之“畜”，如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何谓‘家罪’？父子同居，杀伤父臣妾、畜产及盗之……（108）”《秦律十八种》：“及隶臣妾有亡公器、畜生者……（77）”可知至迟在战国时期，“畜”有了读为透纽觉部的音。





《说文》：“畜，田畜也。《淮南子》曰：‘玄田为畜。’𡗗，《鲁郊礼》畜从田从兹。兹，兹益也。”以“畜生”为“畜”之本义，但从甲、金文的字形和用例来看，“畜”的本义当为“畜养”，“畜生”义乃其引申义。表“畜养”之义时“畜”读为晓纽觉部，而表“畜生”义时则读入透纽觉部，这期间有个音变过程。

在上文中，我们讨论了“𡗗”字的形音义，认为“𡗗”在战国以前与“單”同字，后来由于“獸”从“狩”（本从單声）中分化出来后音变为书纽幽部字，人们以为“𡗗”（單）也读书纽幽部，并训为“牲畜”。《说文》：“𡗗，橐也。象耳、头、足凸地之形。古文𡗗下从凸。”就是出于这样的误解。“𡗗”表“牲畜”，与“畜”就成了同义词，又因为二字形近，于是“𡗗”又有了“畜”的读音。南唐徐铉注“畜”的读音为丑六切，“𡗗”的读音为许救切。《广韵》“畜”字下有丑六切、许竹切、丑救切、许宥切，《集韵》“𡗗”字下有丑救切和许六切，可见在唐宋时代“畜”与“𡗗”的音义就混用了。“𡗗”字读许救切、丑救切和许六切显然是受“畜”之音义的影响而来的。













9. 离(来侵)——离(来歌)

“离”是从“𡗗”字分化出来的一个字。甲骨文“𡗗”（禽）字作“𡗗”“𡗘”“𡗙”，西周金文加今声，作“𡗚”（禽簋）“𡗛”（大祝禽鼎）“𡗜”（多友鼎）“𡗝”（不斂簋）“𡗞”（不斂簋二）。战国文字又在“𡗗”字上累加声符“林”，作“𡗟”（货系 2441）“𡗠”（三晋 51）“𡗡”（玺汇 3119），分化出“离”。古音“林”在来纽侵部，“离”从林声，故“离”本当亦为侵部字。


















“離”是从甲骨文 (合 10820 正) (合 10817) (合 6384) 等形演变而来的,睡虎地秦简“離”字作 (效律 28)。

“離”所从之 又省成“艸”,作 (妥阴令戈),“艸”再进一步演变就成了小篆之。小篆“离”字已经变得与“離”之声符 形体全同,故“离”的读音就受了“離”的影响发生了变化,也读入来纽歌部。

10. 平(并耕)——采(并元)

春秋战国文字“平”字作 (颺羌钟) (都公鼎) (拍敦盖) (中山王罍兆域图),或加饰笔作 (簠平钟) (十年陈侯午罍) (平阿右戈) (平陆戈) (阴平剑),其中作   者与“采”字形体非常接近,故“平”又有了读为并纽元韵的音,中古以后读为并纽仙韵。《广韵·仙韵》:“平,《书》传云:‘平平,辨治也。’芳连切。”

11. 百(书幽)——百(并铎)

《说文》:“百,头也。象形。”又“首,百同,古文百也。《象髮,谓之鬢鬢即《象》也。”“百”与“首”本一字,只是繁简不同而已。许慎因其各有所属之字而分为两个部首。金文“百”字作 (詒伯簋) (虢簋),战国文字作 (曾 173) (包山 273) (天遣) (望山 M2·37)。战国楚文字“百”字,作 (信阳 1·29) (郭店·忠信之道 7) (九店 M621·4) (敬事天王钟) (天星观卜筮简) (包山 138) (帛书甲 4·74) (玺汇 3648),与《说文》“百”字古文作 相合。《说文》小篆“百”字作,与“百”之古文 形近,所以人们就把“百”当作“百”的异体,于是“百”又有了“百”的读音,《集韵·陌韵》就收“百”为“百”的异体,注音“博陌切”。

12. 盼(匣支)——盼(滂文)

《说文》：“盼，恨视也。从目兮声。”西周金文“兮”字作“兮”（兮仲簋）“兮”（兮丰兮簋）“兮”（兮熬壶）“兮”（兮吉父簋）“兮”（兮甲盘），与“分”形近，所以汉隶中“盼”字常写得与“盼”形近，如汉印“盼”字作“盼”（汉印四·二），《九经字样》“盼”字作“盼”，张平子碑省作“盼”，《篆隶万象名义》作“盼”。《说文》：“盼，《诗》曰：‘美目盼兮。’从目分声。”受了“盼”字音义的影响，“盼”也有了滂纽产韵之读音。《集韵·产韵》：“盼，美目貌。”又“动目也。匹限切。”

三、因自身形体变化而造成的音变

13. 牙(疑鱼)——與(以鱼)

“與”始见于春秋金文，字作“與”（鞬搏）“與”（乔君征钺），战国文字“與”字多见，作“與”（中山王霁鼎）“與”（中山王玉片）“與”（侯马·宗盟类 198:10）“與”（睡虎地·秦律十八种 123），皆从牙，刘钊先生指出“與”字从牙应为声符。^① 汉代文字多数仍从牙声，作“與”（马王堆·老子甲 16）“與”（银雀山·孙子兵法 95）“與”（武威·仪礼·有司 1）。不过马王堆帛书中“與”已有写作近似从“与”的，如“與”（一号墓竹简 63）“與”（相马经 50 下）。同为汉初的安国侯虎符作“與”，可知汉初“與”所从之“牙”已有讹为“与”的现象。杜忠诰先生认为“牙”讹为“与”是因为“牙”之上齿沿与下齿沿两笔连合为一。^② 我们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是“與”所从之“牙”中间部分左边不封口，就变成了“与”。应该指出的是，伴随着字形的讹变，“與”的读音也发生了变化。“與”本从牙声，“牙”为疑纽鱼部字，则“與”本当读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2页。

② 杜忠诰《说文篆文讹形释例》，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第95页。

为喉牙音,不少古文字资料可资佐证。西周春秋金文常假借“於”或“零”为“與”,如夔匱铭曰:“牧牛则誓:‘乃以告吏况吏芻於(與)会……’”都公平侯鼎:“用追孝于毕皇祖晨公,於(與)毕皇考犀鬯公。”上都公攸人簋盖:“用享孝於皇祖於(與)毕皇考。”乖伯归鬲簋:“享夙夕,好朋友零(與)百诸婚媾。”毛公鼎:“虢许上下若否,零(與)四方……王曰:‘父播,零(越)之庶出入事于外。’”“零”既假借为“與”,又用为“越”,“零”、“越”均读喉音;大盂鼎“零”既借为“粵”又用为“於”,还假作“與”;善鼎:“余其用格我宗子零(與)百姓”。叔夷钟:“军徙旄零(與)毕行师。”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郭店楚简《老子》乙种四号简“與”和“牙”并用:“绝学无忧,唯~~與~~(與)呵,相去几何?美~~與~~(與)恶,相去何若?(4)”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自梁献书于燕王章》:“寡人~~與~~(與)子谋攻宋,寡人恃燕赵也。(56)”《春秋事语》“公子牙”之“牙”作“𠄎”,与“𠄎”、“𠄎”之别仅在于下部一横划是否穿透,据此可知“𠄎”、“𠄎”为“牙”字无疑,假借为“與”。

诸多证据表明“與”本读为喉牙音。《说文》:“與,党與也,从舛从与。”许慎不说“与”为声符,是因为声符“牙”已讹变为“与”了,但“與”还读喉牙音。又《说文》:“与,赐予也。一勺为与,此与與同。”“与”训“赐予”乃“與”之本义,可证刘钊先生认为“与”是从“與”简省分化出来是对的。^① 魏晋时期的礼器碑“與”字作“與”、石门颂作“與”,仍从“牙”,可推知“與”音变为以母字必在魏晋以后,大徐本《说文》注“與”、“与”均为“余吕切”,说明最迟在南唐时代“與”、“与”已音变读为以母。

14. 戍(匣月)——歲(心月)

甲骨文“歲”字作“𠄎”、“𠄎”、“𠄎”、“𠄎”等形。胡小石先生指出:“歲作𠄎,与戍形无异。《说文》步部歲从步戍声。《唐韵》相锐切。然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2页。

从歲得声之字，如歲、如噦、如識、如翮、如劓、如齧、如齧、如濺，今读并入喉，无一作齿头音者。则歲之读相锐切，为后起之音无疑。卜辞以𠄎为歲，正是初音如此。《说文》从戌声。戌古作𠄎，与戌亦无分，盖皆象古兵器之形。《释名》：“歲，越也，越故限也。”以越训歲，正取其同声，则汉代歲字犹有喉音之读。”^①按胡小石先生指出“歲”之读“相锐切”为后起之音，闽语“歲”犹说 hue 可证。郑张尚芳先生拟“歲”字古音为 sqhwads，以 qhwads 为词根，亦主喉音说。不过胡先生谓甲骨文“歲”象戌形则误。甲骨文“歲”皆从戌、戌亦声。西周春秋金文仍从戌声作“𠄎”（利簋）“𠄎”（召鼎）“𠄎”（毛公鼎）“𠄎”（国差罇）“𠄎”（公子土斧壶）。战国时期除楚系文字外，“歲”皆仍从戌声，而楚系文字“歲”皆从月作“𠄎”（大府鎛）“𠄎”（鄂君启舟节）“𠄎”（會志鼎）“𠄎”（包山 2）“𠄎”（望山 M1·7）“𠄎”（信阳 1·3）“𠄎”（郭店·太一生水 4）等形。我们认为楚文字“歲”所从之月亦表音，古音“月”在疑纽月部，“戌”在匣纽月部，楚音与他系语音有别乃正常的方言差异。马王堆帛书中“歲”有的从戌作，如“𠄎”（阴阳五行甲 250）“𠄎”（战国纵横家书 67）“𠄎”（五十二病方 359），有的仍从“戌”作，如“𠄎”（天文云气杂占 A062）“𠄎”（十问 035）“𠄎”（二三子问 01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阴阳五行》甲篇“歲”既从戌作“𠄎”，又从戌作“𠄎”，由此可知帛书中“歲”仍当读为戌声。战国文字“歲”作“𠄎”（睡虎地·效律 20）“𠄎”（马王堆·天文杂占 2·4）等形很容易在“𠄎”内添一横笔讹为“戌”。汉代文字中“歲”全都写成从“戌”作，如银雀山汉简“歲”皆从“戌”作“𠄎”（简 541）“𠄎”（简 949），居延

^① 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三编·读契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2~103页。

汉简作“𦏧”（甲 646），武威汉简作“𦏧”（仪礼·少牢 1），流沙坠简作“𦏧”（小学 5·20）。《说文》：“𦏧，从步戌声。”可知至迟在东汉初“𦏧”已音变为心母字。本书所强调的是“𦏧”的读音在汉代因为字形讹变从戌而发生音变，由戌声变读为戌声，即音随形变了。

四、因误认两字为一字异体而混淆读音

15. 肆（心质）——肄（以质）

甲骨文“肆”字作“𠄎”、“𠄎”、“𠄎”，西周金文“肆”字作“𠄎”（毛公鼎）“𠄎”（毛公旅鼎）“𠄎”（何尊）。《说文》：“肆（肆），习也。从聿彡声。”“肆”本不从聿，但战国以后的文字里已讹成从聿或从隶作，如“𠄎”（玺汇 5120）“𠄎”（玺汇 5572）“𠄎”（秦陶 1232）“𠄎”（马王堆·纵横家书 265）“𠄎”（银雀山·孙臧 156）“𠄎”（武威·少牢 12）。

西周金文“肆”皆假借“肆”为之，如禹鼎、大盂鼎、天亡簋、虎簋、臣谏簋等铭文中“肆”皆当读为“肆”。春秋时期晋国的郤钟“肆”字作“𠄎”，齐国的洹子孟姜壶作“𠄎”，《说文》小篆作“肆”，可见“肆”本从“隶”声，《说文》：“肆，极陈也，从长隶声。”可证。汉隶皆从聿作“肆”（武威·土相见 16）“肆”（曹全碑）。

从金文资料来看，“肆”和“肆”本同音，“肆”读为心母乃后来的音变。在“肆”音变读心母后，由于人们误以为“肆”和“肆”为异体字，所以“肆”也有了读心母的读音。《集韵·至韵》：“肆，《说文》：‘极陈也。一曰遂也，故也，又姓。或作肆、肆’。息利切。”

16. 𦏧（羊，以阳）——𦏧（书，阳）

甲骨文有字作“𦏧”（合 10168）“𦏧”（合 10967）“𦏧”（合 5772）

“𩚑”（合 9476），罗振玉释为“𩚑”。^①“𩚑”在卜辞中假作“养”或“庠”。^②《说文》：“𩚑，煮也。从鬲羊声。”《集韵·阳韵》：“《说文》：‘煮也。’或作𩚑、𩚑、𩚑。”《玉篇》：“𩚑，煮也。亦作𩚑。”由此可知“𩚑”与“𩚑”后来成为异体字。

甲骨文“𩚑”字作“𩚑”（合 38243）“𩚑”（合 15882），或从𠂔声作“𩚑”（合 15879）“𩚑”（合 15883）。商代铜器“𩚑”字作“𩚑”（奄妇姑鼎）“𩚑”（作父乙𩚑鼎），与甲骨文大体一致。西周金文沿袭甲骨文之形，作“𩚑”（𩚑鼎）“𩚑”（史颂鼎）。西周早期的索谏爵作“𩚑”，借“将”为“𩚑”。“𩚑”在西周金文中就有训为“煮”的例子，如𩚑鼎：“𩚑用兹金作朕祖文考弈伯𩚑牛鼎。”春秋金文“𩚑”皆与“彝”联言，借代指彝器，字作“𩚑”（曾侯仲子游父鼎）“𩚑”（曾子仲諫鼎）“𩚑”（王作𩚑母鬲）。

“𩚑”和“𩚑”都出现在一期甲骨文里，二期、三期则只见“𩚑”，不见“𩚑”。这很可能是由于不同书手受了各自方音的影响而使用了不同的字。金文中“𩚑”和“𩚑”的用法可以证实我们的推测。金文有字作“𩚑”（麦方尊）“𩚑”（麦方彝）“𩚑”（史颂簋），可隶作“𩚑”，徐中舒先生认为“𩚑”与小克鼎之“𩚑”皆当读为“将”，^③黄德宽先生引楚简再证徐说，并指出“𩚑”乃“将”之本字。后来本字为借字所夺，故“将”行而“𩚑”废。^④其说可信。“𩚑”与“𩚑”当为方言之别。

①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656、2657条。

②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656、2657条。

③ 徐中舒《金文叢辞释例》，《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555～556页。

④ 黄德宽《说𩚑》，《古文字研究》第24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72～276页。

毛诗《国风·召南·采蘋》：“于以湘之？维錡及釜。”“湘”，《韩诗》作“𩚑”。“𩚑”即“𩚑”字异体。由此推知“𩚑”的声母本当为 sl-。甲骨文“𩚑”从月声，最初当为 z-。两字来源不同，但后来都变为书母字。大徐本《说文》注“𩚑”的读音为“式羊切”，可知最迟在唐代“𩚑”已音变为书母字。“𩚑”字就是“𩚑”音变为书母后产生的异体字。《广韵》注“𩚑”的读音为“式羊切”，可知最迟在宋代“𩚑”也音变为书母字，二字可谓殊途同归。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𩚑”、“𩚑”皆表“煮”义，人们就把它们当作异体字，因此“𩚑”音变为书母字后，“𩚑”也随之音变读书母。

第五章

论字随音变

长期以来,在谈论古人的造字法或造字思维的时候,人们总以为造字之初古人是先采用象形、指事、会意这三种表意的造字法造出大量的表意字之后,为了表达无形可象的意义才采用假借,而形声造字法又是为了解决过多的假借所带来的文字使用和认读上的困难而采用的补救措施。然而事实上正如裘锡圭先生所指出的:“在文字形成过程中,表意的造字方法和假借方法应该是同时发展起来的。”^①孙常叙先生也指出:“象声写词法(假借和形声)是先秦文字体系的组成部分,没有它,其他三种写词法只能是蕴毓在图画文字的写词因素,不能写话记言。”“象声写词法犹如一把开山巨斧,它凿破浑沌,使蕴育在图画文字的写词因素蜕化出来,质变成为词的书写形式——用以写话记言的文字。”“象形、象事、象意、象声四种写词法创建了我国原始的先秦文字体系。”^②裘、孙二位先生之言意,谓古人在造字之初就已经使用表音的造字方法。据笔者统计,《古文字类编》所收一期甲骨文中形声字就有近一百二十字,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形声字原来是以假借字为声符而造的后起形声字。这说明形声造字法不会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页。

② 孙常叙《假借形声和先秦文字的性质》,《孙常叙古文字学论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94、495、498页。

晚于假借。^① 于省吾先生《释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指出了一些象形字实际上还含有表音成分,如“羌”、“姜”、“眉”、“麋”、“天”、“须”等。于先生还在《释古文字中附划因声指事字的一例》一文中发明了指事字的一个通例,即有一类指事字是在某个独体字上附加一种极简单的点画作为标志,赋予它以新的含意,但仍因原来的独体字以为音符,而其音读又略有转变。于先生所论诸字中在甲骨文一期就已出现的有“吏”、“东”、“夕”、“干”、“百”、“甘”、“今”、“少”、“并”、“氏”。^② 刘钊先生曾指出文字分化现象中有一类现象叫简省分化,指一个文字形体借用另一个文字形体的一部分,同时接受“母字”的读音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如“负”是截取“府”字的一部分而成的一个字;“丌”是截取“其”的下部而成的;“与”是截取“與”字的一部分而来的等。^③ 古文字研究还表明在汉字演变音化与意化这一矛盾运动中,音化的趋势十分明显。^④ 文字受逐渐增强的音化趋势的影响,人们常常将一个字的形体的一部分,人为地改造成与之形体相接近的可以代表这个字字音的形体。刘钊先生名之曰“变形音化”,并做了大量的研究。^⑤ 所有这些研究都证明音在古文字构形和演变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早在1985年,李新魁先生就提出“字因音变”这一术语。李先生所谓的“字因音变”指以下几种情况:^⑥

① 参见拙文《〈文源〉的文字学理论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第76~79页。

②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35~462页。

③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2页。

④ 林志强《汉字的阐释》,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53~56页。

⑤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8~89、109~117页。

⑥ 李新魁《从“同音”现象看语音与文字的某些关系》,《辞书与语言》,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1. 有些形声字的声符由于读音变化了,由原来声符与整个字同音而变为不同音,有时就改用新的声符(即另造一字)以求同音,使声符能更好地表示整个字音。如“袴”字改为“裤”,是因为“夸”(古在鱼部)旁离 ku 音已较远。“箸”字(古音也在鱼部)改为“筯”字,也是因为“者”旁离 zhu 音较远。这是声符因古今音变而更换。

2. 有的字是因口语的读音保存古音,而书面语的读音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音与字发生较大的矛盾,所以另造新字(往往是添加声符)。如古人称父为“父”,口头上一直保存 ba 的音,ba 就是父字上古的读法。但“父”字属古音的鱼部字,后来它的读书音随着其他鱼部字一起变为 u 的音,声母也从重唇音变为轻唇音,但口语(特别是楚方言)的口语仍存 ba 音。结果,人们即在“父”字下加上一个表示读音的“巴”,这样,“父”字与“爸”字就分化了。同样,古代称母亲为“母”,原读 ma 音,后来母字随其他鱼部字变为 u 的音,但口语仍存 ma 的音,因此人们另制一个形声字“妈”来表示口语的“母”。这样,因古今读音的不同(口语音与读书音的不同),使父—爸、母—妈分化为不同的字。“荼”与“茶”、“夫”与“罢”、“怖”与“怕”,都是如此。它们反映了不同的字音层次和字形层次。“父”、“母”二字从字形上说,是古的层次;但在书面语的读音上,却是今的层次。“爸”、“妈”二字,从字形上说,是今的层次,但在口语音上,却是古的层次。音与形之间存在着互有参差的情况。这些字的出现,同样表明人们重视音读的差异,企求以改变字形(或另造新字)来表现不同的读音。

3. 有的字因方言读音的差异,为了符合不同方言的读音,使该“字”与方言“词”形成真正的同音关系,就常常用增加声符或另造新字的办法来表示。如“火”字,上古音本属微部(江有诰《谐声表》入脂部),两汉时,它动摇于微部和歌部之间。但有的方言(如齐、楚方言)中仍保持脂(微)部的读音,读为与“毁”字音比较接近。结果,有人便为它加上声符,一是写作“毁”或“焜”,杨雄《方言》十:“齐言焜火也。”一写作“燥”。《方言》:“燥,火也,楚转语也。呼愧反。”

4. 某些形声字在使用过程中,声符可因同音而互换,结果造出

了新的字,形成异体字。如“糧”与“粮”、“餽”与“饋”、“麵”与“麪”、“泛”与“汎”、“鞣”与“鞋”等。

李先生还强调指出:“人们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由于文字所代表的读音(这个读音在形声字中往往由声符来表示)发生变化,音与字(形)之间出现使用上的差异或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之一,就是更换或添加声符,以期字形与音、义相符合。这表明读音在这种矛盾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李先生之见堪称卓识,虽然他所讨论的“字随音变”现象主要是中古以后包括现代汉语中的,但这些现象实际上是贯穿着整个汉字发展过程的。因此我们不烦照录,以明其说。

本书将要论及的则是从殷商时代到汉代这一时间跨度里的“字随音变”现象。主要探讨的是文字受音的影响而造成的形体上的变化。这其中包括音与文字分化、受音的影响造成的文字使用上的讹混、形声字声符的变化、变形音化以及文字中某些饰笔由于被误认为是声符而固定成为形体中的一部分等现象。

第一节 音是文字分化的枢纽

汉字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不断的孳乳与分化的过程。“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这一本质特性决定了声音在文字孳乳和分化过程中的枢纽作用。黄侃先生曾指出:“古今文字之变,不外二例:一曰变易,一曰孳乳。变易者,声义全同而别作一字;孳乳者,譬之生子,血脉相连,而子不可谓之父”。“孳乳、变易皆有其根,故孳乳、变易之根皆文字之根。既有其根,虽变化至巨而声音、训诂无变,故声音又为文字之根。执声音以求文字之根,至为简易。执文字之根以穷其枝叶,则文字粲然明矣。”^①黄侃先生称“声音”为“文字之根”,可谓卓识。刘钊先生对此也有精辟的见解,他说:“对一个形体加以不同的改变,是古文字孳乳分化新字的一个最主要的手段,这种改变形体分

①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4页。

化新字的方法一般都是以声音为枢纽的。”^①曾宪通先生亦十分重视音在文字分化过程中的作用,他指出:“文字的简省和分化,除了形体本身的条件之外,还要受到义和音的制约。”^②

正确认识音在文字分化中的枢纽作用,往往使古文字考释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迎刃而解。如西周金文有字作“𣎵”(何尊)“𣎵”(交鼎)“𣎵”(散盘)“𣎵”(长由盃)“𣎵”(单伯钟)“𣎵”(墙盘)等形,字从“辵”从“𣎵”,其声符“𣎵”是释读的关键。自清代以来已有不少学者考释过“𣎵”字,如清人吴大澂、刘心源释“来”;方浚益、孙诒让释“束”;郭沫若、李亚农先生释“木”;张政烺先生释“𣎵”,认为字在铭中读为“弼”;黄德宽先生把“𣎵”释为“𣎵”,认为原字在铭中读为“弼”;汤余惠先生释“𣎵”为“𣎵”,读为“佐”。^③诸说在字形或通解原文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远未得到公认。陈剑先生从语音演变和文字分化的角度提出新见,认为“𣎵”是从“𣎵”分化出来的一个字,在铭文中皆当读为“仇”。“𣎵”与“𣎵”最初声韵都很相近,后来读音发生变化,声母分入见系和端系。它们后代读音的较大差别,反映了语音的历史发展。这种语音的分化体现在字形上,就是它们最初可能共享一个字形,读音的变化促使文字分工明确,最终导致“𣎵”与“𣎵”分化成字形和读音都有区别的两个字。^④








又如,甲骨文有字作“𣎵”(合 10820 正)“𣎵”(合 10817)“𣎵”(合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② 曾宪通《“高”及相关诸字考辨》,《古文字研究》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73页。

③ 以上诸说转引自陈剑《据郭店简释读西周金文一例》,《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二),北京:燕山书社,2001年。

④ 陈剑《据郭店简释读西周金文一例》,《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二),北京:燕山书社,2001年。

6384)等形。罗振玉释“羅”，并谓：“古羅、離為一字。離从佳离声。古金文“禽”作‘’，下从‘’，知‘’即‘’，而移‘’中之隹于旁，又于‘’上加‘’，许君遂以为离声。”姚孝遂先生认为释“羅”不确，指出卜辞中“𠄎”与“𠄎”都是擒获之意，但还是有别。“𠄎”的对象只限于禽兽，而“𠄎”的对象还可以包含“敌人”。^①冯时先生肯定字当释为離，并指出：古文字“離”本为会意字，其所表之义并非以罕羅写，而应是写自罕中逃逸，遂有丧失之义。^②关于“𠄎”的释读，多以为“擒”之初文，何琳仪先生则认为字当为“离”之初文。^③

今按：罗振玉释“羅”，并以“羅”、“離”为一字，虽未必正确，但他指出“離”在字形上与甲骨文“𠄎”的演变关系却颇有道理。姚先生的意见则有利于读通卜辞文句。何先生认为“𠄎”不是“擒”之初文而是“离”之初文，算说对了一半。“𠄎”确实是“离”的初文，但也是“擒”的初文，也就是说，“禽”（擒）与“离”为一字分化。“𠄎”加“今”声分化出“禽”，加“林”声分化出“离”。战国文字有字作“”（货系 2441）“”（三晋 51）“”（玺汇 3119），旧皆释为“离”，读为“離”。我们认为字所从之“”当为声符，“”尚未音变为来母歌部，而仍为侵部字。“”所从之“”又省成“艸”，作“”（妥阴令戈），《说文》小篆作“”则为进一步的省变。睡虎地秦简“離”字作“”（效律 28），可见从形体演变的角度看，从“𠄎”到“離”的分化过程与由“𠄎”到“离”的分化过程是一致的。

从语音演变的角度看，“𠄎”与“离”以及“𠄎”与“離”的关系也是一样的。由“禽”和“离”的分化关系来推断，我们认为“𠄎”和“𠄎”的

①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826条。

② 冯时《释“離”》，《古文字研究》第27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89～95页。

③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871页。

读音当为复辅音 gl-，“离”和“離”的来母歌部之读音当是复辅音分化后音变的产物。

上举二例，可见文字分化与语音演变的关系十分密切。以往的研究多以为文字的分化是为了分化词义而产生，很少涉及音。然而，古文字实际表明，大多数具有分化关系的字之间不仅具有语音上的联系，而且是由于语音发生了变化造成的。因此本书将着重讨论语音演变所造成的文字分化现象。

一、我们认为只有形音义都独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化。然而，古文字实际表明：具有分化关系的两个或几个字在字形上虽然已经有别，但往往在很长时间内仍互相通用。这说明它们的读音还是一样的，还没有真正分化，而导致它们真正分化的契机正是语音的演变。如：

1. 以(以之)——台(透之)

“台”是由“以”字加“口”为繁饰而成的一个字。“台”字最早见于西周早期的扶父鼎，作“𠄎”，铭曰“扶父作□台鼎。”从铭文看，“台”很可能还是“以”的繁写。春秋战国时期古文字资料中“以”、“台”的用例可以证明我们的这一推测。因为这期间的古文字资料“台”绝大多数用为“以”，仅一例不能确定读为“以”，即春秋晚期的其台钟，铭文只有两个字“其𠄎”。楚简中“台”皆读为“以”，“怠”皆从以声作“𠄎”（郭店·性自命出 45）“𠄎”（郭店·语丛一 67），亦可证“台”一直到战国晚期仍为“以”之异写，并未分化。“以”、“台”二字真正分化当发生在“台”音变读透母之后，分化的时间约在汉代。

2. 今(见侵)——含(匣侵)

甲骨文有字作“𠄎”“𠄎”“𠄎”“𠄎”“𠄎”等形，旧皆释为“今”。西周金文“𠄎”（师旗鼎）“𠄎”（师虎簋）“𠄎”（召伯簋）“𠄎”（师虢簋）等旧亦被释为“今”。林义光认为金文作“𠄎”“𠄎”等形，当是

“含”之初文，“𠂔”为口之倒文，亦口字，“𠂔”象口含物形。^①按林说甚确。我们认为甲骨文中旧被释为“今”的都应改释为“含”，假借为“今”。“今”为时间名词，无形可象，故假借“含”为之。甲骨文中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甲骨文中倒口多变为“𠂔”形，如“𠂔”（合 19078）“𠂔”（合 4720）“𠂔”（合 18553）“𠂔”（合 18664）“𠂔”（合 20770）等。战国时期“含”除了沿袭甲骨文、金文之形外，还增“口”为繁饰作“𠂔”（郭店·语丛 1·38）“𠂔”（中山王霁鼎）“𠂔”（燕下都 215·11）“𠂔”（信阳 1·32）“𠂔”（包山 134）“𠂔”（望山 M56）“𠂔”（江陵 M370·2）。由从口诸字仍读为“今”来看，可知“今”、“含”还未分化。马王堆帛书“今”“含”已截然分用，如《十问》“含”字“𠂔”（简 63），“今”字作“𠂔”（简 67），《二三子问》“含”字作“𠂔”（简 21），“今”字作“𠂔”（简 8）。由此可知“今”与“含”真正分化当在汉初，此时“含”音变为匣母。李新魁先生曾指出晓匣二母在战国以前当归入见溪群，^②“今”与“含”的分化关系可为之佐证。郑张尚芳先生拟“含”之声母为 g ，将此匣母归入群母，使之与见母清浊相对，也是支持李说的。

3. 鄉(晓阳)——卿(溪阳)——饗(晓阳)




“鄉”、“卿”、“饗”在甲骨文、金文中同用一字，均作“𠂔”（宰亩簋）“𠂔”（透簋）“𠂔”（虢季子白盘）“𠂔”（趯鼎）。睡虎地秦简“鄉”尚与“卿”字无别，作“𠂔”（日书乙种 248）。马王堆帛书“卿”与“鄉”在字形上已有分别，如《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卿”字作“𠂔”（简









① 林义光《文源》，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依写本石印，线装本三册，1920年。

② 李新魁《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

120)，“鄉”字作“鄉”（简 115）“鄉”（简 007），但在读音上还没有区别，“卿”、“嚮”、“鄉”通用无别，如《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有东卿（嚮）室（120）。”《天文云气杂占》：“兵在外龙之卿（鄉）也（A057）。”《昭力》：“鄉（卿）大夫之事也。（7）”《老子》甲本：“若鄉（饗）于大牢（129）。”《武威汉简》已见“饗”字，作“饗”。最迟在《说文》时代“饗”、“鄉”、“卿”已分化为形音义都有区别的三个字。

4. 豈(端侯)——喜(晓之)——鼓(见鱼)

甲骨文“豈”字作“豈”（合 9260），象鼓形，为“鼓”之初文。甲骨文有“鼓”字，作“鼓”（合 6945）。“豈”与“鼓”在卜辞中通用无别。“豈”加“口”又分化出“喜”，甲骨文“喜”字作“喜”（合 17517 白）。唐兰先生指出：“喜者象以盛豈，豈即鼓形也”。“以象意字声化例推之，喜当从口豈声。豈、喜二字，后世读音迥异，然卜辞嬗或作嬉。金文鼓字，沈儿钟作‘’，可证古音豈、喜相近也。”^①曾侯乙墓乐律钟“某钟之喜”或作“某钟之豈”，均读为“某钟之鼓”。李家浩先生据此认为“喜”有异读，即一读晓母之部，一读同“鼓”（见纽鱼部）。造成异读的原因很可能是误认声旁。^②我们认为卜辞“嬉”所从之“喜”仍是“豈”字，下面的“”乃装饰性部件。合集 17517 白“喜”仍是“豈”，其辞曰：“辛丑帚喜示四屯。”“帚喜”即“婦嬉”。沈儿钟“鼓”所从之“喜”。曾侯乙墓乐律钟之“喜”亦然。

战国楚文字中“鼓”所从之“豈”下皆有装饰性部件“”，作“”（沈儿钟）“”（郢王子钟）“”（王孙弃钟）；“喜”皆从豈作“”（天卜）“”（望山 M1·180）“”（包山 7）“”（郭店·性自命

① 唐兰《殷虚文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8页。

② 李家浩《从战国“忠信”印谈古文字中的异读现象》，《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出34)、“𩇑”(郭店·语丛二28)、“𩇑”字作“𩇑”(包山145),左边所从形当为“𩇑”加饰件“𠂔”。从上引古文字材料来看,“喜”乃“𩇑”加饰件“𠂔”构成。在战国楚文字中“喜”还没有彻底分化成独立使用的一个字。

5. 帝(端锡)——啻(书锡)

“啻”是由“帝”加“口”为繁饰而成的,作“𩇑”(刺鼎)“𩇑”(戠簋)“𩇑”(师酉簋)“𩇑”(师虎簋)“𩇑”(陈侯因咨敦)。“啻”在西周金文中四种用法:(1)读为“適”,如师酉簋:“司乃祖啻(適)官。”(2)读为“敵”,如戠簋:“俾克毕啻(敵)。”(3)读为“禘”,如刺鼎:“啻(禘)邵王。”(4)读为“帝”,如买簋:“其用追孝于朕皇祖啻(帝)考。”由此可见西周时期“啻”还与“帝”同字,“啻”所从之口还只是繁饰,小孟鼎“𩇑”读为“禘”,亦可证“𠂔”与“𠂔”皆为繁饰。从古文字资料来看,一直到战国晚期“啻”还没有从“帝”字中分化出来,即加了“口”的“啻”与“帝”仍为一字。如春秋晚期的蔡侯尊:“祇盟尝啻(禘)。”战国早期的者汜钟:“勿有不义訖之于不啻(適)。”战国晚期的陈侯因咨敦:“绍纒高祖黄啻(帝)。”九店楚简“𩇑(帝)龙”;望山楚简:“□南方又敏,与𩇑见。(77)”袁国华先生认为“𩇑”乃“青帝”二字之合文。^①“啻”与“帝”的分化当发生在“啻”音变读书母之后。《说文》:“啻,语词也,不啻也。从口帝声。一曰:啻,謔也。”

二、文字分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为假借字另造新字。从语言文字实际来看,并非一造出新字,语音就随着新字发生变化。新造出的字在读音上与原来的读音一开始并没有区别,后来才发生变化。只有当二字在读音上有了区别,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分化。如:

^① 袁国华《望山楚简校录·江陵望山楚简“青帝”考释》,台北艺文印书馆,2004年,第35~38页。

6. 冬(端冬)——终(章冬)

甲骨文“终”字作“𠄎”（合 916 正），姚孝遂先生认为字象絳丝之器，在卜辞中假作终极之意。^① 西周金文“终”字形体略有变化，作“𠄎”（井侯簋）“𠄎”（颂壶）。甲骨文、西周金文均未见明确表示四时之“冬”的用法，春秋中期或晚期的都儿壘铭曰：“唯正十月初冬吉。”“冬”假借“终”为之，作“𠄎”。战国文字始见四时之“冬”字，作“𠄎”（陈璋方壶）“𠄎”（玺汇 2207），与《说文》古文“𠄎”相合，又作“𠄎”（包山 2）“𠄎”（郭店·老子甲 8）“𠄎”（楚帛书乙一·一六）。饶宗颐、曾宪通先生指出楚帛书“𠄎”与陈驛壶之“𠄎”、古玺之“𠄎”、三体石经古文之“𠄎”结构相同，为四时之终的专字。^② “终”字作“𠄎”（曾侯乙编钟）“𠄎”（商鞅方升）“𠄎”（郭店·老子乙 13），又作“𠄎”（陶汇 3·1149）“𠄎”（帛书）“𠄎”（睡虎地·日书乙种 239）“𠄎”（郭店·语丛一 49）。从战国文字“冬”与“终”的用例来看，二字虽然在形体上已有区别，但读音仍然相同，如睡虎地秦简“冬”字作“𠄎”（秦律十八种 94），“终”字作“𠄎”（效律 30），但《日书》甲种“冬”字仍用为“终”，简文曰：“辛丑生子，有冬（终）。（147 正三）”又如郭店楚简“冬”字作“𠄎”（老子甲 8），“终”字作“𠄎”（郭店·老子乙 13）“𠄎”（郭店·语丛一 49），但“冬”又可假借为“终”，如《五行》：“君子之为善也，有与始，有与冬（终）也”；再如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甲篇“冬”字作“𠄎”（简 194），“终”字作“𠄎”（简 109），而“冬”又假借为“终”，如《十问》：“冬（终）身无殃（21）”。《经法》：“冬（终）而复

① 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5页。

② 饶宗颐、曾宪通《楚帛书》，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第37页。

始(66)。”《十六经》：“鲜能冬(终)之。(128)”春秋时期的徐王子蒯钟、沈儿钟、王孙遗者钟、许子鬯罍等铜器铭文有辞曰“中(终)翰且扬”，“终”皆假借“中”为之，“中”为章母字，那么是不是“终”也已经音变为章母字了呢？战国时期的鸟虫箴铭带钩：“勿可折冬(中)。”“中”假借“冬”为之，可知“中”仍与“冬”同音，“终”、“中”皆未读入章纽。银雀山汉简虽还有一例用“冬”为“终”的例子，但这很可能是抄手出于尊古的考虑而保持原有的写法，大体来看，在银雀山汉简里“冬”与“终”已分化为形音义独立的两个字。

7. 从(从东)——纵(精东)

西周直至春秋金文中“纵”皆假借“从”为之，西周金文如毛公鼎：“翩翩四方，大从(纵)不静。”蔡簋：“汝毋弗善效姜氏人，勿使敢有疾，止从(纵)狱。”春秋金文如洹子孟姜壶：“其民都邑懂婁，无用从(纵)尔大乐。”战国时期已有“纵”字，如战国亡纵熊节有“纵”字，作“𠄎¹¹”，睡虎地秦简“纵”字作“𠄎”（法律答问 63），龙岗秦简作“𠄎”（简 71）。但战国文字资料乃至西汉的《史记》中仍有大量“从”与“纵”通假的例子，^①这说明两字在读音上还没有区别，“纵”音转为精母大约在东汉。

8. 酉(以幽)——酒(精幽)

甲骨文、金文“酒”皆假借“酉”为之。战国简帛文字资料中始见“酒”字，作“𩚑”（睡虎地·日书甲种 23）“𩚑”（马王堆·杂疗方 43）“𩚑”（马王堆·十问 80）“𩚑”（马王堆·谴策 1·173），但睡虎地秦简和马王堆帛书大多数“酒”仍假借“酉”为之，楚系文字资料中“酒”全借“酉”、“𩚑”、“𩚑”，可见战国时期“酒”的读音与“酉”仍同，大概在汉代“酒”不再假借“酉”，即“酒”一直到汉代才真正从“酉”中分化出来。

^① 详见本书第二章《中古精母字来源之古文字学证据》部分。

9. 臧(精阳)——藏(从阳)

西周及春秋战国金文“臧”字作“𠄎”（甚謏臧鼎）“𠄎”（纪伯子窳父盨）“𠄎”（臧孙钟）“𠄎”（曾子旂鼎）等形。在西周乃至汉代的古文字资料里“藏”皆假借“臧”为之。《说文》里“臧”、“藏”才真正分化为两个字，“臧”音转为精母。

10. 屯(定文)——纯(禅文)

西周春秋金文中“纯”皆假借“屯”为之。战国文字中始见“纯”字，作“𠄎”（陈纯釜）“𠄎”（中山王𠄎鼎）“𠄎”（望山2·8）“𠄎”（包山261）。楚简中加了意符“糸”的“纯”字多表缘边义，而训为“皆”的“纯”则仍写作“屯”。^① 令狐君嗣子壶：“承受屯（纯）德”，亦可证战国时期“纯”仍与“屯”同音。《诗·召南·野有死麕》：“白茅纯束。”郑笺：“纯读如屯。”《左传·哀公十八年》：“执孙蒯于纯留。”《汉书·地理志》引“纯留”作“屯留”。由此可知“纯”音变读禅母当在汉代后期，“屯”、“纯”成为形音义有别的两个字后，也就不再通用了。

11. 唯(以微)——雖(心微)

西周金文“雖”假借“唯”为之，如何尊：“尔有唯（雖）小子无识。”春秋金文已见“雖”字，作“𠄎”（秦公簋），但春秋战国文字“雖”仍大量地假借“唯”为之，如蔡侯纽钟、蔡侯搏：“余唯（雖）末小子。”中山王𠄎鼎：“佳（雖）有死臯及三世。”同铭“佳”用为“唯”；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不穀唯（雖）小，已悉起之矣。（265）”郭店楚简“唯”多读为“雖”，作“𠄎”（成之闻之15）“𠄎”（老子甲18）；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它日唯（雖）有不吉之名，无所大害。（137）”凡此诸例皆可证“雖”与“唯”在战国时代仍同音。银雀山汉简里仍有不少用“唯”为“雖”的例子，这说明“雖”音变读心母当在汉代后期，“唯”、“雖”成为

^① 朱德熙《战国文字研究》（六种），《朱德熙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2～35页。

形音义皆有别的两个字后,就不再通用了。

三、同字分化是指由同一个字分化出两个以上形音义都不同的字。母字往往承担多种义项,有本义,有引伸义,也有假借义。为了便于区别,人们就采用一字多音的办法,使得代表不同义项的词在读音上有所不同。随着读音的改变,人们又给表示不同读音的词造了不同的字,于是就分化出两个以上形音义都不同的字。如:

12. 自(从质)——鼻(并质)

甲骨文“自”字作“𠄎”(合 226 正)“𠄎”(合 27437)。卜辞“自”字有三种用法:a、用为本义“鼻”;b、用为其引申义“自己”;c、用为其引申义“由”、“从”。金文“自”无用为本义“鼻”者。“自”既然是“鼻”的本字,音当与“鼻”同,《说文》“皇”字下谓:“自读若鼻。”可证。“自”、“鼻”两字上古韵部同属质部,但声母的发音部位却相差甚远,“自”为齿音从母,“鼻”为唇音并母。如何解释“自”与“鼻”之间的语音关系成为一道难题。裘锡圭先生认为“𠄎”可能本有“自”、“鼻”二音,代表两个同义词。后来才在表示“鼻”的“𠄎”上加注“畀”声,分化出“鼻”字。^①

音韵学家试图从音变的角度解释“自”与“鼻”的分化关系。如洪家义先生认为“鼻”在古代实际语言中念复辅音 bdz,^②何九盈先生则拟 sb。^③郑张尚芳先生认为“自”(sblids)转注为“鼻”(blids),^④即“自”、“鼻”语根同为 blids,“自”的 b 声母因冠音 s-影响转为从母。《方言》卷十三:“鼻,始也。梁、益之间谓鼻为初,或谓之祖。”“祖”在汉初还读为从母,可知至迟在汉初有些方言中“自”已音转为从母,这正可与“鼻”字出现的时代相印证。用于本义的“鼻”字最早见于郭店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7页。

② 转引自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0700条。

③ 何九盈《商代复辅音声母》,《音韵丛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④ 郑张尚芳《上古汉语的 S-头》,《温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

楚简《五行》作“𦘒”（简 45），时代稍后的马王堆简帛也有用作本义的“鼻”字，作“𦘒”（五行篇 209）、“𦘒”（合阴阳 107）。我们推测，“鼻”字的出现正是因为“自”的读音发生变化，即用作本义的“自”仍读唇音，故加“鼻”声，以示本音本义，而用为假借义的“自”音变为齿音。

13. 丝（心之）——兹（精之）

甲骨文“丝”字作“𦘒”（合 36013），商代金文作“𦘒”（商尊），西周春秋金文作“𦘒”（辛伯鼎）“𦘒”（留鼎）“𦘒”（何尊）“𦘒”（毛公鼎）“𦘒”（伯康簋）“𦘒”（匜君壶）等形。西周春秋金文“丝”除用作本义外，皆假借为“兹”，可知“兹”与“丝”一直到春秋时期还同音，读为心母。战国时期以后“兹”音变为从母，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宽容忠信（12 壹），和平毋怨（13 壹），悔过毋重（14 壹），兹（慈）下毋陵（15 壹）……”“为人父则兹（慈）（40 贰）……父兹（慈）（46 贰）子孝，政之本也（47 贰）”“除害兴利（50 贰），兹（慈）爱万姓（51 贰）。”“兹”皆当读为“慈”。郭店楚简《唐虞之道》：“闻舜兹（慈）乎弟□□□□□□（23）为民主也。（24）”“兹”读为“慈”，“慈”为从母字。大约在东汉后期，“兹”才音变为精母字。“兹”与“丝”语音上的变化导致了字形上的分化，战国时期二字在字形上才开始分化，“丝”沿袭金文“𦘒”形，如“𦘒”（睡虎地·日书甲种 119 反）“𦘒”（信阳 2·2）“𦘒”（郭店·缁衣 29）。“兹”则继承“𦘒”形，如“𦘒”（陈猷釜）“𦘒”（陈猷簋）“𦘒”（者汭钟），或在上端加饰笔作“𦘒”（石鼓文·车工）“𦘒”（玺汇 1508），《说文》小篆就是沿用了“𦘒”。二字在词义上也有了分工，“丝”表本义，“兹”用作代词。

14. 晶（精耕）——星（心耕）

甲骨文“星”、“晶”同字，作“𦘒”（合 98）“𦘒”（合 10344 正）“𦘒”（合 11504）“𦘒”（合 18648）“𦘒”（合 21419）等形，又从生声作“𦘒”

(合 11489)“𠄎” (合 11491)“𠄎” (合 11501)。西周金文“星”字作“𠄎” (麓伯星父簋)。战国楚系文字始见“晶”字,作“𠄎” (曾 179)“𠄎” (郭店·性自命出 15),在简文中皆用如“叁”,可知“晶”与“叁”同音,读入心母。《说文》:“晶,精光也。从三日。”“星,万物之精,上为列星。一曰象形从口,古口复注中,故与日同。𠄎古文星,𠄎𠄎或省。”据《说文》可知“晶”之“精光”义,实为“星”之引申义,“晶”当为“星”之后起分化字。“晶”字作“𠄎”,是从金文作“𠄎” (麓伯星父簋)、战国文字作“𠄎” (玺汇 2745)形而来,即截取“𠄎”上部而来,在语音上则由心纽转读为精纽。“晶”与“星”在汉代才真正分化。

15. 𠄎(匣鱼)——粤(匣月)

西周金文“𠄎”、“粤”本一字,作“𠄎” (孟鼎)“𠄎” (毛公鼎)“𠄎” (作册虢卣)。《说文》:“粤,于也。案慎之词也。从案于。”林义光指出:“粤音本如于。毛公鼎‘粤之庶出入于事’,散氏器‘粤猷遽以西’,静敦‘粤八月初吉’,皆以𠄎为之字,字作𠄎,音转如越,故小篆别制一字,其形由𠄎而变,非从案也。或作𠄎,于字,象迂曲形。”按林说甚确,“𠄎”、“粤”本一字,乃鱼部字,后来由于表介词“于”之义的“𠄎”音变读入月部,人们就另造“粤”字表示介词“于”,“𠄎”、“粤”于是成了形音义都不同的字。

16. 尸(书脂)——夷(以脂)

甲骨文“尸”字作“尸” (合 835)、“尸” (合 6466),商代铜器作“尸” (尸作父己卣),象人蹲踞之形。在卜辞中或假借为“夷”,用为方国名,即《说文》“东方之人也”之“夷”;或用为祭名,饶宗颐先生认为自夏殷以来,并有敬尸之礼。^①《礼记·礼器》:“周坐尸,诏侑武力,其

^① 参看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 1996 年,第 3 条引饶宗颐说。

礼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林义光《文源》卷四：“象人箕踞之形。尸古与夷同音，疑即夷居之夷本字。”姚孝遂先生引《论语·宪问》：“原壤夷俟。”《贾子·等齐》：“织履踰夷。”证“夷”为箕踞之义，亦即“尸”之本义。^①

西周金文“尸”字作“𠄎”（师酉簋）“𠄎”（孟鼎）“𠄎”（兮甲盘），均用为“夷”，如西周中期的静簋：“小子𠄎服𠄎小臣𠄎（夷）仆学射。”“夷仆”即出身于夷人的家仆。而“尸”则假借“死”为之，如羌鼎“令羌𠄎司𠄎官”。大孟鼎：“乃召夹𠄎司戎。”毛公鼎：“𠄎毋动余一人在位。”师猷簋：“余令汝𠄎我家。”“死”均假借为“尸”，意为管理。可见在西周时期“尸”与“夷”的读音已有区别。语音的变化也表现在文字形体上，如西周晚期的南宫柳鼎“夷”字作“𠄎”，侯马盟书“夷”作“𠄎”（侯马 156:6），或加义符“土”字作“𠄎”（侯马 156:19），睡虎地秦简“尸”字作“尸”（日甲 112）。“尸”和“夷”最迟在战国时代已经成为两个形、音、义都有区别的字了。

17. 苟（见职）——敬（见耕）

甲骨文“苟”字作“𠄎”（合 21091）“𠄎”（合 21954），乃“敬”之初文。西周金文“苟”字或沿袭甲骨文之形，作“𠄎”（大保簋）“𠄎”（孟鼎），或增“口”作“𠄎”（何尊）“𠄎”（师虎簋）。金文“苟”皆用为“敬”，如夙钟铭：“今夙夕虔苟（敬）。”师虎簋铭：“苟（敬）夙夕勿废朕令。”班簋：“唯苟（敬）德。”何尊：“彻令苟（敬）享哉。”孟鼎：“今余唯令汝孟召荣苟（敬）雍德经。”大保簋：“大保克苟（敬）无咎。”等等。

西周金文已有“敬”字，作“𠄎”（师虎簋）“𠄎”（克鼎）“𠄎”（对盨）“𠄎”（师克盨）等形。战国古玺“敬”字作“𠄎”（玺汇 4171）“𠄎”

^① 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103页。

(玺汇 4724)“𦉳” (玺汇 4299), 或省写成“苟”字, 作“𦉳” (玺汇 4167) “𦉳” (玺汇 4164) “𦉳” (玺汇 5324) “𦉳” (5324) 等形。由此看来, “苟”与“敬”一直到战国时期还未真正分化, 即“敬”仍与“苟”同音同义, 只是形体略有不同而已。大约在战国晚期或汉初“敬”与“苟”彻底分化为二字, 即二字在读音上已经不同, “敬”读入见纽耕部, “苟”读入见纽职部。由于二字语音上有了较大的差别, 所以也不再通用, 如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中“敬”不再假借“苟”为之。

四、复辅音分化造成的文字分化现象。例如:

18. 命(明耕)——令(来元)

“命”与“令”的关系一直成为古有 mr -复辅音的证据之一。同样, 纵观“命”与“令”的分化过程, 可以判定 mr -复辅音消失的时代。

甲骨文“命”、“令”同字, 作“𠄎”、“𠄎”。西周金文“令”字作“𠄎” (康侯簋), 又增“𠄎”分化出“命”字, 作“𠄎” (命簋) “𠄎” (师望鼎) “𠄎” (竞卣)。“命”与“令”虽然在字形上已有区别, 但一直到战国晚期还没有彻底分化。西周金文“令”与“命”常互作, 如同簋: “王命(令)同左右吴大父司场林虞牧。”此簋: “王呼史𠄎册令(命)此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同一篇铭文中“令”既用为本字, 又可读为“命”, 而且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如颂鼎: “王呼史𠄎生册令𠄎……用追孝祈句康𠄎纯佑通禄永令(命)。”小克鼎: “王命膳夫克舍令于成周遯正八师之年……用句康乐纯佑通禄永令(命)。”膳夫山鼎: “王呼史𠄎册令山……用祈句眉寿綽綽永令(命)令终。”据不完全统计, 战国文字仅金文中“命”字当读为“令”例子就不下 40 例, 另外如郭店楚简“命”用作“令”的有 7 例, 包山楚简、曾侯乙墓竹简“令”或写作“𠄎”, 或假借“命”为之, 可知战国晚期的楚音中 mr -复辅音尚未分化。睡虎地秦简“令”与“命”无相通的例子, 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有一例, 银雀山汉简《晏子》有一例。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西汉时期“命”与“令”已彻底分化为形音义独立的两个字, 战国晚期的秦国语

音中 mr-复辅音开始分化,彻底分化则在汉代。

“铃”字的构形及用例可资佐证。西周晚期的毛公罍鼎“铃”字作“𠔁”,春秋晚期的邾公华钟作“𠔁”,许子盨钟作“𠔁”,皆从命声。春秋时期的敬事天王钟:“自作咏命(铃)。”借“命”为“铃”。

西周金文“龄”字作“𠔁”(师鬲鼎)“𠔁”(师克盃),从令声。春秋时期楚系和秦系文字仍从令声作“𠔁”(猷簋)“𠔁”(秦公罍),而齐系文字则从命声作“𠔁”(鞶罍)。这说明在春秋时期齐语中“龄”的声母是复辅音 mr-。

“𦏧”与“𦏨”的分化关系也可证明 mr-的分化在汉代。西周时期的虢季子白盘:“用征𦏨方。”史墙盘:“方𦏨无不𦏨见。”“𦏨”字皆假借“𦏧”字,作“𦏧”;春秋时期的秦公钟、秦公罍、戎生编钟、梁伯戈以及晋公盆等铭文中“𦏨”字皆假借“𦏧”为之。战国郭店楚简《忠性之道》:“君子其施也忠,故𦏧(𦏨)亲傅也。”“𦏧”为“𦏨”之初文,在简文中假借为“𦏨”。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论语·卫灵公》:“……[忠信,行]笃敬,虽𦏧𦏨[之国,行]……(1797)”诸多例证都说明汉初“𦏨”的声母还是复辅音 mr-。“𦏨”字最早见于汉印,作“𦏨”(汉印 13·8)。

甲骨文“𦏨”字作“𦏨”(合 27160)“𦏨”(合 28318)“𦏨”(英 2366),罗琨先生认为“𦏨”在卜辞中指一种名为鹑火的火星。^①“𦏨”字在战国赵币中多见,作“𦏨”“𦏨”“𦏨”等形,皆用为“𦏨”;晋姓名私玺亦见“𦏨”字,作“𦏨”(玺汇 2655)“𦏨”(玺汇 2657),何琳仪先生认为“𦏨”当读“𦏨”。^②战国晚期的𦏨相如铜戈“𦏨”字假借“𦏨”为之,作“𦏨”。“𦏨”从門声,声母最初为复辅音 mr-,但从𦏨相如戈的用

① 罗琨《甲骨文“𦏨”字探析》,《古文字研究》第 25 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5~10 页。

②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 1150~1151 页。

例来看,战国晚期“閼”的声母不再是 $mr-$,而是 $r-$,即 $mr-$ 复辅音已分化。《说文》:“閼,读若舜。”可资佐证。“藺”之声符“閼”的声母本亦为复辅音 $mr-$,但在战国晚期也已分化,读为 $r-$ 。睡虎地秦简有“閼”字,作“𠄎”(为吏之道 23)“𠄎”(日书甲 2)。《为吏之道》:“枪閼(藺)环爰。(23)”整理小组指出“閼”通“藺”,“藺”指插石,乃守城用物。^①《日书》甲种:“结日,作事,不成以祭,閼(吝)。(2)”整理小组认为“閼”读为“吝”。“吝”意谓“小不利”。^②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閼”皆假借为“吝”。“吝”的声母本亦为复辅音 $mr-$,由睡虎地秦简可知战国晚期“吝”与“閼”的声母已不再是复辅音 $mr-$,而是 $r-$ 。《说文》“吝”字下引《易》曰:“以往吝”,“遯”字条下又作《易》曰:“以往遯”,可证“吝”已变为来母字。

19. 土(透鱼)——社(禅鱼)

甲骨文“土”作“𠄎”(粹 17)、“𠄎”(前 5·23·2),在卜辞中用为“社”,何九盈先生拟“社”之声母为复辅音 sth 。^③西周金文未见“社”字,宜侯矢簋仍假借“土”为社。战国文字始见“社”字,作“𠄎”(中山王𠄎鼎)“𠄎”(睡虎地·日乙 164)“𠄎”(包山 210)。“社”与“土”的分化很可能是因为复辅音的分化。郑张尚芳先生拟“土”的上古音为 $tʰaaʔ$,“社”的上古音为 $hljaaʔ$,认为与清浊、带有关。





20. 易(以锡)——赐(心锡)——赐(书锡)——锡(心锡)





甲骨文及商代金文“赐”皆假借“易”为之,西周金文“赐”、“锡”、“锡”都已出现。“赐”字作“𠄎”(庚壶)，“锡”字作“𠄎”(虢季子白


① 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71页注14。

② 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81页注1。

③ 何九盈《音韵丛稿·商代复辅音声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页。



盘)，“锡”字作 (生史簋)，但“易”、“赐”、“锡”、“锡”诸字皆可用为“赐”。以西周晚期的铜器铭文为例，如逆钟：“今余易(赐)汝卅五。”生史簋铭曰：“□伯令生史事于楚伯，锡(赐)赏。”虢季子白盘：“锡(赐)用弓彤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战国早期，如春秋时期的曾伯霁匜：“天锡(赐)之福。”假“锡”为“锡”，又曾伯霁匜“锡”字作，从锡声；郟国“赐”字作 (郟公緘簋) (上郟公敫簋盖)，从易声；战国早期的越王者旨于赐剑、矛或戈铭文中“赐”皆假借“锡”为之。以上诸例皆为楚系文字的用例，可知在楚系文字中“易”、“锡”、“锡”、“锡”诸字尚未彻底分化。

战国中晚期以后“锡”不再假借“易”为之，如 (中山王霁鼎) (睡虎地·日书乙 195) (郟客问量) (越王者旨于赐钟)。纵观从甲骨文到战国时期“锡”的用例，可以清楚地看出虽然春秋时期已出现“锡”字，但在读音上仍与“易”无别，一直到战国“锡”才真正从“易”中分化出来，成为形音义独立的一个字。何九盈先生拟“锡”的上古音为复辅音 sl-。^① 复辅音分化后，“锡”才读心母。

“锡”字音转为心母的时间也应在战国。如天星观楚简“锡”字就训为金属锡，字作。

“锡”与“易”、“锡”分化时间，由于没有可靠的字形资料可资证明，故难以断定。

21. 聿(以物)——筆(帮物)

“聿”为“筆”的初文，甲骨文作。西周早期的执卣铭曰：“尹格于宫。赏执。赐聿聿。”“聿”字作，第二个“聿”字当读为“筆”。《说文》：“聿，所以书也。楚谓聿，吴谓之不律，燕谓之弗。”又“秦谓之筆，从聿从竹。”战国文字可与《说文》互证。楚王领钟“聿”作

^① 何九盈《音韵丛稿·商代复辅音声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8页。

“𠄎”，在铭中假借为“律”；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鬼恒从人游，不可以辞，取女𠄎以拓之，则不来矣。（46背贰）”“𠄎”正写作从竹从聿。何九盈先生据此认为复辅音 pl-在战国已分化，第一辅音变为“𠄎”、“弗”，第二辅音变为聿，“不律”由 pl-分化为 p-和 l-。^①

22. 事(从之)——史(心之)——吏(来之)

甲骨文“事”和“史”同字，作“𠄎”、“𠄎”、“𠄎”、“𠄎”。于省吾先生指出“𠄎”字的造字本义是在“𠄎”的竖笔上端分作两叉形，作为指事字的标志，以别于“史”，而仍因“史”字为声。^②卜辞中“史”、“事”通用无别，可知它们仍未分化。西周早期的御史竞簋、作册矢令簋仍借“史”为事，除此之外，“史”与“事”、“吏”截然分开，“史”作“𠄎”（师西簋）“𠄎”（史簋），“事”和“吏”同字作“𠄎”（邢侯方彝）“𠄎”（孟鼎）。战国文字“事”和“吏”在字形上已分化，“事”字作“𠄎”（陈纯釜）“𠄎”（郭店·语丛一 41）“𠄎”（中山王𠄎鼎）“𠄎”（王孙诰钟）“𠄎”（包山 213）“𠄎”（玺汇 1859），“吏”字作“𠄎”（子和子釜）“𠄎”（郭店·尊德义 22）“𠄎”（睡虎地·效律 24）“𠄎”（玺汇 4295），但读音还一样，古玺“吏”皆当读为“事”可证。汉简和《史记》均未见“事”与“吏”通假之例，二字真正分化的时间约在汉代。分化的契机就是语音的变化，即“事”、“史”、“吏”三字的声母本当为复辅音 sr-，到了汉代，复辅音分化了，“史”和“事”分别读为心母和从母，“吏”读为来母。

24. 立(来缉)——位(匣缉)

西周至战国早期的古文字资料中“位”都写作“立”。中山王𠄎方壶“遂定君臣之位”的“位”写作“𠄎”，但同铭的“臣主易位”之“位”又

① 何九盈《音韵丛稿·商代复辅音声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4页。

②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47页。

写作“立”。同为战国早期的者汜钟“位”仍写作“立”，可知战国早期大部分地区“立”与“位”仍同字，但在中山王国语音里“位”已读“胃”声。战国晚期的包山楚简和郭店楚简已有“位”字，作“𠄎”（包山 224）“𠄎”（郭店·老子丙 10），但郭店简“立”仍可读为“位”，如《缁衣》：“靖共尔立（位）（2）。”上博《缁衣》对应的文句“位”也写作“立”。又上博《孔子诗论》：“甚贵其人，必敬其立（位）。（24）”汉初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和银雀山汉简《孙臧》也有“位”字，但帛书《春秋事语》和《孙子》中的位字仍写作“立”。林沄先生据此认为“立”和“位”在字形上彻底分化是在西汉早期以后才完成。^①关于“立”与“位”的语音关系，也出现两种解释，一种认为“立”有两个读音，“位”的出现是为了分化其中一个读音。^②而主张有复辅音的学者认为“位”的声母为 G^wr。^③复辅音 G^wr 中的流音 r 脱落后，“位”在语音上就不能与“立”相通了，于是就另造新字“位”。

25. 悔(晓之)——谋(明之)

甲骨文“悔”皆假借“每”为之，字作“𠄎”（合 28684）“𠄎”（合 27805）“𠄎”（合 27925）“𠄎”（合 28410），可知“悔”在商代语音中声符为复辅音 hm-。









战国文字有字作“𠄎”（中山王𠄎鼎）“𠄎”（郭店·老子甲 25）“𠄎”（郭店·语丛三 31），从心母声，可隶作“懋”；字又从母声作“𠄎”（郭店·缁衣 22），可隶作“懋”。因为《说文》“谋”字古文作“𠄎”，所






① 林沄《林沄学术文集·王、土同源及相关问题》，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② 林沄《林沄学术文集·王、土同源及相关问题》，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24页。

③ 此为郑张尚芳先生的拟音，参见郑张尚芳《上古音系·古音字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99页。

以学者多认为“懋”、“懋”为“谋”之异体，由楚简“懋”、“懋”皆读为“谋”来看，释为“谋”也有道理，但从字形来看，因为古文字中从心与从言常通用无别，“某”、“每”、“母”三字皆为明母之部字，所以“懋”、“懋”既有可能是“谋”之异体，也有可能是“悔”字。我们认为“悔”与“谋”是由一字分化而来。

上博《容成氏》三号简文曰：“凡民俾敝者，教而（悔）之，飲而食之。”当读为“悔”。第三十七号简文曰：“汤乃（谋）戒求贤，乃立伊尹以为佐。”、“”显系同字，一读为“悔”，一读为“谋”，由此可知、“”的读音为复辅音 hm-。马王堆三号汉墓医书《十问》简 45—46：“舜曰：必爱而喜之，教而谋之，饮而食之……”陈剑先生指出此处“谋”当读为“悔”。^① 据此我们认为当为“悔”之异体，而非“谋”字。

侯马盟书“悔”字作（宗盟类 35:3），用作“悔改”之“悔”。晋玺“悔”字作（玺汇 3054），用为姓氏“每”，可知在战国时期的晋语里“悔”的声母还是复辅音 hm-。燕陶始见“谋”字，作，用作人名。睡虎地秦简“悔”、“谋”二字区别甚明，如《为吏之道》“悔”字作（简 10），“谋”字作（简 34）。

以上证据表明“悔”在楚系和晋系语音中仍为复辅音 hm-，与“谋”尚为一字，但秦系语音中“悔”的声母已不再为复辅音 hm-，而是 h-，“悔”与“谋”也彻底分化为二字。

第二节 语音与形声字声符的变化

形声字一直是古音研究的主要材料之一。段玉裁根据谐声资料

^① 陈剑说见于沈培《周原甲骨文里的“肉”和楚墓竹简里的“肉”或“思”》一文的补记。《汉字研究》第 1 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年，第 364 页。

成功地实现了对古韵的分部,写成了《六书音均表》。他的“同谐声必同部”说已成定论。后来学者又进一步认识到谐声资料同样是研究古声母的可靠材料。傅东华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夫所谓谐声者,本当声与韵无乎不谐。”^①朱声琦先生亦主张“谐声必同声,谐声偏旁相同的一组谐声字,其声母也必然相同或相近。”^②依据这一谐声原则,当代学者在上古音声母的研究上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三点:

首先,新一代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从汉语语音史的角度,为上古音分期。郑张尚芳先生把上古音的研究范围界定在从史前到西晋,分为四个时期:远古(原始汉语,指史前期的远古汉语)、前古(上古前期,指约当殷商的前上古汉语)、上古(上古中期,指约当两周的上古汉语)、次古(上古晚期,指约当汉魏的次上古汉语)。

其次,运用历史语言学的方法,从汉语语音史的角度,构拟上古音系,研究上古语音系统的结构和变化,语音演变的规则和发生机制,以及不同的古音结构、变化在后世汉语方言中的反映等。

再次,复辅音的研究已日趋成熟。“古有复辅音”说的提出就是为了解释形声字声符的声母之间用单辅音无法解释的一些谐声现象。以郑张尚芳、潘悟云两位先生为代表的学者们在复辅音理论的构建以及复辅音构拟方面成绩显著。

由于已经意识到古音具有时间层次这个问题,学者对《说文》的谐声资料的局限性也有了充分的认识,即《说文》中的形声字是经过1000多年的积淀而成的,无法判定每个字的形成年代,所以也就不能成为我们研究的主要依据,而只能作为旁证。目前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对古文字资料中的形声字进行断代,如此才能真正对古音进行分期分域研究,使其更加贴近古音事实。本书将尝试根据形声字

① 傅东华《汉语声纽变转之定律》,《学林》第10辑,1941年。

② 朱声琦《段氏注〈说文〉,重韵不重声》,《山东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

声符的变化所表现出来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来探寻“字随音变”这个问题。

一、语音演变与形声字声符的替换





1. 剝

甲骨文“剝”字作“𠄎”（合 15788），从刀录声，可知“剝”的声母在商代是复辅音 pr-。甲骨文又有字作“𠄎”（合 22376），此形与《说文》“剝”字或体“𠄎”相合，故《甲骨文编》收在“剝”字下。“𠄎”从卜声，古音“剝”、“卜”均为帮纽屋部字，据此则“剝”的声母就是 p-，而不是 pr-。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我们认为在殷商时代很可能也有方言差异，不同的书手难免受其方言影响，从而表现在字形上就是造出了不同的形声字异体。甲骨文“卒”的构形也可证明这一点。甲骨文“卒”字又有两类形体，一类与“衣”同形，作“𠄎”（合 9523）“𠄎”（合 16102）“𠄎”（合 5165），一类从聿声作“𠄎”（合 30990）、“𠄎”（合 30993）“𠄎”（合 32263）“𠄎”（合 34238）“𠄎”（英 2336）“𠄎”（英 2414），裘锡圭先生认为此乃“卒”之异体。^① 卜辞中有大量用“卒”为“猝”的例子，^② 结合战国文字材料，我们认为“卒”在殷商时代乃至战国时期都读为从母。^③ 由“卒”在甲骨文里又有异体“裌”来看，“卒”在殷商时代应该还有一种读为以母的读音。又如，“𠄎”、“𠄎”皆训为“煮”，二字在甲骨文一期均已出现，“𠄎”字作“𠄎”（合 10967）“𠄎”（合

















① 裘锡圭《释殷墟卜辞中的“卒”和“裌”》，《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

② 参看裘锡圭《说甲骨卜辞中“戠”字的一种用法》，《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4页；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第2724页；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多友鼎的“卒”字及其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37页。

③ 参看本书第二章《中古精母字来源之古文字学证据》部分。

5772)等形,“鬻”字作 (合 15879)“鬻” (合 15883)“鬻” (合 38243)“鬻” (合 15882)等形。二、三期甲骨文则只见“鬻”字,不见“鬻”字,这很可能是由于不同书手受了各自方音的影响而使用了不同的字。再如,甲骨文“眾”字作“”,或作,上部变形音化从公声。^①这很可能是因为书手受其方言影响而做有意识的改造。

2. 裘——裘

西周金文“裘”字作 (卫盃)“” (九年卫鼎),从衣求声。又作 (卫簋)“” (次尊),从衣又声。春秋晚期齐国庚壶“裘”字亦从又声作。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同一个人所作的卫盃、卫簋,铭中“裘”的写法不同,卫盃之“裘”字从求声,卫簋之“裘”字则从又声。“求”字上古属幽部,“又”字属之部。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在所有从求声之字中,只有“裘”在之部,而且在先秦韵语中“裘”多和之部字押韵,所以一些古音学者以之为后来转入之部的特字。刘志成先生认为两个形体不同的裘字实际上是方言差异的体现。^②这是值得考虑的意见,据我们考察,西周金文确实存在方言因素,如西周晚期的曼彝父盃“彝”又累加“兄”为声符,作。这种字形又出现在春秋战国齐、楚、秦三系文字中;西周金文“兄”字有一类加“生”声的形体,作 (史梅兄簋)“” (吊趯父卣)“” (帅鼎)“” (吊家父匡)。这类形体在春秋战国文字中仅出现于楚系文字;散盘“道”字从首声作,又从舀声作;鬲伯盃“阴”字作 (鬲伯盃),而永孟作;“始”字从以声作 (颂簋)“”

① 黄天树《殷墟甲骨文“有声字”的构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6本第2分册,2005年。

② 刘志成《两周金文音系的声母》,《语言学问题集刊》第1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

(卫姬鬲),又累加“司”声作“𡩺”(班簋),等等。

3. 廟——庶

西周金文“廟”字作“𡩺”(免簋)“𡩺”(虢季子白盘)“𡩺”(同簋)“𡩺”(元年师兑簋)“𡩺”(师西簋),从朝声。並伯簋“廟”字假借“朝”,作“𡩺”,可证。字又作“𡩺”(蓋方彝),从溥声。那么,“廟”在西周时期的读音应该与“朝”相同,读端纽宵部。战国文字“廟”字见于晋系和楚系文字,晋系的中山王𡩺壶“廟”作“𡩺”,楚简作“𡩺”(上博·孔子诗论 24)“𡩺”(郭店·语丛四 27),皆从苗声。“苗”为明母宵部字。这说明在战国时期的某些方音中“廟”的读音与西周时期不同。《说文》:“廟,尊祖先也,从广朝声。𡩺古文”。按:《说文》实际上记录了两个不同时间层次的形声字,“𡩺”字并不能代表汉代的读音。南唐徐铉注“廟”的读音为眉召切,说明“廟”早已不读“朝”声。后世虽然“廟”、“庶”并行,但读音却以“庶”为准。

4. 𡩺——𡩺

甲骨文𡩺字作“𡩺”(合 39551)“𡩺”(合 9187)“𡩺”(怀 S0475)“𡩺”(合 19124)等形,或加束声作“𡩺”(合 36417)“𡩺”(怀 B1381),甲骨文“𡩺”字作“𡩺”(怀 S1314),又作“𡩺”(合 41410),所从之“束”亦为声符。西周春秋国名“邾国”之“邾”皆假借“𡩺”为之,作“𡩺”(邾公华钟)“𡩺”(杞伯簋)“𡩺”(邾讨鼎)“𡩺”(邾友父鬲),已改“束”声为“朱”声。这很可能反映了“𡩺”字读音上的变化,即在西周春秋时期“𡩺”的读音与殷商时代不同,所以改换声符以适应新的语音。

5. 𡩺——聞

甲骨文“聞”字作“𡩺”(合 6744),西周春秋金文仍沿袭甲骨文象

形的写法而略加繁化，即在人头顶上加表示饰物的“八”、“山”、“巾”等形，作“𦍋”（孟鼎）“𦍋”（利簋）“𦍋”（谏簋）“𦍋”（毛公盾鼎）“𦍋”（克盃）“𦍋”（乖伯簋）“𦍋”（夙吊多父盘）“𦍋”（爰季良父壶），其中谏簋、毛公盾鼎、克盃、乖伯簋、夙吊多父盘、爰季良父壶等“聞”字皆当读为“婚”，可知在西周时期的语音中“聞”的声母为复辅音 hm-。战国楚系文字“聞”或沿袭西周金文之形，作“𦍋”（郟王子钟）“𦍋”（王孙臯钟），楚简“聞”皆从耳昏声，作“𦍋”（包山 130 反）“𦍋”（长沙铜量）；郭店楚简《五行》简中“聞”则一律从采从耳，作“𦍋”（简 49）、“𦍋”（简 23）“𦍋”（简 49）、“𦍋”（简 15）“𦍋”（简 23）“𦍋”（简 26）“𦍋”（简 50），从采声，而《缙衣》、《性自命出》、《语丛四》、《老子丙》、《成之聞之》等篇目中“聞”则皆从昏声作“𦍋”，因此我们认为《五行》中“聞”字写法不是楚系文字的写法，而是抄手受了方音的影响而用的方言字；晋系的中山王鼎“聞”字作“𦍋”，从耳昏声。侯马盟书作“𦍋”，但皆用作“昏”；从耳門声的“聞”字最早见于齐系和秦系文字，齐玺“聞”字作“𦍋”（玺汇 31），齐玺中“聞司马”即官名“門司马”。秦文字作“𦍋”（睡虎地·日书甲种 148）“𦍋”（秦印·聞賜）。

从战国各系文字“聞”的形体及用例来看，秦、齐两系文字因复辅音 hm- 分化，“聞”音变为明母字，所以把“聞”字改造成从耳門声之字，而楚系和晋系语音中仍有复辅音 hm-。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为之佐证，如：金文中许国之“许”或假借“無”为之，作“𦍋”（乔君钺）“𦍋”（鄒箕簋），或从無声作“𦍋”（鄒子匡）“𦍋”（蔡大师鼎）“𦍋”（槃姬鬲），楚简作“𦍋”（望山 M1·18）“𦍋”（包山 212）。“许”为晓母字，“無”为明母字，“许”的声母也是复辅音 hm-。

又如：上文我们讨论“悔”与“谋”的关系时，也注意到二字在楚系和晋系文字中尚为一字，可通用，但在秦系文字中则区别甚明。另外，“悔”字的用例可资证明：西周中期的召鼎“悔”假借“每”为之，铭曰：“召乃每(悔)于氐曰……”西周晚期始见“悔”字，作“𣎵”（墙盘）“𣎵”（不斂簋）。墙盘铭“刑帅吁悔”，裘锡圭先生认为“悔”当读为“谋”。^① 不斂簋铭曰：“汝肇悔(敏)于戎工。”“悔”读为“敏”。可知“悔”的声母在西周时期亦当为复辅音 hm-。战国楚系铜器王孙钟“悔”字作“𣎵”，铭曰：“悔(谋)猷丕飭。”“悔”当读为“谋”；上博《容成氏》“悔”字假借“𣎵”（简 3）为之，“𣎵”即“悔”，从某声。可见战国楚音中“悔”之声母仍为复辅音 hm-。

西周晚期的复公子簋“昏”字作“𣎵”，假借“改”为之。上博《性情论》：“有其为人之假假如也，不有夫束束之心则悉。”“假假”当读为“惛惛”。可知“惛”在战国楚音中声母仍读为复辅音 hm-。

6. 採——播

西周金文“播”字作“𣎵”（师旗鼎），从采声。“采”古为并母元部字，可见西周时期“播”的声母是并母还不是帮母。睡虎地秦简“播”改从番声，作“𣎵”（封诊式 77），“番”为滂母元部字。“播”的声符由“采”替换成“番”，很可能是因为“播”的读音发生了变化。后来“播”读帮母歌韵，则是进一步的音变的结果。

7. 誥——誥

西周春秋金文“誥”字作“𣎵”（何尊）“𣎵”（史𣎵簋）“𣎵”（王孙誥钟），从言升声。郭店楚简“誥”字仍从升声作“𣎵”（缙衣 5）“𣎵”（成之闻之 38）。包山楚简始见从告声之“誥”，作“𣎵”（包山 138）。

^① 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第27页。

“誥”字还见于马王堆帛书《老子》乙种，作“誥”（简 152 上）。古音“卅”在见纽东部，“告”在见纽觉部，觉部为冬部的入声韵。音韵学界对上古音冬部与东部的分合问题一直有争议，如清代音韵学家孔广森主张东、冬为二，影响很大。王念孙则主张冬、东不分，其后于省吾先生、陈秉新先生利用古文字资料证成其说。曾宪通先生显示主张东冬不分，后又修正己说，认为冬侵合韵属于较早期的语音现象，冬东合韵当是冬从侵分出以后的事。^①今按：从曾先生所据的材料来看，都是楚系资料，今从“誥”字声符的变化可证东、冬本来不分，但在楚语中可能是分的。

8. 唐——𪚩

“唐”是从“庚”字分化出来的，甲骨文作“𪚩”、“𪚪”，商代金文作“𪚫”（唐子且乙爵）。西周春秋金文承袭甲骨文之形，作“𪚬”（伯唐父鼎）“𪚭”（叔夷钟）“𪚮”（宋公緡簋）。战国齐玺“唐”字作“𪚯”（玺汇 147）“𪚰”（玺汇 3142），从口易声，与《说文》古文作“𪚱”相合。郑张尚芳先生拟“唐”的上古音声母为 gl-，从古文字实际来看是有道理的。古音“庚”在见纽阳部，“易”在以纽阳部。齐国文字“唐”从易声，说明在当时的齐语里“唐”已音变读舌音。

9. 騶——𪚲

“留”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作“𪚳”（𪚳鼎），从田卯声。春秋战国文字“留”的构形与西周金文相承，而略有变化，作“𪚴”（留钟）“𪚵”（屯留戈）。郑张尚芳先生拟“留”的上古音声母为 mr-。“騶”字的构

^① 参看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内、出兼论古韵东冬的分合》，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63~471页；陈秉新《古韵东冬不分续考》，《阜阳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曾宪通《从“出”符之音读再论古韵部东冬的分合》，《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再说“出”符》，《古文字研究》第25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形可为之佐证。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竹简“騮”字，作“𩇛”（简 147）“𩇛”（简 150）“𩇛”（简 151）“𩇛”（简 169）“𩇛”（简 171），皆从卯声。汉简有从“卯”声作的，如“𩇛”（江陵 168 号汉墓竹牍）“𩇛”（居延简甲 1997），也有从留声作的，如“𩇛”（江陵 167 号汉墓简 2）。上文我们已经提到，汉初 *mr*- 已分化，“騮”变从留声，可以为证。至于汉简也有从卯声作的“騮”，应该是由于抄手仍因原著的缘故。

10. 蚤——蚤

甲骨文“蚤”作“𧈧”（合 4890）、“𧈧”（合 21238），从虫从又，会用手搔抓身上有虫或为虫所咬之处。^① 战国文字未见“蚤”字，但有从蚤声之字，如“骚”字作“𧈧”（秦印·马骚）“𧈧”（秦印·骚），“蚤”字作“𧈧”（玺汇 3334），所从之“蚤”与甲骨文相差不大。马王堆帛书有“蚤”字，作“𧈧”（老子乙前 154）“𧈧”（老子甲后 415）“𧈧”（战国纵横家书 249），仍为会意字。《说文》：“𧈧，啮人跳虫，从虫又声。又，古爪字。𧈧，蚤或从虫。”




“𧈧”为“搔”之初文，本为心母字。据我们研究，“蚤”大约在汉初音变读精母，《说文》小篆从又声就是“蚤”从心母变读精母后在字形上的反映。

11. 犴——狼









甲骨文有字作“𧈧”（合 28317）“𧈧”（合 28323），从犬亡声，可隶作“犴”。罗振玉、王襄、商承祚、唐兰等主张字当释为“狼”，而叶玉森、郭沫若、柯昌济、张单权、姚孝遂等则认为此乃“狐”字。^② 郑张尚

① 裘锡圭《殷墟甲骨文字考释七篇》，《湖北大学学报》1990 年 1 期。

















② 以上两种观点都见于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 1609 条，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1580～1582 页。

芳先生认为从音韵的角度来考虑,当以释“狼”为好。^①“狼”的声符“良”可变形音化从亡声,^②可资佐证。秦文字始见从良声之“狼”字作 (中国玺印集粹)“”(龙岗秦简 2559。“”所从之“良”就变形音化从亡声。由此看来“狼”的声母本应当为复辅音 mr-,到后代脱落成 r-。《说文》:狼,似犬,锐头,白颊,高前,广后。从犬,良声。

12.

“則”字始见于西周金文,作 (何尊) (召伯簋) (格伯簋)。据我们研究,“則”一直到战国时期还读为从母。由从母音转为清母首先发生在战国末年至汉初的楚音中。“則”的精母读音当在汉代以后才有。《说文》:“則,等画也。从刀从貝。貝,古之物货也。 ,古文則。 ,亦古文則。 ,籀文則从鼎。”古文 从册声,“册”为清母字。“則”作 形很可能是因为“則”音变为清母而对字形进行有意识的改造,即变形音化从册声。

二、战国时期方言与形声字异体

众所周知,战国时期是个“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时代。造成“文字异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言语异声”。在战国文字里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字形体,如中山国文字“简”字作、“策”字作、“铸”字作、“良”字作、“易”字作、“上”字作等。楚文字“福”字多从酉作“”;“申”字作 (曾仲大父盃簋)、“戕”字作 (郭店·性自命出 7)、“神”字作 (帛书乙),与“畴”字作 (合 1626) (合 23805)无别;“气”字作 (包山 218) (郭店·老子甲 35) (郭店·语丛一 52)

① 此为郑张尚芳先生审阅拙稿时提出的意见。

② 参看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

“𦉳”（帛书甲 3·72）；“莞”字作“𦉳”（信阳 2·23）“𦉳”（望山 M2·48）“𦉳”（包山 263），皆从关。“歲”皆从月声，作“𦉳”（大府 稿）“𦉳”（鄂君启舟节）“𦉳”（禽志鼎）“𦉳”（包山 2）“𦉳”（望山 M1·7）“𦉳”（信阳 1·3）“𦉳”（郭店·太一生水 4）；“𦉳”字作“𦉳”（天卜）“𦉳”（望山 M1·9）“𦉳”（包山 76）“𦉳”（九店 M56·106），等等；齐系文字“保”字作“𦉳”（十年陈侯午罇），“𦉳”字作“𦉳”（陈逆罇），“𦉳”字作“𦉳”（陈猷釜）“𦉳”（子禾子釜），等等。

尽管战国文字异体众多，但我们仍然能够找出它们变化的规律，因为这些变化都是受各地语音的制约的。在《近二三十年上古音研究概述》部分，我们介绍了目前学术界对战国齐、楚方言及秦汉语音的研究成果，本书将结合这些研究成果，谈谈语音对文字的影响，并寻求互证。

14. 福——𦉳

西周金文“福”字作“𦉳”（井侯簋）“𦉳”（沈子簋）“𦉳”（吊向簋）“𦉳”（善鼎），从示畀声。战国楚系文字“福”多从示从酉作“𦉳”（曾子匡）“𦉳”（信阳 1·12）“𦉳”（包山 206）“𦉳”（郭店·老子甲 38）“𦉳”（帛书乙 10·87）“𦉳”（玺汇 4683），字可隶作“𦉳”或“𦉳”。我们认为这应该是具有楚系方言特色的方言字，“𦉳”、“𦉳”所从之“酉”乃声符。古音“福”在帮纽职部，“酉”在以纽幽部。“福”在楚音中声母为复辅音 pl-，之幽二韵在楚音中也很密切，董同龢先生曾指出之幽合韵是楚方言的特色之一。^① 喻遂生、罗江文两位先生曾撰文反

^① 董同龢《与高本汉商榷“自由押韵”说兼论上古楚方言特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 本第 4 分册，1939 年。

驳此说,认为之幽合韵非楚方言独有,而是通语的特点。^①

15. 奢——𡗗

“奢”字最早见于西周早期的奢簋,作“𡗗”,春秋早期的奢虎匜作“𡗗”。楚系鄠奢鲁鼎“奢”字作“𡗗”^②,沮楚文《秋渊》作“𡗗”,与《说文》“奢”字籀文“𡗗”相合。沮楚文“奢”字作“𡗗”,亦可视为楚文字的写法。因为从沮楚文的内容来看,春秋时期曾有很长一段时间秦楚两国关系密切,所以在语言文字使用上互相影响是在所难免的。古音“奢”在书纽鱼部,“者”在章纽鱼部,“多”在端纽歌部。王力先生曾指出先秦鱼部字“家华牙邪车葭瑕瓜芽野马下夏者雅寡”等字在汉代转入歌部。^③现在看来,在战国楚方言里,已有部分字由鱼部转入歌部。

16. 鑄—盞—針










甲骨文“鑄”字作“𡗗”(合 29687)“𡗗”(英 2567)。西周金文或承袭甲骨文之形,为会意字,作“𡗗”(大保鼎)“𡗗”(作册大鼎),或累加声符“壽”为声符,作“𡗗”(庚午簋)“𡗗”(守簋)“𡗗”(师同鼎)。“𡗗”即“壽”字。西周中期或晚期的楚系铭文楚公冢钟“鑄”字亦从壽声作“𡗗”,但是战国楚系文字“鑄”字则多作“𡗗”(鑄客鼎)“𡗗”(鑄客匜)“𡗗”(禽嵩鼎)“𡗗”(禽志鼎),所从之“𡗗”应该是由“𡗗”(鄂君启舟节)所从之“𡗗”变形音化而来的。由此也看出战国楚系方言

① 参见喻遂生《〈老子〉用韵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西周金文韵文和先秦“楚音”》,《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罗江文的《谈两周金文合韵的性质——兼及上古“楚音”》,《楚雄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② 此从董莲池先生释。参见董莲池《金文编校补》,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2、160条。

③ 王力《汉语语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中“鑄”的读音发生了变化,西周时期为禅纽幽部字,但在战国楚方言里却音变读入以纽侯部。

西周时期晋系铜器晋侯对鼎“鑄”字作,从壽声。战国晋系文字“鑄”字一类为会意字,作 (哀成吊鼎) (郑饗原父鼎),另一类则从 声作 (中山王卣壶) (大梁鼎) (上官鼎) (十年洱阳令戈), 即“肘”字。古音“壽”为禅纽幽部字,“肘”为端纽幽部字。晋侯对鼎“鑄”从壽声,是采用中原雅音。从肘声之字当是晋系方言字。

17. 兄——姓

甲骨文“兄”字作,西周金文沿袭甲骨文之形作 (刺卣) (保卣),或加 声作 (史棗兄簋) (吊趯父卣) (帅鼎) (吊家父匡),构成双声符字“姓”。战国楚系文字“兄”多承袭西周金文作双声符字之形,作 (王孙钟) (沈儿钟) (子璋钟) (嘉宾钟) (姑口句鐘) (敬事天王钟) (黜钟),或作 (鄒陵君鉴),楚简则一律写作“姓”,如 (包山 96) (包山 135) (江陵 M270·3),而他系文字“兄”则无作此形者。古音“兄”在晓纽阳部,“生”在匣纽阳部。

18. 戟

“戟”字最早见于春秋中期或晚期的鄆王戈(《文物》1993年第8期70页图三),字作,从丰声。塞为楚之封君。^① 战国文字“戟”字异体很多,或从丰声作 (元阿左戟) (新弜戟) (曾侯乙戟) (包山 61) (析君戟),或从戟声作 (陵右戟),“丰”为见纽月部字;或从建声作 (曾侯乙戟) (斂戟) (曾

① 王振华《古越阁收藏的几件古代兵器》,《文物》1993年第8期。

37),“建”为见纽元部字;或从各声作“𣪠”(滕侯奭戟)“𣪡”(蔡□□戟),与汗简“格”字作“𣪢”相合,“各”为见纽铎部字。汗简“𣪢”乃假借为“格”;秦系“戟”字作“𣪣”(商鞅戟)“𣪤”(大良造鞅之造戟)“𣪥”(暨吊子戟)。《说文》小篆“戟”字作“𣪦”,与商鞅戟作“𣪣”形同。《说文》:“戟,有枝兵也,从戈从聿。《周礼》:‘戟长丈六尺。’读若棘。”古音“棘”在见母职部。战国文字“戟”字异体正是各地语音不同的体现。

19. 造

战国文字“造”字异体纷呈,秦系文字“造”除作“𣪧”外,还作“𣪨”(秦子戈)“𣪩”(秦子戈);齐系文字“造”作“𣪪”(子禾子左戟)“𣪫”(高密戈)“𣪬”(曹公子沱戈)“𣪭”(滕侯奭戟)“𣪮”(羊子戈)“𣪯”(司马望戈)“𣪰”(曹右庭戈);韩国兵器文字“造”作“𣪱”(十八年戈)“𣪲”(四年雍令矛)“𣪳”(元年郑令矛)“𣪴”(韩钟剑),宜乘之造戟假借“棗”为之;楚系文字“造”字作“𣪵”(宋公得戈)“𣪶”(番仲戈)“𣪷”(斨君戟)“𣪸”(陈公子戈);燕国雁节、鹰节以“舟”为“造”。

综观各系文字,秦系、齐系、楚系各体皆从告(𣪹^①)声;韩国文字“造”从曹声,宜乘之造戟还假借“棗”为“造”,则很可能在韩国的语音中“造”已读为从母;燕国文字“造”写作“舟”,很可能为“船”之省,在燕国语音中“造”读与“舟”同。“造”在各国文字中所体现出的声符上的不同,正是为了适应各国不同的语音。

20. 脰——眚

① 陈剑先生指出“𣪹”与“祝告”之“告”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字。“𣪹”是从甲骨文“𣪺”演变而来,“𣪺”为“艸”之异体,即“艸(草)”字的象形初文。参看陈剑《甲骨金文考释论集·释造》,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127~176页。

寿县出土的楚器铭文有字作“𪔐”（铸客鼎）“𪔑”（铸客鼎）“𪔒”（大子鼎）“𪔓”（大子鎬）“𪔔”（大府鎬）“𪔕”（禽志鼎）“𪔖”（禽肖鼎），朱德熙、裘锡圭先生释为“厨”。^①“𪔐”可隶作“脰”，乃楚文字“厨”的独特写法，包山楚简“厨”字作“𪔗”（简 173）“𪔘”（简 278 背），皆与此同。“脰”从豆声，可知楚音中“厨”读定纽侯部。

三晋文字中“厨”则从朱声作“𪔙”（岢茀鼎）“𪔚”（上乐鼎）。古音“朱”在章纽侯部。

秦系文字“厨”字作“𪔛”（官印 0011）“𪔜”（秦陶 14810），《说文》小篆作“𪔝”，就是沿用此形。《说文》：“厨，庖屋也，从广𪔞声。”古音“𪔞”在禅纽侯部。

过去有的学者认为上古音中章组和知组一样归入端组，由战国秦、楚、三晋文字“厨”字声符的不同可见在战国时期的语音中章组与端组是有分别的。

21. 難——然

春秋时期吴国的者减钟“然”字作“𪔞”，从難声。战国时期秦、楚、晋系文字“然”字皆从朕声，作“𪔟”（睡虎地·效律 54）“𪔠”（郭店·太一生水 4）“𪔡”（郭店·老子乙 15）“𪔢”（中山王𪔣鼎）。楚简多作“朕”。^②古音“難”在泥纽元部，“朕”在日纽元部。

音韵学界对日母是否归泥以及何时有日母尚存争议。如师玉梅先生认为西周时期日母当并入泥母。周祖谟、赵诚两位先生根据出

① 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寿县楚器铭文中的𪔐和𪔑》，《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② 参看李守奎《楚文字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0~261页。

土的汉初简牍帛书中的通假字资料均得出汉初娘日归泥的结论。^①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方言差异的角度去解释。有的方言可以没有日母,如笔者的家乡福建龙岩方言就没有日母,古日母字很大一部分读卜,如“日”、“蕊”、“入”、“然”、“忍”,有的则读n-,如“软”、“染”、“耳”等。从春秋时期吴国的者减钟“然”字从難声这一情况来看,很可能在当时吴国的语音里就没有日母,但从战国“然”字的形体来看,战国时期秦、楚、晋三系语音中“然”确为日母字。

22. 𦉑、恭——覲

西周金文“𦉑”字作“𦉑”(何尊)“𦉑”(段簋)“𦉑”(克鼎)“𦉑”(颂鼎)“𦉑”(𦉑媯鼎),从龍从升,我们认为“𦉑”是个双声符字。西周晚期的曼𦉑父盃“𦉑”又累加“兄”为声符,作“𦉑”,可隶作“覲”。“覲”还见于春秋战国时期齐、楚、秦三系文字,如“𦉑”(陈侯因脊罍)“𦉑”(鲁伯兪盃)“𦉑”(邾公华钟)“𦉑”(邾大宰匱)“𦉑”(王孙钟)“𦉑”(王子午鼎)“𦉑”(秦公簋)“𦉑”(禾簋)等。我们注意到“覲”在春秋战国金文中皆用作“恭”,这应该不是偶然的現象。那么,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一种可能是“𦉑”的声母是复辅音gl-,而“恭”只是g-,所以当“𦉑”假借为“恭”时就添加声符“兄”以示区别。还有一种可能是在当时的齐、楚、秦音中“恭”与“兄”同音,故在借用“𦉑”字的时候就添上“兄”以表音。我们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古音“恭”在见纽东部,“兄”在晓纽阳部。董同龢、罗常培、周祖谟、刘宝俊等先生

① 周祖谟《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音韵学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赵诚《临沂汉简的通假字》,《音韵学研究》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都主张东阳合韵是楚方言的特色。^①

23. 驂——駟

“驂”在战国文字中有两种写法，秦系文字作“𨔵”（石鼓文·吾水）“𨔶”（石鼓文·田车）“𨔷”（马王堆·荆德乙本 95），从参声；楚系文字则从晶声作，如曾侯乙墓竹简“驂”字作“𨔸”（简 150）“𨔹”（简 151）“𨔺”（简 170）“𨔻”（简 143）。曾侯乙墓竹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参”字皆以“晶”为之，无一例外。“驂”字也从晶声作“𨔼”（九店 56·3）“𨔽”（九店 56·7）。凡此皆可证楚文字“驂”确实从晶声。“晶”在楚简中皆读为“参”，乃心母字。“駟”当是具有楚系方言特征的方言字。

24. 鐘——鍾——鍊

战国楚系文字“鐘”有两类形体，一类从童声，如“𨔾”（王孙鐘）“𨔿”（沈儿鐘）“𨕀”（子璋鐘）“𨕁”（蔡侯申鐘）“𨕂”（曾侯乙鐘）“𨕃”（攻敌臧孙鐘）；另一类从重声，如“𨕄”（邾公华鐘）“𨕅”（邾公鈞鐘）“𨕆”（楚公鐘），古音“童”、“重”皆在定纽东部，可见当时楚音中“鐘”还是个全浊声母字。

齐系和晋系文字“鐘”字也有两类形体，一类从東声，如“𨕇”（鲁遯鐘）“𨕈”（笱平鐘）“𨕉”（晋侯苏编鐘十二）；另一类从重声，如“𨕊”（洹子孟姜壶）“𨕋”（己侯鐘）“𨕌”（郟鐘）“𨕍”（鬲羌鐘）。

^① 参见董同龢《与高本汉先生商榷“自由押韵”说兼论上古楚方言特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9年；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周祖谟《汉代竹书和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音韵学研究》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刘宝俊《冬部归向的时代和地域特点与上古楚方言》，《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年第5期。

“東”为端母字，可知即使是同一系方言，也是有区别的，有的地方“鐘”还读定母。

25. 關——關——關

战国各系文字中“關”字的写法有别，楚系文字作“關”（鄂君启舟节），从串声。《说文》“患”之古文作“關”，从關声，可证“關”确可从串声。古音“關”在见纽元部，“串”在昌纽元部。杨剑桥先生把与见系声母关系密切的昌母拟为 $klrj-$ ，^①用来解释昌母与见系声母的谐声关系。

齐国文字“關”字作“關”（陈猷釜）“關”（子禾子釜），张世超先生认为字所从之“卩”即“卯”字。^②古音“關”在见纽元部，“卯”在来纽元部，郑张尚芳先生拟“關”字的上古音声母为 $kr-$ 。

睡虎地秦简“關”字作“關”（秦律十八种 97）“關”（为吏之道 29），从關声，“關”所从之“巛”、“卯”皆声。看来，在秦音中“關”的声母也是复辅音 $kr-$ 。

26. 筍——筍

西周金文“筍”字作“筍”（伯筍父盃）“筍”（伯筍父鼎）“筍”（筍伯盃）“筍”（多友鼎）“筍”（郑伯筍父甗）“筍”（郑伯筍父鬲）“筍”（筍侯匜），从竹句声。战国玺印作“筍”（《中国玺印集粹》），《说文》小篆“筍”作“筍”就是本自此形。包山楚简则从尹声作“筍”（简 180），这表明战国时期楚语里“筍”的读音与“筍”还是有差别的。

① 杨剑桥《论端、知、照三系声母的上古来源》，《语言研究》1986年第1期。

② 参看张世超《金文形义通解》第2111条，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2771页。

第三节 音与讹混

“讹混”是文字演变规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刘钊先生对此做了专题研究。在《谈讹混》一文中他不仅对“讹混”的概念、性质做了界定，还指出了讹混与讹变、义近形旁通用、类化等现象的联系和区别。

“讹混”是指一个文字构形因素与另一个与其形体接近的构形因素之间产生的混用现象。发生讹混的构形因素既可以是单独存在的字，也可以是构成字的偏旁。从广义上看，“讹混”与“讹变”有相同之处，“讹混”可以列为“讹变”的一个小类。从狭义上看，“讹混”与“讹变”又有区别。“讹混”与“讹变”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讹变”所指的构形因素可大可小，既包括独立的字和偏旁的讹变，也包括笔画的讹变，而发生“讹混”的构形因素基本是指可以独立的字和构形偏旁；(2)“讹变”一般是指构形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变，大都是不能逆转的单向发展，而“讹混”则不光有单向的发展，还有两种形态之间的混用，有时是可以互换的双向互动。“讹混”与“义近偏旁通用”不同，“义近偏旁通用”的“偏旁”之间一般情况下形体并不接近，只是因为“义近”才产生互换，而“讹混”的主要特征就是形体接近，混用的偏旁之间“音”和“义”都没有关系（偶然的巧合不算）。“讹混”与“类化”也有一定的关系，有些“讹混”就可以归入“类化”的范畴。^①

在上引文中，刘钊先生虽然认为讹混与音义无关，并把与音有关的讹混现象视为例外。但从他所举的例子来看，有不少就与音有关，如“焉”和“乌”、“易”和“易”、“畱”和“酉”、“又”和“丑”、“赤”和“亦”、“史”和“吏”、“求”和“来”、“茺”和“芷”、“疏”和“踈”等。由此我们认为有一部分讹混应该是由音同或音近造成。如：

1. 隶——聿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9页。

在古文字里，“聿”和“隶”形体非常接近。“聿”为“筆”之初文，甲骨文作“𠄎”“𠄏”，象以手执笔形。“隶”字最早见于春秋晚期的郢钟，作“𠄎”，在铭文中用为“肆”。楚王领钟“聿”字作“𠄎”，写成了“隶”；者汜钟“隶”（肆）字作“𠄎”，又把“隶”写成了“聿”。古音“聿”在以纽物部，“隶”在以纽质部，声韵同近，所以在古文字里，从聿声之字常讹成从隶声，反之，从隶声之字也讹成从聿声。如：

“律”字最早见于商代金文，作“𠄎”（戌铃方彝），从聿声。睡虎地秦简“律”字作“律”（秦律十八种 124）“律”（法律答问 162）“律”（语书 10）；马王堆帛书作“律”（一号墓遣策 278）“律”（要 22），其中作“律”“律”者所从之“聿”“隶”即“隶”字。

“筆”字最早见于睡虎地秦简，作“筆”（日书甲种 46 背贰）。“筆”为“聿”之分化字，本当从聿，秦简作“筆”，显然是把“聿”讹写成了“隶”。

战国文字有“速”字，作“速”（石鼓文·雷雨）“速”（郭店·语丛一 75）“速”（玺汇 802）。“速”为“隶”的分化字，本从隶，但马王堆帛书《相马经》却写成从聿作“肆”（简 4）。

西周金文“肆”皆假借“肆”为之，如禹鼎、大盂鼎、天王簋、虎簋、臣谏簋等铭文中“肆”皆当读为“肆”。春秋时期晋国的郢钟“肆”字作“肆”，齐国的洹子孟姜壶作“肆”，《说文》小篆作“肆”，可见“肆”本从“隶”声。汉隶皆从聿作“肆”（武威·士相见 16）“肆”（曹全碑）。

甲骨文“肆”字作“肆”“肆”“肆”，西周金文“肆”字作“肆”（毛公鼎）“肆”（毛公旅鼎）“肆”（何尊），可见“肆”本不从聿，但战国以后的文字里已讹成从聿或从隶作，如“肆”（玺汇 5120）“肆”（玺汇

5572)“𨾏”(秦陶 1232)“𨾏”(马王堆·纵横家书 265)“𨾏”(银雀山·孙臆 156)“𨾏”(武威·少牢 12)。“𨾏”变从“隶”声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在金文里“𨾏”和“隶”皆用作“肆”，这说明“𨾏”和“隶”本同音；二是因为“𨾏”本从𠄎声，但战国以后“𨾏”已不从𠄎，“𠄎”讹成“矣”。“矣”的读音与“𨾏”远隔，而字的另一部分“𠄎”与“聿”、“隶”形近，故把字写成从聿或从隶。

西周早期铜器小臣𨾏鼎有字作“𨾏”，裘锡圭先生释为“建”，并指出“𨾏”(戎生钟)“𨾏”(蔡侯钟)“𨾏”(中山侯恣钺)“𨾏”(曾 1 正)等形体都是由“𨾏”演变而来的。^①西周金文“建”字又作“𨾏”(建鼎)“𨾏”(毛公鼎)，这类形体发展到秦汉时期就演变为从聿和从隶两种写法，如马王堆帛书“建”字作“𨾏”(经法 71)“𨾏”(天文云气杂占)“𨾏”(老子甲 70)；睡虎地秦简作“𨾏”(日书 16)“𨾏”(日书乙种 26)“𨾏”(日书乙 16)“𨾏”(日书乙 29)。战国文字“建”字还有从止作的形体，如“𨾏”(十八年建信君钺)“𨾏”(上博·容成氏 22)“𨾏”(九店 56·21)“𨾏”(郭店·老子乙 10)“𨾏”(八年相邦戈)。其中，八年相邦戈之“𨾏”所从之“𨾏”即“隶”字。

我们还注意到“聿”字在用作意符时从不与“隶”相混，如“𨾏”、“𨾏”、“𨾏”、“𨾏”等。这也可以反过来证明音同或音近是造成文字讹混现象的因素之一。

2. 九——尤

《说文》：“𨾏，高气也。从口九声。临淮有𨾏犹县。”燕玺有“𨾏”字，皆用作人名，作“𨾏”(玺汇 3505)“𨾏”(玺汇 4109)“𨾏”(玺汇

^① 裘锡圭《释“建”》，《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3～355页。

2713),楚简“吞”字作“𠄎”(包山 38),皆从九声。字又从尤作“𠄎”(郭店·穷达以时 3)“𠄎”(郭店·穷达以时 10)，“尤”亦为声符，古音“吞”在群纽幽部，“尤”在匣纽之部，音极近。

战国楚文字“喬”作“𠄎”(郭店·唐虞之道 18)“𠄎”(郭店·老子甲 38)“𠄎”(包山 49)“𠄎”(包山 141)“𠄎”(郭店·五行 37)“𠄎”(禽志鼎),分别从“又”、“九”、“尤”。字所从“又”、“尤”、“九”都是由“中”讹变而来的,并作为添加的声符,与“高”构成双声符字。

可见,“九”与“尤”之所以常常讹混,除了形近的因素外,音近也是重要的原因。

3. 予——吕

战国文字从予之字与从吕之字常混。战国文字“予”字作“𠄎”(龙岗秦简 220)，“𠄎”字省去下部伸出的一笔就作“𠄎”，从予之字常如此作，如“舒”字作“𠄎”(包山 76)，“野”字作“𠄎”(睡虎地·编年记 45)“𠄎”(睡虎地·日书甲 32)，“豫”字作“𠄎”(包山 7)。“𠄎”上下分离就成了“𠄎”，与“吕”字作“𠄎”(郭店·穷达 4“郎”所从)非常接近，故“舒”字又作“𠄎”(包山 184)“𠄎”(十三年皋落戈)“𠄎”(十八年冢子戈)；“野”字又作“𠄎”(马王堆·相马经 31 下)“𠄎”(秦陶 335)；“豫”字又作“𠄎”(玺汇 1492)“𠄎”(玺汇 1839)“𠄎”(玺汇 3341)“𠄎”(十三年乘马戈)“𠄎”(蔡侯钟)，所从之“予”都写得与“吕”字无别。

战国文字从予的字大都变从“吕”，还由于“予”和“吕”古音非常接近，“吕”为来纽鱼部字，“予”古音在喻纽鱼部，两字韵同声近。郑张尚芳先生拟“吕”的古音为 ra’，“予”为²la’。

4. 畱——酉

在战国楚系文字中,“畱”与“酉”常混。如楚文字“福”字作从示

鬲声之形者仅三例：“𠄎”（王孙诰钟）“𠄎”（王子午鼎）“𠄎”（九店5），其余皆从示从酉作，如“𠄎”（曾子匡）“𠄎”（信阳1·12）“𠄎”（包山206）“𠄎”（郭店·老子甲38）“𠄎”（帛书乙10·87）“𠄎”（玺汇4683）。字可隶作“𠄎”或“𠄎”；又如郭店楚简“富”字作“𠄎”（老子甲31），从宀福声。声符“福”亦从酉作。楚简“福”字从酉作，除了“鬲”与“酉”形近的因素外，还可能因为在当时的楚音里“酉”与“鬲”音近。古音“酉”在以纽幽部，“鬲”在并纽职部，声韵皆可通。

5. 黑——異

甲骨文“黑”字作“𠄎”（合10171正），西周金文在人的面部加两点作“𠄎”（墉伯鬲簋）。唐兰先生认为“黑”象正面人形而面部被墨刑的人。春秋金文作“𠄎”（铸子吊黑臣匜）“𠄎”（叔黑臣匜），有在“𠄎”形上加饰点，使得字变得近似“炎”字，故《说文》以为字从炎。战国文字“黑”字作“𠄎”（睡虎地·封诊式23）“𠄎”（玺汇737）“𠄎”（曾174）。

甲骨文“異”字作“𠄎”（合4412）“𠄎”（合28400）“𠄎”（合32915）“𠄎”（合31903）；西周金文沿袭甲骨文之形作“𠄎”（孟鼎）“𠄎”（召鼎）“𠄎”（单異簋）“𠄎”（虢吊钟）“𠄎”（作册大鼎）；战国文字作“𠄎”（石鼓文·銮车）“𠄎”（包山105）“𠄎”（包山117）“𠄎”（郭店·语丛三3），其中作“𠄎”者与“黑”字作“𠄎”非常接近。

战国文字“翼”字作“𠄎”（秦公钟）“𠄎”（中山王罍壶），皆从異。曾侯乙墓竹简“翼”字作“𠄎”（简9）“𠄎”（简20），所从之“異”与“黑”之作“𠄎”“𠄎”全同，即曾侯乙墓竹简“翼”字变从黑声了。

曾侯乙墓竹简有字作“𠄎”（简15）“𠄎”（简149）。第十五号简“𠄎”字在简文中读为“翼”，文曰：“二画戲，二戈，屯一翼（翼）之翮。”

由此可知“𦘒”所从之“𦘒”为“異”而非“黑”，但确实与“黑”字作“𦘒”（𦘒字所从）无别。“𦘒”字当隶作“𦘒”。

楚简“黑”与“異”之所以讹混，除了形体有相似之处外，音近也是重要原因。古音“黑”在晓纽职部，“異”在以纽职部，二字韵同声近。郑张尚芳先生拟“黑”字古音为 hmlwwg、“異”为 lwg。

6. 異——虞(虞)

战国文字“虞”字作“𦘒”（郟钟）“𦘒”（吉日壬午剑）“𦘒”（蔡侯申残钟）“𦘒”（虞公剑），或省“虎”形，作“𦘒”（玺汇 186）“𦘒”（玺汇 188）“𦘒”（玺汇 187）^①，与燕玺“異”作“𦘒”（玺汇 3688）下部所从完全相同。《说文》：“虞，钟鼓之柎也。饰为猛兽。从虎，異象其下足。𦘒，虞或从金虞声。𦘒，篆文虞省。”从古文字实际来看，“𦘒”才是本字，“虞”则是由于“𦘒”（典）与“𦘒”（異）下部形体相同造成讹混后才出现的“虞”之异体。造成讹混的原因除了形体的因素外，也可能与音有关系。古音“異”在以纽职部，“虞”在群纽鱼部，以声言之，以母与见系声母关系非常密切；就韵而言，之鱼二部例可旁转。

7. 東——束




“東”与“束”乃一字分化。^② 甲骨文“東”字作“𦘒”“𦘒”“𦘒”，“束”字作“𦘒”，都像囊囊束縛其两端之形。古音“東”在端纽东部，“束”在书纽屋部，声韵俱近。由于“東”、“束”二字形体和读音都很接近，所









^① 此从朱德熙、裘锡圭先生释，参见《战国文字研究》（六种），《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② 林义光《文源》卷六·五〇“束”字下说：“彝器人负束形，鼎文作𦘒、爵文作𦘒、敦文作𦘒。𦘒字古作𦘒、或作𦘒。𦘒字古作𦘒、或作𦘒。速字古作𦘒是漢与束同字。漢（东韵）、束（遇韵）双声对转，束声之速亦转入东韵。”林义光《文源》，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依写本石印，线装本三册，1920年。













以古文字中不仅“東”与“束”混用，而且从东声之字与从束声之字也常混。如：

聖鼎“東”字作，“束”即“束”。




春秋早期的叔家父簋“速”字作，从東。陈剑先生据此释花园东子卜辞中作“”形者为“速”。^①

金文“陳”字作（陳公子甗）（陳侯午錫）（陳逆簋）（陳章壺）（陶汇 3·51），从東声；陳章壺“陳”又从束声作，齐系亦从束作（玺汇 1464）（玺汇 1460）。

甲骨文童字作（合 30178）（屯 650），从辛从见，西周金文作（毛公鼎）（番生簋）（墙盘）。其中作者，刘钊先生指出此乃将“束”字与“见”所从之人形融合，借笔写成。^②毛公鼎作则是将“见”所从之人形省去，再添上“土”为繁饰而成的。可见“童”本从東声，墙盘作，从“束”就是“束”之讹。



西周金文“鐘”字多从東声作（克鼎）（番生簋）（士父鐘），或从重声作（兮仲鐘）（毛公鼎）（师昝簋）（中义鐘）（多友鼎），还有一类从束声，作（南宫乎鐘）（墙盘）（猷鐘）（永宝兹鐘），所从之“束”就为“東”之讹。










8. 堇——黄



“堇”与“黄”乃一字分化，甲骨文“堇”字作，在卜辞中皆读为“艱”，或作“”，读为“煖”。“艱”为见纽文部字，“煖”为晓纽元部






① 陈剑《释“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4期。





②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0~81页。










字；甲骨文“黄”字作，“黄”为匣纽阳部字，可见“黄”与“董”在形、音两方面都有联系。因此，金文中“董”及从董声之字与从黄声之字常混，如：




西周金文“董”字作（董鼎）（赵曹鼎）（颂鼎）（董伯鼎）（召伯簋），其中赵曹鼎之就用作“黄”。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文字中“董”皆从黄，如（叔夷钟）（洹子孟姜壶）（齐陈曼匜）。

西周金文“艱”字作（不戢簋），或作（毛公鼎）。其中毛公鼎就从“黄”。






西周金文“廣”字作（班簋）（禹鼎），又作（墙盘）。“”所从之即“董”字。

西周中期铜器县改簋“璜”字作，借“黄”为之，召伯簋作，所从之即“董”字，召伯簋“董”字作可证。

西周乃至战国文字中，除了中山王𣥂鼎和中“難”字从董作（中山王𣥂鼎）（斨钟）外，其他“難”字及从難之字皆从黄，作（归父盘）（受季良父壶）（郭店·性自命出 50）（郭店·老子甲 15）（鄂君启舟节）（郭店·老子丙 13）（斨钟）。

西周中期的中甗“漢”字作，战国晚期的六年汉中守戈假借“董”为之，作；春秋晚期的敬事天王钟则从黄，作。

9. 日——日

古文字中“日”与“日”常混。如甲骨文“眾”字作“”，本从日，金文都讹成从目，作（师旗鼎）（师寰簋）（师寰簋）

“𣎵”（留鼎）“𣎵”（中山王𣎵鼎）“𣎵”（中山侯钺）；战国玺印“筍”字作“𣎵”（中国玺印集粹），《说文》小篆“筍”作“𣎵”就是本自此形，但西周金文皆从日作“𣎵”（伯筍父盃）“𣎵”（伯筍父鼎）“𣎵”（筍伯盃）“𣎵”（多友鼎）“𣎵”（郑伯筍父盃）“𣎵”（郑伯筍父鬲）“𣎵”（筍侯匜）。

上举两例讹混的例子只是因为“日”与“目”形近而混，下面我们要举两例与音有关的例子。

甲骨文有字作“𣎵”（合 30893）“𣎵”（合 30365）“𣎵”（合 30599），刘钊先生认为字当释为“督”，并指出：“‘督’字本来就是从日叔声的一个字，‘督’字本义可能并非‘督察’之意，只是因为后来用为‘察’义，人们才‘变形义化’，把‘督’字所从的‘日’旁改成了‘目’旁以迎合字义。”^①从目的“督”字最早见于战国玺印，作“𣎵”（印典）。字还见于马王堆帛书，作“𣎵”（老子乙 231）。我们认为“督”字由从日变为从目，除了形近的原因外，还与音有关，古音“督”在端纽觉部，“叔”在书纽觉部，“目”在明纽觉部，三字叠韵。

甲骨文“莫”字作“𣎵”“𣎵”，会日落于草木之意。金文沿袭甲骨文之形，作“𣎵”（散盘）“𣎵”（中山王𣎵壶）“𣎵”（夆莫父卣）。战国晋玺“莫”字作“𣎵”，从目，不从日。马王堆帛书“莫”字作“𣎵”（老子乙前 3 上），又从目作“𣎵”（纵横家书 149）；银雀山汉简“莫”字也有讹写成从目的，作“𣎵”（孙臧 23）。我们认为“莫”所从之“日”之所以讹成“目”，除了形近的原因以外，也有音的因素在起作用。古音“莫”在明纽铎部，“日”在明纽觉部，二字双声，韵亦近。

10. 疑 一 矣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2页。

郭店楚简“疑”字作“𠄎”（语丛二 49）“𠄎”（语丛二 37），本从“矣”；又从“𠄎”作“𠄎”（语丛四 15）“𠄎”（成之闻之 4）“𠄎”（缙衣 4），即“矣”与“𠄎”讹混了。“𠄎”即“矣”，古音“矣”在匣纽之部，“疑”在疑纽之部，音极近，故“疑”讹成从矣作，不仅因为形体相近，音近也是重要原因。从矣作的“疑”字当是楚文字独有的写法，楚玺“疑”字作“𠄎”（玺汇 3643）可资佐证。

11. 受——得


“受”与“得”本来形体相差很大，但在战国文字里却讹混了。甲骨文“得”字作“𠄎”，以手持贝，会“得到”之义，或加动符“彳”作“𠄎”“𠄎”等形。西周金文沿袭甲骨文之形作“𠄎”（师旗鼎）“𠄎”（召鼎）。春秋战国文字“得”字已不从贝，“贝”皆讹成“目”，如“𠄎”（倣儿钟）“𠄎”（子禾子釜）“𠄎”（陈章壶）“𠄎”（中山王髹鼎）“𠄎”（盗壶）“𠄎”（宋公得戈）“𠄎”（郭店·语丛一 65）。

甲骨文“受”字作“𠄎”，西周金文仍沿袭甲骨文之形，作“𠄎”（孟鼎）“𠄎”（颂簋）等形。战国文字作“𠄎”（石鼓文·吴人）“𠄎”（包山 33 反）“𠄎”（包山 277）“𠄎”（玺汇 1231）“𠄎”（睡虎地·日书乙 206）“𠄎”（睡虎地·日书甲 107）。其中，睡虎地秦简“受”字作“𠄎”“𠄎”，与“得”字作“𠄎”“𠄎”几乎无别。




造成“受”与“得”混同的原因，除了形体讹变的因素之外，还因为语音相近。古音“受”在禅纽幽部，“得”在端纽职部，声韵皆近。





12. 左——右








甲骨文“左”字作“𠄎”（合 1771 正）“𠄎”（合 5532 正），商代金文作“𠄎”（左父乙卣）。《说文》小篆作“𠄎”，古文作“𠄎”，或体作“𠄎”。

战国楚简“雄”字作 (郭店·语丛四 16), 所从之“𠄎”, 可视为由“𠄎”到“𠄎”的过渡形体。

在秦汉文字中, 从宏声的字所从之“宏”常与“右”相混, 如:










汉印“宏”字作 (汉印 7·14), 所从之“宏”作, 与“右”字作 (汉印 1·6) 无别。

睡虎地秦简“雄”字作 (日甲 70), 所从之“宏”与“右”字作 (日甲 14 背) 无别。汉印“雄”字作 “ ” (汉印 4·6), 所从之“宏”也与“右”混同了。

汉印“閼”字作 “ ” (汉印 12·3), 所从之 “ ”与“右”字作 (中宫雁足铎) “ ” (马王堆·老子甲 91) “ ” (马王堆·战国纵横家书 156) 无别。

“宏”、“雄”、“閼”诸字所从之“宏”之所以与“右”混同, 除了形体接近的因素之外, 音近也是重要原因。古音“宏”、“雄”、“閼”皆在匣纽蒸部, “右”在匣纽之部, 音极近。

13. 用 一甬

甲骨文“用”字作 “ ” “ ” “ ” “ ” “ ”, 于省吾先生谓 即“甬”之初文,  为变体, 并指出金文“甬”作 系于“用”字上部附加半圆形, 作为指事字的标志, 以别于用, 而仍因用字以为声。^① 杨树达先生认为“甬”为“钟”之初文, 上象钟悬, 下象钟体, 中横划象钟带。^② “甬”和“用”在形体上有无联系尚且不论, 但二者的形体确实相当接近, 又因为二字同音, 所以在金文中“甬”常假借为“用”, 如江小仲母生鼎、曾侯乙鬲、曾侯乙鼎、曾侯乙匕、曾侯乙簋、鄱陵君王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古文字中附划因声指事字的一例》,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年, 第453~454页。

②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年, 第46页。

子申豆、曾姬无恤壶等“甬”皆当读为“用”。不仅如此，“用”与“甬”还常讹混，如师克鬲“甬”作“甬”，又作“甬”；楚帛书“甬”字作“甬”（帛书乙 11·10），与“用”字非常接近。在古文字里，从甬声之字与从用声之字也常讹混，如：

甲骨文“通”字作“通”从辵用声。西周金文多从甬声作“通”（梁其钟）“通”（九年卫鼎），或作“通”（颂鼎）。战国文字“通”字既有从用声作的，也有从甬声的，如侯马盟书“宗盟委质类”“通”字作“通”（179:20）“通”（16:21）“通”（3:1），又作“通”（96:9）“通”（156:19）；古陶文“通”字作“通”（陶汇 5·50），又作“通”（陶汇 3·634）；马王堆帛书作“通”（战国纵横家书 12），又作“通”（相马经 39）。

战国文字“勇”字作“勇”（郭店·语丛四 24），或作“勇”（郭店·尊德义 33）“勇”（睡虎地·为吏之道 34），或作“勇”（包山 71），皆从甬声。马王堆帛书“勇”字作“勇”（老子乙前 160 下），银雀山汉简作“勇”（孙臧 114），则讹写为从用声之字。

14. 戊——戌

“戊”与“戌”不仅形近，而且都象兵器，所以古文字中从戊与从戌之字常混，如甲骨文“成”字作“成”“成”，从戌丁声。西周金文“成”字亦皆从“戌”，如“成”（沈子它簋）“成”（颂簋）“成”（善夫克鼎）。战国文字始见从“戊”之形者，如“成”（沈儿钟）“成”（蔡侯申钟）。《说文》：“成，就也。从戊丁声。”许慎不知“戊”乃“戌”之讹。又如：

西周金文“威”字从戊作“威”（吊向簋）“威”（癸簋），又从戌作“威”（癸簋）“威”（癸簋）“威”（虢吊钟）等。我们注意到癸簋铭文中“威”既有从戊作的，也有从戌作的。战国文字有的从戈作“威”（邾

公华钟),有的从戊作“𡗗”(王孙钟),有的从戊作“𡗗”(王孙诰钟)“𡗗”(诅楚文)。《说文》:“威,姑也,从女从戊。”纵观“威”字形体演变过程,我们看到“威”字在很长时间里都处在从戊或从戊的混用阶段,最后固定从戊,是语音起了决定性作用,即“威”当从戊声。春秋晚期的蔡侯申盘“威”字作“𡗗”,从妥(绥)声,古音“绥”在心纽微部,“戊”在心纽物部,音极近。古音影纽和心纽的关系非常密切,如“璽”字作“𡗗”(璽戈),从西声。“璽”是影母字,“西”为心母字;五年师旅簋:“赐……戈瑀戠纁秘彤沙。”同铭亦见寰盘、无夷鼎、休盘等。“彤沙”即“彤纁”,“沙”为心母字,“纁”为影母字;上博《容成氏》:“禹乃通洸(伊)、洛。(26)”又“汤乃谋戒求贤,乃立泗(伊)尹以为佐。(37)”“洸”、“泗”为心母字,“伊”为影母字;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辰(震)卦》:“芙言哑哑。(31行)”又帛书《六十四卦·旅卦》上九:“旅人先芙后号咷。(74行)”通行本《周易》“芙”并作“笑”。“芙”在影纽,“笑”在心纽;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妇(否)卦》六三:“苞忧,吉。”“忧”通行本作“羞”。“忧”为影母字,“羞”为心母字;阜阳汉简《诗经》:“口如疑脂,领如鳧脯,齿如会师,湔首蛾麋。”毛诗《卫风·硕人》二章:“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螭首蛾眉。”汉《硕人》诗铜镜铭二章:“手如濡婁,肤如凝脂,领如尉夷,齿如会师,湔首蛾麋。”“师”为影母字,“犀”、“师”则为心母字,等等。

15. 恥——耻

战国文字始见“恥”字,作“𡗗”(郭店·缙衣 28)“𡗗”(郭店·语丛二 4)“𡗗”(上博·孔子诗论 8),从心耳声。《说文》:“恥,辱也。从心耳声。”可知在许慎时代“恥”仍从耳声,读为日母之韵。“耻”(恥)音变为透母字,当在东汉后期。裘锡圭先生指出:“‘恥’字写作‘耻’始见于东汉碑刻,可能当时‘耳’、‘恥’二字的读音已经有了很大距离,有的人不知道‘耳’是声旁,就把‘心’旁改成了读音与‘恥’相近的‘止’(汉

隶中‘止’和‘心’的字形相当接近)。”^①按:东汉的尹宙碑“恥”字作“𦵑”,譙敏碑作“𦵑”,尹宙碑“恥”所从之“心”确实写得与“止”形近,“恥”字后来写作“耻”就是语音变化和形体讹混交互作用的结果。

第四节 音与饰笔

饰笔,又称装饰笔画、羡画、赘笔,是指文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出于对形体进行美化或装饰的角度添加的与字音字义都无关的笔画,是文字的羡余部分。^②饰笔本来与字音无关,但有些字添加了饰笔后,带饰笔的那一部分往往又可以表音,有的饰笔后来消失了,有的保留下来成为形体的一部分,如:

1. 𦵑(聖)

甲骨文“聖”字作“𦵑”“𦵑”,金文作“𦵑”“𦵑”,本为会意字。金文又在人形下部加上一横笔作“𦵑”“𦵑”,人形中部又加上一点饰笔。饰点又拉直成一横作“𦵑”“𦵑”,于是人形变为从“𦵑”,由于“𦵑”可用作“聖”之声符,所以后来“𦵑”就固定成为“聖”字构形的一个组成部分。

2. 廷(廷)

西周金文“廷”字作“𦵑”(毛公鼎)“𦵑”(何尊)“𦵑”(颂鼎)“𦵑”(颂簋)“𦵑”(卫簋)。刘钊先生认为“廷”字后来从𦵑声,是由“𦵑”“𦵑”等形所从之“土”和“人”重合变来的。^③春秋时期的秦公簋“廷”字作“𦵑”,睡虎地秦简作“廷”(秦律十八种 197),马王堆帛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5页。

②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③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1页。

书“廷”（九主 374），《说文》小篆作“廷”，就是源自秦文字。由此看来，“廷”的演变轨迹还有一种可能是：“自”所从之“丿”加一横饰笔作“𠄎”，“𠄎”所从之“丿”再添一横饰笔作“𠄏”，“𠄏”省去“彡”后再演变成“廷”。由于“壬”与“廷”同音，“壬”就成了“廷”字构形的一部分。《说文》：“廷，朝中也。从彡，壬声。”
























3. 𠄎(年)

甲骨文作“年”字作“𠄎”“𠄏”，从禾人会意，人亦声。西周金文沿袭甲骨文之形，作“𠄎”（史颂簋）“𠄏”（元年师兑簋）。春秋战国文字中的“年”字或在人形上加饰点作“𠄎”（鄆侯簋），或加一横饰笔作“𠄏”（戔吊鼎）“𠄐”（曾姬无恤壶）“𠄑”（番君召鼎）。加了横饰笔的“年”字就成了从千声的字。《说文》：“年，谷熟也，从禾千声。”

4. 𠄒(蕙)和𠄓(聰)
















“蕙”字最早见于睡虎地秦简，作“𠄒”（秦律十八种 179），所从之声符“惠”与金文“惠”字作“𠄔”“𠄕”形同。汉代文字有的仍沿袭战国文字之形，作“𠄒”（马王堆·老子乙前 123 下）“𠄓”（马王堆·相马经 18 下），又作“𠄔”（居延汉简甲 2001），其后又在“𠄕”形上部左右各加一饰笔，作“𠄖”（苍山画像石题记）“𠄗”（严欣碑）“𠄘”（张迁碑“聰”字所从）“𠄙”（杨叔恭残碑“聰”字所从），加了饰笔后就与“公”字作“𠄚”（夏承碑）无异，因“公”与“蕙”韵部相同，皆属东韵，故“蕙”字作“𠄗”“𠄘”等形就被视为从公声之字。“聰”字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郑烈碑“聰”字作“𠄛”，所从之“聰”也是在“𠄕”形上左右各加饰笔而成的。

5. 𠄜(其)

甲骨文“其”字作等形，为“箕”之初文。西周金文或承袭甲骨文之形作（孟鼎）（师酉簋）（颂鼎），或在下部增加一横饰笔作（吊向父簋），又在一横下增加二点饰笔作（吊向父簋）（史问钟），后二点渐渐写得立起来作（师虎簋）（仲师父鼎）（史颂匝）。刘钊先生指出：“……这与奠字本作形，后加二小横饰笔作，又发展成为的情况相同。‘丌’就是截取字下部的‘丌’形而成，其读音还沿用‘其’的读音。”^①西周早期已有“丌”，字作（丌戟）。西周中期的牧簋铭曰：“丌（其）不中不型。”“丌”字作，在铭文中读为“其”。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丌”亦假借为“其”，铭曰：“丌（其）在晋之在周号为大族（中三）。”可证“丌”确与“其”读音相同。

战国文字常加“丌”为饰笔，有的“丌”就具有表音作用，如：

6. （丘）

甲骨文“丘”字作，春秋战国文字“丘”的形体变化较大，如（商丘吊匜）（庚壶）（子禾子釜）。另有一类形体添加“元”或“丌”为饰笔，如齐陶文作（古陶汇编 3·941），晋玺作（古玺汇编 3229），楚国的鄂君启车节作，在“丌”下又加为繁饰，中山王髹兆域图作。陈邦怀先生认为下部之乃“基”字，“”的结构可分析为从丘基声。^②战国时期“元”“丌”“丌”是成字的，“元”即“元”，“丌”即“丌”，“丌”即“基”字。古音“丘”在溪纽幽部，“丌”、“元”在群纽之部，“基”在见纽之部，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3页。

② 陈邦怀《一得集·中山王墓守丘刻石文字跋》，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213页。

声韵俱近,因此“丘”之作“𡵓”“𡵔”“𡵕”形者就是累加“丌”、“丌”和“基”为声符。

7. 國(國)

西周金文“國”字作“𡵓”(毛公鼎)“𡵔”(录卣)。战国齐陶文“國”字作“𡵕”(古陶汇编 3·1006)“𡵖”(古陶汇编 3·1003),在“〇”内加了饰点,变得与“日”同形。燕陶文“國”字作“𡵗”(古陶汇编 4·1)“𡵘”(古陶汇编 4·7)“𡵙”(古陶汇编 4·30),又在“〇”下方横笔下加两饰笔,“國”变从“𡵚”(期)声,亦可看作从丌声。据研究,一直到战国,“國”都用为“域”,^①即“國”之读音还在匣纽职部,“期”、“丌”在群纽之部,声韵俱近。

有的饰笔本来是不表音的,后来由于语音发生了变化,人们于是误把添加了饰笔的那个部分当成声符。

8. 参

商代金文“参”字作“𡵛”(楷参父乙盃),从卩从星。西周金文加饰笔“𡵜”“𡵝”作“𡵞”(卫盃)“𡵟”(盃尊)“𡵠”(克鼎)。战国文字“参”分解为“晶”和“彡”两部分,作“𡵡”(鱼𡵡匕)“𡵢”(中山王𡵢鼎)。楚简有“晶”字,作“𡵣”(曾 179)“𡵤”(郭店·性自命出 15)“𡵥”(上博·周易 38),在简文中“晶”皆读为“参”。从参声的“驂”字作“𡵦”(曾 169),亦从晶声,可证“参”确实本从“晶”声。晋玺“参”字作“𡵧”(玺汇 1520)“𡵨”(玺汇 2070),刘钊先生认为此即从金文“𡵛”形省变而来,其下部变形音化为从“彡”得声。^②睡虎地秦简

① 大西克也《论古文字资料中的“邦”和国》,《古文字研究》第 23 辑,中华书局、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②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16 页。

“参”字也已变从彡，作“𠂔”（秦律十八种 55）“𠂔”（日书乙 88）。《说文》：“参，参商，星也，从晶彡声。”可知“参”已不从晶声。由于读音发生了变化，人们就把由饰笔变来的讹体当成声符。还有一种可能是战国时期“参”字在楚音中读音与“晶”（星）同，在秦音和晋语里则读与“彡”同。

9. 盞

甲骨文“盞”字作“𠂔”（合 3251 正）“𠂔”（合 3520 正），从聿从皿，西周金文作“𠂔”（师觚鼎）“𠂔”（多友鼎）。《说文》：“盞，器中空也，从皿炎声。”又《说文》：“焮，火余也，从火聿声。”刘钊先生指出：

从古文字来看，盞字从聿不从焮，应是从皿聿声的形声字。侯马盟书盞字作“𠂔”“𠂔”，又在一竖笔两侧加饰点作“𠂔”，又作“𠂔”“𠂔”，所从变得近似“火”字，这便是后来误为从炎的由来。侯马盟书盞字又作“𠂔”“𠂔”“𠂔”，在一竖笔上加“彡”“彡”形饰笔，由此又分化出“盞”字。《说文》分“盞”和“盞”为二字，其实乃一字异体。炎从聿得声，后世作燼。金文“𠂔”从聿从貝，应即后世的贖字，后又作“贖”。《说文》：“贖，会礼也，从貝炎声。”贖字作贖是声符的进一步繁化。^①

按：刘钊先生所言极是。“盞”和“盞”为一字异体，本从聿声，后来带饰点的“𠂔”形演变成“盞”，变从炎声；加了“彡”、“彡”饰笔的“𠂔”则变成了“盞”，从聿声。两类形体中的饰笔都成了构形的一部分，并与原字的一部分构成字的声符。“盞”所从之“𠂔”分化出“炎”（焮），“盞”所从之“𠂔”分化出“聿”字。《说文》有“聿”字，谓“书饰也。从聿从彡。读若津。”又“津，从水聿声。”“聿”音转为齿音后，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从隶声的“𦉳”也音变为齿音，“𦉳”、“𦉳”、“𦉳”诸字也发生同样的音变，“𦉳”、“𦉳”当是“𦉳”、“𦉳”音变后产生的异体。

10. 詹

战国古玺“詹”字作“𦉳”（玺汇 5455），马王堆帛书《五行》作“𦉳”（简 225），银雀山汉简“詹”字假借为“檐”，字作“𦉳”（简 682）。刘钊先生认为“詹”是从“言”字分化出来的一个字，其分化途径为：^①

𦉳——𦉳——𦉳（构拟）（詹）

战国文字从詹声之字可为之佐证。如战国楚系文字“檐”字作“𦉳”（王命龙节）“𦉳”（鄂君启节），“檐”字作“𦉳”（郭店·缁衣 16），“𦉳”字作“𦉳”，“檐”字作“𦉳”（包山 147），“𦉳”字作“𦉳”（包山 174），齐国的国差檐“檐”字作“𦉳”。

由以上古文字资料可以看出，“詹”字是不断添加饰笔形成的一个字，先是在“言”上加饰笔“八”作“𦉳”，又在“𦉳”上加“厂”形作“𦉳”，再在“𦉳”上加饰笔“フ”，就写作“𦉳”。

《说文》：“詹，多言也，从言，从八，从𠃉。”段玉裁谓：“此当作𠃉声。”《说文》：“𠃉，一曰屋椽也，秦谓之桷，齐谓之𠃉。”此“𠃉”读入疑纽歌部。《集韵》：“檐，亦作𠃉，余廉切。”由此看来，《说文》不以“𠃉”为声符是正确的。段玉裁认为“詹”从𠃉声，是因为“𠃉”后来音变为以纽谈部字，与“詹”读章母谈韵音近。

11. 𦉳（布）

西周金文“布”字作“𦉳”（鬲卣）“𦉳”（守宫盘），从巾父声。楚简“布”字作“𦉳”（曾 130）“𦉳”（信阳 2·15）“𦉳”（仰天湖楚简），又作“𦉳”（曾 122）“𦉳”（郭店·六德 27），所从之“𦉳”就是在“巾”上加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7页。

一横饰笔而来的。加了饰笔后的“𠄎”与“市”字无异，这很可能是人为的有意识的改造，即楚音中“布”与“市”同音，所以加了饰笔后的“𠄎”就被用作“布”的声符。

饰笔是读不出音来的，但有的饰笔形体正好与某字相似，而这个字的音与饰笔所修饰的那个字的读音正好相同或相近，于是人们就将错就错把它当作形体的一部分，并作为声符来使用。例如：

12. 必

甲骨文“必”字作“𠄎”“𠄎”“𠄎”“𠄎”“𠄎”“𠄎”等形，^①乃“秘”之初文。西周金文“必”皆在“𠄎”两旁加饰点作“𠄎”（五年师旅簋）“𠄎”（无叟鼎）“𠄎”（寰盘）“𠄎”（休盘）“𠄎”（南宫乎钟）。其中无叟鼎、寰盘、寰盘、五年师旅簋、王臣簋、师馘簋以及走马休盘等铭文中的“必”字皆当读为“秘”，可证“必”确为“秘”之初文。“𠄎”所从之饰笔“八”与“八”形体非常接近，又因为“八”与“必”古皆为帮纽质部字，所以人们就把“八”作为形体的一部分，并视为声符。《说文》：“必，分极也，从八弋，弋亦声。”段注改“弋亦声”为“八亦声”。郭沫若在《金文丛考·释弋》亦指出：“必即秘也，弋象秘形，八声。”刘钊先生称此例为声符的误解。^②我们在此强调的则是饰笔有可能受音的影响而成为形体的一部分，并用作声符。

13. 叔(叔)

《说文》：“叔，拾也。从又未声。汝南名收芋为叔。”甲骨文未见“叔”字，但由“督”之构形可见一斑。甲骨文“督”字作“𠄎”（合 30893）“𠄎”（合 30365）“𠄎”（合 30599），所从之点多寡无别，可视为饰点。

① 此从裘锡圭先生释。参见裘锡圭《释“秘”》，《古文字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②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3页。

西周金文“叔”字作“𠄎”（师觶簋）“𠄎”（克鼎）“𠄎”（叔卣）。郭沫若先生认为“拾芋”为“叔”的初义，字象从又持弋以掘芋，“𠄎”象芋形。^①从西周金文“叔”所从之点都固定为三点来看，“𠄎”“𠄎”等形当为“小”字，用作“叔”之声符，而不必拘泥于许说把点说成芋形。古音“叔”在书纽觉部，“小”在心纽幽部，从“小”字分化出来的“少”就是书母字。因为“叔”和“小”音近甚至音同，所以人们把原来字中的饰点规整成三点，使之变得与“小”字作“𠄎”（孟鼎）“𠄎”（乖伯簋）相近，并把它当作声符。

14. 華

西周金文“華”字作“𦵑”（大夫始鼎）“𦵑”（邾公華钟）“𦵑”（克鼎）“𦵑”（仲义父鼎）。“華”的本形当为“𦵑”，下部二横乃饰笔，战国齐陶“華”字作“𦵑”（陶汇3·9）可证。齐国的即墨華戈之“華”字作“𦵑”，就是在“𦵑”形下部加一横饰笔。《说文》：“華，草木華也。从𦵑于声。”将字割裂为“𦵑”和“于”两部分，并以“于”为声符。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加了饰笔的“𦵑”“𦵑”等形下部形体与“于”相同，而且“于”的读音与“華”非常接近。古音“華”在晓纽鱼部，“于”在匣纽鱼部。

15. 旬(旬)和 𠄎(軍)

甲骨文“旬”字作“𠄎”“𠄎”“𠄎”，西周金文增意符“日”，作“𠄎”（繁卣）“𠄎”（王来奠新邑鼎）。春秋晚期的王孙钟作“𠄎”，所从之“𠄎”显然是在“𠄎”上增饰笔“=”而成的。“𠄎”与“匀”之作“𠄎”（多友鼎）形体非常接近，故王孙钟“旬”字作“𠄎”就被看作是从日匀声之字。《说文》“旬”字古文作“𠄎”，就是来源于这一形体。

^①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金文丛考》，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西周金文“軍”字作“𠄎”（庚壶），从車旬声。战国文字沿袭此形，作“𠄎”（郟右軍矛）“𠄎”（郟侯戟矛）“𠄎”（中山侯钺）。战国晚期的郟戈“郟”字作“𠄎”，所从之“軍”亦从旬。

中山王𠄎鼎“軍”字作“𠄎”，对照中山侯钺之“𠄎”字，可知“𠄎”所从之“𠄎”是在“𠄎”内加“二”为饰笔。加了饰笔后的“𠄎”与“匀”形体非常接近，故“𠄎”可被看作是从匀声之字。战国时期赵国的土軍鐔“軍”字作“𠄎”，可证“軍”可从匀声。

16. 𠄎——𠄎(𠄎)

上博简“𠄎”作“𠄎”，整理者隶定为“𠄎”，冯胜君先生认为上面象“今”的那个部分形体可能是“人”旁加饰笔而成，使之变形音化从今声。“今”为见纽侵部字，与“职廉切”音近。^①甚确。《说文》：“𠄎，仰也。从人在厂上。”三晋货币文字“𠄎”字作“𠄎”（货系 543 布空），即从人从厂，“二”为装饰性笔画。上博简“𠄎”字作“𠄎”形者则是在人形下部加“二”形饰笔，并在“𠄎”下加“𠄎”为繁饰而成的。人形加上“二”形饰笔后与“今”形近，于是“𠄎”就被看作是从今声之字了。

^① 冯胜君《论郭店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以及上博简〈缁衣〉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2004年。

第六章

变形音化

第一节 变形音化是古文字构形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变形音化”这一概念是由刘钊先生首次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古文字构形研究》中提出的(1991年)。在文中,他举出了三十五例古文字中的“变形音化”现象,并对“变形音化”现象做了理论上的阐述,他指出:“变形音化是指文字受逐渐增强的音化趋势的影响,将一个字的形体的一部分,人为地改造成与之形体相接近的可以代表这个字字音的形体,以为了更清楚地表示这个字字音的一种文字演变规律。变形音化大都是将原为象形字或会意字的形体改造为形声字。变形音化具有讹变的性质,但与讹变又有不同,它的改造过程具有人为的有意识的因素。”^①刘钊先生是第一个把“变形音化”提升为一条重要古文字演变规律,并较为系统地加以研究的学者。经过十余年的检验,“变形音化”作为古文字构形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为古文字学界普遍接受。如魏宜辉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楚系简帛文字形体讹变分析》设专节《变形音化讹变》,江学旺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西周金文研究》和张静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郭店楚简文字研究》都设有《变形音化》专节,冯胜君、陈剑等学者也在他们的研究中采用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9页。

“变形音化”这一术语。





一、变形音化现象的研究概况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唐兰先生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在 1949 年出版的《中国文字学》里他指出:“把物形的某一部分直接变作声符,应作为‘声化’的一类。”并举“猥”、“鼃”为例:^①

“猥”字本象一个兽,尾梢粗,后来就把尾梢改成“貝”字,从犬貝声。“鼃”字本象带尖嘴的鳄鱼,现在身子作为鼃字,而嘴跟头变成“單”字,从鼃單声。这种字的来源,大都由于形体的错误。

唐兰先生指出的这类“把物形的某一部分直接变作声符”的现象,就是我们所说的“变形音化”。虽然唐先生没有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但开拓之功不可没。

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释“勿”“发”》、《说字小记》等文中也谈及这个问题,他指出:“在汉字发展过程中,把合体表意字的一个偏旁略加改造,使之转化成声旁,从而把原来的表意字改变成形声字的现象,是颇为常见的。”并举“悤”、^②“羞”、“弦”^③、“何”、“𠂔”^④等字为例。

“何”字本作,象人荷物形。后来象所荷之物的形加口而成“可”,“何”字就由表意字转化成从“人”“可”声的形声字了。又如“𠂔”字本作、等形,以象人形的“大”旁和“日”旁的相对位置表示出日已西斜的意思。后来“大”被改为形近的“矢”,“𠂔”字就由表意字转化成从“日”“矢”声的形声字了。

李新魁先生也曾指出汉字因隶变造成的声化现象,并称之为“声符化”。他说:“有些字本不是形声字,但其中的某一部分偏旁,经过

①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89~90页。

②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43页。

③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53页。

④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8页。

隶变以后,变成与整个字音相近或相同,人们遂把这个字看成形声字,把该偏旁说成是声符。从后代研究者的立场来观察,这样的偏旁是从非声符变成声符,这样的现象叫做‘声符化’。如亭字,字下部的‘丁’本像亭柱矗立的形状,但后代把它写成丁字,丁与亭的读音相同(或相近),所以《说文》说亭字从丁声。这样,亭字就从象形字变为了形声字,‘丁’声符化了。”^①

张桂光先生认为这类现象是因汉字表音化趋势影响造成的讹变。如“攷”,金文作“𠄎”,象以手持棍打击戴羊角帽的人,会欺侮之意。因为字与“矛”音近,“𠄎”又与“𠄎”形似,戴羊角帽的人便讹为声符“矛”了。其他如“𠄎”变从今声,“𠄎”之变从由声,“良”之变从亡声,“皇”之变从王声,“矣”之变从矢声等。^②

何琳仪先生在《战国古文字典》中也指出一些古文字中的声化现象。如甲骨文“𠄎”字作“𠄎”“𠄎”,从支,从丰或从木,会击植物果实使其拆裂之意。或作“𠄎”,左上声化从来。西周金文“𠄎”字作“𠄎”,战国齐陶“𠄎”字作“𠄎”,声化从王声。^③

赵平安先生在《汉字声化论稿》中所指的声化现象只有“经由讹变的声化例”属变形音化。在文中他指出的例子有:(1)“幸”,甲文象枷锁之形,到小篆形体分裂成“大”和“𠄎”,其中的“大”被声化;(2)“甬”,“甬”、“用”一字。金文“甬”为钟即镛之象形。后来繁体变成“甬”,简体变成“用”。“甬”的下部被声化;(3)“穴”,《说文》:“从宀,八声。”从甲文“突”字的偏旁“穴”看,知“穴”字之中本是两土点,作“八”乃由土点讹变所致,后被“八”声化;(4)“舌”,《说文》:“从干从




① 李新魁《从“同音”现象看语音与文字的某些关系》,《语文园地》1985年第1期。



② 张桂光《古文字中的形体讹变》,《古文字研究》第15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③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784页。




口,干亦声。”“舌”字是口中伸出舌头的象形。因为伸出的舌头与干形近,故讹变为干。又“舌”与“干”音近而被声化;(5)“胄”,《说文》:“从月,由声。”金文“胄”从胄的象形,从目。至小篆胄形讹变为“由”,因为“由”与“胄”音相近,因而被声化;(6)“弘”,《说文》:“从弓,厶声。”甲文“弘”字以一指示弓上隆起之部位。至小篆,指事符号脱离原字,讹变从厶,被声化为声符。^① 在《汉字形体结构围绕字音字义的表现而进行的改造》一文中,赵先生所举的例子有些也属变形音化,如“鬯”变从亡声,“壶”变从古声,“寐”变从未声,“榦”变从干声等。^②

以上诸位先生对变形音化现象的指称虽然不同,但实质上却是一样的。他们指出了现象,但未能上升为理论,因此还不是自觉的研究。刘钊先生则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首先,为变形音化现象做了概念上的界定;其次,把“变形音化”提升为古文字构形演变的一个重要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再次,举出大量的例证说明“变形音化”是普遍存在的,而非偶然现象。在《古文字构形理论研究》一文中他举了37例:^③

1. 甲骨文“寮”字作,西周金文作“”,变形音化从宫声。

2. 金文“匱”字作,从皿也声,又作,变形音化从兔声。




3. 金文“𩚑”字作,小篆作,变形音化为从“甘”并以“甘”为声。


4. 甲骨文“望”字作,金文作,又变形音化从亡声作。




① 赵平安《汉字声化论稿》,《河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② 赵平安《汉字形体结构围绕字音字义的表现而进行的改造》,《中国文字研究》第1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4~75页。






③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8~89、109~117页。




5. 甲骨文“朝”字作，金文作。战国朝河右库戈“朝”字变形音化从舟声，作。




6. “老”字甲骨文作。甲骨文老、考本一字，后分化为二。分化为考的方式是将“丨”变形音化为“丂”。




7. 甲骨文“逆”字作，金文作，又变形音化从牛声作。





8. “丧”字甲骨文作，金文作，又变形音化从亡声作。






9. “良”字甲骨文作，金文作，战国文字又变形音化从亡声作“”“”。









10. 甲骨文“昃”字作，战国文字又变形音化从矢声作“”。




11. 甲骨文“者”字作，金文作，又变形音化从止声作。

12. 甲骨文“猷”字作，金文作“”，已变形音化从今声。

13. 甲骨文“能”字作，金文作，变形音化从（）声。

14. 甲骨文“州”字作，金文作，战国文字变形音化从卩声作“”“”。

15. 甲骨文“舞”字作“”，金文作，又作“”“”“”，所从之即“某”字，这可能也是人为的“变形音化”。

16. 甲骨文“息”字作，金文作，小篆作，变形音化

从囟声。汉代“恩”又变形音化从公声，如“聰”字作“聰”“聰”。

17. “两”字金文作“𠂔”，战国文字变形音化从羊声作“𠂔”“𠂔”。

18. “智”字甲骨文作“𠂔”，金文或变形音化从矢声作“𠂔”“𠂔”。

19. “襄”字甲骨文作“𠂔”，金文作“𠂔”，战国文字中的“襄”字变形音化从羊声，又作“𠂔”“𠂔”（讓字所从）。

20. 甲骨文“羞”字作“𠂔”，金文作“𠂔”，汉简变形音化从丑声作“𠂔”。

21. 甲骨文“聰”字作“𠂔”，金文作“𠂔”，又变形音化从聿声作“𠂔”。

22. “顛”字本应从“頁”，战国中山王器“顛”字作“𠂔”，变形音化从寡声。

23. 甲骨文“更”字作“𠂔”，金文“便”字作“𠂔”，所从之“𠂔”变形音化从兔声。

24. 甲骨文“保”字作“𠂔”，金文作“𠂔”，战国中山器作“𠂔”，变形音化从采声。

25. 金文“齏”字作“𠂔”，或作“𠂔”，所从之“妻”变形音化从齊声。

26. “盂”字甲骨文作“𠂔”，金文作“𠂔”，战国金文又作“𠂔”“𠂔”，所从之“于”变形音化从羊声。

27. “乌”、“於”乃一字之分化。金文作“𠂔”，像鸟的形状。又割裂笔画作“𠂔”，战国中山器作“𠂔”，割裂出的笔画已写成“𠂔”形，即变形音化从勺声。

28. 金文“参”字作“𠂔”，又作“𠂕”，古玺作“𠂖”，变形音化为从川声。古玺“参”字又作“𠂗”“𠂘”，其下部又变形音化从彡声。

29. 甲骨文“霍”字作“𠂙”，金文作“𠂚”，汉印变形音化从隻声作“𠂛”。

30. 秦汉“脂”字作“𠂜”“𠂝”，硕人镜作“𠂞”，变形音化从自声。

31. “孰”字金文作“𠂟”，秦汉文字或变形音化从舟声作“𠂠”。

32. 金文“樊”字作“𠂡”，汉永建黄肠石、樊氏镜作“𠂢”“𠂣”，变形音化从文声。

33. 金文“寧”字作“𠂤”，秦汉文字作“𠂥”“𠂦”，或作“𠂧”，变形音化从南声。

34. 金文“發”作“𠂨”，秦汉文字或变形音化从非声作“𠂩”“𠂪”“𠂫”。

35. 甲骨文“蔽”字作“𠂬”，金文作“𠂭”，汉帛书作“𠂮”，又作“𠂯”，“蔽”字作“𠂰”“𠂱”“𠂲”，变形音化从米声。




36. 金文“賣”字作“𠂳”，又变形音化从勺声，作“𠂴”“𠂵”。



37. 金文“害”字作“𠂶”，又作“𠂷”，变形音化从古声。小篆作“𠂸”，又变形音化从丰声。




由于刘钊先生对变形音化的研究既有理论上的阐述，又有大量的事实根据，所以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学者追随其后，进一步挖掘古文字资料中的变形音化现象，有的还对这个问题做专题研究。如江学旺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西周金文研究》就直接采用“变形音化”这一术语进行研究。他指出的变形音化例有：西周金文“妻”字作“𠂹”，又作“𠂺”，变从留声；西周金文“匹”字作“𠂻”，又作“𠂼”，变从匕声；西周金文“青”字作“𠂽”，或作“𠂾”，变成从生从井




皆声的双声符字。^①



魏宜辉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楚系简帛文字形体讹变分析》^②设专章“音化讹变”。魏先生从讹变方式的角度把“音化讹变”分为“变形音化讹变”、“省简音化讹变”、“增繁音化讹变”、“笔画部件游移音化讹变”、“形体分解音化讹变”五类,由其所举之例来看,除了“变形音化讹变”,其他四类也属刘钊先生所指出的变形音化现象。魏先生所举变形音化讹变之例有:



1. 金文“身”字作,楚简作,“身”的中间部分变成,“以”、“身”音近。



2. 金文“朝”字作,楚简作,变从舟声。

3. 金文“鞮”字作,曾侯乙墓竹简作,又变形音化从次声作。



4. 金文“良”字作,天星观楚简作,变从壬声,信阳楚简作,变形音化从羊声。

5. 金文“斯”字作,楚简作,变从臼声。

6. 金文“李”字作,楚简作,变形音化从来声。

7. 金文“敬”字作,郭店楚简《五行》作,变从兄声。

简省音化之例有:




8. 东周文字“夏”字作,战国齐系文字作,变从疋声。




9. 春秋时期楚文字“戟”字作,战国时期楚文字多作,



① 江学旺《西周金文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

② 魏宜辉《楚系简帛文字形体讹变分析》,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又作“𦉳”“𦉴”，所从之“𦉵”是由“𦉶”简省而来的，因为“𦉶”与“𦉷”音更近。




10. 甲骨文“我”字作，西周金文作，战国燕系文字作，变从介声。





11. 甲骨文“复”字作，金文作，战国楚文字作，变从畀声。






12. 楚系文字“流”字作，又作，变从“出”声。

增繁音化讹变之例有：



13. 甲骨文“向”字作，战国楚系文字作“”，变从羊声。





14. 甲骨文“索”字作，金文作，楚文字或作，变从昔声。



15. 甲骨文“發”字作，楚简作“”，又作，变从箕声。

16. “乌”（於）字西周金文作“”，春秋金文作，战国楚文字作“”，变从羊声。





笔画部件游移音化讹变之例有：




17. 甲骨文“敝”字作，战国楚文字作，变从采声。



18. 殷周金文“尊”字作“”，楚简作“”，变从关声。

19. 西周金文“殺”字作，楚简作，变从介声。

形体分解音化讹变之例有：

20. 金文“華”字作“”，郭店楚简《语丛二》“嘩”字作“”，所从之“華”变从于声。

21. 甲骨文“厚”字作，楚文字作，又作，变从毛声。

22. 甲骨文“每”字作，楚简作，变从来声。

张静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郭店楚简文字研究》也在第五章《讹变》下专设一节讨论郭店楚简文字中的变形音化现象。如：^①

1. “罍”字金文作“罍”，郭店楚简作“罍”，变从白声。
2. 甲骨文“老”字作“𠄎”，金文作“𠄎”，郭店楚简作“𠄎”，变从止声。
3. 甲骨文“異”字作“𠄎”，金文作“𠄎”，郭店楚简作“𠄎”，变从开声。
4. 甲骨文“亩”字作“𠄎”，金文作“𠄎”，郭店楚简作“𠄎”，变从尔声。
5. 战国文字“布”字作“𠄎”，郭店楚简作“𠄎”，变从市声。
6. 商代金文“守”字作“𠄎”，金文作“𠄎”，郭店楚简作“𠄎”，变从肘声。
7. 金文“法”字作“𠄎”，沮楚文作“𠄎”，郭店楚简作“𠄎”，变从夫声。
8. 金文“音”字作“𠄎”，郭店楚简作“𠄎”，变从甘声。
9. 金文“馭”字作“𠄎”，郭店楚简作“𠄎”，“支”声化为“午”声。
10. 春秋金文“喬”字作“𠄎”，郭店楚简作“𠄎”，又作“𠄎”，变从九声。
11. 西周金文“襄”字作“𠄎”，郭店楚简作“𠄎”，中部声化为“羊”声。
12. 战国文字“諺”字作“𠄎”，郭店楚简作“𠄎”，“文”旁声化为“爻”声。
13. 甲骨文“弗”字作“𠄎”，郭店楚简作“𠄎”，变从必声。

^① 张静《郭店楚简文字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冯胜君先生在其博士后出站报告《论郭店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以及上博简〈缁衣〉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也指出了一些楚简中的变形音化现象。^①如：

1. 陈剑、张富海等先生认为“矣”和“矣”应该是一字分化。冯胜君先生则认为“矣”字上部所从“日”旁是声符化的结果。

2. 郭店《老子》甲篇“辱”字写作“𠄎”（简 36），同简“厚”字作“𠄎”，与“辱”字所从完全相同，即“辱”之作“𠄎”者乃变形音化从厚声。

3. 郭店楚简《缁衣》“允”字作“𠄎”（简 5），变形音化从身声。

4. 上博“尹”作“𠄎”，变形音化从今声。

5. 郭店楚简《缁衣》“敬”字作“𠄎”，其声符“𠄎”从丙，《说文》小篆“曷”字作“𠄎”，所从之“𠄎”是由“丙”变形音化而来的。

黄天树先生称这类现象为“变形声化”。同刘钊先生一样，他也认为变形音化与讹变不同，是一种人为的有意识的改造，并举甲骨文为例，如“昃”在甲骨文中就有变从矢声的写法。又如甲骨文“眾”字作“𠄎”“𠄎”，或作“𠄎”，上部变形音化从公声。^②

由上所述可见，变形音化现象在古文字里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很常见，应该作为古文字构形演变的重要规律进行更加广泛深入的研究。

二、注重标音是变形音化现象的内在驱动力

纵观汉字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意化与音化这一矛盾体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斗争，其中音化趋势逐渐占上风。这表现在以下几

^① 冯胜君《论郭店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以及上博简〈缁衣〉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4年。

^② 黄天树《殷墟甲骨文“有声字”的构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6本第2分册，2005年。

1. 纯粹为了标音

本来就是形声字的字很少发生变形音化,变形音化多发生在那些原本是象形或会意的字上。因为象形字和会意字都不表音,而人们在读一个字的时候,是非常希望能够从字形上得到提示或启发,所以就有意识地对字形的某一部分进行改造,使之与另外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形似。如甲骨文“帚”字多作“𠄎”“𠄏”“𠄐”“𠄑”等形,为象形字。合二〇四六三“帚”字作“𠄒”,就是有意地对“帚”字上部进行改造,使之与“笛”形近,因为“笛”与“婦”均为之部字。甲骨文“霍”字作“𠄓”,金文作“𠄔”“𠄕”,汉印作“𠄖”,又作“𠄗”,变形音化从隻声。^①

2. 为了更准确的标音

有的变形音化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语音发生了变化,人们为了更加准确地标音,就对字形进行改造,即我们所说的“形随音变”。如甲骨文“異”字作“𠄘”“𠄙”“𠄚”等形。“異”为“戴”之初文,故字又变形音化从笛声,作“𠄛”“𠄜”“𠄝”。到了战国时代,由于燕国语音中“異”与“虞”音近,所以燕系文字作“𠄞”(玺汇 3688),变形音化从虞声。燕玺有字作“𠄟”(玺汇 186)“𠄠”(玺汇 188),与“𠄞”下部完全一致,朱德熙先生释为“虞”,读为“遽”。^②在楚音里“異”和“𠄡”音近,故郭店楚简作“𠄢”,变从𠄡声。又如甲骨文“熟”字作“𠄣”,金文作“𠄤”,秦汉文字作“𠄥”“𠄦”,或作“𠄧”“𠄨”,变形音化从舟声。“熟”本为入声,读入觉部,秦汉文字之所以变形音化从舟声,很可能是因为“熟”有了读为幽部的新读音。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8~89、116页。

② 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3. 有的变形音化现象明显具有方言特征

西周金文“害”字作“𠄎”，又作“𠄎”（害吊簋），变形音化从古声。春秋齐系文字“𠄎”字或从夫声作“𠄎”（陈逆𠄎）、或从古声作“𠄎”（铸叔𠄎），或从害声作“𠄎”（鲁士𠄎）。“夫”、“古”皆为鱼部字。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同为铸国铜器的铸公𠄎和铸叔𠄎，铸公𠄎“𠄎”字假借“害”为之，作“𠄎”。“𠄎”为累加了“五”为声符而成的，“五”亦为鱼部字，而铸叔𠄎则从古声，作“𠄎”。西周晚期金文“𠄎”字作“𠄎”（遇甌），又作“𠄎”（姑衍簋）。凡此皆可证“害”在西周乃至春秋时期的一些方言里是鱼部字，故“害”可变形音化从古声。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害”字作“𠄎”，小篆作“𠄎”，就是本自此形，已变形音化从𠄎声。“𠄎”、“害”均为月部字，这说明在秦汉语音里“害”读入月部，故“害”可变形音化从𠄎声。^①

又如，睡虎地秦简“𠄎”字作“𠄎”（秦律十八种 47）“𠄎”（法律问答 89），从頁雇声。战国中山王器“𠄎”字作“𠄎”，郭店楚简《缁衣》作“𠄎”，皆变形音化从寡声。这很可能是因为战国时期晋系和楚系“𠄎”字的读音与秦音不同作的有意识地改造。

^① 裘锡圭、李家浩先生曾指出：“从古文字资料看，‘害’的古音似与鱼部有密切关系。”参看裘锡圭、李家浩《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文与考释》，《曾侯乙墓》（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554页。大西克也先生认为金文“害”与“伤害”之“害”本来不是一个字。金文“害”是鱼部字，在战国文字中讹变得与“害”形近，而“伤害”之“害”与“害”音近。“害”、“害”字形相混后，本读鱼部的“害”字亦表祭部读音的“伤害”意的词。秦汉以后“害”字兼通鱼祭两部，这是“害”、“害”字形相混所引起的特殊现象，并不意味着鱼祭可通。参看大西克也《论古文字资料中的“害”字及其读音问题》，《古文字研究》第24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再如,甲骨文“眾”字作“𠬞”“𠬟”,或作“𠬟”,上部变形音化从公声。^①这很可能是因为书手受其方言影响而做有意识的改造。在甲骨文里应该也含有方言的因素。如甲骨文“卒”字又有两类形体,一类与“衣”同形,作“𠬟”,一类从聿声作“𠬟”“𠬟”。裘锡圭先生认为此乃“卒”之异体。^②卜辞中有大量用“卒”为“猝”的例子,^③结合战国文字材料,我们认为“卒”在殷商时代乃至战国时期都读为从母。由“卒”在甲骨文里又有异体“𠬟”来看,“卒”在殷商时代应该还有一种读为以母的读音。又如,“𠬟”、“𠬟”皆训为“煮”,二字在甲骨文一期均已出现,“𠬟”字作“𠬟”“𠬟”等形,“𠬟”字作“𠬟”“𠬟”“𠬟”等形。二、三期甲骨文则只见“𠬟”字,不见“𠬟”字,这很可能是由于不同书手受各自方音的影响而使用不同的形声字。

三、变形音化的若干理论问题

1. 概念及其内涵

经过十余年的检验,刘钊先生最初给变形音化下的定义基本上是正确的,即变形音化是指文字受逐渐增强的音化趋势的影响,将一个字的形体的一部分,人为地改造成与之形体相接近的可以代表这个字字音的形体,以为了更清楚地表示这个字字音的一种文字演变规律。变形音化大都是将原为象形字或会意字的形体改造为形声字。变形音化具有讹变的性质,但与讹变又有不同,它的改造过程具有人为的有意识的因素。其内涵包括:a、受音化趋势的影响。b、为













① 黄天树《殷墟甲骨文“有声字”的构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6本第2分册2005年。







② 裘锡圭《释殷墟卜辞中的“卒”和“𠬟”》,《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





③ 参看裘锡圭《古文字论集·说甲骨卜辞中“戠”字的一种用法》,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14页;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第2724页;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多友鼎的“卒”字及其他》,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37页。

了更清楚的表音。c、主要对象是象形字和会意字，形声字较少。d、具有讹变的性质，但与讹变不完全相同，讹变是人们出于无意识的错觉，把一个字误写成另一个字。“变形音化”带有意识的人为的因素。e、被改造的部分与另外一个字形体非常接近，而且被改造的字与这个字音同或音近。魏宜辉先生认为变形音化不包括由于省简、增繁、笔画部件游移等因素造成音化现象，并把变形音化作为纯粹的讹变现象，排除人为的因素，都是不妥的。另外，有的学者把“变形音化”称为“声化”也是不恰当的。“变形音化”确实属于声化的范畴，但声化还包括在象形或会意字上添加声符构成形声字的现象。

2. 变形音化的变形方式

(1)就形体的某一部分进行改造。如“𠄎”字本从大从日作会意，因大、矢二字形体接近，且“矢”就与“𠄎”同音，所以把“大”改造成“矢”，作；又如，甲骨文“𠄎”字作，本为会意字，金文作，就是把原来形体中表示倒口的部分改造成“今”以表音；再如，“良”字甲骨文作，金文作，因其下部形体与“亡”字接近，故战国文字“良”字又变形音化从亡声作。

(2)在原字形体的某一部分添加笔画，使之和另外一个与原字音同或音近的字形似。如郭店楚简《缁衣》“允”字作（简5），就是在“允”的下部添上，使之与“身”字形似，楚简“身”字作可证。古音“允”在以纽文部，“身”在书纽真部，声韵俱近，故“允”可变形音化从身声。又如，金文“猷”字作，从冂从犬，小篆“猷”字作，变形音化为从“甘”，并以甘为声。再如，战国中山王器“顛”字作，就是在“頁”字左右两边各添两笔，使之与“寡”形似，“寡”与“顛”皆为见纽鱼部字，故“顛”可变形音化从寡声。

(3)在原字上添加新的偏旁，使之与原字的一部分构成新字，并用作声符。如甲骨文“保”字作，金文作，战国中

山器又作“𡵓”，就是在“𡵓”上加“𡵓”构成“采”字，《说文》：“保，从人采声。”又如，甲骨文“霍”字作“𡵓”，金文作“𡵓”“𡵓”，汉印作“𡵓”，又作“𡵓”。“𡵓”就是在“隹”字上加“又”旁，使之变得与“隻”同形，因“霍”与“隻”同音，故可变形音化从隻声。

(4) 简省原字中的某些笔画。如甲骨文“非”字作“𠄎”，又作“𠄎”“𠄎”，或省去上部的横笔，作“𠄎”。“𠄎”所从之“𠄎”即“北”字，“非”就成了从𠄎北声之字。又如西周金文“遽”字作“𡵓”，“遽”从辵遽声。遽父己尊“遽”字作“𡵓”，所从“𡵓”与“虎”字作“𡵓”“𡵓”非常接近。书写者显然是为了简省笔画，而把“𡵓”省写成了音近的“虎”。

(5) 割裂笔画。“乌”（於）字西周金文作“𡵓”“𡵓”，像鸟的形状。又割裂笔画作“𡵓”“𡵓”“𡵓”，战国中山器作“𡵓”“𡵓”，割裂出的笔画已写成“𠄎”形，即变形音化从𠄎声。又如，金文“華”字作“𡵓”“𡵓”，郭店楚简《语丛二》“嘩”字作“𡵓”“𡵓”，所从之“華”割裂为“𡵓”和“𡵓”两个部分，“𡵓”用作声符。再如，甲骨文“異”字作“𡵓”，金文作“𡵓”，郭店楚简作“𡵓”，就是将原字割裂成两部分，下部再略加改造，变从𠄎声。

(6) 游移笔画。甲骨文“敝”字作“𡵓”，西周金文作“𡵓”，就是将本来属于“𡵓”的四点从“巾”形中脱离，再加一横笔改造成“采”。“采”在字中用作声符。

(7) 对形体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部件加以改造，并组合。甲骨文“彝”字作“𡵓”“𡵓”“𡵓”。西周金文作“𡵓”“𡵓”“𡵓”“𡵓”，增“𡵓”或“𡵓”形于反缚之鸡翅处，又增“𡵓”“𡵓”表宰杀鸡时滴沥的鸡血。战国中山王觥壶作“𡵓”，右边从収从“𡵓”，“𡵓”是割裂原字中的“𡵓”形，再和表鸡血的点改造而成的，在字中用作声符。

“𠄎”，即“率”，中山王𠄎鼎“逢”字作“𠄎”（中山王𠄎鼎）可证。

(8)对形声字的声符进行改造，以更好地标音。如“孟”字甲骨文作“𠄎”“𠄎”，金文作“𠄎”，战国金文又作“𠄎”“𠄎”，所从之“于”变形音化从羊声。又如，秦汉“脂”字作“𠄎”“𠄎”“𠄎”，硕人镜作“𠄎”，变形音化从自声。这很可能是因为在硕人镜的书手的方言里“脂”与“自”音同或音近，所以人为地把“脂”字改造成从自声之字。

以上我们对变形音化的研究状况做了概述，对有关变形音化的一些理论问题也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变形音化作为古文字构形的一条重要规律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有进一步加以梳理和总结的必要。我们认为研究古文字的变形音化问题还应该考虑时代和地域问题，即不同时代和地域在语音上必有差别，不能混为一谈。近一二十年来，上古音研究已开始分时代和地域进行，殷商、西周和战国语音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新成果。因此，本书将分时代和地域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

第二节 变形音化举例

一、甲骨文中的变形音化

1. 𠄎(曼)

甲骨文曼字作“𠄎”（合 22），又作“𠄎”（合 27754）“𠄎”（合 4508）。“𠄎”所从之“𠄎”即“面”字。我们认为“曼”所从之“面”乃声符，“曼”本从“日”，把“日”改造成“面”属变形音化现象。古音“曼”、“面”均为明纽元部字。

2. 𠄎(賓)

甲骨文“賓”字作“𠄎”（合 1248 正）“𠄎”（合 3168）“𠄎”（合 2203），

从宀从女从止，或从宀从人从止，会宾客至之意。或增口作“𡩺”（合 13890）“𡩻”（怀 382），或并从人从女作“𡩼”（合 13871）“𡩽”（合 15175 正），或从“丌”作“𡩾”（合 15179）“𡩿”（合 15188）“𡪀”（合 14422）“𡪁”（合 23101）“𡪂”（合 1540）。“丌”即“丐”字，是在“人”形上加一横饰笔而成的，在字中用作声符。古音“賓”在帮纽真部，“丐”在明纽真部，二字叠韵，声皆为唇音。

3. 𠄎(侯)

甲骨文“侯”字作“𠄎”（合 33082）“𠄏”（合 20070）“𠄐”（合 20024）“𠄑”（合 3333），字从矢。象矢头的部分略往下移，就与“交”非常接近了，如“𠄒”（合 34442）“𠄓”（合 33071）“𠄔”（合 3379）“𠄕”（合 3338）“𠄖”（合 3324）。我们认为“侯”所从之“矢”变从“交”，乃变形音化。古音“交”在见纽宵部，“侯”在匣纽侯部。甲骨文中见匣二纽相通的例子很多，如“效”从交声，“效”就是匣纽字；“教”、“学”在甲骨文中同字，“教”为见纽字，“学”为匣纽字；“雇”从户声，“雇”属见纽，“户”则在匣纽，等等。

4. 𠄗(歳)

甲骨文“歳”字作“𠄗”（合 728）“𠄘”（合 11226）“𠄙”（合 22226），又作“𠄚”（合 1339）“𠄛”（合 11258）“𠄜”（合 14621）。《说文》：“歳，豕也，后躡废谓之歳。”可见“歳”之本形当为“𠄗”，是个指事字，其从“矢”乃变形音化，即把原来作为指事符号的部分改造成“矢”形以标音，“歳”就成了从矢声的形声字。古音“歳”在定纽质部，“矢”在书纽脂部，声韵俱近。

5. 𡩺(家)

甲骨文“家”字作“𡩺”（合 13580）“𡩻”（合 13584 正甲），从宀从豕

会意,又作“𠄎”(合 13586)“𠄏”(合 13593)“𠄐”(合 3522 正),在所从之“豕”腹部加一指事符号,变从“豕”,“豕”即“豨”。“豨”变从“豨”声,应该是有意识地声化。古音“豨”、“豨”均在见纽鱼部。

6. 𠄑(庸)

甲骨文“庸”字多作“𠄑”(合 15994)。裘先生认为庸就是称为大钟的镛,根据考古发掘和古器物学的知识来看,商代还没有悬钟,卜辞所说的庸,即商周铜器里一般人称为大饶的那种乐器,所以卜辞文例常为“置庸”。^①这些都是正确的,但他认为“𠄑”所从之“𠄒”为“同”,“同”、“用”声近,为“庸”之声符似可商。我们认为甲骨文“庸”字作“𠄑”形乃会意字,即将“𠄓”(钟)放置于“𠄒”(钟架)上。陈梦家先生对镛的形制做过描述:“花纹多作繁复的或变形的兽面纹,亦前后面各一,其方向是以口上甬下为顺……甬端有时是不整齐的。并非铸后折断,乃是铸时即如此。这是因为这种镛是口向上的,甬端(其实是末)是植于座中的,因此不需铸平。”^②“𠄑”形与陈氏所述镛之形制正相吻合,即“𠄑”为“镛”。甲骨文又有从“用”声的“庸”,作“𠄔”(合 12839)“𠄕”(屯 1022)。这可视为变形音化,即“𠄑”所从的“𠄓”下端的一竖写得长一些,就与“𠄒”中间的横画交叉而变成“用”形,如“𠄖”(合 27310),为“父庚庸”的合文,“庚庸”合文的下部也变成“用”形。《说文》:“庸,用也,从庚从用。庚,更事也。《易》曰:‘先庚三日’。”许慎误以假借义为本义,以“庸”为会意字,其误显然。

7. 𠄗(非)

甲骨文“非”字作“𠄗”(合 24342)“𠄘”(合 27251)“𠄙”(合

①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6~198页。

②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84页。

34479),又作“𠄎”(合 32722)“𠄏”(合 33147)“𠄐”(合 34708)“𠄑”(合 10977)“𠄒”(合 21620),或作“𠄓”(合 33273)“𠄔”(合 33694)“𠄕”(合 33698)。我们认为“非”字作“𠄎”“𠄏”等形当是变形音化,即原来所从之“𠄎”“𠄏”形省去上部一横,成“𠄓”“𠄔”。“𠄓”“𠄔”即“北”字,“非”就成了从升北声之字。古音“非”在帮纽微部,“北”在帮纽职部,二字双声,韵部的主要元音相同。

8. 𠄎(逆)

刘钊先生已指出金文中“逆”有变从牛声者,如“𠄎”(召鼎)“𠄏”(伯者父簋)。^①但实际上甲骨文中“逆”就有变形音化从牛声的例子,如“𠄎”(合 32185)“𠄏”(合 36475)“𠄐”(英 624 正)。古音“逆”在疑纽铎部,《说文》段注“告”字下段玉裁谓“牛”可读入声“玉”,“玉”古音在疑纽屋部,故“逆”可变从牛声。

9. 𠄎(異)

甲骨文“異”字作“𠄎”(合 4412)“𠄏”(合 28400)“𠄐”(合 32915)“𠄑”(合 31903),又作“𠄒”(合 1096)“𠄓”(合 2274 正)“𠄔”(合 17992)。李孝定先生认为字像一人头上戴物,高举两手扶翼之之形,上从“𠄎”,即许书“东楚名缶曰甗”之甗,或省变作“𠄎”,仍是甗字。^②“異”为“戴”之初文已成定说,但李先生认为“異”字所从之“𠄎”乃“甗”之省变,则似有可商。我们认为“異”所从之“𠄎”“𠄏”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② 转引自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0231条下李孝定说。

“𠄎”“𠄏”“𠄐”“𠄑”等形，皆象所戴之物形，非必为“𠄒”，从“𠄑”“𠄒”者乃变形音化，即有意将象物之形改造成“𠄒”，起着标音的作用。古音“𠄒”属从纽之部，“戴”所从之“戔”亦为从纽之部字，“戔”可为“戴”之声符，春秋战国时期的戴叔朕鼎、戴叔庆父鬲、戴伯匜、九年戴丘令雍戈“戴”字，皆作“𠄑”（戔）可证。因此我们认为“異”确可变形音化从𠄒声。

10. 𠄒(帚)

甲骨文“帚”字作“𠄒”（合 2821）“𠄓”（合 2825）“𠄔”（合 709 正）“𠄕”（合 717 正），又添饰笔作“𠄖”（合 20463 反）。“𠄖”所从之“𠄗”与“𠄒”形近，这很可能是有意识地声化。卜辞中“帚”皆用作“婦”。古音“帚”在章纽幽部，“婦”在并纽之部，“𠄒”在商代读入从纽之部，^①因此“帚”变形音化从𠄒声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西周金文中的变形音化

11. 𠄘(告)

甲骨文“告”多作“𠄘”，作“𠄙”形者亦不在少数，又作“𠄚”（合 6141）“𠄛”（合 37439）“𠄜”（合 30596）等形。《说文》：“告，牛触人角着横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段注：“从口牛声，牛可入声读玉也。”然而，甲骨文中“牛”及从“牛”之字皆作“𠄝”、“𠄞”诸形，与“告”所从之“𠄘”显然不同。所以甲骨文中的“告”并非从牛。至西周以后金文“牛”及从牛之字多作“𠄞”，如“𠄟”（刺鼎）“𠄠”（仲簋）“𠄡”（孟鼎二）“𠄢”（貉子卣）“𠄣”（邾公恽钟）“𠄤”（犀伯鼎）“𠄥”（大作大

^① “𠄒”最初为从母字，其精母之读音乃后出。参见本书第二章《中古精母字来源之古文字学证据》部分。

仲簋),与“告”作“𠄎”(孟鼎二)“𠄎”(亚中告鼎)等所从之形相同。我们认为“告”本作“𠄎”(合 6141)“𠄎”(合 37439),从“𠄎”声,“𠄎”下部一横笔与“𠄎”字的横笔重合即成“𠄎”形,在“𠄎”形上再加一横饰笔,就成了“𠄎”形,西周金文继承此形。在西周时期因“告”所从之“𠄎”与“牛”同形,而且音近(依段玉裁所言,“牛”可读入声“玉”,“玉”古音在疑纽屋部,告在见纽觉部,声韵俱近),所以“告”所从之“𠄎”就成了声符。

12. 𠄎(遽)

西周金文“遽”字作“𠄎”(师遽簋)“𠄎”(遽仲解)“𠄎”(师遽方彝)“𠄎”(墙盘),从辵遽声。西周金文“遽”字作“𠄎”(遽簋)“𠄎”(盨尊)。《说文》小篆“遽”和“遽”所从之“犬”均讹成“豕”。遽父己尊“遽”字作“𠄎”,所从“𠄎”与“虎”字作“𠄎”(师寰簋)“𠄎”(召伯簋二)非常接近。书写者显然是为了简省笔画,而把“𠄎”省写成了音近的“虎”。古音“虎”在晓纽鱼部,“遽”在群纽鱼部,二字韵同声近。

13. 𠄎(器)

金文“器”字作“𠄎”(鬯簋)“𠄎”(吊姬匜)“𠄎”(周憲鼎)“𠄎”(陈侯因甬罍)等形,字皆从四口从犬。西周中期的鬯簋“器”字作“𠄎”,“𠄎”变作“𠄎”。“𠄎”即“矢”,鄯侯簋“侯”字作“𠄎”可证。古音“器”在溪纽质部,“矢”在书纽脂部。陈初生先生认为中古部分章组字有见组的来源。^①李新魁先生也曾列举了文献典籍以及方言中的

^① 陈初生《上古见系声母发展中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1期。

例证,证明中古《广韵》中的章组声母有一部分来自上古的牙音组声母,并且指出这类字是由见组中的软音kj-等变来的。^① 师玉梅先生考察了西周金文中章组与喉牙音的关系,认为虽然这两者之间相谐在绝对数量上不是很多,也多没有超过几遇数,但是比较普遍,应该有音理上的联系。^②

14. 𪛗(齋)

甲骨文“齋”作“𪛗”(合 4875)“𪛗”(合 20648)“𪛗”(合 21306 甲),从来从窗。西周金文仍沿袭甲骨文之形,作“𪛗”(史墙盘)“𪛗”(鬲匜)。西周早期的沈子它簋盖“齋”字作“𪛗”,变形音化从束声。古音“齋”在心纽职部,“束”在清纽锡部,声韵俱近。

15. 𪛗(建)

西周金文有字作“𪛗”(建鼎),《金文编》释为“建”,但裘锡圭、林沅、董莲池三位先生都认为字当释为“律”。^③ 战国简牍资料大量公布后,李家浩先生根据战国简中“建”字从止作“𪛗”(郭店·老子乙本 10)“𪛗”(上博·容成氏 22)“𪛗”(九店·56·21)“𪛗”(睡虎地·日书乙种 29)等形,肯定《金文编》释“𪛗”为“建”是对的,并指出毛公鼎“𪛗”亦当为“建”。^④ 按:魏宜辉先生有专文研究“建”的形体演变轨迹,其说甚确。^⑤ “𪛗”“𪛗”为“建”字无疑。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公鼎“𪛗”之形体还含有声化的成分,“建”所从之“聿”被改造成

① 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402~403页。

② 师玉梅《西周金文音韵考察》,广州: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8~29页。

③ 董莲池《金文编校补》,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7条。

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九店楚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63~64页。

⑤ 魏宜辉《说“建”》,《古文字研究》第25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𣎵”，“𣎵”是由“聿”和“柬”借笔而成，“𣎵”实际上是个从柬声的字。古音“柬”和“建”同在见纽元部。

16. 𣎵(碩)

西周金文“碩”字作“𣎵”(史伯碩父鼎)“𣎵”(吊碩父甌)“𣎵”(吊碩父鼎)“𣎵”(善夫山鼎)“𣎵”(邠史碩父鼎)“𣎵”(史伯碩父鼎)“𣎵”(毕伯碩父鬲)等形。由于《说文》谓“碩，从頁石声”，故旧多以为从石乃“碩”之本形。金文“碩”字除善夫山鼎作“𣎵”与“石”之作“𣎵”形近外，其他各体皆与石不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吊碩父鼎“𣎵”所从之“𣎵”与“𣎵”是相连的，“𣎵”内从“𣎵”不从“𣎵”；(2)毕伯碩父鬲“𣎵”从“𣎵”，不从“𣎵”，而“石”从不作“𣎵”形；(3)战国燕玺“碩”字作“𣎵”(玺汇 3318)，不从口。据于以上几点，我们认为“碩”之本形当如吊碩父鼎“𣎵”之省口作“𣎵”，即在“頁”上加指事符号“𣎵”表示“头大”，“𣎵”为繁饰。由于“石”、“碩”古同音，皆为禅纽铎部字，而“𣎵”和“𣎵”结合得紧密一些，就与“石”无异了，所以人们就有意识地把“碩”改造成从石声的形声字。

17. 𣎵(敝)

甲骨文“敝”字作“𣎵”“𣎵”“𣎵”“𣎵”，裘锡圭先生谓象持杖拍打破布，点表示弹出的灰尘。^①西周金文癸盥“敝”字作“𣎵”，从“𣎵”从支，“𣎵”即“市”字。“𣎵”是由甲骨文“𣎵”所从之“巾”加一横饰笔，或由“𣎵”形简省而成。“敝”变从“𣎵”乃变形音化。古音“敝”在并纽月部，“市”帮纽月部，音极近。

^①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说字小记》，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38页。

18. 𣎵(敝)

西周晚期的散盘铭曰：“封于𣎵城楮木。”《金文编》收“𣎵”于“播”字条下。按：“𣎵”当释为“敝”。^①马王堆帛书“敝”字作“𣎵”（五十二病方 313）“𣎵”（经法 13）“𣎵”（经法 12）。从马王堆帛书“敝”字诸形可以清楚地看出散盘之“𣎵”就是“敝”字，字之左旁“𣎵”被写成“𣎵”“𣎵”可看作是变形音化，即有意识地把“敝”改造成从采声的字。古音“敝”在并纽月部，“采”在并纽元部，音极近。“敝”在不同的器物上写法不同，这在古文字中并不罕见。“敝”既可变形音化从市，又可从采声，可能是因为不同的书手都有各自的书写习惯和风格，同时也难免受其方音的影响。

19. 𣎵(𣎵)

甲骨文“𣎵”作“𣎵”“𣎵”“𣎵”，从人朋声。西周金文作“𣎵”（𣎵仲鼎）“𣎵”（𣎵直），沿袭甲骨文的写法；又作“𣎵”（多友鼎）“𣎵”（杜伯盃），人形变作“𣎵”，“𣎵”即“伏”之初文。我们认为“𣎵”变从“𣎵”乃变形音化。古音“𣎵”在并纽职部，“伏”在并纽蒸部，音极近。

20. 𣎵

西周金文有字作“𣎵”（大鼎），董莲池先生认为此字与“馭”字作“𣎵”（班簋）“𣎵”（令鼎）“𣎵”（𣎵侯鼎）“𣎵”（禹鼎）有别，当释作“馭”。按：“𣎵”与“𣎵”当同字。“𣎵”所从为“更”不错，然“𣎵”所从之“𣎵”亦为“更”。“更”为“鞭”之初文，西周金文“更”字作“𣎵”，又变形音化从免声作“𣎵”（九年卫鼎），𣎵匜“便”（鞭）字作“𣎵”，也发

^① 李家浩《包山楚简“𣎵”字及相关之字》，《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生了同样的变形音化现象。^①“馭”字本从“更”声，“更”所从之丙简省为“𠃉”，“𠃉”又进一步改造成“𠃉”（免），用来标音。古音“馭”在疑纽鱼部，“免”在明纽元部。西周金文还有疑、明相通的例子，如西周晚期的师颡簋有“闇”字，作“𠃉𠃉”。“闇”是个双声符字，“門”、“言”皆声。“闇”为疑母字，“門”为明母字。

21. 叔(叔)

西周金文“叔”字作“𠃉”（师斡簋）“𠃉”（克鼎）“𠃉”（叔卣）。《说文》：“叔，拾也。从又未声。汝南名收芋为叔。”郭沫若认为“拾芋”为“叔”的初义，字象从又持弋以掘芋，“𠃉、”象芋形。^②从甲骨文“督”的字形来看，“叔”所从之点可看作是土点。甲骨文“督”字作“𠃉”（合 30893）“𠃉”（合 30365）“𠃉”（合 30599），所从之点多寡不一。到了西周金文，固定为三点，作“𠃉、”“𠃉、”等形。“𠃉、”“𠃉、”即“小”，在字中作为声符。古音“叔”在书纽觉部，“小”在心纽幽部，从“小”字分化出来的“少”就是书母字。西周金文中心母与书母相通的例子还很多，如“始”为书母字，又从司声作“𠃉”（者媯尊），“司”为心母字。“犀”字作“𠃉”（五祀卫鼎），“尸”、“辛”皆声。“犀”为心母字，“尸”为书母字。召尊、虢季子白盘、易鼎等铭文中“賜”皆当读为“赐”。“賜”为书母字，“赐”则读心母。西周金文“尸”常假借“死”为之，如毛公鼎：“死(尸)毋动余一人在位。”大盂鼎：“王曰：‘孟，乃召夹死(尸)司戎……’”“死”为心母字。

22. 蔑(蔑)

甲骨文“蔑”字作“𠃉”“𠃉”，象以戈加诸人脛，张世超先生谓此即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②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金文丛考》，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

“跗”、“跗”之古文。^① 西周金文多承袭“蔑”之甲骨文字形，作“𠄎”（保卣）“𠄎”（免卣），又将原来横目形改为竖目形作“𠄎”（尹姑鼎），竖目形进一步改造就成了以下各形：“𠄎”（师兑鼎）“𠄎”（墙盘）“𠄎”（师兑簋）“𠄎”（王蔑鼎），变成从莫声之字。古音“莫”在匣纽元部，“蔑”在明纽月部。上古音晓匣二母相通之例常见，晓明二母亦常互通，故匣明当可通。

23. 𠄎（敖）

甲骨文有字作“𠄎”（合 4342）“𠄎”（合 5738）“𠄎”（合 5862），刘钊先生释为“敖”。^② 西周金文乖伯簋“敖”字作“𠄎”，与甲骨文相比，多了动符“𠄎”。九年卫鼎“敖”字作“𠄎”，所从之“𠄎”是由“𠄎”（展敖簋）形进一步改造而成的。“𠄎”即“虍”，在字中起标音作用。古音“敖”在影纽宵部，“虍”在匣纽鱼部，声韵俱近。

24. 𠄎（夔）

甲骨文“夔”字作“𠄎”（合 1095）“𠄎”（合 8243），西周金文或在人形下部加上了“止”形，作“𠄎”（子夔作母辛尊）；或加“𠄎”形于趾下，作“𠄎”（束夔簋）“𠄎”（夔姬鬲）“𠄎”（夔伯觶），刘钊先生认为“𠄎”是累加的声符；^③ 或作“𠄎”（夔伯父鬲），上部变形音化从来声。战国楚系文字“夔”也都变形音化从来声作“𠄎”（玺汇 0164），从夔声的“陵”字作“𠄎”（包山 12）“𠄎”（曾侯无恤壶）。古音“夔”在来纽蒸

① 张世超《金文形义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884条。

② 刘钊《释甲骨文精、羲、彘、敖、戠诸字》，《吉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③ 刘钊《金文考释零拾》，《古文字考释丛稿》，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第121页。

部，“来”在来纽之部，二字双声，韵为阴阳对转，音极近。

25. 刺(刺)

《说文》：“刺，戾也。从束从刀。刀者，刺之也。”西周金文“刺”字异体很多，作“𠄎”（克钟）“𠄎”（癩钟）“𠄎”（大簋）“𠄎”（召伯簋）“𠄎”（几父壶）“𠄎”（师鬲鼎）“𠄎”（柳鼎）“𠄎”（盗壶）“𠄎”（刺鼎）“𠄎”（师虎簋）“𠄎”（班簋）等形。张世超先生认为“刺”字当以师虎簋、班簋铭字意为古。^① 我们认为“刺”字的演化轨迹大致是：𠄎—𠄎—𠄎。其中作“𠄎”形者是由“𠄎”加饰点而成的。“𠄎”所从之“𠄎”即“束”字，在字中用作声符。古音“束”在见纽元部，“刺”在来纽月部。从束声的“阑”就读来母。郑张尚芳先生把“束”的上古音声母拟为 kr-，就是为了解释见、来二母的谐声关系。

三、春秋战国文字中的变形音化

(一) 楚系文字

26. 後(後)

西周金文“後”字作“𠄎”（小臣单觶）“𠄎”（匄簋）“𠄎”（令簋），春秋曾姬无恤壶“後”作“𠄎”，“𠄎”，所从之“𠄎”被改造成了“𠄎”。“𠄎”即“斗”，在字中用作声符。古音“斗”在端纽侯部，“後”在匣纽侯部。据研究，部分中古端母字来自上古的喉牙音，故“斗”可用作“後”之声符。

27. 右(右)

甲骨文“右”字作“𠄎”，本义指右手，在卜辞中多假借为“有”、

① 张世超《金文形义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1091条。

“侑”、“佑”。西周以后加“口”分化出，用作本义的“右”，作“𠄎”“𠄎”“𠄎”。

番生簋“右”字作“𠄎”，我们认为“𠄎”所从之“○”是由“𠄎”改造而成的，即“𠄎”变形音化从“○”（圆）声。古音“圆”在匣纽文部，“右”在匣纽之部，二字双声，韵可通转。

28. 𠄎(孝)

金文“孝”字异体众多，如“𠄎”（裘方鼎）“𠄎”（召鼎）“𠄎”（吊罍父簋）“𠄎”（卓林父簋）“𠄎”（郟遣簋）。春秋时期的番君匜“孝”字作“𠄎”，从交声，古玺“效”字作“𠄎”（玺汇 5293）可证。“𠄎”显然是由“𠄎”“𠄎”改造而成的。古音“孝”在晓纽幽部，“交”在见纽宵部，声韵俱近。

29. 𠄎(侯)

甲骨文“侯”字作“𠄎”“𠄎”“𠄎”等形，象矢集于射侯之形。西周金文多承袭甲骨文之形作“𠄎”（作且乙簋），或在矢形加饰笔作“𠄎”（遇甗）“𠄎”（罍侯簋）。战国早期的曾侯乙钟“侯”字作“𠄎”“𠄎”“𠄎”，其中“𠄎”所从之“𠄎”与“夫”非常相似。我们认为这是变形音化现象，即把“𠄎”形之象箭头的两斜笔拉直就成了“夫”，“夫”用作声符。古音“侯”在匣纽侯部，“夫”在帮纽鱼部。就韵而言，鱼侯二韵在战国楚方言中非常接近，董同龢先生在《与高本汉商榷“自由押韵”说兼论上古楚方言特色》一文中曾指出鱼侯合韵是上古楚方言的特色。^① 赵彤先生虽然主张战国楚方言中鱼、侯分立，但又指出鱼部开始接近侯

^① 董同龢《与高本汉商榷“自由押韵”说兼论上古楚方言特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4分册，台北：编者，1939年。

部。^①就声纽而言,楚系文字资料中不乏匣母与帮母可通的例子,如信阳长台关《遣策》“簠”字作“𦉳”(简6)、包山楚简作“𦉳”(简124),从夫声。望山二号墓《遣策》作“𦉳”(简54),从古声;再如,春秋早期的伯其父匱假借“𦉳”为“匱”,旅虎匱“匱”字作“𦉳”,鲁士匱作“匱”。𦉳、害在匣纽鱼部,“匱”在帮纽鱼部。帮母与匣母可通的现象至今还存在于当代的闽南方言,二母相通是由于-u-介音或-o-元音的作用。^②总之,“𦉳”可变形音化从夫声应该没有问题。

30. 𦉳(夏)

西周晚期金文“夏”字作“𦉳”(伯夏父鼎)“𦉳”(伯夏父鬲)“𦉳”(仲夏父鬲),春秋金文作“𦉳”(秦公簠)“𦉳”(邳伯鬯)“𦉳”(邳伯鬯)。战国时期的鄂君启舟节“夏”字作“𦉳”,车节作“𦉳”,天星观卜筮简作“𦉳”,秦家嘴竹简作“𦉳”。张世超先生疑“夏”字作“𦉳”形乃从日夔声,从日与冬(𠂔)从日同。^③按:张先生以为“夏”从日有一定道理。我们认为鄂君启节“夏”字作“𦉳”形就是由“𦉳”演变而来的,即“𦉳”所从之“𠂔”与表示腿部的“𠂔”组合成“𦉳”。“𦉳”即“𦉳”,在字中用作声符。古音“夏”在匣纽鱼部,“𦉳”在影纽元部,声韵俱近。

31. 𦉳(鑄)

春秋战国时期楚系文字“鑄”的形体有两类,一类是会意字,作“𦉳”(楚羸匱)“𦉳”(曾子遼彝匱)“𦉳”(楚子匱)“𦉳”(鄂君启舟

① 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② 关于匣、帮二母可通的论证详见本书第七章《双声符字研究》部分“𦉳”字条。

③ 张世超《金文形义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992条。

节),另一类从叀声,作“𨮒”(鑄客鼎)“𨮓”(禽爵鼎)“𨮔”(鑄客匱)“𨮕”(禽志鼎),所从之“叀”是由会意字那类形体中的两手和火形组合而成,属变形音化现象。古音“叀”在以纽侯部,“鑄”在定纽幽部。幽、侯二韵在当时的楚音中可能不分,如鑄客鼎“句”字作“𠄎”,所从之“口”、“𠄎”皆声。“句”、“口”属侯韵,“𠄎”属幽韵;越王句踐劍中“句”字作“𠄎”,从𠄎声,“𠄎”为幽部字,“句”为侯部字;黄君簋“𠄎”作“𠄎”,从𠄎声,“𠄎”在侯部,“𠄎”在幽部。

32. 鐘(鐘)

西周金文“鐘”字作“𨮒”(师旋簋)“𨮓”(克鼎),从金童声。西周中晚期的楚公鐘作“𨮔”“𨮕”“𨮖”“𨮗”,益公鐘作“𨮘”(益公鐘),重字所从的“人”字上部写得很弯曲,与“斗”字作“𠂔”(蚌珠鼎)非常接近。“鐘”字写作“𨮘”很可能是为了标音,古音“斗”在端纽侯部,“重”在定纽东部,“鐘”在章纽东部,音极近。

33. 樂(樂)

甲骨文“樂”字作“𨮙”,从丝在木上形,金文作“𨮚”,又加“白”字作“𨮛”,^①战国楚系文字“樂”或承袭金文之形作“𨮜”(郭店·语丛二 29),或作“𨮝”(天卜)“𨮞”(郭店·老子甲 4)。“𨮞”所从之“𨮟”与“𨮠”(中山王𨮡壶)“𨮡”(鄆泉鼎)显系一字。刘钊先生释“𨮠”“𨮡”

^① 刘钊先生认为“白”字是追加的声符。参看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0页;陈双新先生认为“樂”的本义是櫟树,櫟叶可饲蚕,因而其字从丝。由于常于櫟林祭祀歌舞,而引申有快樂之意。音樂、诗歌、舞蹈逐渐分化后,“樂”又专指音樂。“樂”所加“白”像櫟实之形。参看陈双新《释樂》,《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为“斲”。^① 楚文字中从“罍”的“澤”字作“𣶒”(郭店·语丛四7)，“懌”字作“𣶒”(包山59)，可证“𣶒”所从之“𣶒”确为“罍”，“𣶒”是由“白”和“木”改造而成的，在字中用作声符。古音“樂”在来纽药部，“斲”在以纽铎部，音极近。

34. 𣶒(執)











甲骨文“執”字作“𣶒”“𣶒”，从𣶒从𣶒，会拘捕罪人之意。西周金文作“𣶒”(师同鼎)“𣶒”(散盘)，或加“升”作“𣶒”(师寰簋)，或在“𣶒”字表人腿的部分加“尸”形为繁饰，作“𣶒”(多友鼎)“𣶒”(不斲簋)。楚简“執”字作“𣶒”(天卜)“𣶒”(包山154)“𣶒”(包山81)“𣶒”(郭店·老子甲10)“𣶒”(郭店·老子丙11)，所从之“𣶒”表两手伸出的部分变得近似“舟”。郭店楚简“舟”字作“𣶒”(成之闻之35)。包山楚简从舟的“受”字作“𣶒”(简147)“𣶒”(简277)，“舟”字作“𣶒”(简122)。我们认为楚简“執”字作“𣶒”乃变形音化从舟声。古音“執”在章纽缉部，“舟”在章纽幽部，二字双声，韵亦可通。缉部为侵部的人声韵，而“幽侵对转说”已得到公认。^② 赵彤先生也指出了楚简文字谐声材料中侵部与幽、觉两部的对转现象，如上博简《孔子诗论》简16《诗经》篇名“葛覃”的“覃”字写作两声字“𣶒”；上博简《民之父母》第8简“夙”字作“𣶒”，《容成氏》第28简“宿”字作“𣶒”，“𣶒”、“𣶒”皆从“丙”声，“丙”为“簞”之初文；江陵天星观一号墓楚简“憂”字有作“𣶒”的。^③

35. 𣶒(赤)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2页。

② 详见本书第七章《双声符字研究》部分“𣶒”字条。

③ 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甲骨文“赤”字作，从大火。西周金文承袭甲骨文之形作。春秋战国时期楚系文字中“赤”多变形音化从亦声，作。古音“赤”在昌纽铎部，“亦”在以纽铎部。郑张尚芳先生把“赤”的上古音拟为 khlj-，其中 l 就表示以母。^①

36. (灋)































西周金文“灋”字作。裘锡圭先生认为此“去”字为“盍”之初文，与“来去”之“去”有别。^② 战国楚系文字“灋”字或从去作（郭店·缁衣 27），或从大作（郭店·六德 2），或从夫作（郭店·老子甲 23）（郭店·老子甲 31）（包山 18）（包山 145）。张静先生已指出郭店楚简中“灋”字作乃变形音化从夫声。^③ 楚简“”所从之“夫”是由从大之形进一步演化而来的，属变形音化现象。“夫”在字中用作声符。古音“灋”在帮纽叶部，“夫”在帮纽鱼部。鱼、叶二韵的主要元音相同，当可通。从包山楚简“灋”字亦变形音化从夫声来看，这种变化很可能是因为当时楚音中“灋”与“夫”同音，所以为了更好地记录当时当地语音，就对字形进行有意识的改造。

37. (先)










①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5页。

②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说字小记》，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646～647页。

③ 张静《郭店楚简文字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甲骨文“聞”字作，象人跪坐，以手掩面，倾耳以听之形。金文作（孟鼎）（利簋）（郟王子钟）（王孙臯钟）。张世超先生认为所从之“𠂔”，乃甲文中状声音之点画遗留。^①我们认为金文“聞”字人形上部所从之为头饰，“𠂔”是之变。郭店楚简《缙衣》、《性自命出》、《语丛四》、《老子丙》、《成之闻之》等篇目中“聞”皆从昏声作，而《五行》简中“聞”则一律从采从耳，作（简 49）（简 23）（简 49）（简 15）（简 23）（简 26）。《汗简》所收“聞”字作，可与郭店楚简《五行》“聞”字的写法互证。黄锡全先生认为三体石经《君奭》“聞”字作，乃等形省去左边偏旁而讹。^②黄先生所言极是，不过他似乎认为所从之“𠂔”是“米”字。楚简从采的“番”字作（天卜）（包山 41）（包山 52），可证郭店楚简《五行》“聞”之作等形乃从采而非从米。“采”在字中用作声符，古音“采”在并纽元部，“聞”在明纽文部，声韵俱近。

38. 𠂔（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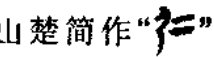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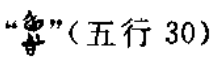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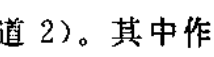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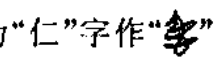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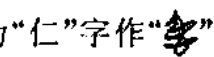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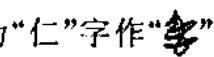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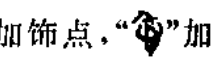





在战国文字里，齐系文字“陳”皆从東声作（陳公子甌）（齐陳曼罔）（陳猷釜）。楚系文字“陳”则作（禽志盘）（包山 172）（玺汇 1459）（玺汇 0281）（天卜），从重声。我们认为楚系文字“陳”所从之“重”是由变形音化

① 张世超《金文形义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2123条。













② 黄锡全《汗简注释》，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10页。

而来的，即。

39. 𡗗(仁)















“仁”字始见于战国文字，中山王𡗗鼎作，包山楚简作（简 180），郭店楚简“仁”字皆从心作（老子丙 3）（五行 30）（唐虞之道 15）（忠信之道 8）（唐虞之道 2）。其中作所从之即“身”，在字中用作声符。我们认为“仁”字作与作，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即都是繁化，加饰点，加一短横，加。因此我们把“仁”写作视为变形音化现象而不是声符替换。

40. 𡗗(蓼)















金文“蓼”字作（蓼生盨）（无吏鼎）（此簋）。张世超先生认为“蓼”象将二扭绞为一之形。“”为天然之“帚”，“蓼”为人工之“帚”。^①“蓼”在金文中多用为姓氏和人名，或假借为“蓼”。包山楚简“蓼”字作（简 169），或作（包山 168），在简文中用作姓氏。郭店楚简《穷达以时》：“子胥前多功，后蓼（戮）死，非其智（9）衰也。”“蓼”字作，与用作姓氏之“蓼”有别，当为“戮”之专字，中山王𡗗鼎“戮”字作，与之形近。“”之下部与“泉”字形近，楚简“泉”字作（郭店·鲁穆公问子思 7），可资比照。我们认为“蓼”字作是为了表杀戮义而做有意识的改造，下部变形音化从泉省声。

41. 𡗗(厚)

① 张世超《金文形义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883条。

甲骨文“厚”字作，唐兰先生谓字当从厂，𠂔声。“厂”，“𠂔”之省。“𠂔”者，石也。^①金文“厚”字或承袭甲骨文之形，作（墙盘）（趯鼎），或略有变化，作（井人安钟）（厚氏匚），或从欠𠂔声，作（休盘）（五年师旅簋）。战国楚简“厚”字形体变化较大，作（郭店·老子甲4）（郭店·老子甲5）（郭店·老子甲36）（郭店·成之闻之39）（上博·缙衣2）（上博·孔子诗论15）。其中可分析为从石句声，“厚”字变从句声当属变形音化现象。古音“厚”在匣纽侯部，“句”在见纽侯部，音极近。
























42. （旃）

西周金文“旃”字，作（兮仲钟）（猷簋），从止从舟，或借笔作（追簋）（善鼎）。战国楚文字作（包山122）（郭店·老子甲篇4）（郭店·穷达以时9）（上博·孔子诗论6）（郭店·尊德义2）（禽前鼎）等形。其中作“旃”形者所从之“止”变得与“𠂔”字形近。楚文字从𠂔之字可资比照，如“族”字作（包山10），“旌”字作（曾65），“旃”字作（郭店·语丛三2），“旗”字作（曾6），“旃”字作（曾82），“游”字作（包山187），“旃”字作（曾163）。据此，我们认为“旃”之作形者乃变形音化从𠂔声。古音“旃”在从纽元部，“𠂔”在影纽元部。楚音中影母与心母关系密切，如蔡侯申盘“威”字从“妥”（绥）声，作；王孙钟“肅”从淵声作；上博《容成氏》：






① 唐兰《殷虚文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9页。




“禹乃通沔(伊)、洛。(26)”又“汤乃谋戒求贤,乃立泗(伊)尹以为佐。(37)”“威”、“渊”、“伊”为古影母字,“绥”、“肅”、“沔”、“泗”则为心母字。心母与从母同为齿音,故“莠”有以“忝”为声符的可能。


43. 成(成)


甲骨文“成”字作。“”,所从之“”即“丁”字,“”所从之“”,当是“丁”的线条化,“丁”乃“成”之声符。西周金文沿袭甲骨文“”之形,作“”(格伯簋)“”(成王鼎)。战国楚简“成”字或承袭甲、金之形作“”(郭店·缁衣 35),或在竖笔上加饰点作“”(包山 51),或把饰点拉直作“”(帛书乙 10·88)“”(郭店·忠信之道 7),或在竖笔下加一横饰笔,作“”(郭店·老子甲 16)。“”“”进一步演变作“”(孔子诗论 5)“”(郭店·老子乙 13)“”(郭店·缁衣 13)“”(上博·孔子诗论 6)。“”所从之“”即“壬”字,楚文字“成”字作“”形乃变形音化从“壬”声。“成”字本从丁声,古音“丁”在端纽耕部,“壬”在透纽耕部,音极近。

44. 复(复)

甲骨文“复”字作 (合 43)。西周春秋金文作 (鬲比盨)“”(中甗)“”(黄子盘)。郭店楚简《老子》甲“复”字作 (郭店·老子甲 1),变从酉。

甲骨文“腹”字作 (合 5373),从身复声。楚简“腹”字作 (包山 239)“”(包山 247),所从之“复”也变从酉。

曾侯乙墓竹简“腹”字作 (简 69),所从之“复”也变从酉。

我们认为楚简“复”字从酉作乃变形音化,古音“复”在并纽觉部,“酉”在以纽幽部,音极近。

(二) 齐系文字

45. 喜(喜)

甲骨文“喜”字作“𠄎”“𠄎”“𠄎”“𠄎”，金文作“𠄎”（伯喜簋）“𠄎”（吊妣簋）“𠄎”（陈喜壶）“𠄎”（郟王喜剑）。春秋时期的侯马盟书“喜”字作“𠄎”（200·50）“𠄎”（1·100），战国齐陶文“喜”作“𠄎”（陶汇3·877），上部变从“止”。这类字形显然是由“𠄎”“𠄎”变来的，“止”被改造成“止”，用作“喜”的声符。古音“喜”在晓纽之部，“之”在章纽之部。据研究，中古章组有喉牙音来源。

46. 老(老)

金文“老”字作“𠄎”（爰季良父壶）“𠄎”（中山王𠄎鼎），又作“𠄎”（鞬搏）“𠄎”（夆吊匜），上部象毛发形的部分变从“山”。“山”即“由”，或簋“冑”字作“𠄎”可证。“𠄎”从“山”声。古音“老”在来纽幽部，“由”在以纽幽部，韵同声近。

47. 釜(釜)

“釜”字仅见于齐国文字，作“𠄎”（陈猷釜）“𠄎”（子禾子釜）“𠄎”（陶汇3·1）“𠄎”（陶汇3·5）“𠄎”（陶汇3·23）“𠄎”（陶汇3·722）“𠄎”（玺汇0289）“𠄎”（玺汇0289）。陈猷釜“𠄎”当为字之本形，从缶、缶父皆声。“釜”所从之“父”常讹成“又”，变成从又缶声之字。从又从缶之“釜”又进一步演变成从又由声之字，作“𠄎”“𠄎”“𠄎”。古音“由”、“缶”皆为幽部字，齐语中有大量来母和唇音相通的例子，汪启明先生认为这说明在先秦两汉齐语中还保留来母复辅音声母。至于来母复辅音中l的位置，他认为可能有两种，即l可前可后。^①

① 汪启明《先秦两汉齐语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

48. 及(及)

甲骨文“及”字作“𠄎”“𠄎”，从又从人，会追及之意。郭店楚简《缙衣》“及”字作“𠄎”（简5），《成之闻之》作“𠄎”（简27），《尊德义》作“𠄎”（简18），表示人的部分变化较大。《唐虞之道》“及”字作“𠄎”（简15）“𠄎”（简24）“𠄎”（语丛二19），冯胜君先生指出这是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写法，作“𠄎”者与“𠄎”（僖公）“𠄎”（汗简）“𠄎”（古文四声韵）正合，作“𠄎”者与《说文》古文作“𠄎”相合。^①我们认为“及”字写作“𠄎”属变形音化现象，即把“及”改造成从“聿”声。古音“及”在群纽缉部，“聿”在以纽物部。以声言之，在上古音里，以母与见系声母关系非常密切；就韵而言，缉部与物部同属入声，且主要元音相同，例可通转。

49. 仁(仁)

战国楚文字“仁”字除了《性情论》作“𠄎”外，多写作从心身声。郭店楚简《忠信之道》作“𠄎”（简8），《唐虞之道》作“𠄎”（简2），与《说文》古文作“𠄎”相合。冯胜君先生指出这是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写法。^②“仁”字作“𠄎”“𠄎”形，是在人形上加饰点，或把饰点拉成一横笔，古文字中这种现象很多。^③“仁”字加了饰点或一横笔后就变形音化从千声。“人”与“千”一字分化，故“仁”可变从千声。

① 冯胜君《论郭店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以及上博简〈缙衣〉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4年，第18页。

② 冯胜君《论郭店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以及上博简〈缙衣〉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4年，第17页。

③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45页。

(三) 晋系文字

50. 𠄎(我)

甲骨文“我”字作“𠄎”“𠄎”“𠄎”“𠄎”，林沄先生认为字象齿刃的戍。^① 金文“我”字仍沿袭甲骨文指形作“𠄎”（我鼎）“𠄎”（毓且丁卣）“𠄎”（善鼎）“𠄎”（吊向簋）“𠄎”（郟钟）“𠄎”（王孙钟）“𠄎”（流儿钟），字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齿刃处。春秋时期晋国的栾书缶“我”字作“𠄎”，表齿刃的部分已变形音化从“𠄎”声作“𠄎”。古音“我”在疑纽歌部，“𠄎”在见纽月部，声韵俱近。

51. 𠄎(鼉)

甲骨文“鼉”（合 7405），即扬子鳄之象形。春秋晋国的金文作郟钟“鼉”字作“𠄎”，金文“單”作“𠄎”（小臣單觶）“𠄎”（單伯鬲）“𠄎”（王盃）等形，与“𠄎”所从同，即“𠄎”变从單声。古音“鼉”在定纽歌部，“單”在端纽元部，声仅有清浊之分，韵也只是阴阳之别，声韵俱近。唐兰先生已指出金文“鼉”字作“𠄎”，属声化现象。^② 我们在此强调的是这一现象发生的时代和地域。




52. 𠄎(獻)

甲骨文“獻”字作“𠄎”（合 31812）“𠄎”（合 26954），金文作“𠄎”（獻侯鼎）“𠄎”（虢季子白盘）“𠄎”（陈侯午罍）“𠄎”（召伯簋）。侯马盟书“内室类”“獻”字作“𠄎”（67·45）“𠄎”（67·21），“獻”所从之“鬲”变形音化从“羊”声。古音“獻”在见纽元部，“羊”在以纽阳部。古见系声母与以母关系非常密切，元韵与阳韵亦可通。












① 林沄《说戍、我》，《古文字研究》第 17 辑，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202~205 页。

②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90 页。











53. 𩚑(脗)

晋系文字有字作“𩚑”(上乐采鼎)“𩚑”(上官鼎)“𩚑”(大梁鼎)“𩚑”(梁鼎)等形,在铭文中皆训为“容”。从文字构形来看,“脗”显系从肉庚声之字。梁鼎“𩚑”所从“庚”字上部变形音化从凶声,其演变轨迹为——。古音“庚”在见纽阳部,“凶”在晓纽东部。同属晋系的中山王𩚑方壶铭曰:“节于醴醢,可法可尚。以飨上帝,以祀先王。穆穆济济,严敬不敢怠荒。因载所美,昭蔡皇工。诋燕之讹,以愍嗣王。”文中“尚”、“王”、“荒”、“工”押韵,“尚”、“王”、“荒”属阳韵,“工”在东韵,可见在晋系语音中东阳二韵可通。













54. 𩚑(萑)

甲骨文“隻”字作,以手执鸟会捕获之意,乃“獲”之初文。西周金文仍沿袭甲骨文之形作 (师隻作尊彝簋) (或簋),春秋战国金文一部分“獲”字写作 (郑井叔萑父鬲) (哀成吊鼎) (中山王𩚑鼎)。其中,中山王𩚑鼎 所从之 即“萑”字,在字中用作声符。古音“萑”在匣纽元部,“萑”在影纽铎部,“獲”在匣纽铎部,声韵俱近。

































55. 𩚑(矣)

“矣”字始见于战国文字,作 (睡虎地·封诊式 84) (郭店·老子甲 6) (中山王𩚑鼎)。秦、楚文字“矣”从以声,《说文》小篆作,乃承袭秦楚文字的写法。中山王𩚑鼎“矣”不从以声而从 声,应该是为了适应当地语音所做的改造。侯马盟书“内室类”“以”作 (194:4) (156:2) (1:65) (1:29),可证“以”、“𩚑”可互作。古音“矣”在匣纽之部,“𩚑”在见纽幽部,“以”在以纽之部。以母与喉牙关系非常密切,之幽二韵亦近。

56. 𦍋(若)








甲骨文“若”字作，象人跪以双手顺发之形。西周金文作（逆钟）（毛公鼎），表头发的部分已变直，近似“中”。战国晋系文字“若”字作（中山王𦍋鼎）（中山王𦍋方壶）（中山王𦍋兆域图）（玺汇 1294），表头发的部分分割出去，成为独立的“中”，两手和人的腿部被写成，即“若”被改造成从兒声。古音“若”在日纽铎部，“兒”在日纽支部，二字双声，韵亦近。

57. 𦍋(彝)


甲骨文“彝”字作（合 14295）（合 36390）（合 36747）。西周金文作（师遽方彝）（芮伯壶）（史颂簋）（农亩），增或形于反缚之鸡翅处，又增表宰杀鸡时滴沥的鸡血。春秋战国时期“彝”字异体很多，如（曾姬无恤壶）（禽章作曾侯乙罍）（中山王𦍋壶）（姬鼎）（曾子旂鼎）（秦公簋）等。其中，中山王𦍋壶作，右边从収从，“”是由和表鸡血的点改造而成的，在字中用作声符。“”即“率”字，中山王𦍋鼎“遂”字作可证。古音“率”在心纽物部，“彝”在以纽脂部。以声言之，心母与来母可通，如郢钟“肆”假借“隶”为之，作。“肆”在心纽，“隶”在来纽；中山王𦍋壶“數”假借“護”为之，作。“數”为心母字，“護”为来母字。就韵而言，脂物二韵属旁对转。中山王𦍋兆域图“进”字又可从聿声作，中山王𦍋壶“盡”从聿声作，“进”、“盡”在真部，“聿”在物















部,真韵为脂韵的阳声韵。

58.  (莫)







甲骨文“莫”字作，会日落于草木之形，为会意字。金文沿袭甲骨文之形，作（散盘）（中山王卣壶）（夆莫父卣）。晋玺有人名“周莫臣”，“莫”字作（玺汇 3025），从目，不从日。我们认为晋玺“莫”改从目属变形音化，即有意识地把“莫”所从之“日”改造成“目”，在字中用作声符。古音“莫”在明纽铎部，“目”在明纽觉部，二字双声，韵亦近。

(四) 燕系文字

59.  (國)

西周金文“國”字作（毛公鼎）（景卣）。战国齐陶文“國”字作（陶汇 3·1006）（陶汇 3·1003），在“”内加了饰点，变得与“日”同形。燕陶文“國”字作（陶汇 4·1）（陶汇 4·7）（陶汇 4·30），又在“”下方横笔下加两饰笔，“國”变从（期）声，亦可看作从声。据研究，一直到战国，“國”都用为“域”，^①即“國”之读音还在匣纽职部，“期”、“丌”在群纽之部，声韵俱近。

60.  (異)

战国时代各系文字“異”字形体差别较大，其中秦系文字承袭甲骨文、金文的写法，作（石鼓文·盩车）；三晋文字作（玺彙 3140）（玺彙 3254）（玺彙 1584）；楚系文字作（郭店·性

^① 大西克也《论古文字资料中的“邦”和“国”》，《古文字研究》第 23 辑，中华书局、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 年。

自命出9)“𦉳”(包山 117);齐系作“𦉳”(郭店·语丛三 3)①“𦉳”(三体石经);燕系文字作“𦉳”(玺汇 3688)。我们认为燕玺“異”字作“𦉳”,乃变形音化从虞声。燕玺有字作“𦉳”(玺汇 186)“𦉳”(玺汇 188),与“𦉳”下部完全一致,朱德熙先生释为“虞”,读为“遽”。②古音“異”在以纽职部,“虞”在群纽鱼部。以声言之,以母与见系声母关系非常密切;就韵而言,之鱼二部例可旁转。

61. 𦉳(都)

西周晚期金文“都”字作“𦉳”(猷钟),春秋金文作“𦉳”(鞬罍)“𦉳”(仲都戈)。战国时期燕系文字“都”字作“𦉳”(玺汇 188)“𦉳”(玺汇 186)“𦉳”(玺汇 292),“旅”字作“𦉳”(玺汇 3248)“𦉳”(酈王职剑),可知“都”在燕系文字中变形音化从旅声。“𦉳”是由“𦉳”这类形体演变而来的,即“𦉳”上部所从之“𦉳”,由“𦉳”改造而成,侯马盟书“都”字作“𦉳”(委质类 156:19),可视为过渡形体。“𦉳”下部之“𦉳”则是“𦉳”的草写。郭店楚简《五行》“者”字作“𦉳”(简 41)“𦉳”(简 40),可证燕系文字“都”所从仍是“者”而非“旅”,即“都”字作“𦉳”属变形音化而不是声符的替换。

(五)秦系文字

62. 隸(隸)

战国文字“隸”作“隸”(睡虎地·秦律杂抄 38)“隸”(睡虎地·

① 冯胜君先生认为“異”字作“𦉳”是具有齐系特点的写法。参见冯胜君《论郭店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以及上博简〈缁衣〉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2004年,第24~25页。

② 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秦律十八种 96)“秝”(廿年相邦冉戈)“𦉰”(廿七年上守赳戈)“𦉱”(卅八年上郡守庆戈)“𦉲”(四十年上郡守起戈)“𦉳”(十五年上郡守寿戈)“𦉴”(十五年上郡守寿戈),右下作“未”“未”“𦉵”“未”“𦉶”,“未”上部左右两斜笔与中间一竖笔分离,就很容易讹成“米”,作“𦉷”(睡虎地·封诊式 51)“𦉸”(高奴禾石权)。我们认为“𦉷”变作“隸”,乃变形音化,“米”起标音作用。古音“隸”在来纽质部,“米”在明纽脂部。脂、质阴入对转,来母与明母关系非常密切,已为学界所公认。

63. 𦉹(展)

刘钊先生曾对“展”的构形演变做过精彩的分析考证,他指出“展”的演变轨迹是:𦉹(史密簋)——𦉺(师寰簋)——𦉻(斝史寰壶盖)——𦉼(曾 128)。① 睡虎地秦简“展”字作“𦉽”(日书甲种 119),应该也是由“𦉻”进一步讹变而来的。《秦律杂抄》“殿”字作“𦉾”(简 20),发生了同样的变化。“𦉽”、“𦉾”所从之“𦉿”“𦊀”即“典”,《秦律杂抄》“典”字作“𦊁”(简 33)可证。“典”在字中用作声符。古音“展”(殿)在定纽文部,“典”在端纽文部,音极近。②

64. 𦊂(建)
























金文“建”字作“𦊃”(蔡侯钟)“𦊄”(中山侯恣钺),但睡虎地

① 刘钊《谈史密簋铭文中的“𦉹”字》,《考古》1995年第5期。














② 之前写博士论文时没有注意到陈剑先生在《释展》一文中已指出秦简“展”、“殿”写作从典声是将所从的“𦉿”“𦊀”改成形体有关系的“典”以充当声符。不过他没有举出字形,也没有指出这是变形音化,所以本书仍保留此例。参看陈剑《释展》,《追寻中华古代文明的踪迹——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2~53页。

秦简皆从辵或辵，日书甲种作“𨔵”（简8），日书乙种作“𨔵”（简29）“𨔵”（简16）“𨔵”（简26）。我们认为“建”字作“𨔵”乃变形音化，即将“聿”下面两横断开，写成斜笔，就成了“𨔵”。“𨔵”即“隶”，古音“隶”在定纽月部，“建”在见纽元部。中古端组字有一部分来源于见组，故“建”可从“隶”声。


65. 僕(僕)

甲骨文“僕”字作，象人手捧粪弃之物，为头饰，为尾饰。西周金文还有这种象形的写法，见于京仲盘，作，但多数已讹变，其异体颇多，如（史僕壶盖）（伯克壶）（旗鼎）（螭鼎）（师旗鼎）（趯簋）（静簋）（师猷簋）。春秋时期的叔夷钟“僕”字作，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僕”字作，这种形体显然是由这类形体改造而成的，即右上方之离析为和，“”与右下方之构成了。“”即“弄”字，在字中用作声符。古音“僕”在并纽屋部，“弄”在来纽东部。东屋对转，并母和来母的关系或可用复辅音bl-来解释。

66. 單(單)

甲骨文“單”字作“”“”，金文作“”“”“”“”。睡虎地秦简“單”字作（日书乙种62）（编年记50）。我们认为“單”字作乃变形音化，即在金文形体“”上加一横饰笔变从“車”声。古音“單”在端纽元部，“車”在昌纽鱼部，声韵俱近。

67. 逆(逆)

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51号简“逆”字作，字变为从“羊”。实际上是一个变形音化的例子，即变从“羊”声。古音“逆”在疑纽铎部，“羊”在以纽阳部，声韵俱近。

68. 考(考)

甲骨文“考”字作“𠄎”，金文“考”字异体众多，如“𠄎”（沈子它簋）“𠄎”（师酉簋）“𠄎”（大簋）“𠄎”（天亡簋）“𠄎”（邾公华钟）“𠄎”（王孙钟），睡虎地秦简“考”字作“𠄎”（日书乙种 238）。邾公华钟、睡虎地秦简中的“考”变形音化从于声。古音“于”在匣纽鱼部，“考”在溪纽幽部，声韵俱近。

69. 遣(遣)

甲骨文“遣”字作“𠄎”（合 3034）“𠄎”（合 4387）“𠄎”（合 5315）“𠄎”（合 5447 乙），金文作“𠄎”（大保簋）“𠄎”（我鼎）“𠄎”（遣小子簋）“𠄎”（赵吊盨）等形。睡虎地秦简“遣”字作“𠄎”（封诊式 14），所从之“𠄎”大概是由“𠄎”所从之“𠄎”改造而成，其演变轨迹为：𠄎—𠄎—𠄎。我们认为“遣”作“𠄎”乃变形音化，“𠄎”是其声符。古音“遣”在溪纽元部，“𠄎”在定纽真部。

70. 𦉳(𦉳)

甲骨文“𦉳”字皆从屯声作“𦉳”“𦉳”“𦉳”“𦉳”“𦉳”等形。西周金文未见“𦉳”字。春秋时期晋国的栾书缶“𦉳”字作“𦉳”（栾书缶），楚系的蔡侯绅残钟作“𦉳”“𦉳”，仍从屯声。战国文字“𦉳”字多沿袭春秋时期的写法，作“𦉳”（寿𦉳鼎）“𦉳”（越王者旨于赐钟）“𦉳”（四年𦉳平侯剑），但秦简“𦉳”字所从之“屯”却变形音化从出声，作“𦉳”（日书乙 202）“𦉳”（日书甲 87）“𦉳”（日书乙 252），秦简“出”字作“𦉳”（日书乙 42）可证。古音“𦉳”在昌纽文部，“出”在昌纽物部，音极近。

71. 𦉳(肆)

甲骨文“肆”字作“𠄎”“𠄏”“𠄐”，西周金文“肆”字作“𠄑”（毛公鼎）“𠄒”（毛公旅鼎）“𠄓”（何尊）。战国秦印作“𠄔”（玺汇 5572），秦陶作“𠄕”（秦陶 1232），马王堆帛书作“𠄖”（纵横家书 265），所从之“𠄗”“𠄘”“𠄙”显然是由金文“𠄑”字所从之“𠄒”演变而来。西周金文“肆”多假借为“肆”，如禹鼎、大盂鼎、天亡簋、虎簋、臣谏簋等铭文中“肆”皆当读为“肆”。春秋时期晋国的郟钟“肆”字作“𠄚”，齐国的洹子孟姜壶作“𠄛”，这说明“肆”和“隶”本同音，故秦汉文字“肆”可变形音化从“隶”声。

(六) 其他

72. 忍 (忍)

古陶文有字作“𠄜”“𠄝”“𠄞”（看录 10·2），旧释为“忍”。《说文》：“忍，怒也。从心从刀声，读若颡。”段玉裁注：“各本作‘刀声’，今删。正从心、刀，谓心中含怒如怀刀也。”又《说文》：“忍，能也，从刀刃声。”《说文》以“能”训“忍”乃声训。“忍”的本义指忍耐、克制，与“忍”在词义上有引申关系。我们认为在字形上，“忍”也是由“忍”改造而成的，即在“忍”所从之“刀”加一指事符号，使变从刃声。战国文字始见“忍”字，作“𠄟”（中山王𠄟壶）“𠄠”（睡虎地·为吏之道 36）“𠄡”（郭店·语丛二 51）。古音“忍”在疑纽物部，“忍”在日纽文部，声韵俱近。

73. 𠄣 (耑一端)

甲骨文“耑”字作“𠄣”（合 6844）“𠄤”（合 6843）“𠄥”（合 8267）“𠄦”（8266）“𠄧”（合 20070）等形，即“端”之初文。字上象初茁之形，下象根。春秋金文作“𠄨”（义楚端）“𠄩”（邠王端），战国文字作“𠄪”（郭店·老子甲篇 16）“𠄫”（郭店·语丛一 98）“𠄬”（陶汇 3·

1224)“𦉳”(十五年守相廉波剑)“𦉳”(十七年春平侯铍)“𦉳”(十三年铍)。纵观“端”字的形体变化,可知自春秋时期以后,甲骨文“端”字下象根形的部分亦讹变得与“而”非常接近,春秋战国文字“而”字作“𦉳”(蔡侯钟)“𦉳”(子禾子釜)“𦉳”(展敖簋)“𦉳”(中山王𦉳鼎),可资比照。我们认为“端”字下部变从“而”,是变形音化现象。古音“而”在日纽之部,“端”在端纽元部,从“而”声的字,如“奘”、“需”、“端”、“奘”均为元部字,可证“端”与“而”于音可通。

74. 喬(喬)

《说文》:“喬,高而曲也。”“喬”本作“𦉳”(郟钟),又加饰笔作“𦉳”(郟钟)。古文字中“中”与“又”常讹混,如“寺”本从又,邾公𦉳钟作“𦉳”,从“中”;“𦉳”作“𦉳”(师𦉳鼎)“𦉳”(𦉳吊钟),“又”也讹混为“中”。侯马盟书既有从“中”的写法作“𦉳”(委质类 156·21),也有从“又”的写法作“𦉳”(委质类 156·20)。“又”字上添加一短横饰笔作“𦉳”(禽志鼎),变为从“尤”。中山王𦉳鼎上的“喬”字作“𦉳”,“又”字变作“九”。“喬”字作“𦉳”“𦉳”“𦉳”等形中“又”、“尤”、“九”都是由“中”讹变而来的,并作为添加的声符,与“高”字构成双声符字。古音“喬”在群纽宵部,“高”在见纽宵部,“又”和“尤”在匣纽之部,“九”在见纽幽部,之宵、宵幽均为旁转,声皆为牙音。

75. 是(是)

金文“是”字作“𦉳”(𦉳季子白盘)“𦉳”(秦公簋)“𦉳”(邾公𦉳钟),从𦉳从𦉳。刘钊先生认为“是”本从日止声,金文从“𦉳”是在“日”上加饰笔而成的。^①字又作“𦉳”(哀成吊鼎)“𦉳”(杕氏壶)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𠄎”（臧孙钟），郭店楚简“是”字皆作“𠄎”，从日从正。我们认为“是”字作“𠄎”乃变形音化，将“早”之竖笔与“正”中间一竖笔重合在一起，“是”就成了从日正声之字。古音“是”在禅纽支部，“正”在章纽耕部，声韵俱近。

76. 𠄎(公)

西周金文“公”字作“𠄎”（作册大鼎）“𠄎”（师酉簋）。《说文》：“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说文》对字形的说解显然不可信。张世超先生认为“公”为“融”之初文，字象蒸气逸出之形。^① 战国文字“公”或作“𠄎”（稣公簋）“𠄎”（徯公左师壶），我们认为这是变形音化现象，即有意识地将“公”改造成从“𠄎”声之字。金文“宫”作“𠄎”（召尊）所从之“𠄎”是甲骨文“𠄎”变来的，“𠄎”在卜辞中均读为“雍”。右易宫弩牙“宫”字作“𠄎”，借“公”为之，亦可证“𠄎”所从之“𠄎”与“宫”之声符“𠄎”来源相同。古音“公”在见纽东部，“𠄎”（雍）在以纽东部。甲骨文、金文乃至战国文字资料中以母与见系声母相同的例子很多，此不赘举。总之，“公”本为会意字，战国文字作“𠄎”显然是人们为了标音而进行的改造。

77. 𠄎(内)

甲骨文“内”字常假借“入”为之，西周金文承袭甲骨文之形作“𠄎”（井侯簋）“𠄎”（禹鼎）。春秋战国文字中“内”或加饰点作“𠄎”（子禾子釜）“𠄎”（中山王𠄎壶），或加一横饰笔作“𠄎”（鄂君启舟节）“𠄎”（侯马·内室类 67:1）“𠄎”（郭店·性自命出 27）“𠄎”（郭店·六德 26）“𠄎”（包山 13）。“内”所从之“入”加了一横饰笔后

① 张世超《金文形义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125条。

就与“大”非常接近，“大”字象两手伸展的部分，也有写得平直的，如“大”（师同鼎）“大”（归父盘）“大”（子仲匜）“大”（邾公华钟）“大”（曾侯乙编钟挂件）“大”（曾 151）“大”（曾 124）“大”（包山 55）。“内”写成“𠂔”“𠂕”“𠂖”等形，可视为变形音化，即“内”变从大声。古音“内”在泥纽物部，“大”在定纽月部。芮伯壶“芮”假借“内”为之，作“𠂔”。“芮”就为月部字。其他如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毒鸟豕（喙）者，炙□□，饮小童溺若产齐赤，而以水饮（71）；屑芍药，以口半杯，以三指大掬（撮）饮之。（72）”“豕”当读为“喙”，“掬”用为“撮”，“豕”、“掬”为 π 部字，“喙”、“撮”为月部字；诅楚文“滅”字作“滅”，从戌声，“滅”属月部，“戌”在物部；“兀”、“元”一字分化，“兀”在物部，“元”在元部；盗壶“地”字作“𠂗”，从隊声，“地”为歌部字，“隊”为物部字。

78. 𠂘 (巽)

甲骨文有字作“𠂘”（合 4500），罗振玉疑为“巽”之古文。^① 林义光《文源》：“巽顺之义，当以𠂘为本字。”按林说甚确，甲骨文“𠂘”就是“巽”之初文。西周春秋金文未见“巽”字，战国文字“巽”字作“𠂘”（随县石磬）“𠂘”（曾侯乙编钟）“𠂘”（陶汇 6·145）“𠂘”（《中国货币》1994·3）“𠂘”（考古 1991·1）“𠂘”（玺汇 3023）“𠂘”（玺汇 161），仍可寻其演变轨迹，即甲骨文跪蹠之形变得直立，又在直立的部分加一横或两横饰笔，作“𠂘”“𠂘”“𠂘”，加了饰笔后下部近似“开”，故字又写成从“𠂘”从“兀”，作“𠂘”。上部的“𠂘”又变作“𠂘”“𠂘”，作“𠂘”（晋玺 3023）“𠂘”（楚玺 0161），“𠂘”即“邻”之古文。甲骨

^①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58条。

文“邻”字作“𠂔𠂔”(合 15351),战国楚系和晋系文字“邻”字增“文”声作“𠂔”(郭店·性自命出 48)“𠂔”(中山王髹鼎),可证“𠂔”“𠂔”所从即“邻”字。“𠂔𠂔”在字中用作声符,古音“邻”在来纽真部,“巽”在心纽文部。以声言之,中古有一部分心母字由来母演变而来,如“事”与“吏”在战国时期还同字,未分化;中山王髹鼎、盗壶“數”假借“讓”为之,作“𠂔”;郢钟“肆”假借“隶”为之,作“𠂔”。“讓”、“隶”为来母字,“數”、“肆”为心母字。就韵而言,战国时期楚语和晋语中有一部分真韵字转入文韵,如“邻”为真部字,但在晋系文字和楚系文字中却增“文”为声符,作“𠂔”“𠂔”。①

79. 𠂔(黄)

甲骨文“黄”字作“𠂔”(合 3488)“𠂔”(合 3503)。姚孝遂先生认为“黄”是从“矢”分化出来的。② 金文或沿袭甲骨文之形作“𠂔”(师觶簋),或在字的上部加“𠂔”,作“𠂔”(召尊)“𠂔”(师觶簋)“𠂔”(伯家父簋)“𠂔”(趯鼎)“𠂔”(休盘)“𠂔”(元年师旗簋)。战国秦楚文字“黄”字形体与两周文字一脉相承,作“𠂔”(包山 107)“𠂔”(信阳 2·23)“𠂔”(石鼓文·沂殿)。燕晋文字中“黄”的形体变化比较大,上部变从“止”作“𠂔”(哀成叔鼎)“𠂔”(赵孟济壶),“止”又进一步变从“𠂔”,作“𠂔”(燕王职矛)“𠂔”(玺汇 1245)“𠂔”(玺汇 728)。我们认为“黄”变从“𠂔”是变形音化现象,“𠂔”在字中用作声符。古音“𠂔”在影纽元部,“黄”在匣纽阳部,声韵俱近。

① 详见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66~67页。

②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350条姚孝遂按语。

第七章

双声符字研究

第一节 双声符字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汉代学者创立的六书说是最早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清代以前,由于“说文学”一直是传统文字学的主体,学者们奉许慎之说为主臬,不敢越雷池半步,所以许慎的六书理论也被奉为经典。其实,许慎是以小篆立说,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许慎见到的小篆以前的古文字资料并不多,所以传统六书理论并不能涵盖所有汉字结构类型。宋代郑樵是许说的第一个诤臣,他在《六书略》中指出了“谐声”字里有一类是“母子同声”,如“悟”、“卅”、“灑”、“藜”、“孽”等。^①郑樵所谓“母子同声”就是指两个构字部件音同或音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双声符字”,^②这是传统六书理论无法解释的文字现象。由于明清时期宗许之风日盛,所以无人响应,以至这些构形特殊、无法纳入六书的汉字长期都被视为形声字。一直到1920年,近代古文字


^① 郑樵指出的“母子同声”之例有36个,其中有不少是正确的。参见郑樵《通志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05页。

^② 学术界对这类两个构字部件都表音之字的指称名目很多,如裘锡圭先生称之为“两声字”,刘钊先生称之为“双声字”,何琳仪先生称之为“双重标音”,袁家麟先生称之为“纯双声符字”,陈伟武先生称之为“双声符字”。本书采用陈伟武先生之说。

学家林义光先生在其著作《文源》中再一次揭示了古文字发展的这一重要现象,并以“二重形声”指称之,可谓凿破千古之鸿蒙。遗憾的是,林义光也遭受了与郑樵同样的命运,他提出双声符字这一课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都无人响应,直到20世纪80—90年代经裘锡圭先生倡导才重新引起学界的重视。近年来,双声符字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进展。首先,学者们一致认为在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双声符字是客观存在的,应当作为汉字构形的一种特殊形式纳入汉字结构体系;其次,陆续考辨出不少双声符字;再次,不少学者都试图界定双声符字的概念,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笔者认为目前双声符字的研究还只停留在零星的考辨阶段,一些理论问题尚未搞清楚,更谈不上系统的研究。理论是研究的前提和指导,理论问题解决了,才能更好地进行研究。本书拟就双声符字的概念、来源及其形成原因和必然性等等问题谈一些粗浅的想法,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关于双声符字概念的讨论与界定

郑樵在《六书略》中仅指出“母子同声”字的音切和字义,而没有具体的说解。林义光的《文源》在传统的“六书”之外特别另立了“二重形声”这一条例,并列举了24个双声符字字例进行详细的说解。为了对林义光所谓的“二重形声”有所了解,下面我们先举数例以申之。^①

𠄎,《说文》:“𠄎,长踞也。从己其声。”林义光按(以下简称“林按”):从己非义,己、其皆声。古作 。

𠄎,《说文》:“𠄎,𠄎也。从午吾声。”林按:午古文杵字,从午非义,午吾皆声。

从林义光的说解中,首先我们知道他所谓的“二重形声”与许慎

^① 以下所举“𠄎”、“𠄎”、“𠄎”、“𠄎”、“𠄎”等例均采自林义光《文源》,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依写本石印,线装本3册,1920年版。

所说的“皆声”有所不同。许慎所谓“皆声”是指一个形声字含有一形二声。《说文》仅收“竊”和“𦉳”两个“皆声”字。“竊”下说：“从穴米、离、甘皆声。甘，古文疾。”“𦉳”下说：“从韭，从𠂔、次皆声。”汉字中确实存在许慎所说的一形二声的皆声字，但《说文》所说的这两个字，今人均已证其误。刘钊先生根据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和《纵横家书》中“竊”均从宀、从糲，证明“竊”并非双声符字^①；“𦉳”可能本是从韭𠂔声或从韭次声的一般形声字，后来又加注了一个声符才成为二声的形声字。因石鼓文里有𦉳字，王国维先生认为“𦉳”当为从韭𦉳声的一形一声的形声字。^②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这种一形二声的皆声字是在原有的形声字上再加注一个声符所致。其次，林义光虽然没有对他所谓的“二重形声”做出明确的界定，但从他的具体说解中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其中的内涵，即两个偏旁都只表音而不表义且两个偏旁(字)音同或音近。裘先生肯定了林义光的“二重形声”说，并称这种由都是音符(声符)的两个偏旁组成的字为“两声字”，如“𦉳”、“𦉳”、“𦉳”、“𦉳”、“𦉳”、“𦉳”等。显然，裘先生同意林义光的意见，可谓名异实同。刘钊先生称之为“双声字”，认为这种双声字是指一个形体的两个构形因素对于所记录的词来说都是表音的声符，而没有形符、意符或其他别的成分。^③ 至此，双声符字的概念被界定为两个构件都必须只表音而不表义，我们称之为“纯双声符字”。

然而，在林义光所收的 24 个双声符字中，只有“𦉳”、“𦉳”、“𦉳”、“𦉳”、“𦉳”、“𦉳”、“𦉳”、“𦉳”、“𦉳”、“𦉳”、“𦉳”、“𦉳”等 14 个是纯双声符字，其余的又可分为三类：

(一)两个部件都是声符，但其中一个兼形符。这类双声符字原有初文，这个初文兼表音义，后又叠加一个声符，如：

① 刘钊《谈考古资料在〈说文〉研究中的重要性》，《中国古文字研究》第 1 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228 页。

②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157 页。

③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89 页。

釐，《说文》：“釐，家福也。从里𠂔声。”林按：家福不得从里，釐训为福、家福之义亦未闻，里、𠂔皆声也。

今按：段注云：“釐字从里，里者家居也。故许释为家福。”李孝定以为“𠂔”乃获麦之象形字，获麦所以足食，引申自得有“福”义，故许训“釐”为“家福”（《甲骨文字集释》）。若依段注，则“釐”当为从里𠂔声；如依李孝定之说，则当从𠂔里声。其实，他们都拘于许说。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许以字从里，故曰家福。愚按：福者禧字之训。古多借釐为禧。”可见“釐”之“家福”义为假借义。林义光认为：“𠂔本义当为飭、为治，经传以釐为之。”“釐”是在表意初文“𠂔”在累加声符“里”而构成的一个双声符字，“𠂔”兼表义。古音“𠂔”在定纽之部，“里”在来纽之部，两字声近韵同。^① 黄丽娟先生亦证其是。^②

（二）两个部件都是声符，但其中一个兼意符。如：

𦉳，《说文》：“𦉳，慎也。从比必声。”林按：《广雅·释詁》“𦉳，比也。”此比字假借之义，非谓比与慎同义也。比必皆声。

今按：《说文》：“比，密也。”清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云：“比有缜密义，故𦉳从比而训为慎。”古音“比”在帮纽脂部，“必”在帮纽质部，两字双声，韵为阴入对转，“𦉳”为部分表义的双声符字。

（三）两个构件音义均相同或相近。如：

舒，《说文》：“舒，伸也。从舍予声。”林按：舍、予皆声。

今按：陈伟武先生也认为“舒”是纯双声符字，并进一步指出构成“舒”的两个偏旁“舍”、“予”音义皆同。^③ 战国包山楚简“舒”字作“𠂔”，从“余”从“吕”。古文字中“舍”与“余”每可通用。战国文字

① 本书所采用古音均据唐作藩：《上古音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黄丽娟《战国多声字研究》，《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1页。

③ 陈伟武《双声符字综论》，《中国古文字研究》第1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5页。

“予”作“𠄎”，马王堆帛书相马经“野”字作“𠄎”，所从的“予”作“𠄎”，“邑”和从“邑”之字每作“𠄎”“𠄎”（《玺汇》3237“𠄎”字所从）或“𠄎”（货系 886“邪”字所从），而“𠄎”“𠄎”与“吕”作“𠄎”（郭店·穷达 4“郎”所从）形体非常接近，故而“予”、“邑”和“吕”常混用不别。“舒”本从“予”，战国文字大都变从“吕”还由于“予”和“吕”古音非常接近，“吕”为来纽鱼部字，“予”古音在喻纽鱼部，两字韵同声近。“𠄎”当隶作“禽”，也是一个纯双声符字。

以上三类能否称之为双声符字，目前学界尚有异议。何琳仪先生认为只要两个构件都表音的都可纳入双声符字的范畴。他称这种组成一个字的两个偏旁都是音符的现象为“双重标音”。^① 陈伟武先生认为所有含有两个表示音读的构件的字都是双声符字，包括纯双声符字、两个构件音义均相同或相近的双声符字和一形二声的形声字。^② 我们认为任何概念都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双声符字亦然。从狭义上说，只有那些两个部件都表音而不表义的字才能称之为双声符字；由广义而言，只要两个部件都表音，就是双声符字，也就是说，除了纯双声符字外，那些其中一个部件兼表义或两个部件都兼表义的也可称之为双声符字，但一形二声的形声字则不宜作为双声符字来研究。本书所论双声符字就涵盖纯双声符字（不兼义的）和兼义的双声符字两类。

我们界定双声符字的原則是：构成双声符字的两个部件在同一时代的文字里都是具有独立的形音义的字，而且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如甲骨文“星”既可作“𠄎”“𠄎”“𠄎”，又可累加声符“生”，作“𠄎”“𠄎”，且这两种形体在同一期卜辞里出现。据此可知其中作“𠄎”

① 何琳仪先生举了“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等字为例。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5页。

② 陈伟武《双声符字综论》，《中国古文字研究》第1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8页。

“𠄎”“𠄎”等形者亦为“星”字，具有独立的形音义，故“𠄎”“𠄎”可看作是双声符字；又如甲骨文“盧”字作“𠄎”“𠄎”“𠄎”“𠄎”等形，又加“虍”声作“𠄎”“𠄎”“𠄎”。显然，“𠄎”“𠄎”“𠄎”“𠄎”也是“盧”字，具有独立的形音义，故“𠄎”“𠄎”“𠄎”可视为双声符字。不过，有些在原字上累加声符而成的字却不是双声符字，因为原字和累加声符后的字不是同一时代的字。如甲骨文“禽”字作“𠄎”“𠄎”“𠄎”，西周金文不再作此形，而是都累加了声符“今”，作“𠄎”（禽簋）“𠄎”（大祝禽鼎）“𠄎”（多友鼎）“𠄎”（不斂簋）“𠄎”（不斂簋二）。由于“𠄎”“𠄎”“𠄎”等所从之“𠄎”“𠄎”“𠄎”在西周金文中不用作“禽”字，而只是个形符，没有具有独立的形音义，故西周金文“禽”字不是双声符字；又如，甲骨文“齿”字作“𠄎”“𠄎”“𠄎”，西周春秋金文未见“齿”字，战国时期的中山王𠄎方壶“齿”字作“𠄎”，累加了声符“止”。由于“𠄎”所从之“𠄎”在战国文字中不用作“齿”字，而只是个形符，不具有独立的形音义，所以“𠄎”不是个双声符字。

明确双声符字的概念对我们研究双声符字是至关重要的。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将讨论双声符字产生的原因和必然性、双声符字的来源以及双声符字的考辨等问题。

二、双声符字产生的原因和必然性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这决定了双声符字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双声符字的出现是由文字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的。我们知道，语言先于文字，语言先有义，然后有音，而后才有文字。而文字记录语言的过程正好相反，即文字是用“形”来记录语音，从而表达语词的意义，因此人们造字时必然非常重视文字的标音作用。在

甲骨文中,形声字就已经超过 20%,假借字被大量使用,也出现部分双声符字,一些象形或会意字实际上也含有表音成分,凡此种种都表明古人在造字之初就已经非常重视使用表音的造字方法。这也可以从文字起源的角度得到证明。有关文字起源有“八卦说”、“结绳和契刻”、“仓颉造字说”和“图画说”。无论文字起源于什么,在它还无法跟语言中语词相对应并按照语序逐词逐句地记录语言之前,我们不能称之为文字。象形、指事等表意造字法所能记录的语词相当有限,显然光靠象形、指事难以完成记录语言任务。在象声写词法出现之前,由象形、指事描摹出来的还只能称为图画文字中的写词因素。只有形象写词法和象声写词法相辅相成,才能共同完成文字写词记言的任务。象声写词法使原始图画记事中的写词因素产生质的飞跃,成为真正的文字。孙常叙先生曾指出:“象声写词法在创建先秦文字体系上是有开山之功的。”^①注重表音自始至终是汉字记录语言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双声符字的出现就是由于人们在使用汉字的实践中过分强调字音的标注作用造成的。

其二,双声符字的逐渐增多是汉字音化趋势的必然结果。汉字音化趋势异常明显,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形声字后来居上,据统计,到说文小篆时代,汉字中形声字的比例已上升到近 88%^②;(二)假借字自始至终都大量出现,在假借字上累加意符是形声字的重要来源;(三)在表意字上添加声符或把原字部分形体改成声符的现象也很普遍。与汉字音化趋势相一致的是,双声符字也逐渐增多,以战国文字特别突出。黄丽娟先生就是从汉字声化的角度探索了战国双声符字大量出现的原因,有的是因为象形文字已失去造字初形,无法经由形体判读其音,因此叠加增繁标音偏旁,如《古文四声韵》所录“虎”字异体“𧇧”就是由于所从“虎”形偏旁与“鹿”形讹混之后无法

① 孙常叙《假借形声和先秦文字的性质》,《古文字研究》第 10 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347 页。

② 李国英《小篆形声字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 页。

由字而判读其音,于是叠加“勿”声作为标音偏旁而成为双声符字;有的是方音造成的地域差别,如齐地“多”字作“夥”、“大”字作“夬”;楚简“害”字作“𠄎”(包山 95)、“禁”字作“𠄎”(郭店·缙衣 32)、“曾”作“𠄎”(郭店·缙衣 16)、“鹿”字作“𠄎”等均是;有的是词义分化造成的,如由“句”分化出“句”;有的是由于上古复声母在声母分化过程中为了记录语音的变化,因而叠加标音偏旁,如“邻”字甲骨文作“𠄎𠄎”(合 2607),金文作“𠄎”(中山王鬲鼎),所叠加的“文”形声符即是“ml”复声母分化期间所增加的标音符号。^①

战国时期双声符字特别多的重要原因在于受方音的影响。纵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小篆,乃至隶楷等各个阶段的文字,其中尤以战国文字中的双声符字数量最多,可谓双声符字的高峰期。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诸侯长期割据混战,其结果是“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文字异形”谓各国记录同一语词所使用的字却往往不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就是受了各地方音的影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出现形声字异体,且这些形声字异体大多是声符的不同;二是各地都出现一批双声符字。这些双声符字大都是在通语的基础上再根据各自的方言累加不同的声符形成的。如睡虎地秦简“卵”字作“𠄎”(秦律十八种 4)、“裙”字作“𠄎”(封诊式 58);楚文字乐律名“羽”字作“𠄎”(曾侯乙钟下 1·2)、“色”字作“𠄎”(郭店·语丛一 110),^②“嗣”字作“𠄎”(曾侯乙钟中二 11);齐文字“皇”字作“𠄎”(陈

① 这里引用双声符字例,黄丽娟先生所谓“多声字”包括双声符字和一形二声的形声字。参见黄丽娟:《战国多声字研究》,《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4~184页。

② 刘信芳《郭店简〈语丛〉文字试解》,《简帛研究》(200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3页。

侯午罍)，“虚”字作“𠄎”（语丛一 60），“裔”字作“𠄎”（陈逆簋）；晋系文字如中山王𠄎方壶“怠”字作“𠄎”，“上”字作“𠄎”，“故”字作“𠄎”等。

三、双声符字的来源

文字永远处于动态的发展演变之中，因此我们研究文字必须以动态的、历史的文字发展观为指导。从这一文字发展观出发去研究双声符字的来源，就必然要以汉字音化的历史为线索。从文字和语音纵向的历史变迁来研究声音在古文字构形演变中的重要作用，就会发现一些过去一直以为是形声或会意的字实际上是双声字，如“甸”^①、“𠄎”、“虚”、“差”^②、“虞”^③等。双声符字的形成途径主要有：（一）造字之初就是双声符字，如“𠄎”、“静”等；（二）在只表读音的假借字上累加声符而成，如“𠄎”、“虚”等^④；（三）在表意初文上再添加声符，原来的表意初文也表音，如“𠄎”（合 28095）、“𠄎”（多友鼎）、“𠄎”（伯要俯簋）、“𠄎”（蔡侯钟）、“𠄎”、“𠄎”（中山王𠄎壶）、“𠄎”（中山王𠄎鼎）、“𠄎”（郭店·语丛一 50）、“𠄎”（郭店·缙衣 16）等；（四）在造字时有意选用一个构件既充当意符又作声符，如“𠄎”、“𠄎”、“𠄎”等；（五）两个音义均相同或相近的构件组成一个双声符字，如“舒”、“𠄎”、“𠄎”等^⑤；（六）由于语音的变化，本来用作声符的部件在后人看来已不表音，所以另造一个形声字，从而在事实上构成一个双声符字。如“耻”，本作“𠄎”，从心耳声，后来“耳”、“𠄎”二字的读音变得相差甚远，有的人不知道“耳”是声符，又因为汉隶中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②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9~90页。

③ 此例承刘钊先生面告。

④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0页。

⑤ 陈伟武《双声符字综论》，《中国古文字研究》第1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5页。

“心”与“止”形近,就把“心”旁改成了读音与“耻”相近的“止”。“耻”字始见于东汉碑刻;①(七)由变形音化造成的双声符字,如“𠄎”(段簋)、“𠄎”(墙盘)、“𠄎”(师壘鼎)、“𠄎”(曾 122)、“𠄎”(语丛一 60)、“𠄎”(邲侯簋)等;(八)一些双声符字显然是方言字。如“𠄎”,刘熙《释名·释船》:“三百斛曰𠄎。𠄎,貂也;貂,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广安不倾危者也。”“舟”、“周”均为章纽幽部字;其他如“𠄎”、“魏”、“𠄎”、“𠄎”、“𠄎”、“𠄎”、“𠄎”等都是杨雄《方言》中所记载的属于不同地区的双声符字;(九)讹变、饰笔、类化等也都有可能形成双声符字。如《说文》:“喬,高而曲也。”“喬”本作“𠄎”(邵钟),又加饰笔作“𠄎”(邵钟)。由于古文字中,“中”与“又”常讹混,故侯马盟书“喬”字既有从“中”的写法作“𠄎”(委质类 156·21),也有写成从又的,作“𠄎”(委质类 156·20),还有的在“又”字上再添加一短横饰笔变从尤声,作“𠄎”(會志鼎)。中山王𠄎鼎上的“喬”字作“𠄎”,“又”字变作“九”。“喬”字作“𠄎”“𠄎”“𠄎”等形中“又”、“尤”、“九”都是声符,与“高”字构成双声符字。古音“高”在见纽宵部,“又”和“尤”在匣纽之部,“九”在见纽幽部,之宵、宵幽均为旁转,声皆为牙音。这是添加饰笔造成的变形音化,从而构成一个双声符字的例子。

“字从音造,义从音生”,双声符字的出现,符合文字记录语言的规律。然而,双声符字长期为传统汉字结构理论所遗弃,这些构形特殊、无法纳入六书的汉字一直被视为形声字。林义光提出的“二重形声”说为这一用传统六书理论无法解释的文字现象找到了理论上的归宿,实有开创之功。陈伟武先生对此做了高度的赞誉:“林义光能够揭示汉字中双声符字的许多事实,正因为他打破了许慎的六书条例,纠正许慎误声为形的种种错误,还双声符字以本来面目。”②通过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5页。

② 陈伟武《双声符字综论》,《中国古文字研究》第1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34页。

研究,我们可以肯定在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双声符字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应当作为汉字构形的一种特殊形式纳入汉字结构体系。当前双声符字研究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不少学者致力于双声符字的考辨,成绩显著,但还没有人对双声符字作系统的研究。“音随字转”、“字随音变”是语言与文字辩证关系的体现,双声符字的出现与语音的演变关系密切,值得我们做深入的探讨。

第二节 双声符字考

上文我们提到,不少学者已经致力于双声符字的考辨工作,成绩显著。其中经陈伟武先生考定的双声符字有“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等。^① 经黄丽娟先生考辨的有“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等。^② 黄天树先生对甲骨文中的双声符字做过研究,他指出的甲骨文中的双声符字有“𠄎”、“𠄎”、“𠄎”、“𠄎”等。^③ 本书将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双声符字的考辨工作。考虑到语音的发展演变是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我们的研究也是分时代和地域的。

一、甲骨文中的双声符字

1. 𠄎(薛)

甲骨文“薛”字作“𠄎”“𠄎”“𠄎”,从𠄎𠄎声,或作“𠄎”(合 248 正)

① 陈伟武《双声符字综论》,《中国古文字研究》第 1 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28~336 页。

② 黄丽娟《战国多声字研究》,《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74~184 页。

③ 黄天树《殷墟甲骨文“有声字”的构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6 本第 2 分册,2005 年。

“𠄎”（合 3983），在卜辞中皆当读为“擘”，由此可知“薛”与“擘”在商代同音，亦为疑母字，其心母之读音乃后出。“薛”所从之“𠄎”，裘锡圭先生释为“义”。^①古音“义”、“月”均在疑纽月部，则“𠄎”为双声符字无疑。

2. 𠄎(鼻)

甲骨文“鼻”字见于合集 8189，辞曰：“壬申卜贞呼御在𠄎……在𠄎。”在卜辞中用作地名，与“鼻子”之“鼻”显系同形字。合集 8357 有从“𠄎”声的“𠄎”字，也用作地名。“𠄎”当为“渎”字。裘锡圭先生认为“鼻”与“渎”大概指同一地方。“渎”字从水，也可看作鼻水的专字。鼻地当滨鼻水。^②古音“渎”在滂纽质部，“鼻子”之“鼻”在并纽质部，可知“𠄎”之读音也当与“鼻子”之“鼻”相同。“鼻”从畀声无疑，我们认为“自”也是声符。《说文》“皇”字条下谓：“自，读若鼻，今俗以始生子为鼻子。”可证“自”最初与“鼻”同音，“𠄎”确为双声符字。对于地名“鼻”来说，“鼻”是个纯双声符字。

3. 𠄎(庸)

甲骨文“庸”字多作“𠄎”（合 15994），当为“镛”之初文。“庸”字作“𠄎”形乃会意字，即将“𠄎”（钟）放置于“𠄎”（钟架）上。甲骨文又有从“用”声的“庸”，作“𠄎”（合 12839）“𠄎”（屯 1022）。“𠄎”当为双声符字。古音“庚”在见纽阳部，“用”在以纽东部。以母与见母关系密切，东阳旁转，声韵俱近。

4. 師

①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5页。

②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5～96页。

甲骨文“自”皆用作“師”，作“𠄎”（合 4226）“𠄎”（合 4227）等形。商代金文有“師”字，作“𠄎”（隸作父乙簋），从自从巾。王恩田先生释甲骨文“𠄎”（后 2·30·8）为“師”，当可信，但他举盂甗、鬲解、戠尊、戠簋中“自”与“師”并用为例，反驳释“自”为“師”说，主张释“自”为“官”（馆），^①则似可商。西周金文“師”字虽然大量出现，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師”假借“自”、“巾”为之，最典型的如師寰簋“師”、“巾”并用。我们认为盂甗、鬲解、戠尊、戠簋中“自”不读为“師”并不影响释“自”为“師”，因为西周金文中大量用“自”为“師”的例子，若依王恩田先生释“自”为“官”（馆），则读不通。盂甗、鬲解、戠尊、戠簋中的“自”可以另作解释，或可用为地名。春秋战国文字中“師”、“自”、“巾”通用，可知“師”、“自”、“巾”三字在春秋战国时期同音。从商代一直到战国“師”的用字情况来看，“師”无疑是个双声符字。

甲骨文“𠄎”（自）、“𠄎”（次）、“𠄎”（師）三字在形、音、义方面都是相关的。“𠄎”（自）为名词，指師旅；“𠄎”（次）乃为动词，指師旅之止舍；“𠄎”（師）则指師旅止舍之处，用为名词。“𠄎”是在“𠄎”下增添横画以区别于“𠄎”，“𠄎”则是添加声符“𠄎”构成的。在读音上，我们认为既然“𠄎”“𠄎”都读为“次”，那么“𠄎”的读音当亦相差不远，一种可能是“自”读“次”音，即读为从母，如甲骨文“𠄎”（合 31233）“𠄎”（合 7345），曹锦炎先生认为二形同字，当为“𠄎”之合文。^②从文字构形来看，“𠄎”和“𠄎”无疑是充当声符的，则“𠄎”声与从“𠄎”声同；另一种可能是“自”、“師”都读入心纽脂部。裘锡圭先生曾指出甲骨文中

① 王恩田《释自、官、师》，《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 曹锦炎《甲骨文合文新释》，《古文字研究》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训为“小阜”的“阜”与表示“師”的“阜”写法有别,有可能本来是两个字,后来才混而不分的。^① 由于秦汉时期表示军队意义时不再用“阜”,与“師”同音的“阜”的读音也就消失了,再加上两种不同来源的“阜”形体上混而不分,它们的读音都读入端纽微部了。

“帀”的读音在春秋战国时期应该与“師”相同,后来读入精纽叶部也是音变的产物。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師”至迟在战国时期还是个双声符字。

5. 𠄎(雉)、𠄎(雉)

甲骨文“雉”字作“𠄎”(合 8874 正)“𠄎”(合 10514)“𠄎”(合 8659)“𠄎”(合 26879),从矢从隹。又作“𠄎”(合 69),“𠄎”为“矢”之倒书,假借“矢”为之,可证“雉”以“矢”为声。字又作“𠄎”(合 35345),从至从隹。陈梦家先生曾指出“雉众”的“雉”在不同时期的卜辞中写法分布的情况,大致是:武丁卜辞作“至”,廪辛卜辞作“𠄎”或“雉”,康丁卜辞作“雉”或“𠄎”,乙辛卜辞则作“雉”。^② 陈梦家先生所说的“至”作“𠄎”,王贵民先生改释作“矢”。^③ 沈培先生根据上博《孔子诗论》“矢”作“𠄎”,肯定了王说。^④ 古音“至”在章纽质部,“矢”属书纽脂部,“隹”在章纽微部,章、书同为舌音,脂、质、微音近,所以“雉”无论是从矢从隹,还是从至从隹,都是双声符字。因为“隹”还表音义,所以“雉”、“雉”乃部分表意的双声符字。

6. 𠄎(星)

①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释殷墟卜辞中与建筑有关的两个词——“门塾”与“阜”》，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2页。

②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608~609页。

③ 王贵民《申论契文“雉众”为陈师说》，《文物研究》1985年第1期。

④ 沈培《卜辞“雉众”补释》，《语言学论丛》第26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甲骨文“星”字作“𠄎”（合 98）“𠄎”（合 10344 正）“𠄎”（合 11504）“𠄎”（合 18648）“𠄎”（合 21419）等形，这类形体都是象形的，又累加“生”为声符作“𠄎”（合 11491）“𠄎”（合 11501）。从同一期卜辞既可写作“𠄎”“𠄎”“𠄎”，又可写作“𠄎”“𠄎”来看，“𠄎”“𠄎”所从之“𠄎”“𠄎”应该看作具有独立形音义的字。“𠄎”“𠄎”等形实际上是由两个独立的构字部件“𠄎”“𠄎”（星）和“生”组成的，因此“𠄎”“𠄎”可视为双声符字。

7. 𠄎(慮)











甲骨文有字作“𠄎”（合 18357）“𠄎”（合 18356）“𠄎”（合 18358），可隶作“慮”，在卜辞中用义不详。西周金文或用作人名，如慮作父解“慮”字作“𠄎”；或用为地名，如今甲盘“慮”字作“𠄎”。春秋战国文字中“慮”均用为第一人称代词“吾”，如栾书缶铭曰：“慮以祈眉寿。”“慮”字作“𠄎”；欽氏壶铭曰：“慮以宴饮。”“慮”字作“𠄎”；中山王𠄎壶铭曰：“将与慮君并立于世。”“慮”字作“𠄎”。古音“鱼”、“吾”均属疑纽鱼部，则“慮”从鱼声无疑。楚简“吾”字皆假借“慮”，“慮”从虎声作“𠄎”（郭店·老子甲 30）“𠄎”（上博·诗论 6），可证“虎”亦为“慮”之声符，即“慮”当为双声符字。冯胜君先生曾怀疑上博《缁衣》“慮”是个双声符字，^①今可知“慮”是个甲骨文时代就有的双声符字。刘钊先生认为“慮”乃“虞”之异体。

8. 𠄎(歲)

^① 冯胜君《论郭店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以及上博简〈缁衣〉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04年，第223页注^①。













甲骨文“歲”字作等形，又作（合 3385），从戌从月。我们认为所从之“戌”、“月”皆声，“月”兼表意。战国文字“歲”之构形可资佐证。战国楚系文字“歲”从月声，如（大府鎬）（鄂君启舟节）（禽志鼎）（包山 2）（望山 M1·7）（信阳 1·3）（郭店·太一生水 4），而齐国文字“歲”则仍从戌声，如（子禾子釜）（国差罇）（陈猷釜）。古音“戌”在匣纽月部，“月”在疑纽月部，“歲”在殷商时代与“戌”同音。为部分表意的双声符字。

9. （龔）









甲骨文“龔”字作（合 5624）（合 26630）（合 14815），从龍从収。古音“龍”在来纽东部，“収”在见纽东部。甲骨文“龔”字作（合 4156），从女龍声，又作（英 2271），从龔声，可证“龍”、“収”皆声，“龔”为双声符字。古音见母与来母关系非常密切，有的学者构拟复辅音 gr 来解释这一现象，有的学者则认为这是急读和缓读之别，即 g 音缓读很容易产生两个音节，如“窟窿”是“孔”之缓读，“斫落”是“角”之缓读，等等。我们认为语言中确实有急读和缓读现象，这样的语料不能用来构拟复辅音，而有些谐声现象的确反映出上古有复辅音。就“龔”而言，西周金文颂鼎“龔”假借为“龔”，而“龔”就带 gr-复辅音，也是个双声符字。上博简《缁衣》：“故子以爱之，则民有亲，信以结之，则民不怀。龍（恭）以莅之，则民又悉心。”“龍”假借为“恭”，可见战国时代还有 gr-复辅音，《说文》谓“龔”、“龔”从龍声并非无据。“勒”的情况与“龔”、“龔”相类。西周金文中“勒”多从革从力作（颂鼎），但有时又省作（康鼎）（害簋）。战国中山王铜器“勒”字均从刀作，刘钊先生认为“勒”字

从刀才是本形,金文“勒”变从力,乃变形音化。从革从力的“勒”就成了双声符字。^① 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遁卦》:“六二,共之用黄牛之勒(革),莫之胜说。(3行)”“勒”当读为“革”,可知“勒”的声母一直到汉初还可能是复辅音 gr-。

10. (盧)

甲骨文“盧”字作 (合 19957 反) (合 259) (合 26010) (合 32993), 又加“虍”声作 (合 32969) (合 28095) (屯 2482)。从同一期卜辞既可写作 , 又可写作 来看,“ ”所从之“ ”应该看作具有独立形音义的字,因此我们认为“ ”是双声符字。古音“虍”、“盧”皆属鱼部,“虍”之声纽为匣母,“盧”为来母字。何九盈先生认为商代有复辅音 gr-。^② “盧”的声母在商代当为 gr-,故“虍”可用作声符。

11. (尋)

甲骨文“尋”字作 (合 16079) (合 27310) (合 28205) (合 36914) (合 36944), 又作 (合 16070) (合 16078), 唐兰先生皆释为“尋”。^③ 李学勤先生把 形隶作“𠄎”,并谓“𠄎”是在“尋”字上再加声符“丙”。^④ 按:“𠄎”可以理解为双声符字,正如李先生所指出的,从“丙”(覃)得声之字与从“尋”得声的不少字彼此同音,如“覃”和“蓊”为定纽侵部字,“擗”和“禘”在透纽侵部,“尋”、“潯”和“𦉳”、“𦉴”均为邪纽侵部字,等等。其实,在甲骨文里也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2页。

② 何九盈《音韵丛稿·商代复辅音声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8页。

③ 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1939年影印本,第42~43页。

④ 李学勤《续释“寻”字》,《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6期。

可以找到例证。甲骨文有字作“𠄎”（合 4552）“𠄎”（合 6057 反），孙诒让释“𠄎”为“谢”，罗振玉因其说，以“𠄎”“𠄎”“𠄎”“𠄎”诸形同释为“谢”。^① 虽然罗振玉释“𠄎”“𠄎”为“谢”不对，但以“𠄎”“𠄎”为一字异体当不误，故“𠄎”为双声符字确切无疑。

12. 𠄎(禽)

甲骨文“𠄎”字作“𠄎”“𠄎”“𠄎”形，像人伏就于尊盘前吸食状，乃“饮”之初文。字又简省作“𠄎”（合 22139）“𠄎”（合 28097），本来象倒口吐舌的部分变形作从今声。我们认为“𠄎”、“禽”所从之“酉”不仅仅是意符，而且还起标音作用。“禽”是个双声符字。古音“禽”在影纽侵部，“今”在见纽侵部，“酉”在以纽幽部。以声言之，甲骨文中不乏影、以二纽相通之例，如“伊”从尹声，“伊”亦可假借“亦”、“寅”为之^②；“益”与“易”同源分化；“壅”从用声作“𠄎”（合 9485）。就韵而言，清人严可均曾提出幽侵对转说，其后章太炎、李新魁、施向东等学者都撰文证成此说。^③ 甲骨文中幽侵相通之例多见，如“人”、“六”同字，“人”在缉部，而缉部是侵部的人声，“六”在觉部，觉部为幽部之入声韵；“凤”从凡声，“凡”在侵部，“凤”在冬部，冬部为幽部的阳声韵；“寝”字作“𠄎”（合 34067）“𠄎”（合 24953），从帚声，“帚”为幽部字，而“寝”在侵部。

① 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1939年影印本，辅仁大学丛书之一，第42页。

②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0215条姚孝遂按语。

③ 参见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6~29、40页；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341~344页；施向东《试论上古音幽宵两部与侵缉谈盍四部的通转》，《天津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二、西周金文中的双声符字

13. 𡗗(𡗗)

西周春秋金文中“𡗗”字多见,作“𡗗”(感簋)“𡗗”(录簋)“𡗗”(𡗗侯之孙鼎)“𡗗”(𡗗鼎)“𡗗”(𡗗衍簋),在铭文中皆当读为“胡”,用为国名、地名、人名,或训为“大”。用为人名时指周厉王。^①杨树达先生认为“𡗗”从夫声,^②刘钊先生认为“𡗗”是“害”叠加声符“夫”而成的。^③春秋早期的伯其父匜借“𡗗”为“匜”可为之佐证。古音“胡”、“𡗗”在匣纽鱼部,“夫”、“匜”在帮纽鱼部。帮母与匣母音似远隔,但在现代方言里还是可以找到它们相通的条件。闽方言是保存古音最多的方言,在笔者的方言——闽南方言中,唇音 f 与喉音 h 不分。普通话中读 f 的音,在闽南话中一律读为 h,并在 h 后加介音 u。如“饭”,普通话读为 fan,闽南话则读为 huan;当韵母为 u 时,声母 f 也一律读为 h。如“夫”,普通话读为 fu,闽南话则读为 hu;还有一种情况是当声母 f 变读为 h 时,韵母随之变为圆唇音 o。如“风”,普通话读为 feng,闽南话则读为 hong。从闽南方言这一读音现象就不难理解“𡗗”为什么可读“夫”声。

我们认为“𡗗”所从之“害”也是声符。墙盘“𡗗”字作“𡗗”,依照汉字省形不省声的结构规律,可知“害”为“𡗗”之声符。金文“𡗗”字作“𡗗”(季良父簋),或作“𡗗”(季宫父簋)“𡗗”(旅虎簋)“𡗗”(鲁士簋)等形,亦可证“𡗗”、“害”同音。陈秉新先生认为金文“害”象下器上盖的器物形,即胡簋之胡的本字,本读匣母鱼韵,后借为患害之

① 唐兰《周王𡗗钟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1936年。

②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释簋》,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③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6页。

害,音亦转为月部。^①“𪚩”在金文中均读为“胡”,因而“𪚩”读“害”声应该没有问题。上文已证“𪚩”所从之“夫”亦为声符,则“𪚩”为双声符字无疑。

14. 𪚩(𪚩)

黄丽娟先生认为“𪚩”为双声符字,^②甚确。李学勤先生亦主此说,并举郭店简以“𪚩”为“浦”为例,证“夫”、“甫”与“古”于音可通。^③陈逆所“𪚩”字作“𪚩”,亦可证“古”、“夫”同音。

15. 𪚩(𪚩)






西周金文“𪚩”字作“𪚩”(兮仲钟)“𪚩”(𪚩簋),从止从舟,或借笔作“𪚩”(追簋)“𪚩”(善鼎)。战国文字作“𪚩”(包山 122)“𪚩”(郭店·老子甲篇 4)“𪚩”(郭店·穷达以时 9)等形,所从之“𪚩”又讹成“月”作“𪚩”(郭店·尊德义 2)“𪚩”(禽前鼎)。我们认为“𪚩”是个双声符字,古音“之”、“舟”双声,均为章母字,韵部则属之幽对转。我们在《中古精母字来源之古文字学证据》一章中已对“𪚩”(前)的语音演变做了考证,认为“𪚩”当与“箭”、“晋”一样本读为舌音,其从母之读音乃后世的音变。就韵部而言,之部与元部也可相通,如甲骨文有“东单”、“西单”、“北单”、“南单”,商代𪚩、觶、爵有“西单”合文,缀遗斋彝器考释(16·11)有商器南单觶,又有商器父戊南单爵(21·

① 陈秉新《害为胡簋之胡本字说》,《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第80~83页。

② 黄丽娟《战国多声字研究》,《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1页。









③ 李学勤《青铜器中的簋与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9~80页。

26),于省吾先生认为“单”当读为“台”。^①“单”为元部字,“台”为之部字;再如“而”为之部字,从而声的字,如“奘”、“需”、“端”、“奘”均为元部字,从“奘”声和“需”声的字很多都有之部和元部两读,如“濡”、“濡”、“輶”等。古籍中也不乏其例,如《礼记·内则》:“芝栢菱稬。”《释文》:“栢本作软糯。”《尔雅·释木》:“栢栢。”《释文》“栢”作“糯”,云:“字又作栢。”典籍中还有“而”与“然”(元部字)相通之例,如《礼记·学记》:“然后尽其声。”《后汉书·丁鸿传》李注引“然”作“而”。又《礼记·郊特牲》:“然后炳萧合膾芴。”《诗·大雅·生民》毛传引“然”作“而”。“然”为元部字。

古音幽元亦可通,如曼鼻父盥“曼”字作“”,从𠂔声,邓盂作监曼尊壶“曼”字作,亦从𠂔声。“𠂔”即“帽”之初文,古音“帽”、“曼”双声,“帽”属幽部,“曼”在元部;又如金文“免”字作(免筐),从,从面声。“瑁”、“面”二字双声,“瑁”在幽部,“面”在元部。

综合以上例证,我们有理由认为“寿”是双声符字。

16. (闌)

𠄎方鼎铭文:“乙未,王宾文武帝乙乡日,自仙,王返入,王赏𠄎貝,用作父丁宝尊,在五月,惟王廿祀又二。”“”显系地名,李学勤先生认为此字与金文中常见的省去形就与𠄎方鼎之同形了,故两字均可隶作“闌”。“和所从之“柬”和“间”皆为声符。古音“柬”和“间”都是见纽元部字,“闌”为来纽元部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四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9~131页。

^② 李学勤《试论新发现的𠄎方鼎合荣仲方鼎》,《文物》2005年第9期。

字。见母与来母的关系非常密切，已为学界所公认。因而我们认为“𠄎”是双声符字。

17. 𠄎(勒)

盩方彝“勒”字作“𠄎”(盩方彝)；从来从力。古音“来”在来纽之部，“力”在来纽职部，“勒”的声母为复辅音 gr-，韵属职韵，声韵皆可通，故“𠄎”为双声符字无疑。

18. 巖(巖)

金文“巖”字作“巖”(井人姜钟)“巖”(多友鼎)“巖”(虢吊钟)。裘锡圭先生指出“巖”所从之“巖”即《说文》训为“多言也”之“岳”，故“巖”之形体结构当分析为从岳敢声。“巖”是疑纽谈部字，“岳”是娘纽叶部字。以声言，同为鼻音。以韵言，有阴人对转的密切关系。可见这两个字不但意义相似，字音也很接近。“巖”很可能是由“岳”孳乳的一个词。在汉字发展的过程里，人们有时在表意字上加上声符，造成形声字，来表示从这个表意字所代表的词孳生出来的一个新词。^①“岳”之于“巖”，既表意又表音，所以我们认为“巖”是部分表意的双声符字。

19. 𠄎(𠄎)

甲骨文“𠄎”字作“𠄎”“𠄎”“𠄎”，从人朋声。金文作“𠄎”(𠄎仲鼎)“𠄎”(楚簋)“𠄎”(𠄎卣)，沿袭甲骨文的写法；又作“𠄎”(多友鼎)“𠄎”(杜伯盃)，人形变作“𠄎”，“𠄎”即“伏”之初文。刘钊先生认为“𠄎”既有可能是“𠄎”字，也有可能是“朋”字异体，即在“朋”字上追加“伏”声而成。“𠄎”与后世之“𠄎”不一定是一个字。金文朋友

①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说岳、巖》，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01页。

之朋作“𠄎”，写成从伏声，大概是有意与貝朋之朋相区别。^① 黄文杰先生指出后世“朋友”之“棚”就是由“𠄎”演变而来。^② 从杜伯盥“朋友”之“朋”字作“𠄎”，又作“𠄎”来看，“𠄎”应与“棚”同字，不同的是，“𠄎”是个双声符字，古音“朋”在并纽蒸部，“伏”在并纽职部，音极近。

20. 𠄎 (犀)

金文“犀”字作“𠄎”（皿犀簋）“𠄎”（竞卣）“𠄎”（五祀卫鼎）“𠄎”（王孙钟）“𠄎”（令狐君壶），从尸从辛。金文“尸”皆用作“夷”。古音“夷”在以纽脂部，“辛”在心纽真部，“犀”在心纽脂部。古文字以母与心母相通的例子很多，如“易”用作“赐”，“修”从攸声，“诱”从秀声，“肆”从隶声，等等。据此，“犀”为双声符字无疑。

21. 𠄎 (宥)

西周金文“宥”字作“𠄎”（师望鼎）“𠄎”（几父壶）“𠄎”（师酉簋）“𠄎”（义伯簋）“𠄎”（兮甲盘）“𠄎”（召鼎）。其中“𠄎”“𠄎”“𠄎”“𠄎”等形在铭文中皆读为“宥”，故杨树达先生以此为“宥”之加声字，“儿”为叠加之声符，^③ 唐兰先生也认为“宥”即“宥”字。^④ 张世超先生对“宥”的形体演变做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𠄎”、“𠄎”字同，惟声符所在微异。“𠄎”或省形为“𠄎”，而小篆复省作“宥”。^⑤ 我们支持张先生的说法，金文中从宥之“宥”用作“宥”，当为假借。由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2页。

② 黄文杰《说朋》，《古文字研究》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80页。

③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79～80页。

④ 唐兰《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五十三篇的考释》，《古文字研究》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⑤ 张世超《金文形义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1356条。

“𡩉”“𡩊”“𡩋”可读“宫”，可知“宄”所从之“宫”乃声符。古音“宄”在见纽幽部，“宫”在见纽冬部，二字双声，韵为阴阳对转，“𡩊”“𡩋”为双声符字无疑。

22. 𡩌 (虞)

西周金文“虞”字作“𡩌”（虞司寇壶）“𡩍”（散盘）“𡩎”（恒簋），皆从虍从吴。同簋、免簋“吴牧”皆当读为“虞牧”，可证“虞”、“吴”同音。古音“吴”、“虞”均在疑纽鱼部，“虎”在晓纽鱼部，韵同声近，可知“虞”为双声符字。

23. 𡩏 (鞞)

西周金文“鞞”字作“𡩏”（卫盃），一般认为字从韋合声。我们认为“韋”既表意也表音，“鞞”是部分表意的双声符字。古音“鞞”在见纽缉部，“韋”在匣纽微部，“合”在匣纽缉部，声韵皆可通。

24. 𡩐 (釐)

西周晚期的越鼎“釐”字作“𡩐”，假借为“釐”。师鬲鼎“釐”作“𡩑”，可证“𡩐”所从之“𡩑”亦为声符。“釐”、“𡩑”、“来”都是来纽之部字，“釐”乃双声符字。

25. 𡩒 (龔)

西周金文有字作“𡩒”（荣有鬲禹鼎）“𡩓”（荣有鬲禹鬲），此字所从之“𡩒”与包山楚简“𡩔”（简 142）“𡩕”（简 144）所从之“𡩖”形近。白于蓝先生释包山楚简“𡩔”“𡩕”为“巷”字。^①李学勤先生指出：“‘巷’是个以‘共’为声的字，在作为偏旁时，每每省去‘共’所从之

① 白于蓝《释包山楚简中的“巷”字》，《殷都学刊》1997年第3期。

‘𡗗’，包山楚简‘巷’就是这样。”^①白于蓝先生在上引文中还指出荣有嗣再鼎、鬲之“𡗗”、“𡗗”很可能是“龔”之异体，认为“龔”当从共声，而非如《说文》所谓“从龍声”。^②按：释“𡗗”为“龔”可从。我们认为“𡗗”是个双声符字，古音“共”在见纽东部，“龍”在来纽东部。从古文字资料来看，一直到战国乃至汉初，见母与来母的关系仍很密切，如上博简《缁衣》：“故子以爱之，则民有亲，信以结之，则民不怀。龍(恭)以莅之，则民又悉心。”“龍”假借为“恭”；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六二，共之用黄牛之勒(革)，莫之胜说。(3行)”用“勒”为“革”。“龔”与“龔”、“勒”同类，皆为双声符字。

26. 𡗗

西周金文“荆”字作“𡗗”(贞簋)，又作“𡗗”(师虎簋)，在原字上累加声符“井”，构成一个双声符字。古音“荆”在见纽耕部，“井”在精纽耕部。中古精母字有的来自见纽，故“荆”之作“𡗗”形者应该是个双声符字。

27. 𡗗(猷)

西周金文“猷”字作“𡗗”(沈子它簋)“𡗗”(毛公盾鼎)“𡗗”(商卣簋)，字从冃从犬。刘钊先生认为“冃”字可能本即“猷”字初文，象口啖肉形，故字有“饱”义，“犬”字乃后来追加的意符或音符。^③按：“冃”为“猷”之初文应该没有问题，“犬”为追加之声符。“猷”当是个部分表义的双声符字，古音“猷”在影纽谈部，“冃”在影纽元部，犬在溪纽元部，音极近。

28. 𡗗(党)

① 李学勤《秦封泥与齐陶文中的“巷”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0页。

② 白于蓝《释包山楚简中的“巷”字》，《殷都学刊》1997年第3期。

③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9页。

西周金文虢鼎有字作“𣎵”，唐兰释“堂”，《金文编》列在“堂”字下，又列于附录。刘钊先生认为字从“𣎵”从“𣎵”，“𣎵”为“定”，“𣎵”应为“京”字之省，乃叠加之声符。^①按：“𣎵”可看作是双声符字，古音“定”在定纽阳部，“京”在见纽阳部。西周金文中不乏见母与舌音相通之例，如牧簋铭文借“旨”为“稽”；“讼”从公声，“讼”为邪母，而古邪母归定母。

29. 𣎵(旗)

西周金文“旗”字作“𣎵”(旗作父戊鼎)“𣎵”(颂鼎)“𣎵”(师旗鼎)“𣎵”(孟鼎)“𣎵”(卫盂)，从𣎵从斤。《说文》：“旗，旗有众铃以令众。从𣎵斤声。”我们认为“𣎵”也表音，休盘、害簋“旗”字都假借“𣎵”字，作“𣎵”(休盘)“𣎵”(害簋)。“旗”为部分表义的双声符字，古音“旗”在群纽微部，“𣎵”在影纽元部，“斤”在见纽文部。以声言之，影、见同为喉牙音；就韵而言，西周金文中常见文、元可通之例，如鬯卣“鬯”字作“𣎵”，从“𣎵”声，“𣎵”即“圆”；“難”字作“𣎵”(归父盘)，从堇声；“虔”字作“𣎵”(追簋)，从文声。“圆”、“堇”、“文”均属文韵，“鬯”、“難”、“虔”则皆为元韵字。微、元二韵亦可通，如“回”、“亘”乃一字分化，“回”属微部，“亘”为元部字。

30. 𣎵(寮)

甲骨文“寮”字作“𣎵”“𣎵”“𣎵”，西周金文或承袭甲骨文字形，作“𣎵”(盂孟)，或加“𣎵”形作“𣎵”(矢方彝)“𣎵”(令簋)“𣎵”(番生簋)“𣎵”(毛公厝鼎)。张世超先生认为“𣎵”为“吕”字，“𣎵”从吕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6页。

声。^① 刘钊先生认为“寮”字作“𡩺”乃变形音化从宫声。^② 从声音上考虑,我们认为“𡩺”所从之“𡩺”为“宫”之声符而非“吕”。古音“寮”在来纽宵部,“吕”在来纽鱼部,“𡩺”在以纽冬部,从声纽来看,三者皆近,但就韵而言,宵与幽更近,与鱼则差别较大。西周金文中不见宵鱼二韵相通的例子,但宵幽相通的例子很多,如逯盘“繇”读为“由”;“叔”字作“𡩺”(师般簋),从小声;“幼”字作“𡩺”,从幺声。古音“繇”、“小”、“幺”皆属宵部,“由”、“幼”则在幽部,“叔”在觉部。今“𡩺”在冬部,与宵部当亦可通。从西周金文“寮”可作“𡩺”来看,“𡩺”是形音义独立的一个字,在字中不仅仅用作意符,而且还表音。因此我们认为“𡩺”是部分表义的双声符字。

31. 𡩺 (俯)

西周金文“俯”字作“𡩺”(伯要俯簋),从府从“𡩺”。“𡩺”即“伏”字,刘钊先生认为“𡩺”字是在“𡩺”字上叠加“府”声而成(或在府上叠盖加勺声),^③ 甚确。“𡩺”不仅表音,还表义,“府”则成了纯粹的声符,“𡩺”乃部分表意的双声符字。古音“府”在帮纽侯部,“伏”在并纽职部。西周金文中侯部与之蒸都有相通的例子,如“登”从豆声,“登”属蒸部,“豆”在侯部;中山王罍鼎“侮”作“𡩺”,从母声,“侮”在侯部,“母”在之部,亦可作为旁证。

32. 𡩺 (𡩺)

西周中期的𡩺簋“𡩺”字作“𡩺”,在铭文中用作人名。清人吴式

① 张世超《金文形义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1385条。

②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9页。

③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5页。

芬以之为“兄”之异构，曰：“兄旁加𠄎与兄旁加光同意，皆谐声也。”按：从铭文的用例来看，难以证明“𠄎”是“兄”之异体，但吴氏指出“光”为声符则是对的。“𠄎”是个双声符字，古音“兄”在晓纽阳部，“光”在见纽阳部。西周金文中见晓关系极为密切，曼髀父盨“髀”字作“𠄎”，从兄声；效卣“觀”字假借“觀”为之，作“𠄎”；墙盘“贯”假借“寘”为之，作“𠄎”，等等。古音“髀”、“觀”、“贯”均为见母字，“兄”、“觀”、“寘”则皆为晓母字。

33. 𠄎 (頤)

西周金文“𠄎”字作“𠄎”（弭吊簋）“𠄎”（公臣簋），从首旨声。或从旨从頁，作“𠄎”（井侯簋）“𠄎”（颂壶）“𠄎”（农卣）“𠄎”（克盨），可隶作“頤”。“𠄎”、“頤”在铭文中均用作“稽首”之“稽”。我们认为“頤”是个双声符字，“頁”也是声符，卯簋“𠄎”字作“𠄎”，“𠄎”即“頁”，张世超先生认为“頁”是“𠄎”之象事初文，象人𠄎首状，首上有发，意其在首而不在目。^①古音“𠄎”在溪纽脂部，“頁”在匣纽脂部，声韵俱近。“𠄎”从旨声也是没有问题的，“稽”从旨声可证。^②上博《緇衣》：“故言则虑其所终，行则旨（稽）其所敝，则民慎于言而谨于行。（17）”“旨”当读为“稽”。“頤”乃部分表义的双声符字。

34. 𠄎 (念)

甲骨文“念”字作“𠄎”（合 12670），西周金文“念”字作“𠄎”（沈子它簋）“𠄎”（万尊），从倒口从心、心亦声，为“念”之本字，即“念”的本义是指诵读，《说文》：“念，常思也。”实际上说的是引申义。《说文》分析“念”的字形为从心今声，也是就已经讹变后的形体立说。“念”

① 张世超《金文形义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1818条。

② 刘钊先生有专文考证“稽”的形音义，参看刘钊《“稽”字考论》，《中国文字研究》第6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

本从倒口，而倒口形“𠂔”又与“今”（含）^①作“𠂔”（师旗鼎）“𠂔”（师虎簋）混同，于是“念”又写作“𠂔”（段簋）“𠂔”（毛公厝鼎），变形音化成为一个双声符字。就韵而言，“念”、“今”（含）、“心”都属侵部；以声言之，“念”在泥纽，“今”（含）在匣纽，“心”在心纽。西周晚期的稣甫人匜“襄”字作“𠂔”，从𠂔声；伯公父簋“需”假借为“糯”；“年”字可从𠂔声作“𠂔”（汤吊盘）。“𠂔”、“糯”、“年”在泥纽；“襄”、“需”在心纽，“𠂔”在清纽，清、心同为齿音。西周金文中心母与匣母相通的例子习见，如利簋“歲”字假借“戍”为之，作“𠂔”；“洹”从“亘”声，如“𠂔”（伯喜父簋）；“咸”从戍声，如“𠂔”（何尊）；“羞”从又声，如“𠂔”（五年师旅簋），等等。“歲”、“亘”、“戍”、“羞”诸字为心母字，“戍”、“洹”、“咸”、“又”等字则为匣母。

35. 𠂔（諺）

西周晚期的厚氏鬲簋“𠂔”字作“𠂔”，刘钊先生认为字当从“彦”从“言”，乃“諺”字。^② 甚确。“諺”字还见于曾侯乙磬石刻，作“𠂔”“𠂔”。“諺”还应该是个部分表意的双声符字，古音“言”、“彦”均在疑纽元部。

36. 𠂔（廡）

西周金文有字作“𠂔”（大师廡豆）“𠂔”（伯公父匜），在铭文中读为“祈”。《金文编》将其列入“祈”字条下。张世超先生谓伯簋簋作

① “今”、“含”一字分化，楚简“今”、“含”尚未分化，本书第五章《论形随音变》部分有详论。

②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59～160页。

“𠄎”，所从之“言”起表义作用，“𠄎”为“𠄎”之省斤者。^① 我们认为“𠄎”是个部分表意的双声符字。古音“祈”在溪纽文部，“𠄎”在影纽元部，“言”在疑纽元部，三字声韵俱近。

37. 𠄎(闇)

西周晚期的师颢簋铭曰：“在先王既令汝作司徒，官司汭闇。”“闇”字作“𠄎”，从門从言，在铭文中很可能就当读为“門”。《说文》：“闇，和说而诤也。从言，門声。”古音“闇”在疑纽文部，“門”在明纽文部，“言”在疑纽元部，“闇”、“門”叠韵，“闇”、“言”双声，故疑“闇”亦为双声符字。郑张尚芳先生指出：“藏文有 mṅan，表数说、指责，与此同源。”^②

38. 𠄎(夜)

《说文》：“夜，舍也，天下休舍也。从夕亦省声。”西周金文“夜”字作“𠄎”（师酉簋）“𠄎”（师盥鼎）“𠄎”（伯晨鼎），与《说文》所言相合。其中作“𠄎”形者，张世超先生谓乃“亦”右侧之指事符号与“夕”或“𠄎”借笔共享。^③ 战国时期的夜君鼎“夜”字作“𠄎”，所从之“亦”不省。“夜”应该是个部分表意的双声符字。古音“夜”、“亦”在以纽铎部，“夕”在邪纽铎部。据师玉梅先生统计，西周金文邪母自谐 7 例，而与以母相谐的却多达 9 例。^④ 李方桂先生就邪纽与以纽的密切相谐关系认为邪纽主要是从上古以母来的，后面有个三等介音-j 而已。^⑤

① 张世超《金文形义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29条。

② 此为郑张尚芳先生审阅拙稿时提出的意见。

③ 张世超《金文形义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1266条。

④ 师玉梅《西周金文音韵考察》，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41~45页。

⑤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4页。

39. 霸 (霸)

甲骨文“霸”字作“𠄎”（屯 873），从革从月，又从雨从革作“𠄎”（合 37848）。西周金文或沿袭甲骨文之形作“𠄎”（郑虢仲簋），因为“霸”字在金文中多用作“月光”之意，所以字多又增意符“月”作“𠄎”（师遽方彝）“𠄎”（兮甲盘）“𠄎”（霸姑鼎）“𠄎”（颂簋）。师奭父鼎“霸”字作“𠄎”，从霏从帛，刘钊先生认为“帛”为追加的声符。^① 甚确。由郑虢仲簋“霸”字可作“𠄎”来看，“霏”是具有独立的形音义的字，《说文》谓“霸，从月霏声”亦可证，如此则可确定“𠄎”为双声符字。

40. 𠄎 (福)

西周金文“福”字多从畀声作“𠄎”（沈子簋）“𠄎”（善鼎）“𠄎”（井侯簋），或从北声作“𠄎”（或者鼎），或累加“北”为声符，作“𠄎”（周乎卣）。“𠄎”当析为“福”和“北”两个部分，古音“福”、“北”皆在帮纽职部，所以“𠄎”应该是个双声符字。











41. 𠄎 (祝)

西周金文“兄”字作“𠄎”（受季良父壶）“𠄎”（刺卣），又作“𠄎”（史梅兄簋）“𠄎”（吊趯父卣）“𠄎”（帅鼎）“𠄎”（吊家父匡），在“兄”上累加声符“生”，构成一个双声符字。这种形体的“兄”字在春秋战国文字中仅见于楚系文字，如“𠄎”（王孙钟）“𠄎”（沈儿钟）“𠄎”（子璋钟）“𠄎”（嘉宾钟）“𠄎”（姑□句镈）“𠄎”（敬事天王钟）“𠄎”（斲钟）“𠄎”（包山 96）“𠄎”（包山 135）“𠄎”（江陵 M270·3）。古音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兄”在晓纽阳部，“生”在匣纽阳部，音极近。



42. 賓 (賓)

甲骨文“賓”字作 (合 1248 正)  (合 3168)  (合 2203)，从宀从女从止，或从宀从人从止，会宾客至之意。或从“丌”声作 (合 15179)。西周金文或承袭甲骨文作 之形者，作 (盧钟)，但多累加“貝”，作 (孟爵)  (保卣)  (史颂簋)  (孟鼎)。《说文》：“賓，所敬也，从貝宀声。”旧多有于《说文》，以为“賓”所从之貝为意符。现在看来“賓”当分析为从貝，貝、宀皆声。古音“貝”在帮纽月部，“宀”在明纽元部，声韵俱近。“賓”本应为元部字，后来才音转入真部。


三、春秋战国文字中的双声符字

(一) 秦系文字


43. 義 (義)

春秋时期的诅楚文“義”字作，从義从兮。古音“義”在疑纽歌部，“兮”在匣纽支部，“義”在晓纽歌部，三字声韵俱近，可知为双声符字。

44. 𦉳 (𦉳)

睡虎地秦简有字作 (秦律十八种 4)，从𦉳从卯，可隶作“𦉳”。“𦉳”不见于字书，在简文中读作“卯”。“𦉳”是个双声符字，古音“𦉳”、“卯”均在来纽元部。

45. 𤇗 (灰)

《说文》：“灰，死火余烬也。从火，从又。又，平也。火既灭可以执持。”“灰”字最早见于睡虎地秦简，作 (秦律十八种简 4)。简文曰：“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整理小组曰：“夜草为灰，意为取草烧

灰。”可见《说文》训“灰”之本义无误，但说解字形颇为牵强。“灰”当为从火，火、又皆声之字，即部分表义之双声符字。古音“灰”在晓纽之部，“火”在晓纽微部，“又”在匣纽之部，音极近。

46. 𩇛(髑)

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申失火，富。癸失火，有𩇛。酉失火邦有(251)年。亥失火，利春。(252)”“𩇛”在简文中假借为“鬼”。“𩇛”不见于字书，可隶作“髑”。“髑”还见于秦印，作“𩇛”（玺汇5489）。“髑”的读音虽不见记载，但从秦简“髑”可假借为“鬼”来看，“髑”当与“鬼”同音。古音“骨”在见纽物部，“鬼”在见纽微部，音极近，故“髑”当为双声符字。

47. 𦉳(幫)

睡虎地秦简《封诊式》：“衣布禪幫、襦各一。”又“衣络禪襦、幫各一。”“幫”字分别作“𦉳”“𦉳”，从君从巾。旧多以为“幫”从巾君声，“巾”为意符。其实“巾”亦表音，古音“巾”、“君”都在见纽文部，“幫”是个部分表意的双声符字。

48. 𦉳(樂)

《石鼓文·汧殽》：“帛(白)鱼𦉳𦉳，其𦉳氏鲜。”“𦉳”字作“𦉳”，从帛从樂皆声。刘钊先生曾指出“樂”本作“𦉳”，从丝在木上形。金文作“𦉳”，乃追加“白”为声符。^①“帛”亦从白声，故“𦉳”为双声符字无疑。

49. 堵(堵)

春秋晚期始见“堵”字，晋系铜器郟钟“堵”字作“𦉳”，从章者声；楚系的邾公𦉳钟“堵”字作“𦉳”，从金者声；齐系的叔夷钟则从工者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声作“𡗗”，所从之“工”很可能为“土”字之残。战国睡虎地秦简“堵”字作“堵”（秦律杂抄 40），从土从者。蔡侯钟铭曰：“咸有九洲，处堦之堵（土）。”“堵”在铭文中假借为“土”，可证“土”亦可为“堵”之声符。从土从者的“堵”为部分表意的双声符字。古音“土”在透纽鱼部，“者”在章纽鱼部，音极近。

（二）楚系文字中的双声符字

50. 𡗗(𡗗)

曾侯乙墓编钟音律名“羽”字作“𡗗”（曾侯乙钟下 1·2），从羽从于，何琳仪先生指出此为双重标音字。^① 楚简亦见“𡗗”字，作“𡗗”（郭店·五行 17）“𡗗”（包山 188）。“𡗗”当是具有楚系特色的双声符字。

51. 𡗗(布)

西周金文“布”字作“𡗗”（鬲卣）“𡗗”（守宫盘），从巾父声。楚简“布”字作“𡗗”（曾 130）“𡗗”（信阳 2·15）“𡗗”（仰天湖楚简），又作“𡗗”（曾 122）“𡗗”（郭店·六德 27），从市从父皆声。古音“市”在帮纽月部，“父”在并纽鱼部，“布”在帮纽鱼部，声韵皆近，“𡗗”为部分表意的双声符字。

52. 𡗗(𡗗)

曾侯乙编钟有音律名“羸𡗗”。“𡗗”字作“𡗗”（曾侯乙钟中二 11）“𡗗”（曾侯乙钟中三 6），从司从子。“司”或省口，作“𡗗”（曾侯乙钟下一 1）“𡗗”（曾侯乙钟下二 1）。曾侯乙编钟之“𡗗”与《说文》“嗣”之古文“𡗗”当为同形字，来源不同。“𡗗”是个双声符字，古音“司”在心纽之部，“子”在从纽之部，音极近。

^①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25页。

53. 𦉳(肄)

曾侯乙编钟乐律名“姑洗”之“洗”字作“𦉳”“𦉳”，从先从聿，可隶作“肄”。旧或以为“𦉳”所从之“𦉳”为“聿”，如曾侯乙墓整理小组就把字隶作“肄”，认为字是在“先”字上加注声符“聿”。^①我们认为“肄”所从之“𦉳”乃“聿”，“肄”是个纯双声符字。曾侯乙编钟“姑洗”之“洗”又作“𦉳”，从兑聿声，可隶作“肄”，可证“肄”所从之“聿”为声符。古音“洗”在心纽文部，“先”在心纽文部，“聿”在以纽物部。楚文字资料中不乏心母和以母相通的例子，如楚文字中“雖”与“唯”同字，^②如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第十二号简文曰：“君上享成不唯本，功弗就矣。(12)……不反其本，雖强弗入矣。(15)”“唯”字作“𦉳”（简12），“雖”字作“𦉳”（简15）。《老子》甲本：“天夫唯(17)弗居也，是以弗去也。道恒无名，朴雖细，天地弗敢臣，侯王如能(18)守之……”“唯”字作“𦉳”（简17），“雖”字作“𦉳”（简18）。古音“唯”在以纽，“雖”在心纽。又如西周金文“筍”字作“𦉳”（伯筍父盃）“𦉳”（伯筍父鼎），春秋战国秦系和三晋文字沿袭西周金文之形，作“𦉳”（郑伯筍父甗）“𦉳”（《中国玺印集粹》），皆从句声，而楚系文字从尹声作“𦉳”（包山180）。“筍”（筭）为心母字，“尹”为以母字。

54. 𦉳(豫)

蔡侯钟有字作“𦉳”，刘钊先生指出字当为“豫”，从土乃繁

① 参看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注108，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515页。

② 李守奎《楚文字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7～68页。

饰。^①董莲池先生认为“土”为添加的声符。^②甚确。古音“豫”在以纽鱼部，“土”在透纽鱼部，音极近。郑张尚芳先生拟“豫”的古音为 la，“土”为 lhaa'，互为清浊音。考虑到“豫”和“土”都是独立成字的构件，可视“𡗗”为双声符字。

55. 𡗗(𡗗)

曾侯乙墓竹简有字作“𡗗”(简 81)，可隶作“𡗗”。简文曰：“乘马𡗗白羽。”四十四号简文：“屯戠𡗗羽。”整理小组认为“𡗗”是由“戠”加注声符“異”构成的，并疑“𡗗”和“戠”在简文中皆当读为“戴”或“载”。^③吴振武先生以为此说可信。^④李守奎先生指出“𡗗”当为两声字。^⑤古音“戠”在章纽职部，“異”在以纽职部，音极近。

(三) 齐系文字中的双声符字

56. 𡗗(釜)

“釜”字仅见于齐国文字，作“𡗗”(陈猷釜)“𡗗”(子禾子釜)“𡗗”(陶汇 3·1)“𡗗”(陶汇 3·5)“𡗗”(陶汇 3·23)“𡗗”(陶汇 3·722)“𡗗”(玺汇 0289)“𡗗”(玺汇 0290)。其中，陈猷釜“𡗗”从父从缶，我们认为这是个双声符字，子禾子釜、古陶汇编 3·5、古玺汇编 0289 中“釜”字从又缶声，可证“釜”可从“缶”声。古音“父”在并纽鱼部，“缶”在帮纽幽部，声韵俱近。古文字资料中不乏鱼幽相通的例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3页。

② 董莲池《金文编校补》，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3~95页。

③ 参看湖北省博物馆编《曾侯乙墓》注108和159，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④ 吴振武《古文字中的“注音形声字”》，《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文字学组：古文字与商周文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第231页。

⑤ 李守奎《楚文字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01页。

子,如“余”为以纽鱼部字,而与“余”有一字分化关系的“由”则在以纽幽部。^①

57. 𠄎(𠄎)

战国货币文有字作“𠄎”“𠄎”“𠄎”“𠄎”等形,^②旧释为“化”,吴振武先生改释为“刀”,并指出:“刀字作𠄎仅见于齐国货币铭文。我们认为齐国刀字或可加注音符“𠄎”作“𠄎”是齐地文字的一个特色,这很可能是受了齐地方言的影响,犹如三晋一带的文字中“上”字可加注音符尚作𠄎。”^③按:吴先生所言极是。“𠄎”应该是个具有齐语特色的双声符字,古音“刀”在端纽宵部,“𠄎”在端纽铎部。二字双声,韵亦可通。如“樂”从白声作“𠄎”(洹子孟姜壶)“𠄎”(齐鞞氏钟)。“譟”字从“樂”声作“𠄎”(譟季献盃)“𠄎”(吊譟父簋)，“樂”为药部字,“白”、“譟”为铎部字。

58. 𠄎(皇)

西周金文“皇”字作“𠄎”(令簋)“𠄎”(作册大鼎)“𠄎”(史兽鼎),下部从王省声,上部之“𠄎”“𠄎”象冠冕形^④。春秋时期齐系文字“皇”字作“𠄎”(齐鞞氏钟)“𠄎”(陈昉簋)“𠄎”(鞞罍),其中陈昉簋之“𠄎”上部所从已近似“古”,战国齐系文字“皇”字上部皆变从古,如“𠄎”(陈侯午罍)“𠄎”(陈侯因鬲罍)“𠄎”(齐陈曼匱)“𠄎”(鄒侯簋)。“皇”之作“𠄎”者乃双声符字。古音“皇”、“王”皆在匣纽

① 刘钊先生认为“余”字是“由”字倒置而成的。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页。

② 商承祚《先秦货币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121~123页。


③ 吴振武《战国货币铭文中的“刀”》,《古文字研究》第10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④ 张世超《金文形义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第0045条。

阳部，“古”在见纽鱼部，声韵皆近。

59.  (保)

战国时期齐国铭文“保”字作“𠄎”（陈侯因咨罍）“𠄎”（十年陈侯午罍）“𠄎”（齐侯敦）“𠄎”（鞌罍）。其中“𠄎”是在“保”字上再加声符“缶”，是部分表义的双声符字。古音“保”、“缶”都在帮纽幽部。

60.  (虚)

西周早期金文“虚”字从虎从兮作“𠄎”（何尊）“𠄎”（效卣）“𠄎”（班簋），后“虎”字中间一竖笔下垂穿透笔画作“𠄎”（毛公鼎）“𠄎”（禹鼎）“𠄎”（沈子它簋）。刘钊先生指出“虚”是个双声符字。^① 郭店楚简《唐虞之道》“虚”仍从虎从乎作“𠄎”（简 17），但《语丛一》和《语丛三》却从虎从采作“𠄎”（语丛一 60）“𠄎”（语丛三 57）“𠄎”（语丛三 68）。冯胜君先生认为这是具有齐国特点的写法。^② 我们认为“𠄎”也应该是个双声符字。古音“虎”在匣纽鱼部，“采”在并纽元部。上文我们已经论证了“𠄎”为双声符字，“害”在匣纽月部，“夫”在帮纽鱼部。齐国陈逆盂“盂”字作“𠄎”，从夫声，“盂”在见纽鱼部，可证在齐国语音中见系声母和帮系声母也存在相通的条件。






（四）晋系文字中的双声符字

61.  (怠)













“怠”字未见于春秋以前的文字资料。春秋晚期的哀成叔鼎假借“𠄎”为“怠”，其铭曰：“台（以）事康公，勿或能𠄎（怠）。”“𠄎”从“台”声，而“台”又假借为“以”，可知“𠄎”、“怠”亦当为以母字。战国文字

①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0页。







② 冯胜君《论郭店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以及上博简〈缁衣〉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2004年。

“怠”皆从以声作 (郭店·语丛一 67) “” (玺汇 2899) “” (中山王罍方壶)。其中,中山王罍方壶“”从“尸”从“怠”,“尸”与“夷”同音,读为以母,则“尸”、“怠”二字双声,韵亦不远,“尸”属脂部,“怠”属之部,“”显然是个具有方音色彩的双声符字。

62. (喬)

战国文字“喬”字异体较多,郃钟作“”“”,其中作“”者乃“喬”之本形。《说文》:“喬,高而曲也。”于省吾先生指出“喬”字的造字本义是在高字上部附加一个曲画,作为指事字的标志,以别于高,而仍因高字以为声。^① 中山王罍鼎上的“喬”字作“”,上部变从“”,“”即“九”。“”当是由郃钟作“”形上部之“中”形演变而来的。侯马盟书“” (盟书一五六·二〇) 当是“喬”由从中到从九的过渡形体。古文字“中”与“又”讹混的例子很多,此不赘举。“喬”从“”当是由“”变形音化而来的,即有意识把“喬”改造成从九声之字。古音“九”在见纽幽部,“高”在见纽宵部,“喬”在溪纽宵部,声韵俱近。因此“”当是个双声符字。

63. (尚)

战国晋系文字有字作“” (中山王罍壶) “” (侯马盟书 77:9) “” (玺汇 494) “” (玺汇 3149)。字在侯马盟书、古玺汇编 494 号玺中用作人名,在古玺汇编 3149 号玺中用为姓氏,读为“尚”,^② 在中山王罍壶中读为“上”。旧多以为“尚”为“上”之加声符字。然而,晋系文字有“上”字,作“” (中山王罍壶) “” (盗壶),而且其他几个用

①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古文字中的附划因声指事字的一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58页。

②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83页。

例都不能证明“尚”就是“上”字。中山王罍壶也有“尚”字，作“𠂔”，所以“尚”也不会是“尚”字。古音“尚”、“上”同音，“尚”就是一个纯双声符字。

64. 𠂔(旆)

中山王罍方壶有字作“𠂔”，铭曰：“燕𠂔君子儉，新君子之，不用礼仪，不辨逆顺，𠂔邦亡身死。”“𠂔”从“𠂔”从“𠂔”，“𠂔”即“旆”，同器“施”字作“𠂔”可证；“𠂔”即“古”，中山王罍方壶“古”字作“𠂔”可证其是，故字可隶作“旆”。“旆”在铭文中都读为“故”。“旆”应该是个具有中山王国语音特色的方言字，“旆”所从之“旆”也表音，“旆”是个双声符字。古音“旆”在影纽元部，“古”在见纽鱼部，声韵俱近。

65. 𠂔(𠂔)

中山王墓出土的鸟柱盆有人名，字作“𠂔”，从北从𠂔，可隶作“𠂔”。何琳仪先生疑“𠂔”为“𠂔”之繁文。^①西周金文“福”可从北声作“𠂔”（周乎卣）“𠂔”（或者鼎），可证“𠂔”是个双声符字。古音“北”在帮纽职部，“𠂔”在并纽职部。从中山王墓出土的文字资料来看，当时中山王国语音中清浊不分，如圆壶铭文用“皮”（并）为“彼”（帮），方壶“即”（精）当读为“次”（从），“傅”假借“備”（并）为之，“勤”（群）用为“覲”（见），等等。因此，“𠂔”为双声符字无疑。

66. 𠂔(𠂔)

侯马盟书委质类有人名“先𠂔”，“𠂔”字或从心从侃作“𠂔”（194：12），或从言从侃作“𠂔”（185：7）“𠂔”（203：10）。从言的“𠂔”与《说文》“愆”之籀文作“𠂔”相合，故学者以之为“愆”之或体。

①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6页。

旧以为“𠄎”从言侃声，其实“言”亦表音，“𠄎”是个部分表意的双声符号。古音“愆”、“𠄎”为溪纽元部字，“言”在疑纽元部，音极近。

67. 𠄎(頡)

“頡”字最早见于春秋时期晋国的郟钟，字作“𠄎”。《说文》：“直项也。从頁吉声。”旧多因袭《说文》，以为“頡”是个形声字，其实“頡”当是个部分表意的双声符号。古音“頡”、“頁”在匣纽质部，“吉”在见纽质部，音极近。

68. 𠄎(料)

《说文》：“料，量物分半也。从斗从半，半亦声。”侯马盟书“宗盟类”：“敢不料(判)其腹心”之“料”作“𠄎”(1:1)“𠄎”(98:28)，又作“𠄎”(156:1)“𠄎”(1:31)等形。吴振武先生认为“料”之作“𠄎”“𠄎”等形者是在“𠄎”“𠄎”这类形体上加注声符“門”而成的。^①在战国三晋文字中“門”和“𠄎”都具有独立的形音义。因此，我们认为“料”之作“𠄎”“𠄎”等形者可视为双声符号。

(五)燕系文字中的双声符号

69. 𠄎(罍)

燕王罍戈、矛中之“罍”字作“𠄎”(燕王罍矛)“𠄎”(燕王罍戈)，“燕王罍”即《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载的“燕王哙”。《古玺汇编》3892号玺有人名“公孙罍”，“罍”字作“𠄎”，“罍”当是燕国习见人名。“罍”是个双声符号，古音“𠄎”在晓纽元部，“言”在疑纽元部，“哙”在溪纽月部，音极近。

^① 吴振武《古文字中的“注音形声字”》，《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文字学组：古文字与商周文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第230页。

(六) 其他

70. 戠(戟)

战国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戟”的写法截然不同，秦系作“戠”
(睡虎地·法律答问 85)“戠”^①(大良造鞅戟)，皆从戈从戠；六国文字
则从丰从戈作“戠”^②(元阿左戟)“戠”^③(新昭戟)“戠”^④(曾侯乙戟)“戠”^⑤
(包山 61)“戠”^⑥(析君戟)，或从戠声作“戠”^⑦(陵右戟)，或从建声作
“戠”^⑧(曾侯乙戟)“戠”^⑨(敫戟)“戠”^⑩(曾 37)。其中从丰从戈的“戠”
以及从建从戈的“戟”，我们认为是双声符字。古音“丰”在见纽月部，
“戈”在见纽歌部，“建”在见纽元部，音极近。

71. 𦍋(兼)

西周早期的兼史尊有“兼”字，作“𦍋”，从羊从永。春秋战国齐
系文字和楚系文字“永”常借“兼”为之，如鄒子匡“𦍋”、𦍋君壶
“𦍋”、陈逆簋“𦍋”皆当读为“永”，可知在楚音和齐语中“兼”与“永”
同音，“兼”是个双声符字。

72. 𠄎(伺)

金文有字作“𠄎”^①(趯盂)“𠄎”^②(姒伯簋)“𠄎”^③(姒伯簋)“𠄎”^④(伯
康簋)“𠄎”^⑤(伯震鼎)“𠄎”^⑥(鄒平钟)“𠄎”^⑦(王孙钟)“𠄎”^⑧(南疆钲)
“𠄎”^⑨(邓公簋)“𠄎”^⑩(秀姒君鼎)“𠄎”^⑪(齐鞞氏钟)等形，在铭文中皆
当读为“姒”，《金文编》释为“似”。然而，从字形来看，此字所从之
“𠄎”“𠄎”“𠄎”并非“人”，而是与“司”近似。金文“司”字作“𠄎”^⑫(墙盘)
“𠄎”^⑬(大梁鼎)“𠄎”^⑭(趯盂)“𠄎”^⑮(鬲壶)。因此作“𠄎”“𠄎”者可看
作从以从司，^⑯作“𠄎”形者亦可分析为从以从司。从字音来看，此

① “𠄎”所从之“𠄎”乃繁饰。台、以同字一直到战国时期仍未分化，“台”、“以”仍同音。

字皆读为“姒”，而金文“姒”可从“𠃉”声作“𠃉”（吊向父簋）“𠃉”（颂鼎），也可从司声作“𠃉”（保惟母壶）“𠃉”（姒簋）“𠃉”（者姒鬯），还可从“𠃉”声作“𠃉”（班簋）“𠃉”（乙未鼎），可见“以”、“司”、“𠃉”同音。何琳仪先生曾指出“𠃉”为双重标音字，^①今可知“𠃉”为双声符字确切无疑。

^①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25页。

引用书目简称表

《殷墟书契前编》	《前》
《殷墟书契后编》	《后》
《殷墟书契续编》	《续》
《殷契粹编》	《粹》
《甲骨文合集》	《合》
《小屯南地甲骨》	《屯》
《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	《怀》
《英国所藏甲骨集》	《英》
《殷周金文集成》	《集成》
《秦铭刻文字选》	《秦铭》
《古玺汇编》	《玺汇》
《秦印文字汇编》	《秦印》
《汉印文字征》	《汉印》
《古陶文字征》	《陶征》
《古陶文彙录》	《彙录》
《秦代陶文》	《秦陶》
《古陶文汇编》	《陶汇》
《古币文编》	《古币》
《先秦货币文编》	《货币》
《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先秦卷》	《货系》

《侯马盟书》	《侯马》
《包山楚简》	《包山》
《望山楚简》	《望山》
《郭店楚墓竹简》	《郭店》
《江陵砖瓦厂 270 号墓竹简》	江陵 M270
《天星观遗策》	《天遣》
《天星观卜筮简》	《天卜》
《仰天湖楚简》	《仰》
《长沙楚帛书》	《帛书》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1—6)	《上博》
《曾侯乙墓》	《曾》
《九店楚简》	《九店》
《信阳楚墓》	《信阳》
《新蔡葛陵楚墓》	《新蔡》
《睡虎地秦墓竹简》	《睡虎地》
《龙岗秦简》	《龙》
《放马滩秦简》	《放》
《马王堆汉墓帛书》	《马王堆》
《银雀山汉墓竹简》	《银雀山》
《张家山汉简》	《张家山》
《武威汉代医简》	《武威》
《阜阳汉简诗经研究》	《阜阳》
《秦文字集证》	《集证》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石鼓文研究》	《石鼓》
《郭沫若全集·考古编·诅楚文考释》	《诅楚》

参考文献

一、上古音研究方面

A

敖小平《“‘古无轻唇音’不可信”补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

B

白一平《上古汉语 *sr-的发展》，《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

包拟古著，潘悟云、冯蒸译《原始汉语与汉藏语》，中华书局1995年版。

鲍厚星《湖南邵阳方言音系》，《方言》1989年第3期。

毕鹗《甲骨文所见若干上古汉语复声母问题蠡测》，《声韵论丛》第6辑，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版。

C

曹兆兰《金文中方言“孀”与雅言“母”的相因生义》，《方言》2002年第2期。

陈保亚《论禅船崇母的分化规律——兼说“有条件音变”和“音变规律”》，《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2002年。

陈秉新《古韵东冬不分续考》，《阜阳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

陈秉新《害为胡簋之胡本字说》，《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陈初生《上古见系声母发展中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1期。

陈大为《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说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陈代兴《殷墟甲骨刻辞音系研究》，《甲骨语言研讨会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陈独秀《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

陈独秀《中国古代语音有复辅音说》，《陈独秀音韵学论文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

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陈鸿《从战国文字的谐声看战国语言的阳声韵》，《康乐集》（曾宪通教授七十寿庆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陈鸿《战国形声字之异体与战国古音研究》，《闽江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陈抗《金文假借字研究》，中山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1981年。

[宋]陈彭年《宋本广韵》，中国书店1982年版。

陈伟武《出土文献之于古汉语研究十年回眸》，《古汉语研究》1998年第4期。

陈新雄《群母古读考》，《锲不舍斋论学集》，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版。

陈瑶玲《简帛通假字中的古声母现象》，第二届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讨会寒假简帛营论文，2006年。

陈振寰《论古韵东冬江三分》，《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

陈振寰《音韵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陈忠敏《鄞县方言同音字字汇》，《方言》1990年第1期。

崔枢华《说文解字声训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D

笄远毅《古汉语复辅音声母 ml-考》，《语言研究集刊》第 1 辑，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丁邦新《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

[宋]丁度《集韵》，中国书店 1983 年版。

丁启阵《论古无复辅音声母》，澳门语言学会，2000 年。

丁启阵《秦汉方言》，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

董琨《周原甲骨文音系特点初探》，《语言》（第一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董同龢《与高本汉商榷“自由押韵”说兼论上古楚方言特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册），1939 年。

董同龢《中国语音史》，华冈出版有限公司 1978 年版。

段玉裁（清）《六书音均表》，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F

方孝岳《论谐声音系的研究和之部韵读》，《古文字与汉语史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冯靛芸《通假字的发展演变及其在汉字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年。

冯潇《历史音变中的循环现象初探》，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年。

冯蒸《〈说文〉中应有两个“去”字说——上古“去”字 * -b 尾说质疑》，《汉字文化》1991 年第 2 期。

冯蒸《论汉语上古声母研究中的考古派与审音派——兼论运用谐声系统研究上古声母特别是复声母的几个问题》，《汉字文化》1998 年第 2 期。

冯蒸《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与古代印度语言中的 -am > -o, -u 型音变》，《古汉语研究》1993 年第 3 期。

傅东华《汉语声纽变转之定律》，《学林》第10辑，1941年。

傅铭《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一)通假字浅析》，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G

高亨《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版。

葛信益《〈广韵〉讹夺举正》(增订稿)，《音韵学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葛信益《〈广韵〉异读字有两体皆声者》，《中国语文》1985年第5期。

耿振生《20世纪汉语音韵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龚嘉镇《从“台”谐声系统的古今音变》，《汉字汉语汉文化论集》，巴蜀书社2002年版。

龚维英《上古秦、楚同源初探》，《江汉考古》1999年第2期。

古敬恒《论通假字的时代层次》，《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管燮初《从〈说文〉中的谐声字看上古汉语声类》，《中国语文》1982年第1期。

管燮初《从甲骨文的谐声字看殷商语言声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1988年。

管燮初《据甲骨文谐声字探讨殷商韵部》，纪念王力先生九十寿辰语言学讨论会论文，1990年。

郭辉雄《古医籍通假字集释》，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

郭锦华《上古汉语无鼻音韵尾吗》，《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2期。

郭启熹《龙岩方言研究》，纵横有限公司1996年版。

郭锡良《西周金文音系初探》，《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郭锡良《殷商时代音系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H

何大安《规律与方向——变迁中的音韵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何九盈《古无去声补证》，《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何九盈《商代复辅音声母》，《音韵丛稿》，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何九盈《上古音》，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何九盈《音韵丛稿》，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何琳仪《幽脂通转举例》，《古汉语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96年版。

贺德扬《汉字德词根音谐声——兼释甲骨文束、帝、丙、商字》，汉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1年。

洪家义《令命的分化》，《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洪扬《20世纪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上古音进展述评》，《渤海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洪扬《古文字考释中的通假关系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胡先泽《诗经东汉齐音考》，《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华学诚《汉语方言学史研究》，艺文印书馆2001年版。

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黄淬伯《唐代关中方言音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黄典诚《黄典诚语言学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黄侃《文字声韵训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黄绮《论古韵分部及支、脂、之是否应分为三》，《河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黄绮《之、鱼不分,鱼读入之》,《河北学刊》1992年第2期。

黄人二《从战国竹简之脂、中侵通押现象论之脂支、冬(中)东分部问题》,第九届国际暨廿三届全国声韵学学术研讨会论文,1994年。

黄叔先《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探源》,《语言研究》2001年第3期。

J

姜允玉《中山王铜器铭文中的音韵现象初探》,《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

金理新、张小萍《精组的上古读音构拟》,《温州师范学院》2000年第4期。

金理新《上古汉语音系》,黄山书社2002年版。

金颖若《从两周金文用韵看上古韵部阴入间的关系》,《语言研究》1994年增刊。

金颖若《吉金奏雅——从东周列国金文韵文蠡测雅言的存在》,《语言研究》1998年增刊。

金颖若《两周金文韵部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3年。

K

柯蔚南著、李玉译《东汉音注的声母系统》,《音韵学研究通讯》1983年4期,又收入《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孔仲温《殷商甲骨谐声字之音韵现象初探——声母部分》,《孔仲温教授论学集》,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版。

L

李存智《秦汉简牍帛书之音韵学研究》,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

所博士学位论文,1995年。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李恭《陇右方言发微》,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李家浩《从战国“忠信”印谈古文字中的异读现象》,《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李瑾《释“自”——论“自”与“鼻”之音义关系及其语音发展》,《华夏考古》1994年第1期。

李娟《章组字的历史演变——附论现代方言与古音研究的关系》,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1年。

李开《戴震语文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李戎《中医药通假字字典》,上海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

李荣《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李荣《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中国语文》1965年第2期。

李如龙《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李如龙《论汉语方言的类型学研究》,《暨南学报》1996年第2期。

李水海《上古楚语历时考释》,《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

李新魁《汉语音韵学研究概况及展望》,《音韵学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李新魁《李新魁音韵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李新魁《论〈切韵〉系统中床禅和分合》,《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李新魁《论侯鱼两部的关系及其发展》,《李新魁音韵学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李新魁《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学术研究》1963年第2期。

李新魁《上古音“之”部及其发展》,《广东社会科学》1991年第3

期。

李毅夫《上古韵祭月是一个还是两个韵部》，《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李毅夫《上古韵是否有个独立的冬部》，《语文研究》1982 年第 2 期。

李玉《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版。

李玉《秦汉之际楚方言中的 ml-复辅音声母》，汉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1 年。

李裕民《楚方言初探》，《中国语文研究》1987 年第 9 期。

林亦《喻四归匣——古以母演变的另一形式》，《语言研究》2004 年第 1 期。

林英津《从“黑鈇之错”论古汉语若干声符置换的异体字》，《语言学问题集刊》第 1 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林语堂《古有复辅音说·林语堂名著全集·语言学论丛》（第 19 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林语堂《燕齐鲁卫阳声转变考》，《林语堂名著全集·语言学论丛》（第 19 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刘宝俊《〈秦汉帛书音系〉概述》，《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 年第 1 期。

刘宝俊《冬部归向的时代和地域特点与上古楚方言》，《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0 年第 5 期。

刘宝俊《马王堆出土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用韵研究》，《语言研究》1996 年增刊。

刘凤山《隶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年。

刘冠才《论祭部》，《古汉语研究》2004 年第 2 期。

刘钧杰《同源字典补》，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

刘钧杰《同源字典再补》，语文出版社 1999 年版。

刘钊《谈古文字资料在古汉语研究中的重要性》，《古文字考释丛稿》，岳麓书社 2005 年版。

刘志成《楚方言考略》，汉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1年。

刘志成《祭部与上古汉语方言》，《川东学刊》1995年第1期。

刘志成《西周金文音系的声母》，《语言学问题集刊》，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鲁国尧《对诗经音系阴声韵具辅音韵尾说的思考》，第九届国际暨廿三界全国声韵学学术研讨会论文，1994年。

陆志韦《古音说略》，哈佛燕京学社1947年版。

陆志韦《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

罗常培、周祖谟《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1年。

罗福颐《临沂汉简通假字表》，《古文字研究》第11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罗江文《从金文看上古邻近韵的分立》，《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3期。

罗江文《〈诗经〉与两周金文韵部比较》，《思想战线》2003年第5期。

罗江文《〈诗经〉与两周金文韵文押韵方式比较》，《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3期。

罗江文《从金文用韵和文字统一性看两周雅言书面语》，《玉溪师专学报》1995年第1期。

罗江文《两周金文用韵初探》，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3年。

罗江文《两周金文韵例》，《玉溪师专学报》1994年第1—2期。

罗江文《谈两周金文合韵的性质——兼及上古“楚音”》，《楚雄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

M

梅祖麟《跟见系字谐声的照三系字》，《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第1期。

梅祖麟《古代楚方言中“夕(𣎵)”字的词义和语源》，《方言》1981年第3期。

梅祖麟《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中国语文》1993年第3期。

梅祖麟《从楚简“𣎵”(美)字看脂微两部的分野》，《语言学论丛》第32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孟传书《古汉语异读字说》，《古汉语研究》1982年第1期。

孟美菊《武威汉简〈仪礼〉异文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孟蓬生《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P

潘悟云《高本汉以后汉语音韵学的进展》，《温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2期。

潘悟云《汉、藏语历史比较中德几个声母问题》，《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潘悟云《喉音考》，《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潘悟云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潘悟云《流音考》，《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潘悟云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潘悟云《上古收-p、-m诸部》，《温州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

潘悟云《谐声现象的重新解释》，《温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

潘悟云《中古汉语擦音的上古来源》，《温州师院学报》1990年第

4 期。

潘悟云《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潘悟云卷》，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庞光华《论汉语上古音无复辅音声母》，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版。

裴学海《古声纽“船”“禅”为一“从”“邪”非二考》，《河北大学学报》1961 年第 1 期。

彭占清《“两周金文押韵方式”志疑》，《古汉语研究》2004 年第 1 期。

蒲立本著，潘悟云、徐文堪译《上古汉语辅音系统》，中华书局 1999 年版。

Q

齐冲天《关于谐声字的声母》，《汉语论丛》第 1 辑，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钱玄《金文通借释例》，《南京大学学报》1986 年第 2 期。

钱玄《秦汉帛书简牍中的通借字》，《南京师院学报》1980 年第 3 期。

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四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裘锡圭《从殷墟卜辞的“王占曰”说到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中国语文》2002 年第 1 期。

裘锡圭《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中国语文》1979 年第 6 期。

全广镇《西周金文通假字研究》，台湾学生书局 1989 年版。

S

沙加尔著，郭建荣译《论去声》，《语文研究》1988 年第 3 期。

邵荣芬《古韵幽、宵两部在后汉时期的演变》，《语言研究》1983

年第1期。

邵荣芬《古韵鱼侯两部在前汉时期的分合》，《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第1期。

邵荣芬《汉语语音史讲话》，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邵荣芬《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邵荣芬《试论上古音中的常船两声母》，《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邵荣芬《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试析》，《语言研究》1990年第1期。

邵荣芬《匣母字上古一分为二再证》，《中国语言学报》1995年第7期。

申红义《近年出土楚简和典籍中的通假异文与上古声母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沈建民《试论异读——从〈经典释文〉音切看汉字的异读》，《语言研究》2002年第3期。

师玉梅《西周金文音韵考察》，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师玉梅《以西周铜器铭文研究西周音系的可行性》，《殷都学刊》2003年第4期。

师玉梅《喻四、书母古音考——由金文舍从余母说开》，《语言研究》2003年增刊。

施向东《试论上古音幽宵两部与侵缉谈盍四部的通转》，《天津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时建国《从临沂汉简、长沙帛书通假字再证古声十九纽》，《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6期。

时建国《上古汉语复声母研究中的材料问题》，《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2期。

史存直《汉语音韵学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史存直《古音“东、冬”两部的分合问题》，《汉语音韵学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史存直《古音“祭”部是独立的韵部吗》，《汉语音韵学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史存直《古韵“之”“幽”两部之间的交涉》，《音韵学研究》第 1 辑，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史存直《关于古韵“脂、支、歌”三部之间的关系》，《汉语音韵学论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史存直《汉语语音史纲要》，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

舒志成《〈诗经〉押韵与〈说文〉谐声中的方音》，《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 年第 4 期。

孙常叙《以齿音和牙音疑母构成的复辅音初步探索》，《孙常叙古文字学论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孙玉文《汉语变调构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孙玉文《上古汉语四声别义例证》，《古汉语研究》1993 年第 1 期。

孙玉文《试论跟明母谐声的晓母字的语音演变（一）》，《古汉语研究》2005 年第 1 期。

孙玉文《先秦联绵词的声调研究》，《语言学论丛》第 26 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

T

唐兰《论古无复声母，凡来母字皆读如泥母》，《清华学报》1937 年第 2 期。

唐作藩《〈说文〉“读若”所反映的声调现象》，《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

唐作藩《从同源词窥测上古汉语的复辅音声母》，《中国语言学报》1994 年第 7 期。

田明《秦汉竹简帛书的异文别字及其语音系统》，《古汉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

W

汪启明《临沂汉简〈孙臆兵法〉用韵研究》，《汉小学文献语言研究丛稿》，巴蜀书社 2003 年版。

汪启明《先秦两汉齐语研究》，巴蜀书社 1998 年版。

汪启明《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臆兵法〉通假字分析》，《汉小学文献语言研究丛稿》，巴蜀书社 2003 年版。

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语文出版社 1999 年版。

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王国维遗书》（六），上海古籍书店 1983 年版。

王辉《古文字通假释例》，艺文印书馆 1993 年版。

王辉《研究古文字通假的必要性与应遵循的原则》，《一粟集》，艺文印书馆 2002 年版。

王健庵《“古无轻唇音”之说不可信》，《安徽大学学报》1983 年第 1 期。

王健庵《〈诗经〉用韵的两大方言韵系——上古方音初探》，《中国语文》1992 年第 3 期。

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王力《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王珊珊《古汉语复辅音声母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年。

王文耀《殷周文字声类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年版。

王玉堂《侵宵对转说与词的音义关系研究》，《古汉语研究》1991 年第 3 期。

尉迟治平《从“风、雷、雨、电”论夷语、楚语、羌语和雅言》，《语言研究》1991 年增刊。

尉迟治平《说之——兼论跟舌音相通的章组的上古音》，汉语言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1年。

魏建功《上古音系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

吴安其《汉藏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中的古文、假借、俗省字》,《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吴其昌《来纽明纽古复辅音通转考》,《清华学报》1932年第1期。

吴文祺《上古音中的几个问题——评王力〈诗经韵读〉》,《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吴泽顺《汉语音转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

X

谢纪锋《〈说文〉读若韵母系统考》,《音史探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

谢纪锋《从〈说文〉读若看古音四声》,《罗常培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徐德庵《古代汉语论文集》,巴蜀书社1991年版。

徐通锵《音系的结构格局和内部拟测法(上)(下)》,《语文研究》1994年第2、3期。

徐正考《“求”“裘”古韵考——附论〈诗〉韵二字异部之成因》,《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寻仲臣《论中古船禅二母的分合演变》,《古汉语研究》1994年第2期。

Y

雅洪托夫(苏)《汉语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严学宥《论〈说文〉谐声阴·入互谐现象》,《音韵学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

杨薇《上古声类清浊不分现象的古文字形音角度考察》，《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杨剑桥《〈说文解字〉读若研究》，《语言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杨剑桥《论端、知、照三系声母的上古来源》，《语言研究》1986年第1期。

杨剑桥《上古汉语的声调》，《语文论丛》，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易国杰《〈史记〉通假字汇释》，苏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修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于省吾《从古文字学方面来评判清代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的得失》，《吉林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于省吾《释𠄎、吕兼论古韵东冬的分合》，《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版。

余迺永《两周金文音系考》，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81年。

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俞敏《四声平议》，《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俞敏《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虞万里《从古方言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榆枋斋学术论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虞万里《榆枋斋学术论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喻遂生《〈老子〉用韵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喻遂生《纳西东巴字、汉古文字中的“转意字”和殷商古音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喻遂生《西周金文韵文和先秦“楚音”》，《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3年第2期。

袁仲一《秦文字通假集释》，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Z

臧正一《尹湾汉简〈神乌赋〉音韵研究》，《古文字与古文献试刊号》，1999年。

曾明路《上古押韵字的条件异读》，《中国语文》1987年第1期。

曾宪通《从“𧈧”符之音读再论古韵部东冬的分合》，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1997年。

曾宪通《再说“𧈧”符》，《古文字研究》第25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

曾晓渝《见母的上古音值》，《中国语文》2003年第2期。

张博《先秦有四声新证》，《宁夏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张洁《张家山汉简通假字所反映的西汉时期声母特点》，《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第2辑，巴蜀书社2006年版。

张琨《汉语音韵史中的方言差异》，《汉语音韵史论文集》，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张民权《清代前期古音学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张青松《郭店楚简通假字初探》，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张清常《上古音 * -b 尾遗迹》，《音韵学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

张儒《关于竹书、帛书通假字的考察》，《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张世禄《汉语语音发展的规律》，《语文论丛》(一)，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张世禄《论上古带 r-复辅音声母》，《复旦学报》1986年第5期。

张树铮《“齐人言殷如衣”补释》，汉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1991年。

张树铮《从上古地名异称看上古声母》，《古汉语研究》1991年第3期。

张显成《论简帛文献的语言研究价值》，《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第1辑，巴蜀书社2002年版。

张永言《关于上古汉语的送气流音声母》，《音韵学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张永言《酈道元语言论拾零》，《中国语文》1969年第3期。

张永言《语文学论集》（增补本），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

张涌泉《论“音随形变”》，《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1995年版。

张玉金《二十世纪殷代语音研究的回顾暨展望》，《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4期。

张振林《谈谐声的慢声音变——兼谈从由从兔等一类字的读音》，广东省语言学会年会论文，2005年。

章太炎《章氏丛书·国故论衡上》，右文社1912—1949年版。

赵秉璇《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赵诚《临沂汉简的通假字》，《音韵学研究》第2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

赵诚《商代音系初探》，《音韵学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赵诚《上古谐声和音系》，《古汉语研究》1996年第1期。

赵克刚《〈经典释文〉郑玄音声母研究》，《古汉语研究》1989年第3期。

赵立伟《〈睡虎地秦墓竹简〉通假字、俗字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赵平安《秦汉简帛通假字的文字学研究》，《河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

赵彤《以母的上古来源及相关问题》，《语言研究》2005年第4期。

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5 年版。

赵振兴、陈灿《〈周易〉通行本与帛书本异文声母研究》，《古汉语研究》2003 年第 3 期。

郑张尚芳《从硕人镜“齐夷”通假谈上古精组声母的取值》，《音史新论——庆祝邵荣芬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学苑出版社 2005 年版。

郑张尚芳《汉语介音的来源分析》，《语言研究》1996 年增刊。

郑张尚芳《汉语塞擦音声母的来源》，《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郑张尚芳《上古汉语的 S-头》，《温州师专学报》1990 年第 4 期。

郑张尚芳《上古音构拟小议》，《语言学论丛》第 14 辑，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郑张尚芳《上古音研究十年回顾与展望（一）》，《古汉语研究》1998 年第 4 期。

郑张尚芳《上古韵母系统和四等、介音、声调的发源问题》，《温州师院学报》1987 年第 4 期。

郑张尚芳《中古三等专有非、章组、日喻邪等母的来源》，《语言研究》2003 年第 6 期。

周长楫《浊音清化溯源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语文》1990 年第 4 期。

周玉秀《古声不清浊说》，《西北师大学报》1993 年第 6 期。

周祖谟《方言校笺》，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周祖谟《古音有上去二声说》，《文字音韵训诂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周祖谟《汉代竹书与帛书中的通假字与古音的考订》，《音韵学研究》第 1 辑，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周祖谟《汉字上古音东冬分部的问题》，《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周祖谟《问学集》，中华书局 1966 年版。

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朱声琦《段氏注〈说文〉，重韵不重声》，《山东师大学报》1996 年第 1 期。

朱声琦《论齿音》，《山东师大学报》1999 年第 1 期。

朱声琦《论喉牙声转——兼评“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语言研究》1996 年增刊。

朱声琦《论同系声母内部可以互转(上、下)》，《山东师大学报》2000 年第 1、2 期。

竺家宁《古汉语复声母研究》，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1 年。

竺家宁《由形声、假借考复辅音的可行性》，《鲁实先先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所·中国文字学，1982 年。

祝敏彻《从汉儒声训看上古韵部——兼论阴、阳、入三声分立》，《兰州大学学报》1984 年第 2、3 期。

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1974 年第 9 期。

二、古文字研究方面

B

白于蓝《释包山楚简中的“巷”字》，《殷都学刊》1997 年第 3 期。

白于蓝《释中山王璽方壶中的“属”字》，《古文字研究》第 25 辑，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白于蓝《释褒——兼谈褒、秀一字分化》，《中国古文字研究》第 1 辑，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C

蔡信发《形声字同形异字之商兑》，《第十三届暨海峡两岸中国文字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 2002 年版。

曹锦炎《甲骨文合文新释》，《古文字研究》第 22 辑，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曹锦炎《甲骨文合文研究》，《古文字研究》第 19 辑，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常玉芝《“甯孳方鼎”铭文及相关问题》，《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陈邦怀《一得集》，齐鲁书社 1989 年版。

陈邦怀《战国楚帛书文字考证》，《古文字研究》第 5 辑，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陈秉新《害为胡簋之胡本字说》，《考古与文物》1990 年第 1 期。

陈初生《金文常用字典》，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陈汉平《金文编订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陈剑《甲骨文“戠”字的补释》，《古文字研究》第 25 辑，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陈剑《据郭店简释读西周金文一例》，《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二)，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1 年版。

陈剑《释“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 年第 4 期。

陈剑《释展》，《追寻中华古代文明的踪迹——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陈剑《释西周金文的“鞞”(鞞)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集刊》(一)，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陈剑《释造》，《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 1 辑，复旦大学 2006 年。

陈剑《说慎》，《简帛研究》(2001)，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陈剑《殷墟卜辞的分期分类对甲骨文字考释的重要性》，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年。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陈世辉《略论〈说文解字〉中的省声》，《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陈双新《释乐》，《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陈斯鹏《“𠂔”为“泣”之初文说》，《古文字研究》第25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

陈松长《马王堆简帛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陈伟武《简帛兵学文献探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陈伟武《双声符字综论》，《中国古文字研究》第1辑，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陈伟武《同符合体字探微》，《中山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陈伟武《战国秦汉同形字论纲》，《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陈炜湛、唐钰明《古文字学纲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陈炜湛《甲骨文简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陈炜湛《甲骨文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陈炜湛《甲骨文形体结构的特点》，《甲骨文简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陈炜湛《甲骨文异字同形例》，《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陈曦、陆炆《试析殷墟甲骨文中“萑”与“萑”的关系》，《古文字研究》第23辑，中华书局·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陈昭容《隶书起源问题重探》，《南大语言文化学报》第2卷第2期，1997年。

陈镇卿《古文字构形析论——从〈说文解字〉古籀文到甲骨文字》，《许铨辉教授七秩祝寿论文集》，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

丛文君《隶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

崔恒升《安徽出土金文订补》，黄山书社1998年版。

D

大西克也《论古文字资料中的“邦”和国》，《古文字研究》第 23 辑，中华书局·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大西克也《论古文字资料中的“害”字及其读音问题》，《古文字研究》第 24 辑，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戴家祥《金文大字典》，学林出版社 1998 年版。

董琨《古文字形体讹变对〈说文解字〉的影响》，《中国语文》1991 年第 3 期。

董琨《周原甲骨文与汉字形体发展》，《古汉语研究》1994 年增刊。

董莲池《〈甲骨文编〉正编笺识》，《出土文献研究》第 3 辑，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董莲池《金文编校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杜忠诤《说文篆文讹形释例》，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2002 年版。

F

方勇《战国楚文字中的偏旁形近混同现象释例》，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年。

冯胜君《论郭店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以及上博简〈缁衣〉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04 年版。

冯胜君《释战国文字中的“怨”》，《古文字研究》第 25 辑，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G

甘肃省博物馆、武威县文化馆《武威汉代医简》，文物出版社 1975 年版。

高明《高明论著选集》，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高明《古体汉字义近形旁通用例》，《中国语文研究》第4辑，香港中文大学，1982年。

高明《古文字的形旁及其形体演变》，《古文字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

高明《略论汉字形体研究的一些规律》，《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2期。

高明《略论汉字形体演变的一般规律》，《高明论著选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

高明《谈汉字中的别体和误字》，《高明论著选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3期。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考古编·金文丛考》，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修订版），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

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

郭沫若《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释说到殷代已在进行文字简化》，《文物》1959年第7期。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帛书》（一），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帛书》（三），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马王堆帛书》（四），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H

汉语大字典字形编写组《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四川辞书出版社 1985 年版。

郝士宏《古文字同源分化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 年。

郝士宏《释壶、壹》，《古文字研究》第 25 辑，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郝文勉《甲骨文编码的线性结构》，《郑州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

何琳仪、黄锡全《黠簋考释六则》，《古文字研究》第 6 辑，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何琳仪《九里墩鼓座铭文新释》，《出土文献研究》第 3 辑，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何琳仪《说文声韵钩沉》，《说文解字研究》第 1 辑，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何琳仪《战国兵器铭文选释》，《古文字研究》第 20 辑，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 2003 年版。

胡平生、韩自强《阜阳汉简诗经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三编·读契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版。

湖北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

湖北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简》，文物出版社 1991 年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望山楚简》，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金文引得·春秋战国卷》，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黄德宽、陈秉新《汉语文字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黄德宽《对古代文字发展沿革内在关系的探索与揭示——关于〈古文字谱系疏证〉》，《学术界》2005 年第 1 期。

黄德宽《古汉字形声结构论考》，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 年。

黄德宽《汉字构形方式的动态分析》，《安徽大学学报》2003 年第 4 期。

黄德宽《汉字构形方式——一个历时态演进的系统》，《安徽大学学报》1994 年第 3 期。

黄德宽《论形声结构的组合关系、特点合性质》，《安徽大学学报》1997 年第 3 期。

黄德宽《曾姬无恤壶铭文新释》，《古文字研究》第 23 辑，中华书局·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黄丽娟《战国多声字研究》，《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黄启方《齐国彝铭汇考》，崇实彩艺印刷有限公司，1990 年。

黄盛璋《战国冶字结构类型与分国研究》，《古文字论集（初编）》，香港中文大学，1983 年。

黄天树《略论甲骨文中的省形和省声》，吉林大学《语言文字论坛》第 1 辑，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 2002 年版。

黄天树《释殷墟甲骨文中的“羞”字》，《古文字研究》第 25 辑，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黄天树《殷墟甲骨文“有声字”的构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6 本第 2 分册，2005 年。

黄文杰《“谷”及相关诸字考辨》，《古文字研究》第 24 辑，中华书

局 2002 年版。

黄文杰《秦汉时期形声字义近形旁换用现象考察》，《康乐集》（曾宪通教授七十寿庆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黄文杰《战国时期形声字声符换用现象考察》，《古文字与汉语史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黄文杰《战国文字中的类化现象》，《古文字研究》第 26 辑，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黄锡全《楚系文字略论》，《华夏考古》1990 年第 3 期。

黄锡全《汗简注释》，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黄锡全《先秦货币文字形体特征举例》，《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J

季旭升《说文新证》（上），艺文印书馆 2002 年版。

季旭升《说文新证》（下），艺文印书馆 2004 年版。

江学旺《从西周金文看汉字构形方式的演化》，《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 年第 2 期。

江学旺《浅谈古文字异体糅合》，《古汉语研究》2004 年第 1 期。

江学旺《西周金文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年。

金国泰《讹变三题》，《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89 年第 3 期。

金俊秀《文字的糅合》，《第十八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 年。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8 年版。

L

赖明德《假借析论》，《鲁实先先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所·中国文字学，1982 年。

李国英《小篆形声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李家浩《包山楚简“籥”字及其相关之字》，《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

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1997年，后收入《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李家浩《楚大府鎬铭文新释》，《语言学论丛》第22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李家浩《战国官印考释三篇》，《出土文献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李家浩《战国货币文字中的“甬”和“比”》，《中国语文》1980年第5期。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补正》，《古文字研究》第20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5年版。

李圃《甲骨文文字学》，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李圃《中国正统文字的发端——殷商甲骨文字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地位》，《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李圃《字素理论与汉字分析问题》，《中国文字研究》第2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李儒松《郭店楚墓竹简字迹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李蕊《战国晋系文字资料地域特征研究》，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李善洪《简论周代金文省体字》，《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

李守奎《楚文字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李守奎《楚玺文字六考》，《古文字研究》第25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

李天虹《楚简文字形体混同、混讹举例》，《江汉考古》2005年第3期。

李孝定《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0年

版。

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

李新魁《从“同音”现象看语音与文字的某些关系》，《辞书与语言》，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李学勤《论殷墟卜辞的新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李学勤《论殷墟卜辞的新星》，《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李学勤《秦封泥与齐陶文中的“巷”字》，《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李学勤《秦玉牋索隐》，《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2期。

李学勤《青铜器中的簠与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李学勤《戎生编钟论释》，《文物》1999年第9期。

李学勤《试论新发现的鞞方鼎和荣仲方鼎》，《文物》2005年第9期。

李学勤《释“改”》，《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李学勤《说“兹”与“才”》，《古文字研究》第24辑，中华书局2002年版。

李学勤《王鼎的性质与时代》，《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李学勤《续释“寻”字》，《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6期。

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文物》1959年第7—9期。

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李运富《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岳麓书社1992年版。

李宗焜《殷墟甲骨文字表》，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5年。

梁东汉《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

林宏明《战国中山国文字构形研究》，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7年。

林钦娟《〈石鼓文〉：秦系文字构形演化发展的枢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林清源《楚国文字构形演变研究》，私立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

林清源《从“造”字看春秋战国文字异形现象》，《第三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2年。

林清源《释“参”》，《古文字研究》第24辑，中华书局2002年版。

林清源《新旧交替——论楚国文字构形的时代特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6本第4分册，2005年。

林清源《战国“冶”字异形的衍生与制约及其区域特征》，《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

林素清《论战国文字的增繁现象》，《中国文字》新13期，艺文印书馆1990年版。

林小安《甲骨文“庚”字说解》，《古文字研究》第25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

林小安《殷契六书研究（一）》，《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

林义光《文源》（线装本三册），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依写本石印，1920年。

林沄《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林沄《古文字转注举例》，《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林沄《释眴》，《古文字研究》第24辑，中华书局2002年版。

林沄《说戚、我》，《古文字研究》第17辑，中华书局1989年版。

林沄《四版〈金文编〉商榷》，江苏太仓古文字学年会论文，1990年。

林沄《王、士同源及相关问题》，《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

书出版社 1998 年版。

林沄《先秦古文字中待探索的偏旁》，《古文字研究》第 21 辑，中华书局 2001 年版。

林志强《汉字的阐释》，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刘凤山《隶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年。

刘信芳《郭店简〈语丛〉文字试解（七则）》，李学勤、谢桂华《简帛研究》（200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刘雨《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刘钊《“稽”字考论》，《中国文字研究》第 6 辑，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刘钊《包山楚简文字考释》，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东方文化》1998 年第 1、2 期。

刘钊《出土简帛文字丛考》，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 2004 年版。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刘钊《古文字考释丛稿》，岳麓书社 2005 年版。

刘钊《古文字中的合文、借笔、借字》，《古文字研究》第 21 辑，中华书局 2001 年版。

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刘钊《释甲骨文藉、羲、螳、敖、𠄎诸字》，《吉林大学学报》1990 年第 2 期。

刘钊《叔夭方鼎铭文管见》，《黄胜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 2005 年版。

刘钊《谈考古资料在〈说文〉研究中的重要性》，《中国古文字研究》第 1 辑，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刘钊《谈史密簋铭文中的“肩”字》，《考古》1995 年第 5 期。

刘志基《汉字体态论》，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刘志基《试说殷商金文中的非通用构件》，《中国文字研究》第 6 辑，广西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

罗福颐《古玺文编》，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

罗福颐《汉印文字征》，文物出版社 1982 年版。

罗琨《甲骨文“閔”字探析》，《古文字研究》第 25 辑，中华书局 2004 年版。

罗运环《论楚国金文“月”“肉”“舟”及“止”“止”“出”的演变规律》，《江汉考古》1989 年第 2 期。

罗运环《论楚文字的演变规律》，《古文字研究》第 22 辑，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M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三)，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四)，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四)，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马国权《鸟虫书论稿》，《古文字研究》第 10 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马国权《战国楚竹简文字略说》，《古文字研究》第 3 辑，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马海江《古汉字中象事造字法构形特点新探》，《东北师大学报》2005 年第 4 期。

马海江《试论象事造字法的构形特点》，《东北师大学报》1996 年第 4 期。

马宗霍《〈说文解字〉引〈方言〉考》，科学出版社 1959 年版。

P

骈宇騫《银雀山汉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 2001 年版。

Q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 年第 5 期。

邱莹霓《东周齐国书风研究》，台湾艺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7 年。

裘锡圭《“司马闻”“闻司马”考》，《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裘锡圭《〈秦汉魏晋篆隶资料字形表〉读后记》，《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裘锡圭《〈睡虎地秦墓竹简〉注释商榷》，《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裘锡圭《〈说文解字〉与出土古文字》，《说文解字研究》第 1 辑，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裘锡圭《异字补释》，《语言学论丛》第 6 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裘锡圭《卜辞“异”字和〈诗〉、〈书〉里的“式”字》，《中国语言学报》第 1 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

裘锡圭《从马王堆一号汉墓“遣册”谈关于古隶的一些问题》，《考古》1974 年第 3 期。

裘锡圭《读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考古》1972 年第 5 期。

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裘锡圭《汉字的性质》，《中国语文》1985 年第 1 期。

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 年第 3 期。

裘锡圭《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丰、鞀》，《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裘锡圭《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

裘锡圭《甲骨文字考释（八篇）》，《古文字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裘锡圭《裘锡圭自选集》，大象出版社1994年版。

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文物》1978年第3期。

裘锡圭《释“秘”》，《古文字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裘锡圭《释“討”》，《龙宇纯先生七秩晋五寿庆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2002年版。

裘锡圭《释“勿”“发”》，《中国语文研究》1981年第2期。

裘锡圭《释“衍”“侃”》，《鲁实先先生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3年。

裘锡圭《释建》，《古文字研究》第17辑，中华书局1989年版。

裘锡圭《释殷墟卜辞中的“卒”和“禘”》，《中原文物》1990年第3期。

裘锡圭《释殷墟卜辞中与建筑有关的两个词——“门塾”和“自”》，《出土文献研究续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裘锡圭《释殷墟甲骨文的“远”“𡗗”（迓）及有关诸字》，《古文字研究》第12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

裘锡圭《说“勺凡有疾”》，《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1期。

裘锡圭《说“岩”“严”》，《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

裘锡圭《说字小记》，《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裘锡圭《谈谈上博简和郭店简中的错别字》，《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裘锡圭《西周金文中的“履”》，《甲骨文与殷商史》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裘锡圭《殷墟甲骨文“彗”字补说》，《华学》第2辑，1997年。

裘锡圭《殷墟甲骨文字考释七篇》，《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裘锡圭《战国货币考》，《北京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

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裘锡圭《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权东五《甲骨文形声字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

R

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

S

沙宗元《古汉字字形讹变现象初探》，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盟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商承祚《先秦货币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沈建华《甲骨文所见几种异体字释例》，《中国古文字研究》第1辑，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沈培《卜辞“雉众”补释》，《语言学论丛》第26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沈培《周原甲骨文里“囟”和楚墓逐渐里的“囟”或“思”》，《汉字研究》第1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

施顺生《甲骨文异字同形之探讨》，《第十三届全国暨海峡两岸中国文字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

施顺生《甲骨文字形体演变规律之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

[日]释空海《篆隶万象名义》，中华书局1995年版。

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宋鹏飞《殷周金文形声字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1年。

孙常叙《假借形声和先秦文字的性质》，《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孙常叙《孙常叙古文字学论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孙慰祖、徐谷富《秦汉金文汇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孙雪英《试论古文字阶段形声字形符的演变》，《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T

汤可敬《〈说文〉多形多声说研究》，《说文解字研究》第1辑，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汤余惠《读金文琐记》，《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

汤余惠《郢钟铭文补释》，《古文字研究》第20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

汤余惠《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古文字研究》第15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

汤余惠《战国铭文选》，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汤余惠《战国文字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汤余惠《战国文字形体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4年。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齐鲁书社1981年版。

唐兰《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辅仁大学丛书之一，1939年影印本。

唐兰《殷虚文字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

唐兰《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五十三篇的考释》，《古文字研究》第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唐兰《周王缺钟考》，《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年刊》，1936年。

W

-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 王恩田《释自、官、师》，《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王贵民《申论契文“雉众”为陈师说》，《文物研究》1985年第1期。
- 王贵元《马王堆帛书构形系统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版。
- 王辉《释帛、𠄎》，《古文字研究》第22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
- 王建民《从马王堆医书中的俗字看汉字形声化》，张显成《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第1辑，巴蜀书社2002年版。
- 王宁《20世纪汉字问题的争论与跨世纪的汉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 王宁《汉字构形理据与现代汉字部件拆分》，《语文建设》1997年第3期。
- 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 王宁《系统论与汉字构形学的创建》，《暨南学报》2000年第2期。
- 王帅《西周早期金文字形书体演变研究与断代》，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 王蕴智《古文字同源分化的三种方式》，《汉字研究》第1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
- 王蕴智《同源字例释三组》，《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 王蕴智《殷周古文同源分化现象探索》，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王振华《古越阁收藏的几件古代兵器》，《文物》1993年第8期。
- 魏宜辉《楚系简帛文字形体讹变分析》，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3年。

魏宜辉《说“建”》，《古文字研究》第25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

沃兴华《类化字及其训诂法》，《于省吾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吴白匋《从出土秦简看秦汉早期隶书》，《文物》1978年第2期。

吴振武《“𠄎”字的形音义——为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而作》，《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版。

吴振武《〈古玺文编〉校订》，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4年。

吴振武《蔡家岗越王者旨于赐戈新释》，《古文字研究》第23辑，中华书局·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吴振武《鄂君启节“𠄎”字解》，《第二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1993年。

吴振武《古文字中的“注音形声字”》，《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文字学组：古文字与商周文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

吴振武《古文字中的借笔字》，《古文字研究》第20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

吴振武《古玺姓氏考》，《出土文献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98年版。

吴振武《假设之上的假设——金文“兼公”的文字学解释》，《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吴振武《试说齐国陶文中的“钟”和“溢”》，《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1期。

吴振武《燕国玺印中的“身”字》，《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吴振武《战国货币铭文中的“刀”》，《古文字研究》第10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吴振武《战国玺印中的“虞”和“衡鹿”》，《江汉考古》1991年第3期。

X

向光忠《古文字与古声韵之参究刍说——兼示〈说文〉古籀篆文谐声系统之学术价值》，《说文学研究》第1辑，崇文书局2004年版。

谢光辉《秦文字形体研究》，《古文字与汉语史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许进雄《判定字形演变方向的原则》，《古文字与商周文明》（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2001年。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

许倬辉《〈说文〉同形字探究》，《第十八届中国文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

许文献《先秦楚系文字声符替换结构初探》，《第十三届全国暨海峡两岸中国文字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

许文献《战国楚系多声符字研究》，彰化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Y

闫华《古文字中的讹变现象举要》，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严志斌《四版〈金文编〉校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中华书局1997年版。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中华书局1983年版。

杨五铭《西周金文数位合文初探》，《古文字研究》第5辑，1981年。

杨郁彦《甲骨文同形字疏要》，台湾辅仁大学硕士论文，2004年。

杨泽生《战国竹书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姚淦铭《论两周金文形体结构演变规律》，《苏州科技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

姚淦铭《论西周铜器文字演变的轨迹》，《苏州科技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

姚荣松《从方言字的系统比较看汉字的多元体系》，《第七届中国文字学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版。

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

姚孝遂、肖丁《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版。

姚孝遂《古文字的符号化问题》，《古文字论集初编》，香港中文大学1983年。

姚孝遂《古文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古文字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姚孝遂《甲骨文形体结构分析》，《古文字研究》第20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

姚孝遂《论文字形体的整体性》，《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5期。

姚孝遂《论形符与声符的相对性》，《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姚孝遂《文字形体的分化及其不可逆性》，《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姚孝遂《再论古汉字的性质》，《古文字研究》第17辑，中华书局1989年版。

姚萱《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的初步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叶玉英《〈文源〉的文字学理论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于豪亮《陕西省扶风县强家村出土虢季家族铜器铭文考释》，《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

于豪亮《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1985年版。

于豪亮《曾侯乙墓出土于随县解》，《于豪亮学术文存》，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于省吾《“鄂君启节”考释》，《考古》1963 年第 8 期。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虞万里《由简牍字形的隶定分析形声字通假的背景》，《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袁国华《望山楚简校录·江陵望山楚简“青帝”考释》，艺文印书馆 2004 年版。

袁家麟《汉字纯双声符字例证》，《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 2 期。

云惟利《汉字演进过程中声化趋势的研究》，南洋大学研究院亚洲人文研究所硕士论文，1973 年。

Z

曾宪通、杨泽生《秦駉玉版文字初探》，《考古与文物》2001 年第 1 期。

曾宪通《“高”及相关诸字考辨》，《古文字研究》第 22 辑，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曾宪通《长沙楚帛书文字编》，中华书局 1993 年版。

曾宪通《楚文字释丛(五则)》，《中山大学学报》1996 年第 3 期。

曾宪通《三体石经古文与〈说文〉古文合证》，《古文字研究》第 7 辑，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曾宪通《吴王钟铭考释——薛氏〈款识〉商钟四新解》，《古文字学与语言学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曾宪通《曾宪通学术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詹今惠《先秦同形字研究举要》，台湾政治大学硕士论文，2004 年。

詹鄞鑫《释甲骨文“兆”字》，《古文字研究》第 24 辑，中华书局

2002年版。

湛玉书《论文字羨余现象》，《语言研究》2005年第3期。

张桂光《读〈甲骨文字诂林〉札记三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

张桂光《古文字考释六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

张桂光《古文字考释十四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

张桂光《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

张桂光《古文字义近形旁通用条件的探讨》，《古文字研究》第19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

张桂光《古文字中的形体讹变》，《古文字研究》第15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

张桂光《甲骨文形符系统特征的探讨》，《古文字研究》第20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

张桂光《金文形符系统特征的探讨》，《中国文字》新29期，艺文印书馆2003年版。

张颌《张颌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张静《郭店楚简文字研究》，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张懋镕《金文字形书体与二十世纪的西周铜器断代研究》，《古文字研究》第26辑，中华书局2006年版。

张懋镕《试论商周青铜器族徽文字的结构特点》，《古文字研究》第25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

张其昀《“说文学”源流考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张儒《关于竹书、帛书通假字的考察》，《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张世超《金文形义通解》，中文出版社1996年版。

张世超《战国秦汉时期用字现象举隅》，《中国文字研究》第1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 张守中《包山楚简文字编》，文物出版社 1996 年版。
- 张守中《中山王髹器文字编》，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 张希峰《古文字形体分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建所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 张希峰《简论古文字形体的分化形式及其相互补足和运用》，《古文字研究》第 22 辑，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 张晓明《春秋战国金文字体演变研究》，齐鲁书社 2006 年版。
- 张新俊《上博楚简文字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年。
- 张亚初《谈古文字中的变形造字法》，《庆祝苏秉琦先生考古五十五周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89 年版。
- 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 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 1995 年版。
- 张玉金《释甲骨文中的“𠄎”》，《出土文献研究》第 5 辑，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 张再兴《西周金文文字系统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 张振林《古文字中的羡符——与字音字义无关的笔画》，《中国文字研究》第 2 辑，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 赵诚《古文字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调整》，《古文字研究》第 10 辑，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 赵诚《甲骨文的二重性及其构形关系》，《古文字研究》第 6 辑，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 赵诚《甲骨文简明词典》，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 赵平安《〈说文〉小篆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 赵平安《汉字声化论稿》，《河北大学学报》1990 年第 2 期。
- 赵平安《汉字形体结构围绕字音字义的表现而进行的改造》，《中国文字研究》第 1 辑，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 赵平安《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 赵学清《战国东方五国文字的构形系统》，《古文字研究》第 23 辑，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赵学清《战国齐、燕、韩、赵、魏五国“文字异形”及成因概说》，《汉字研究》第1辑，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

郑春兰《从甲骨文看〈说文〉或体》，《语言研究》2006年第2期。

郑刚《战国文字中的同源词和同源字》，《中国文字》新20期，艺文印书馆1995年版。

郑慧生《释“井”》，《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宋]郑樵《通志略》，中华书局1995年版。

郑振峰《甲骨文字构形系统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

周宝宏《古陶文形体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周法高《金文诂林》，香港中文大学1975年版。

朱德熙、李家浩《鄂君启节考释(八篇)》，《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

朱德熙、裘锡圭《战国文字研究六种·寿县楚器铭文中的脰和𦉑》，《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朱德熙《长沙帛书考释(五篇)》，《古文字研究》第19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

朱德熙《古文字考释四篇》，《古文字研究》第8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朱德熙《战国陶文和玺印文字中的“者”字》，《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

朱德熙《中山王器的祀字》，《文物》1987年第11期。

朱德熙《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

朱歧祥《论子组卜辞中一些同版异文现象——由花园庄甲骨说起》，《古文字研究》第23辑，中华书局·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邹晓丽等《甲骨文字学述要》，岳麓书社1999年版。

后 记

5月,西校门内的木棉花又绽放了。因为没有树叶,高高的枝头上一朵朵红艳艳的木棉花就显得特别夺目。在这美丽的木棉花开的时节,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幸得到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资助,终于有机会面世了。虽然拿出拙文心怀忐忑,但仍觉得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2006年6月,我在博士论文“后记”中写道:“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终于草就。我没有写结语,因为我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金矿,但只是刚刚进了洞口,里面还有无数宝贝等我去挖掘,也许用我的一生也完成不了这项工作。想到这一点,我就无比兴奋,很高兴有了一生的奋斗目标。”如今,三年过去了,我仍然无法写结语,因为我还徘徊在洞口。三年来,我唯一的长进就是做了一个决定——忝列首都师范大学冯蒸先生门下做博士后,继续我的淘金工作。我很惭愧!只好厚着脸皮对所有关心我的师友们说:“我还需要时间,我……”

今天收到我的博士导师刘钊先生为本书写的序。刘钊师在序中说:“如果假以时日,相信她会在古文字与音韵学之间找到最好的接口,沟通嫁接,探寻出新的学术之路,为传统的文字学和音韵学研究再立新功。”面对老师的鼓励和信任,我别无选择,我只能说:“老师,我会努力的,不会辜负您的期望!”

前些天到福州,又见到了我的硕士导师林志强先生。志强师一直用他纯洁的学人之心和宽厚的为人之道引领着我。常常有人问我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古文字学,为什么喜欢古文字学?我就骄傲地对他说:“那是因为我的恩师林志强老师,他对古文字学的执著和热爱,深切地感染了我。”自从志强师领我走进古文字殿堂之后,我就一直把古文字学比作圣洁、高雅而又迷人的紫罗兰。那是我心中的紫罗兰,我心中的古文字学,我生命的源泉!

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冯蒸先生得知我的博士论文终于要出书的消息后真心地为我高兴,他一直很关心这件事。冯蒸师为人真挚善良,专心学术,音韵学的造诣精湛。每当我对上古音研究有畏难情绪的时候,冯蒸师总是用他的热情爽朗激励我,我的心里暖洋洋的。

郑张尚芳先生也是对我寄予厚望的学者之一。2005年10月,郑张先生来厦大开会,我第一次有幸见到这位我景仰已久的学者。先生的大家风范、唯学至上的精神令我终身难忘。在我的博士论文写作期间,郑张先生在百忙之中为我把关,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我受益良多。2008年夏秋之际,我前往北京,到郑张先生家登门求教。先生总是一坐下来就跟我谈音韵学。在很多人看来非常枯燥的音韵学,郑张先生却能讲得娓娓动听。我听得入迷,每次都舍不得离去。离开北京之后,郑张先生还常常在电子邮件中为我答疑解惑。能得到先生的悉心指导,可谓三生有幸啊!

中山大学陈伟武先生、华东师范大学詹鄞鑫先生、台湾学者季旭升先生,还有厦门大学李无未先生、陈支平先生等前辈学者一直关注我的成长,在我攀登学术高峰的过程中,时常给我鼓励和帮助。我心感念之,没齿不忘!

在人生的道路上,良师益友是一个人最宝贵的财富。我就是一个人非常富有的人,我不仅遇到这么多关心爱护我的师长,还有

许多真诚的朋友。朋友们跟我一起分享人生的快乐和痛苦,为我的工作和学习减压,我感谢他们!

我的母亲是为我付出最多的人,我从小羸弱多病,耗费母亲无数的心血。成家之后,母亲一直为我操持家务,照顾孩子。1995年,我重新开始学习,从函授专科、自考本科,到考研、读硕、攻博,直到今天,母亲始终默默地为我承担了我作为女人应该承担的家庭义务,为我的学习和工作免去后顾之忧,使我能够一心问学。母亲用她无私的爱陪伴着我,我好幸福!

最后,我还是要引用刘钊师给我的一句话:“这本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新著,正可以当作再攀高峰的第一级台阶。”恩师所言极是。本书的出版,只是我对师友亲朋一个暂时的交代,只是我走向学术道路的第一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心向往之,无怨无悔。

叶玉英

2009年7月6日深夜

写于鼓浪屿家中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资助出版丛书◎ 之十

古文字构形与上古音研究



责任编辑 薛鹏志

封面设计 李 钢

美术编辑 夏 林

H0259-1-1

ISBN 978-7-5615-3323-9



9 787561 533239 >

定价:38.00元